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思忆文丛

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代序

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盲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已经很模糊。最近出版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的最全面、最直接的呈现。文丛分三卷：《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这三个意味深长的意象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想起含冤的窦娥、想起逐日的夸父、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文丛汇集了大大小小的右派们的文字，而不加任何评点和阐释——呈现本身即有其价值，对事实客观的呈现体现了人类成熟的历史理性精神，呈现事实能够使后人深思：悲剧是如何诞生的？右派们的悲剧就在于对“说，还是不说”的判断。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说”，结果为“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数十年的牢狱之灾，或者是妻离子散，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例如，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著名学者张奚若在5月15日的会议上指出执政党存在的四点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二，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本来，这是正常的提意见，没有料到却招致毛泽东强烈而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急，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让对方说话。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说话、在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们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们的批评可能有偏差，他们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他们绝对没有颠覆政权的意思。然而，对他们的惩罚却是按照对待颠覆者的标准来实施的。

“说”的自由，即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公民都拥有了七嘴八舌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层保障。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今天重读当年右派们尘封已久的文字，让人感到历史的奇诡——对自由的争取，却使自己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思忆文丛》编辑出版的过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钱理群教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而且几乎参与到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之中。

好几次别的学术活动，他都匆匆来去，说是要赶回家与邓九平先生面谈这套书的编辑事宜。钱理群先生十分珍视这笔“不可抹煞的思想遗产”，而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珍惜这笔思想遗产，也就意味着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权利。

转自《南方周末》

前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

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宫刑，苟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

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們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 1957 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贾植芳

时势变迁，胡风这个名字，对现在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相当陌生的；本传记前面几章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有关 30 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内部纠葛，以及抗战中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恐怕也是难以理解的，就仿佛是有人在说一段古老的神话传说，让人似信非信，疑疑惑惑，甚至觉得不知所云。不过不要紧，只要读者耐心地读下去，慢慢地，一些令人感动的东西就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就是历史，一部中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通过胡风这么一个现在似乎陌生的名字而得以流传。

从 50 年代开始，胡风的名字在中国就成了不祥的象征，一个知识分子罪恶的代表。但从本传记可以看到，胡风一生所追求的，恰恰是与历史所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相反，他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在五十年代初，他还欢欣鼓舞地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来歌颂毛泽东。可奇怪的是，他所有的追求、赤诚和歌颂都未能取信于当局，反而被视为异端，一再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否定和怀疑，就像历史上的屈原，“信而被谤，忠而见疑”。由于对建国以来文艺实践状况十分忧虑，而自己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又遭到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歪曲和批判，便向最高当局上书“三十万言”，直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领导能过问一下文艺这领域。他万万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而且株连了家人和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了 50 年代我国许多文化灾难中的第一件大冤案。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故事竟会发生在人类已经进化到现代社会的 20 世纪，实在是令人太遗憾了，因而也实在是令人大心酸了！

本书写到胡风在 1955 年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以后，在监狱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这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心态。可惜的是，这面“圣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还是在

那儿“朦胧”着。传记里写到，历史像变戏法似地在那儿变着，可是胡风的遭遇却始终让人扼腕叹息：1966 他们落井下石，反过来“揭发批判”一通，因此，他的命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罪加一等，由已到期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76 年，“四人帮”倒台了，胡风却因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毛批胡风的“按语”，又被与“四人帮”挂起钩来批判，而且似乎比“四人帮”还要可恶，起码是罪行不下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一般文艺界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而胡风却仍然不能出席，直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不得被平反时，还对他的“政治历史”的问题和文艺思想问题留下了“尾巴”，甚至在他死后，一篇小小的悼词，还闹了许多的风波，以至在去世 7 个月后，追悼会才得以开成！这么一件明摆着的政治迫害事件，却要平反三次，可以说是极耐人寻味。尽管有些当初迫害胡风的人后来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可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的受迫害是真正的冤案，而胡风却是活该！这种政治上被视为异己的滋味，在今天政治观念普遍冷漠的读者看来，似乎很难体会，但对胡风来说，这精神上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正应了前几年流传着的一句民谣：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于是，胡风从期望到绝望，从自信到幻灭，以至精神分裂，在幻觉中不断感到有人在迫害他，摧残他。但即使病到了这个地步，他心中真正期望的还是这面朦胧的“圣旗”，这面他至死也没有真正望到的心中的“圣旗”。在这个意义上，当我读到传记最后，胡风夫人梅志将胡风死后三年才给以彻底平反的一纸通知送到老胡灵前那段时，我的眼睛不觉模糊起来了。

我说这本传记越写到后来越精彩，还有另一个意思。作者晓风是胡风的女儿。

她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生于战乱的逃难途中，书中写到四川的老鼠将婴儿鼻子咬破一节，这婴儿就是晓风。长于患难之中，才念中学，就逢 1955 年的大难，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梅志的老母亲死于忧患中），没能受到高等教育，不得不在农场劳动了 20 年。苦难伴随了她的大半生。直到冤案逐渐平反，政策逐渐落实，她才调到胡风身边，担任胡风的秘书，帮父亲整理著作，编出了好几本有历史价值的书籍。这次写《胡风传》是她第一次执笔写长篇著作。看得出，前半部分的材料主要得之于她父母的文字材料，写起来多少有点距离，但写到后来，逐渐地把她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感情放进去了，特别是最后几章，如胡风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和出狱后的遭遇，可以说是用血写出来的文字，都很值得细读。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来到上海，住在诗人覃子豪亲戚的洋房里，胡风带孩子来玩，走时将晓风留下陪我们。这时姑娘又瘦又小，病怏怏的，当晚就生起病发起烧来，我们夫妇没有带过孩子，急得不知所措，整个晚上就坐在她身边护理她；惟恐她病得太厉害。今天我读着晓风写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著作时，我眼前不断出现那晚上她烧得通红的小脸。这人世间许多不可捉摸的命运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1995

重逢胡风

牛汉

—

写下题目已有两天，左思右想真不知如何下笔，洁白的稿纸放在面前，字格就像雷达密密的网眼逼视我，等着捕捉我起伏不定的思绪。心情着实有些惶惑和沮丧。已经撕了四五张无辜的稿纸，仍开不好头，总觉得写到纸上的字句近乎那种睚眦不久令人憎恶的交代体。直到一分钟前，才从困恼中挣扎出来，并且得以顿悟：有些重逢如实记述，其实跟交代并无差别；就拿我此刻的心境来说，的确是怀着向历史作交代的庄严心情，在交代中不应有虚构的情节，更不能以超然物外的技艺去描绘，只能存留历史的印痕，如若把它当作一般奇文佚事去阅读，那是要失望的，因为其中绝对找不到赏心悦目的词藻和谐趣。

1980 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记得 50 年代初，他也曾有过巨大的苦恼，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急速走动。有一回我问他：“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境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1980 打招呼，可以去看望胡风。这考虑是很对的，人既然恢复了自由，过去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相会？特别是他的精神陷于病痛中，旧雨相逢，或可滋润他的心灵。这样我才去看望了他。悠悠然阔别了 1/4 世纪，终于又能坐在一起晤谈，重逢的情景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但是，记述这次重逢之前，我必须先得交代（我又习惯地使用了这个词）十几年前的一次“重逢”。在 25 年的分隔期间，我和胡风并不是一回都没有碰到过，说的不是幻梦，我真的曾与他见过面，但那是一次更使人难忘的不同寻常的“重逢”。

二

1965 行之前，接到通知，我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位“分子”到会上发言，其实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层·层坐席，中间的空旷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呼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就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仅有的一身深蓝色哔叽衣裳，领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有所区别。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眼睛，似乎要淹没了我，我自然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向他认真地望了一下，比起 10 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而已，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他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很陌生，陌生这词

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二字较为贴切。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经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1982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谈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到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现在全忘记了。”没有再说第二句。

法庭最后宣布判决词，我们几个鱼贯进入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一个人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在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说话。随即法警把胡风带了出去。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了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

那天芦甸非场钉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么，我一生记着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交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

三

现在还不能接着写1980年夏天我与胡风重逢的事。还必须记述1979年下半年我与胡风通信的情况，胡风当时在成都。在我看，通信是心灵的重逢，但我是怎么与胡风通起信来的呢？1978年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几十年之久了。“四人帮”覆灭后，我和黄沫同志（他当时是编辑组长）是北京报刊和出版社首次叩访萧军并向他约稿的编辑。说来惶愧，当时我还没有平反哩。但我心里确信萧军会记得我，并且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向他约稿就是我的倡议，我相信萧军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人。多年睽别，他的体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过的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并答应写稿，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筒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已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我踏上萧军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悲抑声，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欢快的声调告诉我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说：“牛汉，应当写信去、坦坦荡荡，有什么怕的？《新文学史料》应当给他寄去看看。”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给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史料》的第二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讯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 8 月 16 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 H.F。看到阔别多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泫然而下。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页，说收到了我寄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当时人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之手。）这封信，我让全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20 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基本上已成过去的灾难，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内心的友情，灾难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内涵。梅志同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简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境况外，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有血肉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 80 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不少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稿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因为与世隔绝多年的路翎，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汇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几乎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关于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

收到我的信，胡风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至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信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尽冬上》等小说，“即使到 1955 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锢，并没有把他的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

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个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树立高大的丰碑，他提到的前三位是大家可想到的，胡风如此器重柳青，如没有经过多年认真的思考，他不会轻易写上的。我只记得 50 年代胡风以肯定的语气谈过柳青的《种谷记》，说是一部艺术气质纯正的作品，很可能后来又读了《创业史》受到了感动，引起许多艺术上的思考，他从文学发展和艺术审美的高度，热情地肯定了这位在“文革”中冤死的作家。

胡风还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这几位文坛巨擘，他将从历史广阔的背景深入地评论他们，并通过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得失。经过 20 多年“井中观天”，非但看不出他有消沉倦怠的情绪；经过沉淀、磨炼，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清明起来。

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信，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

他和你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 20 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的独白。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罄的屈辱、孤独、悲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20 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的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不得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年之后，我问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 1979 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颤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黎和绿原。

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理念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的东西。而形式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诫。

1979 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由，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 1979 年的健康水平。

四

前面已说过，胡风于 1980 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

当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风时，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已是上午10时光景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候你来。”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

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坐定之后，我看清了睽别多年的胡风，他的容颜和体态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显的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 and 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无数个艰难的岁月（几年前，聂绀弩从晋南出狱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看望，过去总是衣冠楚楚裤线如刃的小生型的杂文家，也是穿着一身灰乌乌的皱皱巴巴的布衣裳。

大概多年呆在牢里的人，容颜与衣服都会被时光老人涂抹成这个样子。关于与老聂的重逢，我将专文记述）。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1955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在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深深的愧疚。这许多年，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也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逐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

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个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的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摇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慰性的套话，我决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象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话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这个症候吧。至于衰老瘦弱和对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这都是正常的。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

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有能再完全恢复过来。几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并与真实的人生和他在半个多世纪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已成为古人，不会再跟他重逢了。但是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还要近些。

1987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邵燕祥

—

继 1980 年、1985 年从政治、历史方面为胡风平反之后，1988 年 6 月，有关部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后，又进一步予以平反。至此，如报纸标题所说，33 年前的一大错案得到彻底纠正。

旧的冤假错案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呢？我以为现在会有，将来还会有。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投不信任票呢？不。这样的认识恰恰符合三中全会以来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认识，才能使我们自觉地实事求是地去纠正晚近发生的错误，并且尽量避免犯更多的新错误。

毛泽东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说过不但在错误的路线下，而且在正确的路线下也会发生对人的错误处理这种情况。他着重指出其认识论上的根源。

此外还有实践上的根源：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以外的权威有可能干预法律的执行，乃至取代法律；以及旧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制没有经过根本改革；等等。

关于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胡风曾经说某些文艺工作干部的领导权只是建立在“内部文件”的基础上，实际是批评从决策到执行过程中不必要地造成的某种神秘性；正如不久前一位政治学家指出的目前依然严重存在的“简报政治”现象一样，这都使领导部门不能全面地客观地了解实际，也不能全面地客观地体察群众的意愿和情绪，不但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和不同意见无由上达，而且即使领导层内有对错误决策的不同意见也不起作用。这就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循环受到破坏。

这就是错误决策和对错误决策的执行的由来，也是相当一部分冤假错案的由来。

自然，一切历史遗留的错案终归都要平反的；但是动辄三五十年，损失实在太大了。

二

我认为，胡风是一位长期不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被诬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胡风早在 30 年代提出的若干文艺观点属于左翼文艺活动内部的不同意见；后来，他的文艺思想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体系。

胡风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向科学和民主的回归：我们可以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并且承认认识伴随着一个实践过程了。

这个历史事件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学派，而且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学派。

只有积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外部大量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才能克服内部的教条主义表现，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恩格斯 1891 年 5 月 1、2 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

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得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那是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啊：而如果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学术自由和批评自由，不能形成鼓励而不是压制一切科学探索的气氛和环境，则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值得怀疑的——借助于恩格斯所批评的“普鲁士作风”和强制手段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是虚假的权威。

没有良好的文化气氛和民主的舆论环境，也就没有我们日夜期望的真正的团结——党与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的团结，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人们之间的团结。

这不是已被历史多次证明了的吗？！

三

我们要重新认识、提倡并且认真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所以长期不振，是因为我们自 50 年代中后期起从整体上败坏了它的名声：我们声言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只许我批评你，不许你批评我；只要别人作自我批评，自己从来不作自我批评；少数人是专事批评——批判以至整人的，多数人是专事“自我批评”，凡此种种，过来人都很熟悉。胡风就是以批评建议始，以被迫“自我批评”直至受到惩罚终，大家对此也记忆犹新。

可以说，三十多年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变质，就标志着党风不正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拨乱反正中清理、反思历史旧案，纠正错误，是自觉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也是端正党风的努力；目前党内不正之风的猖獗，一方面由于法制不健全，党组织不纯，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政治上、道德上没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则贯彻到底，许多地方和部门整党走了过场，党员素质降低，不少党员不是在干好事而是在干坏事上起了“带头作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万灵药方，但它表示一个郑重的党的自信和有力，

有助于联系人民群众，加强内外团结，改善政治形象和恢复政治信用。

四

胡风错案的彻底纠正，再一次证明党能够自己改正错误，这当然包括了能够认真听取党外的批评，也能够克服自己内部的错误意见。

但是，胡风错案经过 35 年并经过三步才得彻底平反，也证明对“党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应有必要的信心，但不应持绝对化的态度，导致狭隘的理解；如果早有更健全的社会舆论机制，法律机制，群众民主监督机制，也许能更及时地彻底改正错误，或防止错误于未然而了。1957 年鸣放中不是就有从法制和民主的角度对胡风问题的不同意见吗？结果这些鸣放者通通被划为右派了。

我们为违反法制、违反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经过“开庭审理”等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依法办事，正如仅仅实行划圈投票并不意味着民主一样，——即使不把从胡风到共和国主席在内的个人代价计算在内，单是迟滞了国家发展、窒息了社会生机的后果已是惨痛的了，尚堪告慰的是我们终于由此认识到历史上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

对目前的以至将来的工作，如何吸引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社会监督，随时检查、甄别，及时纠正在各项工作中已经出现的或刚刚冒头的错误，不使它扩大和恶性发展呢？谁该享有民主，谁该受到专政；保护什么人，打击什么人：这个敌我友的界线，万万不可混淆，不可颠倒。

法制与民主，这是关系到党与人民的关系，因而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事，是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并且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五

从胡风案件可以接受的另一个教训，就是需要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的同时，改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干部的素质。

参与对胡风案件错误处理的干部，大概无一例外的都是“知识化”、“专业化”的（“革命化”当然更无可置疑），这没能改变胡风案件反文明、反文化的性质，整个案件的过程表现了深度的野蛮和蒙昧，并示范鼓励了后来的野蛮和蒙昧。

由此可见，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不能代替干部文化化或文明化。

我们对普通公民提出的“四有”要求之一是“有文化”，我们对干部提出“文化化”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求市民订出公约来做“文明市民”，难道不应该首先要求市长做“文明市长”吗？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知识和专业，而且包括理想和道德，更重要的是包括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因此，干部文化化必然包括：一、决策和执行科学化——科学而不蒙昧，保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实事求是；二、决策和执行的民主化——民主而不专制，不搞个人专断、长官意志，集思广益，接受监督。

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支柱。没有科学和民主，越是“革命化”越有损害人民利益、损害革命事业的危险。

过去对干部的文化要求，通常是从识字到有一定学历的文凭而已，这如同谈到党风的关键是官风，从而强调“不贪污不受贿”一样，只能说是对干部的最低要求。

然而，对于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干部，以至一切工作的干部的素质，今天是提出文化化的要求的时候了。不然，我们虽有逐步健全的法制与民主的制约，也将无法杜绝中世纪野蛮、蒙昧的悲剧的重演。

1988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康濯

—

这是 1955 年 5 月 13 日早晨，快八点钟了。刚要上班去，就接到了《人民日报》。

我知道今天这张报纸十分重要。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注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八百字的按语，是毛泽东同志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

我翻到报纸二、三版所载这些文稿，立即把按语和《自我批判》看了一遍。按语看得仔细，《自我批判》则只浏览了一番。

不，《自我批判》浏览到近一半，我就再也不能容许自己粗略地匆匆而读了。

自己作为当时《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风同志这篇检讨早已相当熟悉。正如编者按开头的介绍，胡风此文是“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就是说此文先后已有过一稿、二稿、三稿。发表的当然是三稿。然而我浏览了一阵就感到似有不对，便找出家中留有的二稿、三稿的打印件，再对照往下读陡经反复查对，终于发现《人民日报》排错了胡风的文章。

我曾在华北农村生活了多年，潜意识里早有个民间习俗中不祥的日子，即 5 月 13 日。但在我发现胡风的文章正是这天被错排之后，心里实在难过得不知所措，满脑子浮现的只是“凶日”和“不祥”。

这时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出是周扬同志，他焦急而又意外严厉

地责问道：“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不是我错了！”我已经胸有成竹，便尽量从容地给周扬同志答话，“我已经查对过，是《人民日报》排错了。”“《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你可不能反过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我如实汇报了错排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我们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九下电话我就去上班。到了编辑部，侯金镜也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的二、二版。他抬眼看看我说：“怎么搞的？《人民日报》登了个二稿加三稿附记！”我说：“是啊，我也查对了。”然后我就告诉了他周扬同志来电话的情况。他听到这件事周总理已经过问，便眉心打皱，苦着脸说了一句：“怎么办呐！”当时《文艺报》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我、侯金镜和秦兆阳三个常务编委，而秦兆阳正请假在写作。我和侯金镜已在前两天商量好，今天拿到《人民日报》以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现在当然按计划办事。关于《人民日报》登错了胡风的检讨，以及胡风向周总理反映后总理已向周扬提出责问的事，我们只给编辑部主任唐因、杨犁以及几位编辑组长唐达成、刘剑青等同志讲了一下，而没向编辑部全体宣布。

我们向编辑部宣布的主要是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经成了“反党集团”，性质变了。

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是由我们先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早已排出了清样，但是现在已由毛主席另写了按语并决定改由《人民日报》先发表了。而我们这一期出版的日期是在后天，即5月15日，现在已赶不上再转载胡风检讨和好芜材料，因此决定这一期不出了，而和下一期出合刊，时间仍在下一期5月30日出版。现在离发稿也只有几天，原来我们准备的批判胡风的稿件当中部没有提到“反党集团”性质的，因此现在我们必须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写对胡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

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同志，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骂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后，再同侯金镜同志商量决定，但是要快，今天上午就要外出，两天内希望能拿几十篇稿件回来。

我讲了这些，下面就由侯金镜同志主持会议，进行讨论并具体地落实，后来又又有电话找我，于是我先离开了会场。

这一次来电话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他在战争中的晋察冀解放区时是我的老上级，建国后也常见面。他在电话上对我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我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党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是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他说：“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我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

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我请邓拓同志考虑我的意见，他说：“可以研究。”九下电话，金镜同志又同我商量了一下组稿的名单。我知道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已经分了工，马上就要出发组稿了，便一面催大家赶快行动，同时又赶着去接另一个电话。这次电话又是周扬同志来的，他告诉我：默涵、水拍二同志已在他那里，叫我赶快去共同商量一件事。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

二

周扬同志在这个时候找林默涵、袁水拍同志和我商量的事，我估计一定是关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如何处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林默涵同志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的工作，特别是当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就是周扬、默涵代表中宣部具体指导的。

《文艺报》这一段集中力量批胡风，是从1954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的。1954年刊物22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四期合刊以及1955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1955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底为止，已经批判了六期。而胡风本人也早已开始写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检讨，并于1955年一月交给了我们《我的自我批判》，以后我们都称他一月交来的这篇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我们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诚恳地向他提了意见。2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编辑部打印分发给茅盾、夏衍等同志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我们认为他这份检讨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请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我们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同志，希望他能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我们发表。于是胡风又在3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我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地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具体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只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我们决定全文发表他这一《我的自我批判》三稿。

大概在同年的二、三月，《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同志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较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批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确实很重要，但有一些隐语和

暗号不容易看懂，于是又由默涵交给舒芜，请他分类编辑和注释。舒芜这批材料编写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九期发表。中宣部并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扬、默涵等同志的意见。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

《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13日就要装订好出厂，14日送到书店，15日期刊就已按时出版、发行、零售了。当时这是最快速度，是为了批判胡风的这一重要任务，经邓拓同志同意，刊物交由《人民日报》印刷厂印的。

但是这一期清样周扬同志9日晚并没及时退回。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了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两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然太好了，但是那就要快！要争取主席明天晚上把清样退回。否则，我们刊物就要脱期了。”周扬同志最后说：“我马上就送去。”过了一天，10日半夜，主席还没有退回清样。到了11日的一点多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看过了，也退回中宣部了，恐怕变动很大，天明以后上班时，默涵会带原件去找你，你在编辑部等他好了。”我心绪不宁地睡了一觉，天明上班后早早就和侯金镜一起坐在了办公室。大约八点半钟，默涵来了。他拿出原件，我首先看到的第一页，是周扬同志写给主席的这样一封信：“主席：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

阅。

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此致敬礼！

周扬五月九日”在周扬同志这同一页信上，有毛主席看过清样以后的回信：“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五月十一日”回信还有两段话，一段是：“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再有一段：“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这是主席退回的原件第一页，第二页就是主席另外写的那个八百字的编者按。

再后面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文前我那个按语，主席画了个框框，中间打了个大叉。最后是舒芜的材料，毛主席把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了，原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我还发现，主席看清样是很费力的，我们排的新五号字，很小、很密，主席一边看，一边拿了一支铅笔，每一行每隔三、五个字都要旁边画一点，一直画了两万多字。

这就是前天、11日上午默涵带来的材料。我们抄下材料上主席新写的按语，并和默涵商量了《文艺报》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后，默涵就带着材料去了《人民日报》。

当时中宣部已同《人民日报》商定，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13日发表。

默涵走后，我和侯金镜有一段谈话。开始我们两人都有些发懵，因为我们经手了将近半年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这件事，突然变成了揭发反党集团的斗争，难免一下接受不了；同时问题的性质一变，我们刊物的工作自然也就必须有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我们准备的批判稿件恐怕都不能用了，而最近这个第九期也无法出版了。因为我们的清样已不能用，况且批判稿也要改，这是两天时间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的。

于是我们商量以后决定，已经排了的第九期刊物不要了，干脆编一本九、十期合刊，晚半个月出版。并在后天《人民日报》发表主席的《按语》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后，立即动员编辑部同志组织一批揭发胡风反党集团和表态的短文，在九、十期合刊上发表。

接着，我打电话给周扬同志，汇报了《文艺报》改出两期合刊和组织新的稿件的措施，得到他的同意。然后，我向他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变成反党、也就是敌人了；并说：“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同志也和我差不多。”周扬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又说，他也没有想到主席会这样改变性质。我说：“主席提得太高了。”他说：“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这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检讨和胡风反党集团材料的前夕发生的情况。也是我今天、5月13日上午，应周扬同志电话之邀去他家开会之前，脑子里又回忆一遍的情况。

当时周扬同志住在东四头条老文化部的西院，我到他家的时候已过了十点钟，到后就开会。周扬同志让袁水拍先讲，水拍说：“康濯同志是讲得对的，我们《人民日报》排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是没有按《文艺报》

清样上的胡风三稿、也就是最后定稿去排，而的确是排的胡风二稿加三稿的附记。”下面，水拍讲了他们错排的经过。他精神负担很重，情绪很低。讲话声音都很小。他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接到《文艺报》寄去的胡风检讨二稿以后，又听到我告诉他胡风这一稿基本上差不多了，这样，他就把胡风二稿早已送工厂排出了小样，这个二稿的清样并经过他们文艺部好几个同志仔细校对，他也亲自校对过；这一次，昨天晚上发稿，他的错误是没有亲自主持此事，只把原来排好的二稿清样和《文艺报》最后的清样交给文艺部几个同志，要他们再好好校一遍，然后发稿。谁知道他们并没有校对完，他们并不知道胡风还有个检讨的三稿，便只是把二稿的清样和《文艺报》的清样对照着校了一部分，结果发现每一段每一个字都相同，他们就以为《文艺报》的和他们二稿的校样是一个稿子，而他们的二稿又是校对过多少遍，没有错误的。偏偏不知道胡风的三稿是在二稿的后半部还有不少改动，于是便没再校对下去。他们只是翻到《文艺报》校样的最后，发现还有一个附记，于是便把《文艺报》三稿的附记加在了他们二稿的后面，就这样发了稿。

水拍讲完以后，周扬同志问我和默涵有什么意见。默涵说：“这件事的具体责任还是在水拍，这是个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嘛。”我说：“这么大的事，水拍你怎么能不自己亲自参加，到晚上交给部里就撒手不管了呢？太不应该了。”水拍说：“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刚才报社开编委会议，叫我参加，在会上，有的编委质问我：‘这是搞的什么政治阴谋……’”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默涵说：“水拍错误是严重、阴谋倒不是嘛。”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说：“不谈这些了，商量一下《人民日报》的检讨怎么写吧！发表检讨是总理的指示，报社又叫水拍起草，我们来帮帮水拍的忙，给他提点意见。”大家谈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我也讲了邓拓同志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时我所表示的不用检讨形式，而用启事，在启事中做几句检讨，再说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以《文艺报》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就这样也可以了。

我这个意见都认为也可以考虑，但发表正式检讨却是总理的指示……因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直商量到快十一点半钟，周扬同志最后才说：“我看，稿件清样既然经过了主席，现在的处理最好还是再问一下主席。我现在就去问一问，你们等一等，我回来以后再谈。”周扬同志然后起身，马上去找毛主席。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出去吃一顿饭再来。往外走时水拍说：“事情是我搞起来了，这顿饭应该是我请客。”我表示不反对。默涵也说：“可以吧！”由于东四附近只有一些小吃。默涵提出到东华门大街一家西餐馆去吃西餐，就是从王府井往西拐弯，路北不远的一家。

今年五月我同默涵谈起当年的事，他还记得那家西餐馆。

吃完饭回到周扬同志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周扬同志不久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这又是一个预料不到的决定，我听了脑袋又一懵，默涵、水拍也半天没讲话，周扬说：“主席定了，就这么做吧！”后来我们当然这样做了。以至于现在不能不又留下一个历史的空白，就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也即最后定稿，终于也和我写的那个编者按一样，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文艺报》排出的三稿清

样，本来和胡风的原稿一起还存在编辑部的档案里，但是“文革”当中丢失，至今再三寻找，也无着落。由林默涵转交给《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那一份《文艺报》清样，《人民日报》也没有找到。胡风本人原也留了一份底稿。但在逮捕他以后抄家时也弄丢了。现在留给历史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就是他那个二稿加三稿的附记，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稿子。这使我们很对不起胡风同志，对不起文艺界，对不起历史。

当时在周扬同志家，听他传达了对胡风检讨稿的最后处理决定后，我们正要走，周扬同志又把我叫住了。他说：“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不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才能逮捕，这件事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

还得要几天才能办妥。”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下面周扬又说：“因此，主席认为：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然后，周扬要我今天晚上就去看一看。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并说：“他的检讨文章是交给我的，现在的发表稿登错了，我们又不改正，那我去了怎么对他讲呢？”周扬说：“还是你去合适，水拍、默涵都不好去，这又是主席交下的任务；你不去叫谁去呢？至于胡风的检讨稿，你当然只能说没登错了。”默涵也认为我去比较合适。我还是不同意，最后提出实在要去，就再找一位同志和我一起去。周扬同志让我提名，我提了严文井同志，他当时和我同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文学》的主编，而胡风则是《人民文学》编委。周扬同志表示同意，并马上打电话告知了严文井。这样我们才回去。

四

我回来后稍微休息了一阵，下午三四点钟才到办公室。随即向侯金镜传达了主席关于胡风检讨文章处理的决定，他听了也默默无言，和我一样感到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阵，我说：“当然，已经给胡风定了性，他的检讨更正不更正，是不可能改变性质的了。

因而从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全局看，主席这一有胆量的决定也是可以的。不过，是不是有点儿过分？”“总理原来是主张更正胡风检讨稿，还要《人民日报》做检讨的。”侯金镜想了一阵才这样说，“而且主席在决定反党集团这么一件大事情上，事先好像也很可能并没征求总理和少奇同志的意见。”“现在要抓人了，主席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我介绍了刚才周扬同志讲到的情况。

这时编辑部几个同志来汇报，他们谈到三个情况。一个是出去组稿的同志回来反映，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了主席的按语和舒芜的材料，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党外艺术家的态度，实在极不友好，极尽讽刺、挖苦、打击、嘲笑，有时甚至是敌视。再经过主席按语的分析 and 揭露，自然更会引人愤慨。组稿的同志讲，约了稿的几乎都答应写，并将很快交来。

再一情况是大家谈到反胡风的形势，认为从文艺思想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很快会急转直下。有一批原来准备发表的稿件，比如巴金同志批判胡风的文章，刚收到不久，当然应该发表；但现在问题性质变了，巴金同志文章中的口气也就非修改不可了。而退回去请作者本人修改也来不及，恐怕只

好我们代为修改，同时向作者写信表示歉意了。

另一情况是，主席的按语发表以后，中央和北京市的各单位已经开始向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搜集信件，并听说文化部系统已经从路翎那里搜出了大量胡风给他的信，从这些信中发现了更多比致舒芜的信还重要的内容。此外，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同志正在武汉出差，头一天晚上我已同他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主席写的编者按，特别强调了编者按中主席几句话：“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刘白羽同志听到这些话以后，我相信武汉同胡风有关系的一些人，大概也不得不交出密信了吧！

这一天和以后一阵胡风和他一批朋友的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不多。去年江西《百花洲》第四期发表了李辉同志一篇近三十万字的长文：《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其中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至于1955年5月13日，我在晚上找严文井同志商看了看望胡风的事，决定他当红脸我当黑脸，后来我们就一起到了胡风的家里。《文坛悲歌》中所记胡风当天的日记：“《自我批判》在人民日报上加上按语发表，同时发表了舒芜底《材料》。”最后还有一句：“康濯和严文井来。”就是记的这件事。

文井当时见了胡风，一直笑嘻嘻地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饭量好不好，酒还喝得多不多。可是胡风不大理他，而是死死抓住我问：为什么把他的《自我批判》登错了。我只好板着脸生硬地答复他：“没有错！没有错！交给《人民日报》的稿子是我再三校对了的，怎么会错呢？”我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心里很不是味道，但又不得不如此。幸亏严文井在当中调和、打岔，这样空气才稍缓和了一点，我也才有点空隙抽烟、喝水。胡风则是一直狠狠地抽烟，情绪十分暴躁。他这种心情当然应该得到理解，但是那时候谁又能向他公开表示理解呢？这一次我们去看望胡风，感到他还在为自己的问题力争，认为他有错误，但是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我们也就放心了一点儿，觉得他还并没感到自己会被捕，当然更没有自杀一类的迹象。按当时的话说，他是还在顽抗；其实这也有个理由，因为他从电话中向周总理报告检讨登错了以后，总理曾认为《人民日报》不对，此点他当然会有感觉。不过从历史过程来看，他显然是比较坚强的。当时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走时他还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

接着几天的情况是胡风和所谓“胡风分子”们陆续地或被捕、或被隔离审查、反省、停职反省。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大多数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对胡风都表示愤怒和激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开除作家协会会籍等等。唯一的例外是，一次会上被认为同胡风很接近的吕荧居然上台发言，说“胡风同志不是政治问题”，替胡风讲好话，当然他很快就被大家哄下台去了。对于这个吕荧，很多同志都以为他会要被逮捕。但结果是只受到报刊批判而没被捕。这使大家很感奇怪。据我所知，是由于党的宣传部门一位很负责同志讲了话，保护了吕荧。说吕荧是个有成就的翻译家和美学家，和胡风的关系只是认识问题，要给予帮助。另外，吕荧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又主要是在家中从事翻译和写作，很少上班，也很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同大家接触少，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也就保护了他。

当时党的负责同志还实事求是地很早就主动保护过其他的作家。大家

知道艾青和田间都是同胡风来往比较多的，但他们只是文艺上的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也有人提到过艾青和田间同志。当然胡风被捕的抄家当中也查到过他们给胡风的信，他们手上也有胡风的信。在那种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他们被牵连上虽也不难理解，但其实显然是完全不应该的。因而周扬同志很早就主动站出来，在一次会上讲过：“艾青和田间是我们党的两位诗人。”还讲过：“反胡风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得打击面很大，不要把不该牵连的同志牵连上。”这就保护了一些同志。

不过当时整个反胡风的斗争来势迅猛，打击面还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的同志，至少都在内部受了批判、作了检查。关系比较多的绝大部分都曾被捕、被拘留或被停职反省。湖南的“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同志同胡风关系并不密切，被所在单位也报了“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在街上劳动了许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时才查清，他这“胡风分子”的帽子并没被公安厅批准，竟冤枉戴帽 25 年。还有一位老诗人天蓝同志，他抗日战争初期就在延安，是我在鲁艺的同学，和胡风主要只有过投稿和通信的关系。1955 年他在中央党校当教员时，不仅同胡风已没有什么来往，而且还在当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

但是到了五六月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天蓝竟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虽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由于天蓝对他牵连到胡风身上进行严厉批判这件事提了一些意见，再加上其他的事，就给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当时反胡风打击面的确是比较大的。

至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文艺报》的编辑工作，当然也立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人民日报》相继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更揭发了胡风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攻击，对周恩来同志也有攻击，这就使他的民愤更大，《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也就更需要改变。过去留下的谈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文章几乎都不能用了。夏衍同志早已写起的批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那篇八千字文章，在揭发胡风反党反革命面目以后，他又改了一下寄给我，问我是不是还可以用一用；经过我们研究，并得周扬同志同意，还是没有用。这以后，我们主要只组织发表了三类文章。一是政治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带有表态性质。这些文章有的也写得不错，有的还揭发了一些胡风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最多也就是对党和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满，讲的话很难听，但总谈不上反革命性质。于是这类文章就只好骂胡风恶毒、凶狠、疯狂、阴险等等，以致弄得编辑部的同志都纷纷诉苦，甚至侯金镜同志也向我诉起苦来了。我对他说：“你还可以用狠毒啊毒辣呀猖狂啊这些词儿嘛。”其实当时我也在修改这一类文章，也感到很难办。因此，这一类文章我们虽然发了六、七十篇，从郭沫若、茅盾、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曹孟君、梅兰芳直到刘绍棠、李学鳌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和一读者都发了，并转给了因来不及而没组织到更多稿件的《人民日报》几十篇以及《人民文学》几篇这类稿件，但我们自己也只发了四期，到十三期就打止了。

再一类文章是揭发胡风集团的一些人在各个单位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反革命活动的，这些文章发的不少，直至十九期为止。不过今天看来，这都主要是若干宗派性质的活动，反映了一些同志对组织、对领导和对文艺界的不满，对个别党的领导同志的不满，乃至对党的某些不满。这类问题有的确实比较严重，但是问题的出现也有领导的原因，况且不管怎样，说到底也

还绝不是反革命性质。

还有一类文章是分析批判胡风的思想发展和哲学根源的，这一类文章发到本年第二十期为止。其中有的称胡风思想为反动思想或反革命思想，乃至国民党的法西斯哲学。还有的系统揭露、批判了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这类文章不管根据是否充分，倒总还讲了一点道理。我自己也在这时写了一篇《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发表，这是在不去深想只按个人崇拜习惯相信路翎是反革命之后，把我认为他作品中的缺点、不足和值得研究之处统统上升为“反革命”的挖空心思之作。尽管此文也同样讲了点道理，不过很明显，这一类文章终归也都无法联系到反革命的问题上去。

五

《文艺报》这一段批判胡的工作。如前所述，是从 1954 年 11 月底的第二十二期刊物开始的。1954 年，毛泽东同志作了一次专门的指示，指出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以及《文艺报》对待《红楼梦研究》和其他问题上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严重错误。《文艺报》从当年第二十期起，即开始按照毛主席指示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0 月、11 月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了多次联席扩大会议，讨论、批评《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错误。胡风在其中的两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发言稿随即在《文艺报》发表。从当时来看，他的发言有正确的部分，但在以下几方面则表现了明显的不足和缺点错误。

一是对《红楼梦》，认为主要是写妇女解放，而抹杀了其重大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二是对虽在学术上犯了胡适派唯心论错误、但在政治上仍要求进步的俞平伯同志，以及过去的政治情况人所共知、但解放后不论政治上、学术上都要求进步的朱光潜同志，不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态度，而是似乎不屑一顾地近于蔑视。

三是对于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胡风虽也承认毛泽东所指《文艺报》打击李希凡、蓝翎，但他话锋很快转到不仅《文艺报》，而且是文艺界党内外主要领导和《人民日报》都打击、压制了他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垅、路翎。同时路翎也在大会上做了四万字的长篇发言，全面批驳了过去对他作品的所有批判。阿垅也从天津赶来参加了大会，发言重提了过去《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并进行了反驳。

大会上，对胡风两次发言，有一个同志公开表示了“基本同意”。对路翎的发言也有认为部分正确的。不过不少同志却对胡风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甚至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刊物又连着六期陆续发表了一批批评他发言的文章。路翎的发言则于 1955 年一至四期发表。这期间，党中央、毛主席于 1954 年 12 月交下了胡风在当年夏天向党中央的三十万言上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指示《文艺报》发表其中主要论述文艺思想和文艺建设的两部分，同时组织讨论、批判。《文艺报》便在 1955 年第一、第二期合刊以附册形式发表了他这个上书书中的主要两部分，同时就开始了对于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

对于半年来的批判所集中的胡风文艺思想，周扬同志在批判之前口头

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胡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又说，胡风的文章很不好看，大概是由于他的观点有很多矛盾，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是宣传唯心主义，这就不能不把文章写得隐晦难懂。不过，周扬同志又一再强调说，胡风的上书和论文中，也的确抓了我们一些辫子，他批评我们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我们简单化，我们也的确有这些毛病。周扬同志以及丁玲同志都在闲谈时向我说过，胡风总还是比较懂得创作的。因此周扬曾不厌其烦地向《文艺报》指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抓他的根本问题、大问题，不要纠缠鸡毛蒜皮。

当时由我来主持《文艺报》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主要搞创作，理论懂得很少，组织上决定了要我负责，我也只好干。我们三个常务编委分工，由侯金镜主要抓日常编辑工作，秦兆阳首先被分配写了一篇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后来在 1955 年第四期刊物上发表了。我则除了主持《文艺报》的整个工作，参加作协、文联的有关会议以及有时也列席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会议外，就日以继夜地看了胡风过去几乎所有出版的著作和全部“三十万言上书”，也看了过去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及有关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原来我对胡风的文艺观点当然也有一些印象，经过这一段的阅读和研究，也就比较明确地感到，他的文艺思想应该说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他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走过了头，或是走偏了，这样便又时时陷入了矛盾。根据我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就感到批评他并不太容易。何况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又带着“左”的影响，这样以“左”的思想去批判右的过偏过头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也的确较少满意。当时比较好的文章，主要是黄药眠、张光年、杨献珍、秦兆阳、陈涌等同志的，尽管这些文章我们也感到都有不够之处，却总还颇为满意。而周扬同志则几乎对这几篇文章都不太满意。前八期批判胡风的文章，周扬同志几乎每一篇都看过。我们是在同作者商量、修改，有的还是经编辑部再三修改后，才送给周扬同志看的。我和侯金镜在修改过程中总一再强调不要有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但是每一次周扬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稿件后，几乎总还要说文章仍然有简单化，甚至还有庸俗社会学。因此，有的文章他总要我们拿回来再改，有的甚至是他自己动手修改的。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当时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上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今天看来比较正确的、得以留下来的恐怕可能是极少的了，但从当时来看，我们的批判总还并不是主观上简单地打棍子，而是至少态度上是比较严肃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严肃的态度而没有能够写出多少可以留下来的文章，对我来说，除了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外，主要是水平不够。至于周扬同志，他在理论上当然也有局限，但主要恐怕还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态度上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在作到严肃和实事求是的。

六

到了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要我们从以上思想批判的态度，不搞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马上转到政治揭发和声讨反革命的态度，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弯自然也是很不好

转的。那么我们当时到底是怎样转这个思想弯子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怎样终于把胡风和他那批人在思想上当成反革命的；或者说，我们到底是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然后我们又紧跟的呢？第一，这些年来常听到有同志说，胡风是因为向党中央递交了三十万言上书，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这种说法当然不对，这是由于很不了解情况。毛泽东交下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让《文艺报》发表并组织讲座和批判，定的性质只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周扬同志明确向我们传达过的。现在我们还知道，在“三十万言上书”即将发表之前，胡风已感到事情不妙，曾于1955年1月14日找到周扬同志，要求不要发表他这一“上书”。此事过程，周扬曾很快写信向中央汇报：定一同志转呈主席：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思想对抗。他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的认识及对他个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他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我的话说得比较婉转，以避免给他任何压力的印象。

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他希望作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很显然，他要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藉此来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可缓和与麻痹群众的情绪，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我们觉得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并只可以告他，他的声明既没有具体说明错误究竟在哪里，他所举的事实究竟有哪些不确实，这样笼统的声明，对于读者没有好处。

以上是否妥当，请即指示。附上胡风的声明抄件，请阅。

此致敬礼周扬一、十五陆定一同志当天在信上的批语是：“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同主席团决定给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里都可以登载的。陆 15/1”毛主席也在当天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一月十五日现在知道，当时也曾有个别负责同志表示是否可同意胡风要求，返回“上书”交他修改后再发；这当然未得同意。刘少奇同志当时也曾就此说过，胡风的“上书”是维吾尔姑娘的辫子，我们不正好抓住么，怎么还能再退给他呢！

不过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的指示、陆定一的意见、刘少奇的话以及

周扬的信，都并没正式传达过。我只听周扬同志讲过主席曾说“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但并没研究过应如何具体贯彻这一批示，因而在前八期刊物的批判文章中没明确出现过“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一帽子。

并且不管怎么说，即使有这里所引的批示，当时对胡风最高也就是个反动的文艺思想吧，而绝没因“上书”便提到反党集团的性质上去过。

第二，还有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反胡风，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搞的阳谋。这就是认为毛泽东部署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并批评《文艺报》，是在看了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之后，将这两件事做通盘考虑的。也就是“吴三桂借兵”，先借胡风之力批《文艺报》；同时又对胡风“引蛇出洞”，在文联、作协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会议上让胡风发言，然后把批判的矛头转到胡风身上，再进一步批判胡风“三十万言上书”，最后更进而定为反革命，这样一步一步给胡风设的陷阱，搞的阳谋。这种说法我也以为并不确切。毛泽东同志提出批判《红楼梦研究》，同时批评《文艺报》，这是在1954年9月，同胡风并无关系。毛泽东当时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错误十分气愤，把这样一个学术上的错误批给了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讨论，可见对此的确非常重视。也正因为这样，批判《红楼梦研究》就成为建国初期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文艺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又一重大的批判运动，这两次同随之而起的批判胡风因之也成为有名的三大运动。从以下事实，更足以看到当时党中央对这一批判的重视和这一批判的规模，及其同批判胡风并无联系。

一是当时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并不止召开了上述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这一有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丁玲、冯雪峰、邵荃麟、胡风、黄药眠、钟敬之、刘白羽以及老中青作家、评论家、研究家二百来人参加的大规模重要会议，而是同时召开了三个会议。另一会议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再一会议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支部大会，当时全作协统编了一个大支部，我是支部书记，主持了这次也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这一会议主要批评了陈企霞同志，也涉及了丁玲、冯雪峰等同志，他们同样做了检讨。至于前两个会议我也都曾以支部书记和党员作家身份到席，并都曾发言。现在依稀记忆中想到的，一方面是这三个会议，特别是中宣部和作协支部两个会议矛头都主要直指《文艺报》，火力之盛是我所未曾料到；再一方面是即使两主席团会议上在胡风发言之后，矛头也仍未马上转移。我是在胡风发言之后才发言的，发言稿也于同期《文艺报》刊登在胡风发言稿之后，但我就全部是批评《文艺报》，没有一个字涉及胡风同志。记得发言之前的会议休息时，周扬同志曾随便问我：“你要发言了吧？你涉不涉及胡风的发言？”我说：“不涉及，我对他的发言没研究，我也认为现在会议重点还不应转移。”周扬同志点头同意。可见当时三个会议批评《文艺报》，并没有、也并不需要借用胡风之力；同时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更没有“引蛇出洞”即诱胡风登台这类阴谋。批判胡风发言是在两主席团会议的后期，在他的发言希图转移会议目标而这一点又被不少与会者发觉之后。

二是当时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展开学术批判的规模同样很可

观。文艺界共召开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不同的讨论、批判会。《文艺报》是从1954年第20期开始发文批判，到1955年第6期打止，总共11期中发表50来篇批判文章，集中批判虽是在1954年，但1955年仍有多篇内容充实的重点文章发表，并于1955年第5期发了俞平伯同志的检讨。再看批评《文艺报》，也是从1954年第20期到1955年第4期，共9期中发了20来篇文章以及数10位读者的批评意见，并在195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作了刊物的检查报告。也正是这样大的规模才形成了一个永载文学史的运动，而这一切当然都同胡风无关。

三是当时一件具体事也可说明问题，即《文艺报》新的编委中有王瑶同志。本来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同文学界联系较少，参加活动不多。提名并决定他参加编委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发表的一篇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而在一次重大运动中受到领袖表扬自当很快成了盛传一时的大事，于是不大知名的立即知名了，按照当时的习惯自己也有幸参加《文艺报》编委了。记得名单决定后是邵荃麟同志和我去找王瑶同志通知了此事。他问知我当时34以多干。”以后除了参加编委会，他和另一编委黄药眠同志确实都做了不少看稿、改稿和退稿回信工作；而黄老家我倒去过几次，王瑶同志家后来便没再去过，也确实他跑腿来编辑部多一些。至于他的进编委当然同胡风无关，只证明批《红楼梦研究》运动在当时确是文艺界压倒一切的大事。

四是当时毛泽东对《文艺报》很不满意，但并不等于对《文艺报》负责人都很不满。我就从丁玲同志处听说过，毛泽东曾对冯雪峰编剧的电影《上饶集中营》表示好感，要他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好好看看。丁玲同志大约是1953年前后还在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时常出入中南海的情况下，了解到这一情况的。至于雪峰同志原任《文艺报》主编，那其实是兼职，他主要是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的关系也不在作协。《文艺报》受批评后他也认为自己实在无法再兼职负责下去了，这才在改组编委会时免去了他的职务，但仍任编委，参加活动仍多。这就是说，批评《文艺报》并非是要一棍子打死所有负责人，更不需要借助胡风之力。

五是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乃1954年夏天交上，是他亲自交给当时中宣部长习仲勋同志的。不久，习仲勋离开中宣部到国务院文教办，陆定一同志仍任中宣部长份我的记忆，这份“三十万言书”交上不久，周扬、默涵同志即在作协党组内提起过此事。大概材料先后经过了文艺处、周扬以及习仲勋、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送到主席手上，或许按胡风交毛、刘、周的要求再经过少奇、恩来同志，那就显然不可能很快。我记得是在1954年11月，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结束前后，大约是我列席作协党组会讨论周扬同志在两主席团会议最后的讲话稿时，听周扬同志谈到，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还具体了解了此事，并由此而注意到了“三十万言上书”，已经开始在看胡风的上书了洞毛泽东是1954年11月开始阅读胡风上书，并于12月批示发表、讨论、批判。这就合情合理，同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显然没有联系。

第三，还有同志谈到，毛主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是因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密信当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当然是一种推测，不过我以为这种推测并没有多少根据。首先，毛泽东是5月11日凌晨对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写按语定为反党、反革命性质；

而公布胡风集团把《讲话》污蔑成“屠杀生灵”的“图腾”这些密信，在 5 月 11 日之前谁都还没有看到，这些信是毛泽东在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集团的人要交信件后才陆续得到并发现，又直到 6 月 10 日的第三批材料中才发表。毛泽东怎么会在没有看到这类信件的情况下，就根据不了解的情况来定性呢？其次，毛泽东一、二、三批材料中都写了不少按语，但是对于诬蔑“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几封信却恰恰没有写按语。有一封信为此写了按语，但又并非毛泽东所写，而是周扬和默涵同志商量写的，只不过他们写了以后经毛泽东看过，自然表示了同意，不过这也根本不能看作是把胡定为反革命的根据。再次，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梁漱溟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至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冲突，可以说是很激烈地吵了架。而梁漱溟以后又一直不肯认错，因此那一次以后，毛泽东再也不同他来往了，他们几十年的老交情也就这样断了。但即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把梁漱溟定为反革命。毛泽东同志尽管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到底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排除他对胡风污蔑《讲话》确有不满意，但也是丝毫不足以据此便认为是这样把胡风打成了反革命的。

七

那末，毛泽东究竟是根据什么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呢？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造成的。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个人的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段话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十年，即 1956 年到 1966 年这一期间，但是问题在 1955 年前后显然也已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 1954 年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1955 年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脚女人”，以及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随后的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显然就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实践的表现。其中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正确的，反对“小脚女人”就不那么正确，反对胡风则是搞错了。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认识，而是个人崇拜的思想严重，开始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还接受不了，但因为把主席所有指示都看成是英明正确，所以后来就努力不断地提高认识，使自己逐步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也逐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接受了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这又可以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客观反映上三个方面来加以阐述。至于思想上——文艺思想在 1955 年至少还保持了不会上升为反革命的命运，而到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时就连这种命运都难以为继了。

现在先从第一个方面即从政治上、首先是政治面目上看，当时的材料使我们确实惊心动魄地看到，胡风和胡风集团当中的不少人原来政治历史问题非常严重，政治面目十分丑恶。这就是第三批材料中未经严格查证而抛出来的情况，说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胡风本人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又同国民党“特务有不少联系”，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后来证明都系虚构。况且这个第三批材料中的揭发，是在第一、二批材料已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之后。因而自然可以想象，第三批材料很可能就

是按第一、二批材料定的调子，挖空心思去找的所谓根据，甚至为此不惜捕风捉影，能够找到任何一点反革命根据的踪肌吠赶快肯定。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管什么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查证呢？但是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大家当然相信，包括我们在内尤其会相信，试问当时又有几个人会不相信，或者敢不相信呢？同当时胡风政治面目有关的还有个情况，这就是：由于胡风参加过共青团，据他自己说还曾一度参加过党，30年代以来，他又一直在左联和革命文艺界从事活动，和他关系密切的同志当中也就有很多共产党员。胡风和这些党员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当然是正常的和比较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其表现是有的党员把一些只属于党内的意见给胡风讲，甚至把对党的不满和牢骚也向胡风发泄，这当中有的虽然问题不能算很大，但有一些就确实是问题。特别严重地是有的党员还把党内的机密透露给胡风，甚至把党的机密文件也偷偷拿给胡风看。这些情况在1955年批判胡风时确是不断有所发现。还记得1955年时一次陈毅同志从批判胡风事问及和提到一个有关胡风的机密情况，而很快胡风便知道了此事，并找有关方面做了解释。以上这种种迹象当然要引起党的警惕。特别在胡风被捕以后，很快就从他的日记上发现，1954级干部还不知道，胡风却很快就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自然也不能不成为当时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

原来情况是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部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高、饶问题时，那两年正在中宣部工作、和胡风很接近的绿原同志办公室就在怀仁堂隔壁的庆云堂内。据说绿原发现那天晚上怀仁堂外边小汽车很多，而且戒备森严，连他们中南海里面的干部也不能随便行动，便预感到党内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于是他很快就打电话告诉了胡风。这以后没两天，胡风的老朋友聂绀弩同志去看望他，胡风突然问道：“绀弩，前两天你在怀仁堂听了什么重要报告？”这当然是胡风懵他喽！因为绀弩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负责干部，胡风估计他可能听了那个报告，事实上绀弩也确实听了那个报告。经不住胡风三问两问，绀弩就把高、饶问题告诉了胡风。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问题，胡风一直同党很接近，又是绀弩的老朋友，按照今天党总是同党外知名人士及时通报重要情况的制度，党内发生了重要问题也是会向胡风这样的同志正式通告的。但是当时党的情况以及党同党外的关系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聂绀弩同志向胡风透露那样机密的重要情况，当然是严重问题了。

因此党发现以后，就拘留了聂绀弩同志进行审查。当然不久就释放了他。但是这件事当时一方面总是聂绀弩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由此而把胡风至少当作反革命嫌疑加以审查，以便搞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左”的空气下不也是颇为自然的吗？类似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同志，同胡风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他1955年春天从上海调到北京文化部系统工作，当时他也对批判胡风搞不通，因此到北京后不久，党内就开小会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会才开了两次，还没开完，刘雪苇就被拘留了。原因是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审查干部的工作，发现刘雪苇解放以前被国民党拘捕过，大概是有叛变的嫌疑吧，就把他抓了。后来证明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像刘雪苇这样同胡风关系密切，观点又比较一致，而又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不止一个，这就不仅是这些同志要受到审

查，而且自然也会要怀疑胡风为什么偏偏同这些党内有严重问题的高级干部关系密切，会要怀疑胡风到底是什么人。这样的怀疑对于当时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或许也可能会有影响。

八

由于 1955 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而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从当时《文艺报》所见的另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即胡风同他接近的同志之间的确可以看成是有个小集团；当然他们这个小集团并没什么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这主要怕也同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左”的空气下往往不适当而又司空见惯地所定的各种“小集团”略无二致。固然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胡风等同志主要是在文艺、学术上主张和爱好相近的一伙，他们接触和往来多一点，甚至形成了一个有核心、有书刊出版活动并有着流派、社团一类无形的组织；而这样的情况显然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胡风等同志形成的小集团却又是宗派性质比较明显的，这里不妨略提一二事实。

有些问题上他们就往往表现为当面和背后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他们也表示拥护党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领导，但在他们的往来信件中又把毛泽东的《讲话》说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就是对于一些党外著名文艺家，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巴金、老舍、曹禺、黄药眠、杨晦等，往往都加以轻蔑和反对。对于一些优秀的作品，像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等等，都一概瞧不起。而在他们互相接近的同志、朋友之间，却又往往互相吹捧，互相发泄种种不满，如果他们的文章受到一点批评，那就要跳起来叫骂。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不论他们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工作，大多要另搞一套，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他们总要力图实现他们自己的一套主张，既有文艺观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上的主张，他们把党在文艺界的领导，看成是长期的“教条主义统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教条主义统治”，要由他们、或者至少由他们成为主要参与者来领导文艺。以上这种种情况，今天看来说到底也仍然不是反革命，何况他们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有些主张还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至于他们这些方面的确有着很明显的宗派小集团错误，但即使这一错误十分严重，也还并非反革命吧。然而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指导下，在给他们当中有些同志戴上了政治历史问题的种种大帽子之后，这样打成反革命在当时也就并不奇怪，而是相当合理的了。

还可以提到我们亲自所见的一些事实。我个人同胡风同志是 1949 年春天北平解放不久之后认识，以后有点工作往来和私人接触，互相间的关系属于一般性质，至今我仍认为双方的交往都是没带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的。1949 年春天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我是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国统区报告由茅盾同志作，并成立了个起草小组，胡风是成员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址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继续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

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等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于是我只好表示，他即使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以后报告稿出来我一定送他审阅。但由于定稿出来时已是大会开幕的头一天，匆匆交印刷厂印出后已是大会开幕之后了，因此起草小组成员都没来得及再看。而胡风终于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 1954 年“三十万言上书”中并以之作为党排斥他的事例之一顺便提到，可见成见之深——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了。

胡风同志 1953 年从上海全家迁京，住到地安门内太平街以后，我曾以中国作协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去看望过他。同他是老熟人，同夫人梅志同志是初见。落座后梅志泡茶去了，胡风递烟后又把烟收回去说：“等等，我还有两盒好烟。”便也起身进屋去找。这时他们一位六七岁的男孩走进客厅，闪着眼站住看了看我，忽然问道：“你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胡风夫妇听后赶快惊呼笑嚷着跑来把孩子打发走，这时我正拉着孩子的手回答他：“我是共产党一派，你知道不？”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总也是可引起一点思索的。

在 1955 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文艺报》曾约请若干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作家写批判稿件，并很快收到了一些稿件，其中鲁藜同志的一篇当即发表了，也还有两篇准备陆续发。但不久以后从收到的密信等材料中发现，鲁藜等写文章原来是胡风他们共同研究后的部署。他们之间进退一致，甚至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有默契，而鲁藜同胡风关系的不太一般由此可见。

当晚鲁藜的表现自然只是一件具体事，更主要地是后来我们就已知道，最近李辉的《文坛悲歌》尤其详尽记载着，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乃是他们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志同道合者十分机密地共同搜集材料、共同研究、共同准备而写成的，并经过向各方征求意见，才最后于当年七月下旬交上去。接着就静等喜讯。果然十月公布了毛泽东批示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胡风同志等过分天真地以为喜讯果然来到，以为这是毛泽东看了“上书”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开始采取措施从批《文艺报》打开缺口，来击败文艺界党内多年以周扬为首的主要领导者，并从而解决胡风多年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统治”问题。特别是随后文联、作协两主席团会议上他和路翎作了长篇发言，看到两个发言都在《文艺报》先后发表，又听说“三十万言上书”也将发表，胡风和他的战友简直惊喜交加，兴奋不止，各地奔走相告，以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而几乎要感激涕零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不久他就受到强烈反击，而他还曾以为这是有人妄图改变毛泽东的部署，曾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但终于很快就一步步看到自己错了，于是又各地联络，承认“被乐观估计所蔽”，并决定退却。他清楚了解自己并不怕与周扬等对峙，但同毛泽东冲突可就不敢为、不敢想了。因而这时虽然有些朋友反对他写检讨，他仍主张写，加之另一些朋友同意，最后决定咬牙反省，并由路翎执笔，绿原、欧阳庄等帮助抄写，于 1954 年 11 月 11 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

然后将检讨要点分达各地征求意见，到 1955 的一稿。这时“三十万言上书”即将发表，胡风在交上检讨一稿之前，如上所述，还曾找周扬同志当面承认错误，希望不发表他的“上书”，或让他修改后再发，如非发而不同意修改，则希望在“上书”前面登一份他当即交上的“声明”。这显然是希图不受批判或减轻批判分量，同他交去“上书”一样都是煞费心计的。

由此可见，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一切进退、取舍，确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甚至他们在对外保密上还颇有纪律。而胡风也确有一套长期坚持的、有自己特色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为了贯彻他的一套而几十年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自我批评；但是在一旦形势对己不利时，却又可以不计一贯坚持的观点，而俨然很快就有认识似的写出检讨，粗看时检讨还写得不错！由此难道不足以说明，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左”的思想影响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组织上不确是很充分地至少具备了被扩大化到打成宗派小集团乃至反党集团的性质和条件了吗？至于以上这些事实当时大会汇报给毛泽东同志，怕是肯定无疑的。就象胡风的小儿子问我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这句话，我向周扬同志汇报后，随之便听到党和文艺界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提起过。还记得周扬同志在第三批材料发表后和一次小会上讲过，说主席听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情况后曾问到，鲁黎发表过批胡风的文章，他有没有事？周扬答以鲁黎怕不行了，主席啊了一声，没再说话。大家知道，鲁黎当时同毛泽东是很近的亲戚关系。这里既说明毛泽东不管对鲁黎的亲或对胡风的恨都并没影响他个人的好恶，他认为对谁该定什么性就定什么性，而一般地并不掺杂感情成分；此外这也说明了上面的种种事实对毛泽东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性质显然会是深有影响的。

这里也应联系提一提，在谈到胡风等同志所谓宗派的同时，如前所述胡风等对文艺界党内外一些负责同志和重要作家是从 30 年代开始就有了宗派情绪的，以后直到建国初期这种情绪显然越来越有所发展。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文艺界有的党内外负责同志和重要作家对胡风他们恐怕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用事、个人意气 and 宗派情绪。据我的理解，这种情绪恐怕是互相的，而不只是胡风一方面的；不然的话，如“二十万言上书”中所说的事实，胡风在建国后一再要求党在宣传、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同他谈话，为什么这样的谈话就很难实现，而且即使谈了一下吧，也总表现为简单、生硬，不欢而散？为什么领导同志不能同胡风同志更加开诚布公、虚怀若谷、坦诚相见地好好谈几次呢？当然要跟胡风同志真正谈得找到共同语言，也的确不容易，这我有过前面曾经提到的实际经验；何况双方在理论观点上又确有很大差距，并且双方的观点又都由于各自主观的以及各自所受或“左”或有的影响而难免各自都有矛盾，因此也就必然更难谈得拢。不过，“三十万言上书”中胡风不是也谈到，1952 年林默涵曾在中山公园同他有过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吗？更不必说从“三十万言上书”中看到周恩来同志是怎样不厌其烦地许多次关心胡风，不必说当时曾给胡风三个工作而他竟一个也未能挑上并认真干下去。试想想，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虚心、诚恳地承认胡风、路翎等的成绩并听取意见，谈谈看法，那就即使胡风态度再不好，群众也将会并不同情于他了。而现在给人的印象则是胡风多次要求谈话，领导同志不是不谈，就是谈而不耐烦，以致使人感到至少是双方都不好，也使人感到胡风虽然宗派情绪很严重，我们党内有的同志对胡风只怕或多或少也总有一点个人意气、成见，或是有意无意的宗派情绪了。

胡风同志的宗派情绪，以及我们有的同志也可能存在的意气、成见或宗派，其来源自很复杂，起源于 30 年代某些观点和看法上的分歧和争论，包括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分歧和争论，典型问题的争论。以后战争时期大家分处解放区和国统区，环境的极大不同，地区的完全阻隔，往来的几乎断绝，这就使得大家互相更不了解，以至于因为种种确切的、不大确切的和完全不正确的信息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和成见，显然都很难避免。这当中又经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关于主观的问题以及关于胡风整个文艺思想问题在重庆、在解放区和在香港的讨论批判；再经过建国后 1952 年北京小会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批判，其后又公开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这样一系列的理论、观点论争再加上人事关系和工作关系等等很长时间的复杂历史情况，产生一些意气、宗派和成见，也是很难责怪的。前不久我和默涵同志谈起这一问题，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由于历史的积淀，我们有的同志恐怕也不能说对胡风就完全没有宗派情绪。不过这一问题今天来看虽然不难理解，在 1955 年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难以掌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不仅“尖锐”到批评了胡风同志，而且也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评了胡适思想，还批评了梁漱溟先生和梁思成同志，这些批评《文艺报》全都发表了文章。因此不难想象，我们的同志对胡风当时哪怕有一点不完全实事求是的成见和偏激的、宗派的意气 and 情绪，那就很难说对于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高潮和热点上，当这些情况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以后，会对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这件事没有丝毫影响了。

九在 1955 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从当时《文艺报》所见的再一方面是在客观反映上。这首先是我们编辑部曾碰到许多意外情况。

一个情况是 1955 年初批判开始不久，编辑部的夜间值班室就连着许多个夜晚，半夜总要不断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由于我们是几个女同志轮流值夜班，打电话的总是骂一些脏得很难听的话，女同志实在不愿意接，但有时半夜难免会有周扬、林默涵同志的电话，有时也有工厂的电话，以及外地的长途，不接又不行。这件事直到我们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公安部门才在那个人正打电话骂我们时当场把他抓获。原来那是一个书店夜班守仓库的人，他的父亲在我们镇压反革命当中被杀，这样他就有了仇恨。他自己供认，他是看了胡风的有些文章感觉到出了一口气，因而对批判胡风很不满意，于是就打电话骂《文艺报》。这件事今天看来当然要做分析，要区别那个人的父亲到底是不是该杀，该杀或冤案当然不一样；不过即使这个人称得上反革命分子，恐怕也不能说胡风他们的言论就是同反革命一鼻孔出气的，而只会是他借用胡风的不满和牢骚，加以适应、补充从而发泄自己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但在当时的气氛中把这件事作为反革命事件，并看成是批判胡风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很自然的吗？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匿名的和化名的文章和信件，为胡风讲话，而对《文艺报》和文艺界批判胡风表示很不满意甚至坚决反对。这些文字有的还讲一点道理、谈一点理论，有的则干脆是谩骂。记得还有一封署名为“几个三八式”干部写的信，也就是一批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写的信，说他们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都认为批判胡风是错误的，而且还一条一条讲了许多道理，甚至引用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上的话。这些文章和信件有的还写得很有杂文笔法，极尽讽

刺挖苦之能事，我们的编辑看了很激愤、很生气，以至于不得不分配两位水平高的同志专门处理这些文章和信件。这两位同志写的复信和退稿信往往也写得很精彩，有时在编辑部朗诵，总受到大家的鼓掌称赞。大家都认为这也是在批判胡风中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不也是合理的吗？上面这些打电话和写信骂我们的情况，我们都曾向默涵、周扬和中宣部汇报，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还曾把那几个三八式干部的来信说成是“三八式纲领”，他在一次我列席参加了的部务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党和毛主席有一个纲领，胡风有一个纲领，现在又出了个‘三八式纲领’。这个‘三八式纲领’我看也可以公开发表，进行讨论和批判。”后来为了不分散精力，没有发表这封信并进行批判，而只在复信中驳斥了他们。不过这些情况当时自然是通过中宣部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的，而这一类当时的所谓阶级斗争反映，我估计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可能也会有影响。

客观反映上的另一个情况是，胡风的三批材料公开揭出来后，在文艺界和广大群众当中引起的激动和愤怒确实很大。当时由于党和毛主席在广大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因此《人民日报》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面目，读者们大多是坚信不疑的。这里我只举两件事，一是曹禺同志在当年《文艺报》九、十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胡风是走的那一条路》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看到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前所写。

他在文章中说：“有一个时期我很迷惑，胡风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是拥护为工农兵的方向，还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呢？他是如他一再声明的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还是一个日夜梦想着占据山头、另树旗帜的人呢？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隐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阵容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理人呢？”在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曹禺同志又写了《后记》，这恰好是发表第一批材料的五月十三日。后记里说：“今晨刚刚写完这篇文章，就看见《人民日报》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两篇文章，从舒芜先生揭露的胡风给他的密信里，我才更看出胡风的恶毒、阴险的面目。原来一个人是可以伪善到如此地步的，我们还是太天真了。这样的反党集团真是无法容忍的，这样对党对人民的仇恨，是必须揭发，必须加以彻底的清算的。……把党的文艺工作中的负责同志们称作‘官方’、‘权贵’、‘老爷’、‘钦差’，把党和非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指为‘豪绅’、‘马褂’、‘市侩’、‘蛆虫’，并且说要‘警戒’党员作家们和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们。读了胡风给舒芜先生的密信，再看另一页上胡风满篇虚伪的《我的自我批判》，我简直无法再看下去。”从曹禺同志所说这些话，可以看到胡风给舒芜的信的确是使人气愤的，当时曹禺同志不完全是讲的真话吗？这里显然涉及一个私人之间的信件可不可以公开，并以之提到政治上来判断其性质的问题。本来私人之间、好朋友之间背后说一些私房话，发点牢骚，表现一些不满，也是常有的事。正因为是私房话和私人信件，往往就不会说得很全面。写了对某人某事不满，很可能只是一面，而另一面、也许还是主要的一面对某人某事又是赞扬的，或许这不满的一面又只是一时一地的看法。因此，把私人信件所写都提到政治上来作结论，显然不妥。这就还有个私人信件该不该发表的问题了。今天来看自是不宜发表，否则将是违背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如果某些人已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内奸、反革命，而他们私人通信中又进一步提供了反革命罪证，则必要时完全可以发表其私信。但

是如果并非证据确凿，而仅仅要公开发表私信中一些不确切的或至多只是思想反动的言论以之来定性为反革命，这怕就处置不当了。况且即使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到发表私人信件中只属于思想反动的言论以定为右派，但那也一般并不同于逮捕、判刑的反革命。然而在 1955 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又从这些私人信件作出反革命的结论，这对我们当时确实一步步而至迟在看了第三批材料上那些“特务”、“反动军官”之后是不再有怀疑的。至于由此而像曹禺等同志写的批判文章，当时自然也就更是完全正常的了。如果说当时确有个别同志表示发表私人信件是否妥当，而今天来看确也并不妥当，特别是胡风问题已彻底平反；那末根据私人信件而写这些文章的责任也就不在曹禺同志等作者了。

另外一件是巴金同志的事。巴金同志近年间的名著《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此文的最后一节谈到，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他写过三篇文章。

其中第三篇批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巴金同志在文章里说：“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巴金同志在文章中又说：“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

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巴金同志的确是十分真诚的。只是这里讲的有一点有出入，就是他这篇文章原来是寄给我们《文艺报》的，当时由于批判胡风的主要责任在《文艺报》，因此我们组织的文章也比较多，后来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来不及组织多少表态文章，我们曾经给了《人民日报》一批知名人士的稿件，同时也给了《人民文学》几篇稿子，巴金同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转给《人民文学》的。转去以前，的确由我们改了一下，并由我写了一封信向巴金同志说明和表示歉意。巴金同志还回了信。在“文革”中我大批信件丢失的情况下，巴金同志这封信倒是意外幸运地留下了。信是这样写的：“康濯同志：六月一日来信收到。文章迟发表，没有关系。我当初想用这篇文章参战，后来出国开会，拖了将近三个月，刚写好，情况已大变，文章也失去作用了。你们删改，这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示，我当然同意，请不必客气。

此致敬礼巴金 6 月 8 日。”³⁰ 巴金同志真诚的自责十分严格，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他文章中所表露的“天王圣明”、“想不通就不多想”这种个人崇拜的心理，我们当时也都有过，甚至还要严重，而这“天王圣明”的一点，不也正好反映了当时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一定的客观基础，正好反映了当时文艺界对于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因而大多也就并不怀疑、完全相信的情况了吗？

对于胡风和胡风集团这一建国以来文艺界最大冤案，颠倒了敌我，株连到一大批优秀作家和文化人，时间又长达二十四五年的大冤案，在作了以上有关情况的回述以后，或许还有必要略加若干概括。

第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即使在 1955 年“左”的思想影响和我个人又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前所述，我内心里也并没有认为他是完全错误，倒觉得在一系列问题上他还有些道理；当然即使在那时我也仍然“左”得把他的主要方面看成是错误的。今天冷静回思，虽然我没有再去翻读胡风的著作，但内心中却不能不认为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能够比较系统地提出并不断充实这样一整套观点，尽管他的理论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并有着一些不足和缺点错误，然而总也实在仍是很不容易，很值得珍视的。

胡风在理论上显然是曾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追求人民群众的“爱爱仇仇”与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通过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主观战斗精神”，帮助人民去掉旧社会加给他们精神上封建的、历史的负担，这就是胡风说的去掉人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负担。胡风提倡“到处有生活”，谈到客观对象时又强调“日常生活”；然而他自己一到解放区就忙着访问英雄模范，访问工厂、农村的先进人物，访问战斗英雄和后来的志愿军英雄。胡风不主张提重大题材，然而他自己解放后下笔就是英雄模范和开国大典。可见他也仍然并不是反对先进的斗争生活和题材应有主流的。特别在艺术上他提倡作家的主体性即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比较深刻地指出了作家创作过程中应努力追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并提倡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学思潮、文学经验和文学形式，这怕都是应予肯定的难得的方面。也正因为这样，前面提到周扬、丁玲都讲过胡风是比较懂得创作的。

当然他的有些观点也有混乱、矛盾和不足。他的现实主义主要只强调真实性而比较轻视世界观、党性、倾向性和民族形式，甚至把民族形式只当成五、七字句和简单、落后的旧形式；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又要求在创实践中“自我扩张”思想改造，从而忽视了斗争生活的实践和革命的倾向性；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则过分强调了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疯狂性而比较轻视人民勇敢、勤劳、智慧这主要的一面。但是不管怎样，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观、美学观和他在理论实践上的真知灼见恐怕还是值得称道，如果付诸实践，或将很可能会推动我国创作和理论批评较好一些地发展的。即使退一万步说他的观点基本上都不正确的话，也是学术问题，可以批评讨论。然而当时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批得一无是处，一棍子打死。这里还可以讲一点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批判胡风开始，我曾想大概批他几个月结束以后，总还是可以大家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同胡风团结，让胡风在工作中发挥他的作用，也让他的理论和创作发挥作用的。谁知不久以后我就感到自己错了，对胡风的理论恐怕是会要一棍子打死了的。怎么办？正如上面所引以巴金的话那样，我当时确实是只好想不下去就不想算了。

第二，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当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如前所述，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这正如不能把私人之间聊天谈话中随便讲的一些话都当作每个同志政治表现的根据那样。当然胡风他们的私人信件确实特殊到有一些攻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

和党内外文艺家，以及议论和商量他们应该如何对付文艺界领导之处；他们私人信件中有些话孤立来看，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恶毒。但是不管怎样，到底也只是私人通信，即便对于这些特殊信件应该认真对待，那末为什么不能也采取特殊方式在内部来讨论、批评和处理呢？现在看来，当时的方式恐怕只能说成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特殊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不计后果和并不妥当的措施了。

第三，关于胡风集团作为一个文学上并无固定机构、固定组织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这种集团对文艺学术的发展一般地说怕还是有好处的。至于胡风集团之间经常研究文艺问题，直到写三十万言上书和《我的自我批判》，都是十分机密地集体搜集材料、征求意见，这一些本来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他们确有着程度不同的宗派情绪，有时对党的文艺方针和党内外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各方面的工作，也确实有一些完全不应有的谩骂和攻击，偏激的乃至不问是非的看法，以及对待策略上的背后商议；并且有时也确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共产党员可以泄露党的机密而却为他们保密，这却显然都是不足为法的。而且这样一来，难免就连那些本来不是问题的事也变成问题了，乃至把这个小集团完全当成宗派集团了，把他们说成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的进攻了。而没有考虑到要说宗派情绪，对立的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这正如 1988 年 6 月，党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所说：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的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精神，这一指责也予以撤消。

这也就是说，1955 年由我主持的《文艺报》把胡风定为宗派小集团，从今天来看也是并不妥当的了。

第四，当时的三批材料是在把胡风定为反党、反革命集团以后，又挖空心思地找他们的政治背景，以至于捕风捉影，把他们搞成同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联系，有的人甚至干脆被搞成本身就是特务；而当时这样作的第二、三批材料，又是在公安部的参与下编写，这就当然更是严重错误和严重教训。当时还由于这样而把同胡风有过长期的朋友往来的几个党内老同志，也仅凭这一点就予以拘留审查，甚至打成反革命。并且又反过来由于这些党内老同志同胡风的关系，而把胡风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这自然也同样是极其错误的历史教训。

第五，批判胡风时社会上的反映，在当时阶级关系还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当然会是各式各样的，其中难免也会有个别坏人对被批判者表同情，为被批判者说话，这都并不奇怪；但是当时把这些都以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又由此而把胡风的问题看得更严重，甚至还给问题升级，显然这也是深刻的教训。

第六，《人民日报》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登错，对此周恩来本是主张改正的，以后却由于更大的政治需要而决定不予改正。这从特殊的政治利益考虑，或许也未尝不可；但从长远的历史来说，则显然是应予提出、澄清和纠正的。

我这里所谈的不少问题，都还只是提纲性质，只是想扼要介绍一下《文艺报》和胡风冤案大致的关系，其中有些情况可能还将另文论述。最后还想提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中的一句话，就是上面引述的“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我

要补充的是，1936年丁玲同志逃出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以后，跑到上海，代表党去接丁玲的就是胡风。此后抗日战争中胡风在重庆，也为丁玲同湖南老家她母亲的往来做过联系。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胡风还曾为党秘密传递过一份极端重要而机密的情报并受到我党中央军委的来电奖励。对此，我引用当事人张执一同志1981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张在五、六十年代是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这段回忆录是从荒煤同志1987年发表的《告慰丽尼》一文中转引的：“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这样重要的贡献，“文革”中含冤逝世的丽尼同志从没公开过。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品质啊！

我是直到1985年的元旦这一天，在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才约好了上胡风同志家去看望了他，这是整整30年之后，我第一次同他单独会见，这之前只通过信和在作协四大会上见过。他给我的信写得还很好，思想仍然相当敏锐；另外我也知道他谈起他的文艺理论时曾经讲过“借用张志新烈士的一句话，‘观点不变’”。

但是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却大吃一惊，我告诉了他，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他那篇《我的自我批判》，确是把稿子登错了，并讲了发生那一错误的经过。当时他的夫人梅志同志听了很激动、很难过。我对胡风同志说：“发表文章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你，你很严厉地责问我，责问是完全对的。我当时说文章没有登错，那是讲的假话。”向他表示了检讨。可是他却木然地、呆呆地说：“那时候，我还敢，敢有意见吗？我不敢哪！”这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胡风了。正如巴金同志《怀念胡风》一文所说：“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经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的折磨！”当年为登错了他文章，即使已被打成反党集团，也还要不断尖锐地责问我；现在却说是“当时我哪里还敢，敢有意见哪！”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把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诗人，生生变成了似乎是一个呆子，一个完全听话的工具，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过去的事难道仅仅说一句历史的大悲剧就可以结束吗？历史还在往下写，不论是谁，不是都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把历史写得好一点吗？

1987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李慎之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957 哪里呢？从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多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

开，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 1956 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 1958 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6 月 8 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会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 4 月 30 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 5 月 15 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

—

《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将近半年以前的既定决策。这个决策才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才是中国命运的大逆转的转折点。

这里指的是 1957 年 1 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 日、27 日两次讲话，合共两万字，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对付的理论了。这两万字中，可圈可点可摘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这一段比较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的关系：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55 页）就在这篇讲话的上下文，毛主席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都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点，毛主席自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当然，“有人”又会说，“你那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呀？”但是，毛主席在 6 月 8 日以前近半年时间里，每次讲话的时候，确实都没有忘了说“毒

草锄了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你没有参透其中奥妙，你只好自认晦气。

看了这些话，对于《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本来是不应该惊讶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感到始料不及（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深感痛快与解气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次会议是党内高干会议，与早两个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那一次是引蛇出洞的方针初见端倪而尚未最后决策的会议）相同，传达的范围有限，就我本人来说，就因为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欧 11 国，两次传达都没有听到（前一次略知一二）。第二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1956 年 2 月的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动极大。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引起了一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必须改弦更张，更加宽容、民主的印象。毛主席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党在 1956 年全年都有这方面的言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 10 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地做“引”的工作。其第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月以后，也就是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以极其开放的口吻，至少是建国八年来到那时为止没有听说过的开放的口吻，甚至极有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接着，他又在 3 月 12 日邀请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内容更加开放，提出“不要围剿王蒙”、“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鲁迅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现在不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3 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风尘仆仆一路南下。3 月 16 日起程，3 月 18 日在天津，3 月 19 日在南京，3 月 20 日在上海，4 月份又到杭州，自己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游说大家鸣放，这样一直到 4 月 30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毛主席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也是一位制敌机先的前线总指挥。5 月 1 日整风正式开始。因此《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一种不和谐音夹在中间不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好像连后来成为反右积极分子的党员干部也没有怎么注意。所以毛主席才一再说党内干部有百分之九十想不通他号召鸣放的主张。

关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既然是秘密报告，中共当然也不会公开宣传，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知道的范围很广。因为中央决定把朱德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小册子，封面上题目都没有，只印有“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八个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参考资料》虽然只发到高级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机密刊物，也只是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因此这个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传播极广。另外外文书店还发售美共的《工人日报》，上面也载有报告的英译文全文，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尤其是毛主席当时一再发出要打防疫针，种牛痘的主张，《参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 2000 份扩大发行到 40 万份，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订阅。看来他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因此，这个报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按《参考消息》不能登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但是可以登各国的反应。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时已在 6 月 19 日，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而且其中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却增加了本来没有的六条政治标准。至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已到 1964 年，不但上面提

到的话完全不见，而且只剩下强调敌我矛盾的话，在文化大革的大批判中大起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怎么也不能信服这是“阳谋”。

二

对于毛主席来说，虽然前面已经说过，他身经百战，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与屈辱，但是苏共二十大给他的刺激也许是最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已经达到权力颠峰后的刺激。这个刺激看来支配了他晚年整整 20 年的生命。

1956 的一年。这一年开头就让他高兴。1 月 15 日，北京公私合营的工人、店员、资本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还有农民和各界人士共 20 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毛主席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自 1840 年以来 116 年”的奋斗目标已经达到了。

毛主席是永远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是决不肯到此止步的。一个目标的完成在他只是第二个目标的开始，这年刚开始，他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话只有一句，新华社的同志因为参不透他老人家的心思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违抗毛主席指示”的批判，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图大略则是没有疑问的。

一月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在会议的最后一月，即 1 月 20 日，毛主席讲了话，他一方面说到中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在一二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最多一百年……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并且一再提出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心气有多么高，也可以看出，后来的大跃进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子里酝酿了。

但是，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1956 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扫了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兴头。他在 1958 年 3 月 19 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部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6 页。）毛主席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就是指那年春天 2 月 14 日至 25 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上是闭幕以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以及由此在东欧以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他说的国内方面的事情是指 1956 年元月 20 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反冒进的社论，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 1958 年 1 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

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凡听到或看到的无不毛骨悚然。连毛

主席也第一次发明了一个词，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认他以为“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有这样的阴暗面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两点评价：“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当时，今春以 84 岁高龄逝世的新华社原副社长陈适五就跟我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说毛主席“一则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错误公开了，中共与苏共历史上争论的是非也可以公开了。中共受苏共的委屈也可以一舒愤懑了。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压在中共头上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毛主席现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说毛主席“一则以惧”，是指过去历来被认为完全正确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竟是如此阴森可怖。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怀疑与指责呢？可以说，从此以后毛主席心里就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赫鲁晓夫成了“万恶之源”。这块心病越往后越清楚。

毛主席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力主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并且以此思想指导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同时，看来也确实在探索一条比苏联较为宽松的道路。

这一点，其实在苏共二十大开始以前就着手了。毛主席在 1956 年 1 月初召集了 34 最后在 4 月 25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按当时人们的“觉悟”来看，可以说是充满了新意，可是并未公开发表。现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发表的是 1975 年 7 月邓小平为了要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而由众位秀才根据 1965 年底的整理稿再作修正后，请毛主席审阅批示“同意”后的定稿，然而邓小平随即下台，讲话竟延至 1976 年 12 月 26 日才得以发表，其时距毛主席逝世已 3 个多月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与二十年前可称截然相反，因此文字也已与当初大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看得出许多十分宽松的提法：例如“你对发展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这样的话，现在的正式文本上还保存得有一些。我自己手头还有一个听了第一次传达的记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抄不胜抄，就举几条作为例子吧：“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对犯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

类似这样的许多话再加上一个多月以后（5 月 26 日）通过宣传部长陆定一之口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都可以使人认为毛主席在 1956 年上半年的思想主要是在研究如何在中国走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路来。如果要根据事实说话，要奉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我们只能这样说，除非以后有新的材料发现。至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虽然还不大敢想，更不大敢说，但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在领袖的启发下，脑筋也已经开始在“动”了，或者用当时苏联流行的话说，开始“解冻”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看来情况大致也确实是如此。

1956 开的大会。中间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碰上苏共二十大这样的懊恼事，全党与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但是他却并没有做什么大报告，只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辞，据说还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直是耐人寻味而又捉摸不透的。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当时国际舆论的大背景是反对个人崇拜。不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实际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对个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此，重视权位的毛主席看来是难以满意的，却又处于完全无法反对的状态。此中滋味，外人无法妄测，但是有一点却可以看出来，即对于从法理上说是八大最权威、最重要的文件的大会决议，他不甚关心，更不赞成。对于其中最重要的结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竟视而不见，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提出异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75 页）

四

这年十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兰因为党的第一把手奥哈布自动让位而完成了和平过渡。匈牙利则酿成了武力改变政权的暴乱。

据每天列席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吴冷西回忆，为对付波匈事件而讨论如何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毛主席又发展出了赫鲁晓夫“丢了两把刀子”的思想，说得最完全的还是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了呢？我看也去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规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21—322 页）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的震惊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推原其始，他不能不归罪于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也及于列宁这把刀子。他当然会考虑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为一个 63 岁的老人，也应该会考虑到自己身后的遭遇。也许可以想像，10 全国共计之”的思想也已开始在他脑海里浮现。但是现在，他日思夜想的是：中国决不能出匈牙利问题，决不能出赫鲁晓夫。他开始为“打防疫针”而运筹了。这就是后来说的“引蛇出洞”，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事情还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425 页。他在经过半年的部署以后，发出总攻击令的时候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

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1957年6月8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就在波、匈事件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派林克来征求王飞和我对于波匈事件的看法。我竟不识相地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议，殊不知却正好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当然，以毛主席超速运转的脑袋也并不难创造出别的一个名词来）。

他在几天以后（11月15日）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大民主”。但是又告诉吴冷西说：“回去不要批评他们，他们是好同志”，又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我当时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后来当了右派再回想起来，却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大家现在都已知道，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毛主席决定在1957年整风，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的，并且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6、328页）这些，都别有深意。所以我的体会和判断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前后过了一个年关，跨度近两个月。这也符合毛主席历来作重大决策的习惯，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在此以后到6月8日近5个月干的事就是“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其实，毛主席自己倒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反右大体告一段落以后在1957年10“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

说实在的，最早提醒我这一点的是王飞。他在和我一起受到批评后，就一再对我说：“我们闯祸了，犯错误了”，叫我少说话，多注意，无奈我冥顽不灵，觉悟太低。现在王飞已是82岁的老人，患老年痴呆症有年，写好此文，再要向他请教也已不可能了。

五 1957以前的到处游说，而以统帅的身份坐镇中央，指挥若定。《人民日报》社论与党内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党内右派、文艺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战斗一年，挖出了55万右派分子，比毛主席最初估计的4000人多了百倍还不止。许多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到后来竟也一样成为右派分子。毛主席真是铁面无私。

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

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就给它做了结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 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是敌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61——462 页）。

瓮中捉鳖，虽胜不武！但是毛主席不管这一套，他的自我感觉又回复到两年以前了。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在反右运动中不知是由于谁的发明创造，又加上了“绝对”两个字。“绝对领导”的说法从此风行了二十多年。他现在又是无可争议的、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了。年初是他自己宣布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结束”，到年中他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一切都按他的神机妙算进行。他的一个信念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还可以大大促进人民战天斗地的积极性，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从此来的。他现在可以来对付一年半以前针对他本人的、反“冒进”的倾向了。1958 年元旦刚过就发出通知，1 月 11 日就开始在南宁开会，着重批判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主席说它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49 页）有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打底，南宁会议当然是势如破竹。毛主席批评“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连检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的气象。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 1966 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

总之，从 1957 年的反右派开始，中国开始了 20 年的极左路线。一直到毛主席在 1976 年大跃进的出现是同反右派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到底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加了什么东西呢？恐怕还是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个新名词，所以林彪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六

被毛主席认为“一万年都会有”的“人民内部矛盾”曾经牵动过许多人的心（其中不少人后来“堕落”为右派分子），甚至许多外国人的心。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过去了，在马列主义哲学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也有了必要与可能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新质的矛盾了。就因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毛主席的威望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同人办报”、“司法独立”、“无罪推定论”……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实际上都是在对毛主席无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中最有头脑、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志士仁人”，内心想的是，革命政权可以改变为法治政权了，中国从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长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与经验带领赫鲁晓夫、铁托、哥穆尔卡……走上一条正常化、民主化的道路、使马克思的理想进一步实现。

但是这些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毛主席在 1957 年 7 月 1 日给《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得明明白白：本报及一切党报，在 5 月 8 日至 6 月 7 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36 页）反右斗争是怎么一回事，已载入历史。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第三个里程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增加了哪些新东西呢？“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毋宁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1959 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后，人们的普遍慨叹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唯一有点新意的是，通过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发明了不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阶级，而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到后来实际上就是以附和还是不和毛泽东思想作划分阶级的标准，前者就是无产阶级，后者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出现许多“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原因，虽然真正敢于“反对”的人是几乎没有的。这一点可以算是毛主席区别于“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地方。

原来，自从苏联在 30 年代初在城市消灭资本主义，在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社会上就又有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劳动知识分子三个社会集团，在理论上已不能再说还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对斯大林的反对还是层出不穷（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是真的“反对”还是只是斯大林自以为的“反对”）。因此，斯大林只能把这些“敌人”一概定为外国间谍或其同谋。一旦定罪，往往处以极刑。毛主席则别立新义，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可以成为敌对分子。当然批判、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声明这些人“不是特务”，因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就是我们经历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实践的人唯一能捉摸出来的特点了。然而这一点，照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说，起源于延安时代，也算不得有多么新鲜。

基于这样的理论，右派分子虽然是人民的敌人，戴上帽子即成为不可

接触的贱民（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原则上倒确实没有被枪毙的。这点真是要感谢毛主席的如天之仁。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也大体如此。稍微有点特别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竟被戴上了“叛徒、工贼、内奸”三顶帽子，这大概是因为有“特殊需要”的缘故。其他如彭德怀、贺龙……等无数的人虽然都是被迫害致死，到底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明正典型”。张志新那样的人则属于鲁迅所谓“暗暗的死去”。这些要算是沐“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的深恩厚泽了。

1952 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错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看来他后来也并没有逃脱斯大林立下的榜样。

至于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两国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到底孰大孰小，那只好由后人去细细比较研究了。

应当说，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司法独立的国家里，本来就用不着什么“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理论。

它纯粹是多此一举，无益而有害。

七

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是极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不是毛主席本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他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毋宁是他毕生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直线发展。

怎样看待 1949 年到 1957 年近 8 年的中国？有许多书说到，党在这段时期也犯过各种“左”的错误。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但是如果对这段时期有一个大体平衡的看法，那就应该说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一切内乱外患都结束了。人民的生活绝大多数可说是温饱无虞。“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虽然种下了后来“吃大锅饭”，养成“懒汉刁民”的根子。但是比之中国大地上百年未能平息的战乱来，却要好得不能比。普遍享受的公费医疗与劳保待遇使无数旧社会过来的工人职员感激涕零，说“以后不怕老了，不怕病了”。有人以亲身经历对比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要比战后的日本人为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退了美国兵，这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饱受屈辱的中国人热血沸腾，矢志效忠新中国，许多人不顾一切从海外奔赴祖国。确实，农村与城市运动不断，也有不少人受到伤害，但是每次运动到末了都有甄别平反（从反右以后就再也没有甄别平反了）。总的来说，在人口有 6 亿之众的中国，实际无故受到伤害的还不能算多，而且按照全国人民刚开始学习的新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新鲜理论，至少许多与自己无关的人也还可以以“难免论”来譬解。当然，这期间，还有两大冤案，即都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潘汉年案与胡风案，但是前一案件基本不为社会所知，后一案件牵涉虽然较广，但是在全国人民中，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也毕竟只占极少数，而且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定的“反革命小集团”，群众基本上也只有信服的份儿而没有多少牵涉，更不用说老百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眼中看到有不少问题，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却纯粹是伟大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水库铁路的

修建，钢铁棉布的增产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应该说广大群众的估计与伟大领袖的估计相差也并不远。我们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人都在等待及身亲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使听到的人毛骨悚然。但是，人们一方面庆幸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方面还庆幸苏共给中共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敲起了警钟，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祸害了。

但是，反右派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从 1957 年的 6 月 8 日开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名义下，中国的阶级斗争绵延 20 年不绝，一批又一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都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身份被迫害致死，毛主席声言可以避免的“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竟成为事实。到他离开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受文革直接间接伤害的人竟上了“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到了三十多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其中还包括作为毛主席手下败将的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

解放初期，毛主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是“似慢而实快”，后来的二十多年实际上成了“欲速则不达”了。

这个“大逆转”已成为历史的事实，是 1978 年以来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事实。

也许，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还推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它打击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碍甚至扭转了他开始的改革。毛主席还以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他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刺激了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结果当然不可能成功，又反而引起毛主席的讪笑，《九评》的最后一篇就是批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的。

但是，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他是不会承认有这样的逆转的。反右以后，他的心气越来越高，他的平生大愿逐步实现，而且实际上处于大发展，大跃进之中。从三面红旗到三个世界，从不断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也许只有到临近生命終了的时候，他老人家才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估计越来越长上（从几十年到几百年）；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最后讲话上。“我平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赞成的不少，反对的不多；一件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只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造成这样的变化的关键就在他 1957 年的“引蛇出洞”上。

八

回头来看，毛主席的悲剧在许多前现代的国家中其实并不少见。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死而后已”。这实在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洞使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也还有，只是没有中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因此造成的灾祸至少在规模上总还比不上毛主席而已。

据胡乔木说，毛主席曾“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 147 页）毛主席晚年的命运也确实最近似于斯大林，他们都曾领

导过亿万人民，受到过亿万人民的爱戴，他们统治下都不乏聪明智慧的人材而且后者都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都曾对他们“进尽忠言”。但是他们自认为、甚至被认为天才盖世，然而却甚至不能理解比较自由的环境中一个普通公民的常识，而一概打击之为毒草，为牛鬼蛇神，为人民公敌，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抛开他自己好像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只是对一个“权”字迷恋上。至少在延安整风确立了毛主席一贯正确的地位以后，尤其在 1945 年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后，他的权威和威权就是绝对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了。

有不少事实足以证明他对权力的敏感：1948 年，吴晗到平山请毛主席对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主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公认的朱元璋残酷暴虐的一面说成是为巩固其权力之所必需。1957 年，毛主席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为“死人办报”。同时又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确实是像林彪所说的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自己知道这个权得来不易，因此抓住了就决不放手。如果也稍有放松的时候，那是有意的，为的是好更牢牢地抓回来。其结果，不但害了国家、社会、人民，也害了自己，当然在他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那已经是“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1956“右派报纸”的上海《文汇报》就急忙组织人翻译了久居苏联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在报上连载发表，一时反应强烈。据吴冷西传达，它也引起了“中央”的兴趣，“大家”特别注意她引用的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遗憾的是，他老人家自己最终也没能逃脱阿克顿的论断。

在阿克顿的故乡与许多国家中，专制统治的毒害经过反复的反思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无奈我们中国离这个标准还太远，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可能懂，还不如说他不愿意懂。连刘邓都能听得进去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

这篇文章大体上也还是按照中国式的也就是毛主席式的思路来写的，譬如“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理论，唯一可以讲得通的就是如有些右派分子以为的那样，它是由革命政权转为民主政权的标志。然而这却正好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也不得不为此而费了不少笔墨。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毛主席的问题，必须完全跳出他那自我循环的理论，但是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这个历史的逆转一直逆转了 20 多年。到 80 年代中国又开始要走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莫说社会风气的衰败与人民的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 1957 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补上。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是遗憾的是，“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像并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才敢说。事实上省委书记一级人物同类的说法倒不难找到，不过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以后，未来的史家再去努

力。义山诗不云乎：“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1997

1998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

储安平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

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子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与“党天下”（节录）

戴晴

六

[谋] 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辞海·1935年版》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1]，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1]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

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2]，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

名义是“自动”。

[2]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 1956 年 10 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 1957 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1956 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

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 Fairy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 Prf. Laschi 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 1949 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 10 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 年 11 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

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 40 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

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 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 10 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 8 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 30 年后，在 1986 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 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 9：00 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 1957 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先是在 9 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

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对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对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朝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们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 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上午 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

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 1946 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他开始上班了。那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

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4 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

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梗、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 94 位同志，其中 26 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 4 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 50 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么？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

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 57 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社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头，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3]。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3]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师，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侍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5 月 7 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4 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做人一生唯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

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 1957 年 4 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 80 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数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 1957 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

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 1949 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吠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

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止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 70 的话：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 5 月 1 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是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

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小吠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1234

[4]“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5. 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6（李伯球）；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78910初是毛泽东讲的）；1112我改善的能力）；131415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16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1718.....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交待：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

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 Verygood，Verygo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伦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

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李维汉这样回忆在 5 月 10 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 1910 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5]。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5 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 16 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 30 年代就认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 5 月初而是 5 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 2 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

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掬出卢郁文[6]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6]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 本文男主角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 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

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

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响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

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 Jiva 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60 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 1953 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而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 20 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 12 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到 20 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 1987 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

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 1966 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汨汨淌过。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八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

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十一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是，怎么回事？”“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汪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葸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7]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7]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神气十足之打趣。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己被摘的可能性[8]。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9]。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8]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璧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璧记得1959-1960年间，他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份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倔：‘不出，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

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

[9]一般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抠门”。据此节看，他的“抠”，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阔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他并非铁石心肠、坐视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痲痹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的私宅。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

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买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谁的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是 11：00。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 A 夫人。A 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死啦？”“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份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 1947 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 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

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断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

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么？这死还可惧么？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权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刹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 1966 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

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

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

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 1966 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 1957 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

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 10 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 1947 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荪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 A 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

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 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

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厚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帶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到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漂泊无魂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愿他安息。

1988（选自《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的发言

章乃器

（原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下的几点意见：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卖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

×××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的家长作风。”

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同志的“在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

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三

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

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

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扶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四

×××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刚刚相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呢？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

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大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不到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家加以研究吧！

六

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

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7·6·10）

在民建会、工商联党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1]

章乃器

[1]这篇和后面的一篇文章，是作者1957年6月15日和17日在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他的发言摘要发表在1957年6月16日、18日《人民日报》上。——编者我今天发言没有准备。刚才听了大家发言，对我的热情我很感激，但讲道理还不能说服我。这是老实话，假如不老实的话，今天也可以来一个假检讨。现在就几个问题谈谈：一同志们反映：现在下面的工作不好搞了，说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不同意。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自从党提出了整风运动，主张思想改造和风细雨，又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面的情况，是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什么地方可以证明这一点呢？请诸位把最近一期《工商界》月刊翻一翻，其中发表文章的人并不是没有代表性的，这些文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过的，都是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前讲的，时间不妨可以查一查。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前已经有人讲了那么许多话，这说明下面的情况是在党的整风运动号召下发展起来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二

在这时期，我们作思想工作会不会遇到新的困难呢？肯定是要遇到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的。思想改造工作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过去的压服转到说服的阶段。说服必须要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才能做到。下面的情况，说是我章某人几篇文章挑拨起来的，不但时间不对，还没有看到思想改造的总形势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家是自然而然地把过去闷在肚皮里的话都拿出来了。我诚恳要求我们工商界的领袖人，对思想改造负有责任的人，应该把这个形势发展认识清楚。目前是处在思想改造的新阶段，思想改造工作更复杂，正是发展过程，而不是我章某人一个人挑拨起来的。

三

两条路线问题，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与离开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在资本主义时代是要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反而要离开社会主义，那真是奇怪。我曾讲过，看我这个人，看五年看不清楚可以看十年，直到死我也不会

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的，若再不相信，可以在死后把我的骨头烧成灰看看有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反动成分。我曾想写篇文章自我表白一下，但想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写，于是没有写。离开不离开社会主义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的革命已胜利，政权已巩固，这情况和革命没有胜利前是不一样的。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政治路线问题，今天，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公布，政权已经巩固，不可能再有领导权问题、政治路线问题了。尽管有少数人发表一种大家认为反动的言论，那是发牢骚。如农民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牢骚的，尤其对我们的粮食工作有意见，对我们的干部骂得很厉害，但是，发牢骚是一回事，对领导权不发生问题。我过去曾说过，不怕资产阶级造反，资产阶级不可能造反，也不会造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肯定的，路线上没有任何人动摇。两条路线问题，今天与革命胜利前是不同的，而且有很大的不同。从历史来说，当革命没有胜利，还进行斗争的时候，欧洲国家中有社会主义政党，也有社会民主党，小资产阶级也有它自己的政党，那时领导权没有确定，路线也没有确定，必须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在今天，我们应该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一时一刻也不能放弃。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如此的。例如，一个佛教徒说：“佛教要世界大同，但过去只能思想上想，走不通；现在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了，走上社会主义，将来一定能够走上世界大同，在共产党领导下走通了，因此我拥护社会主义，但我是从佛教立场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又如一个基督教徒说：“基督教本来是要走社会主义的，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基督教要走而没有走上的路，因此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又如有的老国民党员说：“我是三民主义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失败了，共产党领导革命不但实现了三民主义，而且超过了三民主义，所以我拥护社会主义，但不是从马列主义立场而是从三民主义立场来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以上三种人，如果从哲学理论上讲应该批判；但是从政治上讲应该举起双手欢迎才对。不这样做，我们的民族大团结会受到损害。如西藏信奉喇嘛教，他们要走社会主义，要不要他们呢？应该要的，走的慢也欢迎。总之，今天和革命胜利前是不一样的。是离开社会主义还是拥护社会主义，要从政治上看。戴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大家一致拥护的，但在具体作法上有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之内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不能这样乱戴帽子，乱说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有这样一点认识。

四

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在民建二中全会的时候我就肯定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没有一句话否定两面性，从来没有说过两面性不存在。我从前讲过的话和今天所写的文章差不多。正因为两面性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以改造更困难，是个长期的任务；民建和工商联的工作也是长期的。我从来没有否定两面性的存在，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驳，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

五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在我看起来只能是阶级合作的关系，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它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起工人阶级，是落后的，但不是反动的；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落后的，但不是要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所以，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只能是先进领导落后。如果大家不同意“落后”这个提法，请大家提一个名字，是否叫做先进领导“反动”？

六

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问题，我肯定阶级是有本质的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别。至于阶级分子的本质问题，这要看大家怎样解释，如把本质解释为本能，那就是“先天”的了，那是站不住的。任何一种思想习惯都不能说是“先天”的。反动的人我们还可以把他教育改造过来。

阶级与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不同。从辩证法来讲，个人组成集体要起质变，阶级分子组成一个阶级也起质变。如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起初只有零零碎碎的资本家，没有什么具体组织，阶级本性尚不严重，当然那是处在上升的阶段。等到资本家组成旧商会，它形成一个具体的组织，阶级的恶劣本质就逐渐显著起来。再进一步资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政权，阶级恶劣本质的危害性更大了。更进一步组成国际资本主义，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更加大。由分子组成集体要经过几个阶段，是个质变过程。一万个资本家组成资产阶级，并不等于一万个资本家加起来、它要起一种质变。任何分子与集体的区别，只有这样看才符合实际。

由分子组成集体，不是一个数量上的积累，而是质量上的突变。所以，阶级本质是根本的，不可调和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人的本性和阶级本质不同，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是完全符合理论的。

最近，《文汇报》上刊载了徐懋庸一篇文章，谈到人性问题时，说人性有阶级特性，也有共性，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特性掩盖了人的共性。马克思曾经讲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特性消灭了，只有人的共性了。

七

我最近参加了许多整风座谈会，发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是了不起。那些平时看起来很平凡的人，在整风运动中看出，他们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出乎意料的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都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这包括党与非党的关系，公方与私方的关系。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可以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完全是完全可能的。我感觉到有些机关、企业里的“墙”和“沟”是个重大问题。我看我国的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积极力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力还很大。

这是由于过去的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当然，过去的斗争是必要的，

而且有很大的成绩，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必须消灭才行。如果经过整风，把“墙”拆掉，把“沟”填平，大家互相协作，都成为同志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利益。

八

关于我的几篇文章问题，不外乎是“是非利害”问题。“是非”就是是还是非；“利害”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我要问：现在工商界私方的主要缺点在哪里？主要缺点在于消极自卑。因此，我觉得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这种消极自卑解除，把过去不大恰当的帽子去掉，相信在工商界思想改造中的重大问题消极自卑是可以改掉的。我相信党的整风就是这样的要求；先从“是非”来讲，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工商界的消极自卑是否是主要的缺点？他们现在是否已经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他们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了？我看没有。我感到上层较好，中下层比较差一些，即说上层也不一定都积极。究竟是多数人提高了呢？还是少数人提高了呢？从“利害”关系来看，我从没有说过工商界不要改造。工商界是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但不应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要用几顶大帽子来压。要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是否有些同志对思想改造的要求有点唯心主义，假如要求工商界都变成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改造到哪一天才能改造好？我可以回答：活到老，学到老，但是，这个回答不能解决那些要求脱掉帽子的人的具体问题。毛主席曾讲过，猴子变人工商界并不是都能接受。我认为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好高骛远，应该先讲讲国家政策，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等等，由近而远。我很欣赏南京市民建分会和南京市工商联举办的伟大祖国讲座，不过，除了讲祖国的伟大外，还应把祖国建设中的困难也讲一讲，交待明白，使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家能够安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安于现在低工资制的待遇，让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这样才恰当。现在要把每一个人都改造成为马列主义者，成为圣人，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到哪一天才算基本改造完成呢？只有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那一天，才是基本上改造好，——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思想改造脱离物质基础就是唯心主义。把现在的物质生活给大家讲清楚，使大家安于现在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毛主席是很唯物的，他说不能让饿着肚皮接受改造。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思想改造的物质基础，这是英明的，唯物主义的。今后民建和工商联应该把适当安排的工作做好，把前途的美丽和前进中的困难讲清楚，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好高骛远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我说对工商界工作的缺点有两句话，一是估价不足，二是对思想改造的要求过高。思想改造工作应该一步一步来，要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化而逐步提高。

1957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

章乃器

我今天的讲话一部分是上次没有讲完的。

—

首先我谈谈思想改造中说服与压服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现在的会场是压服性质呢？还是说服呢？我认为应以中共中央这次整风的指示作来标准。可能大家记不清楚，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听：“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上次说×部长的讲话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就是作为党员，党章规定，党作出决议后，党员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党内民主还有这个权利。

二

有同志说：“你说工人阶级不剥削、反剥削，为什么不说工人阶级被剥削呢？”我说工人阶级不剥削、反剥削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解放初期有人说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后来受了批判。因为解放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已成为领导阶级，不能再看作被剥削阶级了。大家看应该怎么办。

三

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从阶级来说是剥削残余，我说这些话至少是通过脑筋的。对私方个人说是不劳而获，理由是：1. 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2. 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3. 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4. 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从个人来讲，除了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还有以上这些理由，应该说这不是剥削。从阶级来讲，肯定是剥削残余，这是因为，给定息是根据这个阶级的资本支付的，这是国家利润的一部分，所以是剥削残余。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是符合理论的。但不劳而获也并不是光荣的，不劳而获有什么光荣？从个人来讲，如果也说是剥削收入，

不合逻辑。所以，我认为常识与科学分析是有区别的，有些常识是符合科学的，然而不等于所有常识都符合科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向科学进军。

四

讲一讲集体与组成人员的不同。上次是从坏的一面来说的，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我不是说资产阶级分子没有剥削，我是说，成为资产阶级后，阶级本质越来越恶劣起来。反过来，现在从好的阶级再讲一讲，从工人阶级来讲，领导我们的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以前，革命的力量是不够的，斗争是自发的；但一组织了工会，力量就强大了，有的大一倍甚至几倍；假使再有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就更大了，不但在经济上能取得胜利，而且在政治上能取得政权。这是质的突变，而不是数的增加。我们有些工商业家在这方面没有看清楚，他们看个别工人是平凡的，就认为工人阶级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一经组织起来形成阶级，力量就会增加几倍，要是 12000 人的话，就会变成 36000 人或更大得多的力量。资产阶级心里面有一套轻视群众的心理，不知道个别的人要是参加了群众运动，力量就大多了，群众的力量并不等于个人力量的相加。拿破仑说过，一个法兰西人和一个日本人比，比不过日本人；但 300 个法兰西人和 300 个外国人比，力量就大了。

五

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我对资产阶级看了 40 年，也可以说是研究了 40 年。我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经过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过程。现在到了否定的否定的阶段。否定的否定法则，恩格斯、马克思是把它肯定的，苏联在过去有一个时期不重视这个法则，现在大家也肯定了这个法则。我认为由肯定到否定，否定的否定，从现象上看貌似肯定。我提出资本主义经营的优点是有的，这一点我要是讲起来，可能又说我是歌颂资本主义。大家可以看看刘少奇的报告，我所肯定的资本主义的精华没有超过这个报告的范围。同志们看过列宁的文章，列宁肯定资产阶级的优点就更多了。如果说我美化资产阶级，难道列宁、刘少奇也美化资产阶级？还有一点附带声明，我认为思想上有些资本主义思想，有些封建残余，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改造的。如果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面太广了。我认为从政治上看，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次党的整风文件，对党内知识分子也说明这样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党员，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可见，思想斗争还是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一点请同志们多多考虑。

六

× × 老讲的话，有些地方满好。但其中对我的文章的批评，也许是执

笔的人疏忽了，或性急了一些，如×老说我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错，我是这样说的。但×老接下去说我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存在；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阶级领导一个阶级的问题存在。”×老由此推论说：“这不仅否定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阶级的存在。”为什么我说执笔同志性急了些呢？我接上面那句话讲的是：“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这说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是一个先进的阶级领导一个落后的阶级。要是说我否定社会阶级的存在，否定一个阶级领导一个阶级，我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这是需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七

我们为了对工商业者思想改造有利，今天不是打擂台，应该根据工商界客观思想情况的存在，作实事求是的解释与说明，对症下药。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说我要争取市场，这对我说是很可笑的。今天任何个人要争取市场都是做梦，是条死路。×××发表在报上的发言，有两句话：“没有共产党，章乃器怎能当人大代表，怎能当部长呢？”部长也好，人大代表也好，这是人民给我的荣誉，我以责任感来接受，没有认为是权利。争权夺利的事我向来不做。说我写文章争夺市场，请考察我这些文章是怎样发表的。登在《工商界》上的这篇文章，是我要写文章在《工商界》刊登呢？还是《工商界》出题目要，写文章呢？既然要我写文章当然只能写我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怎么能说是争夺市场呢？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在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谈话，当时我曾说最好作为内部谈话，×部长说：为了开展整风，发表了对推动整风有好处。没有想到那次的谈话，《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人民日报》第二次登出来的《“墙”与“沟”》一文，因为我那天有事，没有参加座谈，是以书面发言的，我还写了一封信给×部长说是否要发表，请你考虑，我个人是没有顾虑的。我常常想我是依靠共产党的，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党中央是会明是非的，所以搞得思想不一致，要查根源。两面性问题，在二中全会的发言我也是要求作为内部高级领导讨论的，大家可以查考记录。也可以查一查我开始时有没有说过没有两面性。

八

争鸣不是抗拒批评。有一些复杂问题是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同志们可以检查一下，从两面性的问题提出后，有许多同志不同意，引起讨论，有些人是否通过讨论也提高了呢？说章乃器荒谬言论，我是不承认的。《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老一套的东西，往往容易不自觉地拿出来，我们会场上的气氛都可以看出来，今天会场上的组成人员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高级领导，被批评的对象是两会副主委——章乃器，和风细雨够不够呢？是压服还是说服呢？我怀疑各地开会

压服多还是说服多，请检查一下。我真诚地要求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以说服的态度和方法解决问题，对工作有利。有些同志有些意气用事，希望轻松愉快些，我是“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的。大家通过讨论提高思想很好，但不要想入非非，变成虚无主义。

关于李万铭的话，我是说不应当对党员个人崇拜，完全没有拿李万铭代表党。

说平等人格，是说不要给工商界扣帽子。为什么工商界要求摘帽子呢？有帽子就说明是不平等的。在宪法上规定有要扣帽子吗？我看是没有吧？有人说我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发言是袒护章伯钧、储安平。这是不对的。我认为现在正是对这些人批评，检讨慢些发表好。我对他们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至于是不是实事求是，有记录可查，将来可以公布。

对工商界的问题，我并不是以工商界身份代表工商界，而是以国家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发表对工商界的看法。我是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根本不必要在工商界争夺市场。

至于先进领导落后的问题，改为新生领导衰落也好，可以考虑。我觉得应该从思想上去认识。新生也就是先进，衰落也就是落后。由于党坚决执行和平改造政策，因此引起改造高潮，不要共产党领导完全不是事实。

说大家都有两面性，并不是说所有有两面性的阶级表现都一样。这在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举一个例子，人都有两个眼睛，并不等于人都是一样，没有好坏。

人有先进、落后和反动的，这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辩证的性质。

说我的言论是反动的，是挑拨的，我想可以检查我的全部言论。我对党中央没有说过一句不利的话，没有一点损害党中央的威信。就是在墙和沟这篇文章中，也说明了中国的党是一个好党。对党员的教育是另外一回事。很明显的，有错误的党员是少数。1200万党员如果有百分之一有错误，也不过12万人，只是少数人的问题。

另一点，为了保卫、巩固我们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怕公开，就怕隐蔽，反对的公开站出来，不可怕，隐蔽，偷偷摸摸地做坏事情才会令人痛恨。因此，我认为大家有一些不满情绪与牢骚、怪话，让它暴露出来没坏处。比在少数人中传播比较好。整风运动的精神是好的公开的，对我们的批评没有什么可怕。的确，在中国搞匈牙利、波兰事件是搞不起来的，希望在这时期让工商界畅所欲言，暴露思想。有些混乱思想，在党中央应是意料之中的。

有人说，我好比是给资本家抽大烟，在高潮以前还可以这样说，高潮以后已戒掉了。

否定运动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

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

另外，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一模一样，我没有这样说。我说是先进与落后。

有人说我说中小工商业者都是市侩。中小工商业者中有市侩大资本家中也有市侩。这是歪曲我的话，我不能承认。

我再讲一讲，我对我这些言论的态度，一个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对，我个人发表的文章可以全部推翻。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的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人写文章不是不经过考虑的。我还是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按整风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要按照整风指示的精神来研究。我认为整风运动的指示应作为思想斗争的指导。

1957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章乃器

本报特约新华社 31 日讯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

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

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

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

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顾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

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

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

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

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

我的检讨

章乃器

（这是作者在 1957 年 7 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

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

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前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

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

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

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二，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

的个人主义思想。

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原载《人民日报》1957.7.16）

章乃器在 1957 年

章立凡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 1957 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之类的“活谥”。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 1979 年起，我不断地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有两位当年整过他的同事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 年 4 月间，有消息说，在 27 位当年被划右派的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请求对这些言论重新甄别评估；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 6 月传达的中共中央 60 号文件，父亲的名字被列在改正的 22 人之首。

—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 1957 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树；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有类似的记述，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父亲的性格。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父亲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己见，虽然周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许汉三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

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

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

他的这两项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两个问题上与一些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到了后来，这一提法被截去了“政党”两字，成为他美化资产阶级的一大罪状。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他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父亲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

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哪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上也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他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二 1957年2月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

此事说来话长，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春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很不

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她，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 1949 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复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 20 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4 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5 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全国鸣放进入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三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 5 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 13 次，后者开了 25 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整风开始前，他在 4 月 15 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 1952 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六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 10 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 5 月 8 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

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一位中共领导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这位领导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一篇书面发言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四 5 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的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

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

5月1日和2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界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的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2000，资本稍微超过2000元就算有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

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的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

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 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一位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他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某老也被同时召见。

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民建的他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 1947 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他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 12 时 29 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过齟齬，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 月 7 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五 6 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有批判者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领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的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释，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智，似是而非，偷换概念。例如父亲的文章谈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认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到批判时就被曲解为：“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区别的存在”。经此加工，一段论述阶级关系的话变成了“否定阶级区别”。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辩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富戏剧性，诸如公报私仇、卖友求荣、夫妻反目、反戈一击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似乎也怪不得被喻为附皮之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近于疯狂地洗刷自己，与“卖友求荣”相比，“卖友求生”已算不得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种高压之下声泪交加的忏悔，与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声浪震撼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化”，边缘的泥土不断陷落，泥塘的面积不断地扩大，站在塘边呼喊的人们也纷纷滚落其中。

谁无妻儿老小，一人入围，全家罹祸。求生的挣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还为之骄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识分子人格。在轰鸣狂转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智。

六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评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

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销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xxx：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xxx：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x老，你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明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xxx：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和帽子堆中。

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堆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七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 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前面提到的民建那位老先生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份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公的良苦用心，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二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能自尊其祖的。这段报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报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6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

……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 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 工商业者；3. 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地愉快地考虑。

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八

父亲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

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 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9日，这篇讲话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位当场聆听过讲话的“大右派”，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6月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

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混战，秩序纷乱。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像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公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20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父亲专门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这两年周公处境不好，被迫做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父亲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作了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父亲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今一些老前辈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此事。

接下去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例如当时各报都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回忆一件往事兼质问章乃器》一文，大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际，是他所在的游击队将章乃器、胡风、史良、邹韬奋等人救出，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战士谴责章乃器：“在最艰苦的时候，党派了自己的儿

女用生命搭救了他，解放后又把他放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而章竟“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最后他用“这种人简直没有人味！”的粗话，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义愤。事实上，香港沦陷时，章、史二人都在重庆。

这位老战士可能是记忆有误，但历史岂是能够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九1957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父亲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自20年代他进入银行界起，就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会议期间代表们的用车是统一安排，有一次车子因接侯外庐耽误了一会儿，开到时父亲已在家门口等候，并指着手表对司机说，你晚了五分钟。

怀仁堂——这座皇家禁苑中轩敞的古老建筑，曾默默地注视了几个朝代的盛衰荣辱。自1949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建国前夕，父亲曾在这里与600多位政协委员一起，举手通过了政协的《共同纲领》，选举出新国家的领导人；1954年9月，他在这里举手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他曾多次在这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及政协、人大的历次会议。如今，这里的一切都与往常迥异，不见了昔日的肃穆祥和，雍容谈吐，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而又保留着人民代表身份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在各个小组内接受着无休止的斗争，违心地作着屈辱的检讨。黄绍竑因为经受不住，两次吞安眠药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陈铭枢则在赠答友人的诗中，以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气氛和自己的心情：君诗忧患积，一语九回肠。

痛定宁思痛，群弦已共张。

赤标天下鹄，青换眼中桑。

莫负苍生愿，相将造乐康。

父亲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群弦共张”的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

得是出于意外的好。

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炼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7月7日下午三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前面提到的老先生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谈到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经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右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的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他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八大”政治路线，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 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看他怎么办？”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就表现的很‘左’，×××也不赞成章乃器，似乎×××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份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的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一连斗了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闭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跟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接下去又是一场人海战术式的围攻。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

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 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沥所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领导（即当初鼓励他鸣放的那位——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十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58 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 38 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这是一种“加重处罚”的信号。26 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1 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前往中南海。

11 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到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早已熟悉的古老建筑。周恩来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和徐冰副秘书长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 30 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 5 年吧，5 年不够，也可以看 10 年，到那时我也不过 70 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 10 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和习、徐二位一一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9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29 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决定。

195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93 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

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55 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 11%；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在 200 万以上，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右派”中除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

十一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

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大行其道，没有人再敢于提不同意见。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 2000 万人口，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 30 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 25 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另一位领导（即曾鼓励父亲鸣放，后来又主持给他戴帽子的那位）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

那位领导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还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路上聊天时，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

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10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一次政协小组会上，某教授（年轻时曾受父亲提携，“反右”时积极斗争他）碰巧坐在他的身旁，父亲吟诗一首赠给教授：“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教授大怒，反唇相讥，指控他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份量当然不轻。

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教授亦有悔悟，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 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批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1963 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法院查封财产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的生命之火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漫漫长夜中耗尽。1977年5月13日，他在曙光出现之际赍志以歿。

1995

章乃器传（节录）——最后的历程

章立凡

1966 的“红色恐怖”中，像章乃器这样的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8月24日，红卫兵冲入章乃器的住宅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

院，这里正在举行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到这里的“黑七类”分子大多是有来无回。章乃器周围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唯有他凭着重意志和气功的功力硬挺着，不久也因伤重而昏死过去。

也是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位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章乃器成为从这座戏院中活着出来的幸存者，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请看他的自述：“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1]

[1]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7、48、49页。

面对这种极“左”狂热下令人发指的暴行，章乃器对付的方法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他说：“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或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此时此地，我是没有死的理由的。我可以镇静对待。”“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进行了8天的绝食。直到他被赶出原来的住所，迁入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楼，他才恢复进食。从那时起，他蓄起了胡须。

他凭着自己修炼多年的气功的功力，自疗好身上的创伤。他说：“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部经常疼痛。

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疼痛也

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2]

[2] 章乃器：《七十自述》149页。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 10 年，就是在北京东郊那座普通居民楼的斗室中度过的。他在逆境中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健康完全恢复以后，章乃器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动手烧饭。尝过他烧的饭菜的人们一致公认，章乃器的烹饪手艺很不错。他的生活费在运动中被造反派降为 50 元，这点钱要维持他自己和小儿子立凡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说：“钱少了营养不能少。”他时常买些价廉而又富有营养的“猪下水”，漂洗干净，做成酱肚、溜肥肠、猪肺汤等各色菜肴下饭。当儿子为生活的艰辛而抱怨时，章乃器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起 40 多年前我在北京失业时好多了。”章乃器的藏书和笔记，在抄家时已散失殆尽。但他仍好学不辍，利用一切可能寻求书籍阅读，并坚持作笔记。当时有不少单位找他“外调”，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不少回忆录，前后约有上百万字。在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历史常常是被歪曲颠倒的，章乃器却坚持讲真话，为此经常跟外调人员发生争执。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一定要他写材料证明张劲夫是叛徒，他没有这样写，这几个人对他拍案威吓，章乃器忍无可忍，当场把自己写的材料撕成了碎片，厉声喝道：“歪曲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又有一次，有人硬要他证明钱俊瑞是特务，他也没有照办，并对儿子说：“过去救国会工作的时候我同他（钱俊瑞）确实有过不同意见，但我不能无中生有地陷害人家。”章乃器很欣赏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句话，还不时诵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五柳先生传》等名篇，他多次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想同儿子一道“布衣还乡”去过隐居的生活。但他终究不可能超然世外。有时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悄悄探访故旧，劫难余生，故人相聚，议论之间章乃器往往会流露出忧国忧民的孤愤之情。在这一时期，他和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直接交往，在周围的人看来，他是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他在公园里和人们探讨气功，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找他下棋，却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是个做过大事的人物。

章乃器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以往政治生涯中未曾遇到过的朴实的友情，也进一步理解和感受到他们的疾苦。他曾经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首先我要办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

面粉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1975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章乃器的处境也有所好转。他写信给党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曾代表党中央与章乃器进行了亲切、坦诚的谈话。4 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实上章乃器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但这已是在当时可能作出的最佳安排。他的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并准备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掀起所谓“反

击右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

1977 耗了他最后的生命，当曙光出现之际，章乃器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会后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排除“左”的干扰，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的直接过问下，章乃器的右派冤案在 1980 章乃器的一生，显现出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的思想脉络和行动轨迹。他为人刚正耿直，才华横溢，富有爱国理想和实干精神。有时是拘于历史的局限，有时是误于率直的性格，他的一生经历了曲折、苦难的里程。但他始终怀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章乃器晚年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对章乃器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名字，将作为中国近代中外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而彪炳于史册。

章乃器——中共的诤友

翟作君王蕙炎

1957 的材料。章乃器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派”、“反共老手”。

纵观章乃器的一生，他恰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20 多年的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昭雪，尽管此时章乃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然而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史册。

热血沸腾追求革命

章乃器，1887 年 3 月 4 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垵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有“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乃器”。

章乃器的祖父章楷，是清同治年间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济困扶危伸张正义。

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在章乃器身上得到继承。

1918 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

从此，“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只干了 3 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27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当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而对国家前途充满美好憧憬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这年 11 月，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步尝试。他把“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奉为《新评论》办刊的信条。1928 年 5 月 3 日，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他一方面呼吁对日宣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他宣称：“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发泄郁结的民气。”章乃器的激进言论，自然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 年春，便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党的诤友抗日斗士 1932 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 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三弟章郁庵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就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将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现钱，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30 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 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与章郁庵联系上的。当时章乃器曾安排陈云在秘密住所隐蔽，后来才转道前往苏联，可见章乃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35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实行“剿共”内战，章乃器于 1936 年 1 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文章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在文中呼吁：“我们不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向外！”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沈钧儒当时就称赞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1936 年 5 月 31 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 月 2 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市政府会见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向他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

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当即诬称救国会有野心。章乃器和沈钧儒毫不为吴铁城的诬指所屈，严词拒绝收回《宣言》。而后，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救国主张，唤起民众。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他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章乃器干脆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啡国会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啡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

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的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1938年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结果，1939年3、4月间，蒋介石终于下令“另有任用”罢了他的官。

“红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筹建昆圣影片公司，同时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平民主义活动。1947年9月，蒋介石阴谋对民主人士大逮捕，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

1948年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北上。1949年1月7日船抵大连。章乃器在东北亲眼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热烈场景，而旧社会常是的烟、赌、淫、乞等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这使章乃器感慨万分。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一支革命歌曲，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要切实表达党的历史功绩，建议在“中国”之前冠以“新”字，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

者把歌词改过来了。”1949 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10 月 1 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 年 8 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涉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1955 年 4 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那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1956 年，章乃器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是章乃器在国内出现了新形势的情况下，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新的估价，在理论问题上作探讨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

披肝沥胆推心置腹 1957 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 月 13 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 6 月 5 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

事实究竟如何呢？首先，关于“与党争权力”的问题。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

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

段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曾于 1955 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 1957 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其次，关于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1956 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学界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在《关于工商业改造辅导报告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不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像这类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硬把章乃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因而成了当时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

第三，关于对民族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问题。章乃器认为“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章乃器不同意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他认为民族资本家改造了近 8 年仍然需“脱胎换骨”，会使人望而生畏，其结果是“阻碍了人们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但是章乃器的观点却被曲解为“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而加以批判。

第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1958 章乃器写出了 3 万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文中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没有沉沦依然乐观 1958 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后来他虽然曾经提出过申诉，却未被接受反而被斥之为“翻案”，接着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此刻，章乃器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1966 冲入了他的住所，章乃器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集会。

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倒在血泊之

中，章乃器也被打昏在地。他曾作过以下的回忆：“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遇：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充分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

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浇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面对暴行，镇定自若，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是会理解他的。他说：“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他又说：“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民楼斗室中度过的，他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而且始终保持着坦率、正直的秉性。

1977 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80 岁。从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到 1966 年开始的 10 年浩劫，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20 年，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 20 年呢？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不能不想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一个静静的小型追悼会上，当年“七君子”中两位健在者——史良和沙千里为他们的同志送行。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 1980 年 6 月平反昭雪，1982 年 5 月，他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翟作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蕙炎：上海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章伯钧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

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 20 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

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地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即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

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鹅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罗隆基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

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未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

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 1200 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入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镀划整个地建立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

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 1956 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原载《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23 日）

加强党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罗隆基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最近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现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来的成绩和缺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周恩来总理旧年 1 月先后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绩。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解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时间、助手、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问题，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满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内，都得到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现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极，现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并且必须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说：“代表委员们年年观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问题还是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就印发了一些有关单位答复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这就充分地证明上面这种悲观论调是错误的。第二，国家还在一个发展很快的过度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当前，在知识分子方面，还存在些什么问题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学哲学的人在图书馆编书目，学法律的人在机关里做会计，学染料化学的人在中学教语文，学机械工程的人在中学教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政法、财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挂名领薪，而没有开课的人还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英国留学生拉板车，美国留学生摆烟摊的情形。这当然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单位的事例。这次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座谈会建议党和政府通令全国，普遍检查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的情况，我个人同意这种建议的。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国家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旧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政策的时候，重点放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问题，准备逐步地来解决。现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又起来呼吁了，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顾，而对小知识分子，特别对小学教师的照顾不够。其实旧工资调整，对小学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他们普遍表示兴奋。

但是小学教师教书的工作量已经很重，而有些地区的干部还要驱使他们充当杂役，替机关抄写，替书店推销，替家乡打井筑堤，替粮库晒谷守仓。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今天的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

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间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经过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纯洁了。各级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

诸位委员，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见。就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来说，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评级制，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是否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

事实果真是如此，事实就会给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说服教育。去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我曾说过：“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6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结，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就所见，畅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认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经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们就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以今之韩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栗巍峰，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隔膜是从双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须双方共同努力，倘此方认彼方是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见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见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视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认识和了解的问题。在我个人来看，我们

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经过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锻炼。革命老干部语言比较坦率，行为比较憨直，批评比较严厉，斗争比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须了解认识的。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们变本加厉了。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是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作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说在今天的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最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愿就个人的见解谈一点我们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就拿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年来我们民盟全体盟员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后，我们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加重了。怎样进一步采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课题。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反映：民主党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这些反映是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下，我们今后应真正成为领导党的助手，

我们应该诚恳地接受党的领导，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我们要认真地贯彻“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一般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和提高。东大部分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是业有专精，学有专长的。我们应该殷勤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且竭诚帮助他们，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问题。协助他们克服困难，鼓励他们贡献意见，团结他们互相学习，共同改造，这是我们民主党派每个成员的任务，我愿同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共同勉励！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谢泳

1957年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他称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1]《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出身清华罗隆基（1898 - 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

当年的29名成员中[2]，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思。

[2]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82。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

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清华辛酉级（即 1921 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1922 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逃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3][4][5]浦薛凤：《忆清华辛酉级 10 位级友（上）》，《传记文学》，第 47 卷，第 2 期，总第 279 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5 年 8 月），页 19、20。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 30 岁。是年 3 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 卷 2 期至 4 卷 1 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

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实现现实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页 502。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 年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愤体说，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璜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

极方面是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7][8][9]《新月》，第2卷，第2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10]《新月》，第2卷，第5期。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地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11][12]《新月》，第2卷，第5期。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3]。

[13]《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

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14]《新月》，第3卷，第1期。

[15]《新月》，第3卷，第10期。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鹵”等笔名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1949 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 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见，罗隆基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24][25]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1949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

[26]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27]千家驹：《70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页239。

1949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情况比较复杂。出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共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种欢迎态度，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使他们绝望，1948一度兴奋。可是正当他们对新政权产生好感之际，中共却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居然相信了这个神话。罗隆基甚至说过：“周

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28]一方面说明他有想不通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已渐趋以“无”为荣，以“资”为差了。在新的环境中，罗隆基的心情并未感到舒畅，而是越来越感到压抑，他所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出现，而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很快发生了。1957年的到来，将这位复杂的、充满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剩的一点梦想也打破了。

[28]《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吴晗发言。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6月2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在1957年夏天的言论是妇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党天下”这个说法的应是罗隆基。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一篇文章是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他说：“‘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当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说到“党天下”的说法出自罗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他和储安平的关系。

罗隆基长储安平11岁。储安平的经历与罗隆基大体相似，他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留学英国，思想都受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影响。罗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较活跃，而储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较活跃。

罗隆基曾任光华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年，储安平于该校毕业，是罗隆基的学生。从各种联系上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储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受罗的影响，但储对罗是有看法的。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列为该刊“撰稿人”的前后共有78人，多数是国内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这个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时间内，罗隆基没有为《观察》写过片言只字。原因何在？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年《报》发表一篇《章、罗和储安平密室策划一证》[30]，说储安平和罗隆基如何如何，显然是将一般性的拜访和交谈上升到政治活动中去了。储安平后来在《向人民投降》一文中承认了与罗见面。另外，在当年的民主人士中，罗隆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个人交往是很少的[31]。罗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毛周个人的疏远或许也是一个因素。

因为即使在“反右”、“文革”当中，毛周出于个人情谊或其他考虑，也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如章士钊、梁漱溟等人。在“反右”之前，罗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32]然而这种声音在已经获得政权的人听来，已经很不顺耳了。

[30]《光明日报》，1957年7月7日，第3版。

[31]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和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中，未收一封毛周给罗的信，这在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是很特殊的。另外孙琴安、李贞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等书也未列毛罗交往的资料。

[32]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说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33]这与他当年对吕孝信说的“如果申请不准，以后将被歧视，那份罪可大了，又怎样不怕呢？”是一致的，作为“右派”的罗隆基还能怎么回答呢？申请离开，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吗？罗隆基没有走，1965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但他自觉地走上了仕途，一切悲剧都由此而来。书生参政，好像都是这个结局。

[33]叶永烈：《沉重的1957》（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2），页34；70。

（本文编入《思忆文丛》时被删去一节，若干注释虽有内容并未被引用，如有需要可参考谢泳原著——扫校者识）

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

葛佩琦

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 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

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6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费孝通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

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

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前辈，30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陡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目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了这种感叹是不多了。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者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两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

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业务。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吧。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得先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得讲讲各家的异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没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家驳斥，现在别人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朋友们，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们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间房、二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就是指这个。说得具体一些，他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说是可贵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们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说来，我认为并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我满意的情况，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们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说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问题。自从规定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贯彻，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高等学校里大约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得到了保证。八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教师还不能保证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教师比例已降到十分之一以下。这个问题虽则不能说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愿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说来时间问题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书少，而是编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问题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别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

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彷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前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须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不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汇报了上级，交了卷子。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惟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

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已自觉到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

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

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那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那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对头的。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

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他们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学术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却还没有这个条件。

积极的東西搞得不好会变成消极的东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线应当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要求能满足，别人还是红脸白脸地来对待他，他心里就会不服气，会产生情绪。我体会到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最初确是有人反对学习苏联，本质上是立场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些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加分析，会觉得立场又不稳了，其实性质是和过去不同的。

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确有一些地方把学习苏联简单化了。有些人提出了怀疑或不同意见，反而受到批评，于是搞出了情绪。这些情绪并不是从立场问题上发生的。但一有情绪，消极因素也跟着滋长，那就不好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

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

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嗅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

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锁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我想，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发生的，由来已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同聊天，谈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很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认为国家大事自有贤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等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势，自觉很孤陋寡闻，不要说别的，连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说起来都觉得绕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没有资料。第四，多年来养成了没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懒汉习惯。我们曾经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尺寸都不很合。说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赖了呢？虚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没有了主张了呢？不论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

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认为水平不够，说不清楚。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赘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说到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超过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言论摘要

钱伟长

“党员灰心、失望了，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在1955年民盟七中全会上）“院系调查……工作量，一系列的改革，无非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开展争论也应该是有学术水平的人来开展争论，升级也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高教部对高等学小仗无学术领导，连一个学术委员会都没有。我所讲的学术领导不是老头领导，年老年轻只要有学术都可以领导。学术问题与群众观点是两回事，现在有些人在争夺科学研究工作，我看是争马桶坑不拉屎。因为他们没有吃饭，肚中空空。”（1957年在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文委会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党有意排挤老教授（内行），问题“非常严重”在高等学小房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第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部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教授同青年教师搁在同等级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从我已获得的资料看，我认为目前有一个问题严重——所有工作中依靠内行不够。”“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领导意图是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青的来代替老教师，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人才，而苏联不可能成千万地派专家来，依靠苏联专家只能作为一部分补充。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

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老教授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有三一、另外有一条线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二、党的力量大，……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三、党内资料外人不知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今后应该开门办党学校党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呢？应当公开，党的小组会也可以吸收群众参加，大开门，使党外团外的人对党团工作有监督作用。同时，对群众也是很大的教育，整风的过程就可以把门打开。现在是半开门，先讲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员有意见回去提，关门研究。应当开门整，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使党员在群众中生根，在学校内这样作是有条件的，应当从开门整风到开门作党的工作。”（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要求党员揭发党内秘密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鸣”“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概一时还放不开。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党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钱伟长批评学校里的宗派主义》，见《北京日报》1957年5月16日）从物理教研组“鸣”“放”的情况来看，清华还“鸣”“放”得很不够。我们可以通过物理教研组来看其他系，问题不会没有，但是今天还比较静，要使整风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第一，党委首先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物理教研组“鸣”“放”得好，就是因党员带头。很多事情我们只能谈表面现象，举不出具体例子，党员带头就可以更好地搞好整风。蒋校长在报告中说，党员可以采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鸣”，这一句话还有保留。

第二，有些问题，党委应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如杨子远可以把他调开，不调开，群众贴大字报也还得躲躲闪闪，会妨碍整风开展的。又如在肃反中斗错，应开诚布公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何东昌同志作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不解决问题。（《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要青年不要“虚心听群众意见”“服从祖国需要”“从整个社会看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的封建教育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中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过多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见《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要学生发泄烦闷情绪你们想过了没有？现在学校里揭发那么多的东西，根本问题在哪里？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说“三害”，但这是笼统的罗。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辅导员制度、肃反问题、教学改革、理工合校，但这虽是问题，却不是主要的，你们没有想过吧！现在是该想想的时候了，不要光是和大家哄在一起，应该冷静分析

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揭发这么多的东西？青年人要独立思考嘛！”（《答学生问》见《新清华》1957年第204期）“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找不到题目，你们今天来也是来找题目的。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关怀。

我很奇怪，为什么天天在讲要团结青年，但是学校里还要造成局面，总有那么一群人想要去感染另一群人，而且态度是敌对的……你们大胆揭发，不要怕，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听。你们鸣了，我再来讲。”（《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青年学生不应分左、中、右钱伟长说：“我是吃过苦头的人，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气氛呢？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也不过是口头说说，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的话，但是他们就没想到，我们是青年，最多二十来岁，有的还只有十六十七岁，就是落后也不过是落后三四年，还会干什么坏事？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30岁以前青年人都是这样活泼的，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

“我们的青年人大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大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对学生情况的估计，我同意杨人阁的意见，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清华就没有人提胡风问题，在北大也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也有人批评，不必害怕，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党、团组织是三大主义的根源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一原因产生的。层层汇报制度，年纪轻轻的团文书，见了一棵芝麻大的问题就夸大，然后汇报到团总支、团委会，一直到党委会，每一层加上一些干部主观主义，到了领导上作个决议“贯彻”到团支部，团支书拿了个鹅毛当令箭，硬灌。党的威信很高，谁敢违反，当然就闷在心里。下面灌不通了，就作个大报告，点名点将把同学都点一阵，点到的就心里结个疙瘩。而一些干部越显得自己了不起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他不同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从各方面反映的几位党委的发言，说明对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如蒋校长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认为这样的领导思想的本身就有宗派主义情绪。”（《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整风运动中搞理工合校的签名关于理工合校问题，钱伟长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苏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同学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副校长问有多少人？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钱副校长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临别时，他又向我们说，“你们去签名吧”！

……座谈后，有些同学立即成立了理工合校组，到全校发起签名……（1957年6（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7月6日）

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上

王造时

首先，王造时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話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

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民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贰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

王造时冤狱侧记

夏高阳

王造时冤死已经20年了，抚今视昔，缅怀易已，爰草此文，用志拳拳。

人间冤狱

王造时先生于我为前辈，谊兼师友。30年代，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建国后，我们成为忘年交、患难友。

1957我二人先后被捕，同囚于“四人帮”的集中营一名为看守所，可那是真正的地狱！

有的人不堪折磨，便殁毙在那里。王造时亦未能逃过“四人帮”精心策划的那种变相的肉体消灭之厄，我有幸被囚禁在那鬼地方达6年6个月又

一个星期，是合格的历史见证人。

“文革”那阵子，全国形成一个大囚笼。“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主要集中营，先后拘禁过好几千人。其中包括：“走资派”、民主人士、专家学者、文艺界人士、倒楣的造反派头头、大量党与非党干群，并旁及工、农、兵和少数外国人。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对“囚犯”实行饥饿政策：不让“囚犯”吃饱，使之长期处在痛苦的饥饿状态，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因此，入狱不要很久，好端端的人便形销骨立，随之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入夜，则成为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殿。镣铐声与呵叱声并作，皮肉与哀号呼救声交响，令人毛骨悚然！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仍不乏犯人起而争取活命及有意义的生存而斗争。

狱中相逢

一天午后，刚刚吞下砂石饭就烂菜皮，我蹲的班房门突然打开，几个狱卒出现在门口，他们叫出一连串囚犯号码，我被叫到了，杨仲池等也被叫到了。

基于长期牢狱生活的经验，我判断这不是绑赴刑场，也不像提审，更不像是宣布释放，而是调班房。

这是我们这个班房的难友所共同担心的。我同杨同志等调到这个关着 30 个人左右的大班房时，发现这里难友们闹不团结，互相告讦成风，遭到狱方的不断镇压翻过深入工作，依靠全体难友的觉醒和共同努力，整个班房转变成团结互助、政治情绪高昂的集体。人人抓紧锻炼，认真学习，深入研讨国际国内形势，取得了：黑夜终将过去，光明必将来临的共识。凭这一点思想闪光，大伙保持着旺盛斗志，免于精神崩溃。我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胜利！”“为了祖国，顽强地活下去！”我们的物质匮乏已极，然而我们精神世界是富足的。

现在眼看就要分散了，大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对斗争得来的硕果的留恋，又有对未来命运不可预料的顾虑。

一个狱卒要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跟着他一起下楼，他打开底层一个班房的门，让我进去后，加锁。

这是一个阴暗潮湿、让人窒息的房间。四壁和承尘的白垩已经剥落，地板凹凸不平，一盏昏昏然打瞌睡似的电灯，泛照着四个囚犯的身影。

倚靠在铺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衣服褴褛，极度衰弱的老者：1845（囚犯的代号，下同），是一个 30 出头，右颧骨上有一块黑斑的造反派头头；1646，一位原检察官，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40 多岁，身体憔悴且带着伤；一个 60 岁出头，浓眉凹目，讲着不纯正上海活的矮个儿，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工程师渡边。他的囚号是 1753 我的眼光停留在老者身上，他的囚号是 1416，白发萧疏，一脸胡子，瘦得皮包骨。这人好生面熟，但怎么想不起来了。我发现他也在上上下下打量我。会不会是王造时？一个意念在脑子里闪过。不，不，不可能，王造时白白胖胖，平时腆着滚圆的大肚子，足足有 178 磅光景；而且王造时很爱修边幅，胡子剃得精光，头发梳得熨熨贴贴……而眼前的人怎么能是他？继而转念一想，王造时在这里呆得很久了，体貌不可能不起很

大的变化……这囚室有二张高铺：一张是老者的铺位，另一张空着。我就把行李放在空铺上面，继续观察。

此时，狱卒来通知“放风”，我决定在“放风”时，看个清楚。

到了放风场，我故意靠近老者谛视他，而他也用目光逼视我，目光碰在一起，我确认老者就是王造时。但鉴于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我还希望能找到直接证据，以免误认。

回到班房，一份报纸递了进来。

1845 道的江西腔，“他确是王造时！”我极力隐藏自己的感情，并提醒自己：对此必须绝对保密。依据监规，绝对不允许熟人呆在一个班房，狱方把我们二人调在一起，显然是工作上的疏忽。我一定要等适当机会向王表白。

在这个班房才呆了不过半天，我已经发现 1845 的专横作风，和他对王造时不逊的态度。这一动向，引起我的注意。

在别人不注意的一刹那，我靠拢王，并偷偷地握住他的手，耳语似的轻轻告诉他：“我是××，请注意保密。”他也同样激动，颤声说：“我吃不准，不敢认你……那真是太好了……”饥饿难忍这个班房曾经先后送出两个魏侗病人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去抢救：一个就是王造时，一个是渡边。

正是由于饥饿，监狱里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早上发粥，遇桶底有一点剩余，狱卒照例向阴沟一倒。有一位苏北籍女炊事员，出于好心，碰到有剩余的粥，就收集拢来装在小面盆里，排日轮流递到班房里去，让犯人分而食之，这原是德政，那位苏北阿姨成为犯人心目中的观音大士。

别的班房把送进的剩粥由犯人分而食之，这个班房却是轮流由一个犯人独享，那一次，轮到王造时，由于实在饿得慌，他端起小面盆，一口气喝了下去，饿瘪了的肠胃哪里承受得了两三千 CC 的薄粥汤的涨力，于是酿成胃壁穿孔的惨剧，鲜血咯了一地，立即被送往提篮桥监狱医院去了。第二天轮到渡边享用薄粥汤，当小面盆递进来时，尽管有王造时的前车之鉴，但他顶不住饥饿感的压迫和薄粥汤的诱惑，竟也一口气灌了下去，随之倒在自己咯出来的一汪血泊中……他们住院个把月才回来，渡边身体较好，恢复得快一些，王造时则委顿不振了。

这种悲惨场景的酿成，绝不能责怪犯人们缺乏自制力，要看到“四人帮”饥饿政策的残酷性。

蔑视霸头

这个班房里的 1845 毕业于华南某大学经济系，是该校造反派头头，因武斗死了人，被对立方面造反派揪了出来，一肚子委屈。他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产生的特殊材料，尽管造反已经彻底失败，落到这个地步，仍不失造反派本色，想在班房里称王称霸，企图以打击王造时为突破口来确立“霸业”。

他对待王的态度十分无理，常常出言不逊。一会儿嘲笑王笨手笨脚，不会自己料理生活；一会儿又无端攻讦王读报读了“错别字”；一会儿又嫌王睡眠打鼾，妨碍了他。而王造时出于对他的蔑视，则一味忍让。我既气愤，又怕 1845 的胡闹还会继续升级，伤害王造时，我想保护王，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我也曾企图说服 1845，向他指出大家都是难友，谁也不能歧视谁。可他却说：“我就是这个脾气，我看不惯就要说！”我说：“1416 的年龄可以做

你我的长辈，论资历，他可以做你我的师长，我们应该尊重他。”“尊重个屁，他连读报都读不好，读了不少错字。”“你说 1416 读错别字，那是你的误解，他发的是江西语音，如果一定要以纯正的普通话读音才算读对，那么你的苏北口音和我的浙江口音，读出来的字，有多少不是错别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讲道理，应该懂得起码的礼貌。听说，孙大雨关在楼上的一个班房，难友们让他讲莎士比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何不让 1416 跟我们讲讲国际政治，该有多好呢？”……可是这些话，1845 渡边和“检察官”都是正派人，他们看不惯 1845，但也不愿意招惹他。

铁骨铮铮

这一段时间里，1845 提审频繁，我有机会同王造时深谈。

王造时，留美法学博士，早年成为上海的名律师。他看问题更多的是从法的角度来考虑。他说：“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经济建设，忽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很可惜的。后果严重，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中国反右的失误，都是从冲决法的藩篱为其特征的一种毁灭性打击！”“这个地方，解放前，解放后，原本是在法律规范下羁押未决犯的通常的看守所。三四十年代，我执行律务，经常到这里来，会见未决犯，接受委托，担任辩护。

今天这里已经蜕变为无法无天的纳粹集中营。何以致此？值得深思。

我在 1936 年 11 月，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时隔 30 年，1966 年 11 月，我却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被起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他对 1845 的悖行，似乎不太在意。当我对 1845 表示忿忿然，并说一定要让他接受教训时，王造时反而劝我，不要为他操心，他“忍得住”，并对年轻人不要苛求。

由于我对他在 30 年代和解放初期那种慨当以慷，辩才纵横的风范的印象特别深，因此，对他眼前一味忍让的态度，不能理解，以为王经过反右的打击，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之后，可能气质上起了变化，丧失了英雄本色。

经过同他深入交谈之后，才认识自己的幼稚和肤浅。

“文革”一爆发，王造时就被投入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中心脏涡，在复旦大学，他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之一，但从来没有屈服过，始终临之以凛然的浩气，使张牙舞爪的造反派束手无策。从那时候起，他就遭受“红卫兵”几次抄家的践踏，特别是第三次，那股“红卫兵”居然盘踞他家达 42 天之久！除了拿走他们想拿走的东西，破坏他们想破坏的东西之外，这些人还秉承“四人帮”头目的旨意，蓄意制造冤案，逼他承认组织反革命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想置他于死地。他毫不含糊地同这些“红卫兵”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乞灵于非刑拷打。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死过去后，用冷水喷醒，继续拷打。但他的口供只有三个字：“不！不！不！”或者六个字“没有！没有！没有！”42 个日日夜夜当中；这些人轮换着不停地折磨他。那个头头说：“王造时即使是钢，也要让他化为钢水。”但王造时的意志胜过钢铁，居然没有融化点！

他说，他这样誓死不屈，既是捍卫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另一位被诬陷伙同他组织反革命政党的著名教授。他强调说，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我也不能屈服！

我终于了解：他对 1845 的宽容，是对他们的蔑视，是对他的怜悯，从而也坚定了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的决心。

智斗 1845 1845 字，加以嘲弄。我想只有找个由头，才好刹住他的狂妄。一天，王造时感冒，我就说，1845，你来读报。

1845 给周总理献上花束”一句话，他把“花束”读成“花圈”。我立即打断他，并严肃地说：“你再读一遍！”1845 还没有觉察他的错误重复读一遍“献上花圈”。当检查官和渡边指出他的错误时，1845 紧张起来。我说：“这可是政治性质错误，它涉及到你对周总理的态度问题。”1845 忙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过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你应该主动向管理员说清楚，省得我们报告了。”1845 知道，如果此事让狱方知道，够他受的。他哀求道：“1995 请你网开一面，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1416“1845 这种误读是不能容许的，但他已经承认错误，1995，是不是可以放他一马呢？”看到王出来打圆场，我就趁势收场道：“此事可大可小，看在 1416 和 1753 两位的份上，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不过希望你今后要自重。”经过这番折腾，1845 的专横态度，特别是对王造时的态度收敛了不少。王造时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大约太平了一两个月，1845 故态复萌，又来编派 1416 的不是。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1845 对王造时夜眠打鼾骂骂咧咧。我对他说：“1416 已经向你再三表示歉意，并且说，如果他打鼾，把你吵醒，你可以立刻将他叫醒。他就坐到明天，不再躺下。我看，他也只能作到这一步了，打鼾是生理现象，他无法控制，我睡在他身边，都不嫌他，你就不能担待一二么？”1845 回答说：“我才不管他生理、病理，他妨碍我，我就不答应。今天晚上，如果他再敢打鼾，莫怪我不客气！”次日凌晨两点钟光景，我突然被一个重物落在地下的闷响所惊醒。一看王造时已不在高铺上，我翻身起来，发现王造时连同棉被滚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1845 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可以断定王翻落在地上，显然是 1845 所为；我俯身察看躺在地上的王造时，并同 1845 一起，把王造时抬到高铺上。王虽有微弱呼吸声和脉搏，但处于昏睡状态。我厉声呵斥道：“1845。你好大胆子，你闯了大祸了！”1845 嘎嚅着说：“1416 打鼾将我吵醒，我只用脚轻轻地碰了他一下，想不到他会滚落到地上。”我气得浑身发抖，说：“你是足球运动员，你这一脚，还不是要了他的命！你走开，让我报告去！”1845 向我打躬作揖，苦苦哀求我不要去报告。我说：“人命关天，人都昏死过去了，你不让我报告！”检查官和渡边都说，报告找医生要紧。

此时，王造时眼微微睁开，并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我。我马上过去扶他，让他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并用耳朵凑到他的口边。只听见他说：“我没有什么，你放心好了，原谅他吧。”我想，如果传达王的话，1845 就像没事人一样，奈何他不得，他没有受到教洲，后患无穷。因此，我严肃地说：“1416 对我讲，他头昏得厉害，天旋地转，而且浑身疼痛，快要不行了，他要我立刻报告，请医生来。你闪开！”1845 这时，王造时又轻轻地呼唤我。我又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说：“我好了一些了，1845 太粗暴。可是我也有责任，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我内心很内疚，你再放他一马吧！”我抬起头对 1845 说：“1416 说他头痛得厉害，你说怎么办？”这时，检查官和渡边都说：“1416 醒过来了，能说话了，可能有了好的转机，再等几分钟，看看 1416 的情况，再决定报告还是不报告。”我冷静地分析了情况：我想，1416 说他没有什么，可能因为他身上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条厚棉被，头上戴了一顶棉帽子，减轻了撞击的力量，因此伤势可能不重，王造时又这样好

心肠，看来我这独脚戏很难唱下去，只好缓和一下。

我即对 1845 说：“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但如果 1416 的伤势有发展，我还是要报告的。同时，你得做到三条：第一，从现在起，你要好好服侍 1416，三餐、大小便、睡觉擦身统统归你负责；第二，1416 的衣服统统归你洗；第二，你要保证尊重他。

冤死狱中

约摸两三个月后，王造时调到另一个班房去了。我为此忐忑不安好一阵子，顾虑他能不能适应新环境。

关于这个谜底是在我平反出狱后，碰到杨仲池同志才揭晓的。王造时离开我后，凑巧调到杨的班房里去了。他们是清华的同学，王是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并且领导过“五四”运动，杨自然非常尊重这位老会长，把王的衣被统统洗好，缝补好，连王的破席子也补好了，他们班房很团结，大家都对王有好感。

更重要的消息——关于王造时冤死的消息，是我在提篮桥监狱医院获知的。

1972 年，病情危重，被送到监狱医院。那里的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病犯可以使用本名，并较无顾虑交谈，老病犯告诉我，王造时去年在病势危笃时，被送到医院来，经抢救没有起色，转送瑞金医院，也许因为病入膏肓，也许因为转院过迟，不久去世。

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王造时冤案才得到昭雪。

王造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品质，他捍卫原则立场的风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王造时传（节录）

何碧辉赵寿龙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了，胜利了，王造时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十分高兴。他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

解放初，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上海法学会理事。另外，王造时还担任下列职务：上海诚明文学院董事长（约 1950 年 4 月至 1952 年 7 月）原诚明文学院院长董事冷蠓辞职，院长蒋维乔请王造时担任。蒋去香港后，王又兼代理院长三四月，该校后来并入当时的上海大学。

上海前进中学董事长（约 1949 年至 1954 年 7 月）。解放后，《前线日报》所办的前进中学被查封，由孙晓村等出面改组校董会，与教育局接洽继续开办，推王造时任董事长，孔大充任校长，因经济困难，房屋又发生问题，孔不久辞职而停办。

上海正平补习学校董事长（约 1951 年至 1953 年）。该校由薛迪清（原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创办，推王造时为董事长。后由教育局接办，改为中学。

王造时担任这些学校的董事长，至少对于当时减少教职员失业、学生失学这一点来讲，是有益的。

1951 王造时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 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近代史教研部主任。

解放初，王造时对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等等，都是积极参加的。他自己认为，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一步步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 年“救国会”工作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一般人也认为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因此他在民主人士中间有一定威信，常常代表民主人士发言。王造时对新中国也确实是热爱的，这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明的。

1950 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在《几点感想》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确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1951“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基本上是廉洁的、勤苦的、奉公守法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上空前未有的廉洁政府。”[1]1954 年 8 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普选时，王造时是上海四川北路选区选出的代表。他在普选时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我没有选过别人，当然也没被人选举过。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兴奋，感到骄傲。”他还说：“这次选举是最平等、最普通、最民主的。再度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1955 年 10 月 1 日国庆时，王造时又发表了《我们今天庆祝国庆要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的文章，他说：“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成功，而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方能成功。并且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国革命：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大量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仅指示着我们 6 亿人口的中国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是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如果 20 年后我们来写世界史，这将是可大书特书的一章。”

[1]王造时《我们决定开步走》，《解放日报》，1951 年 12 月 14 日。

王造时 50 年代初发表的上述言论，与他 30 年至 40 年代发表的言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的王造时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而现在的王造时则是歌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的。

但是，总的来说，王造时解放后不如解放前活跃，相对讲是沉默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解放后才开始的。前面已经谈到，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开始感到苦闷和孤独，这种消极情绪，王造时本人感到了，解放初，他听人说，共产党对他有点误会，但又不知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疑惑不解。后来，他向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谈了自己的政见，提了关于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南的建议，结果潘汉年没有给他回话，他更以为这是共产党对他的意

见置之不理，对他有误会，不够信任。

因此，王造时决定采取消极态度，不加入民主党派，不担任行政工作，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并且自以为有的人只能做政治工作，不能教书，而他则既能搞政治工作，又能教书，有两套本事而引以自豪。还认为革命成功了，专搞学问，同样可以为人们服务。因为王造时有这样的思想，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试探他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时，他婉言谢绝了，说：我有自由散漫作风不能胜任。九三学社、民盟劝他出任工作，他也托故推辞。1956年，无党派民主人士想组成一派，设立一个办公室，黎照寰为此和他商量，他认为无此必要。凡此种种，都证明他有消极情绪。

这种情况，旁观者也看出来了。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初，王造时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潘大逵曾对他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据王造时说，张孟闻也对他讲过类似的话。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党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王造时的关心和照顾也增加了。特别是1957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市政协推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和王造时前往出席。在北京，他不仅受到救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热情款待，而且解释了多年来的误会，心情很愉快。

在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了王造时。王造时向周恩来说明致斯大林公开信的起草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周恩来还谈了关于救国会的事。救国会于1949年12月18日结束的，发表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对于这件事，王造时当时认为，如果其他民主党派不解散，救国会也不必解散，后来多数同志主张解散，王造时也就赞成了。周恩来说，抗美援朝开始时，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拥护“抗美援朝，薄兑卫国”的号召，决心为这一神圣任务而奋斗的时候，联合声明上缺少救国会，毛泽东主席感到很可惜。周恩来赞扬王造时当时反对解散救国会是对的。周恩来还征求王造时是否有意恢复救国会的意见。王造时回答说，这要问沈钧儒和其他朋友。事后王造时曾经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如顾执中就极力主张恢复，并说如果别人不干，他支持王造时一个人出来领导干，希望王造时拿出当年的气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支持恢复救国会的不多，不久又开始反右斗争，因此恢复救国会的事就不了了之。王造时对周恩来的真诚会见，与长时间的谈话和鼓励，十分敬佩和感谢。他感到共产党了解他，信任他了，顿时疑虑冰释，心情非常高兴。

王造时在北京还直接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由陆诒向他作了传达。

总而言之，王造时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以后，由于多方关心，由于共产党的信任，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马寅初等的赞扬。当时，王造时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光明的，促进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不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了把国

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以至于演成严重问题，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所以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里说：“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2]

[2]王造时：《在二届三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月）。

3月4日王造时回到上海之后，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召集的座谈会上，在《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又多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宣传教育问题。他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党团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他指出：“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关于建立监督制度问题。他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3]

[3]王造时：1957年5月在上海市一届四次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他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

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

理。……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了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可以渗入而破坏的。” [4]

[4]王造时：1957年5月在上海市一届四次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王造时的发言，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样要求本身也欠妥当。有的可能有片面性，有的是在党的政策明确以前说的，如“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但是从王造时发言的主流看，是好的、积极的，其中包括某些真知灼见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精华。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由于反右斗争，他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和批判，这是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

王造时经过一翻批斗，戴上了极右分子帽子之后，他的心情是很悲愤的。他想念周恩来总理，仍想为国效劳。王造时当时写的一首词说明了这一点。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晓，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飞愁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阻（此字不清楚，似为“阻”——引者），张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

[5]

[5]王造时 1958年8月16日夜写的词。这正是1957年3月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王造时一周年。此词于1966年10月3日被抄家时当作反动诗保存下来。

1960年9月底，国庆节前夕，王造时被摘掉右派帽子，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仍然认真教学。同时，他还积极从事翻译和著作，从1960年开始为止，他翻译和著作在100万字以上，出版的只是极少数。[6]他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6]田汝康、金重远编著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王造时翻译的有两篇：《历史有意义吗？》、《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的有《保守主义者的解剖》、《法律生长社会学》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王造时是“摘帽右派”，自然被“横扫”，与千千万万无辜受迫害者一样，挨大字报点名，抄家，劳改。

1966夜再次被抄家，并隔离审查，他的家成为临时隔离室。经过42个日日夜夜轮番批斗，于11月2日以群众专政名义关进看守所。3日提审时，王造时经过一天休息，头脑清醒多了，马上提出三点声明：第一点，在压力下被迫交代的材料，有许多是虚构的，应予推翻；第二点，关于组织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莫须有的罪名；第三点，承认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过世界观属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应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从严批判，关在监狱里没有好处，应马上释放。可是，在那动乱的年代，既拿不出罪证判他的罪，又不放他份王造时自述材料说，从1966年11月12日夜拘留到2月2日的一个月中，审问过好几次[7]。“我的供词基本是上面三点，审讯员也就没有再提审，也没有要我再作交代了。从同年12月3日到现在的两年半以上的漫长时间里，除了两位领导干部和我谈了两次，两个训导员和我谈了五六次以外，关于本案审讯一直没有举行。”有几个月，他与所谓同案犯潘世兹关在同一

间牢房。据潘世兹说，王造时曾对他说，他已写信给周总理，申诉他的案情，如周总理收到他的信，他的案情就会搞清楚了。

潘世兹又说，他曾劝王造时写报告给看守所“领导”，说明身份要求吃中灶，以增加营养，增强体质。王造时开始不肯写，后来写了，但看守所“领导”置之不理[8]。

王造时家属前往探监，不能直接见面，家属只有看到收条上签名时，才知道他还在人世洞使重病，也不通知家属，更不用说保外就医了。1971年8月5日，王造时终于在“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下，冤死狱中。

[7]据审讯记录，一共10次。

[8]访问潘世兹纪录。潘世兹为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潘明训先生的儿子，也是一位爱国者解放后，他看到祖国光明前景，痛恨帝国主义侵略，曾毅然将传家珍宝“宝礼堂藏书”。全部从香港运回上海捐献给国家。

王造时如此不幸，王造时的家庭，也是很不幸的。原配夫人朱透芳1956年病故。

王造时1961年再婚，新夫人名叫郑毓秀，在上海线毯厂工作，是上海民族资本家李康年的外甥女，他们是经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介绍认识的。据《王造时自述》说，他们都有类似的遭遇，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因此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从1966年9月22日夜王造时被叫醒隔离审查后，他俩只见过一次面，押解人员还不准他们讲话。

王造时与朱透芳有四个子女。大儿子王钧陶，1946年患轻微精神病。次子王钧枢，原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1956年也患有精神病，休学回沪，1969年初，病情恶化，不久去世。王钧陶随后亦去世。两个女儿，大女儿王海若，1949年3月在上海沪北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地下党员。1950年4月，据说因为作风自由散漫等原因而被劝退党，1953年8月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1955-1959年被错划为右派，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1973年3月病逝。

1976年。王造时的冤案于1978年12月得到平反昭雪，错划右派的问题于1980年5月得到改正。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

历史是公正的。悼词指出：王造时同志解放前热爱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切希望祖国富强，在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王造时同志的一生，不愧为爱国主义人士的一生，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

陈新桂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陈新桂认为目前“鸣”“放”中有五种顾虑。他说：其中有人根本怀疑整风有何用处。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党天下”“一党治国”。储安平的话还没有说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这是个理论问题：如何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这要毛主席继续发展了。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陈新桂在发言中，首先说光明日报登载他的谈话没有登完全。他说，他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当前对“鸣”“放”有五种顾虑：(1) 耽心再有一次暴风雨；(2) 怕变相报复；(3) 提了意见没有下文；(4) 怕卫道者、全面论者围剿戴帽子；(5) 少数人怀疑整风有无用处。

他认为人民日报这几天所发表的社论，证明知识分子的顾虑不是过虑。

陈新桂说，储安平“党天下”的论点，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只是他没有再进一步追究根源。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范畴，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万古长存。它不是目的，是手段，是工具，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这一政治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历史经验作适当的必要的改进。他认为毛主席正在这样做，已经这样做。

陈新桂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有 40 年的历史，它的正确性应当确定，但它有缺点的一面，有阴暗的一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也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困难，很多弱点。陆定一在纪念整风运动 15 周年的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地位，领导的地位，便利了“三大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害？陈新桂说，共产党的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义语。

共产党在执行国家领导和政治统治的时候，依靠党员作核心，而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是杠杆，传导带，这样一种方式就值得研究。他认为我国这几年来对旧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选派留学生主要看成份，看政治条件，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他认为说专政是对敌人，对人民内部是民主，这说法是对的，但不全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除镇压反动派外，还要组织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他说，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还不是“党天下”，是难以想象的。1200 万党员，如果百分之一的人犯了“三大主义”，就是 12 万人，这 12 万人在全国各部门起决定作用，对天下大事关系重大。因此他说他竭诚地拥护党的整风，但是只依靠多少年一次的整风不是够的。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用来联系群众的杠杆、传导带，实际上是工具，完全被动，不可能发生主观能动性。要改进弱点和阴暗面，必须使党进行领导时所应用的环节（原文如此编者注），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他认为毛主席已经这样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是传送带，他认为这已经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又说，毛主席想的这办法，时间还短促，还需要更进一

步推动。如果真正“鸣”“放”，真正“互相监督”，这就能使党员经常洗脸。陈新桂说，归根结底，就是扩大民主问题。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6月11日)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顾执中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85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可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94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

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

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

我建议：一、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人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

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

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

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储安平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起混乱。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竑

？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哪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情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制定哪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

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带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盖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 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重申赎买 20 年的主张

李康年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 20 年”或者“赎买 20 年”的建议者。

“三个建议”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 22 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 2750 万元，除 1956、1957 两年已发 2.2 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 19.8 亿元，多余 2.2 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

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 20 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 20 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 60 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 80 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 20 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 22 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 15 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

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

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准备，即是需要 15 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 1949 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 15 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 20 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一、千家驹同志说，赎买不要算细账，何以他还认为应从 1949 年算起呢，算了有什么作用呢？二、倘若要算细账，1949 年到 1962 年并不是 14 年而是 14 年不足。

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即四马分肥办法）都是赎买，此说没有根据。

四、他说 14 年中（实际上到目前只有八年）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这些话完全是凭主观的理想而毫无调查资料。

据我所知，还有资本被虚盈实税因而亏本的，（千家驹同志发言第一节中所说的）还有资本被阶级斗争因而损失的，还有资本被五反退款因而短少的，有的虚盈实亏，有的资负倒挂，有的资本蚀光，有的生活资料亦已卖光，也有因周转不灵而增资的，这些岂不是客观的存在吗。

五、他说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们安心改造，我觉得他把和平改造方针的内容混淆起来了，因为和平改造方针有二个内容，一，对物（生产资料）——赎买（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资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两者之间虽互相关连，而各有区别，他说赎买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觉不可理解。

六、无论赎买也好，购买也好，这是不是一种合理措施呢，如果说是合理措施，则资本家既将生产资料交出而政府说并不是欠他之债非还不可。这成什么话呢。这是丢却赎买意义了。

七、他说赎买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债则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 65% 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事实，并且对工商界说来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我说，我扣了这顶立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在有些冤枉，请问毛主席所谓不是半赎买半没收之说，作如何理解。

八、千家驹同志说赎买应自 1949 年算起，兹查毛主席于 1956 年 1 月 25 日下午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 1956 -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说，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1955 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

围内基本上完成。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 1955 年夏季以来开始的 1955 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

九、根据毛主席说开国以后的三年中，是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可见得决不是赎买时期。

十、开国之初，是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时期，所谓劳资，即是私营企业内部组织，当时还谈不到赎买政策。

十一、共同纲领订立于 1949 年 9 月 29 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

十二、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如果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开始赎买之中，未免太矛盾了。

十三、1949 年并未进行清产核资，财产数字无法估计，如照资本家账册记载，他们是随意编造，各自一套，绝无标准，殊不足凭。

十四、财产重估是 1950 年进行的，当时估价是仅凭私方主观进行的，并无工人阶级参加，不足为凭，且币制还是旧人民币。

十五、主张赎买开始是 1949 年者，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

十六、五反是 1952 年举行的，当时退款数字之大，殊足惊人，这种退款数字，都是在资产项下减除的，这时国家定息之支出，是有好处的，如果强调赎买开始在 1952 十七、如果赎买确定为 1949 年开始，则八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十八、如果赎买确定为 1949 年开始，则目前正在讨论的工龄问题，何以强调应为 1956 年开始呢？“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所以我主张无论老合营或全行业合营，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为赎买开始之时，财产数字一律以清产核资时所核定的数字为准，质之千家驹同志以为何如。

（原载《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6 日）

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黄药眠

（草案初稿）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于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认识不足。

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

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一切由党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

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之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了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的“党组”有什么区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系里面，党总支部书记（党总支部书记常常是兼系秘书）和系主任之间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没有研究，因此我们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

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现象，如校务会议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教授的教权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难于发挥积极性，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定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为改正以上缺点，我们仅提出以下几点有关高等学校领导机构的意见，请领导上加以研究和考虑。

领导方针和意见：我们不同意党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或在学校内停止党、团、民主党派活动和民主党派的成员不以党派的资格在学校内活动的说法。我们认为这和今天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总方针是不相符的，和各民主党派健全各基层组织的精神也是不相符的，相反，我们认为学校的党正应加强领导，民主党派正应加强活动。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教授治校可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已和以前有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的领导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

一、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即使少数人有此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

二、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

因此我们的总的意思是：（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领导。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四）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外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的吸引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就是在党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现在把以上四点，分别扼要叙述如下：一、关于党的领导方面：（一）党应抓以下四种工作：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的

建设工作； 动员党团员起带头、保证作用。

（二）党委或党组对学校内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则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细讨论。

（三）党通过党组织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贯彻的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

（四）党委或党组织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

（五）党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间学习一门业务，慢慢作到由外行变成内行。

（六）党委必须规定出一种制度，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七）党委必须规定出一种制度，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定期举行碰头会，互相交换意见和批评。

二、关于校务委员会：（一）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成员包括教务方面的负责人，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的代表，讲师、助教的代表，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综合大学如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太多则可以考虑过去分成文学院、理学院的办法）。

（二）校务委员会应重点抓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请、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

（三）一般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去讨论。但其中比较大的项目，如预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如遇到比较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校务委员会可定若干人组成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研究，审查委员会向校务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然后再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审查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有权向主管部门调集有关资料，或请该部门的负责人出席解释或陈述意见。

（四）校务委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党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意见加以对论，如遇重大问题，校务委员会可以推选若干人（必要时还可以指定若干校务委员会以外的专家）组成委员会详细研究各方面的有关资料，征询各方面的意见，拟定草案，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党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形式主义地通过的办法）（五）学校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在校务委员会讨论到与该委员会有关的某一部门的工作时，应有权出席听取该部门负责人报告，而委员会则应对报告提出批评建议或陈述意见。

（六）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重要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

（七）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的时候，则决议必须执行。

（八）少数人对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除执行决定外，他们有权向上级陈述意见，但不得向外宣传。

（九）校务委员会应设置秘书若干人（可和校长办公室联合办公），专门负责和各校务委员联络，及处理学校各部门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来的批评和建议。

三、关于学校行政会议：（一）行政会议归校务委员会领导，有关学校

重大措施的决定，必须经校务委员会批准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二) 行政会议的成员，除学校的行政负责人外，应广泛吸收教职员工参加，参加者不应由上面指定，而应分别由各部门的群众选举。

(三) 校长或副校长为行政会议的当然主席。

(四) 行政会议应着重于带有全校性的问题的讨论，并作出决定。各部门的负责人向行政会议提出报告。行政会议如认为问题比较大或者复杂需要研究，就可指定行政会议的成员或会外的专家组织临时委员会加以审查，临时委员会应负责向行政会议提出审查报告和建议。在审查过程中，临时委员会有权向主管部门调集有关资料，并请该部门的负责人出席解释或陈述意见。

(五) 行政会议应将会议时间及议题事先通知各校务委员会的委员，校务委员会有权随时出席听取某部门的报告。

(六) 学校各部门的工会，如对于某一工作有意见时，它可以通知行政会议，在讨论该问题的时候派代表出席，提出批评、建议和陈述意见。

(七) 学校的各种委员会在行政会议讨论到与该委员会有关的某一部分的工作时，该委员会的委员应有权出席听取该部门负责人的报告，并提出批评建议和陈述意见。

四、各种委员会：为了吸收各方面的工作同志共同办好学校；因此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之外应视各校的客观需要设立各种委员会，目前至少可以设置以下几种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人事管理委员会图书设备委员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一）各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并向它们提出质问、批评和建议。

(二) 委员会的成员由群众选举由校长批准聘任。

(三) 学校的行政部门应和有关的委员会取得紧密联系，并经常向他们报告工作。而委员会的委员则有权向有关行政部门了解情况并调集必要的资料（保密文件的阅读，另作适当的规定）。

(四) 各委员会除直接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质讯、批评和建议以外，可以直接向党委（或党组）校务委员会提出有关工作的批评和意见。

(五) 图书设备委员会和基本建设委员会应有学生代表列席参加。

(六) 各委员会对党委、校务委员会和有关工作单位的批评和意见，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和有关工作单位应负责答复，不能置之不理。

五、附注：高等学校的教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研究工作和搞好教学，不宜负担过重行政事务工作。因此教学工作者，无论是参加校务委员会、行政会议或各种委员会，都以一人一职为宜，而且每二年改选一次，这样可以使每个人都有分负一部分行政责任的机会，至于在学校外面负担有社会工作的同志，则最好不要让他再在校内分担行政工作。

本文件只是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机构提一些基本性的意见，至于校长与校务委员会之间，校务委员会与行政会议之间，究竟应建立怎样的关系，这应该看学校的专业性质、学校的历史传统等等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不可能作出很详细的建议，也不可能作出对任何学校都能适用的建议。

（原载《师大教学》1956年7月18日第161期）

我的看法

黄药眠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都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

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的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个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来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一番经历。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丝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住人的唉声。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门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割面的深夜里踟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二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落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终究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达出春天的消息。

至于目前知识分子所苦恼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绝大多数的人看来，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是得到了保证了。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是在埋头研究，有些人则在很紧张地备课。今天的学生，更能独立思考了，提出来的问题是很多的。争鸣当然很好，但争鸣也得有资本。钻研业务的精神是提高了。可是他们的社会活动都是很少的。有些人则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政治待遇，特别是一些过去曾经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或在过去曾经活跃过一时的人物，抚今追昔，又未免有点寂寞之感。以上两种人，问题都不是在于如何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来搞好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和如何更好利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政治学习和做些社会活动。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

的确也有些人，社会活动太多，侵犯了他的六分之五的学术研究的时间。这种人，其实并不多，但也是容易嚷，而且他们的嚷也最容易被人听见。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的确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工作，而他自己也是愿意沉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的。但也有些人不过只是嚷嚷，而其实正是“乐此不疲”，真的要他少出来活动，他可要惶惶然起来了。但也不能说，他们这种嚷就都是假的，不，它还是有几分真情。不过这只是偶尔抒情，或者老朋友面前，偶然表示一下对于过去摩娑过许多时日的旧业的怀恋。如果把这些嚷就看成是他们的主导思想，这也许未免太天真一些。

有一位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青年，曾和我说过，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的

不容易搞，把你们的名字放上去请你来开会吧，你又说，我哪有时间来陪你们开会，如果不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吧，有朝一日，名单在报上发表出来，你一看见大名没有在报上登出，又会大发牢骚，说某某都有名，我的名字谁给除去的？总之像是纹纹柴，很难摸清它的纹路。这些话，我认为也是真的。以上两种人，尽管社会活动很多，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太多了呢？我看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真的对于政治科学有深刻的研究呢？对于政治艺术有很好的修养呢？对国计民生有十分关切的心情、对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呢？我看还没有。他们有些人，好像是名贵的花，被人十分小心地保护着访而久之，也就自己觉得真是名贵的花，而有些儿飘飘然起来了。我看以后也有必要让他们学习学习。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目前的政治积极性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今后随着民主生活的日益充实，大家有更多机会说话，情况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问题是需要领导和帮助。诱导人们向前看。此外，如果能再把社会活动过少的和社会活动过多的人加以适当的调整，使小提琴固然有机会鸣，就是轰然作响的大鼓也可以有机会响，典雅的竖琴也有机会来丁冬几声，那就更好了。

知识分子总得要有知识，天下总很难找到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自甘于没有知识。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库，书库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库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洞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库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他总得把他所学的东西，和人民的需要对对口径。学以致用，这是我们中国的老传统。莫非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想把他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世所用？我想不是的。没有不愿意他的知识发挥作用的。如果他能作出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为政府所接纳付诸实行，他一定会感到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近年来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大肯谈政治，主要就是顾虑。顾虑别人说他立场不稳，说他有唯心主义。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知识分子多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了。难道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花了多年的劳动获得来的宝贵的知识，拿出来让大家品题，而甘于把它埋在心灵深处让时光送入遗忘的王国？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士大夫的传统，态度比较矜持，希望别人对他有更多的尊重，批评起来采取更委婉一些的办法，这些估计都是对的。但我不同意把今天的知识分子比成诸葛亮。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但这个打比，却跛得太厉害一些。因为究竟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成为高卧隆中的诸葛亮的可能了。他既不能收租，又不能真的卷起袖子来以“躬耕”为活，而且如果他不读许多杂志报章，如果不经常听报告，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即使他有满腹经纶，又如何能了解天下大势？所以别人对于知识分子尽可以有三顾茅庐之心，而知识分子可切不要存让别人而来三顾茅庐之意。知识分子要求别人尊重，这是好的，但知识分子，也应该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奋斗经验和历史。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有时候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

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现在再就百家争鸣来谈罢。要真的争起来，就首先要求领导方面真的敢放，而且不要一放一收，或欲放还收。另外一方面，则知识分子要对于这个政策的贯彻有信心，有勇气。有许多问题过去认为早已经解决了的，实际再研究一下，还是没有解决，还可以提出来争论。而且你不提出争论，青年同学们早就提出来争论了。所以你想不争鸣，也就不可能。为了培养争鸣的勇气，提高争鸣的质量，我认为可以多组织一些小型的读书会，小型的讨论会。小型讨论会中，可以就某些重要论文提出讨论；可以由某一个人写好文章，约几个朋友来对他的文章提提意见，可以就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先由几个人交换意见或展开争辩。由小型的座谈会到大型的座谈会，到讲坛上的争鸣和报纸刊物上的争鸣。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所担心的就是，我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争鸣。但过后一想，争鸣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把幼稚的意见或甚至错误的意见拿出来，因而引出了层出不穷的真知灼见，那对我也是莫大的快乐。因为真理难道一定要通过我的手里获得么？真理难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荷包里才算是快乐么？无论谁把真理挖出来，真理都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既然是共有的财产，当然我也就能分享得一分光荣了。因为想通这一点，所以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黄药眠

我认为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首先是必须扫除思想障碍，而思想障碍中有若干是和文学现象的理解问题有关的。这里，我想就我所想到的来谈谈。

我们常常听见人们爱引用列宁的话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个话是完全对的。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可是我们可不能因此忘记了列宁接着在下面说的另外一些话。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着：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无产阶级党的事业同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正是由于忘记了列宁后面说的那一段话，所以有些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平均化。它们无视文学的特性。

正是由于忘记这些话，所以有些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硬要来一个标准化。

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要以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少数人的文学趣味。这样就抹煞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

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

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到如此田地，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

列宁的话是说得清楚的，人们本来不应有这种片面的理解，可是竟有人这样片面地理解，我想这不能怪列宁，也不能怪党，这只能怪这些同志对列宁的著作并没有好好学习。

人们常常爱说，文学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

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忘记了另外一面，即文学是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了解的过于死板。

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着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一个人有严肃紧张的时候，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有和同志们关系，也有家人父子的关系，有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有潜伏在内心的思想。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地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错着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也可以有正面的描写，侧面的描写，或者烘托的暗示的描写。同时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文学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能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

正是由于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因此有些人就要求文学要按着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

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了简单的说教。

这里重新温习一下列宁的话，也还是有意义的，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底某些本质的方面来。”“某些本质的方面”，比“本质”就得生动得多了。

常常听见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里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务就是把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的意义。

这当然也是对的。可是事情也还有另外的一面，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于改造世界。在生活实践过程中，人们不仅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对于这客观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即肯定的或否定的态度，爱或憎的态度，有时还有着强烈的情绪色彩。

正是由于忘记了事情的这另外一面，所以有些人把文学创作看成为在沙滩上捡拾贝壳一样。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某某人物故事，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有的，所以是现实主义的，某某人物故事是在现实生活里没有的，因此作品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甚至有人把“希望像早上的红霞般那么美丽”的诗句，都认为是错误的，理由是红霞是很快就会消失的，难道我们的希望是很容易消失的吗？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是资料的搜集和堆积。照这样的看法，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

记载。

照这样的看法，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

在这里重新温习一下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是有益处的。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论，连费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内，其主要缺点就在于：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在客观的形式上或是在直观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主观地去理解。”我认为如果对于有关文学的这些理论问题，能够有人出来阐发一下，这对于“百花齐放”的方针的贯彻还是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57年5月12日第6期）

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黄药眠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文艺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据我看来，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当前的迫切工作是如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存在着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赵树理同志的《三里湾》发表以后，很多人写了文章，说好得很。康濯同志也写了一篇评论，但我看，他对自己的意见也不大有把握，使人读过以后，引起了模棱两可的印象。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但他所以说好，倒并不是他亲身感受到了，而是因为《文艺报》和康濯同志说好，他也就跟着说好了。其实他是抱着苏联大部头的作品在啃呢，或抱着一大堆中国的古典作品在读呢！

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谐调。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掌握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或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作家如果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拟讨论”为由绝决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的原因。

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对于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而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请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么为什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间接

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现在又有人说，只要写出真实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这就把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看做是外加的，而没有看到世界观对创作的生动的渗透作用。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硬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协会的理论批评组一直是不景气的，我是成员之一。有人说我是什么干事，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有几次报上载作协文艺理论批评组开会，我就没有接到过通知。

有时候有通知，我也就来了，我是招之即来的。说到批评家的专业化问题，我是同意的。只靠业余的人，临时拉夫，产生不了质量较高的论文，也组织不成队伍。一篇作品，读一遍就写批评当然不行，至少要读二三遍，而要研究，就需要有时间，同时，批评要有一套设备，要有经常的工作。要有助手。比方现在出版物这样多，谁能够把它一一细看呢？必须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经常研究。批评也要靠集体的力量。

舒芜同志建议作家自办刊物，每个刊物自成一格，一花独放，全国合起来是个“百花园”。我看立刻全国来搞，恐怕不行，最好试办几个看看。现在的刊物多，为办而办，似亦可以考虑，每种刊物却有自己的目的、任务、性质和写作力量。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尝就少呢？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主编的意图，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结果好，只有正襟危坐战战兢兢，如此这般，交卷完事。个性风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里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致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关于文艺批评，综合大家意见，我们建议以下几点：一、要有批评的队伍，经常从事于批评工作。二、要有助手、资料，多作研究工作。三、试办一二种同人性质的文艺综合刊物，让大家比较自由的发言。这种刊物，水准可能低些，批评的权威性也没有这样大，但正因为它的影响不像机关杂志一样，因此写作的人胆子可以大些，而被批评的人，也不会因此就抬不起头来。四、批评也应该有自由，事后也不应责之过苛，因为如果责之过苛，那就只有鼓励大家都写四平八稳的文章，或者改行。五、应该鼓励作家出来写批评，写创作经验，和写对于批评的反批评。六、应该鼓励批评文章有艺术性，而且有多种多样的风格。

（原载《文艺报》1957年6月9日第9期）

在1957年5月1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党员不对也对，非党员对也不对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定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在 1957 年 6 月 5 日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一、黄药眠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我有的意见已和方铭谈了，但是大家要我谈，我谈谈。我来师大，是决心教书的，而没想做行政工作。系主任也很难做，有些朋友做部长也难，有的作了七年副部长在部务会议上没有发过言。

我自到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

先来谈一下，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解放后丁浩川同志来校首先抓青年的思想工作，搞运动这是对的，“三反”后还继续这样做我认为不对。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它本身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工具。中国的知识分子更特别，虽然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教育，因为它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也想工业化。譬如欧洲国家的工业发达，而当时中国没有工业，学什么工程、医生、会计等都没有出路，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殊待遇，譬如清华大学同是教师外国人的待遇就高，中国人的待遇就低，待遇差别，使心里不服，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爱国主

义的思想，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估计，知识分子已经或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故属社会主义的力量。

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它有其落后一面，但他受的资产阶级影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深，易接受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两个面，可以跟社会主义走，利益没有受损害，可以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只是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矛盾。中国要工业化了，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工人阶级结合。知识分子应做为社会阶层，不应做为阶级，不应一开口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我们许多同志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另外，在知识分子中也分许多层：有出洋的，有流浪汉，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小艺术家，虽然他们有的过去为国民党服务，但很多人生活是贫苦的，他们和一般的人不同，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最高的和最低的纲领，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能搞民主运动，到了社会主义他们也不会再依靠地主、资产阶级，而一定会依靠工人阶级。比如茅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帮助党搞民主运动，他不知道要走社会主义吗？到社会主义还是可以信任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知识分子也在发展，对知识分子要现实的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不得不向对立的方面转化。不要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如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就是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党过去没有考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从每个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发展去看问题，首先，看政治上的态度如何，这是造成“墙”“沟”的原因。

斯大林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是敏感的，1931年他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变了，我们应当改变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我们一些党员同志应该很好的学习一下他这篇文章。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党员了，觉悟就高了，但我认为根本是低能的，是没有政治头脑。

二、黄药眠认为：现在是用做官带兵的办法来办学校，把老先生看成满身都是缺点，什么都依靠年轻人，而对青年的思想工作又很差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是用笔的都是秀才，办学校不是打仗，不能用带兵的方法，它也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法律办事。但我们学校里神秘气十足，什么都保密，又不是炮台、仓库，我们学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呢，外边有些事情我知道了，在学校里的倒不能知道。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知识有阶级性，而有些知识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对科学的看法是有阶级性的，教书先生是靠知识吃饭，而不是看级别。评薪时，我一开始就说我评的太高。政治地位可以提，学术地位是靠本事不能硬提。地位提高了也没用。如果人家叫我当作家协会的主席，我就不敢当，因为没有那个能力，人家也不服。评级也应这样。但是我们学校的评级却是用政治力量来提高学术地位，认为好的就一路提上去，这是用作官的办法来办学校，学校应以学术为基础。

党在学校中的工作对象是什么？木匠的对象是木头，在学校里是知识分子。对年轻人应当教育，老先生年纪大应当鼓励他们的积极性，说服和批评他们的落后性，而我们的党是否研究了这些问题呢？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呢？现在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如何呢？学生对人处世的态度怎么样呢？虽然比过去有进步我看是很差的，思想工作很差。现在青年是不是敢于斗争呢？

有些人话不敢说了，因为怕妨碍入党，这是与马列主义不合的。认为入党对自己有利，进党有好多好处。带着这种思想往党里爬，爬进去可以留助教，可以留学，这叫什么无产阶级教育？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是相当普遍的，有的同学很能说，但是真正做起事来是不能吃苦的，几年来，思想教育显然是放松了，这是教育的失败。

过去对老先生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认为他们满身都是缺点，什么事情都依靠年青人，这是不成的。在 10 年内，主要应依靠老先生传授知识，钱俊瑞说过用革命办法培养，留校一年就上台，武兆吉就是这样，我还得了奖！这靠得住吗？应该靠老先生。当然苏联专家也可以依靠一部分，但不能全部依靠苏联专家，过去对苏联专家的估计也是有问题的，认为他们万能，在这里我要质问：我们中文系请了二位苏联专家，办了这样一个一百多人的苏联文学研究班，现在成了灾难了，这是谁干的事，是谁教他们来的？盲目冒进！中文系办苏联文学进修班，人来的越多越好，一下来了一百多学生，连小孩子也能算出全国需要多少苏联文学教师。认为专家什么都知道，是万能，究竟是什么专家？我们了解不够。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是共产党所有的，我们应当对人民负责。

依靠老先生这一点学校是不明确的，我认为在 5 年、10 年以内还得依靠老先生。

不明确这一点就搞不好工作。青年助教一年开课这是靠不住的，现在又提倡独立思考，但我认为独立思考要有知识，没有知识那就是胡思乱想。应该刻苦钻研，但是却不懂外文，不会看古书。知识分子有一个长处，听你说几句就知你在行不在行，不要不懂装懂，这是头脑发昏，一讲到知识分子就是满身缺点。

三、黄药眠认为：近年来党的纪律废弛，袒护落后，把劳动不好，没有学术的人摆在高高的位置上近年来党的纪律废弛，党由 200 多万党员发展成 1200 多万党员，1000 多万党员并没有受到革命的锻炼，像小姐一样禁不起风。有的人有功而骄傲，还情有可原，有的人对革命没有功也骄傲起来了，有的人像蚯蚓一样的拼命钻进党里去，他们昨天还是小资产阶级，今天一进去就好像成了百分之百的先进分子，就不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把朋友也都忘了，而别人也可以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呀。举个例子，这正如在逃难时抢着过河上渡船，没上船时要人等不要开船，上了船马上叫人快开，快开！

比如外语系赵璉升为讲师，是抄袭了别人的文章，党发现后只是批评了一下，并没有把他从讲师级拉下来，这党的纪律何在？盛荃升作风不好，赵璉的作风就好吗？又如我们系秘书李秀云（党员）为什么不服从专业分配呢？这事从来没有和我讲过。做系秘书为什么不到系里来呢？我认为她是不称职的。好像是小姐少爷。

我们学校是教育机关，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有的人不是什么好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学术，却把他摆在高高的位置上，据说这是“阶级情感”。这不是阶级感情，不是劳动者的阶级情感，是袒护落后。工作不好的不能照顾，过去有功的要照顾，但不能永远照顾。解放已经八年了，对这些人还是要长期照顾下去，难怪有人说一些党员是凭着光荣称号吃饭的。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党怎么前进？如何能成为先进部队？我们师大党就有这种现象，有些党员不积极也是积极的，工作能力、效果不好也是好的，这是袒护落后，

是不对的。

党的领导工作作得不好，党团员中有不少的人有相当的升官发财思想，对新党员不抓紧思想教育，而尽是抓一些事务工作，不论什么科什么组，如房产科都摆上一个青年党员做领导才叫做党的领导。他们不称职却升得很快，群众不平，你工作没我好，却升得快，工作情绪就消极了。这些不称职的青年同志由于升得快，自己也飘飘然了。这样再搞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会从内部来腐蚀你的。何书记如何也有资产阶级思想？从那儿来的？它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中溜进了你的脑中。

现在还有一些党员说为什么要群众参加整党，这是没有常识的表现，应当把党员置之群众监督之下。列宁在革命胜利以后曾领导过“清党”运动，当时每一个党员都要上台作自我检查，群众也一个个上台指出他的缺点，当时就发现一些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除出去了。清党就是在群众监督之下进行的。

四、黄药眠对人事档案制度很不满意，说人事室不懂教学，用政治力量硬提拔干部关于人事室的工作我非常不满意，全校留助教一定要他们来决定，他们懂什么？只能掌握历史。我们所留的是要培养成为高等学校的师资，是我们的接班人，这需要有一定的天资和才能，研究的越高深，越能看出才能来，根本否定了这一点，就是违反巴甫洛夫学说的。我想作高尔基，但我没有那样才能，汪毓馥留下做助教，我是不同意的，她只是当过小学校长，在师大进修过一年，但彭慧一定要留下她，这就是用政治力量硬提拔的表现。这是没有好处的。李少明（党员）从中学调来，我说要升为讲师应该补一篇论文，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事室突然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决定升她为讲师了。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对他升讲师我没有意见，我认为应该有一定的手段。我们是唯物论者。有人提议蔡澈（黄先生的爱人——整理者注）当助教，我是坚决反对。关于李少明的事情我曾打电话问张斧，他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的意见我们提了，下次还是这样。这种事层出不穷，自以为是马列主义，这真是不知羞耻！人事室来条子派乔静贞出国的事是根据什么？据说是汪毓馥决定的。汪毓馥凭什么可以决定乔静贞出国？汪有什么本领，一个小学校长就能评定一个人出国吗？很使人愤慨！出国是要国家拿出外汇来，派出去的一个人回来要抵两个人用，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废料，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我要求彻查，根据什么派她出国？教育系发生的左企云和孙岩的事，首长我们要尊重，为什么连首长的老婆也得尊重。我要求迅速处理这件事，如不处理，我要以人民代表的资格到人民代表大会去控诉！

49 厚。幸而过去我批评过胡风，以后对我的坏话就少了点。人事室对我的档案材料有很多，我要求看看，到底说了我些什么坏话，不给我看，我要通过人大常委会调这批卷宗来看，方铭说没有，也没专为我开会，工作时交谈。

党团员的汇报，部分是真实的，大部分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汇报时是迎合上级的看法，另外有的是由于青年教师受了老教师的批评，有一定的矛盾（如升级等），他们不满，抱着怀恨的心情说老先生的坏话。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曲解了老先生的话。而领导者又是高高在上，不调查不研究不找谈话，只有一个耳朵，主观、片面常常做了不正确的结论。

五、黄药眠眼中的党委负责人和中文系的党员干部我们的何副校长事实证明也是党性不强。关于李文保的事情，我曾经跟他谈了，他不处理，关

于彭慧的事我也跟他讲了，他总是敷衍了事，和他接触感到他有小市民气。张斧碰到我，找我谈话很神气，颇有威胁之势，说我的话对，但却没实际行动，我虽不学无术，但政治感觉还是敏锐的。我们和黄教务长的接触更少，教育实习的事，他们说学生理论和实践不结合就应实习两次，这种说法证明他是外行。

我们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是看学生对所学的东西能否融会贯通，是不是消化了，能不能与生活结合。同时，实习问题争论不休，但实习对老教师、年轻教师、学生、实习学小房竟都有些什么影响，他不去了解，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这与柳湜部长的坚持有关），就决定为两次了。

对系里面的意见，所谓“彭黄事件”本没有什么。1953年留助教，我曾提出留盛荃升，我觉得他业务很好、能思考一些问题，后来虽了解到他作风不大好，但政治上没有问题，我还是认为可以留下来。但这件事反复不定，在我去青岛前夕彭慧来找我谈，说盛的作风不好，说我泄露了留助教的秘密，说我和盛的关系不正常。

当时我很不痛快，我要求学校彻查这件事情，必要时可以隔离我们，后来听说党内批评了彭慧，党让她和我来谈，但是她说些转述班上的意见，自己没这意思，我感到很不满意。转述而不否定，就应负责任。在系里彭慧常指点我如何如何办事，像对小孩子一样，后来她还向一些人说过我的坏话。我知道。彭慧在民主革命阶段并没有什么功劳，还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判断什么都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出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不顾及到客观效果，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东北和人搞不好，在北京也和人搞不好，说我、谭丕模、王汝弼、杨占升、匡兴都不好，但这些人又都存在着，那你应怎么办呢？如果彭慧当权，我们这些人都只好一刀杀尽。实际上我们都是有优缺点的，多少能做些事情，那么就应合作。但是什么人对她不利，她就不择手段进行打击，甚至造谣。我与她虽闹得不好，但是《文艺学习》找编委时我还向周扬推荐彭慧，我不满，表现在当面，我对彭也不是一笔抹杀。彭慧还有些流氓气，有时说了话又说没说，有时痛哭流涕，有时装病。彭说李文林是为闹恋爱而装病，我也可以此心度彭之腹，你的病是否也是假的，彭慧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却有着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

彭慧同志对人的态度，对不如她的人是看不起的，对与她差不多的人也是看不起的，因为她对自己偏高，对别人偏低，对比她高的人是嫉妒，结果只有她一个人行，只有她一个人能办中文系，只有你好，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承认我是你的老朋友的话，你就冷静的想想吧。

谭丕模先生一来，讲义马上付印，太仓促，有神秘性，一来我就觉得他是个党员，在系务会议上他常叫困难，说教研室里老先生不团结，助教不合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没有办法，是不是自己作风上有毛病。我认为他是个老好人，也有人说他是个伪君子。

汪毓馥留下来做助教是不对的。解放以来有一种暴发户，一连升上来。听说儿童文学还要成立教研组叫她做秘书，我不赞成。她还做了积极分子，她们编的资料还得奖，为什么我们编的就不能得奖？这件事的过程要搞清楚，在总结会上要交代。

她这样小的年纪，就有人奉承她了，这样将来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她还不老实，比如儿童文学的研究生向我反映了一些教学问题，我问她则说“很

好”。我要求了解汪毓馥革命的功绩是什么？哪年进的党？应该公布出来，不要带神秘色彩，否则我们不佩服她，不能服从她的领导。以后从校长起领导人都应当公布有什么革命功绩。

李筠这个人很朴素。但是有许多事根本不告诉我（比如肃反的问题——学生自杀的事，一直没告诉我，只是到人民代表来视察时，才跟我说了几句真话），有时他告诉我的情况是假的，有些事告诉我也是隐隐约约的，有些事是用得着我的时候才告诉我，比如老先生有矛盾时，讨论教学大纲时，迎外宾时等，自己不懂了，才告诉我，要我出主意。有的事情是已经办完了才来告诉我。我索性对他说，有事情你放手办吧，不要告诉我，因为问了我，我出了主意又不照办，我要生气的。萧主任可能积极了，每天都到学校，但我知道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如陈仲瑶调动工作的事。

这些事不能全怪李筠，这与党的整个的领导和制度有关。党委负责制到系里就更麻烦了，李筠是党总支书记，又是系主任助理，是系主任领导主任助理呢？还是主任助理领导系主任？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呢？六、黄药眠说，他不愿和先生来往，和学生接近，是因为没法解决问题和怕出毛病我自己事情多，身体不好，对先生、助教、学生接触得都很少，但也不完全如此。我不愿和先生来往，因为我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比如高向夫、杨敏如先生有情绪。我知道了也难过，但也不能给他们解决。我还怕和人多往来，说我有小组织，拉拢人，想要保住系主任的江山。助教我也最好不认识，从盛荃升事情后，我不留助教在家里吃饭，怕人说我以小恩小惠收买助教，我说：“我要吃饭了，你们走吧！”。学生我也很少接近，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不知道说什么好，说话又掌握不住分寸，很容易出毛病。与大家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最好让我教书，不要叫我做系主任。叫我黄主任我觉得很不相称，在美学上内容与形式绝对对立时，就成为滑稽了。有些事情要我去讲，又怕篡夺领导权，我是处在困难的地位，如学习八大文件时，有一次开会要我做主席，我依李筠的话讲了几句，会上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都不来，大家没精打采，事情是已经决定了的，只是形式上做给我和萧先生看的，这还不如打个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决定了好呢。匡兴的事彭慧非拉着我谈清楚不可，李筠来了也说了几句，弄得没有结果也就散了，好像党内意见不一致在我面前就不能谈似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我叫来呢？这样做叫我很不愉快。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愿意这样的浪费掉。你不跟我统战，我教书教得很愉快，我们学校统战“统”得人很不愉快，使人心里烦躁，这样的统战还是少做的好。黄彦平同志是统战部长，汪毓馥是统战委员，但他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呢？这样的统战官，要么不要挂这些头衔，要么好好做，七、黄药眠对师大整风信心不大，说“我等着瞧”希望这次整风能真正做到有话全都说出来，有的青年说，如果我把什么话都说出来，那我不准备入党。我对这次师大整风的信心不大，整风的结果如何，我是等着瞧。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56期）

我心目中的药眠同志

白鸿黄药眠同志是丁易的朋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将永远怀念他。

我第一次见到药眠同志，是1945年春天，他在成都搞民主运动的时候。那时他住在沈志远先生家里，有时在《华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我在未见到他之前，已读过他的文章，还听丁易说过，他是黎澍同志的老朋友，是个革命作家，曾经被国民党抓去坐过几年牢，朋友们都叫他“大师”。1945年春，正是成都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丁易和黎澍、陈白尘同志等，都在党的领导下搞民主运动。有一次我和丁易去参加一个反蒋爱国的群众性的集会，碰见一个穿西服的个子不高的广东人。经丁易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我早已闻名的“黄大师”。那时，药眠同志不过四十二三岁，但是，他两鬓已有白发，额上也有皱纹，很像五十多岁的人。也许是他生活坎坷，受过许多磨难的缘故吧。

我在和药眠同志相识之后，才知道他爱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精通英文和俄文，也搞过翻译，是个多才的作家。因此，我对他非常钦佩。可是，1945年8月我便离开成都了，没有机会向他多请教。

药眠同志在成都工作的时候，已和丁易结为知交，后来他在香港时，还和丁易通过信。1947年我去解放区之前，曾听丁易说他在香港达德学院教书。那时，我还写过一篇短文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向北方的读者介绍这位革命作家。

1949年石驸马大街北师大的教职员宿舍里。大约在这年的六七月间，药眠同志带着他的夫人到我们家来玩，于是，我又见到了几年不曾见面的“黄大师”。那时，大师刚结婚不久，是从香港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他是待解放区的特邀代表。

那天，药眠同志穿着整洁的西服，面带笑容，特别有精神，好像比1945年我在成都见到他的时候，还年轻得多。他的夫人蔡澈同志穿着中式旗袍，身材窈窕，年轻、漂亮，在丈夫面前，显然有些娇气。我见到他们后，便想到：这位黄大师，现在可翻身了。他过去受国民党的迫害，逃亡，流浪，没有家，没有亲人，现在受到党的关怀和重视，回国参政议政，做了国家的主人，又有娇妻相伴，难怪他精神焕发，变得年轻了。我为大师的变化而感到十分高兴，即祝他们新婚幸福。

丁易那时候在北平师大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便邀请药眠同志到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在政协会议结束后，他们夫妇搬进了石驸马大街北平师大二院的宿舍，和我们是近邻。因为他们人地生疏，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帮我看孩子，常来我家串门，还曾经提到过，药眠夫妇喜欢跳舞，有时还在家里跳舞呢。

1952年宿舍的后院。我家的后门正对着他家的前门，中间仅隔一个小小的院子。我们两家互相串门非常方便。那时候丁易和药眠同志常用休息时间在一起品茶谈心，或对彼此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往来很密切。可是，我和蔡澈同志都在中学里教书，还担任班主任，工作相当繁忙，所以很少串门。

药眠同志工作异常勤奋，他书房的灯光经常深夜不灭，这是我从窗外可以常场尔到的。后来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买了一本他编辑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厚厚的一本书，汇集了那么多的资料，可以想见编者花了多少心血。它对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有帮助，至今我还珍藏

着。

1953 家转一转，问问我和孩子的生活情况，非常关心我们。有时他也坐下来和我聊聊天。

有一次，因为我提到入党的问题，他便将他过去在上海入党，后来被捕入狱，以及出狱后失掉组织关系的一段经历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既同情他的遭遇，也很钦佩他。我认为像他那样在 1927 年就倾向革命，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在中国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之后的 1928 年要求入党，入党后放弃了个人的一切，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实在是难得。他在被捕之后，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利诱，都不向敌人屈服，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宁肯判刑坐牢，这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同时，我又想到药眠同志比我大 20 来岁，他的学识和革命资历都应该是我的前辈、老师，但他却把我作为他的朋友，对我如此诚恳、坦率。我觉得这种友情十分可贵，所以至今不忘。

1957 授上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根据他和我接触中的种种表现，实在难于相信他是阴谋反党夺权谋利的人，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去看他几次。在会见他的时候，他从不对我谈他被划为右派的事，我也没有问过他。1961 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后，我又去看他，我提到我看见了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但他仍然不谈这件事，只是说他现在可以写点文章了，也要做好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像有的同志那样，总是没完没了地对人诉冤诉苦。

1966 学研究所也因为与被批斗的某某关系比较好，要“接受审查”，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去看他。后来我被解放了，但他还是北师大斗争的对象，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去开斗争会，而我却并不了解他的处境。我记得在 1969 年的一天下午，我到药眠同志家去，刚走进他的书房门，还没有和他上说两句话，就听见外面有人气势汹汹地大声叫喊：“黄药眠！黄药眠！”药眠同志立刻大声答应：“来了！来了！”又对我说：“他们来叫我开斗争会了。”我当时有点紧张，怕来人看见我，又会引起麻烦，就躲在门背后了。而药眠同志则很机灵地迎出去，并随手带上了门。大约他们刚走出黄家的大门，我听见药眠同志说：“哎呀，我忘了带手巾，让我回去拿吧！”他很快跑回书房，小声对我说：“等我们走远了，你再出去，把房门带上就行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说完这两句话，没等我回答；他就走了。——原来他并不是来拿手巾的。药眠同志做过地下工作，有“应变”的经验，在这件小事上也表现了他的机智。

不久，我们单位在河南建立了“五七干校”，我便离开北京到河南干校去了，直到 1972 年夏天才又回到北京。这时候北京各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揪斗对象，差不多都已经作了结论，恢复工作了，我去北师大看药眠夫妇，才知道药眠同志的问题还未作结论。他们两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已经没有书房，生活条件很差，药眠同志完全无法工作。我对他的处境有些愤愤不平，但他对此并无怨言，只是说，因为他的关系，孩子不能分配工作，觉得对不起孩子。——唉！他这样内疚，难道这是他的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师大给药眠同志重新作了结论，肯定了他在北师大和民盟所做的各种工作，推翻了罗织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特别是纠正了因“六教授上书”而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因此，他非常高兴，特地约我和袁翰青先生和他们夫妇俩一同聚餐，还给我们看了他的“结论”。那天，我和翰青先生都为药眠同志的彻底平反感到十分高兴，也曾向他俩敬

酒，表示祝贺。

药眠同志释去精神上的重负，北师大又给他调整了宿舍，他有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又积极地投入工作。他除了仍旧在北师大任教之外，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难得的是，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多年的智慧之笔，潜心写作，在几年之内，完成了好几部书。

药眠同志是个诗人，我爱读他的诗，也爱读他的散文，因为他的诗和散文热情地歌颂了党，歌颂了革命，歌颂了祖国，歌颂了人民，既给人以教诲，又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惜这位诗人，多灾多难，因为政治上的各种磨难，他的才华无法充分表现，特别是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文化大革命”的20多年中，他的才华竟完全被淹没了！

1987 我刚从外地回北京不久，突然传来药眠同志去世的消息，使我极为震惊，也觉难于相信，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早已生病住进医院了。我到北师大见到蔡澈同志时，她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无法安慰她。只能劝她节哀，注意身体。

她含着眼泪对我叙述了药眠同志生病期间的一些情况，又拿出药眠同志在病床上和她一起照的相片给我看。那已是药眠同志垂危时的留影了，我看了心里非常难受，这才意识到药眠同志真的走了，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多年相知的良师益友！后来蔡澈同志对我说，她感到最遗憾的是药眠同志原希望能够恢复党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在一年前写过一份材料，送给北师大的党组织。据说他的问题要由中央解决。药眠同志在生病期间，还抱着希望等待中央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我离开蔡澈同志回家以后，药眠同志希望恢复党籍的问题，总在我心头萦绕，使我感到困惑。根据多年来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即使他没有入党，也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入党以后，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之所以被捕入狱，是由于他的上级“领导人”在被捕后投降敌人出卖了他。他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折磨他，都没有向敌人投降，结果判处10年徒刑。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政治形势起了变化，八路军办事处将他保释出狱，说不定他会死在狱中……。他出狱之后，又千里迢迢地到延安去找党。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也还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革命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也是受害的“揪斗对象”，他都毫无怨言，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然而，忠于党的药眠同志，却没有恢复党籍：这是为什么？过了几天，我收到“黄药眠同志治丧委员会”印发的《黄药眠同志生平》和关于举行药眠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我仔细地反复地阅读了那份《黄药眠同志生平》之后，慢慢地我的问题也似乎解决了。

我觉得《生平》对药眠同志的历史所作的概括的介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公正的。如说：“1933年冬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判处10年徒刑。1937年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虽然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工作。”还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中国民主同盟长期负责宣传工作，每当爱国民主运动的紧要关头，总是挺身而出，为贯彻党的方针和民盟的正确主张，不懈地进行斗争。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勤奋工作，以革命实践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且说：“1949年5月，黄药眠同志从香港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

以来，……他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各项运动。他在民盟工作中努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满腔热情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7年，他代表民盟中央起草了《我们对高校领导体制的意见》，论述中肯，不幸被错划为右派，为此受不公正待遇达20余年。

10 将重新普照大地。”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而在于他是否作了对于革命事业，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有益的事。药眠同志以革命实践写下了他的历史，《生平》说：黄药眠同志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他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光明与真理，热爱党、坚信马列主义，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不息。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因此，我认为他虽然没有恢复党籍，他在我心目中也堪称布尔什维克。

1987 我去向药眠同志的遗体告别，我看见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熟睡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并在心里对他说：“药眠同志，你安息吧！你的同志，你的朋友和你的亲人了解你，也将永远怀念你！” 1993 1992

破浪前进

钟敬文去年夏天，党中央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文艺界、科学界的广大人士马上就回报以雷鸣的掌声——真正从各人心坎发出的声音。

可是，这个明智的、适时的文化方针，并不是什么人都高举双手欢迎的。对于某些领导同志，它就不怎样适合胃口。他们心里怀疑，或者干脆不赞成，当然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他们的想头是，这种方针实行起来，对于那些文艺家、科学家是会有好处的，可是对于党有啥好处呢？（他们是这样把党和广大知识劳动者的利益截然分开的！）在工作上，还要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厄单命令的作法不行了，唯我独尊的想法要改变了。在许多地方，要商量，要讲道理，要自由竞赛。这不但麻烦，简直是太困难了！老一套有什么不好？何必自讨麻烦！何必自寻苦吃！

有的领导同志忧虑更大。他们想，这样一来，就像决了黄河的堤防，那混浊奔腾的河水即刻会泛滥成灾！多年来辛苦得到的革命成果，就要这样被摧毁了！多可伤心！……总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由党中央提出了，广大的知识界也表示了衷心的拥护，可是，在实行上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至少，在某些部门，它好像水里的月亮，看得见，捞不上。陈沂、陈其通诸同志文章中的那些错误思想，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那决不只是他们几位同志所专有的私产。他们的背后是有着广大“群众”的。这些“群众”里有些人的意见，比他们几位的还要激烈得多，不过没有在《人民日报》或《学习》杂志上公刊出来罢了。

当然，从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看来，这个方针迟早是必然要贯彻的！我们不用怀疑这点。可是，也不能够无条件地乐观。因为像前面所提到的，不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不感觉兴趣么？而这些同志

又往往是坐在领导的交椅上的。这就难怪有些人在明朗的希望中要夹着一丝阴影了。

要贯彻这个党的文化方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尽力。当事人的文艺家、科学家自然有他们应尽的责任。而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他们所负责任中很重要的一点。大地虽然已经回春，有时还不免来一阵阴寒或小雪。要彻底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在某些地方是还遇到阻力的。碰到这种情况，文艺家、科学家们就必须根据党的指示，鼓起道德的勇气，不屈不挠地争取它的实现：一定要除去那些横在路上的障碍物，使真正的文艺、科学能够顺利地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

“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钟敬文钟敬文在5月16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墙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象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了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了解，决定级别不要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不满意。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知识分子不会造反，学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未改。如教育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没有什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特反映：逻辑学宁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后来党委布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系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时很细致，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的事考虑要细致，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抵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是否抵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抵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什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要人家“将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缺点：群众路线走的不够；未变外行为内行；政治敏感不够。

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 20 几个助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件事。

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

（原载《师大教学》1957 年 146 期）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钟敬文教育部开门整风是很好的，因为教师们和我个人都有很多意见

陡年来教育部成绩是很大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谈一谈：(1) 教育部过去出了很多主意，颁布许多指示、计划。领导机构应该有主意办法的，但不问这办法主意如何，下到学校里去就得照作，如教育实习师大非得两次不可以，因全国都惟师大马首是瞻，这些主意计划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主观空想。教育部倒不是有意将工作领到死胡同去，而是不从教育实际、物质设备条件和对过去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所以它是空想的，如部里去年反保守主义要加速前进，在 12 年远景规划里要办一百个高师，而师大要培养上千个研究生，这浩浩荡荡的大数字世界上也少有，现在的苏联文学就有将近 100 人。我想学校要增加这么多是可笑的，因为高等学校主要问题是师资，一个成熟的高等学校师资起码要 22—23 人听你的，作为一个掌握全国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关，像这样的作法只能造成观感不好的影响，我们不管年老年青教师对教育部这种作法都骂，但不在报纸上骂，并骂得咬牙切齿，但他们不是心向台湾、向帝国主义而是想把高等教育事业办好。但教育部的办法是不能使我们同意的。教育部只是从需要上看，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应抓住这规律来办事，教育事业是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但不能随着其他事业一样的速度来发展，如合作化高潮那样。不根据教育本身规律办事是主观主义、空想主义。

(2) 机械学习苏联，不动脑筋的听专家话，毛主席曾讲“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而我们却只看前句，丢下了后一句。这样从不自觉的教条主义到自觉的教条主义，如我们原来有四个附中，而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讲不需要，苏联没有。

这条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它们没有我们可以有。那时费拉托夫专家常来学校给我们帮助很多，但添的麻烦也不少。如领导二级制，苏联是二级制我们也得二级制，为此我们讨论了好久，结果是无下文，现在仍是三级制。

另外函授学校的设立，有好多系科设立了，这也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师资不够，多是助教，我一向不同意助教开课，那时钱部长说：高师要发展师资不够，但这不要紧，我们有许多助教，二年以后就可以作教师了，并可作优秀的教师。我和钱部长的看法不一致，我向何校长讲，“对钱部长的话我是口里不敢非之，但肚子里不敢是之。”过去对青年教师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对老教师所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

再说办函授，系里一直不同意，但有个别假积极分子说可以，部里就糊涂的听他的意见了，可是我会反映说不行，部里却不理睬。过去对中国专家是看不起，学生和教师的意见部里不大理。

再说苏联文学教师现在需要的很少，但现在搞这么多，真不知如何分配，最初我的意见是 5 个人到 10 个人，最多不能超过 15 个人。但教育部想多培养几个，这只是甜梦，这是不合实际的，当然虽然我反映了这个意见，只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专家，不能起作用。

还有 6 时一贯制，是很不合适的。当时虽然征求了意见，按常理来推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教育部不听中国专家的意见，这损失很大。

教育事业是一步一步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有程序按部就班的。但领导上熟于一阵风的规律，把它引到教育事业上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如批判杜威一阵风。

先生们辛辛苦苦的搞出来而无下文。搞教学大纲亦是如此，不是按部就班积累经验来稿，而是一阵风，这一阵风使得先生们忙乱不堪。拿教学计

划来说，没有一个学生是从头到尾用一个教学计划的，别说4年就是3年2年也没有，当然变还是需要的，但没有这样快的，这样快是反常的。这样的变使得每位先生都应付年年的变，而无时间去搞科学研究，变成了南辕北辙，向南方的车子实际是北方走。

部里下来的指示是行政命令，不能抗拒，只能服从。如服从有好处这还可以，但事实并不如此，如教育实习就是命令我们两次。柳部长说这是科学的，我觉得这讲得太轻率了，这是变相革命。又如去年要我们支援其他院校150人，但我们经研究抽80人都有困难，李司长讲在不伤元气下抽。我问他半死不活算不算伤元气，他说不算。这怎么能说不算呢？这话说的是不负责任的，纪司长当时也是赞成150人，但到后来抽了几十名也还是可以了，应该说合理的服从不合理的不服从，部里从需要出发不看实际，我们已经出了几十个人了还说我们反抗，几乎要通报，这是命令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的方法。

还有部里有些作法也是不很负责的，如分配研究生问题，第一次我培养了五个，分配出去没有一个是高等学校教本专业的。据我所了解很多学校缺这个专业的师资，如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就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我的学生出去反而教文学理论或现代文选，去年培养出来的也只有二个人搞本专业。这样的做法从他本人讲是学非所用，对国家是该开的课程未能开出来。

部里不该管的部里也管，如研究生培养是教师个人的事情，这部里也要抓，研究生的学习年限需延长时间也得部里批，教育部不懂不了解，还要管的多，这当然要犯官僚主义的。

一般讲，事情办错了与经验有关这是对的，但教育部并不完全如此。这要具体分析，有许多错误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不相信中国专家，不吸收中国专家经验，不走群众路线。学校的许多工作是不重视党外专家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党委，党委同志又不懂，不深研究，这样一些能避免的错误也未能避免。丁浩川同志就自己摸索，盲动主义的作风，我和他讲马克思是讲科学意见的，摸索是不得已的事情，要走群众路线。

（摘自座谈会记录）

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

钟敬文作家协会是我们作家志愿结合的团体。既然是一个团体，自然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也必然要有领导。普通的同业公会，还有主席、委员会之类的领导人物和机构呢。可是，过去和现在，我们作家协会的领导方法等，多半是不能符合这个行业的性质的。它使许多成员感觉到疏远，感觉到它不能起那种应有的组织和鼓舞作用。

协会领导比较突出的一种缺点，是少数领导同志在工作上的包办作风。我们试举一点事实看看。

作家协会有个理事会，照理它是代表大会闭幕时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理事们不但是经过代表会选举出来的，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也是经过党的检查的。他们不是些什么来历不明的人）。

但是，几年来，会里所做的事情，有的还是很重大的事情，理事们事

前是很少参加商议的，甚至于是毫无所知的。

近年来，协会里成立了许多委员会，管辖了许多文艺刊物，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到底那些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人选是怎样决定的，那些刊物，是怎样领导的，成绩究竟怎样等，理事们简直不甚了了。

有时候，协会召开会议，我们往往要到了会场，听过主席的报告，才知道那个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事前既不能参谋，又没有时间准备意见，当场只好草草通过了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我们是很少踏进作家协会的门槛的。有时候，我们走过协会的门口，看见那块白地红字的招牌，心情就怪别扭的。说是咱们的会罢，实际上它跟自己是这样隔阂？说不是罢，自己又明明是它的一个成员，不，在名义上还是一个负责的人（理事）。作家照例是敏感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心上，不只是尴尬的，而且是苦恼的。

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由少数人“偏劳”的。我们衷心地感谢这些同志的辛苦。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使工作更好地展开，对于许多理事和作家们来说，它更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他们那种有用的、同时愿意贡献出来的力量，在“投闲置散”中荒废了！

作协领导同志不但在领导工作上，有关门独造、不容插手的倾向，日常在对党外作家的态度上，也是叫人感到冰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是有说有笑的，对于党外作家就不免“敬而远之”了。不错，党外作家的思想和作风，往往有较多的毛病，但是，他们并不是麻疯病者，为什么要采取那样隔离态度呢？回忆全国解放前，在国统区或香港的时候，党的作家和党外作家，一道工作和战斗，一般说来，感情是融洽的，它并没有像今天所看到这样的隔膜。怪不得有人想起当时那种称兄道弟、亲密无间的情形，在神往之余，不免有些感慨了。

或者有人要说，那种情形，是一时权宜的，它并不是革命阵营里彼此关系的正常状态。也许我太庸俗了。我想，从事革命的人，在许多地方，要违反固有的人情，这并不是难于理解的。但是，似乎没有必要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都具着一副铁石心肠和冰霜脸孔（实际上，自然也不是完全如此）！前面所说的解放前那种情形，对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利呢？事实本身，不正是英明、公正的证人么？如果我们进一步说，那种同志间友谊的存在，还是有它更积极的意义的。我们都承认大多数党的作家，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过比较严格的锻炼，在这些方面，他们是能够给党外作家以帮助的，也必须给他们以帮助的。而要进行这种帮助（也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像过去思想改造和别的一些运动时候所做的，自然必要。

但是，仅仅那些，却并不充分。必须还有一种经常的和风细雨的吹润。这对于他们新思想、新作风的形成、茁壮，是决不可缺少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经常建立彼此间的感情基础。我们不难于接受一位老朋友比较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一位没有交道的人的意见，却往往不很容易听从，这是一种值得吸取的经验。

遗憾的是作协的领导同志，为了帮助党外作家的进步，不但不努力去建筑那种感情基础，正相反，往往倒把固有的一些也给以摧毁了。好像惟恐存留下只砖片瓦，会大大地阻碍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似的。

我们也知道，党外作家跟党的作家，在某些点上存在着差别，存在着矛盾的。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彼此关系中间必须筑起一道玻璃墙的理由。譬如在一个家庭里，有男女、老少等几口人，彼此思想上、作风上，乃至某些利害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平常惯说：“像家人一样”，它就表明这种谐和的关系是怎样使人羡慕的。除了少数的例外，我们很少看到在家庭的成员中，彼此故意保持距离、互不信任的那类反常状态。

今天，我们协会里的党的领导同志，乃至不少的党员作家同志，对于党外作家的关系，并没有做到像亲密的家人一样。党组织的界线，就是彼此感情的界线。

党员作家和非党员作家虽然在一个同业团体里，实际上中间的“楚河汉界”是非常严明的。缺乏信任，缺乏亲密，就不可能在事业上有真正的同心协力！

我们作家的主要任务，本来是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去团结几亿人民，使他们充分发挥智力和体力，以创造成一个雄伟美丽的理想王国！而现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团结上就不是太坚固的，在作战上又不是大家都能很使劲的。这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么？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我们必须下决心拆去横在你我中间的那道墙——不管它是玻璃的，或者是砖石的！

拆墙，当然不是太轻而易举的。但是，怎样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它是该做的，就要用一切力量去奔赴它。我们要学愚公移山！

我想，只要党的领导同志们，更重视我们的共同事业，只要他们不把自己看成为特殊的人，只要他们将心比心，胸无城府，就会更信任人，尊重人，因而有力感动人、推动人。我相信，党外作家尽管冥顽，也会像鳄鱼那样受感化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到今天还没有褪色的古训。

我们大家用对于人民文化事业的最大忠诚，来共同铲除那道使人精神分离的高墙罢！

5 作家协会党组首次邀请了一部分在京党外作家提意见，帮助整风。在会上，我作了简单的发言，同时顺便请丁玲、刘白羽、张光年三位同志，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感想。他们所写的话（特别是丁玲同志的）深深打动了，我感觉到这道墙，不但是应该拆的，而且也是容易拆的。在整理发言稿的时候，我就自然地让这种思想渗进我的发言里。如果这篇小文有些可取的地方，那首先就要谢谢他们珍贵心情的感染了。

（原载《文艺报》1957年11期）

中共失策之一

傅种孙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因为中共是胜利的党，如果失策多得计少，早就失败了。得计虽然多，有的是人歌颂，中共虽然很愿意听，恐怕也听腻了，我就不打算谈了。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

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

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然而共产党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呢？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不是年青的讲师、助教，所以第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自然中共所采取的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时候是必要的、不可否定的。譬如对土豪恶霸，如果不加以镇压，不加以斗争，那他们是会造反的。对于买办、资本家，如果不经过斗争，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思是不容易改变的。知识分子就不然。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他看事就要看得明白些，看得敏捷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不会看不懂，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加以什么惩戒。再说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的，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对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带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带帽子的。这很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带帽子，就不好骂了。可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

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

我常这样想：这样骂知识分子的人，骂了两句过了什么瘾？骂了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我认为是坏作用，愈这样骂使知识分子愈怕接近共产党顿如不是骂，而是假以辞色，知识分子会欣然附和、共济时艰。谁都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那就是说，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是建设的时代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自然很需要体力劳动，但是如果专靠体力劳动，那未免太苦了，因此我们需要靠脑力劳动者来想办法减或是免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增进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再说明白些，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做而且知识分子也做得到的。中共中央是不是见不及此呢？我想是早有先见之明，要不然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政策出来呢？我所惋惜的是，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既然处处的知识分子都寒心，那是谁造成的局面呢？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自然也许有人这样说，中共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这些旧知识分子而需要红色知识分子。但是要等到红色知识分子数目够用得等到哪一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

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把这般知识分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这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不打不骂也是佩服的，一打骂倒是怀疑了。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我常这样想，如果自解放以来中共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只是口里说而是实际做，那么团结知识分子的结果一定会很好，而且建设的成绩也会更好，设施上面的错误会少得多。正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我行我素（还想用打游击时的办法来办工厂、办大学等等），致命错误重重，亲者痛而仇者快。

就最近报章上所揭露的情形看，共产党派到厂、矿、机关、学校去的代表党的人物往往独断独行，或者偏听偏信，对那个厂、矿、机关、学校的专家的意见不加采纳，这样就用人的方面说，用知识分子同不用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土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患，无形的损失。当三反肃反的时候，共产党说得倒轻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无意中造成那些人不问事实、信口开河的坏风气，毫没有对受批评的人设身处地想一下。这样，人们学会了这一套。现在整风的时候，党员们应该会想到片面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不十分妥当的了。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以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有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小吠指定教授做培养对象，做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就应该承认他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如果我们选拔教授为培养对象，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7月6日第151期）

在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傅种孙一、党群关系我以为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是不够的。

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

这样的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作”，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我曾经提醒过浩川说：“你听到的只是党团员的报告，至于非党团员的话，你是听不到的。”我知道有许多党外人士的本心话不愿跟他说，而愿意跟我说。

现在党群关系，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还是不好的。我们学校好像是形成了两个党：党内的党和党外的党，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党群之间的关系。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有责任的。有些党外人也不好，借党团员的话来打击别人。

有人提议教授治校，我认为这在师大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基本队伍，没有组织，没有底子。

二、师大没有了基本队伍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砂，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

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的爱师大。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他来了师大才好了似的，这样可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能办得好呢？我们的校刊，每当来了一个新的主持人，就要改一次名，从《校刊》到《新师大》再到《师大教学》，好像过去皇帝改元一样，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

三、发展党的问题关于师大的党群关系我很早以前就提过意见（在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政策以前）

我也曾批评过师大党组织对高级知识分子关门。后来有了些改变，吸收了一些教授入党。前几天听见有人对党的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不满，说有些同志入了党以后就变得严肃，不像以前那样与群众接近了：被吸收进党的人也并不是众望所归的。希望党好好检查一下为什么这样。

四、职权问题对这个问题多方面都有呼声，并且非常厉害。本来，照道理说职、责、权三者该是合而为一的。韩愈说：“官以谏为名，诚有以奉其职。”其实不但谏官，任何职位都应该名副其实，职名义和实权应该一致。我们学校怎样呢？也许我们学校要好一点：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但是我对此也不无感想。前几天陈校长在市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说：要不是党委领导，何校长帮忙，我的校长也就无法当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想及古人所说“垂拱而治”，但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呢？比方教师的评级工作，我们学校要评张三是几级必须和别的学校李四比比，那就要去了解李四的情况，如果用我傅某的名义去了解，别人就不会告诉，会用保密呀，没有评出呀等等言辞来回绝，要是人事部门去了，他们就会尽其所有的告诉你。可见离开了党是办不了事的。还有像毕业生分配，支援外校等等，假如由校长、系主任分配不服从怎么办？党分配的话，不服从的就会少些，不服从的话也有办法进行善后工作。

我们学校党委的威信很好，何副校长的威信也很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建立威信，而是如何爱护威信，如果威信利用得太多了，管的太多了，就难免会有失检点的地方，如果我傅某做错了事，只是放在我个人身上就行

了，可是何副校长做错了事，人家就把它的行动放在党的身上；我如此渺小，尚且爱惜羽毛，那么何副校长就更应该谨慎了。

何副校长常常爱开空头支票，却让我来兑现，或推给下级，常常使我和下级为难。何副校长开会要开空头支票时，我常常在他旁边扯他的袖子，要他不要随便开空头支票。何副校长威信很高，我望尘莫及。比方我到员工食堂买菜，月底还钱，收条上却写上何副校长的名字，你说可笑不可笑？职工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虽然这是小事，但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的小照。现在我校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只有何副校长一人。前几天在座谈会上陈秋帆先生向领导提意见时，首先声明傅副校长、钟主任不包括在内。我听到时很惭愧，也很难过，因为学校领导工作没做好，我也有责任。

现在我不能畅所欲言。我的话不能发生效力，责任就难负了。即使能发生效力，也不是靠我的副校长的职位，而是因为私人情感。

平时有很多事我总是这样想：如果一切事都需要由何副校长批示，那何副校长也未免太不胜其烦了。所以我要帮帮忙，分工负责。但是有许多事情我是不同意他的做法的，比方把附中（女附中）附小交出去，我很不同意，但别人都说管不了，我也不好说我来管，那只好算了。

五、部、党对附校的领导前几年两附小的校长都是党员，不得人心，我曾提过几次意见，但党有党的看法。党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他们的威信，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如果党员工作做不好就别让他当校长。为了维持一两个人的地位而损失党的威信那就不合算了。

去年教育部把附中、附小拿过去，我认为是很不对的。现在附中、附小固然办得不错，但不是党员校长的功劳，而是几十年老教师的心血办好的。教育部收为已有是为了什么？为了给国内外各方面人士参观访问以壮观瞻，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贪人之功以为己力”。二附小的党员校长王静自以为了不起，认为学校办得好是自己的功。事实上，我认为二附小现在之所以办得好，完全是因为原来的底子好，但党却不是这样看的。我在师大几十年，也是附中的老教员。对附中所以办得好我是了解的。因为她是师大的附中，师大的人来来往往的很多，大家都是内行，办不好的就提意见，所以才办得好。

我们对附校一定要爱护。听说前几天附中为廿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举行庆祝会，现在这样的教师只剩下六个人了，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我认为一个学校所以成为老学校，是因为有老教员。可是附中老教员解放后被逐渐分散了。这种情形师大也有。我们总是想学校老教员多一些好。但是党过去的政策却不是这样，总是想把旧的打垮。如果旧的教员有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打垮呢？党员校长曹运昌初到一附小时汇报说，教员彼此之间一团和气没有批评。实际上他所指的是他们之间没有互相攻击，没有互相攻击就不好，只有把他们调走一些，他的校长职位才能站得更稳。

六、师大教授的痛心事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一个人如果永远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就永远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总是叫他好好向老师学，听老师的话，难道有谁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我认为党要注意这件事情。党是年青教师的家长，就要尽家长之道，要很好动

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者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学校对老教师是不够重视的。近几年来我看见许多老同事退休了。我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所以没有养老退休，能够幸免，是因为我学的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比方学校对夏宇众先生就看得无足轻重，请他退休，可是现在很多人又要去请教他，这不是矛盾吗？七、学生的失望关于留助教、研究生、保送留学生的问題，诚然年年都有进步，但到现在仍有毛病。最近还听见有人说：分配出去的人甚至有可以做留下来的人的先生的。这些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却是出自教授之口，总是有原因的。这种做法对学生影响很不好。它已经不能成为鼓舞的力量。这种留助教、研究生、保送留学生只看政治条件的办法已成公开的秘密，很不好，必须考虑。

八、随风而靡我认为学校领导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主见，没有预见。比方学校的规模是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呢？房子要盖得好些呢，还是便宜些呢？附中是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一年年年的反复，永远没有定见。这是由于领导干部没有经验，想得少，征求意见不够，就是征求意见，也不知择善而从。今天听这个这样说就这样做，明天听那个那样说就那样办。朝令夕改，毫无主见。

学校对教育部十足的唯命是从，恭顺得很，特别是对部里的党员上级，如董部长、柳部长、李司长。服从命令当然是美德，但我永远认为不能把任何人看做超人。

一件事情考虑一两天，总比只考虑三分钟好。我们学校考虑了很久的事，教育部部长或司长只考虑几分钟就批驳了。而我们学校党委却总不敢和部里争论。

我觉得部里对我们的事管得太多了。学校录取学生要管，甚至学校盖房子门窗怎样开都要管，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过去军阀时代，也不这样干涉学校的内政。

我觉得教育部对我们的过多的管理，对我们很少好处，反带来了累赘。教育部总是拉我们的后腿。如学校盖房子，快要盖好了，部里又突然来说要节约。我们学校的房子盖得特别慢，而人家却盖得快，我认为教育部以后应少管闲事。现在部长、司长、校长都给我们指示，连科员也直接给我们学校打电话，甚至不通过校长，直接给学校各科打电话，真是婆婆太多了，真是“自乱其列”，徒增纠纷。

我认为我们学校有许多事应该向教育部反映，劝他们别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党委也不要太恭顺了。这种过于恭顺的态度并不是爱护上级。教育部把附中、附小拿过去，拖了七八年都不批幼儿园的经费，这都是错误的。现在要教育部好好整风，看看教育部做错了改不改，有没有知过必改的气概。

教育部也是没有定见的。有时候教育部领导者下判断太轻率。比方学校是实行“二级制”好呢，还是实行“三级制”好。（二级制就是校长底下没有教务长、总务长的中间级，而直接领导系）教育部硬说要实行二级制。现在我校已经证明不能做到“二级制”只好实行“三级制”。我早就说过要实行“三级制”，他们都认为这是反动政府传下来的。其实这并不是反动政府用政治力量形成的。教育部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用了很长时间，但是

到底检查出什么来了呢？谁也不知道。无声无息的就完了。

有时候我也觉得何副校长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往往突然改变了。不知道是自己改变了意见，还是党委的主意改了。他这样变来变去不要紧，却常常把我弄得下不了台。比如最近决定要举行校庆，何副校长叫我筹备一切。但后来突然又不举行了。

他说这因为我那时病了，所以才不举行。这我当然很感激，可是这样的突然变卦，却使我很难为情。又比方和工农速成中学接头，我知道我说话不算数，本不想去，后来我和黄教务长去了。商量好了归附师大，并且也和教育局谈过。但后来何副校长却又突然不要了。这叫我怎么办？这类事过去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

九、整风究竟是整谁有人说“有意见还是说出来的好，说出来后解释解释，误会就消除了”。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要大家提意见是为了改正党委会的错误，不是为了改正提意见的人的错误，难道整风是整别人的错误，不是党员的错误吗？这和整风的精神符合吗？（“苦药”“底层之声”共同采访。“苦药”编辑部整理。）（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23期）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

傅种孙（傅种孙在5月27日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我看学生放得差不多了，差多少也难说。现在他们想说，可就是没有话可说了，而到处去访问，应当适可而止，不必要像牙膏那样硬挤。我观察同仁们放得极不够。

我是消息极不灵通的人，油印报一张也没有见到，大字报也没有看。我的观察不一定对。我们要想法让同仁们都能放。在三反的时候，有些学生还在中学里读书，没有进师大，我们的旧冤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飞冤不算，别说党外的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然而我所看到的有很多痛心的事，比如张佩湖先生，西北大学来公事要他去，我是送他上汽车的，我是代表学校把罪犯交出去，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把他送上汽车，好比是送上杀场。过去这些事，不算旧账，人情上做不到，群众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这须要允许群众算旧账。

对于学生不要鼓动太多，本来他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硬要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当新闻记者，访问先生，就是要在编造一些，做小说家，如果是身受的，当然可以说。没有话说，而要在拜访老师，找一些材料，这又何必？老师有意见，他自己不知道提吗？何必要转一道手呢。对于学生要适可而止。还可能有一个偏差，就是走向罢课罢考。大字报贴得很多，但没有打中要害。

我有一层意思，还没有漏出来。学生找我，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害得我好苦。

我说我是说了话的，因为记录记得不够好，自己开会很忙，没有时间修改，还未登出来。同志们也可以了解这一点。中文系的学生要访问我，要录音，这也好，可以说一次，让他们都能听到。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唯独对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体，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有一种治标的办法：就是搞运动，主张发动群众，但不主张锣鼓喧天。

再就是治本的办法：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运动搞完了，究竟怎么办？师大做事常是有始无终，肃反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现在还不知道。今天这个运动，将来党打算怎么办，是不是有个结束，是不是只在党内处理，是不是也让党外知道，大家的意见对不对，党至少要加个可否。跟党走，过去有时就走糊涂了，在三反、肃反的时候，就走糊涂了。不要虎头蛇尾、烟消云散，没有结果。我们要跟党走，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能含含糊糊。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第123期）

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傅鹰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子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子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愿。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队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知识分子就是爱国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

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出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

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

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

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1]

[1]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1期。

曲折的道路

张岱年 50 教育部指示北大、清华各派一个教授到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课，清华大学让我到人民大学听专家讲课（北大听苏联专家讲课的是郑昕）。同时辅仁大学邀我到辅仁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北师大聘我为兼职教授，讲“新哲学概论”。当时北师大尚在厂甸，我旧地重游，甚感快慰。当时每周奔驰于四校之间，工作非常紧张，但精力充沛，不感疲劳。当时公共汽车不甚拥挤，乘坐比较方便。次年，在清华大学亦开讲“马列主义基础”课，照本宣讲而已。1951年在清华提为教授。当时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周礼全任助教。金先生和冯先生都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上有重大转变。两先生在哲学上本来都已成一家之言，而今努力研读马、恩、列及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的谦虚态度是值得钦佩的。

1952 迁至燕京大学的旧址。全国各地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由金岳霖先生任哲学系主任。金先生本来不习惯于事务工作，这时每天到系办公室上班，统筹全系工作。

南方的朱谦之、宗白华、熊伟、黄子通等都来到北大，汤用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哲学系教授，郑昕、贺麟本系北大教授。1953 年北大也聘请了苏联专家，讲“马列主义基础”，由我和黄丹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之后，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冯友兰先生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同仁集体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计划开设新内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

当时北大教务长尹达同志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讨论会，考虑讲课教师的人选，建议由冯友兰先生和我担任课程主讲，于 1954 至 1955 年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冯先生讲先秦至汉初，我讲汉初至明清，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庞朴、萧萐父、乔长路、申正、吴乃恭等同志都来旁听。次年，我专讲宋元明清一段，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 年至 1958 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

当时教研室规定，每人每学期都须撰写一篇有关哲学史的论文。1953 年我写过关于墨子思想的论文，无甚新意。1954 年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内容比较深刻，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船山哲学的专著，详细分析了船山的唯物论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教研室开了讨论会，邀请贺麟同志参加评议，贺先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客观唯心论，看了这篇文章，我同意船

山是唯物论。当时金岳霖先生担任《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主编，提议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此文，因原稿较长，仅发表了其中讲唯物论的部分，题为《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1955 肯定了其唯物主义本质。冯友兰先生将此文推荐给即将创刊的《哲学研究》，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 年第一期。此文曾引起争论，我又写了两篇答辩文章。1957 年春季，我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对于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八个范畴进行了分析诠释短而又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倾向有所阐发。1957 年 1 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发言谈论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后来发言稿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1956 年又撰写了论文《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短而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小册《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都在 1957 年出版。当时我的工作紧张的，心情是愉快的。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 年代初期，学术界充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1956 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先秦时代曾经出现百家争鸣，达到学术的繁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这是令人鼓舞的。现在的百家争鸣应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嗣后，我访问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却告诫我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我以为，我坚持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想 1957 年秋季，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1957 年党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我很感动，觉得党如此信任群众，应将平日感恩说出来。5 月 17 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会小组会上，我发言说：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但觉得也有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正确的；但让一些老教授作思想检查，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等，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老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我也拥护，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已经交代过，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我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经过了暑假，到 9 月初，系里忽然开会对我进行批判，认为我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当时我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前辈中如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如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孙楷第等，仍能维持友谊。周礼全同志知我受诬，给我以慰藉。教研室派给我的工作是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的资料选注工作。迟至 1962 年 7 月 14 日，宣布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但仍难以发表文章。至 1979 年 1 月，党拨乱反正，重新审查，宣布 1957 年实属错划，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1958 有些农民知道我划为右派后，私下对我说：你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对我表示同情。农民同志的纯朴令我感动。

“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在 1957 年至 1979 年的 20 年中，我完全放弃了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思考，正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却完全钻入故纸堆中，枉费了光阴，这是深感痛惜的。

1963 讲了两个学期。1965 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白鹿司村参加“四清”工作组，与任华同志同组，和农民同吃同住。农村生活比较艰苦，颇受农民的热情接待。当时到王四营参加“四清”的还有郑昕、周先庚、周辅成、熊伟、桑灿南等。

1966“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小吠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据说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丹森、朱蒙、吴天敏、桑灿南等；一组是据说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齐良骥、黄子通等。有问题的一组由黄丹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没有问题的一组，后来黄子通也被揪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国民党，曾任区党部的委员，在外调中发现了，他冒充进步，终于被发觉了。

宗白华也受到批判。我每天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学习。不久冯友兰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冯先生冷眼相看，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共十几个人，以冯定及王庆淑为首。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斗。当时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9月初的一天，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印带队到我家搜查，闹了一上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而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到 1967 年 6 月 1 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丹森、汤侠声、叶朗、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曼成书等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读《毛选》。1968 年 8 月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从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其实原来也不大），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沙发，必须搭上一个书桌，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烈，1968 年 8 月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那天晚上，让我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人们列队欢迎，我也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接着开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欢迎的话，一个工人立即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我就不敢再说了。天天开会，过了几天，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令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这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有一天，参加宣传队的某一工厂的领导同志魏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们老知识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这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是参加群众学习的，还有不少老教师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 38 楼居住，每天开三段会，每天晚上要做思想汇报。1969 年 9 月宣传队号召教职工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

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

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

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汤侠声等回校，于10月3日起程北归，回到北京。在鲤鱼洲整整一年，冯定、王宪钧等仍留在鲤鱼洲，次年才回京。

回到学校之后，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辅导工作。1972年，毛主席指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组成写作组，由冯友兰先生、楼宇烈、朱伯崑和我参加。分配工作，我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6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深感研究学术前途无望，此时研究的宿愿又复活了。

1978《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重新发表论文之始。1978年12月，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任继愈、石峻等任副会长。在这次会上，我提出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论文。

1978了程宜山、王德有、陈来、刘笑敢、吴琼、陈战国等十人。我为研究生讲了两门课程，一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当时友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姜法曾同志随班听讲，并做了详细笔记。之后，我依据我原来的讲课提纲及姜法曾同志的笔记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又依据讲课提纲，参考姜法曾同志的笔记，另加增补，写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一书。

1978川同志。1979年1月，北大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蒲梢沧桑（节录）

傅振伦错划“右派”前后1957中央发动党的整风运动。21日，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座谈，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27日，又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以帮助进行党的整风。中国农工民主党李振球在中山公园纪念堂主持文物界座谈会。我因在去年9月22日向党组织递过入党申请书，也响应党的号召，应叶恭绰、齐念衡之邀，本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继王雪涛之后，慷慨陈词，作了10分钟的发言，事后如实汇报了历史博物馆党组。不料有人添油加醋，报告了文物局整党小组（据徐彬如透露）。后来这个人不但邀功入了党，还越级提升了官。

1956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

告，至 8 月 11 日，文物局又布置学习这一重要材料。在这次鸣放之时，5 月 19 日，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成绩的话，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夏衍插话说：“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正面的话不必说，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我才接着说：“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 600 多件，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院。领导要尊重专家。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在生前，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死后才受到重视，组织人力，整理他的遗稿。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五铢钱等物很多，当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

此后，在大小批判会上，我因此作了几次违心的检查。9 月 20 日，在文化部大礼堂召开大规模的批判会。王冶秋批判我“对领导不满，妄想篡夺领导权，想与组织平起平坐；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等，还说我集右派言论之大成来传播，是个“文抄公”。并妄说我收藏着 12 件成化彩碗，想出让谋利（按非事实，我无力购这些珍品），斥为第三类右派，当降为副研究员。

1958 王冶秋说：“自 1936 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说了些过头的话，倒不必划右派吧！”可是康生，这个对党怀有野心与江青同流合污的大坏蛋，1942 年 7 月 15 日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就大搞逼供信，扩大“反特”。1945 年中共七大开会之际，清算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又是他。这次他又唯恐天下不乱，搞极左主义，胡说：“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便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着凉倒不患感冒了饭把我降级又降级，从研究员降为助理员，王冶秋不敢得罪他，乃默而不再说话，于是划马非百为右派三级，把我划为五级。在宣布结论时，陈列部书记王镜如用一口清丰土腔土调说：“你傅振伦号称专家，我们是‘大年初一捡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你有什么不得了的？”1957 我们就被赶出天安门“红区”，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在历博陈列部书记王镜如倡议下，单位迫令我让出阜成门内宿舍北房 4 间，迁到外院原军委托儿所浴室阴暗的小屋里，一家 5 口局促于一间之内，馆长任行健来自山沟里的老婆和邻居呼我为“老右派”，呼我老伴为“女右派”，呼小儿永光为“小右派”，时加凌辱。1964 年，又迫令迁出阜成门大街 51 号宿舍，乃在东总部胡同 42 号中华书局宿舍里住了 20 多年。

中华书局本是 1958 年 7 月 27 日与同列 40 多单位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的。

在周扬倡议组建 40 万大军整理中国古籍时，又回到文化部来。1958 年 9 月。党组把马非百和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分配我在古代史组工作，曾出版了我旧作《刘知几年谱》；这是第四次再版校定本。又整理印行了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郭沫若写了序文。更负责编审了何竹淇、马长寿等著作。但人事室主张右派分子应以劳动锻炼改造为主，所以我经常被派去服杂役，如帮厨、种菜、割麦、养鸡、开荒。

三年困难时期，党照顾知识分子，每月津贴白糖、黄豆，号称“糖豆干部”，我也受到优待。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挖石填土以种苹果树，还冒寒负筐到处捡粪，往往见不到马粪，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沙河边。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府通知，因生活资料缺乏，减少干部劳动，要求提前晚饭，7 时上

床安眠，也停止了学习。不久，回到了书局编辑的岗位。

1964 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贯彻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中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华书局干部下放到河南林县（今林州市）1966 我则参加了文化部的四清参观团。至党中央公布《五·一六通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大搞运动，抓黑帮，破四旧，批斗“公安六条”分子及当权派。打、砸、抢风行一时。9月6日，学习“十六条”（即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年部队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1 革命公社。书局黄葵（名守义）揭发我曾到历史博物馆串连及右派事，揪出来，诬为“公安六条人员”，都关在农业大学（今翠微路 2 号）的大楼里，而派我为“黑头”。我天天领着大家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汇报”，背诵“老三篇”，吃饭前，先“认罪”。开会时，唱《毛主席语录》歌曲。每开会时，他们争抢立后排，怕站在前排受到“造反派”的踢打、辱骂。因奉行“毛主席语录不过夜”的指示，接到新语录，即列队外出高呼，走到公主坟才回来，深夜亦如此。每星期六才准回家，回家期间还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工资也只发生活费。

两出版社的运动，一时达到了高潮。其后为了恢复工作，两社联合成立业务和行政两个办公室。5月11日，宣传队澄清我的问题，才得到解放。解放前我曾患绝症“对口疮”，医务室张丽容以为疮重口深，难以割治，乃由造反派证明“黑帮”身份，去永安大街医院诊治，因是“罪人”不打麻药，即行割治，我疼痛难忍，抱头回出版社。

在全国“大串连”时，经常借衣借被招待串连人员。还经常应外地革命团体“外调”人员的要求，写些材料。

1967 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令“抓革命，促生产”，又以 10 人设业务小组，毛主席号召《做好出版工作》的 18 周年之日开始，重整故业，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约计 4500 万字），计划组织社内 40 人及社外 30 人办理，派我和卞孝萱、汪某整理《唐书》，要我在每周完成 9 万字，限一年之内校点 250 万字的《旧唐书》，交卷后也未见下文。

在康生、江青乱党干政期间，无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数达 45 万人，我在中华书局戴“罪”工作，孜孜不息，弥补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的损失。在“评功摆模”的运动中（这次运动不谈缺点、错误，只讲成绩与贡献），摘去我右派帽子，并由群众推选，经过“三榜定案”，提升两级。

1969 病的爱人，下放湖北云梦泽的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搭棚住下，一同下放的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干部和家属有六千余人。出版口的商务和中华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1971 干校奉上级指示，一部分所谓“五类分子”迁在丹江口原文化部分校准备安顿，6 日，先遣我和文学出版社两人押运家具搭火车前往，不久全部来到。规定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我乘暇整理旧稿，补充修订。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和汤浩等都有所协助。10 月，与姚绍华等老人游历襄樊、隆中。

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在湖北丹江水库之北，附近有烈士墓，其纪念碑载红三军在湖北活动情况。校西北有丰碑及石兽，系“文革”时迁自均县武当山（太和山）玄岳门者。因邀 70 岁同仁姚绍华、姚坚由东麓同登武当山，宿紫霄宫，山高缺粮，游山者必交粮票。（按武当山即《水经注》之太和山，传系古净乐国皇太子入山修炼为仙之地；武术内家拳祖张三丰曾栖止于此。

明永乐追迹建文帝，大兴土木，紫霄宫即修于其时，为红三军医院，太子坡复性殿今仍有红三军十一师政治部遗址。) 1974 江青一伙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在清华、北大设大批判组（所谓“梁效”），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史通》，因买不到我撰著的《刘知几之史学》和《刘知几年谱》，遂找我协助注释，两年定稿，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但迄今未见出版，原稿恐随“四人帮”垮台而付诸东流了。

家乡的人民公社 1960 地说：“在老家活不成了，咱县碰上百年不遇人为的大灾难。”擦擦眼泪，又慢慢地说了农村的大致情形：“1958 年 8 月，中共新乡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在全县并乡，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统一的经营管理体系的人民公社，组织书记处，设书记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成立组织、宣传、工业、交电、农业、水利、财贸、文教、公安、武装等 10 部，下辖管理区行政村；以本省徐水、安国为榜样，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集体所有制，把公社里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全部包下来，统一管理、分配、计划、核算，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制定了‘百化’的十年远景规划，计划修建城市化、别墅式居民点，建立敬老院、托儿院，还要修路，建万鸡万猪场，建工农兵红专大学，并不符合实际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深挖地、密植谷，拔白旗、放卫星、搞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四化思想为指导，成立了公共食堂，村民吃饭不要钱，并在农村搞‘一平二调’，造更大的舆论和声势。在不切合实际的做法下，又遇上了自然灾害，闹得人困财尽，生产上不去，人们吃不饱，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妇女闭经，有的老弱饿得奄奄一息。一些急功好利的领导干部还打肿了脸充胖子，说：‘左比右好，大跃进不是冒进。’竟昧着良心，搞不符合科学的密植实验田，减了产、绝了产之后，仍然虚报亩产粮产数字，浮夸万亩‘棉海’、‘麦海’，以迎合上级某些领导的口味。经过 1958 年秋季的大炼钢铁和 1959 年的除四害的运动，麻雀虽是减少了，可是粮食却减了产。”我父亲继而又说：“老家的儿子们各领自己的媳妇、子女、逃到石家庄自寻生路去了，希望上天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幸福吧！”，说完仍叹息不已。

那时我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印证了当时的右派言论，觉得当时农村的情况，多是事实，为什么无人敢向中央如实地反映呢？在北京，我为了一家的温饱，变卖了沙发、大玻璃柜、藏书和珍贵的精装图书、金石、瓷器、字画。在三年困难时，我这“糖豆干部”每月发的粮（黄）豆，也不便独享了。当时粮食不够吃，便到东邻饭馆买“汽酒”（当时饮食行业出售的一种充饥安眠的冷饮）充饥。有时吃完了带鱼，子女把鱼刺放在炉子上，烤酥后果腹。

回想起来，真不知当时祖孙三代一家 9 口是怎样度过的！

一次儿子傅永龄从粮店领粮票回家，数了数发现多发了 28.5 斤。他心想粮食是宝中之宝，粮店错发了，一定很着急，这是大事，怕因此闹出人命，马上送还了粮店，锦什坊街粮店的人正在着急，一见送还的粮票，感激万分，立即报告派出所，在红公民榜上写了大幅表扬信，又贴在了阜城门内大街 51 号我的住所。

当时我的经济很困难，到处借贷无门。有一次迫不得已，将在中华书局才买的新印的《艺文类聚》一部书，交儿子永龄去书店卖，以济眉睫。书店以为此书尚无公开发行，怀疑是偷来的，及电询中华书局，才知道了书的

来历，之后便廉价收购了。永龄叹道：“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以落到这步田地？”父亲目睹我狼狈的生活情况，看我一人担负这么些人的生活，戚然落泪，也就忍痛回到老家，我按月邮去起码的生活费和食品。后父亲在三年困难不幸的时候，未尽天年，竟于1962年1月与世长辞了。呜呼哀哉！痛哉！

次年，我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1963年8月河北南部连降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京广铁路以东尽成泽国！东至衡水县高达35米的唐代万云塔顶，也淹没在水里。到12

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王铁崖一个人要是从北京大学西门进来，在校园里走一遭，从东南门出去，就会看到这里物理楼、外文楼，那里是文史楼、哲学楼；这里在上课，那里在进行实验。

乍一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倒是满正常。但是，要是在学校里呆上一天，看得仔细些，听得更多些，那就会发现这些楼里办公室不少，冒出来的都是什么“长”，什么“主任”。到处闹哄哄的，忙的尽是行政事务、人事、经费、房屋、还有什么计划、检查、汇报、指示、会议、传达。人们不由得作出这样的结论：学校机关化。

更严重的一点说：学校衙门化。

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群众怎么说呢？有的说：“学校官僚主义不轻呀！拖拉现象很严重呀！”有的说：“行政事务压倒一切，学术空气太薄了！”还有的说：“下情不能上达，拿个楼梯来，让领导同志下楼！”游国恩先生说，学校有“三多三少”，我看简单说来，多的是官僚主义，少的是学术空气。

现在“主义”已经太多了，但是我还想加上一个：“行政主义”。什么是“行政主义”？行政主义是学校里官僚主义的根源，一方面是学校领导陷于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以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当然，学校领导掌握学校行政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陷入行政事务，而且愈陷愈深呢？是不是应该用行政方法来领导一切工作，而且单纯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工作呢？领导陷于行政事务，也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学校所接受的任务与客观条件有很大的矛盾。杨人榘先生主张三年之内停止发展，我基本上同意。任务和条件的矛盾如果不适当解决，学生质量很难保证，而学校领导势必陷入行政事务，许许多多的问题也就会发生。

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准备细谈，我要谈的是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特别是教学与科学研究这样重要的工作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

有人说，教学靠“良心”。这就是说，教学工作依靠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但是，行政方法却不能解决发挥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

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行政主义”很容易受人喜爱，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闭着眼睛不看效果，也是很痛快的。领导者可以坐在高楼上发号施令，行政有个系统，指示可以层层下达。但是，这样的贯彻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上就不能不产生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请看，这

几年来学校领导对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注意了些什么呢？在教学工作上，尽是什么讲授进度、教学环节、考试制度等教学形式；教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学内容，而用行政方法来管教学，不是什么分量太重或太轻、逻辑性强不强等皮毛问题，就是搬用一些教条来检查教材。在科学研究上，这样的领导只能是订计划、要题目、定期限；再不然就是做些检查进度的表面文章。

最近有一个例子。学校行政领导要想知道“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教学工作中贯彻的情况，就决定在某些系重点地检查一两个课。于是指示下达到系，系到教研室到主讲教员；检查之后，又层层往上汇报，从主讲教员到教研室，教研室到系，系再到校行政。据我看来，这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贯彻“百家争鸣”。

不重学问重头衔我认为，教研室是最重要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集体。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学校行政部门的基层单位。有人提议取消教研室这一制度，我看，如果把它当作行政的基层单位，那是可以取消的否则，多一个层次，多一个“教研主任”的头衔，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好处的。

目前，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有那么多的头衔，而且受到那么样的重视，实在令人诧异。好像值得人重视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职位头衔。

有人又起了一个名词，叫“偶像主义”。我说，这是官风。这是行政主义的副产品，是用行政方法领导工作的结果。

社会上也有这种风气。明明是科学家、教授，报纸上总想法给他挂上个什么“长”，什么“主任”。有的报纸还出现过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字样，真是闻所未闻，连“教研室主任”也成为头衔登到报上，更是莫明其妙。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这不仅损害了学风，而且也糟蹋了科学家。

要有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学校的领导方法应该改变了。一方面要摆脱陷于行政事务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停止用行政方法来领导学校最主要的工作——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党委，领导学校工作，一方面要依靠有学问的科学家和有经验的教师，依靠广大的教师群众，要大胆放手，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在教师中间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正确地引导大家前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总之，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它有自己的特点，搬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是不能搞好工作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肃清官风，发扬学风！

国际关系这门科学中的问题另一问题是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去搞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人们不可能继续搞这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院系调整以后，这方面的人材予以“疏散”，都或多或少地改了行。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留在行外，想归队而不得，高教部就没有认真地、主动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培养干部，包括师资和科学研究干部，好像只能限于一个大学一个系，而问题在于这个大学这个系只限于一些年青的同志。应该说，这些年青同志还不错，也很努力，但是，毕竟基础还差些，年限也很短，几年之中只能学到苏联专家的讲义和一些教科书。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草案）中这一部分，也委托他们去搞，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搞过科学研究，也不了解这门科学在中国的情况，怎么能搞得通呢？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只从主观愿望办事教条主义侵袭到这门学科来，不是不

严重的，至少在教学工作上是如此。硬搬苏联的经验，专门化也好，专业也好，专门学院也好，都要照苏联的办法办。既没有了解苏联经验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了解到苏联这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更没有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这一方面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科学的基础和条件怎么样，人力怎么样，图书设备怎么样，都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只是从一时的主观愿望去办事。这样，不仅人才培养有困难，而且将要造成国家的浪费。

问题不能再拖下去关于北大这方面的情况，学校领导是拖而不决，高教部是置而不问，实际工作干部，高教部可能不管，难道这方面的师资和科学研究干部也可以不管吗？应该指出，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人材在我们中国，现在不是多，而是太少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好得很，而是差得很。过去几年已经脱了节，干部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已经遭受了损害，再拖下去，不加以考虑，这门科学将要难以发展，而有些部门将要绝种。我认为，国际关系这一门科学的研究干部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只能在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想办法。这是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要扭转它，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现在扭转，将来还要扭回来。如果是这样，又何必多此一举，走弯路；是很大的浪费。最近，有人建议再合并集中，这样的建议如果是认真地考虑到像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的作用，那还可说。如果还是想着办独立学院的做法，那是很危险的。孤立是难以把科学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像国际关系这样的科学。何况，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呢。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10日）

散文诗四首

艾青画鸟的猎人一个人想学打猎，找到一个打猎的人，拜他做老师。他向那打猎的人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所选中的是打猎，我很想持枪到树林里去，打到那我想打的鸟。”于是打猎的人检查了那个徒弟的枪，枪是一枝好枪，徒弟也是一个有决心的徒弟，就告诉他各种鸟的性格，和有关瞄准与射击的一些知识，并且嘱咐他必须寻找各种鸟去练习。

那个人听了猎人的话，以为只要知道如何打猎就已经能打猎了，于是他持枪到树林。但当他一进入树林，走到那里，还没有举起枪，鸟就飞走了。

于是他又来寻找猎人，他说：“鸟是机灵的，我没有看见它们，它们先看见我，等我一举起枪，鸟早已飞走了。”猎人说：“你是想打那不会飞的鸟么？”他说：“说实在的，在我想打鸟的时候，要是鸟能不飞该多好呀！”猎人说：“你回去，找一张硬纸，在上面画一只鸟，把硬纸挂在树上，朝那鸟打——你一定会成功。”那个人回家，照猎人所说的做了，试验着打了几枪，却没有一枪能打中。他只好再去找猎人。他说：“我照你说的做了，但我还是打不中画中的鸟。”猎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可能是鸟画得太小，也可能是距离太远。”那猎人沉思了一阵向他说：“对你的决心，我很感动，你回去，把一张大一些的纸挂在树上，朝那纸打——这一次你一定会成功。”那人很担忧地问：“还是那个距离么？”猎人说：“由你自己去决定。”那人

又问：“那纸上还是画着鸟么？”猎人说：“不。”那人苦笑了，说：“那不是打纸么？”猎人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先朝着纸只管打，打完了，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了几个孔，就画几只鸟——这对你来说，是最有把握的了。”偶像的话在那著名的古庙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像，人在他的旁边，伸直了手还摸不到他的膝盖。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这尊塑像站了几百年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苦役，对于热望从他得到援助的芸芸众生，明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由于羞愧而厌烦，最后终于向那些膜拜者说话了：“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

“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末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像忽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养花人的梦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

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像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

最先说话的是牡丹，她说：“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姊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接着说话的是睡莲，她说：“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姊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石榴激动得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兰花说：“我看重友谊。”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

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1956（原载《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蝉的歌在一棵大树上，住着一只八哥。她每天都在那儿用非常圆润的歌喉，唱着悦耳的曲子。

初夏的早晨，当八哥正要唱歌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叫声，她仔细一看，在那最高的树枝上，贴着一只蝉，它一秒钟也不停地发出“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声，好像喊救命似的。八哥跳到它的旁边，问它：“喂，你一早起来在喊什么呀？”蝉停止了叫喊，看见是八哥，就笑着说：“原来是同行啊，我正在唱歌呀。”八哥问它，“你歌唱什么呢？叫人听起来挺悲哀的，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么？”蝉回答说：“你的表现力，比你的理解力要强，我唱的是关于早晨的歌，那一片美丽的朝霞，使我看了不禁兴奋得要歌唱起来。”八哥点点头，看见蝉又在抖动起翅膀，发出了声音，态度很严肃，她知道要劝它停止，是没有希望的，就飞到另外的树上唱歌去了。

中午的时候，八哥回到那棵大树上，她听见那只蝉仍旧在那儿歌唱，那“知了——知了——知了——”的喊声，比早晨更响，八哥还是笑着问它：“现在朝霞早已不见了，你在唱什么了呀？”蝉回答说：“太阳晒得我心里发闷，我是在唱热呀。”八哥说：“这倒还差不多，人们只要一听到你的歌，就会觉得更热。”蝉以为这是对它的赞美，就越发起劲地唱起来。八哥只好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傍晚了，八哥又回来了，那只蝉还是在唱！

八哥说：“现在热气已经没有了。”蝉说：“我看见了太阳下山时的奇景，兴奋极了，所以唱着歌，欢送太阳。”一说完，它又继续着唱，好像怕太阳一走到山的那边，就会听不见它的歌声似的。

八哥说：“你真勤勉。”蝉说：“我总好像没有唱够似的，我的同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唱一支夜曲——当月亮上升的时候。”八哥说：“你不觉得辛苦么？”蝉说：“我是爱歌唱的，只有歌唱着，我才觉得快乐。”八哥说：“你整天都不停，究竟唱些什么呀？”蝉说：“我唱了许多歌，天气变化了，唱的歌也就不同了。”八哥说：“但是，我在早上、中午、傍晚，听你唱的是同一的歌。”蝉说：“我的心情是不同的，我的歌也是不同的。”八哥说：“你可能是缺乏表达情绪的必要的训练。”蝉说：“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表达不同的情绪。”八哥说：“也可能是缺乏天赋的东西，艺术没有天赋是不行的。”蝉说：“我生来就具备了最好的嗓子，我可以一口气唱很久也不会变调。”八哥说：“我说句老实话，我一听见你的歌，就觉得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蝉说：“那真是太好了。”说完了，它又“知了——知了——知了——”地唱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也上升了……1956（选自《野百合花》花城出版社）

记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

顾学颉冯雪峰（1903 - 1976），原名福寿，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O.V、吕克玉，浙江义乌县人。和他熟悉的人们无论当面或背后，都亲昵而尊敬地叫他“雪峰同志”或“雪峰”。这个极普通而平凡的称呼，实际上超过了寻常字面的意义和感情，而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寓言作家；领导过“左联”的各种活动；与鲁迅有不寻常的关系；并且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家。他的理论、著作和生平重要事迹，都为当代文艺界所熟知，用不着我再赘述，这里只想谈谈我与他个人交往、同事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岁月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作为对这位年尊望重的长者的纪念。

他去世快 20 年了，经常想写一点什么纪念他；仅在他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写过一篇四言体的挽诗，诗很短，为他的不幸遭际感到不平，未及其他。我想，这是不够的。但每次提笔，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一直拖到现在——我准备写的《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纪念性的文章），二十来位师友，差不多都写完，并多已在台湾和大陆发表过，可能编印成一本册子的时候，惟独多次想写而未写出的敬爱的雪峰同志，尚未在白纸上变成黑字，真有点对不起他，说不过去！于是，在每天多次服各种药物的情况下，勉强执笔写下几行很不显眼、不值一提的小事，聊抒对他的怀念之情。

说来很惭愧，因为我一向搞中国古典文学，钻故纸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各高校教书，对于当今新文学界的人物很生疏，除了读过几位大文豪如鲁迅、茅盾等人的名作以外，其余的许多作家、作品和新文坛的许多活动，都很隔阂、模糊、不甚了了。同样，对冯雪峰同志的大名，也是在解放前后才渐渐清楚的。大约在一九五二年冬，我在《文艺报》上看到雪峰写的讨论《水浒》的文章，知道他是该报的主编，但不知他还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对那篇文章谈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并附带谈了我对整理中国文学名著如《水浒》、《三国》之类作品的看法，作为一个读者，把意见寄到该报。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他的亲笔回信。除了简单谈到《水浒》一文外，并着重地询问我的工作、写作等情况，还嘱咐要我回信。回信告诉他，我一向在大学教书，目前正写完一本关于元曲研究的小册子。因为图书馆还未完全开放，许多书不借出阅览，许多材料没有看到，只能草草完工，等以后条件好了再深入研究、完成。很快，又得到他的来信，要我把那本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转给他，并转交该社古典部负责同志看。并说，该社古典部正准备编选一部有关元曲的书，很希望我也能参加这项工作。于是，我送去稿子，准备和他见面。当时，他不常到社，由一位女青年同志（秘书）代收（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位女翻译家谢素台同志，她是我在出版社认识的第一个同事，后来还同在编译所共事几年）。

不久，就接到文化部通过教育部转到我的工作单位的调令。那时，我在刚从老区迁京的中央财政学院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因为正逢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的几所大学的财经各系都合并到该校，改名中央财经学院。设备、书籍、人事、课程等等都需要安排，第一学期并未开学，但有许多创建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所以学校虽接到调令、同意我调走，但必须把未完的工作大致就绪以后才能走。因而拖延到次年二月底，我才到文学出版社报到，三月初正式上班。可是上班好多天，并未见到他和古典部的负责人。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次古典部的会议上，才初次和冯雪峰同志见面。他的那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带有很浓厚的农民淳朴气息和老革命家的气概，很自然地让人产生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感觉。他除了一般寒暄之外，详细问了我的工作安排、日常生活和到社后的感受等等。有一次，开完会我去看他，顺便问他对我的那本稿子的意见，请他指教。他很谦虚地说：对于元曲，仅仅浏览过一些，没有研究；虽看过那本稿子，但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的印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都是对的，但比较粗糙，还不够深入，资料不够充实，还得继续钻研，希望多加努力（后来，经过重新修改、补充，已由作家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台湾先后出版。并另外编注了一本《元人杂剧选》出版，被国内外一些大学中文系采用为教材）。当时我听了觉得非常中肯，不失为一位专家和长者的教导。

他是社长兼总编辑、并兼鲁迅编辑室主任。鲁编室和社本部不在一处，他常在鲁编室工作，到社本部的时候较少，因此，除了一两次春节时我到他家拜年之外，平时我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 60 年代我们调到编译所以后，每天就可遇见。

出版社初建立时，全社除出版部、行政部门之外，共有六个编辑室和后建立的一个编译所，出版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还有八个期刊，颇具一个国家专业出版社的规模。初建时，人员很少，冯雪峰同志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罗致人才、充实编辑力量上面，从各个渠道调来一些专门人员。从他平时的谈话和实际的作法上，当然他也有所偏重。他和编辑室的负责人积极想方设法从各方面调集编辑力量，充实队伍，以便打好出版社的基础，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对古典编辑室，也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和聂绀弩一道，先后调来许多曾在大学任教的人员到社工作。我到古编室之前，这里仅有黄肃秋、文怀沙等三位同志。之后，陆续又调来汪静之、张友鸾、舒芜、王利器、陈迥冬、周汝昌、严敦易和钱南扬、王庆菽、童第德、冯都良等人，真可谓济济一堂，盛极一时。一次开室务会，冯也参加了，谈了许多本社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又谈到本室人才济济，专家众多，在和社外专家作比较时，他非常得意，认为我们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不会弱于大学或研究机构。

他说：有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故事来作比譬，有一个人胆小怕鬼，一天晚上，看见窗户外面有个影影绰绰的黑影晃动，向窗里窥视，但又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向前闯入室内。屋里的这个人，害怕极了，一直注视外面，不敢动。双方对峙了很久，不料这人突然打个喷嚏，外面那个影子吓了一跳，才知道里面的是人不是鬼，就拔腿而逃。里面的人也才知道外面的也是人、不是鬼。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对待社外专家、和他们打交道、审稿件时，不要胆怯，害怕专家，不敢提意见，有什么意见该说的尽管说出来；这样才能交换意见，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我们出版物的水平。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大笑，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和他在一起开会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能听到他的寓言式的发言，得到一些启发。

过了不久，他主编的《文艺报》，受到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批驳，引导了全国文艺界对“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批判运动；他的检讨，也未获得通过，主编的职务，当然被取消。紧接着，一场名义上是文艺界的而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大风暴降临的前奏曲开始了。这是由胡风“该死的”“三十万言”引起的，搞得文艺界人心惶惶，与胡风本人或与所谓“胡风集团”有关

的人，都免不了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例如文学出版社的聂绀弩和冯雪峰，前者和胡的私人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冯因为解放前在上海和鲁迅、胡风等人搞文艺活动甚久（如领导“左联”、办刊物等），关系也不算浅，所以批判、审查“胡风集团”时，冯也免不了要检查、受批判。聂、冯经审查后，幸亏都不在该“集团”之内，然而仍不免沾了一些腥膻。接着，又发生了“丁陈集团”一案，又是一次不大不小令人心惊肉跳的风波。冯和丁玲、陈企霞都是文艺界的老朋友，尤其和前者关系更深。批判丁、陈，自然又与冯有关系。

虽然也不是他（她）们集团里的人，但接二连三的审查、批判，精神上总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刺激和实际影响的。这时，《文艺报》主编的头衔早已没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桂冠，也在摇摇晃晃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平常，他不大过问出版社的日常事务，也不常到社办公，由一位早已来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也是冯的朋友）代替他执行任务。他和这位胸怀雄才大略的副社长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也乐得清闲不管。这位副社长下车伊始，就想对出版社大力“整顿”一番。这时，古编室在聂绀弩不很循规蹈矩的领导下，被社里许多权力人士议论纷纷，说是“闲谈乱走”，“一团和气”，“打伙求财”，等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偏偏聂和这位副社长在职权上（聂也是副总编辑）和某些具体作法上意见很不一致，不免有些矛盾。不巧，又遇上与胡风私人关系密切被审查的不利条件，于是，古编室便成了被“整顿”的对象。接着“丁陈”案件、“胡风集团”案件接踵而来的是十二级强烈台风的“反右运动”的来到。很自然，由那位副社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古编室就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从正、副主任起，所有业务骨干如小说、戏曲、散文、诗歌（沾边）几个组的组长和几个年轻的助编、编辑，几乎一网打尽，大多成了“右派”；并有正式的封号，叫做“右派小集团”、“独立王国”。运动的开始阶段，冯还在领导地位上，很快就被卷入“右派”大网罗之中了。听说他的问题主要在社外，当然，社里有些问题，总不免会牵连到他头上。于是，他也和我们这批“右派”一样，受到“批判”、降级等等待遇。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一件他也没料到的意外事。那是1957年6月初，社里已开过几次高知座谈会，他是主持人，叫大家大胆提意见，不要有顾虑，说得很激动，有句过头的话，叫大家“有冤的报冤”，当时人们很欣赏这句话。那几次会我都没参加，因为我早想离开这里，已有两个单位分别和出版社谈过，要调我去，所以我不想参加社里的座谈会。可是冯见我几次都没去，他就屈尊亲自到宿舍我家动员我参加明天最后的一次会，无论如何，务必参加并发言，有意见尽量提出来。我碍于情面，答应一定去。社党委书记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受冯的嘱咐，也到我家劝我参加明天的会。这样，我就被两位好心人无意地推到了卤水池的边缘上，只要我的脚一动，就会轻易地掉进深渊。当然，我从不埋怨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蒙蔽不知底细的人。第二天，我果然参加了座谈会，并放了本不应该放的大炮，一下变成了被猎取的对象，成了出版社的“头等”煊赫人物。只怪我不机灵，这次会已换了主持人，不是雪峰，而是那位副社长，这里面大有文章，冯可能已被通知不再当主持人了。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反正有几十万、百万（难以统计）人，一夜之间，都被“错划”成“右派”了。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以及毫不相干的人被株连，受连累，人数就更难估计了。这么多的人，

忽然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准阶级敌人”，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谋者难道不应该冷静一下头脑，深刻地反省一下吗？事情就这么突然，也异乎寻常地简单，昨日的座上宾，忽然成了今日的阶下囚。这件事的深远后果，不仅相当长的时间刻印在国内人的头脑里，也同时给好心的或别有用心的人用作评论或攻击我们的口实。有人安慰并表示遗憾，说：如果不去参加那次会，不就免掉了那场大祸？我不认为是那样，虽然也包含着某些偶然性的可能。然而，“命里注定”，“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的难逃”。你既然被列入“知识分子”、尤其“高知”之列，你就必然成为被猎取的目标，“漏网之鱼”是很偶然的。我在冯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写的四言体的挽诗，最后两句：“哀彼冥鸿，毕张弋送！”弓箭网罗都摆好了，你还跑得了吗？之后，雪峰的几顶桂冠都被摘下，降级，仅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在社里工作。我，更不在话下，降五级之后，“蒙恩”仍留在岗位上工作，但不定期的劳动时，成了麻将牌里的“听用”、劳动“常委”。记得约在五八年夏秋的时候，我正在昌平县居庸关下文化部劳动站劳动，每天走过大河沟上山挖鱼鳞坑、树坑。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劳动队伍几十人也来了，帮着挑水上山浇灌新栽种的树苗。忽然看见雪峰同志也在挑水队伍当中，从水沟里挑着一担水，往几十米、百多米的高坡上挑，往树坑里灌水。那时，他已五十多快六十岁了，曾经动过手术，割掉半个胃，身体不太好。我看见了，真为他难过。收工、吃饭后，我去看他，问他身体怎样？挑水上山，太累了，受得了么？他笑了笑：这不算什么，从小生长在农村锻炼出来了。并问我在这里劳动，身体怎样？从谈话中看不出他有什么难受和委屈的表情。表现了一位经过几十年革命洗礼、锻炼的老革命家的风度，使我十分钦佩和尊敬。

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饿饭时期，政治气氛不得不放松一点，让人们喘口气、缓过来。出版社也作了一些调整。雪峰和我都分别由编辑部调到成立不久的编译所工作。开始没有正式房间办公，只好把我们新调过去的人放在一间东西晒的杂屋里，几张办公桌一摆，几乎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雪峰的桌子正好在西边窗户下，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但还是一本正经坐在那儿看稿子，不说一句闲话，更没有一点怨气，体现了他的涵养和胸襟开朗。不久，就搬到东楼上编译所较宽阔的办公室了。我们分别在几间屋里办公，每天上下午工间操时，都可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兼游艺室里见面。这里，有搞俄、英、法、德、日等语翻译的，有搞古典文学的，有搞新文学史资料的，雪峰还是搞他的鲁迅著作编注工作。人才济济，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我欢喜打乒乓球，在这里还数得上名次。我们打球，其余的人坐在沙发上观看、议论或谈别的什么。这一段时间，过得还比较轻松愉快。看上去，雪峰总是面带微笑，和大家交谈，看不出有什么沮丧的神气。当然，大家对他仍然十分亲切和尊敬，把他当作一位善良淳朴的长者。他当权和下台的时候，对人的态度都前后一致，没有两样：在台上，没有颐指气使的那副高人一等的气派；到台下，也没有怨气冲天或自卑的可怜相。他还是依然故我，不亢不卑，谦和谨慎。有人说他颇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傲上而谦下。听说他开始当社长时，一次在文化部开会，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他反对某位副部长（实际上的部长身份）的意见，辩论激烈，后来拂袖而去，根本不把那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他和那位上司，在“左联”时期就因为众所周知的两个口号问题意见不合，闹过别扭。解放后，冤家路窄，又碰到一起，并作了领

导和部下，两人心里多少总有些芥蒂、隔阂。平心而论，以雪峰的革命经历，对新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在文艺界的声望，让他当一个区区的出版社社长，似乎确实有点屈才，虽然他自己不计较职位高下，但旁人总多少有这种看法。

在编译所共事几年里，从来没看到他对人疾颜厉色，总是和和气气的。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紧张，连纸烟也是按级别等级发票购买的。我被降了五级，没有资格买高级香烟，一个月最多也只买几盒“恒大”、“光荣”烟，其余更差的烟，我也不要。烟瘾虽不大，但几盒还是不够抽的。雪峰知道这种情况，常常问我烟够不够抽？我说：烟瘾不大，足够抽的，还想率性戒掉哩。他虽然也降了级，但还够买高级香烟的资格，每逢发了烟票，买到熊猫、中华等高档烟时，遇见我总要递一支给我，当我吸燃后，他又抽出一支给我，说：留着明天再抽。我不好意思再接，又无法谢绝他的好意，我说：您也不够呀！他说：我够，还有朋友送。没关系，抽吧！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对同事、朋友的关心与爱护之情。

“文革”中，文化部大部分人马都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围湖造田。

雪峰同志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右派”帽子已摘掉，但仍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淖地里整地、插秧、割麦，他总是一丝不苟认真干，比年轻人还卖力。记得一次在冬天刨冰块地，他抡着丁字稿往半尺厚的冰地上挖，满头大汗，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说：不累。从这些小地方看，他办事认真负责、一点也不肯马虎的实干苦干精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的。

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我们早都从干校回来了。一天，我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新桥原先幼儿园的一间不很大的房间里，屋里阴暗潮湿，温度极低，好像没生火，屋里只有他和卧病的夫人，没有别人照顾他们。我们只简单地谈了谈彼此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他面带忧容，精神不佳，可能是因为他夫人的病情比较严重。我见状，不便多打扰，就告辞走了，这算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出现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朋友们谈起他来，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悼念他，为他高唱赞美歌，也为他不平凡的、坎坷的一生而惋惜。

敬爱的雪峰同志，安息吧 11994

记刘尊棋

冯亦代去年一个寥落的秋晨，我得到何老师请人打来的电话，说她挚爱的尊棋，经过长期病魔折磨之后，已经安然地走了，使我顿时全身木然，说不出半句话来，一直到话筒里传来滴滴的表轨声，才使我发现对方已挂了电话。他的去世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想不到这样快。他在久病的时候，我没有去探问他，因为我不忍见一位顶天立地的血性汉子，陡然变为痴呆认不得人；他那微弱的眼风里，似乎还是知道你是谁，就是说不出声音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惨状。人生在世，总要临到这一天，但我希望他能溘然而逝，不再留恋那曾经折磨他45年不得安生的这个无情的尘世。

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但是我的感情不让我这样做。

每当我铺开稿纸拿起笔来的时候，他那双充满柔情的眼光，便显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这个自以为泪水已经流尽的老人，禁不住潸然一片，无法落笔，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收起笔来，无言久坐在窗前。

我认识尊棋是从读他的文章开始的。我一直对国际问题有兴趣，又在香港遇到了乔冠华，在读他诗样的政论文章中，我学到了些应该知道的知识。当时在重庆读到尊棋的文章，众多的材料与精辟的分析，使我折服。我曾经多次在美国新闻处的酒会上遇到他，总要找空隙谈几句，我发现他是个感情十分细致的人。惺惺相惜，从此结下了快半个世纪的友情。

1949 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胡乔木希望我参加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在北上开会之前，曾经得到乔冠华的口信，要我等他同我见了面，再决定我的行止。我当时便把这个意思和尊棋讲了。他答应再去和胡乔木说，同时希望我也不要拒绝。后来廖承志叫我去谈筹备国际宣传机构，这一次谈得比较具体了，他说乔冠华将来主持这一工作，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闻总署所属国际新闻局由乔冠华、刘尊棋主持，我则在他们下面做行政工作。我觉得这一时期，是我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时期。从新闻总署到国际新闻局都是在解放前长期在一起工作的人，而且当时党与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泾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三反运动后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撤销，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组织虽变，人事大致照原样，除了社长改由师哲担任外，新闻处划归新华社，其他变化不大。那时领导上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我没有同意。我的理由是我是非党员，做行政领导工作不合适，私心里则想回到写作的老本行。尊棋同志和我作了次长谈，要说服我，但我总觉担任行政领导，既非我的初衷，而在“三反”运动中看到那些过火的行动，我也有些寒心。

但是为了做到听党的话，我答应代理一时，等有了党员来接替，我就回我的业务工作。后来调来了党员做主任，我就专职做出版工作了。

过了些日子，我看到尊棋似乎有心事，社里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副社长也增加了人。

逐渐我才在风言风语里，知道组织上正在审查尊棋的历史，说他是叛徒。我就十分纳闷，因为关于尊棋在解放前曾经被捕的事，我曾经和他谈过。我也曾经读过《鲁迅全集》中的文章，知道胡适曾经代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调查过当时北平政治犯监狱，他当时曾和一个政治犯用英语对话；那个讲英语的政治犯就是尊棋。陪胡适去监狱的有王卓然，他当时正在为张学良收罗各方精英，视察回去之后，便要了张学良的一张手令把尊棋带出了监狱。至于监狱囚徒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决议开除尊棋的事，那完全是在仓促和不知详情中造成的误会；因为尊棋释放的经过，狱内党支部并不清楚。关于登报脱党的启事，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防止共产党员重新为党工作的阴谋诡计，在白区工作过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一定不出叛徒。

尊棋的事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病榻上遗书，详述尊棋出狱的经过，否则时过境迁，主要的当事人王卓然又去了世，尊棋也将冤沉海底，永无翻身的日子了。他被审查之后，我们虽比邻而居，但是我非党员，所以对他们的事也不敢多问。等我再见他时，已在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了，那天宣布最后结论，我记得他和我都大哭了一场。他当然是满腹冤枉，我却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谁让我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呢。

我再见到尊棋已在 1959 年冬天。有人告诉我他已从北大荒回到外文出

版社，组织上决定他下放湖南，他希望和我见一面。但等到我去找他时，他已于前一日启程了，真是失之交臂。那时我们都是待罪之身，不敢自由行动，无处不有监视，尤其我所在的《中国文学》编辑部。我的一举一动那位女领导人都可随时得到小报告，向我盘问，加以批评。我未见尊棋，心里十分懊丧，因为我认为像他这样精于外文业务的人，中国又有几个？放到山野之地，不免浪费人才。果然他在乡间打了几年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受过“驯服工具”的教育，决不会多说话。

1976 棋的情况，当时他听了似乎没有表示什么，只微露惋惜之意。我感到有机可乘，当晚就写信告诉尊棋，要他写信与胡乔木联系。我说眼前正需人才之际，要他抓住这个机会；不久之后，他终于回到北京。

为了弄清他的问题，他经历了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时间是久了一点，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的病榻遗书，否则人证俱无，要搞清楚他的问题，就成为一件难事了。

但是我想初审者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工作搞得更为客观，更耐心，不要一下子就扯到敌我问题，也何至于要拖 45 年之久。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他 1931 年 1 月入党的决定。然而毕竟尊棋还是幸运的，在他生前就平反改正了，因此还留有若干年的风光，也多做了不少工作，使他能贡献所长，心理上得到平衡。

否则死后昭雪，事情虽好，但为时过晚了。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们的长谈。记得那是个漫天大雪的冬日，我和他从外交部参加一个会回国际新闻局，时已中午，便在过北海时上了白塔。我们二人在白塔旁边的餐馆里吃午饭。纷纷扬扬的大雪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们两人要了几两酒和几个菜坐了下来。在喝过几巡之后便各诉起心曲来。那是他首次告诉我他的历史，草岚子胡同的监狱生活就是那次谈的。当然他也谈了以后为党做的工作以及在延安访问毛主席，我也讲了自己的历史和走过的路。自从那次畅谈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他年纪比我大，我自此目他为老大哥；在我生活与思想有什么问题，便向他请教帮助解决。二反运动中，我对于有些做法颇有意见，特别对于大胆怀疑不考虑实际情况，对于有错误嫌疑的人一概视之为死不悔改，有我的看法，他那时也已见到国际新闻局的运动走了弯路，对过火的行动如逼供信扩大化等，也有所觉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认为群众运动中难免有偏差，最后党总会搞清楚的。

我当时也相信他的话，不过现在看来，这过份的自以为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实在太可怕了。

我不知尊棋在这样长达 45 年的坎坷中得到了什么教训，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轻信某一些人的话，而不相信甚至拒绝非党人士的证明呢，还是其他？45 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代价是惨重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削弱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还有那个宁“左”毋右的思想，尊棋的例子只是一个不幸中之万幸，所以我说他是幸运的。可惜我没有在尊棋生前和他谈过，然而只要办理一切案件的人能够抱着客观的对党负责的态度，许多的 45 年便会积聚成为一种力量，这正是今日提出要祥和气氛所求的。如果我们对一些事看得更深一些，事情也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但要求每个人的头脑完全站在一个水平上，究竟也是个过份的要求。

也许我的看法完全错了，但每次想到尊棋，我总会想到这 45 年对他的伤害。如果以每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我希望另外有处理的办法。

尊棋的遭遇使我想得很多，在他坎坷生活前途不明的时候，我也没少思索过，我希望现在我的想法不是白想的。

尊棋已经撒手西去了，他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人，但愿今后每个人有充足的时间，干他应干的工作。

1994

记前纱络胡同

冯亦代北京以胡同出了名，我居然在上国衣冠之地，卜居了四十多年，走过了许多胡同，但自己并不住在胡同里。刚来北京时暂住叶浅予家，那个地方叫大佛寺，一出大门便是热闹的大街。我读过一些谈北京胡同的文章，那种古老宁静的气氛，始终在我心里萦绕。后来几迁新居，都系临街，与胡同无缘。

1957 对于那几间坐北朝南的屋子，我虽不无恋栈，却也只能自叹运蹇。新搬的屋子在前纱络胡同，这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那时我正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安娜带信给我，回家时不要走错了门。

我原来的住处，有三间大房，容得我历年收罗的书籍，我想新搬的家肯定不会有原来的气派，但至少我的那些书可以随之迁徙，等我到了家，不免倒抽一口冷气，书籍何辜，也受到了株连。新居之湫隘，简直出乎意外；一家四口的住处，不过是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我的五口红木书柜已经换成三个小得可怜的书架；大部分的书都已卖给了旧书店。幸而安娜知我，几部我喜欢的中西文书籍还塞在两口木箱里，放在床下；不过他们和我的缘分，至此已到尽头。

三年困难的岁月里，都已作了口腹之资，真是罪过。旧书店员视我为一个落魄的藏书人，隔三差五总要来我家转转，问有否稀贵之书，我也趁此舍而求食。

前纱络是个曲里拐弯的胡同，路面经过多年煤渣和垃圾的堆压，已较两边屋基为高。屋子原是清时权贵的马厩。幼时朋辈每以我的姓作调侃，称我为“马二先生”，如今可真的成了马住在马房里了。胡同虽无特别显眼的地方，但到了一定的时辰，就有一定的小贩，或打鼓或吆喝，在胡同头尾巡行，倒也耳根不静。到了刮风雨雪的日子，便显得凄凉了。我的屋子后墙外便是街道，有时可以长时间听不到脚步声。

不过那几年正是喧嚣的年头，胡同里可以行人稀少，屋顶上却很热闹。麻雀何罪？忽然变为四凶之一。家家都起了吓麻雀的呼喊与鞭炮声，有时又锣鼓齐鸣，幸而这时不长。麻雀不打了又打树叶，院里有株杨树，树叶子做窝头馅儿，是那时的美食，也是救命的东西。

我那时家居养病，一清早听见邻家有人在催取牛奶，便醒了过来，晚上则挑灯夜读，直听到叫卖夜宵声过了，才熄灯就寝，真是“日出而读，夜深而息”。平时见人低头，不敢乱招呼，所以避嫌，屋子里则窗帘低垂，怕人窥测，屋门常关，连嬉笑当今的儿女，也都噤若寒蝉。这就是我蛰居胡同的现实。

以后成为摘帽右派，调了工作，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邻近胡同，但

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幽居的情趣，便成为过眼云烟了。但我总不能忘掉前纱络胡同，偶有闲时，便到那里去踟躅一番，看惯了大马路，才感到这里的寒伦与湫隘，真该随现代化而改弦易辙了。

1993

伐木日记

荒芜小序 1958 陆续续记了一些日记，约十万字。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抄走，下落不明。不料去年十一月间，有人发现了那部手稿，并承他的好意，用挂号寄还给我。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1981 高尔基写过一篇短篇，叫《二十六个和一个》。我们这次上山的129人的伐木队中，有3位女伙头军。我们的比数应是四十二与一。但实际的比数，并不如此。

象我们所知道的，吴大姐连遭巨变，丈夫病故于前，爱子惨死于后，刺激太深，精神失常，现在住在清水镇医疗所里，奄奄一息，说不定，哪一天早上，她就不声不响，和我们大家告别了。所以真正的比数应为六十三与一。

另外两位女伙头军，按照我们队里习惯叫法是徐二姐和毕三姐。徐二姐原籍绍兴，是鲁迅先生老师的孙女。名门闺秀，家学渊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编辑，写一手好剧评。这位二姐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精明强悍，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利嘴，说起话来，一句也不饶人。她的丈夫在一个驻外使馆当参赞，一子一女在第四中学读书。当她被划为右派之后，她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宣布跟她丈夫离婚，跟她子女脱离关系。她说，以后各走各的路，她绝不愿意连累别人。她就是那么一个斩钉截铁的人。不信，哪一天轮到你去帮厨，跟她一起淘上半天的大豆和高粱，你就会知道，干起活来，她的那股认真劲儿，是什么样儿的了。如果你在切菜和劈柴时，碰破了皮肉，那她会把她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关于她，有许多可写。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写不完。改天，等到大礼拜，我要跑到山背后去，拿出一整个上午时间来写她。

毕三姐是我们队最年轻的小妹妹，论年纪，她比小刘大一岁，倒数第二。但是全队不论老少，赶她叫三姐，没有半点别扭之感。她随身带着针钱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酸枣刺、野蒺藜给你拉破的棉袄棉裤缝上。有的人把破毛衣送给她织，破衬衫送给她去补。还有人身上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她做的针线。她平常不多言多语，可是她那两只黑黑的大眼睛似乎更会说话些。她在北京的一个科研机关工作，跟她一道来的人说，她自杀过，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发现较早，救治过来。那场空前的大运动，象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枝折干摧。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时期。我记得她刚来时，脸上没有多少血色。两只眼睛看人呆呆的，好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似的。她好像只跟伙房几位大姐说话，就是跟她们说的话，也是极少的。

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花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

慢慢地，毕三姐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我们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学习会一个大礼拜两次，都在星期一晚上开。实际上是走形式，开的是东拉西扯会。但是就在这个会上，我听过她两次发言，慢声慢语的，很有条理和逻辑性。

她在那个研究高能物理的机关当研究生。她的导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而且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有一天我问起那位科学家，她说，不久以前，他还给她来过一封信。

“说些什么呢？”我问。

“能说些什么呢？”她反问。“无非是叫我好好保养身体。我们和你们却不同呀！你们有一支笔，一叠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东西。处境越困难，生活越艰苦，越能写出好作品来，象屈原那样，杜甫那样。可是我们呢？”她的黑色大眼睛直瞪着前方，又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补充了一句，“可是我们呢？我们离开了实验室，什么也干不了。”“不，你也可以写。写出新的《离骚》来，新的《哀江头》、《丽人行》来。

屈原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汨罗江，杜甫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成都，我们走过的地方比他们远十倍。屈原只死过一次，我们死过九次。象我们过去那样，在零下 33 度严寒下，在辽阔的北大荒平原上，给大豆脱粒，打一班，24 个钟头；象我们现在这样，在完达山原始森林里，只要天上一出月亮，我们就上山截木头。这样的事，莫说屈原、杜甫没经验过，就是荒山老林里的猫头鹰也没见过。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小刘调走以后，队里派了小董来跟我拉锯。小董跟三姐是同事，过去和她常有来往，还到她家里去过。他告诉我三姐的妈在北京的一个师范学院中文系里当教授。

“三姐不但在她的专业方面是个尖子，中文的基础也很结实。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这种人反正永世翻不了身了。”小董这个人，据我的观察，各方面都很好，就是精神有些萎靡不振。我们多次给他打气说，瞅瞅那些大树，凡是根扎得深的，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风越强，雪越大，它越长得苍劲挺拔。但是他抱定了“永世不得翻身论”，听不进去。他的一件棉袄是全队最破烂的，有几处棉絮外露，已经被野刺扯光。三姐给他补过几次，可是实在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有一天上午，我和小董正在伐树，三姐来了，手里提了一件新棉袄。

“小董，穿上，试试合适不合适。”“这是给谁的？”小董问。

“给谁的？给小狗儿的。”三姐噗哧笑了。“看你那副样儿，简直象个叫化子。

我们从科学院来的，都替你寒碜。大家一合计，就凑了点布票棉票和钱，让我给你缝了一件。”小董愣了。

“发什么愣，还不赶快穿上。”我说。

棉袄果然做得合适。穿上新衣的小董显得漂亮精神多了。

“这布票、棉票、钱我一定照还。”小董说。

“这裁缝手工怎么还呢？”我说，“我看哪，干脆跪在地上给三姐磕个头吧。”“那还不容易，”小董一面说，一面果真趴倒磕起头来。“下个大礼拜天，我请你去清水镇吃猴头狼肉。老黄作陪。”三姐笑得前仰后台，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开心过。

“我今天来有两件事，”她笑完了说。“第一，是给小董送棉袄，第二，是要跟你们伐两棵木头，体验一下伐木的感受。我跟伐木队上山快四个月了，连一棵树都没伐过，那还象话吗？可是，我从小就害怕使用锯子。我们县城里有个城隍庙，两边墙上画有地狱壁画。有一幅画的是两片木板，夹着一个罪犯，两边两个恶鬼，正在拉锯，把他锯成两半，血随着锯齿流下来，可怕极了。后来我又看到妈妈收藏的一部明人笔记，其中说朱元璋也用那种办法锯人，不过不是竖锯，而是横锯。每次我拿起银子来，我就联想到那种酷刑。”“善哉！善哉！你是把木头当作有生之人了，这一闪念胜造七级浮屠，”我说。

“其实有些人比木头还要无知，即使你锯开他的脑子，也不会流出一滴血来。”那天上午，小董和我跟她伐了三棵树，两棵红松、一棵黄菠萝。事实证明，她是一个很细心的锯手，尽管体力比较差点。

大礼拜那天，他们果然去吃了狼肉，据说吃的很愉快。我因为临时有点事，没有陪他们去。但接着便有风言风语，说什么七仙姑下凡了，就在伙房里。我听了那些闲话，老实说，很替三姐担心，因为我们队里有一条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定，就是改造期间，一律不许闹恋爱。

有一天，三姐又来送午饭。饭后她主动跑来问我，有没有听到有关她的闲话。

我如实地告诉了她。

“你介意吗？”我问。

“我才不介意哩！”她坦然地说。“我恨不得把他们也夹在夹板里，拦腰锯断，那些嚼舌头的！”我眼前突然出现一株苍劲挺拔的红松来，它的根在丰厚的黑土里扎得更深了，它会在未来的大风雪中唱出一支更嘹亮的歌。

小客——伐木日记（附后记）

荒芜我们伐木队是个“右派”队，又被安置在边疆的深山老林里，基本上是跟外界隔绝了的。不许家属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所以在我们住区内，很难看到一张新面孔。我们平常自称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即霍乱病的译音）的虎。

但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例外。1959年旧历元宵节的中午，上山送饭的人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平凡的消息，一个小客人来到了伐木队。消息象一颗卫星在山上引起了轰动，连当天最引人的话题，晚上的一顿元宵都没有人提了。

“谁的小客人？”“吴大姐的。”“她的什么人？”“儿子。”“多大了？”“14岁。”“不是不许探亲吗？”“他的情况有些特殊。”“怎见得？”“他一家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简直是个右派之家。在学校里，他的同学

把他叫作小右派，他火了，跟他们大闹了几场。去年年底，他爸爸在八五一农场病故，他下定了决心要来奔丧。他外公外婆扭不过他，又怕管紧了，出了什么事，只得打点他到这里来。”“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吴大姐告诉我的，还有错！”“居然有人自愿跑到这么个深山老林里来，和我们这种人混在一起，可见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晚上，在工棚里，在吃元宵以前，队长报告了十天来伐木的进度以及集材、装车的问题，接着话题一转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队上来了一位小客人胡小鹏同志，希望大家好好招待。”小客人也说了话：“我爸爸死了，妈妈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家。我到这里，不是作客，是回家。我是个学生，到哪里，都得学习。希望伯伯、叔叔、阿姨们帮助我学习劳动，学习各种知识。”所有的人都拍手表示了欢迎。

小客人面目俊秀，很象他的妈妈。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讲话不多，但有分量。

总之，是那种容易引起人们好感的小伙子。他被安排在老晁原先住过的铺位上。晚上，他妈妈和伙房的两位女同志也来问这问那，于是在他的周围，便响起了笑语之声，活跃了工棚的空气。有人看见吴大姐手里还拿着针线活，问她忙些什么。

“小鬼哪里知道这里冷得厉害，以为北京用的棉帽子棉鞋，一样可以在这里过冬。我只好帽子上给他缝几块皮子，挡挡风。看来，大号棉胶鞋也得买一双。”“让他也帮帮你的忙。”

“是的，是的，队长说了，上午让他自修。我们各种专家都有，将来让他自拜老师。中午跟着伙房的人上山送饭，下午帮着伙房打打杂，劈点劈柴，决不能白吃公粮。”“听你说的，咱们这一百来条大汉，每人每月还有二百大毛，还能养活不起一个小伙子吗？”以后，他果然上山来送中饭了。吃饭时，我们大家都聚在一处。饭后还有半个钟头的休息。一天，就在我灌开水壶的时候，他和我闲聊起来。

“你是黄伯伯？”“你怎么知道？”“妈妈告诉我的。我见过你。”“在哪里？”“在我外公家里。”他外公是个书法家，爱收藏字画。我跟他同事，每当他收到名家作品，就找我们去观赏。由他外公又谈到当时常去作客的几位老先生，他都有印象。

“我妈妈还要我拜你做老师呢。”“学什么呢？”“学写文章。”“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是因为写了文章才到这里来的。我说与其学写文章，还不如学伐木。”又过了两天，还是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他坐在一根横躺着的枯木上，正向摊在膝头上的一本大册子上写什么。我轻轻走到他前后。原来他是在画画。画面上是一个中年妇女。我在他身边坐下，仔细一瞧，才知道他画的是他妈妈。她坐在伙房门口削土豆。阳光斜照在她脸上，显得神采奕奕。生活的艰辛虽然在眉梢眼角留下痕迹，却掩不住发自内心的善良与耿直。

“画得很好。不太象，但是画出了她的精神。”他抬头对我微微一笑说：“我每年给她画一张，这是第八张了。”“那么你已经学了8年了？”“是的，我六岁就开始学画了。我喜欢画人，我更喜欢画我理解的人。”“可是，小鹏，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可不那么容易。有时也许要用十年八年的工夫。”“但是，也有这种情况，一个陌生人，素不相识的人，他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下子就打动了你的心。怎么说呢？你喜欢的人你就想多加了解，你越了解也就越喜欢。”我问他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他说：我相信

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同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谁都愿意和好人生活在一起，到这来，就是对妈妈和你们的一种信赖。

离我们住地 25 里路，有个清水镇，镇上有有一个澡堂，一个小饭馆。碰上大礼拜天（十天一休），我们常去洗个澡，吃一盘野味，野猪肉，狼肉或熊瞎子肉。路上他拿他的新作给我看。

“这是我上月画的一张。”老场景，还是伙房门口那块小平地。后方是堆好了的两大堆劈柴，前景左方是一块大石桌，桌前斜倚一把大斧。劈柴人坐在石桌右边一张矮椅里。他仰着头呆呆地频视远方，右手里夹的一支卷烟已经快烧完了，但还在冒着烟。

“简直是痛苦的化身。这是谁呀？”我问。

“他的原型是杨子山伯伯，你知道他的事吗？”我摇了摇头。

“杨伯伯和她的爱人感情很好，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已经进了小学，她爱人在一个外事机关工作，机关近来一定要她划清界线。我和杨伯伯连铺，我常常半夜醒来，看见他瞪着大眼睛瞅屋顶。”“其实对方也是出于无奈啊。”

“这一点杨伯伯倒很能体谅她。但是我还是要说，为什么非要苦苦折磨好人呢？这不就是株连九族吗？”33 前还从妈妈那里要了一个大饭盒，说是要带两条大鲫鱼给她吃。晚饭时，所有的外出的人都归了队，只不见他回来。天黑下来了，仍无消息。大家觉得不妙。派一个小队拿了电筒，打着铜锣，连夜上镇去找。据说他确实洗了澡，也买了鱼，以后便不知去向。又过了两天，一个打猎老汉来到队部，他说他在东南十多里外一个山凹里，发现了死者的遗骨。衣服都撕成了碎片。只有一顶帽子完好，他带了来，果然是小鹏的。据老汉的推断，小鹏在归路上，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吴大姐从五号夜里，便神志不清。她好像变成了傻子，突然老了十年。六日上午，人们让她坐在伙房门口小平地石桌旁边矮椅子上晒太阳，她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说，不笑也不叫。给她吃她就吃，给她喝她就喝。但过了不久，就昏迷过去。当天下午，队部就用担架把她送到清水镇医疗所去了。

让伐木者醒来

舒芜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 1958 年 9 月至 1959 年 3 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 10 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 1983 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

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全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写一个 129 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 56 个人中的几个人，以及全队仅有的 3 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 55 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 102 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

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 30 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黑、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伦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塞，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

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

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棵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截材时被擀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 56 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 9 点干到 11 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擀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顾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他们有一个 14 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然后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之前的 10 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小刘的妹妹考上了大学，因为小刘是“右派”的缘故，被刷了下来，小刘愤慨地说这是“罪及妻孥”。所以不少“右派”的夫妻儿女，为了不受连累，赶紧脱离关系，也有的“右派”主动同丈夫或妻子离婚，同儿女脱离关系，使他们免受连累。其中也有“刽子手”那样的，离婚时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男不重婚，女不再嫁。

“刽子手”终于在北大荒得克山病死了，死前托付难友，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刽子手”还有一位半残废的老母，

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王大化的妻子早已逝世，撇下一个小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大化来北大荒，便把读小学的孩子托给她大姨妈照管。王大化在伐木队接到一封电报，孩子在校门口给一辆卡车碾死了。睡在王大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睡梦中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尤其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是，《伐木日记》中有题为《家信》的一篇，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写给女儿的一封信，详谈伐木队的生活，尽管掩饰不了那些血和泪，还是尽量往好处说，例如说到每天伐木劳动中在山上吃的饭：“主食一般是高粱米饭或窝窝头，菜是汤菜，每人一碗萝卜汤或白菜汤，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加上饭菜都煨在柴火堆上，非常热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多。我现在吃高粱米饭，一顿3大碗，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结尾处忽然提到女儿所爱读的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说自己现在也和万卡一样，深夜在写家信，但是，“他的信是写给爷爷的，我的信是给女儿的；他的信是一封诉苦信，诉说所有的人都打他，饿得要命；我的信却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许打人，伙食虽然差点，但还是管饱的。”这都是尽量往好处说。又说：万卡不愿在城里学鞋匠，想回到乡下去，一旦冰化雪消，他就可以打赤脚走回去；“我们要想放下目前的活计，回到城市，搞各自的专业，现在看来，还不那么容易。”这也是把绝望说得缓和一点。他笑万卡太糊涂，连个地址都不知道写，这笑里面饱含着同情的泪。他希望他这封信平安到达女儿手里，希望女儿对弟弟妹妹念这封信，并且找出《万卡》一起念，问问他们，谁的信写得好些。信的最后，特别感谢女儿亲手做的棉裤。凡是读到这篇《家信》的人，心里都会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信为什么只能写给女儿？为什么只能由女儿对弟妹们念信？棉裤为什么只有由女儿亲手做？信中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女儿的妈妈呢？这些“右派”及其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右派”们都是大坏蛋，活该受罪；恰好相反，吴大姐的儿子胡小鹏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起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孩子的盲目信赖，事实上，这里就有小朱，和别人锯树时，大树突然倒下的一刹那，他舍己救人，砸断了一条腿。有小刘，每天下工，他总是抢着独自我枯木，不让年长的那一个扛，快到住地了，才让那一个合扛着回去。有孙二姐，精明强干，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刻薄嘴，但是你给她帮厨时，如果功菜劈柴碰破了皮肉，她会把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有毕三姐，随身带着针线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你身上荆棘扯破了的棉衣缝上，有人把破毛衣送给她重织，破衬衫送给她补，还有人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针线。她看见小董穿得实在太破烂，不成样子，便悄悄地和几个难友凑了布票棉票和钱，买了布和棉花，由她缝了一件合身的新棉袄给小董。还有她自己并不抽烟，看见抽烟的人没有烟抽时，抽茶叶末、干树叶，把喉咙都抽肿了，她便到处搜集香烟头，重卷成一根根的卷烟，送给没烟抽的人。也是她，一被划上“右派”，便主动和丈夫离婚。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很简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自己要自由就得首先给别人自由。”他们每人每月只发32元生活费，逢到难友们家庭有特殊困难，例如甘益生的老母要动脑内淤血清洗的大手术时，他们就慷慨捐钱出来贴补，像往年募捐贴补老赵的家属一样。还有老宋，隐姓埋名，按月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寄给朋友的朋友的孤儿。他们并不只是在难友之中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小杨有一次下山背米，粮店邻家失火，快要殃及粮店，小杨爬上屋顶救

火，头脸和手臂都烧伤了，事后粮店送感谢信到伐木队，表扬他的见义勇为。“刽子手”一次背粮回队的路上，将要过弓背岭时，见到祖孙二人也要过岭，孙子腿上生疮不愿爬山，祖父又实在背他不动，“刽子手”自己已经背了50斤粮食，二话没说就把孩子背了起来，过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他一路又说又唱，百般哄着孩子，过了岭临分手时，小家伙搂着他的颈子直叫“大爷”，尽管他生得那副模样真像个刽子手，有人说小娃娃见了他都会害怕的。

这样一些好人里面，也混杂着个别的败类。像那个姓樊的，大家给他取绰号“樊摇头”，并不是因为他爱摇头，而是大家一提起他就要摇头。此人是个打小报告的专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闻必报，无闻捏造，惟恐天下不乱。还有那个近视眼，他连别人看《纲鉴》都打在小报告里。还有那个罗圈腿，本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为人能说会道，来北大荒后，在“右派”劳动队里，逢年过节，组织个晚会什么的，照例由他奔走张罗，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人拾到他的一个笔记簿，才发现上面全记着别人的“反动言行”，为他告密的材料。但是，十篇《伐木日记》里，在这几个人身上只用了少的笔墨，事实上这几个人也很孤立。连王大化拾来的猴子“大圣”，也是每次见了樊摇头，就对他撅屁股，（这是淘气鬼小王教的，）所以全工房的人宠爱的“大圣”，只有樊摇头把它恨得牙痒痒的，他终于找了机会偷偷把它吊死在树上了。《伐木日记·大圣》写到大家发现“大圣”失踪的真相时说，“于是一切都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摇起头来。”这一结非常有力。在惨死的“大圣”的尸首前的所有人的一起摇头，是对樊摇头的有力的谴责，也表明这里还是好人多，他们道义上的一致否定所产生的力量，不是个别丑类所能抵御的。

是的，他们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并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有一个“右派”，没有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籍，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话累活全得由他去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听说北大荒这里的“右派”们彼此彼此，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前面说过的王大化的唯一亲人小女儿在北京一次车祸中遇难，王大化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也断了之后，有一天他下工回来的路上，拾得一只受伤的猴子，他便用了慈父慈母一样的爱来医治抚养这只猴子，整个工房的人也都把它当作宠儿，给它命名为“大圣”，“大圣”也给王大化、给整个工房带来了安慰和生气，后来竟至于可以放它自由跳入森林游玩，只要王大化呼唤一声它就回来了。伐木队有一条硬性规定：不许谈恋爱。但是，硬性规定往往行不通。年轻漂亮热情助人为乐的好姑娘小毕（毕三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借口作针线活来找她，她本不想搭理，可是看到他们那副破破烂烂的样子，又不忍心驳回，还是有求必应地替这个缝，替那个补。而她的心却已有所专属，她爱着的就是那位见义勇为、救火受伤的小杨。小毕初来伐木队时，成天呆呆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但是，正如《伐木日记·女伙头军》里说得好：“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都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豹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

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树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慢慢地，小毕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会上敢发言，平时敢欢笑，也就敢于恋爱，敢于冲破不许恋爱的硬性规定了。所有这些，包括猴子的人性化，都是人性的胜利，有人在，就有生命和爱情在。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尤其严酷，常常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前面已经说过，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木头碾死，吴大姐的儿子被狼吃了，生龙活虎的“刽子手”得克山病死了，小褚的腿被砸断了。此外，那位坚强的吴大姐，挺住了丈夫死亡的打击，仍然每天工余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可是不久儿子又被狼吃掉，她一夜之间突然老了 10 年，人们让她坐就坐，不动不说不笑不叫，给她吃就吃，给她喝就喝，终于昏迷过去，被抬到附近小镇的医疗所，奄奄一息地等死去了。还有人总算离开了伐木队，死神仍然没有放过他，就像那个小刘，学气象的，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打成“右派”，在伐木队里最年轻，才 21 岁，总是有说有笑，跟谁都乐呵呵的。晚饭后他总是点起松明子，正襟危坐在床头读各处借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他还能背诵许多长篇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诗歌内容发表许多评论。他终于因为是学气象的，有一技之长，上调到一个小县里当气象员。他给伐木队的难友来信说：那个气象站虚有其名，连起码的仪器都没有，他只好在县小学里教几点钟算术，住在一座破庙里。荒芜给他回了信，两个月后，信退了回来，上面批着 8 个字：“此人病故，退回原处。”当然，成千上万的“右派”还是死不绝的，正如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过：被木头砸死的，被野狼吃掉的，病死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肯定会活下去的。他们二三十年后回顾生命中这一段时，肯定会发现这一段希奇的、独特的、真实的生活是丰富的宝藏，他们中有各种文艺人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留下一个时代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像吴大姐，像“刽子手”，都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刽子手”还为此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临死前仍然把日记交付给难友。荒芜自己就写了约 10 万字的日记，他还有计划地每天找一个难友聊天，聊他的家庭、事业、理想和苦恼。这些其实都是为将来的作品储积素材。荒芜鼓励小毕道：“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的划时代作品。”荒芜这是在对历史对生命作出了豪迈的诺言，他写出了《伐木日记》，就是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动手写《伐木日记》，是在比“反右”更大规模的“文革”大苦难之后，表明了他的历劫不磨的决心。可是，为什么他又只写出了 10 篇，没有再写下去呢？我曾经几次问他，都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荒芜最后几年，干脆陷入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朋友们都不知道他这样的确切原因，大家为他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现在又是人天永隔，同在北京的朋友得到他的噩耗时竟已在遗体火化之后，遗言有“但求安静”之语。《伐木日记·家信》中说到老晁被砸死，就地草草埋葬时，有这样几句：“一个人死了，就应该把他忘却，不让他成为生者的累赘。如果有一天，我也给木头砸死了，埋在这里，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对我。”这与“但求安静”的遗言是一致的。我作为老友，应该遵守他的遗言。但《伐木日记》写的是生命怎样通过苦难死亡而行进的历史，这是不应该忘却的，所以我把它介绍一番。我的拙笔难胜转述之任，所以我几乎全是抄它的原文，以存原文之美；不过把十篇打通，重新编次组织一下，以见其所反映的已经相当全面，稍补《广

陵散》一曲未终之遗憾而已。

聂鲁达有名篇题曰《让那伐木者醒来》，兹即借以为题。

1995（选自《麻花堂外集》，荒芜集，1989年8月版）

床虱[1]

黄苗子

[1]查《辞海》，臭虫一名荐蠹，一名床虱，以《臭虫》做题目，老伴嫌太俗，荐蠹这个怪名没有人懂，因以《床虱》为题焉。

我这个人虽不算绝顶聪明，可一般也不太傻。比如说，看了敦煌壁画中描写一个王子因为看见老虎饿得要死，就自己跳下岩去“舍身”，用身体喂饱了那饿虎的事，至少我是不愿意干的。因我还从未遇到一个三岁娃娃横过火车正在驶来的铁轨这一瞬间，所以我还无从考验我有无勇气扑过去推开孩子，自己“舍身”在火车下那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精神。

我之所以不想“舍身喂虎”，是因为从小就知道老虎是“坏人”，它吃人，除了把它关起来在马戏班表演、哄哄孩子之外，老虎对人一无是处（当然你如患过风湿症，你会说虎骨酒还有点用处，可是那不是活的老虎）；而救孩子呢，那你可以举出十百种理由，虽然你当时想的，可能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感情。

在我的一辈子中，我也曾有一个时期做过那王子所做差不多的“慈悲”的、愚蠢的舍身行为。但那不是我自愿的，而是十分无可奈何的一种大慈大悲。

也就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我被投入四面是墙，门口站“警卫员”的所在。“警卫员”，这里需要略加说明：他们并不是为了我去“警卫”别人，而是别人派来“警卫”我的——我只是被“警卫”的对象。

最初，我以为这个所在只是我一个人活着，铺板、铁窗，全是死寂东西，太寂寞了。可是天黑之后，我始而彷徨，继而恐怖：“还有我们！”“我们！”“我们！”……诸位，我遇到的不是鬼（鬼不是活的，不可怕。），我听到的不是声音，而是巡回在我的胴体上的爬攀动作，原在这个密不通风的小小地带，除我之外，还生息着无数生灵，它们是——臭虫！

臭虫，我以前也见过，我不应大惊小怪，但是你尝过成千上万臭虫永无休止地向你一个人袭击的滋味吗？不知道因为我是“要犯”而把我隔离，还是因为我是“嫌疑犯”而对我优待，总之我是一个人一个单间。据说这里的铺板是睡六个人的——换句话说：应当由六个人分担的被“吃”，现在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了。古时候祭把大神的牺牲，还分别由马、牛、羊这躯体庞大的“三牲”来献享呀，何况牺牲还是早已宰割过，早已没有知觉了的呢！

明知道“古人韩愈写了《祭鳄鱼文》就起到了驱逐鳄鱼的作用”，这是彻底的撒谎，因此当时，我也不想写《祭臭虫文》。

我无可奈何地、一天一天地熬下去，正象元曲里说的，“消瘦了沈郎腰、潘郎鬓”！但我却意味不到臭虫在我身上，每晚到底吸去多少血。

然而我到底不是一个彻底的消极主义者，我那时天天在读经典著作，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及“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等唯

物主义法则，于是我就运用到臭虫身上。

我起初发现，把臭虫按死在铺板上是百发百中的，可是它在墙上爬，你有再大的本领还是难于逮住它，你明明看准了，用指头往下一按，结果是一——不见了！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和观察，我才发现臭虫的脚原来跟壁虎一样，在立面上爬行时能够用足趾吸附在物体上，但当它感觉到受袭击时，便立刻弹跳到地面去，你就无从按住它。当我意外地发现这个秘密时，我随后就用右手承堵在下面，然后用左手中指按到墙上，这一来，我的敌人就乖乖地跳入我的右手掌中。

臭虫一般不在床板面上做巢，而在底部，它发现这样更安全些。你不要以为臭虫的喙只能插进人的柔软皮肤里吸血，不是的，它比钢钻还厉害，能够把床板、墙壁啃出很深的窟窿和沟缝，它们的“住宅区”，就是凭这张铁嘴一口一口地啃出来的。当我发现床上和墙壁上，臭虫在那里挖洞产卵时，（一个母臭虫一年产卵三、四次、一次就产卵 50 枚！）我曾经用饭粒和窝窝头封堵住那些洞，但第二天，轻而易举地就被它们搬掉了。

那时我真感到遗憾：第一没有昆虫学的基本知识，第二，缺少观察和培养臭虫的科学仪器，因此我无法完成一篇对生物学界具有重大贡献的科学论文。不然；我今天也许已成为生物学博士。

按照我当时的身分，是无法向我的“警卫员”提出消灭臭虫的强烈要求的。但大约一年半以后的一个夏天，当我拖着如柴的瘦骨（现在，朋友们都承认我是个“老胖子”）“放风”回来之后，发现房内充满敌敌畏的气味，我知道这是开了恩，第一次用药杀臭虫了。

但是当我俯身一望，床底下凝聚了一大摊血和无法计数的臭虫尸体，我立刻感到心情不怎么舒畅，这是长期积聚下来的，我自己身上的血！谁不愿意把鲜血献给应当献给的地方呢！

最近，看到一个画家朋友画的一本以动物为题材的画册，有一页他画了一个臭虫，却幽默地题道：臭虫——“先生，杀死我，不可惜你的血吗？”我当时即欣赏这句子的智慧，但心头却似乎泛起一点“山抹微云”那样的轻翳。

遗嘱

黄苗子一、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约定，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做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对我的人“忽发慈悲”，在公共场合或宣传媒介中，大大地恭维我一番，接着就说我生前与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对他“推崇备至”，他将誓死“继承我的遗志”等等，换句话说：即凭借我

这个已经无从抗议的魂灵去伪装这个活人头上的光环。那么仍然引用郑板桥的那句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此外，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觉的尸体去嚎啕大哭或潜然流泪，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对着别的尸体痛哭，我管不着，不在本遗嘱之限）。

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

三、我和所有人一样，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旧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浪费。顺便声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张裸体主义。

流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下决心叫人对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种仪式。

我的朋友张正宇，由于“告别”时来不及给他戴上假牙，化妆师用棉花塞在他嘴上当牙齿，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一闭目就想起。因此，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即使只让我爱人单独参加的遗体告别。

四、虽然我决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都把尸体献给医学院，以免存货过多，解剖不及，有碍卫生。但如果医学院主动“订货”的话，我将预先答允割爱。

五、由于活着时曾被住房问题困扰过，所以我曾专门去了解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才知道骨灰盒分30元、60元、75元……。按你生前的等级办事，你当了副部长才能购买一百元一个的骨灰盒为你的骨灰安家落户，为此，我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作为我临时的“行宫”。这并不是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倍形亲切，本是好事。但有人认为骨灰是优质肥料，马桶里冲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

此嘱。

庄周说过一个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人志趣相投，都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户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礼节的子贡去他家帮着筹组治丧委员会。谁知孟子反、子琴张这两位生前友好，早已无拘无束地坐在死者旁边，一边编帘子，一边得意地唱歌弹琴：“哎呀老桑头呀老桑头，你倒好，你已经先返回本真，而我们却仍然留下来做人。”子贡一见吓了一跳，治丧委员会也告吹了。急忙回去找孔头汇报。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听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点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画了个框框，然后指着子

贡说：“懂吗？我们是干这个的——是专门给需要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

他们这两个可了不得，一眼就识破了仁义和礼教的虚伪性，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圈套都不值一笑。不过你放心，人类最大的弱点是懒，世世代代安于在我们的圈套里面睡大觉。而这些肯用脑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却被人目为离经叛道，指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无事生非的傻瓜。他们的道理在很长时期仍将为正统派所排摈的。子贡，放心吧，我们捧的是铁饭碗，明儿个鲁国的权贵阳货、季桓子、孟献子他们死了，还得派你去组织治丧委员会。因为再也没有象我们孔家的人那样熟悉礼制的了。”（大意采自《庄子·大宗师》）以上的故事讲完，想到自己虽然身子骨还硬朗，但人到了70岁，也就是应当留下几句话的时候了，于是写《遗嘱》。

长歌行·读舒芜《让伐木者醒来》[1]

黄苗子读舒芜《让伐木者醒来》奇文不可读，读之盈襟泪：往事不堪忆，忆之肝胆碎。去年已闻荒芜病，不意夙如殉星坠。掩卷怕看舒公文，此文铺天盖地横风骤雨，一似半夜蛟龙呻！当年我亦北大生，生幸不死死微尘；欲遣巫咸叩帝阍，黑奴吁天天不闻。不幸生，不促死；“投之有北”常事耳，祖龙之坑亦如此。当年我亦北大徒，浑浑噩噩生死途，日记白写焚无奈，文献无征愧荒芜。当年子弟江湖老，我老江湖徒懊恼，小妻宝马遍官街[2]，独不见荒芜坟上草。完达山，雪如银。啾啾鬼哭天惨昏，幢幢绰绰游冤魂。

祖龙之坑平如砥，诸儒地下埋千纪，伐木之人醒何俟，太息“陈陶十万良家子”[3]！

牡丹江水流，密山山气浮；手持《惠特曼》，肩扛沉木头，芜魂今大荒，啸傲归兹丘；迎汝者谁？老晁、老子、吴大姐与胡小鹏，撅臀“大圣”欢且踰，一曲《森林》广陵散，“刽子手”来歌《卡门》[4]。黄泉浊世孰凄苦？屈原比干竟何许？风光北国此“多娇”，恰称诗魂来此土。我昔服役兹山麓，饥肠羸骨支肿足，最是荒唐李景波，开荒要种红烧肉[5]。我歌声竭谁复怜？众伐木者终长眠；抉目国门，子胥呼天。君不闻，先君去者聂绀老，曾问“我是何材值几钱？！”1995（选自《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

[1]舒芜《让伐木者醒来》，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内容介绍荒芜的《伐木日记》，兼悼逝者。

[2]“小妻”，二奶的古称；“宝马”，名牌车也。

[3]借杜甫句。

[4]“迎汝者谁”以下，均《日记》中的人物、故事。

[5]李景波当时语人：“眼看大伙嘴馋，想种几亩红烧肉，给大家过个瘾。”

牧丁和我

魏荒弩听说，诗人牧丁死于十年浩劫。他是怎样离开人间的，我至今仍然一无所知。

又不便多去打问。其实，自 50 年代中期断绝来往以后，我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每一忆及，便为一种怅惘之情所困扰。

最后，偶然翻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卷第二集，像久别重逢的故人，我又惊喜地读到了牧丁的诗篇。从此，牧丁早年的身影总是闪现在我的目前。往事历历，一时引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与牧丁结识（其实是建立通信联系），大约在 1940 年前后他在成都主编《诗星》的时候，距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起初是给《诗星》写稿，这是一个篇幅不多的 32 开小型诗刊。撰稿者间或有一二位名家，其余多半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虎虎有生气。后来，他得知我译的长诗《爱底高歌》（德·蒂奥·蓉格世界语原作）在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发表，便写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长诗列入他主编的《诗星丛书》出版，并声明不付稿酬，仅赠样书二十册。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我当即去信表示同意。从此便书信不断，建立了友谊。继而他又把蒂克的诗集《小兰花》列入《诗星丛书》（1942 年），蒂克当时的在昆明，经常与我谈起牧丁，对他也颇具好感。1943 年，我与晓崧合编《枫林文艺》，他曾不断寄稿来，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我们虽未谋面，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朋友热诚坦率，是一个颇为相得的朋友。

1945 此，千千万万的亲朋好友失掉了联系，纷纷奔赴自己向往的地方。我与牧丁也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待到我们相见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 1954 年春天，苏联专家伊·萨·毕达阔夫来北京大学讲授《文艺学引论》，在中文系开设进修班。授课教师中，还有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和钱学熙教授。参加进修的，除本校有关教师、研究生外，还有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派来的文学理论教师和研究生，总共也不过二十来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南开大学的顾牧丁。真是意外的巧遇！我们这两个长久通信的老朋友，终于在北京大学见面了。更巧的是，我当时的寓所在旃坛寺后面的府藏胡同，而他的家则安在地处地安门西大街的妇女干部职业学校——他爱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两地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因此只要彼此得闲，便时有往来，谈天说地，颇以为乐。如此过从，大约持续了一年光景。

牧丁，苏北人。中等身材，架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总洋溢着笑意，生活简单朴素。第一次接触，我便发现他十分健谈，心直口快，有话从不藏掖掖，比我想象的还要率直，遇事爱发议论，爱作不平之鸣。他自幼家道贫寒，放过牛，所以后来取名“牧丁”，偶而也用笔名“朱实”。他只读过小学，但一生刻苦自修，发愤读书，矻矻孜孜，终于学有所成，跻身于大学教师的行列。抗战时期，他一直在成都的一些中学教书。1947 年参加民盟，解放后曾到华北革大学习。1952 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曾开设“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选”等课，颇得系主任李何林的赏识；同时由于工作上积极肯干、政治上要求进步，曾被评为“模范教师”。他一生不嗜烟酒，酷爱读书、买书，以至广为搜集。这一习惯，就是在他一生苦学中逐渐养成的。比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搜求保存了大后方出版的大量文艺书刊，一种种一套套，应有尽有，几乎是完整无缺。他曾经自豪地对我说，他拥有的抗战文艺书刊，整整塞满了他南开寓斋中的 6 个大书架子。并表示有朝一日要利用它写一部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况或新文

学史。

牧丁本身就是诗人，曾写过不少好诗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又是《诗星》的主编，对当时诗坛的情况了如指掌，交结了不少诗人作家，曾不厌其烦地跟我谈论艾青、田间、阿垅、鲁藜、绿原、谷风（牛汉）蒂克的诗。可以看出，他赞赏“七月派”，而他的诗其实也酷似“七月派”。以他对诗的执著热爱和对诗的钻研理解，加以他的卓越口才，我想他的“中国现代诗选”课一定会讲得有声有色。怪不得他的这一门课曾在南开受到学生的欢迎。而在当代诗人中，他对常任侠的中文修养最为欣赏，曾一再对我称赞他文字之洗练，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凡是常老的作品，不论是诗还是其他学术著作，他都一一买来阅读、珍藏。当时说着，便从案头拿过新购得的精装巨著《汉画艺术研究》，指着序言让我看，啧啧赞叹不止。

凡此种种，均可见牧丁平日审美情趣之一斑。

1954 严厉的批判，自然也在话题之内。在这方面，他比我知道得多，我多半只作为一名听众，但我们得到的共识则是，胡风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从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一向信奉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追随鲁迅先生。按说，进入新社会他理应是很愉快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竟会遭到那么巨大的痛苦，陷入那么艰难的处境。但当时由于我们对新社会的信赖，便总是把这一有历史渊源的文艺上的论争，归结为某些个人之间的恩怨，如此而已。但在这里也要如实指出，即或在这种私下议论的情况下，我们对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也并无任何的不逊或不敬之处，遑论其他？！

1955 先后发表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批材料之后，全国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等到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牧丁和我就先后被隔离、抄家了。寻思横祸之来，主要是由于我们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率直。牧丁，虽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所理解，平日言论也较多，但就揭发的材料看，也不过是“宣传”了“到处都有生活”、“主观战斗精神”等早已不成问题的一些学术性问题；而我，主要是与牧丁和牛汉是朋友、有联系，并于牧丁事发以后，在答复一个负有“使命”的外系学生提问时，说过一句老实话：“胡风在重庆时期，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进步文艺理论家。”所谓的“胡风分子言论”，主要就是这些。牧丁是全校两个“要犯”之一，我则仅限在系里审查。因此他比我受的折磨更多，时间也较长。但不久都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们虽被隔离，但我却能从每天清晨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如抗战时期他即与方然、阿垅、绿原有联系，解放后仍与阿垅有来往等等，但均不足以说明牧丁有“反革命”的事实。至于说他曾在“中央干训团”任职等等，我既未听他本人说过，也未听到别人提起。何况这又出自那样狂热的喇叭，那就更是非我所能尽信的了。即使果有其事，又将如何？历史也只能说明过去。牧丁解放后的主要政治表现是“模范教师”。在那一段被隔绝的受难的日子里，记得我们也有一次巧遇：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夏日早晨，在我用过早饭的归途中，只见他被人带着，头发淋湿，光着双脚，在雨水中哗啦哗啦地走着。紧蹙眉头，目不斜视，低头向食堂走去，活脱脱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这一幅雨中押解图，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中，永生难忘。

我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便已审查清楚，回到了备受惊吓的家。牧丁，则拖了大约有一年之久。他不能回南开了，只好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好像等了很长时间，后来高教部让他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他一拖再拖，终于还

是到了郑州，但很不情愿。从此三十多年来，天涯睽违，形同陌路，再也不敢互通音讯了。前者，他因工作调动，一再趑趄延宕，从而侥幸躲过了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劫难：“反右”。

但到了“文革”，我想这一回他是插翅难逃的了。果然，“四人帮”就擒后不久，就传来了牧丁惨死的噩耗。终年，估计也不过 50 开外，正是年富力壮、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生存和工作的权利，怎不叫人悲痛？！

我和牧丁，友情本属一般。但因同涉那一株连最广的文字狱案，又因一同“偶语”而获罪，仿佛一时成了休戚相关的患难兄弟。今天我来为文纪念他，自然也在叹惋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戈戈微言，于事又有何补？：1990

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祖光“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

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

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

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吴祖光“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

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怎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

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敬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欠账

吴祖光新凤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 111 篇，约 50 余万字。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 13 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 1977 年开始，至今约为 13 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烦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然而偏偏横遭不幸，最终迫害成病，落得半身残疾。这就是新凤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也由此而生。从 1957 年春天地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 1975 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

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她大可列入异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阅读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作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

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比美。

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那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记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

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 10 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凤霞，其它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博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佚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书，行将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而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座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 50 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作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地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苦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

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大书，可以想像，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

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文，给我一个机会谈谈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疚。歉疚亦就是“欠账”吧？凤霞受的苦是我害她的一——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为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际，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0

从“1957”年说起

吴祖光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近代的中国，从百年前的满清、北洋政府、国民党……一系列愚蠢无能、对外屈辱、对内镇压的当权者害苦了中国善良无辜的人民群众，百余年陷国家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刻，蒋介石居然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发动内战。我的青少年、到成年进入自己的事业发端的时代饱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岁以后开始结识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进步力量，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有了转机，有了脱离苦难的希望。于是我不再迟疑地进入他们的行列，使我从1937年20岁的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便认准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她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前途无限光明，必然战胜当时已经十分腐朽的国民党，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时我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在日暮途穷日本投降后的上海开始作报纸副刊的主编工作，并且在上海连续编写新的话剧剧本对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落后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终于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之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做起了电影编导的工作，并且在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两年中我最为萦绕于心的还是祖国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国民党的崩溃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乌云散尽，中国出现了光辉的太阳，百年的奇耻大辱一旦洗雪。虽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给我优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匆匆结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轮回大陆，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然而那时还没有空航，通过尽可能的关系，才买到了船票，紧赶快赶，终于赶到祖国大陆；然而10月1日北京的开国大典已到，海轮靠岸才到青岛。新中国建国大庆我是在青岛参加的，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剧本写作，我始终认为电影导演太过烦琐，杂事太多，我一心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写作，不受别人、更不愿被别人管束。我在香港两年做电影导演的目的是为了熟悉一下电影，为以后写电影剧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全中国则是怀抱无限的感激之情，也确实尊重我当时的领导。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谈我的今后工作任务时，和我谈话的是当时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女士，她是局长袁牧之的夫人，这两夫妇在以前的中国左翼电影就很有成就了。见面之后，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愿做电影导演，但波儿立刻对我说：“当前我们所缺的就是导演，譬如说某某人，过去根本对电影从未接触过，刚从延安进城，电影不过只看过几部，现在不是已做了导演吗？何况你已经在香港拍过四部电影，很有经验和成就了；请你做导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务已经定了，先去拍一部纱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我吓了一跳，摇手说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儿说：“任何事物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现在就应开始去工厂体验一下生活……”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认识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么也没有预料到，我突然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当然，半年之后，我自己就看见这部《红旗歌》是一部到半个世纪后我想起来便满面通红，惭愧无地的影片。

然而，我对于共产党还是满怀敬爱感激之情的，这首先是驱除了我青少年时代萦绕难休的满腔忧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憎恶。我的工作既然是出于国家的需要，也就是这样接受任务吧！但我对这个任务始终是勉强的，情绪不高的。

手边的工作不是十分紧张的，加上对于别来多年的北京有无限离情别绪；我在同事朋友之中是一个常常领着同志寻找失去的记忆的向导。此外就是关心家里的老亲和对自已的小家庭作长久建设的打算，我首先用两年在香港做电影工作挣来的钱买了一所有十八间平房，位置又在东城繁华地带的舒适的四合院。把年迈患病的父亲和高年的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的职务早经我的劝告辞去，现在便由我承担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了。1954年全家从南方迁来，第一件事我就是动员父亲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我对父亲和母亲说：“我家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腐朽的统治，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看到了近百年来、真正爱国、真正廉洁、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历经劫难收集到的一批珍贵文物，又多年卧病全依靠母亲和弟妹们的辛苦收拣保护，从北京到南京辗转回到四川再回南方，运回北京。不应该留给孩子们继承，我想最好是献给国家。”父亲点头。第二天我便打电话通知父亲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识的老伯、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到我家来，尽可能地请他们一一鉴定，看了两三天才大致看完，两人都对我说：“真是珠玉满堂，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不知你家想要国家出多少钱收购？”我当时就回答说：不要提这个，我的想法是全部捐献给国家。”父亲那时由于右肢中风瘫痪，说话十分吃力，但听觉尚可，听我说完只是连连点头，而且满面笑容。因为捐献的话我根本没有同父亲商量过，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弟妹谈过，远在台湾的长姐也全未与闻。

由于我离家日久，这批文物跟着父亲的踪迹，搬迁多次历尽辛苦，都是母亲带着一群弟妹们包扎呵护，还曾经有一个时期要躲日机轰炸，抱着几件特别珍贵的字画、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艰苦备尝。事后回想，我竟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弟弟妹妹商量一下，征得他们的同意，未免太过主观了。241件文物拉了几车到故宫博物院，母亲叹口气说：“总算卸下了负担，放了心，不再发愁了。”为了国家，只有献出，不计得失，多年的积郁得申，祖国江

山如画，前路一片光明；我对生活、对环境、对前途，都是无限欢乐和安慰的。然而不过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激发了我爱党爱国之心，假如说对党有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党员领导，这主要是延安来的某些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指导写作；而且在文艺界这种风气更是盛行、普遍。尤其在戏曲界：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平常谈论、讨论、写作、理论都是这样……国家和党的领导者毛泽东正在这时号召整风，而且从文艺界首先整起，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态度十分诚恳，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在此时纷纷提出意见，响应“党的号召”……谁也想不到忽然从“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而且把这种显然的“阴谋”公开说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从而展开了一个成为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展开的“反右派运动”。而我由于在戏剧家协会的一次发言中谈了我反对戏剧审查的意见，被当时剧协的领导者田汉，把我的发言加一个标题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这样，田汉就摆脱了自身发表过的一切类似意见，揪出了一个专门与“党”作对的吴祖光，为戏剧界、甚至扩大为整个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震动全国，立了一大功。

接着来的是整个戏剧界，以至文艺界进行了对吴祖光的大批判，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对我的批判大会、小会开了不知有多少，现在回忆，至少不下五六十次，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文××的在青年团召开的一次会上，发言批判我，发言很长，内容全是吴祖光贪淫好色：如何看淫书淫画，如何搞女人、玩女人，如何引诱年青人搞下流事……而到1960年我从北大荒经历三年“改造”，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他听说我已经回来，又很快地来看我，告诉我他当时发言的目的全是为了我好，其内容全是他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对我的“揭发”材料中提出来的，为了向我“通风报信”，便于我写交代材料。这样说他倒是我的“真诚帮助”了，但是谁都知道，这位当年自称是我的表兄的文某恰恰是以玩弄女性著名，至今从不讳言自己是好色成癖的名家。使我认识了我一世交游，什么样的“狐朋狗友”都有。

受了几个月的“批判”之后，我这个一心一意热爱祖国、不借中断在香港的事业与生活，并把家庭全部收藏捐献祖国的爱党爱国者，于1958年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受了三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才回到北京。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倒都经受过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首先说我的妻子新凤霞，说她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戏曲舞台上最红最亮的、广大观众最喜爱的演员，这样的评价决不为过。然而由于我戴上右派帽子，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刘××威胁迫使她和我离婚，被她断然拒绝之后，立即给她也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这个晶光透体的“评剧皇后”便立即变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怜虫；到了“文革”时代竟然在病中被曾经受过她的恩惠的年轻评剧院演员刘敏庚打伤成残废直至今日。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主任老师取消

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至于我的父母，父亲病已垂危时刻，被我夸誉为有史以来“最好、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将我放逐万里冰荒，去世之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我的母亲担负起所有全家以及三个年青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虽然他还有许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开这个“闯了大祸”儿子的家，把应当由大儿媳承担的一切责任背到老人的身上……不能不说，我的原该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为党为国家献出最大贡献的忠心耿耿的文艺工作者，毫无愧色的干部就这样被摧毁掉了。

回想 1949 年我从香港满腔热情投奔党和新中国的怀抱是怀了多大感情呀！甚至把一向认为选择自己事业的自由都义无反顾的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想到号召提意见原来是一个骗局。把“阴谋”说是“阳谋”，从而发展到“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庐舍成墟，弄虚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虚报产量，大事谎言，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后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抢”，把祖国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杀人场；使城市一片血海，农田遍野荒芜。有史以来，以弥天大谎惑世惑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志，将昔日战友甚至一一杀戮，真乃“史无前例”。“文革”开始，我曾有一年行动自由的生活，就在一天走在家门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时见街心锣鼓齐鸣、口号声震天震地，原来是一辆人拉的大车上反手捆绑了四个赤膊老人，白布横标上大书反革命分子“彭罗陆杨”；乃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钦犯”。当年不都是赤胆忠心忠于伟大领袖的吗！现在就都落到这种地步，蓬头垢面，非复人形。片中说明，这位国家主席被折磨得惨不能睹，没吃没喝，长期不能洗脸漱口，头发里长满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没有见过刘少奇一面，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来，“刘主席”被折磨成这付惨象真是难以想象。

这使我多年已经忘记“文革”当年的一些经历重又出现：我在我的“工作单位”被“管制”的当时，开始只能留在家里，不准自由行动，而所谓造反派则可任意闻来为所欲为，譬如从上海来了一伙青年到北京来串连，自称是我弟弟吴祖昌任校长的“上海市北中学”的学生，故意找到我家来“造反”，这就说明祖昌目前显然也是失去自由，被他的学生造了他的反，而且到北京来造他哥哥——这个“大右派”的反，到了我家便又骂又砸，十分粗野，就要动手打人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占我家南房的工人老刘挺身而出，制止了这群野蛮的上海青年造派，从而保护了我，使我至今感激这个工人阶级的见义勇为好人。可惜我现在也全然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比那萃华楼党委书记老姜更好得多了。还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住在我的邻近不远一所大红门大四合院的人家，是当时一位国家部长的公馆，部长本人待人和善可亲，在街上偶尔接触都热情招呼，而“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一个中学学生，参加了当时的一群学生组织的造反派的“东城纠察队”，却多次闯入我家来抄家，就像到了他自己家里一样，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在我家大门上用白粉笔写着“大右派反革命吴祖光”字样，上面还划着大叉子，他曾多次来抄东西，又摔又打，对许多精巧好玩的东西要把玩半日然后摔掉，我曾注意到他和许多人同时对一把美国货的尺把长的刀把玩甚久，又给扔掉了，但是到了傍晚他一个人又来闯进北屋径直取走这把刀高兴地拿回去了。看来这位贵公子是何等喜欢这个“文革”世界啊！

1960 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这个工作我从内心是喜欢的，亦能胜任的，

而且写了不少剧本。还带着一个当时最年青精锐的国家京剧团到上海演出，十分成功，轰动一时，戏研院的许多年青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都对我十分友好并且尊重我，但几年后“文革”开始，立即起了变化。到了打、砸、抢的混乱时刻，我就从“老师”一降成为人人可欺的罪犯。先是被关闭在一间小屋子里失去了自由，而有一次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家一趟，我一人居然回了家。到家一看，原来全家一片混乱，我的书，我家大客厅的桌椅摆设全部像遭了抢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残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残破的屋里发呆，我只能爬在地上，满身是汗地一件件捡起这些破烂东西，客厅里连地板砖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诉我造反派说地下埋有军火，所以挖开的，屋顶也挖开了一角……从这天起我可以回家住了，两个儿子都已离家，只有老母、妻子和小女儿在家，两个外来的“房客”那时还没有来。这一阵北京真是恐怖世界，随时都会有妖魔鬼怪闯进家来。戏曲研究院的一个青年工作者（原来对我执弟子礼甚恭的陈湘），有一次居然一个人骑了辆平板三轮车来到我家，进屋之后把我的书大量搬到车上装了一车，然后用绳子捆好，骑回去了。

另外一个叫李××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是他“造反”之后，成为“领导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骂我，说得到新凤霞的单位“中国评剧院”的通知，是我偷写给凤霞的纸条，被“革命同志”发现了，并把纸条给我看，原来我写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听党的话。”（大意如此）那时我已很久没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约有几个我俩不曾见面，我有一次遇见中国评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我托他带去这张便条。李大声责骂我违犯纪律，越说越气，竟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应当说，由于我一向待人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所以从来没有结过什么仇，李振玉平时也很和善，与我也一向友好，这次可能是当了“领导”，所以摆一摆“威风”，然而我感觉到他没有力气，这个耳光打得没有一点劲道，但却是整个“文革十年”挨的唯一一次的一个耳光。在一群年青恶棍“造反派”手里受这样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的四位“高干”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还能欢呼“毛主席万岁”吗？现在唯独杨老依然健在，他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未来是怎么看？怎么评价？不能说后来毫无觉悟和改进，不是现在就消失了“万岁”的称呼了吗？但是我想，假如发一个声明公开宣布不该有这个反动封建意识，向人民群众作一次公开的承认错误岂不更好。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惨非人的受难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个人全部储蓄买下来的十八间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协和医院旁边，“文革”一开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闯进抄家，接着就占据住房，第一个人竟是东城萃华楼饭庄党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带着家眷，占用我的房子、家具，用着百炽大灯泡，为所欲为。相反，作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却只能吞声受气，后来我听了京剧演员老朋友叶盛兰的话，把我一家还住着的十间南北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却在不久之后，又被当地街道一个女干部来说：“你们家人口不多”；不该占有四间居室，而抢去中单元的一大间。时间已过去近30年，应该至今还占着吧……难道这样的巧取豪夺能认为中国是个有法制的国家吗？而且据我知道，这位占住我的四合院的萃华楼的党委书记由于今年四合院面临政府拆迁，要求换个大房子，赖着不走，终于赖得了他理想的住宅。这位党委书记拿抢到的我的房子换取高级享受，真是无耻！是骗子，无赖！

写到这里，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戏曲、诗词大家宋词的来信，信末附

了一笔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汉传》如实写了反右时，田汉为保全自己而诬您为右派事，忠于历史，可一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万字的这本书。这使我忽然想起：这本书自己就有，果然在一个书柜里找到了，是约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汉基金委员会”送给我的，由于书太厚太重，田汉这个人我又十分憎恶，所以根本没有看便放在一边了。这本不久前出版的65万字的大书从第788页到790页完整地叙述了田汉移祸于我阴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后后，使我明白而且证实他和周扬等人一致行动阴谋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脱身，反而全部由他对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斗争会的全部过程。而这一场阴谋陷害，几乎害得我家破人亡，还把一个天才的、得到全国广大观念热爱欢迎的新凤霞凌虐备至，赶下舞台，使病残集于一身，世人都看见这颗明星的殒灭！

感谢宋词介绍我这本董健写的《田汉传》，虽然只占全书将近900页之中的3页，却用文字记下我受害的全过程，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晓。难得年轻的戏剧史家董健掌握了当年的真实史料，并被记载于史册，我对他深深感激。

也感谢戏曲和诗词家宋词为我提供了这部真实的史籍，宋词的一生也充满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个一切诉之于哀怨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只感到他这般痛苦；横逆之来，他只有悲伤、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骂，完全走的两条道路；我也感谢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场反右斗争，视知识分子为仇敌，以凌虐知识分子，为最大娱乐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制造无数冤假借案，死伤枕籍，真是千千万万。仗势欺人的“四人帮”制造的数不尽的血腥罪行，对人民、对国家欠下多少血债！

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毛泽东作宣传工作会议报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听会，而且遇见演员石挥坐在一起。毛表现得虚心、太民主了，听讲的人一个个心情舒畅，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如此谦恭朗爽、胸襟开阔。开完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出门时遇见艾青，我们三人在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认为未来的中国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谁也不能想像，不久发表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的“记录”完全作了改变。石挥被打为右派之后，不堪凌辱，只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说是死于铁路轨道，一说是跳海自杀。艾青的苦难得到了王震的保护，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条命。

10上了轨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来我家拜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打过我一个“耳光”；必须得到我的原谅，才能工作，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觉得好笑，但我告诉他，文革十年虽然受尽折磨，全家损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挨打确是只有这一次，而且记得十分清楚，你那个“耳光”打得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从这个灾难中完整生还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经历过“反右”之难；而“文革”的主要对象乃是整“当权派”也。譬如那田汉，我看了《田汉传》知道他的死事之惨，血肉淋漓，就是因为他是“领导”之故，不知他临死之前可回忆到当年为摆脱自己而把我当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还有我当年的邻居马大妈的一家，马大妈的儿子马小弟当年是我家儿女的同学，在那个人鬼不分的苦难时代，是我们全家的保护神。只要街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跑到我家通风报信，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顷，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里，救我的次数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至今一别有几十年了，我终生忘不了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譬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经再三考核才得过关等等。

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争气，奋发。半个世纪过去了，都能挣扎求生，一个个都作出各自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个曾作为“右派”的大哥对每个弟妹后辈都欠了一笔冤枉债。

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补注：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载有《20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其中有一个三百位捐献者中的30人名单，第一人即我父吴景洲先生，并有“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的说明。又于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一册，为至今的捐献者唯一的一册。）1997

祖光是个男子汉

新风霞祖光具有父亲的性格。我的老公公一生爱为人打抱不平，做官清正廉明，一生刚直讲骨气。祖光也如此，他在香港做编导，有优厚的待遇，1949年为建设祖国，回到北京，就明里暗里受到歧视。记得香港导演朱石麟被国家约请回国观光，国家拿他当贵宾招待。他来我家吃饭，朱先生对我说：“祖光回来得早，我是没有什么羡慕的，就是你们这所四合院真好！”我说：“您回来这么大的举动，国家领导人约请，专家接待，海外的艺术家太光荣了。”朱石麟说：“祖光不是爱国吗？早就回来了吗？要是他现在才回来，受到的招待要比我高多少倍哇！”是我们国家对这些忠实的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从50年代中期后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从1957年祖光就挨整，打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挨整，受尽打骂折磨，险些家破人亡。但他仍是爱国，不失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本分，说真话硬骨头。我在这方面更同情他，理解他，尊重他难能可贵的为人。

我跟祖光40年的夫妻，从50年代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口如一，对国家、对朋友、对亲人真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机会就整他呢？像他这样无私的人有多少？把父亲留下的字画、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物哇！一分不取地捐献给国家，动员妻子把多年唱戏的戏衣全部捐献给国家，把自己从香港带回来的钱，买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献给国家，自己落得一无所有。这和那些向党要级别，要待遇，想尽方法争房子，还有那些发国难财，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挖洞的人怎么比哪？祖光这人也太真了，他就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不会顺情说好话。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我跟祖光这四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受他株连，我受了不少罪，但我觉得我一生不冤枉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和这样一个丈夫建立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

祖光他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来，说心里话，很多的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拿祖光当成自己的同志，他们从定级别到各种待遇，都带有

一种说不出的成见，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历来的不公正，把好同志当成内奸。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当成内奸、特务、赫鲁晓夫打嘛。

祖光在建国后都在受着不信任，也是文艺界说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有文化的整有文化的。”我们国家几十年的运动，不是很多无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吗？把诚实的人整了。有的被整的人，为了应付领导，虚假地奉承讨好，领导说他是改造好了。真奇怪，培养了人们做奴才。顺情说好话，耿直惹人嫌。这些年国家搞运动，损失很大，更大的是人们总结了经验，少说为好，不要惹火烧身，睁开眼看热闹吧。可祖光他就不，看到不对就说，这里不好说到那里说，做人就是要尽到做人的责任：“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全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开心顺意，政治上彻底平了反。海外的亲友们，可以随便来往。过去是因有台湾的亲戚而受罪挨批斗，平反后，祖光去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据我知道，美国有几次约他去一年、半年讲学，他都没有答应，也有不放心家里的原因。祖光好就好在对名利金钱不放在心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坐汽车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不报销自己花钱。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是有骨气的男子汉！

最可怀恋的地方

郁风被关进四堵墙一席榻、不见天日的有限空间里，经过几个寒暑之后，心里想的就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震惊、困惑、怀疑、愤慨、抗议、希望或绝望，都没有结果。仍然是两顿饭，等天黑；开了灯，睡觉等天亮。

一张报，一本书，就是生命的延续。

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

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和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因为我要活着，活着直到疑问得到解答，直到暗中在操纵我的命运的魔鬼现出原形，真理重新放出光芒。

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好到能够战胜生活如真空的“闲”的苦恼，能够战胜那用严酷的审问、诬陷、讹诈所造成的恐怖，战胜那与世隔绝的与无期徒刑无异的监禁所引起的绝望；为此，我要使自己快乐，要用美丽的形象充实思想，用曾经向往的一切，去温暖冻结了的信念。

在许多可怀恋的地方中，最可怀恋的地方就是故乡。

谁都有自己的故乡，对故乡都有特殊的感情。读过鲁迅写他的故乡和沈从文写他的湘西故乡，都使我感到哀哀欲绝的凄凉。然而即使是那么破碎的，在那个时代阴影下的故乡，也是亲切的，可爱的。

而我所怀恋的故乡，却远远比他们那个时候美好得多。虽然她也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带着我儿时对于祖母和曾祖母的凄凉的回忆，但是更真实更深刻的是伴随着新的希望，显出生气勃勃正在姗姗迈步的美丽形象的故乡。

因为我是在跨过一个时代之后的 1956 年又回到故乡去的，虽然那一次时间不长，却是第一次看到故乡的新生，用我的全身心去拥抱她，画笔一毫一发的描绘她，倾注了我对伟大的却是久经苦难的祖国的无限希望和信赖。

那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人，把劲都使出来。我没有任何选择，用手，用脑，工作或创作，只要是需要，我做了，我就高兴。

当时又怎能想到十几年后，被关进与一切亲人、朋友、同志隔绝的监狱，长时间的闲着两只手，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是用时间消耗来使你的头脑也蒙上蛛丝，使思想生锈，扭曲变态，或者身体瘫痪，或者精神崩溃分裂成为精神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不少就这样报废的国家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7 我的身体和精神终于没有瘫痪。如今我又能做点什么的了。在那七年中能够保持身心正常，主要是设法使自己享受一点快乐，而经常使自己愉快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心中默默地描绘着我那绿色的有着黑瓦白屋的家乡。

1956 色的阴影，而一丛红叶树隐现在峡谷中。

迎着凉爽的风，（在那长年静止的监号里，我曾多么向往吹一下江边的风啊！）走在村边石板小路上，一排高个儿粗壮的向日葵，一个脸儿向着你，所有的脸儿都向着你，随风轻轻摇曳，就像鞠躬微笑着的仪仗队。

1964 富春江岸铺满了一片片娇黄的油菜花，粉红色的草籽——紫云英，和嫩绿的秧田。到了初夏的“双抢”时节，我跟着小队的男男女女像过节日一样，争先恐后的半夜三点钟起床，摸黑走到田里去拔秧，笑语声冲破了黎明。伯伯和姑娘们寻开心，说要比赛，看哪个姑娘拔得最快，八点钟收工到他家去吃火腿汤年糕。是真的，我住在阿根伯家里，一天吃三顿大米饭和两顿点心——咸菜春笋汤年糕。双抢时节，家家都是一日五餐。

但是我也听到家乡父老向我申诉，曾经有那么一两年，叫做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可是家家都不许做饭，一家老小去食堂领一碗吃不饱的稀粥。屋里一颗粮食也没有，连铁锅也给搬走了。小伙子到田里饿得扶不动犁。他们说，解放前受剥削苦，可利上滚利还能借到一口粮食，那时却连借也无处去借啊！这话使我战栗！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后来中央派的田家英同志在富阳蹲点，搞调查研究，逐渐纠正了许多政策上的错误，家乡人谈起田家英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连没有文化的老汉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愿那样害人的蠢事永远也不要再发生了。

啊，那使我快乐有时又使我心酸的故乡，一别十年，你又怎样了？当我获得自由以后的 1977 年秋天，我又去了故乡。虽然十年浩劫的痕迹比比皆是，但毕竟已经过去，故乡又在向前姗姗迈进了。人们热情地向我慰问，但是不愿再多谈他们那里派别武斗一类的蠢事，似乎宁愿它没有发生。

江上的白帆仍然缓缓地在青绿的山峦背景上移动，而更多的是崭新的翠蓝色的小火轮，拖着十几艘一列长长的运输船，激起向岸边散开的波浪。那上面装载着多少双劳动的手从富春江底掏出的沙石，由于它们不像接近海洋的河流中的沙含有盐份，对金属不会腐蚀，因而成为许多基本建设工程中所需要的东西。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叹息那些本不该发生的蠢事。我只是庆幸江山依旧，故乡的儿女仍然会把最好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又一次经受了灾难的祖国。她使我又一次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人，能够把劲都使出来。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萧乾一前天我去一家洗衣店取衣服，柜台外边有个顾客正跟店员吵嘴，大概店里把那人的衣服给烫糊了一块。客人气势汹汹，忘记了洗衣店早已公私合营，就满口飞起“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一类五反时期的帽子；可是帽子越大，柜台里头的那个人越不服气。他说，烫糊了，我们向你检讨不就完了么！（“检讨”两个字是横眉立目地嚷出来的，说的神气跟那个字眼儿很不相称。）那个衣服给烫糊的人显然没从这个“检讨”得到任何补偿（无论是精神上或者物质上），所以也还是不肯罢休。这时候，店员就绷起脸来，俨然占了上风似的，理直气壮地说：你这个人真是学习得太差啦！我既然向你检讨认错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我在旁听了，颇有感触。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可是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观。“检讨”居然成了以退为进的反攻战术，“学习差”成了骂语。

那个店员怎么会想出“抢先检讨”这个“高明”战术来的呢？这里，近年来我有一种自己没有把握的观察——没把握，是说，我这个观察可能完全不对头，而且我也希望它是不对头——那就是：由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譬如说，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过嘴，反而抢先检讨之类。这种“革命世故”的表现还有：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

这种现象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譬如说，作家们勇气不足），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责任也很不小，他们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而敢于用胳膊抗拒车轮的螳螂毕竟占少数。我国有两句非常形象化的成语：“杀鸡吓猴”“兔死狐悲”；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解放初期，我见过西南出的一本小册子，批判一部有原则性错误的长篇小说（《再生记》），其中，有些篇是这么开头的：“我看了×××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深为愤慨”。然后，就根据对那部小说的批评，写起批评来。

《十五贯》在古典剧的整理工作上，的确是个巨大成功。中央推荐它，是叫大家学习这种从积极方面搞戏的精神。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拿到《人民日报》吓了一跳，七版底下登的是全市各个剧院、各个剧种，清一色的《十五贯》。当时我想：这可说是我们文化界“响应”党的任何本身无可非议的号召最典型的表现了。

我问过一个朋友：咱们这个革命的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出现更新、更好的见解，为什么反而会这么人云亦云，人演亦演，这么缺乏独创性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反对个人突出。可怎么能把个人风格、个人看法，跟个人突出混同起来，一道消灭呢？可怕的是，不少人认为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

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我看就是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问题还在嘀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读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甚至，为什么我们的论文写得那么罗嗦？我们的创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读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不够放心。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状况，估计关键也就在这上头。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人民在我们这边。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二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

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现在，他们那宪法早已经被麦卡锡、杜勒斯垄断资本的走狗踩成一团烂纸了。现在，提起这句话来，那些国家的人民感到的不再是自豪，而是愤慨，讽刺和哀伤。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大宪章”，早已经被那些金融大亨、军火大王指挥下的反共大家撕成碎片了。

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目前“争鸣”主要还是靠中央来号召，靠一般“运动”的空气在支持，劲头很大，但是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证，树立一种社会风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则：不以横暴态度对待别人的看法、想法和说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大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三谈到“放心”和“容忍”，当然谁的思想里也不会包括反革命的言行。然而要保证长期在人民内部贯彻这种民主政策，就需要在不正确的见解与反革命的言论之间，严格地划一道红线，而今后的偏向和困难，可能就潜伏在这里。

在目前的初夏气候里，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已见的机会，心情当然是豁然开朗了；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加不好搞了”之感。其中，我还估计最感觉棘手的，是做人事及思想工作的，如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事科科长们。可是我也听到不少人说：今后民主空气保证了保证不了，作为党组织处理“人”的问题的左右手的人事部门的做法，还的确是关键。

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位民主同盟的盟员私下里说：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还谈什么互相监督。当然，这个说法偏，甚至歪，在感情上显然对人事部门有抵触。我们只要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接受党的领导，就应该尊重人事部门，认识到它在机关内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人事部门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方式呢？我知道有些非党同志干脆把人事科看作驻在机关内部的派出所，不过今天的派出所也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解放前，派出所是神秘的、恐怖的，一般人走路宁可多绕几步，也离它远远的。今天的派出所呢，南屋里正给孩子们种牛痘，北屋发着粮票布票，西屋里一位同志也许正舌敝唇焦地给人调解家庭纠纷，从早到晚，市民是川流不息地来往。总之，派出所今天已经从神秘恐怖变为体现政府关怀人民的机构了。可是就我的见闻所及，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虽然没有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科里时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险柜（我个人的印象是：这种材料非党的领导干部即使对工作有好处，也看不到），和一些跟大家不大往来的老干部。

这种隔阂一小部分是工作上的必要（其实，我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一大部分是由于经历的不同。这些老干部的优点在于单纯，而他们工作上的缺点也常常发生在这上头；他们对中国旧社会不大了解。因而，对机关里的知识分子时常也就缺乏了解。轻则和一般干部互不往来，重则在文化和政治上，彼此各存着轻蔑心理。

另外，还有人这样感觉：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或是人事部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不见回音。这个滋味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政治上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多。这自然也更增加了不健康的神经感，它本身就形成一道完全没有门窗的墙。

自然，在全国范围来说，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还是健康的。他们非常辛苦，也做出许多成绩，一笔抹煞是不公平的；不过，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到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有缺点，而这种缺点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弊多利少的。

比方说，一个人民团体的民盟组织在讨论吸收某一同志入盟的时候，与人事部门有联系的负责同志在介绍材料时提到：在某一国际事件发生时，有人反映这位同志曾说过一句什么不很正确的话。

那个人民团体从肃反运动中总结出教训：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轻

易构成嫌疑，因而也不能轻易进行追查。可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党员同志的外甥）由于某干部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立刻倒打一耙，硬说三年前曾经连续五次看见那个干部在宿舍里有猥亵行为。人事科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调查，而且，调查了半年多，到现在仍然没个下文。

这个团体有个附属机构，过去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党员。支部书记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书长（同一位同志）主要信赖机构里一个“积极分子”的一些“反映”。结果闹得内部疑神疑鬼，互不团结，并且使得群众一度跟支部对立起来。直到那个机构有了党员，并且挨到肃反后期，才发现那位“积极分子”原来并不怎么积极，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听说机构里一位参加工作七八年的同志已经坚决退出了革命队伍。这算不算是主观主义的作法呢？连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讲究凶杀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认为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挟嫌诬陷与真正向组织汇报情况混同起来，应该给“反映”定出一个规格来；比方说，必须有某种证据或旁证才能算数，不能任何人一句话就能叫另外一个人背上黑锅。第二，不必要的拖延只有加深群众与组织之间的距离。既然调查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宜于不了了之。第三，对于一句不正确的话，即使证实了，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为跟着这个人走的“人事材料”。

第四，应该承认说出来的不正确的话比不说出来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是被暗地里记下来，而应该相机地进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我们的人民政权主要是依靠人民的积极力量，广泛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主要依靠少数人的“反映”。过去，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可能过分偏重于警惕的一面。对于“反映”虽不至完全相信，可也要求不苛。历次运动对显然有意捏造和挟嫌诬告者，事后似乎都没有什么惩诫。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触，只根据少数人的认识来判断多数人的情况，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

大凡用这种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门，必然平时对干部成见一大堆，真正遇到肃反那样时机，反而心中无数。事实上，由于准确的“反映”而抓到特务的事有，由于不准确的“反映”而严重地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甚而不必要地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的事也发生过。那时候，最陷于被动、最丧失权威的，常常正是人事部门本身。

现在大家都嚷着“拆墙”，我完全同意应该从两面拆，而且，我认为负责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志在这意义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极大的作用。比方说，把每个干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要是还有些捕风捉影、已经证实不符事实的小条条，就撕掉；属于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的，及时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的干部进行教育；过去有些措施使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尽量向他说个明白；同时，该质问干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质，也最好当面问个清楚（这个工作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应该已经做了一些吧）。今后，让人事部门更能成为大家有冤可以伸，有苦可以诉；成为不仅仅做保卫工作，同时也能解决内部矛盾，加强内部团结的地方。

要在机关内部长期、健康地开展“鸣”和“放”的工作，我认为机关里做党和人事工作的同志（常常是同样一批人）也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广开“反映”之门，使歹人无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观效果上纵容不真实、并且带个人动机、破坏团结的“反映”‘这样一来，积极分子的圈子必

然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有更多的同志们亲近组织，而大家也就会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

不要怕民主

徐懋庸 1957 第六版刊登的武汉电中说：“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但“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的“民主太多”，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

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国，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担这“杞人”之忧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构成的，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

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

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然要消亡的。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

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正是这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汉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不要怕不民主

徐懋庸前几天谈过“不要怕民主”，今天想谈谈不要怕不民主。

看报纸上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笔谈，许多人谈到有“顾虑”；关于小品文，《人民日报》上有人提到“新危机”，同时上海的《解放日报》上也有人谈到“危机”。这一切的反映，实质上是说明：现在确实有少数怕民主的人存在，因而另一方面，就有很多怕不民主的人存在。倘没有前者，自然不会有后者了。

但我以为，即使有怕民主的人存在，人民大众也不要怕他们。

历史上，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由来已久矣。孔子讲他的“仁”学的时候，我看已经碰着这个问题的外围。训诂家说仁字是“相人偶”，“二人为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矛盾的时候，就发生对阶级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之法，就是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也得多少给人民的利益一些照顾，给人民的说话一些机会，这也就有些几近乎民主的意思在里头。否则，一味横征暴敛，专制高压，人民一定就起来造反。所以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仁”是统治阶级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政权既已归于全体人民，阶级之间，既已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但非对抗性的矛盾却还存在，那么，民主就成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手段，所以，今天的民主，就成了新的意义上的大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有“仁人不忧”，“当仁不让”的态度。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曾经以“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过。何况，现在并不是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整个政权不让我们享受民主，只是少数官僚主义者不让，那么，我们有什么怕的！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为什么怕官僚主义？人们最怕的是死，但现在的官僚主义者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能致人民于死地。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

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在今天，归根到底，恐怕只有极端反对民主的反动派才会死于民主，坚持民主的人是决不会蹈民主而死的，就是那只是多多少少有点怕民主而基本上不反对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也不会。

现在的民主，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民主，也是当仁不让，因为只有它的领导，才能实现真正的供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在别的问题上，都是谦让的，他们决不与人民争利，而且实行自我牺牲。但在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实现真理的问题上，是不谦让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当仁不让”中又有谦让之处，就是，他们并不以为自己一定能够做到“不违仁”、不违民主。所以，我们只在确实认为自己符合真理的地方，才不让，而当发觉了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却又坚决向真理退让。

而且，即使自己原来掌握了一点真理，而当看到别人的真理比自己更大的时候，他也退让。鲁迅曾经教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是萤光也有作用，但是，他又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社会愈发展，真理愈光大，炬光和太阳总是愈来愈辉煌的，所以，我们在当仁不让之中又随时存谦让心；同时，还想到，炬火或太阳，并不排斥萤光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并不会消失。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

大民主和小民主

李慎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3页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

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在当年虽然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我的上级——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

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

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京解放时起就在我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的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案：1995资料，版面无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

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在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的时候。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七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 1956 年 3（在那年九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规定，党内的本来只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人，但是，第一、邓拓同志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毫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受到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提名要吴冷西同志代替邓拓同志列席中央会议。冷西同志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从延安时代起就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应付自如，而为冷西同志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 3 本，上午版 64 页，中午版 24 页，晚上版 32 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 8 点、中午 1 点、晚上 7 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120 块十六开的版面，虽然是老五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要二十三四万字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虽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罗材料翻译上报的依据。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话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 selective eyes 或 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的结果。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林克

同志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订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同志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

冷西同志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如此等等，不下几十条，我因此还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由于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支持我这样想的，不但有冷西同志那里来的“言者无意”的传达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闻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他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至少能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他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同志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的多得多。而“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又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因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决不是像斯大林那样会整人的领袖，批评也并不是整人。另外，冷西同志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

回去不要批评他们。

又说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潮问题。”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的问题，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同志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去又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家就住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同志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情还是并不紧张。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 11 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八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完成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

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改”，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急。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是我的功劳。在批斗时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二参”之外出了二十几期的专辑，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还曾传令嘉奖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宣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一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最权威的。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向下传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但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本就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出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 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最早说大民主的人。”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十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读完之后有一种爽然若失、悔之已晚的感觉，我要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愚蠢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都给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

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无产阶级的的大民主来反对资产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明年要实行整风，“预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事实上这次整风也就是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半年前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

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或者由大民主所建立的制度）的必要的补充，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点富有“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看到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 mass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

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 1968 年 5 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还不算走红，然而在欧美的大学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西方人的心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彻底消灭官僚主义。至于官僚主义能不能彻底消灭，该不该彻底消灭，他们就不考虑了。

事情已经整过去四十年。我年已七五，行将就木。我个人微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优容宽厚，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运动，我骨头里决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她，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得承认后来也渐渐滋生了怀疑以至反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但是那是 1959 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跃进失败，农村到处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

黄秋耘当时我并不知道，比起新闻界来，文坛更是是非之地。我千方百计脱离了新闻界，却投进了文艺界，其实也并没有脱离苦海。幸而这苦海中还有一艘“诺亚方舟”，我又恰好跌在这艘“方舟”之上，才得以死里逃生。

根据 1979 年 11 月第四次文代会印发的文件粗略统计，在 10 年动乱期间，大约有 200 艺术家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而且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编导史东山，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

工作者洛蔚、招麦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关于他们的悲惨死亡的内幕情况，很少人知道，知道的人也不会轻易讲出来。

不管怎样，邵荃麟同志给我指定的阵地还算是风险较少的。《文艺学习》只不过是一个普及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青年读者进行文学教育，普及文学的基本知识，提高群众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并为我国的文学队伍培养后备力量。

从1954年4月创刊，到1957年12月停刊，一共出版了45期，每期的篇幅48面，共8万字左右。印数从创刊的12万份一直增加到近40万份，每个月的来稿来信达千件以上，可见，它还是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的。总括起来说，它做了如下的工作。

一、帮助读者正确阅读、欣赏和理解作品，更深刻地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通过作品更好地认识生活，更多地获得教育。

二、提供一些关于我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帮助读者逐渐对中外文化传统获得正确的了解，在更宽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教养。

三、提供一些写作的知识，介绍一些创作经验，发表并评介一些较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习作，帮助培育文艺的新苗。

四、提供一些文艺科学的知识。

五、经常答复一些引起读者所关心的文学阅读、写作方面的问题；对于有较大普遍性的问题，则组织读者进行讨论。

六、报道群众的文学活动情况，发表读者学习文学作品的心得和体会。

韦君宜原来是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的主编，她主编《文艺学习》期间，很强调文艺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效果，但后来大概是受到社会上的（包括我的）非正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变得有点“非正统”起来了。例如1956年《文艺学习》转载了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还发表了赞扬这篇作品的评论文章，就是出于她的决定。当时我下乡去了，对这件事没有过问。当然，假如我还在其位的话，肯定也会赞同的。至于组织讨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则是我出的主意。

平心而论，《文艺学习》在它出版的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当然，对上述六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最后的几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一些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来批判，伤害了一些本来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这是极大的遗憾。当时我的处境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而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了，即使还是由我主持笔政，我自问也没有力量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这一切，当然也不能归咎韦君宜和杜麦青，他们虽然也不同意粗暴批判，但同样没有办法“扭转乾坤”。“误尽平生是一官”，一个人既然在其位而谋其政，有时候就免不了要作违心之论，做违心之事。

在这里，我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仅仅以组织讨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为主要“罪状”，还加上发表我和刘绍棠同志的文章等“严重右倾错误”，就勒令《文艺学习》这份深受广大青年群众欢迎的刊物停刊，这是不公平的，顺便提一下，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那几个刊物，没有一个不被认为是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它们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副主编、编委、编辑部主任），绝大多数不是被错划为“右派”，就是受到“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

在《文艺学习》工作期间，我负责处理过几桩政治性案件。韦君宜虽然是第一把手，但她不大愿意介入这一类事情。我当时兼任中共作协总支委员，再说过去干过多年军事工作和地下工作，党龄又比较长，这副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在处理毛宪文一案的时候，我是十分慎重的。毛宪文是内蒙古人，当时在《文艺学习》当编辑，当地公安部门在敌伪档案中找到了一张他“亲笔”填写的参加国民党的入党申请表，作为检举材料寄来给我们。申请表上的笔迹完全不象他本人的笔迹，但事隔七八年之久，一个人的笔迹是可能改变的。我用放大镜认真检验了这份表格，发现他把自己父亲的名字写错了，误写了一个同音的别字，这就引起我的怀疑，照理说，当时他已经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了，就算文化程度比较低，一般也不会写错了自己父亲的名字。申请表上还盖上了指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核对一下，这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指印。当时办案还要讲点法制观念，对未受行政拘留的公民，是不好随便勒令人家盖指印给你拿去检验的，否则就是“侵犯人身自由”。我想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耍了一点花招，假装说我办公桌上台灯灯泡的钨丝断了，我正在接待客人，请毛宪文给我换一个新灯泡，毛宪文当然毫不犹豫地照办了。后来我把两个灯泡都拿给公安部的侦察部门进行技术鉴定，留在灯泡上那十个鲜明的指印，没有——一个和申请表上的指印相符。这就证明这张申请表肯定不是手宪文亲自填写的。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敌伪档案中呢？这仍然是一个谜。我派出李兴华同志作为外调人员到毛宪文的家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最后才把事情弄清楚了。

原来毛宪文的姐夫王绪在国民党部队三十五军某团当书记，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党规”，无论哪一个“党官”能够亲自发展 20 个人入党，就可以提升级，并得到奖金一百块大洋。那位书记把他能够记得起姓名的后辈，一一都填上申请表、由他自己代盖上指印，算作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新党员，一下子就发展了 20 人。解放后，这位书记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当时还关押在监狱中，他的记忆力还不错，能够一下子就说出十多个“假国民党党员”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毛宪文。李兴华同志又让他盖了十个指印，拿回来一一核对，他的右手食指的指印果然和申请表上面的指印一模一样。这个“假案”总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冯光一案，本来非常简单。只发现了一张胡宗南抗战初期在陕西省凤翔县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举行毕业典礼的集体照片上有她在场。她对曾经在战干团受训这件事，从来没有隐瞒过：入党时交代过，以后每次填写履历表，也都如实交代。一个青年在抗战初期国民党部队举办的军事训练班里受过训，但没有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去干一般的抗日救亡工作，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入了党，这根本不能算是“罪行”或者“错误”，更没有必要把她“隔离审查”。但经办此案的同志竟把冯光隔离审查了两个月之久，并且把她家里的全部东西都翻箱倒筐地搜查了一遍，即使在当时来说，这样做也是太过分的，不合法的。这一案件虽然不是由我直接经办，但作为领导人，我没有及时加以制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比较复杂的重大案件是冯大海一案。冯大海是个行政十七级的党员干部，当时担任《文艺学习》创作组的代理组长，业务能力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文艺思想跟胡风比较接近，也去过胡风家里，但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有一个老同学，在我们海军的一条军舰上当中尉枪炮官，这个人跟他关系比较密切，但仅仅是生活上的关系，例如一同去参加舞会、逛公园、冯给他介绍

过女朋友等等。这位海军军官对文艺一窍不通，也根本不感兴趣。冯大海有时向他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他也不置可否。

胡风等人既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冯就被怀疑有意向他的老同学套取我海军内部的机要情报，秘密向胡风汇报。因此，冯的专案组比较特殊，是由公安部的一位张处长、海军司令部保卫部的一位上尉军官和我三个人混合组成的，由我担任组长，归公安部直接掌握。所有的专案材料（包括档案、交代材料、审讯记录，等等）都属于“绝密”范围，不准对外泄露，也不用送给作协的领导同志审阅。定案结论也是由本小组自行拟定，直接呈报给公安部审批的。

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命令逮捕的，签发了逮捕证和搜查证，指定由我去执行。在1955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深夜里，我带领了几个人去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觉得根据一些不实不尽的材料，就随便怀疑一个人有间谍活动，加以逮捕，这样做未免过于轻率。同时我认为，即便胡风等人真是反革命集团，跟胡风等人有些来往，甚至赞同他们的文艺观点的人，也未必个个都是反革命分子。至于说冯大海奉胡风的命令窃取军事情报，则更是无稽之谈。根据那个海军军官的交代，他告诉冯大海的只限于一些军中的轶闻趣事之类，作为军事情报，那是一钱不值的，况且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尉军官，根本不可能知道多少战略性的军事机密。但，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我有意做得宽容一点，我没有给冯大海扣上手铐，当人们带他上汽车的时候，我扭过脸去，在房间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低声对他的妻子说：“要照顾好孩子！”这句话等于暗示她，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她想开一点。我真害怕她会自杀，这一类事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屡见不鲜的。当然，我知道，作为一个专案组组长本来不该说这样的话。

在冯大海被隔离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每一次提审都是由我主审，其他两个专案组成员陪审，冯自己写了近10万字的书面交代材料。我们曾经开过十多次会议，反复研究过审讯记录和交代材料，我们还派出专案组人员内查外调，收集了二三十份旁证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冯大海一共见过胡风三次，每次都有许多人在场，胡风从来没有单独接见过他。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也没有遵照胡风的指示去办过什么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只限于文艺界的一般情况，没有涉及党内机密，更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机密。冯大海只是一个行政十七级的干部，他所知道的党内机密也是极其有限。当然，他在胡风面前发过牢骚，骂过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他谈到《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是韦君宜和我的时候，胡风没有说什么，只说了一句：“黄秋耘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为什么要请邵荃麟给他作序呢？其实邵荃麟并不太了解罗曼·罗兰。”根据这样的案情，本来很快就可以写出定案结论的。冯大海还够不上是“胡风分子”，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不必给予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至于对他的一些自由主义的错误，在党内进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

我根据三人小组一致的意见，再三斟酌过字句，写出一个定案结论，呈报给公安部。

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个定案结论不到一个月就批复下来（通常起码要拖三五个月的），同意不给予冯大海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记过也不降级。

但是认为象他这样跟胡风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毕竟是不可靠的，不适宜留在党内，要开除党籍。工作也要调动一下，不能留在北京。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理并不能算是很公平的，既然冯大海仅仅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就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那未免失诸过重了。

但公安部那位张处长极力劝阻我不要再往上申诉，据他所知，凡是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案子，几乎没有一个“案犯”是可以免于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的，重的要判处有期徒刑，最轻的也要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假如再进行复议，说不定处分还会加重一些，这样对于冯大海和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我们量刑过轻，就是犯了右倾错误。

这一点，大概冯大海自己也心中有数。当我们的这个定案结论拿给他本人看的时候，他却喜出望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欣然签字表示同意。听说后来他的爱人抱着孩子来接他回家的时候，一家三口都高兴得跳起来，好像是得到“特赦”。一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对第六类右派分子的处分也往往比对他要重得多，虽说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过，冯大海的最后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调离中国作协以后，在张家口地区的河北梆子剧团担任文化教员，有时候也让他编导一些小戏。他出差到北京，还常常来我家里聊天、吃饭，和探望老同事、老上级一样，好像在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法官”和“犯人”的关系，对1956年的往事半句也不提起。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受到猛烈的冲击，说他本来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只不过由于我这个“漏网右派”的包庇和开脱，才得以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他在饱经折磨以后，终于用上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他的妻子早已跟他离婚了。

50 难幸免，而且第二次打击往往比第一次打击还要猛烈得多、厉害得多。冯大海在第一次打击时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本来也是无辜的），他死在第二次。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也不可谓不重了，但他们全都死在第二次。作为政治风暴的规律，总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些的。而且越往下刮，风力就越猛。上边刮起七八级的风，到省里就达到十级以上，到了地、县，就变成十二级的强台风了，卷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人物的身分越小，受害的程度就越大。所以胡风虽然挨了整，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坐牢的时间远超过10年，但毕竟还没有死去，一直活到今天，当上了全国文联委员，而冯大海最后却非送命不可。

与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进行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进行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当时这一运动并没有公开报道过，知道的人也不多。批判会的方式很特别，范围不大，参加的人只限于作协以内行政十三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干部，有时也吸收一些作协以外的文艺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最高潮的时候也不过50人左右，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得挨个发言，进行揭发批判，至少也得表个态。一言不发的人也是有的，一个是陈翔鹤同志，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我刚进文艺界工作不久，对丁、陈和主持运动的人之间的争执，实在闹不清谁是谁非，对那些没完没了的“检举”和“揭发”材料，也判断不出是真是假。我一边开会，一边却神游物外，只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强烈的愿望：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了吧，我打从心底厌倦极了。烦死了。这样的批判会在宝珠子胡同

全国妇联礼堂一共开了十三次之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的时间又拖得特别长，一般从下午三时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结束。那时候，机关的食堂早已休息了，饭店也已经打烊了，幸亏在南小街一带，还有些卖夜宵的小食摊，只供应馄饨和烧饼两种食品，勉强可以塞饱肚子。参加会议的那些人，少数还是积极的，例如有一位同志，他事先准备好发言稿，激昂慷慨，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像煞有介事。当然，他所揭发出来的大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谓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始终都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提倡每一个作家都写出一本有影响的好书，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另外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敷衍塞责的，例如另一位同志，开会时总是在笔记本上画小人，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画上一张素描速写，他画画的技法本来就不大高明，加以心不在焉，画出来的素描总是“神似”而形不像，他自己也不满意，一画完就撕下来，揉成一团塞进烟灰缸里烧掉了。

记得有一次会议休息时间，我在院子里问陈翔鹤同志：“你为什么不言语呢？”他朝我苦笑了一下：“哦，我不了解情况嘛。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发言呢？”我学着他的腔调说：“我嘛，同样是不了解情况。”我们心照不宣，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对这样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批判会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了。

陈翔鹤同志是个具有古典色彩的人。他是个老共产党员，却对当时那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感到十分厌倦。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致怨憎’！”我不知道，陈翔鹤同志所说的许多人的悲剧，是否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但我心里明白，他对我说这么一番话是有所为而发的，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就是这么一个“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的悲剧人物吧。不幸得很，陈翔鹤同志这一席话竟成为谏语，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我。当然，这是到若干年以后才应验了的。他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被诬陷为影射庐山会议，替彭德怀翻案，在1969年4月下旬被殴打致死。他所遭受到的灾难就远远不止是“谤议沸腾”和“频致怨憎”了，和嵇康一样，他也是因文章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的，虽然他是一个“性不伤物”的谦谦君子。我自问也是一个“性不伤物”的“人道主义者”，但是这些年来所遭受到的“谤议”和“怨憎”也往往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十三次会议中，我没有说过一句话。后来在某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中，我随口说，有许多同志修改了或者推翻了原来的发言，是由于“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这句话就被认为“助长了丁陈集团的反党气焰”，列为我的严重右倾错误之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诛心之论”了。当然，到了1979会议尽管开得没精打采，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速记员和打字员）可忙得不可开交，每次会议过后，都得整理出厚厚的一本发言记录，记得很认真，很详细，连每一句插话都记了进去，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可以使用，要记得那样详细是很不容易的。十三次会议，一共产生了十三本厚厚的发言记录，大概总有洋洋数十万言吧，全部打字油印出来。参加会议的人，每个人都发了一本，上面印着，“内部材料，严格保密，会后收回。”我总是怀疑这一堆“废话录”怎会有这么大的机密性。我不知道会后还有没有人会耐心地从头到尾看它们一

遍，至于我自己，我一收到就把它们锁进抽屉里，从来也没有翻阅过，直到上缴时为止。

1956 一案，澄清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指定由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主持其事，还成立了一个复查办公室，由黑龙江省前副省长杨雨民同志担任主任，下面配备了十多二十个专职工作人员。他们找每一个发过言的同志反复核对，请发言者把打印出来的发言记录重新修改。我在批判会中一直没有发过言，这一切自然都与我无关。当时我跟韦君宜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看到杨雨民来动员韦君宜修改发言记录，要她破除顾虑，实事求是，把一切有“反党”涵义的词句全部删掉，真是说得唇焦舌敝。当然，有的人改得多一些，有的人改得少一些，有的人全部推翻。其实，看来这一切都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一案，就算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全部属实，假如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话，也构成不了多大的罪名；全部推翻了，丁、陈和其他十多二十个受牵连的人最后也还是免不了全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就连主办此案的李之废、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受到党纪处分（张海留党察看两年，降五级，下放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其余的人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开除党籍）。据我所知，其实李、张、崔、黎等人跟丁、陈素无密切关系，也从来不来往，“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有些人甚至根本未见过丁、陈的面，只不过由于职务关系，奉命行事而已。作为自始至终参与过文艺界这么一场“大辩论”的人，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恐怕只能说，一切都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看来从 1955 年初夏开始的反胡风、批丁陈、肃反、审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不过是序幕，是前哨战，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头呢，那就是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 年 5 月 18 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那种严肃。

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

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 9 点 20 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

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经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错已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编辑们看到我抽文章，心知有异，纷纷打听是怎么一回事，我装作若无其事、轻描淡写地答道：“没什么！有些话我还要斟酌一下，改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就是。”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

那一年我将近 40 岁，这在心灵上和理智上已经是成熟的年纪。我知道发生了新的情况，暴风雨快要来了。但关于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我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有些人比我还要糊涂，比如杜麦青，他还是主张要继续“放”。这也难怪他，他并没有得到“转”的信息。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

比方那一个“转”字，那怕我是个“小诸葛”，在 5 月 18 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当然，对这种转变的出现我早就有过一些预感，不过，没有“提示”，我就不可能作出判断。

随遇而安

汪曾祺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 1957 年打成右派的，是 1958 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规定的。

1957 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

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

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1958 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

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

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我是有实际数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 110，高压 170。

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 - 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

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伸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

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

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

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不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

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

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

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妆。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台上有布景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 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 1960 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 8 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蹭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效力军台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1962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该人是摘瑁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 1979 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20 年了！”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

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壘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1991

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

刘衡——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 19541957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来临,到处在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记者站发表了鸣放的消息、通讯。而内蒙古却迟迟不动,我怎么能跟上形势,闻风而动,写出“得风气之先”、“指导全国”的报道呢?不怪我没本事,只怪内蒙古工作太落后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头开始鸣放了,我好不欢喜!认为这是抓住大题材的好机会。我找了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准备大记一场。

鸣放中,大家对肃反的意见最多:“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一搞肃反,就叮当打人。我说打人不应该,领导说可以推推搡搡,还说我右倾!”“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是真有仇,可积极分子打斗争对象是假积极。打人一耳光,他脸上很不自然。”“问题还没搞清楚,能那样对待同志?我看现在对这些人就不能和风细雨!”“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会大恐怖!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确实是反革命,然后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这些意见与报上登的大同小异。看来肃反引起的怨气是全国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进步青年。你把他斗错了,他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甚至会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搞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会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没有记上几页,突然风云骤变。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一时间,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黄继光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报上大张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汇报、章罗联盟……鸣放时,我并没看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的言论。现在,从批判的内容看,说服力很差。有的看不借,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人民日报》6月19日)看了好几遍。上边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我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反革命已经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呢?我还想到:“肃反运动斗错了许多人,还未总结,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我是共产

党员，有责任向党及时提醒。”我记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大兴安岭的白夜、木头房子、一望无际的森林……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深刻印象。我还来不及酝酿主题，突然报上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记者部几次来信、来电话，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参加肃反运动。“稿子写不成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无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们的记者部主任陈×是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我还是头一次和他见面。只见他流着热汗、满嘴惊叹号，领着大家把白原一股劲往反革命方面斗。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与文艺部诗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来被认为是胡风派，现在由于参与了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我看陈×新来乍到。太主观了。又想到他当众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后会冷静一些，能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就跑到他房里对他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

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脸，训斥我：“你说他老实，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吓得我赶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比较友好。在斗争会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话。记者部特地派人到我们房中，批评我们落后，对肃反不积极等等。林沫就学着大家在会上吼白原了，我仍然发不了言，对白原气不起来。陈×根据大家在会上的表现，伙同记者部副主任汪×背地里划大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等，我当然是落后分子了。以后我回到内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内心负疚：“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对陈×坚持正确意见，浪费大家好多时间，害得大家虚惊一场，也伤害了白原！我的情绪被破坏了，不愿再去大兴安岭，稿子也无法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反右派，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据理力争、仗义执言。”自投罗网包头的鸣放被扼杀了。我回到记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记者站的党小组长，我向小组提出我的担心，另外两个记者都有同感。钦达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记者站。他说：“我是肃反积极分子，那个时候，领导同志说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着他穷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经病，疯了一样。以后我再也不盲目跟着领导跑了。”我说：“大家对肃反意见特别大，怎么现在一对肃反有意见，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呢？我们应该给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后诸葛亮！”林沫说：“那你去给支部汇报一下”。我又说：“胡风派的诗文，我看不懂，欣赏不了，但要说他是反革命，证据不足。以前跟着领导跑，他说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脑子。领导说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现在想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说他在国外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一点也不明确。又说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组织关系。在白区，找对方做朋友来掩护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风也搞错了”。我还说：“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称胡风集团，并没有称胡风反革命集团。”林沫说：“那你也去问一问。”于是，我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

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

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脸色立刻变了。他很惊讶我们记者站三个人怎么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样的腔调？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许多人躲避还来不及，我却找上门去，自投罗网。

林沫见情况不妙，赶忙到牧区采访。回来后，表示立场转变。支部派他和张×（党委办公室主任）周×（农牧部副部长）轮番对我进行教育。张×说：“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那样复杂，哪是什么好人！”我说：“不管多复杂，是不是好人，他总不是敌人吧？怎么能用对敌人的方式斗争他呢？”周×说：“挨斗有什么要紧？我就当过斗争对象！挨一下斗是有好处的。”我说：“我们党员无所谓，一般群众就受不了。”张×说：“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弄清许多人的问题，这就是成绩！”我问：“是不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审干的秘密目的？如果这样，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小。”张×说：“审干是审干，肃反是肃反，不能混为一谈。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说：“既然肃反没有审干的秘密目的，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种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肃反的副产品，不能说是成绩很大。”我还死死咬住一个理：“你说斗得对，不是缺点，干吗以后又要向他赔礼、道歉？”周×对林沫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应该把我的言论向《人民日报》记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记者站的站长，不然对他不利。林沫对我说：“连朋友们都说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个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你应该好好考虑”。就把我的言论写了下来，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给记者部。信上还说他不赞成我的意见，与我斗争。我十分坦然，以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会草木皆兵，对我大惊小怪，不几天，支部开大会批斗我，说右派分子反对肃反，你也反对，和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是反对肃反，我是对肃反斗争会有意见。如果斗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称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应该。”人们大喊小叫，一个个舌头像快刀、牙齿像枪刺，向我砍杀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们不了解我，《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是了解我的！”钦达木尼在旁边帮腔：“你们不了解刘衡，她比较正直、稳重、水平高！有次，内蒙古党委一位领导要她在报上为他们向中央呼吁经费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写内参，不好在报上发表，拒绝了。”钦达木尼是蒙族人，以后也成了农牧部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就说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怎样批斗他，我不知道。

钦达木尼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写的，署名时他在我前面，现在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记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道我父亲是耿伯别反党集团，上边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湖北日报》报道不真实，你应该写信告诉他们”。

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

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与报上的“右派分子”共鸣 1957 我感到这些标题漂亮，但华而不实，徒有其表，揭发的材料缺乏科学性、逻辑性，也就没有说服力。原先我对一些人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没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对这些言论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结果，我感到好些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例如：“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 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 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许多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检查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实际上是假检讨，使我感到他们不但不是坏人，而且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例如：罗隆基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他“认罪”道：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条”。“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条。”（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龙云检讨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把我的思想搞乱，究竟错在哪里？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他们划成右派。他们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亲切、自然。因为报上说他“拒绝批评”，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他的发言。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在7月16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我的检讨》：“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他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 and 右派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炼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肃反的意见。例如：诗人艾青说：“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画家江丰说：“许多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十分可怕！”葛佩琦的意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讲话摘要：“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是说不爱国。”文章刊出不几天，葛佩琦就写了一个更正，说他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可是，一贯强调报纸真实性的《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却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到处都

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杀共产党，不肃反，怎么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杀共产党人的大右派。

我那时当然看不见葛佩琦写的更正，光从报上登的摘要来看，我对大家说：“他并没说现在就杀共产党人，而是说搞得不好才杀，说得过激了一点，不能因此就证明他是反革命。”《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也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国际部的蒋元椿。他说胡××是说一不二的“圣旨口”。这样，蒋元椿就变成反党反领导的罪人了。当副总编辑王揖派他到外边参加反右斗争会时，他说：“我才不去当打手！”这样，他既不响应党的反右号召，又辱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鸣。例如：认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于农民斗地主，农民斗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在政治运动中，敌我还没弄清，如果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私心杂念，积极分子哪来那样大的火气呢？像我就对他们恨不起来。蒋元椿骂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当。再如人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感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的确不称职，既然如此，就应该下台。不能说要他下台就是要整个的共产党下台，就是取消党的领导。会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我心里直打鼓。

但我从报纸上寻找到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来为自己辩护。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历史没有污点，怎么会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说，有些说了的光是在党内进行有组织地汇报，并没有在外边写文章、作演讲。怎么也变不成“行者”！党绝对不会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散文《包头，你变了！》我更放心了，几次催促记者部，快开我的会，“我要回内蒙古搞反右派报道！”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题材的机会。

想起了《巧克力》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部召开批判我的斗争会了。没想到，大家讲的话竟然和内蒙古农牧部的同志们一模一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立场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了！”无论我怎样申辩：“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我是站在结论不是反革命的斗争对象那边，他们也是自己人！”人们仍然一股劲批斗，说我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葛佩琦辩护等等。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发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连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说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就代表他们在党内向党进攻！”老记者陆×说：“刘衡在我们记者当中，文学修养是最好的，但政治上……”这话戳进了我的痛处。长期以来，我就隐隐约约感到，报社对政治性强弱，存在一种偏差：报道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强，报道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报道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强，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见叫做政治性弱；写枯燥干巴的经验介绍叫做政治性强，写生动活泼的描写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热衷参加运动的叫做政治性强，欢喜钻研业务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顶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错……”“不错？不错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你污蔑

群众斗争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了！”拍桌子、训斥、辱骂像连珠炮一样地打了过来，使我心里发酸，肺腑刺痛。“怎么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对我也不能理解了？”散会后，我伏在办公桌上大哭。陈×以为我在悔恨，有什么难言之痛，再三盘问我。

我哭得没法讲话，就写了一个条子：“顾×讲话过于简单、粗暴，应该对他进行教育！”“你、你……”陈×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一当斗争对象，就成了待宰的猪羊，只有索索发抖的份儿，哪里还能反抗？陆×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鸣放，你听着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不肯去。陈×见势不好，不知我会发生什么意外，赶紧叫林沫从内蒙古到北京来帮助我。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十分在意别人背后对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听。他告诉我：“李×（编委）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组织撒娇！大家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陆×说：‘刘衡一句批评都受不了，连我那样的话都不能接受！’”“大家奇怪：刘衡写别人，倒头头是道，怎么对自己，光晓得哭，写不出检查！”只好让林沫帮我写检查。

我亲自出马，了解我的意见究竟错在何处。党总支书记、反右领导成员肖×告诉我：“你们攻击我们的肃反和苏联一样扩大化了。要知道，扩大化是把一些人脑袋砍错了，咱们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只是斗了一下，不能说是扩大化”。可是，挨斗的滋味是好受的吗？我是不是太娇嫩了？我到处喊冤叫屈，捉摸人们对我的真实意见。老认为：别人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问他们：“是不是一搞运动，就不能一边倒，不能说反面的话？一说反面的话，就会破坏运动？”大家无法回答我，只好闷在肚子里笑：“刘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正像陆灏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确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当狼群在外面狂噪时，最保险的是跟着它们一起噪。”我不会保护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开头几天，陈×对我比较友好，洋洋得意地向我夸耀：“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右派分子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不像是在革命队伍里呆了好多年的，就像是一个才参加革命的小青年。”他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叫我好好清理一下思想：“大家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跟他们（指另外几个被批斗的人）不一样。”9《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对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斗争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汪×（记者部副主任、支部书记）批评陈×右倾，不应该对我那样温和。陈×立刻对我变脸、疾言

厉色了。本来嘛，历次运动中的打手当然要考虑“温情”的后果，他不能为某个下级影响自己的仕途。但我没有失望，因为社论上还有一段：“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严肃，决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宽容。这当然不是说，在划党内右派分子时可以草率从事。”⁹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在反右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克服。”党中央一催再催，反右派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来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农村部主任林韦原先对我说：“你在革命队伍长大，谁不知道你？我们会帮你说话的”。现在，他为难了，说：“党中央发了脾气，不好办了。”报社从武汉弄来我给父亲写的全部信件，汪×叫我交出父亲写给我的信，并打印出来。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抄家”行动是侵犯我的“人权”，反而十分高兴，放心，以为很快可以回内蒙古。谁知汪×看了来往信件，硬说我让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是给他出坏主意，破坏反右派斗争。肖风也为我惋惜，说我有包庇父亲的行动了。我的思想被搞乱了，以为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就把打印件给李克林（党总支委员）看看。李克林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立场是有点模糊，但不是什么坏主意。”以后汪×再一股劲说我包庇父亲时，我恼火了：“你就恨不得把我打成右派，人家李克林看了信，不像你那样”（以后反右倾时，批斗李克林。“同情右派分子刘衡”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报社要开全社职工大会批斗我们了。临开会时，汪×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向我解释：“这不是哪个个人决定的，是党决定的”。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和我父亲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她满脸通红，说：“是不是政治问题现在还说不定”。但在批斗会上，她又恢复了她穷凶极恶的样子，对我无限上纲。肖×批斗我说：“你说，是汪×划的你。光这一条，划你是右派，就没有错！”以后，陈×对我说：“你们都恨汪×，其实，汪×的后台是我！”“你们瞧不起汪×，其实，她的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批斗大会后，我们好些人被派到图书馆干活。有天，党总支办公室的姜××把我叫去，要我在政治结论上签名。我去时，裴达正在他的结论上签名，姜××对他十分温和、客气。轮到我时，我不肯签，说上面讲的许多不是事实。姜××拍着桌子大骂：“你的态度最坏，明天还要开大会斗争你，要加重你的处分：……你只管事实部分，政治结论是党下的，你怎么不相信党？”我本想写一句“我不同意这个政治结论”，但一看他可怕的样子，就像他的巴掌马上要打在我身上一样，不敢写了。光对结论上不合事实之处予以说明，签上名。回到图书馆，我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叭叭掉。在旁边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蒋元椿对我说，“你怎么搞的？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问：“什么道理？”他说：“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人要牺牲的。苏联就有许多例子。”我问：“什么例子？”他说：“像《巧克力》”。

《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是苏联的一部小说。写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位名叫佐丁的领导人错用了一位舞女当秘书。那位舞女与白军有勾结，利用佐丁的名义向人们敲诈勒索。不久，白军反攻，人民不肯抵抗。上级知道佐丁罪不至死，但当时情况紧迫，没有时间向人民说明真相，只好把他枪毙。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地走向刑场而且感到光荣。我对蒋元椿说：“如果党要我牺牲，会告诉我的就像告诉佐丁一样。党不告诉我，我就不盲目牺

牲”。蒋元椿说：“党不告诉你，你自己应该这样想。”我是在1941年到陕甘宁边区不久，看到这本小说的。1943年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我正在关中分区关中师范教书。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从延安带来了一批自称特务的人，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有一位名叫陈英的女同志现身说法，说她在延安怎样拉拢一些人搞小圈子、搞小广播、搞自由主义，破坏党、破坏边区。

还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地下党都是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等等。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年丰上台说自己是特务，我也跟着说。下台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就问陈英：“我们在西北大学时，在党领导的读书会里，都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去边区时，党都是叫我们好好工作，并没有叫我们搞破坏！”她说：“我们也是这样呀！”我问：“原先不知道自己是假共产党员的现在也变成特务了吗？”旁边一位领导同志赶忙拦住我：“你不要到处说你不是特务，不是假共产党，你破坏整风！”我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当特务的是极少的，怎么到了解放区，特务会这么多。我立刻想起了《巧克力》。佐丁临刑前的一些内心独白震动了我：“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觉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的、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着未来，只是为着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我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们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促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成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不久，抢救运动进行甄别，证明绝大部分人是假坦白。我又想起《巧克力》中，领导向佐丁讲的不得不枪毙他的理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群众决不会了解冗长的辩解的。群众只懂得单音的yes，或no”。我想：“这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污蔑群众吗？这本书可能有问题。”听说当年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巧克力》，拿佐丁做榜样。

十多年过去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又想起了这本书。蒋元椿一提，感到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去问这本书的译音林淡秋（编委、文艺部主任）：“《巧克力》不见再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听说”。于是，《巧克力》有没问题，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只好不去想它。

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中央指示：被划为右派的党员，一律开除。记者部要开支部大会，开除我的党籍了。我痛苦得死去活来，林沫原先照顾着我，陪我到饭馆吃饭。慢慢，不愿和我一块上街了。他多次劝我，不要摆出一种不服气的架势，要低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认罪，给人一个“态度好”的印象。他埋怨我：“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因为态度不好才被划成右派的！”他责备我：“你太不懂事了！党说你是右派，你承认了，以后证明你不是的，难道党会责备你当时的承认是说假话吗？会这样的道理吗？”我痛苦得写不出检查，他帮我写了一个，说了些大家都在重复的话，如：我对不起党，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党对我的挽救，我要低头认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由我抄写，签上我的名，交给汪×。林沫说：“你态度好一点，人

家不会划你；即使划了，处分也会轻一些……现在后悔也迟了。开除党籍是最后一关，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被开除。不要临走还给大家一个坏印象！”我满口答应。

1956 是党执政以后的第一个党章。我学习它，仔细寻找我的不足之处。准备大家一说开除，我就举手。

一天晚上，记者部开支部会了。林沫到内蒙古交代工作，准备搬家（内蒙古记者站三个人，我和钦达木尼两个成了右派，林沫这个站长当不成了，因此把他调回北京），无法参加。其他一些老记者有的说要找人谈话，有的说要赶写稿子，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出席。光是汪×领着傅×等一批年轻人乱起哄……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汪×当主席，先开除林钢。林钢十分沉痛地说，他因为不好好进行自我改造，以至沦为可耻的右派。他以后要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说着说着，伏在桌上哭了。汪×连忙说：“林钢有悔改之意，我们十分欢迎，建议行政给他较轻的处分。现在举手表决……林钢在被开除前，还有表决权，自己可以表态……现在，同意开除林钢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到会的人都举起了手。林钢举起了手，我也跟着举了手。

轮到开除我了，汪×叫我表态。我说：“我也同意被开除……”汪×不等我说完，就插嘴：“你同意？讲一讲理由！”我说：“我感到我不够党章说的党员八项条件……”傅×赶忙说：“我们也不够！我们开除你，不是因为你不够条件，是因为你沦为可耻的右派！”我一下子愣住了。汪×说：“你攻击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不平……”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反右以后向党汇报思想，怕又斗错了自己人。”汪×吼：“你哪里是汇报什么思想？反右派了，一些党外右派不敢讲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党内继续向党进攻！”从外表看，我讲的话的确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如果仔细分辨，就能找到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出主意，要在台上的共产党更好地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呀！可是当时有谁去仔细分辨这个不同呢？汪×见我不发一言，接着又说：“你还给你父亲出坏主意……”本来我在肃反、胡风问题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似，根据这些划我右派还有点道理，但一提我父亲，我立刻清醒了：“我叫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怎么会是什么坏主意呢？”汪×说：“不管不管！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开除刘衡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大家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汪×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我也没有举。

汪×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现在迷糊了，我弃权。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回答你。”眼看就要散会了，我准备了好几天要“低头认罪”的话一个字也找不着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好、是坏，行政处分是轻、是重，我已毫不考虑。从我的心底突然发出一阵从来没有准备、从来没有想过的吼声（也就是我灵魂深处的吼声）：“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们开除我，并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还是要汇报的！”汪×赶忙挡住：“你看你看，这个右派分子刘衡最近交给我一个检查，我满以为她的态度变好了，有改悔之心，准备让行政给她较轻的处分。现在你看，她凶恶的面貌又暴露了！她死不甘心，临走还要放一次毒！一个党员向党汇报思想，党就要开除她的党籍，你说党多残酷呀，

党内多黑暗呀！”我说：“不是党内黑暗，是你们的工作有偏差！”

我并不想和人顶嘴、吵架呀，我并不想最后还要在党内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呀，可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毫无办法。”第二天，冷静下来，告诉汪×，我不同意被开除，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她偷偷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

听说开除的事经支部同意后，还要经中直党委批准。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中直党委会冷静、慎重一些。我对陈×说：“请你们千万不要马上登报”。我想，报社的领导喜欢赶热闹、表现自己的成绩。如果冒冒失失一登报，就没法更正了。

我们更有嘴无处说、有冤无处伸了。谁知不说倒好，一说，在1958年1月6日，报纸就登出，《人民日报》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沫从内蒙古回来后，知道我的态度无法改好，也无可奈何。他听说我已被开除，虽然是在他意料之中，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对我说：“真想不到，就像做梦一样。”田流（记者部副主任）对林沫说：“原先我们都把党当成妈妈，以为对妈妈无话不说。现在才知道，对妈妈也不能胡说八道”，汪×对林沫说：“现在看来，和上级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我过去在工业组，跟组长王揖关系不好，他就把我调出，我就到记者部来了”。肖×对林沫说：“刘衡以为划她右派，是假的，是我们在演戏。现在，报纸都登了，是演戏不是？”我问蒋元椿，“在开除你的支部大会上，你自己举手没有？”他笑着说：“以前在陕北，中央要开除刘志丹的党籍，他自己也是举了手的”。我很惊讶，党员在接受错误处分的时候，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要说假话，隐瞒自己的观点，难道这就是党性强吗？接二连三的打击把我打蒙了，我不相信这就是盖棺论定。也不相信中央党报人员的水平真的那样低下，真的分不清敌我，可是，为什么党要这样划我呢？对我更是一个难解的谜。

对党组织不能说假话 1958 分人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现唐海县府所在地）劳动了，当时正在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声中，我是受的第三类处分，属于劳动锻炼范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与干部下放并没实质性的差别。林沫对我说，我们去的地方是平原，主要产大米，比有些干部下放的地方条件还好。他叫我好好劳动改造，把懒病好好治一治。我的问题报社已经掌握，不要再到农场喊冤叫屈了，我说：“当然，我身体差，劳动不好，又加上不服罪。农场要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我就不得活了！”4 又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柏各庄农场。我们报社来的全部分到第 4 分场。蒋元椿、林钢、胡平、刘晓晞、赵克惠、李右、方达、张恩铭到 3 队；刘时平、吕建中、裴达到 4 队，我和孙乃、田兰坡到 4 分场场部。大概领导照顾妇女，除了我和田兰坡外，别单位到 4 分场的女右派也集中在场部。有《工人日报》的陈蓓和全国妇联的谢松生，另外还有王兆祥、王济培、左渊明……分别来自中直各机关。

领导我们的是 4 分场人武部的干事王振山，30 来岁，共产党员，谢松生打饭时，脸上毫无笑容，王振山看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偷偷一笑，我认为他了解事情真相，把他当作党的化身，“无事不可对党言”，对他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他笑了，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每天，他分配给我一些轻活，和我有说有笑。谁知不多天，农场发下一张表，叫我们填写。我一边看，一边填，填到中间，有这么一项：“你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

我脑子一闪：“说真的？说假的？说真的对我不利。”立刻，我责备我自己“农场也是党组织，对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写：“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再往下填，有这么一项：“你是否受过严格的审查？”我脑子又一闪：“大概我们现在是在受严格的审查！”想到林沫责备我的话：“老爱顶嘴，说话不晓得客气、委婉一点。”这次，不能再给农场留下这一印象了！就在填写对处分意见的前边，加了一句，变成：“我愿意接受党组织严格的审查，但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全农场一百多个右派分子，都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只有我一个人公开不服、立刻把农场领导惊动了。总场公安局张局长特地赶来了解情况。有天晚上，他和王振山来到我们女右派的宿舍。我正坐着，向他点头打个招呼。他大吼一声：“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连珠炮似的训斥：“我走了几十里路（当时不通汽车），大老远跑来帮你解决问题，你坐着一动不动，真是太没礼貌了！”我只好向他道歉，说我劳动一天，太累了，不想动。实际上，是我没有养成向领导低声下气的习惯，不知道见了领导要站起来，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人，应该有个卑恭屈节的模样，想到他亲自跑来帮我解决问题，我内心感到过意不去，我的确是太不懂礼貌了！接着，我就把我为什么不是右派的理由向他说了一遍。还说到，这个问题由报社掌握，本来不想在农场谈的，只因农场让填表，才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写了出来。在写以前，我还闪过“说真的、说假的”念头，这是不对的，以后不再这样了。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老生常谈的话，像什么党不会冤枉人的，你要低头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当时听不到心里去，现在自然更是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王振山从此对我变脸了，不断对我训斥、责骂：“你这个右派，欺骗我们工农干部，我差点被你骗了！你真害人不浅，你害得我挨批评，差点要撤职拿办！”还说：“你在报社的政治结论上，明明签名表示同意结论，来到农场你又变了卦”。我听了，十分高兴，看来农场已和报社联系，看了我的政治结论表。就说：“我是对一些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加以说明，然后再签的名，是对说明签名，不是对政治结论签名。”他说：“你太小看我们农场了！只有报社才能解决你的政治问题，我们农场不能解决？”我说：“我当时以为你们只管我们劳动，政治问题由报社管。现在你们也管，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一直对你交心。说真心话，怎么会小看你呢？”一有机会。我就向他解释，靠扰，把他当成知心朋友，甚至傻到对他说：“我解不了你的秘密，你的职业的秘密。你外表很凶，不断训斥别人。

其实你的心很软，见不得别人的眼泪。那天，谢松生愁眉苦脸地向你买饭，你偷偷一笑，我看见了。”王振山让我做较重的活，让我挑水、掏厕所等等。嘲笑我的气力、姿势：“连10动不好是因为你不服罪，你不服罪所以你才劳动不好”。“你到这里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有一次，训着训着，他向我说开了悄悄话：“你不应该把你们不是右派的话告诉我的，你不应该对我说……”立刻，他感到他说漏了嘴，又大声对我吼了起来。

他让大家监督我、孤立我，说：“她是不服罪、反改造的，你们不要相信她，跟着她走。你们要好好服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大家对我没有好颜色了，老是横眉瞪眼，表示他们和我不同，我成了四分场场部斗争的重点，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李有是第三队的重点，和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王振山鞭长莫及，就把

他调到场部。他来了，因为有我这么一个比他更顽固的人，他才免于当重点，得到解放，参加到批斗我的行列在右派小组改造，也和划右派时一样，你划了别人，自己就免于被划。别人当了重点，自己就可以免于当重点。自己的安全是建筑在别人的罹难上面。

这年年终作改造鉴定，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关系大家前途、命运、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大事。我仔细看了看鉴定表，上边把右派分子排成三类：第一类口服心服，第二类口服心不服，第三类口服心也不服。我对王振山说：“第二类口服心不服，不是对组织说假话吗？怎么比第三类还要改造好些呢？”他说：“口服，是讲不出道理了，不得不表示服。当然比心不服口里也对抗的好。”我听了，并不以为然。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怎么一到敌我斗争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章程就变了，变得我不能理解了？明明不同意自己被开除，却要自己举手表示同意；明明不服组织对自己的处分，却要把不服放在心里，不在嘴上说，这样的人比心口如一，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还要好！共产党不是逼着党员哄自己、欺骗自己吗？为什么党要这样做呢？真是不可思议：我属于第三类是无疑了，但我想不通，也无可奈何。

农场怎么违背党章 1958 王振山管理右派有功，由干事升为人武部部长，1959 年 2 月，总场让右派分子回家过春节，四分场的右派分子全部放假回家了，只把我一人留下不让走。无论我怎样哀求，也不生效。我写去一个汇报：我感到时间有点长，如果我是光身一人，戴着帽子来到右派小组，和大家一块劳动、学习、开会、斗争，长期下去，即使有些烦恼，但也不无好处。

可是我有爱人和小孩子。我的爱人早就不愿等待，因为我的爱人当的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属，等待出征的妻子，带着幸福的微笑，观看来自前线的捷报。我的爱人当的是可耻的右派分子的丈夫，而从农场传回去的有关我的消息，始终都是不好。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感到软弱，不能支持，感到风浪太大，时间有点长。

春节过后，右派分子都按时回来了。

不几天，总场场部突然向全场发出一个通告，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一直不服罪、反改造，要加重对我的处分，由第三类上升为第二类。即由劳动锻炼上升为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由 60 元降到 26 元。全农场 100 多名右派分子都知道了，纷纷把我当作反面教员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我们 4 分场也召开右派小组会，要我表态。我并没有被吓倒，只是感到奇怪，会上，我说：“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一个人是不是右派与他的工资多少没有关系，减少我的工资我不是右派，即使增加我的工资，我也不是的。”“是不是右派与处分轻重没有关系。加重我的处分我不是右派，即使减轻我的处分，我也不是的。”王振山淋头泼下一顿大骂：“你这个顽固右派，你太把我们农场看扁了！你说我们违背党章，你有什么资格？你早已不是党员了！”“告诉你，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你的嘴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你是一块啃不动的老牛筋！我要看看，胳膊拧不拧得过大腿”？我对王振山当众骂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但不生气，还经常提醒他，让他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后我对他说：“你们只在右派分子这个小范围搞，倒没什么。千万不要散布到群众中去，要是散播出去，党的威信损失就更大了”。

谁知不说倒好，一说……不几天，这个加重我处分的通告就贴在四分

场场部的墙上，王振山洋洋得意地对我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农场的职工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抗拒改造的顽固右派，编了歇后语，嘲笑我，如：“刘衡过沟，没辙！……”我是平反问题 1959 为了迎接国庆 10 周年，中央决定特效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柏各庄农场轰动了、到处都在谈这件事。右派分子们看见了一线曙光，偷偷希望自己正是这摘帽中的一个。我内心十分不安：“大家都摘帽走了，光剩下我一个人了！反右派运动采取大呼隆办法划右派，又采取大呼隆办法摘帽子，我就糟糕了！”王振山、四分场领导不断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赶快认罪、承认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有次，场长说：“你看，连溥仪都摘了帽子，你还摘不了！你还不不如溥仪……”我说：“我们两个性质不同。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这是千真万确的，改好了，当然可以摘帽子。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问题，我是平反问题。”就这样，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人虽然很顽固，可是对党倒很忠诚。”不多天，总场要召开摘帽大会了。那天，我们从各个分场向总场大礼堂集合。

大礼堂没有座位，只有一个半月形的主席台，台上有几位农场的干部。我们对着主席台排队站着。先由一位干部宣读《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再由一位干部宣布农场第一批摘帽右派分子的名单，并简单地介绍了他们改造的成绩、摘帽的理由。每个人姓名后面都加上“同志”二字。我们报社的裴达也在其中。大家一听，摘帽的只有 10 位，自己不在其中，都泄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反右派不再采取大呼隆办法，我就好办了。”我们报社 30 名右派分子，这次摘帽的除裴达外，还有留在报社改造的杨春长。一共 2 人。

接着，由被指定的摘帽右派代表上台讲话。无外乎是“感谢农场党的领导，使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在农场的改造只是起点，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将来的道路更长，今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任凭风吹浪打，不再犯同类错误”等等。

会议休息，大家三三两两的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坐在石头台阶上，还是和在分场时一样，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这是我们农场全体右派分子第二次大集合，头一次是 1958 年 4 月 8 日在北京火车站，相距一年多了。我用眼睛寻找认识的人，除了看见我们报社的右派外，还看见了文艺界的陈企霞、钟惦棐、唐达成、穿着补丁连补丁衣服的肖乾……突然，肖乾向我走过来了，我们来农场后，王振山向我谈过肖乾。他说：“三分场的斗争重点是肖乾，人家一斗，他就劈里啪啦交代好些，写了好多好多，尽是反动又反动的东西”。还说：“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三分场的肖乾、四分场的刘衡，你们是一对活宝！”农场关于我不服罪、加重我处分的决定是通告全场的，肖乾当然也看见了。肖乾来找我，我猜他是想和我说说心里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农场的日子比别的右派更难过，他不会像别的右派一样，对我横眉瞪眼，和我划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别的右派分子一样，口里服罪，心里也是不服罪的，我准备和他好好谈谈。谁知我们刚寒暄几句，三分场一个人走过来，赶紧把肖乾叫走。我这才知道，肖乾一直受着监视，人家怕他和我这个顽固右派串联，而这监视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用右派监视右派，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所谓“煮豆燃豆箕”是

也。

会议继续，公安局张局长讲话了。他说：“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全中国高高飘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一些右派低头了，认罪了，服输了，表现较好。根据中央精神，农场决定给他们摘掉帽子，使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们仍然是好同志，现在摘帽的 10 个人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们希望所有在农场改造的人，都能摘掉帽子回去，与家人团聚，重新工作，不希望有一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长期留在农场劳改。”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喊道：“四分场的刘衡，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大家都摘帽了，你就摘不了！你想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一些人朝着我看，大家的眼光刺得我的脸发疼，我心里咚咚跳，感到这一下自己可完了。

但是，张局长停了一会，接着又说：“不过，你不要灰心、丧气，你还是

有前途的。只要你服罪，承认这顶帽子，你也可以摘掉，甚至比别人还要摘得早。”我听到最后一句，豁然开朗：“这不是威胁利诱吗？开头是威胁，现在是利诱。”我心里笑了，脸上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来场开会的路上，我内心沉重。回去的路上，我脚步轻快，不时露出笑容。

一回到四分场，王振山马上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表态、谈感想。大家都表示，要以裴达为榜样，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轮到我时，我说：“它们是右派分子，应该争取摘帽。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而是平反问题。

是右派的要摘帽，不是的就该平反。这里头有个甄别问题。”当然，在我的内心，认为大家都是平反问题，但我不能说。不然会惹起众怒，对我“群起而攻之”。

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 1962 我们在农场劳动 4 年多，领导要把我们全部调回原单位了。我们回报社后，除我之外，都分别摘掉帽子。这次摘帽不像在农场那样大张旗鼓了，而是个别通知他本人，即毛主席说的“阴摘一批、阳摘一批”。在通知的同时，还告诉他组织上对他的安排。留在报社的有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朱克潜、杨春长和我，其他人都分别到内蒙古、贵州、河南、新疆等地。有些去外地的人愤愤不平了：“怎么我们这些摘帽的不如没摘帽的、我们这些改造好的不如顽固右派刘衡？”有的人甚至向我发脾气，认为我的待遇不应比他好。领导就向大家解释：“刘衡没摘帽子，没有地方肯要，只好留在报社。”我们在农场 4 年，不知什么时候，谭立当了报社的党委书记，他见了我说：“别人改造摘掉帽子，你改造却加重处分！”我说：“那是因为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他说：“哈，你说对党说老实话的加重处分？你好反动！”但声音里含着笑意，看来他对我比较了解、同情。我说：“是这样的，现在说老实话的吃不开。”他说：“你回来，随便找个工干干吧。”我干了短时间的杂工（如挑水）后，没有部门要，被分配到资料室，不久，工资由每月 26 元升到 99 元（即 17 级，比原先下降 4 级）。

我在资料室，工资是最高的，但工作却是最低的，如剪剪贴贴之类。有的人又发牢骚了：“怎么我的工资还不如当右派的？”以后工资调整，就

给有的人升了级，特别是当领导的，他的工资不能低于右派，不然他怎么能叫做领导呢？我对这些毫无怨言，因为那些摘帽右派如裴达等都没恢复工作、工资，恢复党籍。使我感到，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必须继续调查研究：反右派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拜访许多领导，如梅益、习仲勋……一半为了呼喊，一半为了刺探。

我找得最多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我说：“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快进行。”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有一次，她回答我：“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口：“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原先《人民日报》社把高粮从内蒙古调回来，告诉他，要为他甄别，不几天，中央决定不甄别，又叫他回内蒙古。

1962 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华到任后，就大刀阔斧地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等到中央下命令不甄别，安徽已有数千右派平反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搞甄别的省，其他各省（包括《人民日报社》）因动作迟缓，没有赶上趟，李葆华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30 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到了 1962 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央于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 7 千人大会）。会上，除了林彪为毛主席大唱赞歌之外，彭真、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对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1959 年的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生活等等谈了许多意见，谈得很好。

一时间，政治气氛转向宽松。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砍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3 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4 月 27 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一时间，到处都在说“甄别”、“平反”。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脱帽，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就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很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于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山主持，在 7 月 26 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

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谁知在 8 月 17 日，中央发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1. 对有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

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

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2. 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分子帽子给他们戴上。3.....一个月后，即9月24日至27日，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这样一来，统战部再也不敢提为右派甄别、平反了，还给一批已经摘帽但是表现不好的（主要是要求为自己翻案）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在7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即后来称为的“三不主义”）。于是，从大家的讲话中，他看出林彪是忠于他的，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的，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就为他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毛主席又演了一次“引蛇出洞”。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其中奥妙，只是奇怪为什么有很明显的甄别问题，党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不“有错必纠”？党已经不是我理想的共产党了！我不死心，我要弄个水落石出，只有继续呼喊、继续刺探。

我在资料室干活的时候，一天，社长进来了。我拦住他：“你知道我的事情吗？”他笑了：“知道知道”。我说：“反右派有个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呢？”他收起笑容，变了脸色：“Nono，反右派没有甄别问题！”我说：“有、有，不光我一个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大家真的承认自己是右派，他们都在说假话。”他立刻声色俱厉起来，大声呵责：“他们比你好！他们知道不甄别，就不做声。他们比你好！你、你，你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社长也提起“政治”二字，我在政治上不行，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究竟什么是政治呢？难道政治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的吗？我更糊涂了。同时，我如果像大家一样默不做声，不与人交谈，我怎么能收集材料，了解每个人在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言行、表演呢？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静等领导开恩，坐享其成。看见不对头的事，我必须大声疾呼，提醒领导，唤起民众，尽一点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哪怕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向毛主席、刘少奇呼吁我们在柏各庄农场的时候，只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人。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香花、毒草的标准，也是只看他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

回到人民日报社后，才知反毛主席也算是敌人。“两”反变成“三”反，毛主席的威信空前高涨，我必须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才能解决我的右派疑问。

“毛选”不能解决我的疑问，相反的，越读“毛选”我越心疼，我好像是个受害的人。例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而我，既没有写文章，又没有作演讲，只是向党组织作汇报。意见再错也不能错成敌人！

何况我的意见并不错！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

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是，当时划右派光看鸣放前后的那一会儿。即使只看那一会儿，也是只看一个表面现象，并不去区别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是，当时给人戴右派帽子，只凭几句言行就定案，是先下结论，后调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这些话都不作数了。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是这样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办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批判却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没有科学的分析，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教导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作老实人。”可是，在反右运动中，“口服心不服”的比心不服、口里也讲出来的要好。在逼供信的空气里，促使大家假认罪、假检讨，以至我这个唯一讲真话的人，变成死不悔改的顽固派。有毛主席的话作后盾，我更有把握、更坚定了。用同志们的话说，也就是更顽固了。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天不怕，地不怕，天崩地裂也不怕。我心里没有别的巧，只因我听见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我心里照，不怕霹雷闪电、地动山摇，我心里有个红太阳，斗争起来有力量！”我给毛主席写信，向他讲叙以上情况。告诉他：反右派的好些做法，以及我的种种遭遇，违背了他的许多教导。因此，“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是您领导的党！”我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越看越觉得它能够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例如：书上说：“党员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么……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他理直气壮地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甚至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对他个人来说，他无所畏惧”。

我想，我被划为右派后，一直是孤立派，不同意政治结论，不同意被开除党籍，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打击，我正处在这种“光荣的孤立”的地位。书上说：“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和革命的前

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于是，我给刘少奇写信，向他呼吁：反右派要有始有终，必须甄别。一开头我就说：“我给您写信，我是泪流如雨，因为您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您懂得党员的心。……”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我要加强党员修养，受尽虐待毫不怨恨。光荣的孤立算得了什么？少奇同志是我知心！”我给毛主席寄去的信就像石沉大海…不，比“石沉大海”还坏：石头掉进海里，要冒一个水泡，我的信寄了去，却没有一点回响。我给刘少奇寄去的信倒是有一点点声响：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天，与我同在牛棚劳改的陈×问我：“你怎么给刘少奇写起信来了？”我说：“他当时是副主席，我怎么不能给他写信？”他说：“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也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说：“刘少奇究竟有什么罪恶，我搞不清楚，不过，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这点是对的。”

同时，一反右派，我就在说，我比他说得早，并不是我学的他。”他说：“那你比刘少奇还高明？”看来，造反派对刘少奇抄家的时候，把我给他的信抄出来了。但不知陈×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件事的。

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在资料组，我按时上下班，剪贴资料，做些不需要多少知识、力气就能胜任的工作。比起在农场，劳动强度小多了。大家为我开过几次批判会。各种千篇一律、牛头不对马嘴的批判接踵而来，一点不能打动我的心坎：“刘衡犯错之后，一再不承认，加重处分后，并未接受教训，的确令人难以想象。花岗石脑袋敲打好多次，没有改进，骇人听闻！”她搞翻案活动，不能让人容忍！她立场十分顽固，三个问题（指肃反、胡风、父亲问题）和党针锋相对，怨气冲天。这样的错误不算反党，什么才算反党？她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有反党思想（指我对抢救运动的看法），20多年来，没点变动，令人惊奇！”“她没有起码的觉悟，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她到处活动、告状，兴风作浪，跟党对抗到底。只要容许她发言，她就反驳。只要有会，她就污蔑，始终不肯回头”。

“凡是在重大问题上，她都有她独特的看法。任你千言万语，她有一定之规。

由于她的立场与我们不同，因此是非也就不同，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她攻击党无孔不入，有空就钻。她通过思想汇报向党发动新的进攻，越来越猖狂。‘肃反、抢救运动都错了，逼得大家说假话’，她把党丑化成瞎子，连真假都看不出。她攻击报社党委，‘划人右派，是否夹杂了打击报复、官僚主义’。污蔑报社党委长期把她置之不理，‘不知是慎重呢，还是官僚主义’？我们都不支持你的意见，难道我们都是打击报复、官僚主义？”当然，有些批判稍微能打动我心坎，引起我的思考和反驳：“你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难道在党的会议上就可胡说八道？就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结果怎样？彭德怀的意见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吗？结果又怎样？”我心里想：“那他们被划成敌人，也有问题”。但我不能再说，连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

“你光说把你搞错了，不要说整个反右派。反右派是毛主席领导的，一说整个反右派，问题就大了”。我说：“我正是因为对整个反右派有意见，才汇报的。整个反右派没问题，我还提什么意见？我的问题只有在大家问题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解决。”“你要为民请命？太狂妄了！告诉你：当了右派分子，就要低头认罪，夹着尾巴做人，不能骄傲、翘尾巴！”我说：“我有什么

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保留我的意见。我是用可怜的最低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人民？是敌人？即使达到了人民标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现在报社没摘帽子的只你一个，你要顽固到底吗？”我说；“多年来，同志们除了逼我承认帽子、给我乱扣帽子外，揭发不出我有任何真正的三反罪状。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清楚、越肯定，是有大家的功劳的……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大伙儿嚷起来了。我只好又说一遍：“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给我打击最大、几乎要把我压垮的是林沫提出离婚。

反右派初期，我和林沫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才有我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向支部汇报的一幕。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后，立刻把他“惊醒”，他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了。我到农场后，他写来大量信件，对我进行帮助、教育。有些意见（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自己、把自己说得坏坏的……）我接受了，但在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很大。例如，他说：“假若你的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你能及时地进行深刻的检讨，用阶级观点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次总的分析和清算，而后痛改前非，破白立红。你是有可能不戴右派帽子的。即使戴了，也会得到很轻的处理。

但是，这一步你没有走对。你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痛心悔过。相反的，你情绪抵触，大叫冤枉，其结果呢，你结结实实地戴上了帽子，而且得到了重重的处理。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你的态度。”我认为：“态度”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处分轻重，但不能改变一个人问题的性质。同时，态度好坏拿什么来衡量呢？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满嘴假话叫做态度好，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坚持真话叫做态度坏。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他还写：“你来信仍然认为你的问题是搞错了，还在那里等待中央的什么复查。这说明你仍在原地踏步未动。听说有不少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中都 有所进步，他们都在彻底悔过自新，努力争取、变化自己的思想，从右向左转。而在这个改造中，你显然是落在后边了。你如果死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改变，那将一直落在后边。事实将证明你是彻底错了。别人可以争取三年、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摘掉帽子，而像你那样，那就很难说了。”“你在农场大概会经常听到驴子和猪的那种单调而无聊的叫声，但因为人们知道这类生物的特性，所以听了它们的声音，并不觉得愚蠢和讨厌。如果一个人也像它们那样总是发出单调刺耳的叫声，人们会觉得这一定是个怪物。但是也竟有这样的人，你只听她在那里叫着：‘我冤枉了，我不是右派，党应该纠偏！’最近又提出什么‘什么时候划分敌我界限？’界限不是早就划得清清楚楚了吗？还要怎么划？我看这样的事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右派分子自己的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过自新，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那就可以重新变化过来。如果他们改正错误很努力，我看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么。但如果像你这样，顽固不变，我看什么时候也是化不过来的。一个人已经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自己硬要去作驴子、猪，我看任何人也没办法。”“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在报社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个。其他我所听到的报社外的有些右派分子，传来的消息大多是在劳动中表现很不错，都在下决心改造自己。

你在这个问题上顽固不化，只能表明你的阶级立场，你坚决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改变你的态度。或者说，你始终不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认识自己的问题，始终和党对立。你既然不能和党和人民走一条

路，那当然，我们就必须分手。不然的话，那你就真心诚意地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悔过，下最大的决心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我感到，他不是我认识的林沫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他们是这样的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我们已经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没有共同语言了。感情的深度是与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我们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我在农场被加重处分后，他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没有批准。我回到报社后，他不能改变我，我也不能改变他。我们之间的冲突更加升级。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比你更愚蠢的了！”我说：“我是因为反右派有问题才去向党汇报的，现在反右派弄到我头上，我更知道它有问题，怎么能改口呢？我想改也改不过来，只好不改了。”他说：“你死死抱住帽子不放……别人都摘了帽子，有了合适工作，你还养猪！”

别人摘了帽子，可以当记者。你就不行，不让你写，人们早把你忘记了。”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而是他们要我承认帽子后，才能摘帽子。人们说我是小偷，我说我没有偷东西，你就应该研究我偷东西没有。怎么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他说：“就算将来证明帽子戴错了，可是，这几年，你许多文件不能看，许多会议不能参加，已经是大大落后了，赶不上去了。”他的话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只好拿《红岩》里的华子良等英雄人物激励自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最大的进步；宁要原则，不要脑袋；宁要真理，不要所谓的前途。他说：“党的政策从来只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是要牺牲的。你的不幸你一个人担承吧，不要连累我、连累孩子、连累我们一家人。”我说：“你过去常说，有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落井下石闹离婚，以后问题搞清，这些人被人骂死了，抬不起头来。没想到你现在也这样！”他说：“这次运动和以前不一样。”他又以我是顽固右派为理由，再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批准了。我被划右派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7岁，经过长期分离，都不肯要我……在闹离婚期间，我胸部突然剧痛，发作起来痛得死去活来。喉咙里好像堵了一块痰，吐不出、吞不进。中医说我得了胸痹（即心绞痛）痰迷心窍。经过长期针灸，才有好转。我从未想过自杀，但我算是体会到了：“怪不得有人会自杀！众叛固然可怕，亲离更为可悲。身受社会与家庭内外夹攻的人能挺得过来吗？”我决不会自己去死，我要亲眼看到反右派的结局。我想：“真正的战士都有白毛女的性格，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能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向党汇报“右派分子”，对我可说是个新名称，1957年反右派了，这个名称才引起我的注意。运动初期，领导是把右派分子归入人民的行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右派分子就变成反革命、人民的敌人了。既然我对这个名称了解甚少，我为什么能够肯定自己不是有派分子呢？如果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肯承认，那就罪加一等。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别人都说我是，我承认了。以后证明我不是，别人也不会责怪我，“法不责众”嘛！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跟着大家一样，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这样才保险。我写去汇报：“虽然明知道承认帽子是最保险的路。对了，表示悔改了；错了，责任不在我，可是，我不能耍滑头，我宁愿当傻瓜，我不能走大多数人走的保险路，宁愿一个人去过我的独木桥，因为我不能对党进行欺骗”。

我还写：“即使最后证明我还是个顽固右派，我对我所作的毫不后悔。

因为让党了解我的真实面貌，对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党可以针对我的情况对我进行教育，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在这两段话的指引下，我勇敢向前，毫不动摇，无论以后到印刷厂、到牛棚或是五七干校，不管工资一减再减，不管肉体、精神遭受何等折磨，我都遵守我被开除党籍时的诺言，随时随地向党写去大量汇报。下举数例：我不能对党说谎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我 16 岁就开始把你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我把命运和你连在一起，跟着你踏过千山万水，我要变成你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你欺骗？如果我要说谎，小苍蝇会变成大象。小小的谎话并不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谎话说过之后，并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动物一切有生物一样，能够不断繁殖生长。即使只说这么偶尔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污点。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违背你对我的教养。不管形势对我有利不利，不管戴右派帽子是永久还是暂时，我始终一个心眼对你，始终对你绝对地老实。

做老实人毛主席说：“一切不老实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没有想到，老实人竟会遭到极大不幸。如果不信，我的经历可以作证！正因为我对党老实，我被加重处分；正因为我一直老实，一直被留在敌人阵营。我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人！”如果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不会有更好的命运：我要在逆流里向前空洞的帽子对我早已不是重要的问题。我要做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做挂名的共产党员。我离党对我的要求很远很远，我今后改造的道路很长很长，我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我个人已经一无所有，就像以前的无产阶级。我把一切献给党，因此，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以前的无产阶级，除掉锁链一无所失。

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不会失掉什么，除了帽子。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炼。我要在风浪中不倒，我要在逆流里向前！

当工人们要我戴高帽子游行后，我写：《我的心好像一座大山》。今天晚上，工人们让我戴高帽子游行。在我耳边大喊：“打倒顽固右派刘衡！”工人们口号声声，一点不能震动我的心灵。我的心没有发抖，不会向口号低头。我的心一动不动，好像一座大山。我的心十分明白：工人们在和假想的敌人作战！

和“走资派”们一块在牛棚改造时，我写：《我的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早晚，我们要在毛主席像前念两遍坦白从宽，我坦白；坦白从严，我也坦白。我的坦白，经得起考验。

《一个欺骗》“站出来，请罪！”一转眼，我被推到毛主席像前，我有什么罪？我请什么罪？谁也讲不来。讲不来也要站半天。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没罪的人请罪，是不是对毛主席的一个欺骗？《毛主席会不会难受？》又是打来又是吼，不爱文斗爱武斗。游楼、用刑又活埋。罚吃咸菜窝窝头。不听毛主席教导的不请罪，跟毛主席走的在弯腰低头。毛主席的相片如果有知，会不会感到难受？《“无的放矢”斗一通》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从牛棚出来，在五七干校时，我写：《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胸口闷，呼吸紧，好像成了时代病。在五七干校接连发生。我谈谈自己，也议论议论别人。我感到……被党组织审查时的痛苦，常常胜过在敌人的法庭。敌人对自己越凶，我心里感到光荣。党组织对自己越狠，我心里感到越疼。在敌人的法庭，同志们常常慷慨就义、

英勇牺牲。被党组织审查，有的人会去投河、跳楼、吊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真的敌人。不但不是敌人，而且对党的感情很深。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党组织的不信任，不免要在心里留下伤痕。

《生活不应老兜圆圈》“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早就十分肯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话斩钉截铁，我的脚站得稳稳。我不会有任何动摇，不会改变我的声音。

同志们尽可放心，不要把我问个不停。同志们一提右派帽子，我是又高兴，又不耐烦。高兴的是：我的政治问题十分简单，有些地方值得夸赞。不耐烦的是：生活应该前进，不应老兜圆圈。

《落实政策》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要落实毛主席准确划分敌我的政策。

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解决，文章无法往下写。如果一定要写，许多事情就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怀疑……）我等待我问题澄清的那一天，等待着，等待着，时间是那样漫长、遥远。把自己同志推到敌人那一边，我怀疑他是内奸，或者是敌人所派遣。

《我有点醒悟》读了鲁迅的书，我开始有点醒悟。我不是什么英勇，而是“迂”，像方孝孺[1]。方孝孺使他的十族受到杀害，我使父母、子女三代深受痛苦。我是书房里的呆子，不知实际生活中的残酷。被自己战友流弹所伤，这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悲苦中最大的悲苦[2]！

[1]见《为了忘却的纪念》。

[2]见《杂感》。

《反右派还没结束》我经历了反右派的开头，经历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经历一下反右派的结束。同志们说：“反右派早就结束。”我说：“没有！

没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问题，当然应该有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并不笑得最好》一个浪潮跟着一个浪潮，一个波涛跟着一个波涛，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会笑在最后，我并不笑得最好。因为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十分痛苦的过去了。

1978 派必须甄别，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邓小平没有理我。胡耀邦把信转给人民日报领导，上边批示，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于是，社长秦川和成坊到我宿舍找我，要我摘帽子。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这不合逻辑。”秦川说：“现在中央只有摘帽一说，我们没有办法。”我说：“那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就给我摘掉吧。”我的帽子被摘掉不久，全国开始了右派改正工作。

1978 人民日报社有 10 名“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我是其中之一。其余 20 名以后陆续获得改正，无一真右派分子。我获改正的那一天，我在楼道贴了一张“向党汇报”的小字报，这是我被开除党籍后的最后一次汇报。

1978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 21 年！……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是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

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彻底平冤[4]，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3]21 年来，我向党写去的汇报记不得有多少次了，这里引用的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的典故。暴君山鲁亚尔每晚要娶一个女人，第二天清早把她杀死。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告奋勇地去了，还把妹妹叫了去，每晚讲故事，讲了 1001 夜，1001 个，终于使暴君弃恶从善，不再杀女人了。

[4]在“平冤”前边，我特地写上“彻底”二字，表示我对党寄托很大希望。

我的理解我的怀念

乐黛云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 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和废名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 信！当解放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她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

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铄同志。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 10 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何老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边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同志。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 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谛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

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在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两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罢，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难道他真就这样永远不再回来？作为一个大叛徒？一个大特务？我当

时的心情惟能表现于中文系最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收取了七分子弹钱！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休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

程贤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距此10年前，中文系解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20过去几十年也未能完成的思想历程。我在北大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我曾访问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我确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四十而不惑”，40年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素质，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1988

透过历史的烟尘

乐黛云——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人生在世，总有一些场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尽管时光如逝水，往事瞬间就会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但这些场景像里程碑，联系着一些人和事，标志着你成熟的某个阶段，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番周折。

记得那是 1951 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况且当时在我心目中，美国真是一个罪恶的渊藪，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可以无罪开释，二战胜前前夕，我亲身体会了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大后方的霸道横行！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每当人们埋怨汉族太受束缚，不像少数民族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舞，她就会大声反驳，有时还会一展她圆润的歌喉，唱一曲江南民谣：“沙土地呀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风吹竹帘我看见了，鸭蛋脸儿，黑头发，红缎子鞋扎梅花，当田卖地要娶她。”她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今天，仍然健在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一次还曾为她不幸的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 1957 年 6 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深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部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已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纽扣，还要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到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 11 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消失，无声无息，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惟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

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

艇，将她劫持而去；说不走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至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至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纽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却并没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 37 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 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

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 1951 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些什么？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夭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孙钿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四十六个年头。至今，我还不会讲宁波话，甚至听宁波人讲话，有时也搞不明白讲些什么。屈指算一下，我个人在宁波的四十六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牢狱和劳动改造中蹉跎过去的。

我 1917 年在上海出生，6 岁开始在上海初级小学读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同大学。1933 年开始从事革命戏剧和文学活动。我发起组织“暴风雨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还自筹资金，出版了文学刊物《天明》。1934 年大学未毕业，受到国民党追捕和迫害，遂流亡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不可能在日本继续读书，于 1937 年 7 月 20 日回到上海，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也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打仗、行军的间隙，我仍坚持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写稿。1938 年 3 月至全国解放，我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主编《东江》、《东

惠》半月刊。1950 年来宁波，留学德国的辛亥老人张葆灵、文化进步人士翁心惠当时办学缺少师资，挽留我暂时在宁波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宁波卫生学校任职。

1955 我参加“五一”节观摩团，赴上海欢庆国际劳动节。在这大喜的时刻，我的内心并不感到怎样欢乐。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文艺报》上“揭露胡风”、“批判胡风”的报导陆续刊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文艺报》印成小册子随刊附送。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涌起。因为解放前我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希望》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我同胡风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多次晤聚，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香港时，我和胡风、梅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在登陆日军的枪炮轰击中共生死一个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信，被定性为反革命材料，我过去同胡风当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而这些往来，根本丝毫没有反党反革命行为。我在解放初，读到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以真诚的饱满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难道这些都是反革命？胡风一片忠诚之心向党提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则采纳之；如果是错的，不妨戒之或批评之，何罪之有？何必搞得血淋淋呢？但是，我终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在杭州乌龙巷蹲了一年牢狱。释放时，由省农工部负责人对我下了结论：“经过一年来的审查：一、你不是胡风分子；二、你在党内没有叛党行为；三、你从日本回来时，正处抗战时期，没有投敌当汉奸。现在向你本人道歉，向你家属道歉，你们都受苦了。……”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我意识到我总算自由了。

我拿了一张回宁波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恢复工作的证明条，急急忙忙地买了火车票赶回宁波。时已深夜，白昼暑热刚刚退去，街边豆浆店正在生炉子。我兴冲冲敲开了家中的破门，简直是猪棚一般的小屋子住着 7 口人，煤炉就在床边，蚊帐已给煤烟熏得发黑，家人见到我回家，都惊骇地瞪着眼呆呆地瞧着我。我说：“我自由了！回来工作了！”此时，只有我独自在庆幸自己的团圆生活的结束，家人的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给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笑没有乐了。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回家了，我跟家人在苦难之中团聚了。我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之后，以为立即可以恢复原职。我想得太单纯了，去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推说“且待研究决定”。

我在杭州释放证上签字以后听到对我的处理结论，以及写给肃反三人小组的纸条上，明明是恢复原职。何必拖延？事隔 25 年之后，在被平反时才知道还有一顶“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暗中紧扣在我的脑袋之上。

我于 1956 年 6 月底释放回家，足足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到了 9 月初，才安排工作。

那时候，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借给我所需的生活费，一家大小得以苦苦维持两个多月生计。

似乎厄运从此结束，我并没有回原校而是分配到机关干部学校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能够走上工作岗位为革命出力，又能够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每天从湖西走到解放北路上班，学校的学生都是机关干部。

在晚上进行授课，我每天一直忙到晚上 11 时以后才拖着劳累的身体缓步回家。快要走近家门时，我已经在解掉大衣的钮扣，回家后我脱掉大衣立即伏案写作。我是多么想：往者已逝，一切从新开始，为革命事业振奋精神，

努力写作，夺回无奈何损失的光阴。

1957 小说《不幸的遭遇》，寄给人民出版社。接着机关干部学校开学，又是忙忙碌碌起来，那时我 39 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党为国出力的好时光。我非常珍惜这个好时光，上课、看书、写作，挤满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着我。一个蓬勃的生机出现于全国：真正是春天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胸怀，知无不言，每个人更感到党伟大。我兴奋的心情凝成了激动的诗情，我写出了许多诗篇寄给报刊杂志发表。

1957 在茁长，万民都在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师职工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传达完毕，照例是小组讨论。全校沸沸扬扬，大家敞开肺腑，畅谈所见所闻所思，发言极为热烈，充分显示了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赤诚爱戴，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在市府小会议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谈会，参加者抢着发言，副市长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点头称好。记得我的发言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话，我早已变成幽灵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让历史去评定，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终于搞清楚了。反正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当然不是，将来也决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时间老人会作公正的结论。

决不是由谁说了算数。”这次座谈会以后，我接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指出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党整好风，以求得我们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在 1957 年春夏之交那段时间内，我在各种会议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反对不分国情、不分气候条件，什么都学习苏联。我说学习苏联应该取长补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说农民生活并没有富裕，而是相当贫穷；三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四是不懂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到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担任领导？领导者应当钻研业务。

万万想不到这几条论点，却变成了“毒草”！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自己嘀咕：“收了！不放了！”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总不会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风向确实是变了。

我意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一个灾难时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正在筹备开学工作，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便看见我的坐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八个毛笔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为何要贴这几个字给我看？难道我又一次犯了什么“胡风案件”那样的滔天大罪了吗？等我坐在椅子上，办公室外面就听到喊声：“大家出来看大字报！”原来在院子周围已经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对面语文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摊开了大报纸提笔写着什么，院子里的布告栏前面，也有不少老师在看刚贴出的大字报，气氛异常严肃。

原来那些大字报都是反驳我的大鸣大放的言论，大家起来铲除我这株“大毒草”。

后来，周围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见时连笑脸也没有，我再也听不到“同志”、“老师”的称呼了。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的友人，今天却满脸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转头同我擦身而过。我一下子变成了“人民之敌”。

我下班回家，见到门口上用粉笔写着“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报纸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从街边墙上贴着的报纸上阅读所谓“批判文”，但每次读毕，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不实之词也不感冒火，因为我很坦然，我只是莞尔笑之：这天下真妙，我们这亚洲大陆之上，无聊文痞何其多也。

在一次“批判”我的诗作的大型座谈会上，组织了整个小城里的语文教师、文化人参加，由一个组织部派来的人主持会议，他手里拿着一张发言稿，提出要批判我的“文艺思潮”，他说：“你这个右派分子，长期以来恶毒反党，你的言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今天我们来清算你，你应该坦交代你自己的文艺思潮！”我听了他这么说话，觉得奇突，有些文不对题，他要我交代什么“文艺思潮”，真把我搞糊涂了。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几个教师手边都有一叠书本，我不知道他们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主持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实交代，不能缩小也不要扩大！你的文艺思潮是谁主使的？”我听了这段开场白，几乎喷饭。我的眼睛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会场内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语文教师，有些人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成为众矢之的，本来相当知交的友人，如今彼此相见也同陌路人了。

我的心情澹然，好像已经蛰居深山寺院削发为僧了。我正在独自感慨之时，会议主持人又催我说话，他说：“你们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个一个右派跳出来了。你们这批牛鬼蛇神出洞了，现在你想装死吗？你想一言不发吗？老实交代谁主使你的文艺思潮？谁主使你写出诗来向党进攻的？”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人在翻书看，有些人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有些人以惶惑惊骇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又不得不“遵命”地说些什么，我说：“我不懂有人主使一种思潮。我认为人世之间不可能某一个人真正完全主使人的思想，即使是奴才、奴隶，他们的主子也不可能真正完全主使他们的思想，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思想影响，那是可能的。我走上文学道路，根本没有人主使我。我喜欢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没有来主使我，他早已死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存在于世，也流传到中国。是不是影响了我？那也不能说肯定的话。是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可以一下子武断。我也读L·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看有些人在忙着翻阅桌子上堆着的书。翻翻这一本又翻翻那一本，并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也读高尔基的散文，普希金的诗，也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我很喜欢雷马克的笔调，我还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契河夫的三个剧本和莫里哀的剧本，我都爱读……”。

主持人说：“住口！谁要你背这些名字出来？他们都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家伙，你们臭气相投！现在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大家要拿出打落水狗的精神来！”于是有一个中年教师手里拿了一张油印纸，说道：“这些诗，我都仔细看了，右派分子利用诗来向党人民进攻。有一首写着‘我戴了白色口罩 / 在寒风中踽踽而行’……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是白色恐怖的，多么阴险恶毒！”我立即辩说：“不要硬扯，白色口罩就是白色恐怖吗？我写白色口罩，完全是真实的描写，毫无他意，不可牵强附会。也搞不到白色恐怖那方面去，难道口罩有黑色、红色的么？”主持人伸出手臂指着我说：“你！你！你狡猾！你想逃过关吗？”接着，另一个人翻着油印了的我写的诗稿，说：“这首诗写他自己去探望友人时的阴暗的心情：‘我 / 走过他家门口 / 望见窗子

射出温柔的灯光 / 我伸手去敲门 / 但是缩回了手 / 我不想但是又多么想去跟他聊聊……”你们瞧这首诗，恶毒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完全在一片恐怖之中，看望一个友人在心理上蒙受压抑！这是右派分子的心理！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我听着这些对我的诗的所谓“批判”，发觉一些功利主义者的头脑膨胀得非常厉害，我再也听不见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只顾独自思考了，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掉入一个可怕的深谷，谁能预料到未来会怎么样？我为胡风冤案蹲牢狱一年之后又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的生活就在一次又一次“批斗”的灾难之中延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文化界“批斗”我的大会。当我来到大会堂前时，只见大会堂门前贴着两幅漫画海报，说我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另一幅绘着我和胡风、梅志、蒋介石“坐”在一张方桌边，说我们在密室“策划”向党进攻。大会堂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并且要我全都看，我来不及仔细看，有些大字报像旗帜一样高挂在大会堂中间的绳子上，我的视力又极差，根本看不清那些纸上的毛笔字，但是命令下来，非看不可，还说必须看得仔细，要记录在笔记本上。人民大会堂会场里挤满了人。有些是我熟识的，有些是我亲近的，谁也不跟我说话，我自己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去逢迎。即使逢迎也无人胆大包天敢同我说话。我又不愿说什么违心的话，于是，只好沉默！

批斗的第三天下午要我检查。我登上台，手里拿着“检讨书”，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党的动机，也没有反党思想。我说：“我忠心耿耿听党说，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就尽量说了话，党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么，我确实弄不清楚党说这些是否算数的？”这时，台下有些轰轰然，接着有人站起来喊“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于是全场呼起口号声，我的生命在孤寂的山谷之中，四周回荡着振耳的轰鸣。这次谁也没有上台来“驳斥”我。有两个人事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白纸，在讲桌前摊开，白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毛笔字：“攻克顽固堡垒”。

就这样，我被“攻克”了；就这样，整整三天兴师动众的批斗大会结束了。自此以后，这个小城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出“批判”我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半版冠以“臭不可闻的……”大字标题。我每次读后总是不禁失笑，一味嘀咕：奇哉！

奇哉！奇也！奇也！

1957“右派”帽子既然戴上了，只得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信念。我在梅山盐场总是拼命劳动，每天从工地拖着疲倦的身子收工，来不及洗去满身海涂泥浆，就拿起扫帚打扫工房、宿舍和院子。我的小队、中队里的人除掉像我这一类“右派分子”之外，谁都嘻嘻哈哈，喝酒唱歌讲笑话；而我们这类人既笑不出也哭不成。板着脸到食堂去，也只能买些最劣的菜，如果买了一块肉或一块排骨，晚上开会时就要挨批，说什么“右派分子也吃上肉”啦、“享受干部待遇”啦、“甭想改造好”啦。

每天晚饭后，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全体集合，中队长训话，总不外乎讲点白天劳动情况、表扬与批评之类。从来不会表扬我，挨批评却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我们每天到山上去背树，这树与大石块一起是筑海塘垫底的，树的叶子桠枝全部保留，故而从山上背到山脚下是很重的，肩上压得肿痛但也不能吭出声来，有时整棵树背到半山腰，脸上已分不清淌着的是泪水还是汗水。一个上午每天要扛三棵树下山。

也就是每个人一天要上山下山背树 6 次，身上穿的破棉衣，而贴身的

衬衣却给汗水浸透……到了晚上大队集合，大队长训话时要批评，说我背的树都是“龙头烤”，“右派分子”狡猾偷懒，专拣小树背，是抗拒改造的表现。偶尔听到前几天在一起劳动的京剧团团团长自杀了，送医院急救，救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他和我对视时的微微一笑，仿佛又见到了他咬紧牙关挑着一担石块，扁担压在肩肿上，两只装石块的竹畚箕晃来晃去，走路的步子歪歪斜斜的神态。

到了围封海塘缺口的那天，真是紧张极了。我所在中队负责溜送泥块，我们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竹杆，在溜泥板上拨送着接连不断飞驰而至的泥块，不能停留一刻，一停留，泥块便立即飞来堆在我的脚旁，那可耽误了大事，像我这类“右派”身份的人，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身上手上脸上全是泥浆，双脚站在泥浆上要下沉，所以站在一块竹编的垫板上，时间站久了，垫板在身子的压力下渐渐地下沉，一直到我的脚都陷入泥浆中。为了争取退潮时间把叫做“塘门”的海塘缺口堵住，吃午饭时我们双手中的竹杆仍是不停地传送泥块。为此，食堂来了许多中青年妇女，把肉包子塞到每个人的嘴里，喝水也是由她们喂的。长龙般的整条流线操作完全机械化了。我只知道双手拿了竹杆往后拨送前面滑过来的一小块泥巴，人似乎成了高速运转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小担山挖泥、帮助泥水工盖屋时，中队长带了一个人找我，该人板着脸孔，严厉地叫着我的名字，说：“过来！今天给你定性做结论了，你在纸上签个字，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说完他从皮包里拿出4张打了铅字的纸，翻到最后一张，指着空白处要我签个名字。我说我没有笔，此人便从左上边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抓住钢笔，要翻阅纸上写着些什么，这4张纸一条一条列着我的言论罪行，有几条是用纸粘住了的，显然是不给我看的，我要撕开纸条看，此人竟然按住我的手，不准我撕开粘住的纸条，他有点恼火地说：“不准撕！”我说：“你不准我撕开来看，我怎么可以签字？”他说：“就是要你签字盖手印！”他抓住我的手，我手里还捏着他的钢笔。我说：“我不看清楚就不签字”。他硬是要我签字，我也火了，我把他的钢笔往海涂里扔去，说：“你不准我看，我就不签字！”他说：“你这样抗拒到底，好！好！你不签字也可办你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愤愤地收起纸条，夹着皮包走掉了。

我脑子里混乱不堪，像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惶惑起来，我又对自己宽慰地说：“大不了多吃点苦头！大不了是死！”那个走掉了的人，姓什么，来自什么单位，我都不清楚。后来听说他姓王，是文教部门的干部。过了三天，他又来了，我正在海涂里劳动，中队长派人来叫我不劳动了，回去收拾我的衣物行李，那个姓王的矮个子也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

我离开了梅山盐场，回到宁波，立即被押入大狱。从此，冬寒暑蒸，屈辱悲惨折磨了我二十多年！我活下来了，终于活到了老已至，真是奇迹！我的一个亲人，见到我写这些往事而为我忧心，她怕历史重复，怕我再遭殃，我对她说，我写的是真实，为的是冀求历史不再重复，为的是鉴之戒之。

我庆幸这么多年的灾难没有扭曲我的灵魂。

1996

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公刘——我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 1958 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 70 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料，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方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趑趄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癜。

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 1500 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 30 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狂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

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一根

电线杆子冲去。

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和车上的土保住。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 斤的黄土，150 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

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远处山腰开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下行，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动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竭，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

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 300 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然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 米、10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悟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粱地里填筑

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粱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8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了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不是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的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三五青山，好似一样淘气的邻家少年，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铁，究竟藏在我哪一只手心？”中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中中中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的思想状况，既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国”！

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笔，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大枪。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轮着供应。

男女分灶，只能扎在男人堆里，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

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献给国家

了，吃甚呢！”我听了，不敢吱声。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不像如今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场，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二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日一通你祖宗，遇上成份高的，那活该批判“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古香林座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

为了探矿，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深山凹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这天，我们正走着，突然间，空谷里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我茫然地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们仍旧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地味道。

我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沙沙乱响，还没等我作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无比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我下意识地斜着眼睛膘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操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嚎，顶着我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自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瓜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蹿了一蹿，该死的畜牲！我又挥舞起探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调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

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地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探矿锤的尖端不但沾着狼的血，带有哆目糊和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右派”，竟然教恶狼变成独眼龙了！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啊——啊——喔啊——揍狗日的啊——好啊——揍得好啊——好啊——这一回的呐喊，显然是助威，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

日的？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地跺脚，表示他们的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感谢你们啦！

洪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疙瘩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您；我就怕您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了。哎呀真个吓杀我了！”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您的名字赖，你看，您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哈哈大笑。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的确是为了找到铁矿，完成任务，哪怕是立上一小功，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

写到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大干系了，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怪异，把儿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死命！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一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忘记，人家给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般般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 20 天；1984 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鸿福？！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罢。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把这句俗语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追求

秦兆阳我是 1958 年 7 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7 月 25 日被宣布开除党籍。从此我才知道帽子压在头上的滋味。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您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所以，1961 年 11 月宣布摘掉我的帽子以后，当个别朋友暗地里祝贺我的时候，我说：“我并没有感觉到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因为，并没有还给我那被取消了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心并没有归还原处，我的灵魂仍无所依，我的生命仍无寄托。虽然拼命工作能够弥补一点内心的空虚，但那

不过是暂时的，是一种勉强安慰自己的办法。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只要努力为革命工作，像一个最好的党员那样工作，就仍然是个共产党员。”不，我没有这样坚强，我是个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11月脱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过多少回，脱帽以后，直到1979年3月“改正”为止，十几年中仍然痛哭过无数回，有两三次哭成了严重的眼病！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大先生”。这是从幼年时代就养成的，遇事“较真”的认死理的性格，参加革命以后，党又培养了我这种“认真”的性格。

所以，1962年春天从柳州机械厂被调回南宁以后不久，我就向党组织提出了请求：“即使是让我重新入党也可以……”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答复。

1964在柳州某中学工作)，我也请假回北京看望孩子们，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想趁请假的机会向上级探询一下入党问题是否有希望解决。

“××同志，请你很坦率地告诉我吧，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党内来？如果根本没有可能，我就死了这条心，也许内心的痛苦倒可以减轻一点……”“你到了北京以后，去见见A同志吧。”“我向来不习惯于看望地位高的领导同志，而且他一定很忙，不容易见到。”“一次见不到，两次；两次见不到，三次；多碰几回钉子，总会见到的。”这是我向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请假时，互相间的一段对话。

接着，我又去找自治区的文化局长请假，并且趁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不料，局长的回答竟跟上述宣传部长的回答一模一样，两人像是对过口径的。

“怪呀！”我想，“也许我的入党问题关键在于北京的A同志是不是点头吧？”回到北京以后，矛盾啊！我的事就是他们制造的呀！现在我想重新回到党内来，还要去哀求他们吗？所以我一拖再拖，从7月拖到了9月，老伴不断地督促我，责备我：“你这几年干痛苦万痛苦，现在广西的领导同志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还不老着脸皮去找一找？为了党籍问题，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9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先到×××胡同××号去找我最不愿意见面的B同志，为的是打听A的地址。离开北京已几年，谁知道A搬到哪儿去了？没想到，B不在家。我只好到隔壁C同志处坐了一会。当时，从报刊上看到，正在大批《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全国文联正在“整风”。所以C同志告诉我：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他要带领一部分文艺干部到山东曲阜下乡搞“四清运动”。

那个县农民生活很苦，要“三同”，他有胃病，很担心吃不消……他谈得很坦率很亲切，像不知道我是个“脱帽右派”（这使我至今想起来仍很感激，那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温暖，就会使我心里发热，就会终生不忘）。他并且把A同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告诉了我。我感激不尽地告辞出来，没想到，正好在门道里碰见了B同志刚从外面回来。

我只得用像几年前共同工作时的口气，叫了他一声“××同志”。他也感到意外，“啊，是你！”然后让我跟着他进了宽大、敞亮、书柜上摆满古瓷的工作室。

落座以后，就谈起话来。我说明了来意。他说，A同志最近患心肌梗塞，身体不好，恐怕不宜于去打搅他。不过他还是把A的地址告诉了我。接着就说起他自己的忙碌来了：某同志、A同志、还有他自己，是个三人小组，领导文联整风，每天去上班。

……我想：“可见A还能工作。可见你现在更加成了重要人物，可见又

有多少同志的命运操在你们手里！？”“文联整风，事情很重大……”他说了一半又转移了话题，“你在广西还好吧？脱帽以后分配了什么工作？”还是那熟悉的圆润的喉音。

我告诉他：当地组织上对我很照顾，让我在文联专职写作。

“啊？”他像是出乎意外，“我还以为你在《广西文艺》当编辑呢！”意思很明白：你还能搞写作？能当编辑就不错！

他的长方形白脸忽然像是有点冷冷的了。我就赶紧告辞出来了。

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一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那是1958年7月下旬开除党籍的前两天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我的结论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的。很明显，意思是要我不要再存幻想了。当天夜里我真像五雷轰顶，又像堕入了深渊，睁着眼睛看着黑夜，看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一夜未眠，天不亮就不知不觉出了门，像游魂似的，身不由己地在附近的小胡同里飘游晃荡。天刚粉亮的时候，竟不知不觉地晃到×××胡同××号门口了。

正好传达室的同志开了大门，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晃进了大门。传达室同志声音沙哑地问了一声：“你怎么……？”他大半也知道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没有回答他，不知不觉就飘晃到了B同志的住室门外。站了会，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里面才问了一声，是带着睡意的声音，是那个圆润的喉音。

我回答了一声：“我。”里面又是好半天没有动静。我只得在屋檐下冰冷的石阶上坐下来等着。

又过了好半天，听得见屋里起床、穿衣裳、拖鞋、跟老婆小声嘘嘘的声音。终于，外间屋的门开了，露出半个高大的身子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圆润的喉音，但是冷得令我发抖，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于是，我含着眼泪，只觉得周围都是云雾，我在云雾里飘浮。……忽然，我的胳膊被一个人捉住了，抓得紧紧的，颤抖着。

“我……发现床上没有人，就，赶紧出来，悄悄儿，跟着你……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啊，我的妻子，只有她深深地了解我！

当时，我俩在静寂无人的小胡同里抱头痛哭，好久好久……现在，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耳朵里又响着几年前听到的那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是圆润的喉音，更加冷得令我发抖。因为，经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体会到了，像我这样的人，半人半鬼的人，即使人民看着我不顾死活地工作，对我并无多少成见，有的人甚至还抱同情，可是，在人的世界里做鬼……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怎么能死心呢？不能啊！于是我给A同志打电话。他的女秘书问了我是谁，然后告诉我：A同志到天津去了，不在家。他的心肌梗塞病很严重，干吗不住医院？干吗要到天津去？我只得又到他的公寓去找他。传达室里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不在家。”到哪里去了？“反正不在家！”很明显，反正是不见我。

是不是应该死心了呢？不！好容易回到了北京，既然已经耐着性子老着脸皮开了头，那就追求到底吧！而且，老伴又不断鼓励我——她是希望，

万一我能追求出一点眉目，不再总是觉得活不下去，不再总是在精神上折磨自己，她也就放了心，她也好做人，而且孩子们的处境也会好起来。

于是，在又犹疑了大约半个月以后，我又鼓起勇气到×××胡同××号去找B同志，希望他能在A同志面前为我通通款曲。不料，这一次不但B不在家，连隔壁的C同志也已经到山东曲阜去了。

我只得失望地推着车子出了大门，向西边走去，打算去看看D同志，因为报刊上已经在批判他了。在1958年上半年批判我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他是对我暗抱同情的。现在他也倒霉了，我能不顺便去看看他吗？可是，我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背后不远汽车停车的声音。回头一看，一辆黑颜色的小轿车正好在××号门口停住了。我认得这辆汽车，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必定是B从“三人小组办公室”回来了，我心里一喜：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这时天已黄昏，看不清汽车里面的人。我扶着车子等着。怪呀！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吧，既不见开车的司机出来，也不见坐车的人出来！

我只好又推着车子往西走去。几步以后回头一看，车门开了，B同志那高大的身影从车里钻出来，走进大门去了。

啊！“你以后还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嘛！”——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这句话，多么圆润的喉音，然而又是多么令人发冷！

我连忙跳上了自行车，简直不记得是怎么走进了D同志的家。我泪眼模糊地看见，他正跟他的儿子面对面地坐在桌边下围棋，他的老伴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观战。

他只对我点了点头，示意叫我坐下。

我呆呆地坐了五分钟，彼此一句话也没说。在那样的时候，有什么话好说呢？有什么话能说呢？虽然我很惊奇，在这大受批判的时候，他怎么有心思下围棋？可是，当时我怎么好拿这样的问题问他？等我重新骑上车子在小胡同里东弯西拐的时候，这才想到：是的，他只得下围棋，他应该下围棋，应该以此来追求内心的平静，因为他的身体实在经不住风浪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D同志的面。在十年浩劫当中，他比我还更不幸得多。其实，他真正是一个十分蹩脚的棋手，不可能在下棋的游戏当中追求到内心的平静。）当时，北京的街道像在雾中，像在水里。我在用眼泪染湿北京，北京也在用眼泪染湿我。回到家里以后，老伴几次问我：“有点结果了吗？”我声音沙哑地把情况简单告诉了她。她痛苦地闭上眼睛伤了一会，大约是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我，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潮起伏，喉头酸哽，不知道过了多久，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我的心能够冷下来吗？能够浑浑沌沌地混日子吗？能够麻木不仁地活下去吗？不能啊！你们哪里知道，如果让我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心里积存着多少热力！”我忽然想起了鼓励自己的四句诗——是步鲁迅先生的原韵而反其意，但其内涵的悲苦而又炽热的滋味可能有些相似：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

若蓬柳绿江南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江南雨”在“柳绿”的时候，意即南方的春天，意即希望能够在广西重新入党。

1985（选自《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忆肖也牧

秦兆阳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悼念死难同志的文章，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写文章悼念我所怀念的死难战友。20年的不幸使我与他们疏远了，许多新的情况不了解，许多旧的情景模糊了，某些“关系”牵制得不好说话，刻画性格和抒发感情又不易，自己“改正”后要做的事情太多——这都是我未能动笔的原因。近年来精力衰退了，对许多想干的事情不能不总是“且听下回分解”，不知不觉就犯了老年人爱回忆往事的毛病。

历史在咀嚼着生活的滋味，大地上浸透了欢笑与眼泪。

消逝的未必会全部消逝，泥土在抚慰着衰草的根须。

流出的如果是滚热的血液，终归会给人间添一点生机。

这是我的一本被冷落了20余年的长篇小说有幸再版时，我为它写的几句卷头诗。

我想，这诗也可以用来说明我对于那些不幸逝去的人们的心情。

我常常想念肖也牧，虽然我与他之间交往并不算多，相知也不算深。这原因，大概是跟“最早”二字颇有关系。有四个“最早”：他是解放以后最早受到批判的作者；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是我经手发表的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他和我都曾经最早对这一批判多少表示了一点意见；在我被“划”掉了的20年中，他是最早（其实也是唯一）向我约稿的人。

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晋察冀边区作群众工作和报纸工作，我在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不记得是否跟他见过面，也许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写的通讯，才知道他的名字。解放以后彼此是怎么相识的？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几次约我去中山公园的茶室喝茶，跟我谈论他的写作构思，征求我的意见。那时他颇有些青年气，单纯、直率、随便，对自己颇有信心。

于是他给我寄来了《我们夫妇之间》。

我知道，老干部进城以后，对文化低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渐感不满。这样的事决非个别。《我们夫妇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明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作品是不是对夫妇双方都多少有点不适当的描写呢？因手边没有原刊物，不及查考。但无论如何，作品没有重大原则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我和他当时都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批判“忘本”思想的小说，竟对他以后的命运和文坛的空气产生那样大的影响！

现在，在事隔几十年以后，我不由得会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给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觉。作者一点也不顾及别人可能产生的联想，这在解放初期那种政治气氛和道德气氛下，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

从此，直到1956年夏天，我跟老肖只接触过三次。一次是他来约我为新创办的《红旗飘飘》从刊写稿。第二次是来让我看《红旗谱》的原稿，让我提供一点参考性的意见。两次接触中我都没有问过他对受批判的感想和看法，以及批判对他的处境有什么影响，虽然我在暗暗为他难受。为什么不问？也许是不愿意触及他的内心的伤疤，但更主要的是他那坦率真诚的态度一如既往，向我约稿时那么耐心，请我看稿时那么诚恳，好像并没发生过对他有

什么影响的大事。

第三次——1956年夏天，他给我送来一篇他自己写的短文章，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感得好！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诚恳地承认过去那次批判对他有益的一面；二是说了一些他被批判以后到处难以见人的情况（但写出的比他当时跟我谈到的要少）；三是由此提出建议；文学评论不要把自己人当做敌人来打，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

当时我问他：是不是对遭遇和建议说得不够？为了有益于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否可以作点修改？他同意我的意见，要我看情况替他修改一下：“由你全权处理。”于是我替他作了一些修补，发表在1956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了。

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来往。一直到相隔20余年以后的1970年，我才知道他也在1959年经我作过修改的那篇《有感》，是不是他被错划的原因之一呢？我一直有这种猜测。

并有负疚之感。我所知道的，只是《对肖也牧……有感一文的修改情况》，在1958年以散发。

这也许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件小小的“史实”。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明白真相，也为了纪念肖也牧同志，特将我的《修改情况》节录于下。

原文：“我认为……这一次批评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也使大家得到了益处……”秦改为：“从我自己的切身经验来看，过去那次批评一方面固然给了我很大的教益（这是我一直到今天还十分感激的）；另一方面却又因批评文章有不够完全妥当之处，而对我和读者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原文：“以上所说的……对我……的批评，多少有点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对待一个好人。这种批评所引起的种种事情，所形成的一种空气，确实是很可怕的。”秦改为：“以上所说的……批评，我以为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这主要倒不在于……给被批评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它所产生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后果，使被批评者再也不能复活，并且给其他作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威胁。”在肖的原稿中谈到自己出去作组搞活动时不敢用肖也牧的名字，秦在后面加了一段描写：“甚至我到某些机关去办事情，会客单上填写的是我的真名（吴小武）而不是肖也牧，不知怎么竟也有人知道，窗户外面竟会出现许多好奇的：合有轻蔑神气的眼睛，和‘肖也牧，肖也牧’的声音。……只有一个人坏到了成为‘癞皮狗’和‘敌对阶级’时，人们才不会原谅和信任他。”下面秦还删掉了一段，内容是：组织上要肖写英雄罗盛教的事迹，但又不准他去朝鲜前线收集材料，而是派别人去代劳。

这里要作几点说明：一、我的修改在于强调批评所引起的社会效果，但并未减弱肖也牧“诚恳接受”的态度，相反地有所加强——是为了“站住脚跟”好提出建议。二、最后的那段“描写”并非我的臆造，而是肖也牧当时对我“举例言之”的。

三、不准他去朝鲜前线的一段其所以删去，是考虑到也许会引起他所在单位的反感而对他不利。四、即使是读一下上述的节文，也可以看出肖也牧是诚恳地想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来促进“双百”方针更好的得到贯彻。我认为，我和他都是倒霉在这一类的诚恳和认真上。

1958-1968年是由于看到了《广西文艺》上连载的我写的《两辈人》，颇为赞赏，希望写完以后给该社出版。被划成右派后还有出版社向我约稿，这真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当时估计，这很可能是肖也牧起的作用，因为只有他

知道我有很多战争年代的素材，立志要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也只有他知道，他的老友这时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支持；也只有我知道，他这样做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人之相知，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从别的同志那里得到了证实，我的估计是对的。但当时我没有给青年出版社回信——原因和心情，正与他之不能去朝鲜前线的道理相近似——我当时倒是颇有自知之明的。

1958 干部会议，宣布作家协会的“大跃进规划”。会后，我出于对大跃进的盲目热情，写了一篇数千言的《建议书》交给了党组。总的意思是建议加强文学工作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具体办法是：组织一些作家去工厂、农村、机关，帮助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协助群众写工厂史和农村史。后来，在我 20 年的不幸中，为了寻求精神支柱，解除内心的苦闷，许多革命回忆录就成了我如饥似渴的读物。而读得最多的，则是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专门刊登革命回忆录的《红旗飘飘》。直到 1979 年我跟原在青年出版社工作的一位编辑同志谈起肖也牧来，才回想起：原来这个刊物是肖也牧和另两位同志在 1955 或 1956 年创办的，那时他曾经找我约过稿。

肖在上述《有感》一文中说自己是好人，这“好人”两个字，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看法的天籁之声，是理直气壮而又当之无愧的。试想一下，全国解放初期，他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以致于成为社会上的“无面目焦挺”以后，竟然最早地创办了一个发表革命回忆录的刊物《红旗飘飘》。如果他心里没有一杆经常飘动的红旗，能够竭力地开创这一工作吗？他在编辑工作中辛勤的劳绩，认真的态度，对青年人的耐心帮助，直到今天，仍然使得在他下面工作过的同志怀念不已。他从来没有权位之心和名利之念。他只知道工作。划为右派以后，仍未放下手中的笔。

也牧同志哪里会想得到，我们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旗，竟会在夺取了全国胜利的若干年以后，被反革命的野心家们夺了过去，换成假的红旗，肆意残害那些高举真红旗的同志，包括你肖也牧在内！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犊，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如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余毒立即消亡！

1985

1957：中国的梦魇

邵燕祥人生往事有一些如梦如迷。人类历史有时也仿佛一段噩梦，留下一个哑谜。

1957 数人则是半生。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了，无论是斗争的领导者或当时斗争的对象。

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偶然忆起那场政治风浪，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记得一些人的遭际，记得一些人的嘴脸，记得几句社论，几声口号，记得一种气氛，一些镜头和细节……他们不是历史学家。

至于这一反右派斗争是怎么“爆发”的？从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指

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人们响应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到6月8日党内发布指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四十二天中这样的剧变，是突如其来的吗？是偶然发生的吗？是像有些人说的某些尖锐意见唐突了最高领导人，以致“一怒安天下”？或是像有人说的重演了封建时代的“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1]或者既不突然，也不偶然，而有深远的背景和根源？

[1]《词林纪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谗词云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官及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历史专著。然而，应该感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者，使我们能从已入选的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中，了解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前和反右派斗争期间的思路，了解他关注的主要方面，以及他一直坚持到晚年的一些论断形成的根据和过程。

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也是我们索解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何以在此时而不在于彼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把钥匙。

人们熟知，毛泽东是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的[2]。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他就是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敌我友的基本判断，从而建立起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以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的体系。

[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一卷，3页。

对于作为体系的毛泽东的思想，不仅需要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而且需要发展地即从动态中去理解它。随着党的政治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言行经常突破原有的结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跃变化和实践的灵活性；然而在他思想中历几十年不变的，是要由共产党领导在完成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建设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和努力方向。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初，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内外敌人的存在与活动，经济和政治的困难，认为立足未稳，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1950年3月12日）[3]；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许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未来”（1950年6月23日）[4]。他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阐释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

[3]《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毛选》第五卷，13页：“……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4]《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27页：“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

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

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5]

[5]《不要四面出击》，《毛选》第五卷，23 - 24 页。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一切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社会力量，即属于“人民”的范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许诺选举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后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15日）[6]半个月后，他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重申：“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7]

[6]《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选》第四卷，1400、1403 页。

[7]《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3 页。

理解“人民”是什么，相应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密切相关，与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所指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统一战线的内涵是有变化的；而无论在哪个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1949年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并不是平行的。当时有人解释五星红旗，说一颗大星代表党的领导，得到首肯，说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四个阶级，其所以受到批驳，就是由于这样的误会。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8]，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

胜利，并在胜利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8]《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选》第四卷。1375页。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就是指当时和后来习惯所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是以他们“能够同我们合作”为条件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要去“团结”的“知识分子”，同与工农一起作为“基础力量”亦即党的依靠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加以区别的。后者即革命知识分子，一般是指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是已经或正在实现“革命化”的；前者即所谓现有的知识分子，早在1945年毛泽东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时，就指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9]，这就是说，现有的知识分子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对党在革命斗争中和革命胜利后各项任务的“有用”之材，才能成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将格格不入，一事无成。

[9]《论联合政府》，《毛选》第三卷，1031页。

在统一战线内部，或者说在人民内部，在作为团结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了”，“多少有点可能团结”，处于团结的边缘。毛泽东对于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如蒋介石，是认为看他的过去便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便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的；他对曾经是敌人和对手而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的人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二毛泽东确实是如有人所说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领导者。

到1952年中，他就把确认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课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这一年6月6日在一个批语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0]

[10]《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毛选》第五卷，65页。

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从此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尽管在几年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并未因大会通过的决议而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1]如果说路线分歧的话，那末从1956的不同提

法的路线分歧，是确实存在的。

[11]《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而在1952年，这样的路线分歧还不存在，产生这一路线分歧的前提还不存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还没有基本完成，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2]，而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说，“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13]。

[12]《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13]《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1953年6月至8月，毛泽东以批示形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4]，把这个不同革命阶段的“暗转”公布出来，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广大群众了解当前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一般是在1953年秋冬以至1954年了；而这一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对于当时没有读到过七届二中全会文件[15]的许多人是大出意外的。由于以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有一个搞“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一些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样三句话，被批评为不愿遵照甚至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16]。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里面，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耽于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觉，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错位。现实将纠正这一错位。他们终将在现实的教训面前，意识到自己在新的革命阶段即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最初说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后来订正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7]。“三大改造”大大提前在1956年初宣告基本完成；而从1953年算起十年到十五年后，正是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一切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自然理应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总之，这就是横在人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关”。

[14]《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15]主要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选》第四卷，1362页。这一著作收入《毛选》第四卷，是1960年第四卷出版才公开的。

[16]《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17]《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开宣布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报刊广播的宣传和公开发表的文件一般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为1953年8月；毛泽东接着就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8月），在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9月）[18]，意图借此“典型”，在全国开展有关总路线的“辩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它同毛泽东不久以后为所谓胡风反

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反右派斗争中一系列的文章，影响了名为思想辩论实为政治批判的一代文风，影响了政治风气，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和政治准备。

[18]《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90页，107页。

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年代，毛泽东强调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那末在建立了共和国，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还存在领导权问题呢？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回答道：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19]。

[19]《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 115 页。

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经常担心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在一切方面巩固树立起来，加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的论断的影响，在中共决策层也形成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的共识，毛泽东以特有的敏感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或者说搜索敌情。

毛泽东作为宏韬远略的军事家，时时记住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基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性考虑，他在总结高饶事件时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20]。

[20]《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153页。

这时，首先进入毛泽东视野的除了1955年4月被捕的潘汉年的案件以外，无疑就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1955年5月写道：“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1]这与十一年后1966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思想是一贯的[22]。反胡风斗争的规模虽然不能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但当时确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自1955年7月1日展开的新的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23]，“在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24]。

[21]《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的序言和按语》、《毛选》第五卷，163页。

[22]在1963 - 1965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为“四清”运动），就是从基层政权有大约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出发的。

[23]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列举

的成绩中有：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已经定案的有八万一千多名，其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同时，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24]（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200页。

与此同时，围绕着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和粮食问题，正进行着遍及党内党外上自领导下至群众的一场辩论。有些地方还发生死牲口等事件。毛泽东形容“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25]而到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已经以胜利的姿态总结说：

[25]《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33页。

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26]

[26]《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199页。

其中“反唯心论的斗争”，指“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送走了1955年。迎来了1956年。在批判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以后，农业合作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印证了毛泽东“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的论断[27]和从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对群众运动的信念。这时在“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推动下，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声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一夜完成，1956年一个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1956年1月30日的发表；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将要到来。全国仿佛都在一片热浪滚滚之中。

[27]《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29页。

三 1956 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28]。

[28]《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出版社，1963年9月。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讲话，对此讲得更加明朗：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烧到自己头上来了。[29]

[29]《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30]

[30]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7页。

这个成绩为主、缺点错误次之的二分法，不仅指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而且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估计，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指出，“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低估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31]联系到毛泽东曾经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就可以知道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时常在对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上相邻的。

[31]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明确宣布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地位；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没有丢，“第一法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32]。特别是1956年夏秋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关注和分析国内各样社会矛盾的同时，把许多思想、舆论和基层少数人闹事的动态，都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和挑战这一背景上来认识了。他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33]

[32]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2页[33]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我们现已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毛泽东在那前后的讲话或文章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从七十年代初他同爱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说“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个观点恐怕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产生的。

个人崇拜——后来又改译为个人迷信，加以区别——问题的提出，还是那个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34]

[34]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4页。

毛泽东批评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指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35]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解决，并且不是在 1957 年而是早在 1945 年以前，在中央领导的解放区已经解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宣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36]

[35]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 页 [36] 《毛选》第三卷，1019 页。

毛泽东借用“大民主”这个词，提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大民主”相区别，前者泛指过去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包括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在内。“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至于教授“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这话是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说的，不是已经为半年后的反右派斗争勾勒出了蓝图的轮廓吗？毛泽东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紧紧抓住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个纲，眼睛紧紧盯住了“扩大”了的资产阶级的动向。本来，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37] 1956 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他说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说到电影《武训传》中的一枝大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38] 这话是 1957 年 1 月 27 日说的，前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整整一个月。

[37]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4 页。

[38]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8 页。

毛泽东这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到定息问题时说，“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夺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一年以前，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曾经提出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39]。一年之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时候，指出：“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40]。

[39]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158 - 189 页。

[40]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3 页，351 页。

仍然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讲到“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

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说，“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虽然没有定量分析的数据，但国内“许多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总是令人惴惴不安；“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41]因此，“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42]

[4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42页。

[42]《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52页。

毛泽东在1月27日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就是后来施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随后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者同年6月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表，后者直到60年代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公开发表，都对当时讲话作了“整理”或“补充”）。毛泽东这时真如他自己说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

据一份大事记，后来被称为右派首领的章罗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曾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讲过话：章伯钧在18日会上宣传他的反动的“两院制”思想，说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日趋完善充实，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罗隆基在19日会上开始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说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43]

[43]《四个月的大事简记》，《1957年的春天》附录。学习杂志社1958年4月出版。

手头资料不足，不知道罗隆基有两句涉及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话，是否也是这样讲的；毛泽东一再给予批评，显然认为是要害问题，使他印象甚深：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44]

[44]《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9页。

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

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45]

[45]《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选》第五卷，484页。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46]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夺取中间派”，左派和右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47]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48]。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战场主要在知识界，就是这个缘故。

[46]《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52页。

[47]《毛选》第五卷，425页。

[48]《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5页。

反右派斗争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分别召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期间开始酝酿，随后在6月8日正式开始的——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整风运动是在头一年就决定要在1957年开展的：“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49]这叫作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50]因此，共产党的整风是整作风问题，后来各民主党派、整个社会的整风则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51]；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52]

[49]《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

[50]《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2页。

[51]《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50页。

[52]《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选》第五卷，457页。

这一全民整风自然是涉及亿万人，一直持续到1958至1959年的大跃进中。而在反右派斗争中作为孤立和打击对象的右派，最后划为右派分子的，据有关领导部门公布的数字为53万人。

四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各个阶段的任务，是以对政治形势即各个阶级的动向、态势和力量对比的估计为根

据的。

且看他对 1956 年下半年形势的认识。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53]

[53]《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5 页。

这个“去年下半年”，在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关于经济领域，人民日报 6 月 20 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由陆定一起草、刘少奇定稿的，据说此文中心是反冒进，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是公然对抗毛泽东 1955 年的几次批判，毛泽东认为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有原则性错误。政治领域的大事自然首推八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持有异议。意识形态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思想开始活跃，例如文学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多少揭露了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像官僚主义等等的作品。有些评论性文章开始提倡独立思考，有摆脱教条主义的迹象。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54]；毛泽东的这一洞察，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方面，并且实际被广泛地普及了，例如：有些人反对的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有些人反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自认为 1956 年下半年把阶级斗争“弛”了一下，放松了一下，接着便要抓紧了。

[54]《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5 页。

事情还远远不止是对 1956 年下半年形势的估计，更推广到对“过去七年”的估计：“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1957 年 6 月 8 日）[55]怎样转为真的主动呢？“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56]。

[55]《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2 页。

[56]《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3 页。

这是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是在 1957 年 4 月末到 5 月上半月才确定的，而是经过毛泽东长期的深思熟虑，符合毛泽东从战争时朗开始就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习惯了的思路。因为在反右派斗争前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右派，有些过去本来就是敌人，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革命对象即敌人的；“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57]

[57]《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8 页。

时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当年的“右派言论”，就我们的阅读范围来看，那些批评和建议绝大部分是提得对的。毛泽东在 1957 年 5 月 15 日也说过：“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右派的特征是他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

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58]以“看得出来”判断善意和恶意，指控敌对情绪，这样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据此进行批判，就会离开耳熟能详的“摆事实，讲道理”愈来愈远；据此进行组织处理，就会悖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把敌情估计得严重到几乎要天下大乱，而按照比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左派、中间派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59]其余便都是落后分子。——“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60]在运动中的估计，不同单位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多些，可能少些”[61]，以当时知识分子为五百万人计，所公布的53万名扣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之数，正是百分之十许。终毛泽东一生，他不认为发生过“扩大化”的问题。

[58]《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427页。

[59]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选集》下卷，163页。他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情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60]《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8页。

[61]《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页。

的确，当时有个别遭到严厉批判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张奚若，并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这显然出于我们目前还不知情的某些考虑。

例如，张奚若继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上讲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后，5月15日又讲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他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我们从当时人民日报摘要报道的张奚若讲四种偏差的话看来，都是一些平实之论，不知道为什么会招致毛泽东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功，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62]

[62]引自《班禅大师》，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也许我们只能试作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一样，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而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要迫使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着重斗争，强调斗争甚至认为“‘整’也是治病救人”[63]，一斗一整，虽曰痛快，但势必把事情搞乱。

[63]《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9页。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整风中所谓“鸣放”一说，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来。千百万人积极投入，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希望中国

共产党克服自己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使大量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得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得到解决，避免发生像在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泽东也是立足于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希望通过整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三大主义”的问题，摆脱因脱离群众而可能触发“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64]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整风，则本来就是为了更紧地抓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开展阶级斗争，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避免由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最后形成“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危机。

[6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4-325页。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人们已经看到的了。但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是不是充分汲取了呢？鲁迅在《隔膜》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文中，曾经对历史上的思想、言论、文学之祸作过一些犀利的分析：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

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65]

[65]《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66]

[66]《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

鲁迅的概括是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进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状况，我们更不能简单地以鲁迅的话来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乃至反右派斗争之前，由于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思想方法以至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之间例如党内与党外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感情、语词表达（包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隔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角度、深浅和先后的不同。不过，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宣布“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又来了一次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预演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层原因。

我只是在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努力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去弄清反右派斗争甚至它的“扩大”化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进一步分析就非我学力所及了。

1992

徐铸成 1956《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1955年刚调来的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

（2）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立《教师报》，乃派人与我们商量，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们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个人的前途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来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刻被批驳：“《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另应由部里审阅的稿件，且经由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

在楼梯口与《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相遇，他热情地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纸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晚我回家后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邓拓同志怀恋呢？人代会后不久，我去中南海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粗暴的批判，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新华社不妨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过的新品种，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延请萧乾同志为附页顾问，帮助文艺作品的充实，还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改名为《教师报》城内记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一起交谈。对《人民日报》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之新面貌甚为鼓舞。《教师报》一周出两期，发行数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都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月组织两次编前会议外，多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收报外，可在城内及四郊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六七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

哈哈笑道：“你不要讲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报纸里泡着，能安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们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光把一个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大概觉得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历，我就知道了。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去参加该国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到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浦熙修约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颇熟，立即掏出她的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夜，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主任的严宝礼来看我，得知这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到灯市口的萃华楼便餐。夏衍同志向来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确信。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地候着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说：“我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两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

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同志立即出来会见，在坐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处长。

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通知。请你立即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成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基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现分散参加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夺取一部分回来。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曲。第二，《人民日报》经济组主任钦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请《人民日报》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以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同邓拓同志磋商。”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会见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编辑方针怎样写，我很费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对我说：

“邓拓同志对《文汇报》极为关切，如果你愿意，是否可与邓拓同志约期谈？”从1949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就来谈，说：“邓拓同志很高兴和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人民日报》金鱼胡同他们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同志家中，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落座后，我简单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点点写出来，我思想还不成熟。”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看法：“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

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建立了知识分子们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已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之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基本按邓拓同志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下午分别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同意。张际春同志第三天下午即与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阅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也下来了，除批“照准”二字，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对我的信任。

‘关于钦本立调回问题，曾一再商之于邓拓同志，他答复先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中宣部即将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总编辑名单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附页）、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是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后，地点问题曾有过一度反复，留

在北京呢还是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的《文汇报》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眷属，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以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约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个人客厅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可和分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报的同等待遇，以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小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角四方会谈上，基本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计划，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也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请夏衍、姚溱、罗烈（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另外还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分别地请各方权威人士及《文汇报》老同事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奚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8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必须有一定的质量，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实践有限，应广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邀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宗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体育报》的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审阅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1956年10月1日国庆日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工作，并全面掌握二三版的学术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委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必和浦熙修

同志通电话，有时还向《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前后给我三封信，表示赞扬（后来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公室撬开我的抽屉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当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的感谢外，也体会到他如此支持我们，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启导和鼓励分不开的。

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的30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个就是那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而起为止。不论版面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下场”，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1957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

第二天，我去参加，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陈平守、傅雷、周煦良、孔罗孙、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吴永刚、石挥等都到了，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

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先生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

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界代表按界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有时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说，这正如电影《甘露寺》中所说的：“贾化。”³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携登车，赴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院墙粉刷陈旧，一丈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座椅。我被引到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等在门口。听到康生一一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接着慈祥地对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

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毛主席的赞赏使我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及舒新城，其他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反正没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坐在我对面。康生先说：“今天毛主席全天邀约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地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会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

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派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

毛主席问到：“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北办人员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十二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出发，团员人选已经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惑，怎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在，我挂个空名，大约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这篇文章是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

简单谈些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和苏联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们刚到苏联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后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到苏联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迎酒会，我们应邀参加。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真想不到，我们回去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贬居、或降职。

在那次晚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波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们热情地握手，还和我拥抱。

第二件事情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的前几天，陪同我的苏联外交人员说，赫鲁晓夫可能要亲自接见你们。会谈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文革”时，这张照片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指为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使我多尝了喷气式的味道。

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当年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好时机。

我们决定 5 月 9 日回国。这次访问历时四十四天，收获不少。加上回京后又处理了几天事务，那时所谓的鸣放，已接近尾声。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此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访了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访苏经过。他说：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还是说说报纸的工作吧：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 30 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报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们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入京，必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无非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正式上班。

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

我说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与非党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地回绝了。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谈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会也快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证，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着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盛意难却，我当天去了。发言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党群之间的隔阂即“拆墙”的问题（听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我出来的）。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说他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数。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了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合作。

我举《文汇报》为例，说我和钦本立同志等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率相商，《文汇报》就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作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的业务，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现在领导干部应当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不久进行“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

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的规律。”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一片热诚想介绍当时《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社会上“墙”能不能拆除的争论。即以后来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后来一声令下，“反右”之风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运动是由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接着6月初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序幕。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另一篇社论（据说是伟大领袖亲写的）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了44天，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这就是被伟大领袖指的“《文汇报》写了检查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有些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确指出，“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一切都是早已部署好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开始，市委宣传部希望我接替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立法委员开始点了我的名。我想到风已慢慢刮了，但是还没有想到雨点会溅到我身上来。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于是我们又设法面见这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是不能由您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不愧后来被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时，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为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是有些看不远，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点。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说，“章罗联盟”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吗？我翻阅 1957 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计划、有领导、按步骤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关于纲领性的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宏文印成文字时比 1957 年我们听到的录音，大部分已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创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章罗两位，从而涉及浦熙修，然后抛出索涉兴教授。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以我为中心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新闻界的盟员，最后牵到基层。斗争的方法也非常技巧，当集中力量斗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以立功赎罪。

7 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我，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他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我，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我在是年 7 月 2 日的日记照抄如下：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

（摘自《国情研究》1989 年第 1 期）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刘乃元一与“社会主义高潮”同时，50 年代中期也涌现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出以后，引出一片要求民主的呼声，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变化，接着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事件，谁都不知道这些事和中国的百花齐放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估计总不是完全偶然的。

双百方针宣布不久，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提出脑力劳动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指出，解放前的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有的学非所用，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各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周总理的报告对我真像天降福音！我听了以后不禁充满感激之情。我听说像我这样不能发挥专长的解放前的大学生大有人在，这是解放初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随着形势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展，国家有能力也有必要腾出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我的长期压抑的愿望和理想重新升起，我想，七年以前我之所以决定留在祖国是出于为祖国服务的热忱，现在这种热忱要得以施展了，我受到的歧

视和不公正记忆犹新，但是现在想到，那是因为国家初建，一切尚未巩固，对于我这样一个背景不明的人过多地警惕些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能为国效力于愿已足，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化冰总是比冻冰快。总理的讲话刚刚公布，各大城市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叫做“招聘委员会”，负责接待要求解决归口问题的知识分子。北京的招聘委员会设在中山公园内。我的工作问题早就是全家的一个思想包袱，因此周总理讲话公布以后，父亲很快行动起来，找出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和其它证件去到招聘委员会，事后父亲写信到涑水告诉我，接待的人很热情，那办公室外挤满了要求解决问题的人们。我的事做了登记，留下证件，告诉父亲回家等待通知。

我并没有等很久，招聘委员会还没有任何答复，我却收到新华通讯社的通知，叫我去新华社干部处去应试，准备做翻译工作。这是因为老朋友老江推荐了我。他是继两年前推荐我失败以后再次为我努力，为此我对他十分感谢。我不敢耽搁，立刻回北京到新华社干部处。接待我的仍旧是那个老刘。他像两年前一样地再次考试了我的英语，再次表示满意，也再次告诉我回去等候通知。我回到涑水以后不久，就接到新华社的调动通知，叫我立刻报到上班。仅仅两年的时间，形势变化多么大！

两年前像魔鬼一样跟着我的“档案问题”如今竟好像神秘地消失了。我的新单位两年前被我的档案吓跑，今天却对此毫不介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然而这个谜不是我能解得开的，更重要的是我得到工作了，问题解决了，也就不甚希望追究这个谜底了。

这时我要和涑水的同事们告别了。两年来的经历是特殊的，有益的，也是值得回味的。当初来时不仅不情愿，简直认为是屈辱。两年多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使我对这个偏僻地区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城市里人们之间的感情很不一样，现在要离开了，而且看来再见的机会不多了，我心里觉得真是有些难过。然而我的同事们却处之泰然。我临行前科长召集全科座谈会为我送行，大家说些惜别的话。刘国说：“我早就知道老刘呆不长。他的水平太高，在这里不合适。

浅水养不住大鱼。”我看出别人都有同感，刘国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农村朋友们的可爱。

二我于1957年4月被调到新华通讯社。当时我33岁。1957年，解放后第八个年头，我终于得到了发挥我的特长的的工作。这是我从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天起就渴望实现的梦想，然而八年来却被无情地关在机会的大门外。在我已经万念俱灰之际，却意外地沐浴着早晨明媚的阳光，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台历上写下一句话：“1957年，我重新开始真正生活的一年！”称得上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事实证明我是大错特错了。这一年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幸运，而且是我与我的祖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至今只要听到或看到1957这个数字，我的心都要颤抖。

我被分配在翻译部英文组工作，每天和几十名翻译人员一起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译成中文，供《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用。这些通讯社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我做用英文写稿的新闻记者，对于英文电稿很熟悉，做这种翻译工作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不久翻译部的人们就知道我英文水平比较高。实际上我是能够做比这难得多的工作的，例如英文改稿员。到很久以后我方得知，领导层在怎样使用我的问题上是有过争议

的，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姓董，是很有水平而且正直的人，当时在翻译部担任较高的职务。他见我英文很好，在翻译部不能发挥作用，曾建议把我调到国际部或对外部去改英文稿。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我“历史不清楚”、“政治上不可靠”。说实在的，我只认为汉译英、英译汉之间，或翻译和改稿之间只能是难度和业务水平不同，并没有政治上可靠与否的不同。我逐渐发觉，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就只能做他不擅长的工作，或者做能力不及他人所做的工作。我自己八年来的经历和“招聘委员会”门外成群的要求换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使用人才的荒谬的原则为害之广。

然而我在这么多年企盼、请求、失败之后，终于做上了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已经是不胜欣喜，至于还应当怎样调整才真完全合理，暂时还无暇顾及，再说，即便领导层中有人极为通情达理，想要对我的分配加以调整，他也没有这样的时间。不久全国就被一场风暴卷得是非颠倒，天翻地覆，什么合理化的事也做不成了。不要说工作的调动，连增加一点工资都没有来得及。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 62 元，只有组内平均工资的一半，发工资时大家发现了都为我不平。记得刘组长（一个正直的人）对我说过，领导已经决定为我调整，要我安心等待。孰料没有过多久，连刘组长本人也被迫对我进行违心的批判，调工资只能算是天方夜谭了。而为我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仗义执言的董君，自己也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了职，更谈不上为我张罗什么了。

三随着双百方针的公布，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整的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惯例，运动开始由社长在大礼堂向全社人员作动员报告。

他强调这次运动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一切政治运动都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要求大家直率地、开诚布公地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

随之就是上午办公、下午停工搞运动，方式是在办公室开座谈会。我在英文三组，全组十余人，有三分之一是女同志。整风座谈会开始阶段很不热烈。每天下午上班后，大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刘组长说：“同志们，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顿工作作风，去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大家提吧。”担任记录的女同志早就把纸笔准备好。组长又问了一句：“哪位同志有意见？提吧。”还是没有人说话。静了好久，有人说，最近伙食价钱贵质量差，有贪污的嫌疑。接着又是冷场。很久以后，第二个打破沉寂的人对夜班的安排不够合理提了几句，然后又冷场。大家耐心等待到下班铃响，才起身离开办公室。分手时相视一笑，意思是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然而领导上不允许这样拖下去。社长动员以后，接着各部的主任动员，然后由部的总支书记找每个人个别谈话，从党团员开始。会上有人批评社里的高级干部，于是大家的热情上升了。例如有一位部主任被指责挪用公款供夫人出国，这引出一串所谓“夫人问题”。批评的对象地位愈来愈高，直到有人提出社长渎职和失职的问题。“形势开始变了，发言的人多起来了，运动初步展开了，”这种阶段领导上常常这样说。

四组里只有我一个人迄今没有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原因首先是我刚刚调来，人生地疏，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何况新华社调我来，使我得以用上了自己的专长，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意见，其次，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共产党有什么错处，以及怎样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整风会开过两周，组内同事都发言好几次了，唯独我一句话没有说过。

一次散会以后组长问我：“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说了上面的原因。

他说：“发言不必限于社内的问题。只要和整风的目的相一致，不论什么问题，也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提。比方说，你的英文这么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使用，这就是问题，它说明党的工作作风上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番话提醒了我，我想起过去八年来不合理的遭遇，想起了自己长期的失望和压抑。这当然是有关方面在用人方面的不当。问题可能牵涉到人事制度本身，以致于造成人事部门处理问题任意而行，不顾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可以算是官僚主义口巴！

次日，1957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作了第一次发言，我回顾了我在美国通讯社工作的经历，我的报效祖国的愿望，我效力的请求如何遭到无情的拒绝，我怎样盲目地自己找工作而遭到愚弄，后来又在农村做了两年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最后我说：“感谢新华社把我调来，我才在八年来第一次使用了自己的专长。我感到很幸福。”这时我激动起来：“这点幸福是多少年不公平的对待以后才来到的，很高兴我有机会吐吐苦水。”我发言时听到同事们不时发出惊愕和不平的声音，我接着发言，说出了久已埋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的话。“我作过两年美国记者，这不假，”我说：“但是我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写过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没有作过于解放战争不利的报道。不应该在档案里加上对我怀疑和歧视的东西。”我还追述在1951年我在镇反运动中，把自己作记者所发的全部电稿的存底和刊登我的稿子的剪报统统上交给坦克学校领导，以便帮助组织了解我的全部活动。“那些材料是英文的，”我说：“但是领导可以组织力量把它们译出来，这应该不困难。假如领导上认真审查了这些材料，对我的怀疑就可以解决。我很怀疑这些东西组织上研究没有。而这是不公正的。”一位同事说：“这是不公正的。”另一位说：“老刘真倒楣。”“我个人的经历，但如果反映我们政府的人事工作上的缺点，就是个重要问题，因为那样受影响的不止我一人了。”我说：“因此我建议以后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允许人们自己找工作。”我是组内第一个人在发言后引起听众的一致赞许，甚至一片掌声。我讲完以后，好几位同事走过来和我握手，表示同情我过去的遭遇同时祝贺我调到新华社。这时一位女同事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的关于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次日上午，部党总支书记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下，对我说：“我看，你们组的座谈会记录，你的意见提得很好。过去对你的使用是我们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我理解他说的“我们”指共产党而言。“你谈出党的错误是对的，这表明你爱共产党。我们希望你继续这样做。”我表示感谢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很受感动：“从来没有党的书记如此友好而且诚恳地对待我，甚至承认我爱共产党。然而对我的礼遇这刚刚是开始。”

过了几天吴社长找我和几位地位相似的到他的办公室面谈。从动员报告以后，社长不断分批接见各部门的人，了解大家鸣放的情况并继续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

我们走进四楼一间宽敞的社长办公室，吴社长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工作部门，然后对我们说，大家必须进一步了解这次运动的意义。他说：“党要求所有的人帮助党改进工作，邀请大家批评党的缺点和错误。一切真心爱护共产党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党才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加强大。共产党没有私心，不害怕批评，善意的批评。任何别的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社长下面的话我至今不忘，因为这些话不仅在

措辞上而且在内容上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这次运动对党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考验。党从批评中获益，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伟大。每一个人对党的态度也将受到考验。如果你真正爱护党，真地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你就会毫无保留地发言。发言愈直率，对党的缺点批评愈尖锐，就愈能表明忠于党。”吴社长强调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即死抱住个人主义立场，还是转到无产阶级的，党的立场的问题。无产阶级无所畏惧，所以敢于直言不讳。个人主义者害怕失去个人利益，所以不敢完全坦率。因此这次运动是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一次考验。”社长的谈话就是这些。他的话使我沉思：我害怕什么吗？我自认为没有。共产党看来是在诚恳地征求意见。社长关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话特别打动了，使我想起自己在革命大学的启蒙教育要求“改变感情”，我觉得自己又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又必须从头学起了。一个执政党竟然邀请人们对自己进行批评，这是多么无私，多么崇高！祖国是伟大的，这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人人应该跟上时代的要求，包括我在内！

我初到新华社，确实对这里提不出什么意见。但过去几年我亲眼目睹不少情况，感到实在是有些问题。我的不幸的遭遇表明存在不正常的现象，应该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我如果真地爱国，就应该直率地告诉自己的政府哪里存在问题，使它得到改进，使祖国更加富强！

我是新华社全体人员中动起来最晚的人。现在运动开展将近一个月，整个新华社大院要求整顿，热火朝天。整风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愈来愈尖锐，有人把意见写下来贴在走廊的报框里，让自己办公室以外的人都能看见，这叫做小字报。过了不久院里出现了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如浪潮一样席卷全社，所有建筑物墙壁上都贴满了，后来只好把新大字报盖在旧的上面。这时全国响遍要求改革、要求扩大言论自由和开放管理体制的呼声。最活跃的是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界和党外人士。报纸大量刊载鸣放意见，内容愈来愈尖锐，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内容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文章热烈赞扬新的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言外之意是否定了解放以来党对思想和言论的严格控制。这篇文章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认为作者表达了先进思潮，对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启蒙。文章对我的震动超过报纸上连日刊载的所有鸣放文章，作者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比我的更全面，深刻得多。当时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加了通栏标题。这表明文章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准，至少是默许。

这就是 1957 年 5 月中旬到下甸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点燃了我久已黯淡的爱国热情。我不仅在会上畅所欲言，而且发表小字报评论社会和政治。我要对党敞开心扉，告诉党我认为应该怎样做就能使国家更加富强。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和党这样亲近，我就像对亲人一样，像对母亲一样细诉心曲。然而正当我陶醉在这彻底交心的妙境时，竟然风云突变，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子，多少热情的面孔变得陌生了，认不出来了，我自认为是诚恳地向党进言被指为对党的反革命的恶意的攻击，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并且险些为此送掉了性命。

我受处分以后，一开始很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有的人想得比我多但是一句也不说，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倒楣的主要根源在于我的出身历史，而不完全在于说了什么。换言之，即使整风时期我一言不发，

恐怕也难逃挨整的噩运。古语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五我于 1957 年 5 月下旬发表我的唯一的一张字报，贴在翻译部的甬道的墙上。

这篇文章不仅得到我的同室的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连其它部门如参编组、选报组的人都纷纷到办公室来看我，许多人说这篇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然，后来风云突变以后，对它的评价就面目全非了。

这篇小字报原文如下。

从“冷漠”谈起参加革命以来曾经历数次工作调动。每在一个单位一段时间以后，人熟了，觉得那是我的家，调走时舍不得分手，觉得牵肠挂肚的。“以后常写信啊！”这是临别时照例的互相嘱托。我是认真写信的，可惜没有回信，渐渐地由于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熟悉了新事物，认识了新朋友，旧同事便互相淡忘了。后来又调到别处，又是临别的互相嘱托，接着又是互相淡忘。大家变得不甚关心人，只关心工作了。

近来的变化还不止此。人们为了不犯错误，变得愈来愈谨慎。谨慎当然是好事，但过分的谨慎就产生副作用。我有一个朋友，称得起是不犯错误的典范：他不冒失，不发脾气，不走错步子，不站错立场。他的优点是无可辩驳的。但他也有缺点：他不激动，不发怒，不热情，对恶人不义愤，对弱者不怜悯。看啊，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消极的，都冠上一个“不”字，可怕的“不”字！

记得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有两种演讲者，一种讲得辞藻华丽优美，听众听过之后都说：“嘿，讲得多好啊！”但他走开以后谁也记不得他讲了些什么。另一种演讲者则不同；他讲的时候听众有的热烈鼓掌。有的坚决反对，有的吹呼，有的怒骂，有的沉默，有的痛哭。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演讲者是后一种，不是前一种。

反过来看看我们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后一种演讲者愈来愈少，而前一种却源源而来。我们慢慢变得不会犯错误，也慢慢变得不会爱，不会恨，也不会想了。

中国人民的祖先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国文化。

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留给我们这笔改造世界的精神财富。

然而举目四望，随处可见上述我的朋友的同时人物，他们的情感淡薄，冷漠无情。这是一种传染性的冷漠。我们的祖先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后代；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弟子。

历次政治运动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政治运动多了，就一点点地冲淡了我们的热情，磨光了我们的棱角，浇灭了我们的火焰。旧时北京的纨绔子弟喜欢养蝨蝨、冬天养在特别的葫芦里。这种葫芦小时就装在专门雕刻的模子里，模子刻成什么样子葫芦就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在模子里生长的蝨蝨葫芦；可怜他们根本就没有棱角，也就谈不到磨不磨了。

我想起鲁迅的话：“救救孩子！……”六上面讲过，领导上肯定了我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且鼓励我继续提意见，提得愈多，愈尖锐愈好。于是在以后的整风座谈会上我继续给党提意见，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个人得失的问题。我想到就说，并没有书面记录。感谢作记录的女同志和后来批判我的人，

他们把我在一周左右的发言加以记录整理，以供批判之用，这对我回忆自己40年前说的话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不被划成右派，是记不了这样清楚的。

总起来说，我在整风期间鸣放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中国应该给人以更大的说话的自由，应该有更多的民主。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为主张节育而获罪是不应该的。中国解放前有4.5亿人，解放八年增加到现在的6.5亿，照这样下去不得了。马寅初的意见是对的。

第二，应该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乱押人、打人、捕人的现象不少，这是侵犯公民权。

第三，解放后许多文化科技机构的领导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会打游击战的指挥员不一定能领导一个科研机构。建议这些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由外行变为内行。实在不称职的予以撤换。

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不懂政治。只是对国家很关心，才能讲出这些话。我从小关心国家的安危祸福，这是国家多难的结果。在童年的记忆中，长辈们总是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比愤怒，那时人民是绝不可能向政府提意见的，更不用说是批评。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是因为深信党和政府会采纳这些建议，或至少能够予以考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因此而招来大祸，为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把一生三分之一的岁月消耗在劳动农场里。

七《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晴天霹雳一样改变了风向。社论说民革成员卢郁文因为说了维护共产党的话，收到一封匿名信，骂他“为虎作伥”，警告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人民是饶不过他的。社论说：“这封信的确是对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又说，“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并没有动员报告，6·8社论发表以后，社领导并没有公开表态，于是我和同事们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仍旧沉浸在鸣放的美梦里。大家对6·8社论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文章感到意外，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和一个多月以前动员整风时宽容大度的姿态相距甚远。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党不要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这封信由十个人签名，我也在内。四十年后回忆这件事，我不禁为我那时的幼稚感到可笑。然而这并不是我做的第一件幼稚的事，而且幼稚的人不是我一个；其他九个签名者也未必比我懂事。还有组内所有的人，无不热烈支持我们写这封信，应该都有幼稚病。信发出以后当然没有回音，然而我们并没有白白费事。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我参加的这封信被说成是反党的罪行之一，给我的批判者提供了材料。

不久院子里出现了大字报，点了一些人的名，说他们向党进攻。这些人有的我认识，如参编组的陈，我读过他的小字报，觉得他写得很好。如果我的消息灵通一些，我应该知道这首批大字报都是党支部写的。然而消息不灵通的还大有人在，就在大字报贴出以后，整风座谈会还继续进行了几夭，然后才展开了对右派的批判。

这时我竟然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批判陈，我说他的小字报写得很好，这是个直言的同志，不应当受到伤害。可见我幼稚到了怎样可笑的地步。

八到 1957 年 6 月中旬，鸣放完全停止，整风运动改为反右派斗争。报纸上再也不刊载鸣放言论，而代之以连篇累牍的反击右派的文章。新华社大院里形势的变化和全国完全相同。鸣放座谈会不开了，换成了反击右派的座谈会。批判会的规模依右派分子罪计，所以百分之五这个比率数定得缺乏依据。然而从中国人口总数看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吓人的：6.5 亿人的百分之五是 3250 万！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在发出指示之前是否真地找到了那么多坏人，但他的指示是有分量的。许多地方“挖出”的右派达到了这个指标；有些部门甚至“超额完成”了。原因是：第一，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一些领导人的原则是“宁左勿右”，以此表现对党的忠诚；第二，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划右上有意地偏严些，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划右，免得给自己招祸。结果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愈划愈多，这超出了开始的估计。薄一波 1993 年发表回忆录说，1957 年 6 月 29 日毛泽东估计全国有 4000 右派分子，到年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人数达到 55 万。

新华社的情况也是一样。到 1957 年 11 月，运动基本结束，共揪出右派分子 60 多人。在此以后又陆续宣布右派名字，间隔时间较长，每次宣布一两个。据说这是因为已有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就有必要继续审查，继续揪。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种“补充队伍”，但我确实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被批判的。

一天我正在工作，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他姓魏，是党支部指定专任“处理刘乃元问题”的。我没有见过他。他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整风期间的发言和写的文章。”他的态度很严厉，尽管尽力友好些，但毫无笑容，以致我怀疑这个人大概根本不会笑。“有些错误观点，并且有的很严重。你参加过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应该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份检查，看你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么样。如果认识得好，就可以宽大处理，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开会，不出大字报。几个月以前如果叫你写检查，你肯定不如现在写得好。现在形势对你非常有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我三天以后把检查交上去。

说实话，我一点也看不出形势对我怎样有利，也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一言不发地旁听了不少反右批判会，现在轮到我批判自己，再不言语是不行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批判自己。我走投无路了。七年前在革命大学被勒令批判自己，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现在要批判我自己比那时更难，因为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努力想想自己做过哪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检查了自己解放前为共产党的敌人美国人做事的历史，尽量严厉地谴责自己一番。三天以后我把材料交给魏，但我知道毫无通过的希望。

果然，他读过材料之后又来找我，这次已经是满脸怒气。他把材料还给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我看倒应该叫做自我表扬！你辜负了领导的希望！我们原以为你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要决定你的前途的！”他提高了声音：“你在整风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因为你一贯坚持反党的政治立场。这一切你自己很清楚。现在要看你是坚持反动立场，还是缴械投降。好好想想，重写你的检查！”这都在我意料之中。从在革大的经验，我还可以预料我第二次检查的反应。果然，第二份检查交上去的次日，

部主任陈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部主任的态度比魏更加严厉。他叫我坐下，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小办公桌前写东西，他就是陈，我写大字报为他辩护的那个右派分子。

“你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陈主任说：“你应该怎样做，老魏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正站在交叉路口。有两条道路由你选择。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自取灭亡。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说着他把我交上去的手稿掷还给我以示愤怒。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写空话或者玩弄词句，我们只要求你老实下来。”然后他指着陈向我说：“拿陈作例子吧。他的错误比你严重，但是他缴械投降了，因为他的态度老实。”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找我个别谈话了。“因为你的态度顽固，不适合个别谈，明天要开会帮助你。你必须出席，并且应当明白，这是进一步挽救你。”我走出去时听到他又说了一句：“老实下来，缴械投降，这是唯一的出路！”一切都像旧事重演。我又一次被说成不老实，又一次不知道怎样做才算老实，又一次据说是站在交叉路口，应该选择一条路，而又一次什么路也看不到，并且又一次得到极为善意而又慷慨，但绝对无法接受的帮助。有一件和上次不同的事是要我“缴械投降”，说实在的，如果我真地攻击了党，我就愿意投降；如果我真有武器，会立刻呈缴无误；然而看来投降大概是可能的。部主任不是说陈投降了吗！陈太高明了！我多么希望能单独见到陈，请他给我讲讲投降怎么投，这样我也可以投降了。可惜右派分子是不许单独接触的。我需要懂得投降的方法，可没有人教给我！

十第一次批判我的会由部主任陈主持，他宣布“这是帮助刘的辩论会。”“刘在整风期间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我们为了给他一次投降的机会，还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如果他投降，就不戴帽子。一切都由他自己在这次会上的表现来决定。”接着他命我在会上读我最后修改重写的自我检查。

可以想见，我的检查只能引起大家愤怒的质问。一开始是质问，不是批判，因为部主任说过这是“辩论会”。他叫我用笔把问题一一记下然后答复。他说：“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解释，以便尽量挽救他。”然而接着发生的却很不像辩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但我刚刚回答就被愤怒的听众打断。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在整风期间说你要‘吐吐苦水’？”我说，在调到新华社以前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因此而苦恼。“你胡说！”提问的人喝道，“你是在吐你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的苦水，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水！”这时听众齐声喊：“叫他说！”另一个问：“你过去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撤走时你不跟他们走？”我回答，因为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效力。听众中一个人说：“你说得多好听啊！你为美国人工作，挣高工资，你不跟他们走，把高工资都放弃了。

这是因为你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吗？”我说是的。“果真如此吗？”提问者的口气充满了嘲讽。他问道：“你在新中国八年以后要吐苦水，你会拥护新中国吗？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你究竟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而留在大陆？我们想知道实情。”听众喊：“叫他说实话！”接着有人问：“刘说新中国不民主，说新中国没有法律，”（我插言说：“我没有这样说过。”）

“刘说要把高级干部一律撤掉，换成资产阶级专家。”因此“刘想要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刘污蔑青年一代，把他们比做蝮蝎葫芦，并且恶毒地叫嚣‘救救孩子，’（我想要解释，被制止。）会继续开

下去，提问逐渐变成批评，后来索兴变成对我的言论和文章的批判。

我的话被断章取义，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加以批判，几个人做了冠冕堂皇的长篇发言来证明我的意见是反动的。一个人说，刘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和 1949 年以来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证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备、最有效率的民主制度。下一位爱国者提出，“刘硬说中国没有法律”。接着极其耐心而详尽地列举了建国以来制定的各项法律，从《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缕述到《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直到北京市颁布的交通法规，证明刘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后来批判的矛头逐渐转到我来到新华社以前的表现。为达到火上浇油的目的，部主任插言指出：“刘刚刚参加革命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比做动物。”（他显然看过我的档案，那里有革命大学时期对我十分不利的记录。）主任的揭发引起了大家对我更加愤怒的谴责，我的批判者一个比下个更为激动和理直气壮，也更加能够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指出刘口称自己爱国完全是欺骗。“如果你真地爱国，”他吼道，“你为什么一直为美国人工作，一直到他们被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你说你留在大陆是为国效力，完全是欺骗！”于是批判集中在我做过美国记者，解放时留在大陆是为了什么，我从小就反对共产党，等等。一致的结论是：我趁整风之机向党恶毒进攻，妄图和社会上其它右派一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部主任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同意这个结论，如果不同意便立刻给我戴右派帽子。

我当然不能同意，于是部主任当场宣布，从此刻开始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着就散会，大家走出去，我一言不发。等到乱哄哄的声音稍稍过去，人们听得到我说话时，我说了一句：“我保留解释的权利。”我留在最后，两个女同志在我前面走出会场，我听到一个说了一句：“他很固执！”我不知道这是褒义还是贬义。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辩论的一方蛮不讲理，另一方不许发言，这是什么辩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非倒楣不可了。部主任散会时还说：“我们尽力帮助了刘，希望通过大家的帮助，他能认真考虑，缴械投降。”这种帮助倒是毫不陌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找到可以上缴的武器和向大家投降的方法。然而对我的“帮助”倒是愈来愈加强了。转眼之间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逐篇看过去，愈看愈清楚：我完了。有一件事使我不解：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是“美国武装特务”。这是从何说起？直到 20 年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几天以后又开我的会，这次的级别更高了：参加者有其它各部的干部和副社长，主持会是社党委委员。他每提到我都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字。

“右派分子刘比别的右派更顽固，”主持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听他胡说八道。”

今天只向他简单地提问，弄清他的态度。”下面是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解放时你为什么不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起逃走？”“因为我要为新中国工作。”“但是解放后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我认为共产党很好。”“那你为什么向党进攻？”“我没有向党进攻。”

我只是帮助党整风。”“你不老实！”“我是老实的。”“你欺骗！？”“我说的是实话。”类似的提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几次都是提问者的怒吼，接着是我的沉默。不久，主持者起立宣布：“由于右派分子刘的态度恶劣，批判会已经对他不适用。我宣布现在会议改为斗争会！”斗争会和批判会不同之处，是斗争会不说理，只喊口号，还可以用暴力。

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疯人院里。我怒火上升，拒绝回答问题，只是不停地吸烟，任凭他们歇斯底里地向我吼叫，一概置之不理。忽然一个人举拳喊道：“不许右派分子抽烟！”大家也同样喊起来。主持会的人说：“刘，不要吸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下定了决心。

“我可以上厕所吗？”我问。

“去吧！”主持者停顿了一下说。

我把香烟和打火机装好，离开会场走出办公楼，找到我的自行车，飞快地奔回家，把批判者们抛在后面。会上连干部带群众有60人左右。

我知道这可闯了大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已经横下一条心，宁死也不受这样的侮辱！

次日上午我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去开一个小会。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是姓周的英、法文翻译，他是党员。他们没有重复前一天的那一套。只有周一个人说话，其它人都沉默。周让我坐下。

“我们今天不准备批判你，”周板着面孔说，“因为已经证明批判没有用。这是最后一次开你的会。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你说的话对你自己的前途非常重要。”我看出，这是因为昨天的斗争会没有开成，他们现在要我最后表态，以便决定怎样处分我。周问我：“昨天开会以后，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有没有改变？”“没有，”我回答。

“考虑后再回答。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周说。

“谢谢，”我说，“我不必再考虑。”“现在我们出去，你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我们过三分钟回来。”周说完就带人走了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我独自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屋子里静得很，我的手表的滴嗒声都听得到。整整三分钟以后他们回来了。周叫记录员准备好，然后向我说：“你说吧！”“我保留我的意见。请组织考验我。”我慢慢地说，这时记录员写下我说的话。

看得出他十分紧张，唯恐漏掉一个字。我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物。

“好吧！我们走！”周对大家说，于是都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我跟着走开，心里很明白：我的命运已经不可挽救了。

十一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必须受孤立：如果没有事，谁都不和右派分子说话，交谈也要板着面孔。有时几个人正在谈笑，走进一个右派分子时谈笑立刻停止。“人民的敌人”不能娱乐，所以礼堂放电影右派分子是被拒之门外的。办公室里的内部传达不许右派分子听；每当组长传达时我和邻桌的杜就得离开，在走廊呆十几分钟然后回去。然而人们的态度并不是像官方要求的那样绝对一致。批判会上有的人的发言听得出极为勉强，更有人始终一言不发。我们组内的文和高两个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和我讲话，但我看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我后来得知，文因为批判右派无力受留团察看的处分，而高因“文革”中不肯贴大字报下放到新疆。后来他自己努力工作，任新疆大学外语系主任。

恶运笼罩着我们全家。两位哥哥的遭遇和我相同。大哥乃隆是地质部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因整风中批评领导不懂业务被划分右派。二哥乃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福利科长，因批评党的政策而获罪成右派。他说：“党在有些问题上搞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弟兄三人几乎同时受到同样的迫害，只是我的两位哥哥的态度不像我那样暴烈。每天晚上弟兄们从单位回家以后各自讲讲当天的痛苦的经历，真好像世界到了末日。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太严重了。那年父亲 67 岁，患严重冠心病，靠经常服药才能维持。八年前他从国外到了香港，由于种种顾虑不敢回大陆。二哥特地到香港，对父亲说明共产党的宽大和英明，打消了他的顾虑，一起回到北京，安享退休的清福。

八年来他目睹国家形势很好，证实了二哥的描述，心里很高兴。我们三弟兄的事对父亲真是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他坐在书桌前，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喊：“毛主席！你知道吗？我的儿子都是爱国的。他们冤枉啊！”又说要到天安门去喊。我看着父亲为我们急成这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不久以后，在 1957 父亲去世，三弟兄一败涂地，全家从此失去了欢乐。弟兄们只能尽力安慰母亲，但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十二这时正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新华社的职工轮流去参加义务劳动。1958 年 1 月，春节临近时，通知我随队到十三陵去劳动。这个队由新华社各部门的人组成，有右派在内。但因是打破部门界限重新编组的，同组的人都是新朋友没有孤立右派的问题，所以气氛很融洽。出发前由党委的一位干部给全队讲话。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右派分子，现在在等待处理。这次劳动是一次考验的机会。大家好好干，干得好可以从轻处理。”这时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右派处理的规定，是在我受到批判以后正式颁布的。

处分共分六类，最严重的是第一类，以下递减：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第二类：监督劳动；第三类：留用查看；第四类：撤职；第五类：降职减薪；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

处理办法颁布以后，我使用以衡量自己，看我适合哪一类。结果看不出得到从轻处理的可能。党委的临行讲话具有激动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在昌平县城附近的工地住半个月，每个人都带着铺盖和换洗衣服。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出发，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那天风和日丽，太阳照得暖洋洋的，乘车到郊外透透风，出出这些天的闷气，觉得很痛快。

忽然，靠对面车帮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笑得非常友好，这一段时间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笑容了。他看起来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告诉我他姓张。是参编组的。我听到他的东北口音才想起，他就是开我的批判会时说我不是真地想为国效力的那个人。“现在我也变成了右派，咱们是一样的人了，”他说。我们不在一个组，过去不认识，批判会时见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见面，所以他认识我。他说的不多，但态度很诚恳，友好之间带着惭愧和歉疚。其实我并不恨他，我知道我们素无芥蒂，他批判我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而已。受批判以前，我在不少场合见到过类似的人际关系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对那受他们责骂和侮辱的人究竟有多少由衷的仇恨，以及这样的表演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现在张的身份变了，他不必继续装模做样，我们就可以推诚相见了。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张一起劳动，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会干农活，比我强得多，在劳动上经常帮助我。

我们住在昌平县城外的民房里，离工地 10 里路，每天步行往返。水库工地是一片人的海洋，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多人在一起。大家干着同样的一种活：向坡上运土运石，目的是筑起一座大坝拦洪蓄水。我们干活处就是将来的人工湖的湖底。由于经济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整个工程大部分依靠人力。手推车和肩挑的土畚是主要工具。人们情绪高涨，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我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这时我干得特别起劲。我推的车比别人装得多，来往飞跑，把别人抛在后面。回到住处洗脚时，发现手脚都打了泡，夜间感到腰酸背痛。但我照旧拼命劳动，毫不松劲。我经常脱掉上衣，赤膊在工地往来奔跑，引起人们的诧异和赞许。我并不是想要通过干活换得什么好处，可怕的前途也并没有叫我紧张起来，实际上我已经把党委那位干部的话忘记了。我只是觉得很久以来闷得要死，今天走出了牢笼透一口气。我被无情的偏见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几个月——不，几年了，今天在这广袤的大自然舒展了四肢，释放了压得几乎要爆炸的能量。

这里工作简单，人也简单。我要运土，力气用到了，土就变换了地方。土懂得我想干什么，我的年轻的肌肉出了力就得到了回应，诚实的劳动在这里换到的是诚实的报答，而不是欺骗和侮辱。这里的世界至少不是颠倒的。

半月以后我回到家。我晒得黧黑，饭量大得惊人，性格变得粗犷豪放，满不在乎。母亲说我变了，和劳动之前判若两人。我自己也觉得变了。时间到了，该变了，不管怎么变，变了痛快。

十三 1958 我在单位继续被“孤立”，后来我看出，这种古怪的关系对“孤立”我的人们也是一种负担。一次我在甬道里迎面遇到两位女同事，她们向我笑着要打招呼，但忽然记起我是右派，赶紧收起笑容快步走掉。我的处境实在古怪极了。在这里我禁不住对这种古怪处境的创造者无限钦佩，钦佩他的才智，竟然想出如此奇特的办法来折磨他的同类。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局面尽快结束。如果灾难必须到来就叫它来吧，死亡的威胁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天上午，两个月以前告诉我“形势对我非常有利”的那个姓魏的到办公室找我。他带我到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叫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对面。他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过。他告诉我：我在十二陵水库干得很好，为此党委考虑从轻处分我。我刚刚有点激动，桌上的电话铃响起，魏立刻拿起耳机。

“是的，他在这里。好。”魏说完挂断电话对我说：“党委在等你谈话，你要受表扬了。我们去吧。”于是他带我离开翻译部向干部处大楼走去，他说党委的领导在那里等我。我边走边想，我在工地的表现可能是好的，但那个打到空房间的电话值得注意：好像有人在追踪我，恐怕等待我的不是表扬。

到了干部处大楼，他把我带到二楼，指着一扇关着的门叫我进去，他自己走开了。我敲了敲那个门。

“进来！”里面的人吼道。我推门进去，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里面。一个穿便装，是新华社保卫处的干部，一个穿警察制服。

“姓名？”那警察问。我说了姓名。

“你站好！”他吼道，“你因为右派罪行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接着他递给我一张中文打印的文件叫我读。那是由新华社付社长邓签发的决定，

内容是我是旧国民党政府外交官的儿子，本人解放前做美国记者，“曾做情报工作”，“死心踏地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党整风时期恶毒地向党进攻，并且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我读过之后把文件还给他，他说：“你保留着，那是给你的一份。”接着问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沉默不语。于是他说：“走吧。”这时我的后面有一个警察，我不知道几时进来的。他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拉进甬道尽头的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约 20 多人排队面壁坐在长凳上，都低垂着头，有几个女的在哭泣。近门处一张桌上放着两块方玻璃，上面涂着黑色油墨。带我进来的警察取出一张文件铺在桌子上，抓起我的左手，把五个手指都在油墨上蘸一下，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指纹按在文件上。接着抓起我的右手照样按了一遍，使用我的手指就像用手戳一样。我偷眼看那个文件，是以我名义写出打印的自愿申请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我的指印都按在我的名字下面。按完手印，那警察指着桌子角上一块脏布对我说：“搽搽手！”我照办了。但那块布已经被我前面 20 多个“自愿申请者”用得乌黑，搽过和不搽差不多。

我是来得最迟的几个人之一。在我以后又有两三个人履行了同样的法定手续，之后，我们 20 多人就全部由警察押出干部大楼，上了等在门口的大轿车。每个人必须坐下，不允许站立。车窗一律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保证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

前后车门都由一名武装警察守卫。车子开动以后，车上静得像送丧，但比送丧还要压抑百倍。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表明路程不远。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门口，院墙很高，装着电网。我们下车后被带进院子一角的一座四层楼房里，进去以后，后面的铁门立刻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先被押进靠门的一间房，押送的警察命令每人交出腰带和随身携带的钢笔、小刀、别针等锋利物品。看来这是为了防止自杀。其实我们并没有企图自杀，起码我是没有的，这种保安措施并无必要；然而我们却因此必须提着裤子走进牢房。

这里是半步桥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我从中年开始到老年结束的漫长的旅程的第一站。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并且我们是被人用可怕的方式押来的。假如当时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可怕的前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提前使用了进楼时被迫交出的东西。

那天是 1958 年 3 月 8 日，我 33 岁。

往事不堪回首（节录）

刘绍棠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 1956 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当时年仅 20 岁的我，竟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 50 年代稿酬高，收入多。

1957 小说 1000 字 18 元。然而，出书付酬，完全照搬苏联方式，3 万册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出书又印数

多，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

我专业创作时，已出版了 4 本书，收入情况如下：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 万多字，每 1000 字 15 元稿酬，印了 6.3 万册，三个定额，每 1000 字 45 元，收入 1800 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 万多字，每 1000 字 15 元稿酬，印了 4 万多册，两个定额，每 1000 字 30 元，收入 2000 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 万字，每 1000 字 18 元，印了 6.8 万册，三个定额，每 1000 字 54 元，收入 5000 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 万字，每 1000 字 18 元，印了 10 万册，四个定额，每 1000 字 72 元，收入 8000 元左右。

光是这 4 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 5% 交党费，但不纳税。

存入银行，年利率 11%，每年可收入利息 2000 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 160 元，相当于一个 12 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 4 角多，一斤猪肉 6 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 5 间，厨房 1 间，厕所 1 间，堆房 1 间，并有 5 棵枣树和 5 棵槐树，只花了 2000 元，加上私下增价 500 元，也只花了 2500 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 33 年。

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 20 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

我专业创作之后，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 1957 年 8 月划右的 1 年 4 个月，主要致力于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 3 个短篇小说和 3 篇论文，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 3 本书，却收入了 6000 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只是个 1 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 17 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 1000 字竟达 108 元。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 10 月 1 日国庆节出版，印数 10 万册，其中 5000 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 3.5 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 10 年，10 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 5000 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

10 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没等《金色的运河》见书，就被划了右。

《金色的运河》被装在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我在无限悲忿中将这部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埋葬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 年我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者编辑向我要这部稿子，我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变成烂泥，可谓尸骨无存。

我虽有 2 万元存款，但“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到“文革”前已降到年利率 3.6%，所以，利息已不能维持生活，年年都要吃一部分本金。本金年年减少，利息也就年年降低。1979 年 1 月 24 日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银行存款只剩下 2300 元，坐吃山空已经亮了囤底。

天不灭刘，我活着熬出了头。

走村串户的“无任所大使”1956 人家并不当真，自己也不能以假乱真。官场有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不可随心所欲。所以，除了开会，我每天都溜溜达达，走村串户，整个儿是一个“无任所大使”。

那时，衙门口小，乡里的干部只有书记、副书记兼乡长、乡秘书和乡公安是国家工作人员，副乡长以下的都是农业人口但吃商品粮的社调干部。生、旦、净、丑，一人数任。大家虽有分工，却必须围着中心转。也就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只有我这个“客卿”真正是“不管部部长”。三夏大忙，我却像个二流子，于心不忍，脸上发烧，便主动要求抓供销社的筹建。

我一不要人权，二不要财权。理事会和监事会没有我的名字，主任、副主任、会计、营业员……我没有安插一个私人。那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乡党委和乡政府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被没收的反革命地主分子的旧宅院里。乡党委书记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后来被开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想趁建立供销社之机，向上伸手，要一笔建房费。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中央派下的人”，又列席县委会，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尊重，他口头上没有跟我唱反调，但是心里结下了仇。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他无中生有给我抹了不少黑，扣不少屎盆子。

我走遍全乡几十个村庄，劝说农民掏钱入股。我不会骑自行车，雇了一辆二等车（自行车带人）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我对农民讲，掏钱在供销社入上一股（一股一块钱），便成为供销社的东家，平时买东西享受优惠，年终还可以分红。我当时虽然只有20岁，却是这一方乡土的“知名人士”。农民相信我说的话，纷纷入股而以东家自居。有个10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块多钱，想买几尺花布，做一件小褂，跟我在路上相遇，听了我的劝说，竟然也把买花布的钱交给了供销社。这个女孩，就是我在后文中要提到的秀子。

供销社正式挂牌成立。主任、副主任、会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挤出一间老房旧屋里办公。长工棚成为门市部，磨棚和碾棚充当仓库。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秀子从几里外前来给爹打二两酒，我亲自为她服务，二两酒足有半斤，还笑着对她说：“东家常来照顾。”40能再为供销社奔走鼓舞。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1958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候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哪儿站起来。”5“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20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20“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

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20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现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1956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便争执起来。耀邦同志见我如此不知好歹，也发了火，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最后他声严厉色地对我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所谓“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是这样的：我和耀邦同志初次见面那天，耀邦同志就和我约定，要我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我虽然很觉荣幸，但是又怕打扰他的工作，难免攀附之嫌，所以从没有主动要求一次，每次谈话都是他派人找我，1956年冬季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对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我和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发生争执。我是十足的以下犯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也是极端的专横独断。

对于这位老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看法，我深受耀邦同志跟我一次谈话的影响，耀邦同志看过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我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其实是“述而不作”。我顶撞文艺界主要领导同志不久，耀邦同志便找我谈话。我“心中有鬼”，就找了个借口，编个瞎话没有去，这便是“请也不来”，此后，文艺界颇有流言，说耀邦同志对我宠纵溺爱，我才无法无天横反；有位老作家更封我为“团少爷”，与“党老爷”相映成趣。当时我才20岁，不懂人情世态，估摸这些流言也会传到耀邦同志的耳朵里，对我的印象可能更不好了，也就更不想找耀邦同志谈话。

1957年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轻骑队横冲直撞，终于一头碰在了《讲话》上，惹得龙颜大怒，招来塌天大祸。

耀邦同志和我的话别，早已超过30分钟，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耀邦同志只得结束这场谈话。

“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二年？”说出这几句话，我泣不成声。

“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谲，不能含糊。”耀邦同志站起身，板起面孔，“我把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屈原《离骚》。”“会讲吗？”我没有吭声。

“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快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我点了点头。

他送我到小客室门口，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说：“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20话。一见面他就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我提起20年前的往事：他跟我话别时最后那句预言。耀邦同志仰脸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深埋在我心底的隐痛我仍然怀念1957年因遭厄运而被我“活埋”的《金色的运河》。

《金色的运河》长达50万字，以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为主旋律，是一部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但是，由于我1955年4月起回家乡担任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反面情况了解颇多；因而这部长篇小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题之外，也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有所描写和否定。这就显得比当时的同类小说大胆和贴近生活。

当时，我正鼓吹小说的主要功能是美育，又声称要使自己的小说更乡土化；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风土人情描写很多，地方特色比较鲜明。

我写《金色的运河》时，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已经到来。

现在，当然不能这么写。对于农业合作化如何评估？40多年的经验教训，引起我们种种反思，但是还难下结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那么，邓子恢的“小脚女人”速度慢不慢呢？农业合作化有没有必要？搞一搞好还是不搞好？今后又当如何？对于我这个亲历其事的过来人，不能不想通了就盲目创作。由此可见，文学和政治是难解难分的。

在我的“一口气写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中，也不打算再写农业合作化。

1955群众大会，农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而来，黑夜中像几条蜿蜒起伏的长龙。我给他们讲话（由一个懂普通话的当地干部翻译），向他们描绘前途美景如画，很快就过上人间天堂的生活。但是，3年后的1958年，彭德怀到这个地区视察，看到的却是一片破败景象，愤而为民鼓与呼。难道3年前的我是以谎言欺骗这里的农民吗？我在离开北京之前，首长给我们的训示，也是这么说和这么讲的，难道他是在欺骗我之后又指使我去欺骗农民吗？当然不是。我和派遣我的首长，都曾坚信我们的许诺必能实现。回忆这段历史，我仍然激动得心跳，又伤心得想哭。我要写，就得写出这两种情感的交织和纠葛。

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的乡和大社，领导班子恶人当道。在1960年为平民愤而开展的“反共产风”运动中，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管制3年，乡长判处8年徒刑，副乡长判处15年徒刑，信贷社主任判处12年徒刑，大社主任被开除出党。我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一年多，耳闻目睹他们的种种劣迹，多次向上反映。我的小说《田野落霞》中写了这些人中的一个。那时我和他们曾进行过一点点斗争，失败的是我。后来证明他们都是恶人，遭到了应得的报应，然而我已戴上右字号铁帽子……剪不断，理还乱，是隐痛。

扣在我头上的三个屎盆子1979共青团中央彻底改正1957年把我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逐条批驳和否定强加在我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我至今

对这个改正结论非常满意，称赞这个结论写得像悼词一样好。

但是，有三个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错划结论中并无记载，改正结论也就无法予以澄清。然而，这三个屎盆子的臭气流传甚广，对我的伤害极大，不消除影响我很窝心。

一个屎盆子是“为3万元而奋斗”，一个屎盆子是“带着馒头下乡”，一个屎盆子是“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

“为3万元而奋斗”的揭发人是从维熙。我听到的原话并非如此。这是为了把我搞臭，记者受命歪曲的。从维熙写有《走向混沌》一文，据实更正，我就不再赘述。

“带着馒头下乡”也是我的一位老友揭发的。当时，我在京东的家乡挂职，这位老友在京西的山村体验生活。我俩返城休假，在我家小酌，谈起农村在高级合作化以后，粮食产量下降，却浮夸丰产，实行高征购，农民口粮不足。这些情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那本《毛选》五卷中，有更详尽的记载，不是我和那位老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在家乡挂职的职位，算是乡和大社的领导人之一，在乡和大社机关吃饭，有酒有肉，不缺香油白面。然而，看到乡亲们吃不饱，尤其看到本族同宗的老人、小孩饥肠辘辘，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每次回城，都买15斤左右馒头，装在一个大人造革手提包里，拎回来分给大家打一打牙祭。如果是为了自己食用，完全没有必要付这个辛苦。因为我享有乡和大社领导干部的特权，吃喝不比城里差。

我这位老友揭发，跟从维熙一样，本是为了敷衍塞责。谁想，竟然引起茅盾先生的浓厚兴趣。在对我展开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批判中，茅盾先生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做了一次长篇批判发言。书面和口头，每次都痛斥我的“带着馒头下乡”，而且把带馒头的方式从拎提包改为挎篮子。如此艺术加工，颇有乡土风味。

1957乡，要换乘几次市内公共汽车和郊区长途汽车。馒头装在篮子里，而且挎在胳膊上，多次换车岂不要被挤得七零八落？我当时就想，以茅盾先生阅历见识之深广，生活经验之丰富，怎么能说出和写出如此违背生活常识的话语呢？茅盾先生逝世，一些人耽心我不忘旧恶，可能拒不参加向茅盾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我没有那么心胸狭窄，多少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量事。这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对这位文坛老人尽到了晚辈后学的敬礼。

回忆“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的冤案，我更痛心。

揭发此事的人，是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她是一位老革命，我出生那年她就入了党。我们亲如姐弟，两人无话不谈。我划右后，她也被内定为右派，为了立功赎罪，把自己从恶运中抢救出来，便不顾情义和事实，千方百计加罪于我，开脱自己。

50员每月交一毛钱。我在中学时期入党，后来又上大学，交过五分也交过一毛。由于50已达两三千元。这位老大姐故意只说一面，掩盖另一面。各路报告急需此等“臭闻”，便一不服本人核对，二不向组织部门查证，纷纷捅了出来。姚文元著文惊呼：“令人不寒而栗。”这三个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并不想逆来顺受，几次进行解释，说明真相，都被斥为“纠缠小事，趁机反扑”。于是，这些污蔑以讹传讹，更被坐实。

那位老革命大姐，最后还是被划了右，4年后身患癌症惨死。1987年，“反右”斗争30年，我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记述我对她的感谢和哀思。

这也是她身后唯一的一篇悼念文章，不少熟人读后感动得落泪。

呵！往事不堪回首。

抚今追昔，不堪回首往事话当年。

蒲柳雨凄凄

从维熙——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从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而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笔去写祭悼他的文字。当时，向我约稿的报纸很多，但我都婉拒了。所以如此，我觉得我的感情还需要沉淀。试想，两个已然结识了几十年并共同经历了历史上风风雨雨、晚年又产生了对生活不同认知的友人，该有多少令人沉醉、令人心酸、令人心悸的往事，它们一起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波的。

1997 神色有些恍惚，像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经我追问，她才告诉我，刚才早上 7 点 30 分，作协陈建功打来电话：绍棠于午夜去世了。她安慰了我几句，便上班去了。我立刻披衣坐起，继而穿衣下地，抓起电话想向绍棠家里询问一些情况。但我很快又放下了电话，此时此刻，他家中一定乱成一团，都奔往宣武医院去了。

绍棠是由糖尿病而脑血栓，又由脑血栓而并发了肝脏病而离去的；而医治这些病症，宣武医院并非是最合适的选择——因而我推断又是出于绍棠的个性固执所致。

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于他的早熟；从我结识绍棠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自信，是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同步增长。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文学少年时的他，像一颗灿烂的星，升起在文苑星空，在一代文学新人中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我最早看见他的文章，是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小说《九月里，高粱红》（这并非他的处女作），之后，我陆续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小说《红花》、《青枝绿叶》，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摆渡口》、《大青骡子》……他将运河的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撒进当时还比较单一的文学园地——我结识绍棠，可以说不是从他笔下的人物，而是从他字里行间的水草的芳香中，走进他的艺术境界的。少年时，我在通县上过学，曾像一个赤子，在那些芦苇和蒲柳环绕的河边嬉戏而乐不思归；因而可以这么说，绍棠的作品，是唤醒我文学梦幻的第二个人（第一颗启明星是孙犁）。

在记忆中，我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绍棠的，我当时十九岁，而他当年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他，坐在会议桌的前排，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腼腆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静听着他的宏论，心里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能不能这么说，绍棠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才子，上帝赐与他的先天文学秉赋，使他在年少时就已然超凡，以五十年代初期而言，把“鹤立鸡群”的文学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无任何过分之处。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作者不少，都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都被时间淘汰），而绍

棠则给了我天之骄子的形象——这种深刻并使我为之动情的认知，成了我和他之间友谊的基石。

绍棠非常善饮，记得头一次与他在东单拐角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不少的白酒。酒后复童真，他纵论文苑形势，对当时文学领域里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绍棠认为中国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中，只有孙犁与赵树理，各树一帜，各自成家；但是从文学感情张力而言，赵树理是无法与孙犁相提并论的。绍棠在那个年代，比我的思路宽阔多了，我当时只知道以笔为犁拼命地耕耘，没有他想得那么多。尽管我也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他有自己的读者群体，记得我叔叔（四十年代的一位先锋派诗人），就非常偏爱赵树理的“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绍棠的少年自负。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验证了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一个有见有识的作家，而非人云亦云的文人。如果把他的这些行为，解释成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反右时对他批判的常用词汇），他也是有这种资本的，他在初中时写下的《青枝绿叶》，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而他当时正在潞河读高中，语文教师不得不请他亲自讲解这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还有谁能有此殊荣？我一直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新中国文苑孕生的一个不凡奇迹。他性格外向，外向到无遮拦的程度；他读的杂书极多，谈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他的记忆力更使人惊愕，现实到解放大军中的将帅们的出身历史，远古到二十四史中的人物轶事。他都能从远逝的时间经纬中召之即来。为此，我每每与他坐闲谈，常有聆听教益之感。如果我非要从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一点他的不足，也许就是他的才赋使他有一点“非我者谁”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他有意显露，而完全出自于他的天赋本能。

始自 1956 年之后，有见地、有锋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涌现，结束了绍棠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枝独秀于同时代作家群的局面，可以说那是一个群雄并起、文苑百花初绽各自风姿的开端。但是绍棠的思维是敏锐的，绍棠在这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后来成为他右派罪证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几点浅见》（此文为绍棠执笔，征求我的同意后，发表时也署上了我的名字）和《暮春夜灯下随笔》。他在《浅见》一文中，态度十分明确地赞美了王蒙的小说，他认为党的机构内部，确实有了霉斑，王蒙以其怨而不怒的笔锋，准确地捕捉到了生活的底蕴。

那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大鸣大放时期，我们的心情正处在十分舒畅的时候。《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女士，向我俩约鸣放文章。绍棠写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我写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他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相约，但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反右派的号角就在中国大地吹响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推理，他和我是密谋于密室的。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这么白纸黑字见诸于报刊的——两个右派一唱一和，意在使资产阶级文艺在中国全面复辟。

“台风”过后天各一方我和绍棠划右之后，他到家乡运河滩上放牛，我辗转于各个劳改驿站，从事烧砖、挖煤、种田、园艺等劳动。虽然时代的手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与绍棠在别离期间，从未中断过各种联系。因为他的家住独门独院，我家居于大杂院内，他来看我不太方便，而我回京时去看他倒是可以避人耳目。

1969 问候。我怕他为此受过，让他在信上不要写名字和住址，并不要保留我的信件，绍棠生性坦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信皮上仍然写

着他的家庭地址，只是信尾没有绍棠二字，当然，一切的话，都是正面的叙述，只有我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一些他要表达的心绪。我在山西9年，每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劳改队，与家信同时发出的一定是写给绍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原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火车的开车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与爱人曾彩美一同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得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学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1976年，山西文学界的段杏绵大姐以及胡正、李国涛等同志，把我从劳改队中要了出来；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文联主席郑怀礼，出于爱才之心，把我安置在地区文联工作。绍棠来信为我高兴，他在信中说：维熙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底层生活，文学成果将会回报你承受的苦难。你要做好文学井喷前的准备，我坚信这一天对你会提前到来。

应该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979年初，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该年《收获》的第二期刊世。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已是过眼烟云，但在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覆盖着全国大地之时，小说内核的反神力量，还是如文苑的一声春雷，一时间，《收获》洛阳纸贵。回到北京，绍棠为我举杯，庆祝我们九曲回肠之路已走到尽头，更为历史的新时期而畅饮到一醉方休。应该说，在我最为困顿的年代，绍棠是给我生存支撑力量最多的朋友。尽管1957年之后天各一方，但是灵犀之心河，始终浪波相连。

分而聚，聚而分——竟成诀别 1979梅——1957年被喻为的四只黑天鹅，重返北京，相聚于北京文联。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绍棠于1980年3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蒲柳人家》。可以想象，告别文学二十年的他，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激情，投入到这部亮相不久之后的新作——在这部作品中，绍棠再次显示了他无可争议的文学天赋，一派昔日的田园风光以及运河乡土人物，在他的书页中，散满了童真的诗情。

我不能说绍棠的所有作品都能跨越时间的磨砺，但是一曲醉人心扉的《蒲柳人家》，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绍棠全部作品中杰出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没有脂粉气息，只有四溢而出的泥土芳香。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绍棠的身体是不错的。最初发现他的身体出现病兆，是在一次会后，与他一起去他家的半路上。走着走着，他突发了一阵晕眩，身子靠在路旁树上，双目闭合了很久，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恢复了血色——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绍棠有病，而且是潜藏在他体内的一种疾病。他说他的晕眩，是夜间写作、白天睡觉生物钟混乱所致。我劝他改变这种写作习惯，但是绍棠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外力是无法改变的。萧军在世时，曾有过如下的名言：人都是性格悲剧。绍棠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幼年形成的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自从进入中国作协，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准会去看望绍棠一次。尽管我初到作协党组，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很忙，但我深知绍棠这位挚友的心。我们在青年时代已是至交，患难时期我们曾相濡以沫，人的良知良能，使我把看望绍棠，当作一桩必须履行的使命。果不其然，1988年8月5日的夜晚，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通知我，绍棠中风于当天下午住进了北大医院。我当即给绍棠家中挂了电话，在电话中绍

棠的儿子松萝告诉我，病情比较严重，现正在监护室进行监护观察。对我来说，那是我离开劳改队后，第一次彻夜失眠。第二天早上，我洗了洗干涩的双眼，匆匆赶到北大医院，彩美告诉绍棠我来了，眼泪立刻顺着他的双腮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了绍棠的一只手，俯在他的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你一定能好！”绍棠摇摇头，嘴角翕动一会儿，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你要挺住！”这时，医生要家属推绍棠进CT室去检查病源，我就是握着绍棠的这只手，一直送他到CT室门边的。他的手比我的手大，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也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医生在检查室门口，限制我再往前走时，他才把我的手松开。这说明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头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只是因为血栓的原因，一时丧失了言语功能罢了。好在绍棠的病，经过北医的治疗，很快结束了半昏迷状态。

待他回家以后，我又去看望了绍棠，他用半幽默半认真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去了一趟阎王殿，人家没收下我，算我命大。”我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人过中年日过午，精力大不如前，这是人的生命科学，你我都要有自知之明。”绍棠虽然点头称是，但是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中风的教训。一个文学界的编辑告诉我，绍棠并没有停饮。在一次会议上，他已然喝了不少，但在饭局结束时，他看见桌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酒，便说：“这是农民的心血酿制成的，不能浪费掉。”说着，一抬手，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很欣赏绍棠的爽直和童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坐着轮椅车半瘫痪的人了。奈何？谁能重塑绍棠的个性？此外，他在病中还在惜时如金地玩命地写作，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虽然他的门外挂上一块木牌，写着“病体在身，恕不接待”的告示，连他个人都难遵守，又何以警示来者！后来他搬到阜城门外的一座楼内居住，虽然那张告示照贴不误，但他还是按老皇历办事——来者不拒，来者必应。这当然可以看成是绍棠一贯所具有的美德，可是它的负面价值，就是不停止地自我消耗。

到了1989年春天，我去他家时，他的话比过去任何一次见面时都多，我看他情绪很好，提议叫彩美为我俩拍一张合影，不曾想到这张照片，就是我和绍棠的最后一张合影照……几天之后，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全民皆悲，友人刘厚明为参加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奔往人民大会堂的半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灵魂随耀邦而去。绍棠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厚明的追悼会，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请我为他代送花圈，那几行字，也成了绍棠留给我的最后绝笔手迹。

1990一些表态与少年才子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所悖离。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没有必要出现的激烈，怎么到了晚年，会出现这般的文学？人到了生命之秋，把一些行政官员的名字，写到文章中去，与文学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关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知，而是一些昔日的许多友人的窃语，我为此而感到非常难过。

大概是1996年夏天，我偶然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绍棠一篇题为《死刑缓判》的文章，文章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关切之情，在一天晚上突然闯进了他家。当时正好有安徽友人送来的新茶，我给他带了去；我妻子是个副主任医师，也陪同我一起去看望他。至今，难以忘怀那次的见面：绍棠见到我之后，最初略有惊异之色，但很快露出了微

笑，那一瞬间，我顿时眼窝发酸——因几年过去之后，绍棠面容不仅消瘦了一圈儿，气色中也没了昔日的阳刚。

“我肚子上的腹水，已经有几千毫升。”绍棠依然笑着。我无法强作欢笑，因为我的这位莫逆知己，实非几年前的身体了。彩美给他端来一小碗面条，我见他一只手用筷子往嘴里挑送的时候，手臂有些哆嗦。此时此刻，我的心也不禁哆嗦起来，老天何以如此虐待绍棠，昔日的一个天之骄子，竟然被病魔折磨到这种地步。他不吸烟了，让彩美把一条万宝路交给我，我坐在他的对面，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儿，在沉默无言吸烟的同时，两只眼睛不敢盯视我的这位挚友，因为每看一眼，我都要心颤一次。

我的妻子向彩美讲了一些有关绍棠的病必须注意的事情，并告诉绍棠，对医治此病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否则后果会很糟的。绍棠只是微笑地点头，答应照办。待我们下楼时，彩美送我们到楼下，把我和绍棠拍摄于1989年春天——我与绍棠见面时的像片交给了我，我同时比较委婉地向彩美转达了一些文学界的友人，对绍棠的希望和对绍棠健康的祝愿。

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在作协五大会议上，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就离会而归，因而我去绍棠家的那次会面，就是我与绍棠的永别——他于1997年3月12日夜，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13日晨，接建功的电话后，我一天之内，像是一个丧失了思维的木偶一般，感叹人生苦短之余，含泪翻读了往昔绍棠写给我的全部信件。

之后，我上街去购置鲜花，当天下午，与唐达成兄一起携带挽联，赶往绍棠的家庭灵堂。挽联是达成的手书，上写：运河不泣泣哭少年才子竟远去蒲柳雨凄凄哀一代文星竟不归别了！我的挚友绍棠！当我在绍棠遗像前潸然泪下的时候，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一起涌进我的心扉。我简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不禁咽声而泣……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少年、青年岁月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摘自3月12日《天津日报》）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丁酉年纪事辛弃疾：《沁园春》——1957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

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我很觉得委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馀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一点宽松。《文汇报》复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

持久和平》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气是有了一点变化。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3 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4 月，《人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5 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健平在全社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

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座谈，向领导提意见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了：你不会没有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入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大约这就是由他来同我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铸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官健平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 年 8 月长沙解放，9 月我即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这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中学还没有毕业。不但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还没有政治历史。为什么要把我列为肃反运动对象呢？在肃反运动后期，宣布处理之前不久，报社肃反五人小组找我谈话，念了一个《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

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给我听，我越听越觉得同我没有关系。这个文件中说的特务间谍、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恶霸、土匪、胡风分子、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政、警、宪人员、敌对阶级、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宣布俞润泉、张志浩、朱正、钟叔河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四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过去并不怎么接近，现在大约是因为都要加以打击。就临时编为一个小集团了。

有趣的是这个小集团的称号，或者说“所定的性质”，开始，反革命小集团；批斗若干时日之后，调子稍稍有点降低：反动小集团；最后定案材料上写的，却更加客气，只不过是思想落后小集团了。当我看到拿给我签字的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肃了一年，并没有把我肃成反革命，这是因为十人小组的那个文件规定了一些具体界限，现在不说我反革命了，只说是思想落后，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的思想并不落后呢？在整风小组会上，我说：如果这是肃落后运动，我落后，肃我是肃对了。现在是肃反运动，在定案材料上没有一条反革命的内容，肃我是肃错了。

这里简单插说一下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之中，像朱正、钟叔河，在政治历史上毫无问题。有些人有问题，例如许任飞，曾任国民党军方报纸桂林《扫荡报》总编辑，后来又在重庆《大公报》任编辑；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挂过上校参议的头衔；邹今铎原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过。他们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在肃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为自己早已交代了这些问题才被列为肃反对象。这十多个“老虎”被内查外调、检举坦白、批判斗争，折腾了大约一年。

其中谌震、许任飞、俞润泉三人还被宣布逮捕法办，捉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到运动结束时才放回报社来。我还记得，每捉去一个，就把我们这些“老虎”领到写了这事的黑板报前面（逐个带去，每次一个），吓唬一番：你得争取时间，坦白交代，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如此等等。这样一年肃反运动的结果，报社并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办”的三个，除了自杀和病死的以外，现在多已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了。

肃反运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新湖南报社一处独有的，其他单位的肃反也大同小异。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供了几个数字，拿来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了。社论说，在肃反运动中，“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肃错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社论说是“有八万一千多名”。两项相加，肃反对象共约一百四十多万。取整数以一百四十万为分母，错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强，每一个在运动结束时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作陪。

这里说的是全国的情况。至于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弄得这样一场糊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而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当时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在下面的编辑记者无从知道他的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他当了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去调查了那些“走资派”的情况，一查，可就不得了。“官健平何许人也？现已查明，他的姓名、年

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的心腹，结业后又提升为工作队的分队长。

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下工委书记。解放后，官健平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邓钧洪《追忆 新湖南报 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经历，岂不正是肃反运动应该审查处理的对象吗？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组组长，肃反运动正是由他主持，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斗争对象。他需要的是转移视线，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于是把那些主动交代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的人作为对象，还凑不足数字，再找一些历史上毫无问题并且毫无疑问的人作为对象。

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免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冷下来的原因的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 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反右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健平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外干部的全社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月8日，黑板报的大字标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努力工作，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

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锐，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

针对民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简称为“杨罗耿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月5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唐荫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是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

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

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小集团，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文汇报》——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见9月5日《新湖南报》报道）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动，其他四人都是劳动教养。由此也可见唐被列为小集团之首，完全是因为他的民盟盟员身份。

三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

右派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邓钧洪、苏辛涛两位副总编辑，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六位编委，此外多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 1956 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 1955 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总编辑邓钧洪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南报总编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 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是，在编委会内，以官健平和秘书长孟树德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争论的情况，在 1993 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健平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也要注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要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6 年 3 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九篇，最突出的是 3 月 11 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一百六十九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東西！’

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 232 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在争论中，孟树德就加以曲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

作依据，以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健平。原来，官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派驻报社的代理人罢了。周惠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派官健平来。官健平的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惠的要求。

他对办报业务一窍不通，才更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在争论中，多数编委不是提出了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吗，作为回答，官健平说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图就是报纸的特点。”假如官健平向多数编委的意见让步，同意从报纸的特点出发，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代理人，也就不会让他留在总编辑的座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省委偏听偏信，受了官健平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希望省委能下来听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过也有人感觉到了，说：“省委实际上是报社争论中的一方。”多年之后，邓钧洪在《追忆 新湖南报 的“反右”斗争》一文中说：“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指周惠）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邓钧洪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周惠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个温和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对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周小舟传》中对此有一点含蓄的反映：“此时，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辉煌，捷报频传’，‘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二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难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呢？因为周惠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³还听了毛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在座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厌恶得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今年3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

编辑，胡开明、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 1959 年又成了右倾机主义分子。

四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锋、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 1955 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分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九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 9 月 14 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 月 9 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本报讯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下”。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里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

1950 行造谣攻击；8 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

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955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

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作家所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然而，朱正却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译，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的余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象，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象。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

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958“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54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

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

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

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在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

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

短不一的徒刑。

1979 年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做编书了。到 1983 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原载《黄河》双月刊，1998 年第 2 期）

那条小胡同

柳萌自打记事时起，走过多少胡同，我实在数不清了。这些形状各异的大小胡同，它们的这样那样的名字，以及它们的这样那样的故事和传说，我更无法讲述出来的。然而有那么一条小胡同，如同罩在我心头的一片轻云，无时无刻不在撩拨我的心绪，我想抹也永远不会抹掉。这条小胡同，叫羊管胡同，就在北京东城。

北京城的胡同多，成百上千，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这众多的胡同里，羊管胡同实在平常。它既不像东厂胡同，曾设有朝廷的情报机关，总使人感到有某种神秘；也不像铁狮子胡同，曾有达官贵人的府第，一听便觉得有某种威严。我甚至于觉得，平常的羊管胡同，几乎没有什么故事。你若打开小幅的北京地图，都很难找到羊管胡同这四个字。羊管胡同就是这般平平常常。

如果非要找出它的不平常，还是有的，那就是有一座寺庙，坐落在这条羊管胡同里。三十多年前我在羊管胡同居住时，这座寺庙的香火很旺，经常可以闻到僧众的诵经声。我同朋友们多次去过那里，后来还结识了一位老僧，这位老僧会讲英语会下象棋，他的名字我现在完全忘记了。这位老僧是半路出家，听说他原本是大学的讲师，平日钻研佛书入了迷，后来便弃教削发来此修行了。当时同我住在一个公寓里的单身汉，有几位是做翻译工作的，有的也是象棋迷，经常去找这位老僧聊天、对垒，渐渐熟了，大家便都知道了他的身世。这座寺庙里还有位看门的僧人，也同我们很熟，这是位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听说他原来是旧军队里的营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的家。这人很和气，只要我们一去，他便热情接待。我说的这些人和事情，同样平常，没有什么新鲜，但是这些平常的人间关系，却带给了我们不少情趣，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是那么有滋有味儿。

羊管胡同对面是王大人胡同。从胡同名字上猜测，大概这里住过一位王姓的大人物，不然不会有这样的胡同名。当时国家侨委就在王大人胡同里。羊管胡同里有机关公寓，王大人胡同里有大机关，上下班时人来人往，这两条胡同交叉的街口，便很自然形成了摊贩的聚集地。每天早晨天刚刚亮，这里便很热闹了，卖菜场、杏仁茶的，卖炸糕、油饼的，卖豆腐脑、馄饨的，总有七八种不同的吃食，热气腾腾地摆在那里。我每天吃早点大都在这里。我爱吃馄饨，出来直奔馄饨摊，边吃边观街景，有时一坐二三十分钟。有天

早晨我正在吃馄饨，见王大人胡同里停下一辆轿车，随后下来一位中年人，腿脚不很利落地走到馄饨摊前要了一碗馄饨，坐在长板凳上，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起吃。大家明知这是位轿车干部，但是谁也不觉得怎么稀罕，因为北京坐轿车的干部太多了。这位中年人吃完馄饨走后，一起吃馄饨的人说起，我才知道这位就是廖承志。在我的心目中，廖承志是位了不起的革命者，他的传奇故事和多才多艺，早听人说起过，今天居然让我邂逅相遇，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久久地望着他渐渐走远的背影。这天早晨我过得极其愉快。

可是，我要坦诚地说，我对于羊管胡同的缕缕深情，绝不仅是我记忆中的这些平常小事，而是这条胡同里藏匿着我个人的故事和悲欢。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又有几位青年诗人朋友，大家经常一起聊天读读诗，就因为这个，在“反胡风运动”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审查了我一通，并使我失去了到大学读书的机会，事隔两年，又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在“反右派运动”里被戴上帽子，送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从此我离开羊管胡同，三十几年来，再也未去过这条小胡同。近几年有时从北小街一带走过，真想去管胡同看看，重温年轻时代的梦想和生活，可是刚一抬脚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倒不是怕在思想上重新承受那有过的压抑，这些属于过去的经历早成了我的生活经验，今天咀嚼起来只会坚定我的意志。比这一切更容易牵动我的心的，是我年轻时的一段感情上的故事，只因为政治的倒霉，这故事才有了悲凉、凄楚的结尾。这故事好像一只死抓不放的手，揪着我滴血的心，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想放声大哭一场才痛快。然而这毕竟是纯属个人的生活隐私，怎么好同别人公开呢？只好永久地深埋在心底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平顺，无论经历是复杂，还是单纯，都会在心灵上有一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领地。我的这块领地是同羊管胡同连在一起的，今天写这篇短文自然便想起了这个不可言传的故事。哦，羊管胡同，你永远是那么平平常常，平常得好像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在我的心目中，羊管胡同，你从来没有平常过，我的许多故事是在你那里发生的。更何况你还知道我青年时代的梦想和悲欢。

雨天

柳萌生离死别，这大概是人间最痛苦的事情了。从时间上看也许是短暂的，在记忆里却会滞留很久。

我在这并不很长的生命历程里，有过无数次的同亲朋好友的告别，虽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惊心动魄，但是总有几次让人牵肠挂肚。这其中一九五八年春天的那次告别，更是久久地揪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就会气火冲顶，愤怒得不禁咒骂当时的自己，怎么会那样老实、顺从，眼巴巴地看着人间美好情感被残忍地揉搓。

那是早春四月的一天，北京下着蒙蒙细雨，大街小巷都是湿漉漉的，连人们的心也罩上了水气，以至于张不开飞翔的羽翼。有人说，今年雨水来得早，是老天爷愁事太多，总是在哭。谁知道呢？反正我是无论如何笑不出来的。

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要在早晨启程，这是风天雨天都不会变的。在那个万事都难以预料的年代，唯有这少变的列车时刻，使人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安定感。

此刻，中央各单位、各部门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冒雨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向前门火车站聚拢来，他们要搭车去密山、虎林一带的军垦农场，开始那不可知的北大荒流放生活。

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不大，可也不停。不知是匆忙中忘记了带雨具，还是沉重的心思无暇顾及，来的人里有不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若是在往常，这帮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很少雨天远行的，有些过于娇嫩的人，即使订购了车票，说不定还要退掉呢，怎么肯轻易受这份罪呢？可是现在，无论是过去的作家、教授、记者、工程师，还是过去的委员、司长、大使、书记，好像都没有了昔日的派头、威风、脾气，如同孙悟空跟随唐僧赴西天一样，不得不乖乖地听从命运的摆布。原因是他们头上都有个“右派分子”的紧箍，动不动就会被人念“老实点”的咒语。就连平日最爱发牢骚讲怪话的人，嘴上都好像贴了封条，不管心中到底是怎样想的，也不得不规规矩矩地哑然处之。这些在一九五七年夏天敢于说真话的人，现在却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留给他们的仅仅是痛苦的回忆，以及对于未来的茫然思考。

我当时是个子身一人的小光棍，父母也不在北京，自然也就少去许多情感上的牵挂。除了像我这样当时人走家搬的光棍汉无人送，凡在北京有沾亲带故的人，差不多都有人来送行，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他们互相的称谓看，大都是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等近亲，远一点的也不过叔舅阿姨。至于别的什么人；即使平日里关系果真不错，大概也很少有无顾虑的勇者，再说人家也犯不着，为了结发落的人送行，找顶划不清界线的帽子戴。在政治高于一切的那些年里，运动的风暴不时袭来，人们感情的泉眼干涸了，连言语都不敢交流半句，谁还肯用心同心相撞呢？能保持自己平安度日，少点政治差错，就算是幸运了。何必无事寻事，自讨苦吃。就是在这些送行的亲人之间，谁又能说些什么呢？明明清楚是蒙冤受屈，怎么好鼓励“要好好改造”呢？明明知道此去生死未卜，怎么好安慰“不要挂念”呢？凝滞的眼神，沉默的泪滴，变成了无言的话语，道出这人间复杂的感情。可能是老天爷有眼，看出了人间的不幸，特意洒下这场早来的春雨，替无辜的人们哭个痛快。雨呀，淅淅沥沥的雨，湿润了北京城，湿润了一颗颗善良无告的心。

我认识的一对小夫妻也来了。男的去年才从俄语学院毕业，分配在一个外事机构当翻译，结婚还未来得及去外地度蜜月，就遭遇了这场飞来的横祸。原因是说过“苏联专家有的也无什么本事”的话，被上纲到“破坏中苏友好关系”，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年轻的妻子是位中学教师。她紧紧地握着丈夫的双手，不住地哭泣，用来擦泪的手帕全湿透了，还在不时地擦泪，有时她用劲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紫红的齿痕深印在唇上。从她无限痛苦的神态里可以看出，心中聚集着无数难言的话，却被一道无形的可怕闸门阻挡着。丈夫也不便劝慰妻子，他唯一能说的一句话，只是：“别哭啦”。妻子反而哭得更厉害。两个人的目光，有时交织在一起，都是那样的痴那样呆，倘若不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很难让人猜想他们的表情，更难以理解他们复杂的心境。

站台上响起了一阵铃声，列车就要开动。这时，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手也拉得更紧，哭得也更伤心，只是依然不便开口说话。走的人边朝车厢走去边在回头观望送行的人，好像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似的，留恋的神情里透着无限的痛苦。送行的人不忍看一眼走的人，却又想再看一眼熟悉的身影，表露出来的矛盾神态显示出一颗正在破碎的心。人说哭是内心痛苦的最好解脱，不能哭岂不是会带来内心更大的痛苦。

列车到底还是开动了。起初只听得机器的轰鸣声，待列车渐渐远去以后，无数颗头颅和挥动的手臂，从车窗里伸出来，隐约传来更响的抽泣声。命运把一批人送到荒凉的原野。命运把一批人留在繁华的都会。无论是走的，抑或是留的，他们都要在痛苦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重逢。这便是这些人当时唯一的美好愿望。

雨，还在下着，淅淅沥沥地下着，下了一天，一年，二十年。当二十年后天空晴朗时，我回到春光明媚的北京城，心依然是湿漉漉的，这时我不禁苦笑了一阵。

二十年前的那场雨呵，该让我说些什么呢？还是不能说，只好缄口沉默。可是我依然在想，想二十年前那个雨天，想雨天中的我。

无言的等待

柳萌母亲是个爱唠叨的人，心里不搁事儿。生活里碰到高兴的或烦恼的事情，她都要说出来，很少有话闷在心里不言语。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在一件事情上不声不响，硬是挺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唠叨，直到这件事情有了结局，干涸的眼泉流出泪水，她内心的忧郁这才算释放出来。对于像她这样爱唠叨的人，能忍耐、克制到这个份儿上，该承受怎样的感情重负啊？其中的痛苦和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件事情就是等待她被划为“右派”的儿子，从“北大荒”流放地归来，重新回到她因等待而显衰老的身边。

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年轻时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之后的几十年再未回去过。

说是生活在大城市，其实连像样的大商场都未逛过，终日在家中忙里忙外的操劳，唯一的爱好也是活动，就是找邻里姐妹们聊天儿。弟弟妹妹小时候上学，放学回来见家门上着锁，不必等待，不必打听，到邻里的某一家去，准能找到串门儿的母亲。

这样一位不谙人间大事的家庭妇女，当然更不会懂得什么是政治运动，因此，当我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以后，家里人谁也没有跟她说，何况连有点文化的我的父亲都不懂，即使跟母亲说了她又能懂什么呢？但是，母亲对孩子的惦念，无论何时都是真诚的，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我，她总是要询问的。再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又是单身汉一条，每到星期日总要去天津看望双亲。突然有一天中断了对她的看望，那该怎么跟她说清楚呢？还好，那会儿正是干部下放的年月，母亲在街道开居民大会时，听说过这类事情，父亲就跟她说，我下放东北锻炼去了，母亲自然信以为真，不再说什么。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唯独我不在，母亲就会显得魂不

守舍，做饭常常忘记放盐或放两次盐，却不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

后来见别的下放干部休假，或者人家可以请假回来，而我，竟然是一走两年不见踪影，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这时才疑惑地偶尔说一两句：“他大哥到底去哪儿啦，怎么还不回来呢？人家下放的也回来过呀？”这时全家人心里都明白，只有母亲一人不清楚，她的大儿子——我是个“右派分子”。在当时一些人的眼里，“右派”无异于中国“最坏”的人，怎么能给坏人自由呢？下放不过是个好听的名词，实际是无情的专政严厉的管制，根本没有一星半点仁慈可言。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且我不是走一时半会，母亲更不会是一般的惦念，她只是不挂在嘴边罢了。我从“北大荒”回来以后，父亲曾经告诉我，母亲那些年丢三拉四的事情很多，纯粹是因为我的事让她太不放心了。这实在太可怜我的母亲了。在那个黑白颠倒好坏乱分的年代，连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都要遭受如此折磨，被欲加罪过以后的当事人的景况，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这些被当地人戏称“二劳改”的右派，到“北大荒”农场的第二年，正赶上全国人民大挨饿。农场只能给我们每人每天八两带壳的粮食，可是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却未减，不时有些身体不支的人死在荒野里。幸亏当时管制“二劳改”的农场领导还算开明，他们破例地允许我们可以做两件救命的事：一件是可以变卖衣物换食品充饥；一件是可以让家里寄钱或寄食品接济，让这些加罪并未判刑的人得以逃生。

我那时没有带来工资，每月只有 25 元生活费，更没有可变卖的衣物，只好写信找父母要吃食。有些原先级别比较高的人，或者家庭经济情况好的人，那时都有大包小包从北京寄来，里边大都是奶粉、饼干、腊肠、葡萄糖一类的食品，农场每天都要派出马车运送。我盼望许多天以后，总算接到了家里寄的邮包，打开一看，只有一个筒型双层的搪瓷饭盒，里边装着满满的油沙白面，数量、质量都远远不及别人的，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免埋怨父母不理解我艰难处境。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人口又多，就是这么一点东西，还是从众人牙缝里抠出来的。后来听父亲说，当时家里既无粮又缺钱，母亲边炒着面边流泪，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不知我饿成啥样子了哪。这时我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深深感到错怪了母亲，在那种情况下还同别人攀比，实在不该。现在想起来才意识到，正是这种不值钱而又非轻易寄来的东西，更显出母亲一颗比金子珍贵的心，这远比那些有钱可买可寄的东西情意更浓。

我在“北大荒”过着无望而艰难的生活，母亲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等待着，还经常在睡梦中呼唤着我的名字。有次她睡到半夜忽然惊醒，叫我父亲快去开大门，说是我从东北回来了；其实哪有那么回事，是她思子之心过于殷切。在过去那样把政治运动当饭吃的年月实在无理可讲。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哪怕是判刑几年十几年也好，总还会有个时间可以指望，而对于当时的“右派”根本没有时间界定，因此，不仅折磨着我们这些“罪人”的身心，而且也让我们的亲人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这种做法比之蹲大狱更让人难以承受。我简直没有办法猜测和理解，像我母亲这样爱唠叨的人，竟然默默地忍受多年惦念盼望亲子之情，那该是有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的精神啊：从 60 年代挨饿的日子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时候家家吃饭都是

分份儿，掉一颗米粒饭渣都要捡起来。我家那时人口比较多，弟弟妹妹们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分份儿也得让他们吃饱，母亲自然就不会按份儿吃。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菜，拨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她自己却经常饿得无力地躺在床上。弟弟妹妹也还都懂事，他们总是不肯要母亲给的饭菜，说：“妈，您自己吃吧，您不能饿着。”这时母亲总是说：“这饿啥。你大哥呢？他不定饿成啥样子了呢？”听到这些话，谁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大家知道她在牵挂着我，都希望她说说心里的郁闷，哪怕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谁也绝对不会感到厌烦。可是她就是怎么也不说，把无尽的思念和深情的惦记，全一股脑儿地积存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不得不经常写信提醒我，常给家里来信报个平安，免得我母亲总是牵肠挂肚。

这写信的事情，在我父亲看来，似乎并不难。其实他不知道，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在强劳动的“右派”劳改农场，我哪里有时间 and 精力写信，写的信又怎么能及时寄出。只要有一段时间我的信寄不到，母亲就会像丢了魂似的，常常是坐在那里自己出神。父亲怕母亲想出病来，有时就找出我的旧信，说是我新来的信，瞎编些内容给母亲读，这时她才会放心，总会有几天，高高兴兴地忙着家务。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母亲无言地等待着我。

我们这些“右派”之所以被放到“北大荒”，主要是考虑当时中苏两国是亲密无间的兄弟，有些“右派”就是因为对苏联有看法罹祸的，把这些人放在中苏边境自然放心。不曾想后来俩兄弟闹翻了，反目成仇，放心地区成了“反修”前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这批“右派”若是“乱说乱动”会更糟，上级便决定把我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尽管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我们这些“右派”来说，依然是个天大的喜讯，起码我们可以回家啦。

我想让思念的母亲有个意外的高兴，两年多来头次发了个电报，告诉家里，不日即可离开“北大荒”去天津。在从农场总场所在地发完电报回来的路上，我还想像着，接到我的电报母亲会怎样高兴，说不定很快会告诉邻里姐妹，更会千方百计给我准备些吃食，总之，她一定会用她全部的慈爱迎接流放归来的儿子。

后来听父亲说才知道，跟我想像的恰好相反，我这一纸突来的电报，差点儿让无备的母亲丧命。

送电报的时间是一天傍晚，父亲还未下班，弟弟们还未放学，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母亲像往常一样，做熟了晚饭，乘等待他们的时候，自己收拾她心爱的小院。

这时送电报的摩托车的哼哼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到我家门口熄火停下，送报人连喊几声“一号电报”，门牌一号的我家无人应声。送报人推开大门一看，见我母亲独自一人倚在墙边儿，脸色煞白，动也不动，送报人急忙走过去，一边呼喊“大娘”，一边又推又拉，最后找来一杯冷水喷在脸上，母亲才渐渐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幸亏遇到了这位好心的送报人，倘若没有他的及时抢救，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岂不是成了受人责骂的千古孽子。

母亲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她一听到送电报的喊声，不知怎么一下子联想到是不是我出事了，不然不会拍电报来，她的两条腿立刻不听使唤了，心里也发慌了，不由自主地倚在了墙边儿。她还说，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我。自个儿老不向好处想，又不便跟谁说，许多话全都闷在心里头了。我的事实在难为我可怜的母亲了，连她的儿子本想给她的意外欢喜，

她都没有福气承受，可见我的流放带给了她怎样的痛苦。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以后无论有什么急事，我都不曾给家里拍电报，怕让母亲再担惊受怕，更不想引起她对往日痛苦的回忆。

母亲用她无言的等待，终于盼来了她的儿子；母亲又同样用无言的忍耐，不久又送走了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名义上是摘了“右派”帽子，实际上并未结束劳动改造，很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草原。这样，母亲又等待了许多年，她还是没有再唠叨什么，不过她心里是有数的。在经历了那个人妖颠倒的“文革”以后，她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她曾说：“这回我明白了，好人为什么会挨整。”从此她更心安理得地等待儿子归来，只是仍然不多说话……

“少写”六记（上）

林希题说·代管记趣·猪场记情·相亲记憾题说清人沈三白，著有《浮生六记》一书，自述一生乐事，其思致之清雅，文笔之隽妙，令人读来爱不释手；今人有杨绛女士者，著有《干校六记》一书，其文笔之清秀，情愫之幽远，更是令人读后三月而不知肉味。不才如老朽，年在花甲，一事无成，又忽发奇想，以笨拙之笔，无华之文字，也想能写出一篇《六记》之类的文章来，也算是东施效颦，遂了我狗尾续貂的心愿。如是，每日苦思冥想，历时三载，勉为其难，最后才写出了这一些破烂章节，说来也真是让人感到自愧弗如了。

其实以吾人之经历，莫说是只写六记，就是写六十记、六百记，那也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只是大凡本人亲历之事，皆在“不要多写”劝告范围之内，故几次也想捉笔，但一想到保持一致，便立即又文思枯竭了。只是近来忽觉老之将至，再不将种种亲历事件一一记下，只怕日后，那就要连一记也记不下来了；鼓足勇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是，就有了《“少写”六记》的这篇无趣文章了。

身为作家，谁也是愿意写提倡多写的好文章的，只是遗憾，不是老朽不愿意写提倡多写的文章，只是老朽大凡提倡多写的事，都几乎很少有过参加的机会。老朽生于1935年，轮到老朽知事的时候，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年代早已结束了。

18 还没轮到我走进火热的年代，那火热的年代就开始以那比火还热的烈焰烧灸我了；待到火势稍弱之后，我就被送到如今被劝告不要多写的地方去了。如是，我就除了不要多写的地方之外，提倡多写的地方我连见也没有见过，直到1980年平反之后，我才有机会遍访祖国大好河山，也才有机会和工农兵坐在了一条板凳之上，以体会种种光荣享受。

但我终究还知自重，大凡不要多写的地方，我一定不会多写，只写六则，也就是一点芝麻盐儿罢了，再不写就有悖于“不要多写”的劝告了。五则、六则都不写，那不就成了不许去写了吗？而谁人又说过“不许写”的呢？可以查一查么，真是无稽之谈。

如是，我就要开始写我的《“少写”六记》了，当然也是以不伤害他人要紧，尽管人家当年伤害过咱，那是因为要紧跟么，何况人家至今还表示

决不忏悔，老朽就更要顾全人家的面子了。

代管记趣说起来那时候人们是傻，只要领导说句话，那就连一声“为什么？”也不问，便老老实实地遵照执行了。1955年把我定为“胡风分子”，根本就没给我看任何结论文件，作家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在一天晚上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准备准备到下边去吧。”这样，我就知道我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而且对于秘书长所说的那个“下边儿”我也知道是什么地方。于是连夜我就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跟着来人到“下边儿”去了。这若是在现在，或者是换了王朔呀什么的，他一定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位秘书长，“凭什么让我到‘下边儿’去？”再不行，他把他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说出来给这位秘书长听一听，说不定，这位秘书长也就不那么厉害了。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问，就这样“低头认罪”了，那时候也不懂申诉呀什么的，也不懂找个地方去讨个说法，就这样傻兮兮地由着人家说什么，咱就认下什么，也就这样由着人家把咱送到什么地方去，咱就跟着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先把我送去的地方是一家工厂，接待我的是人事科的一位科长，这位科长倒不太凶，因为那时候他还闹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上边说，有一个人要送到你们这里来，他也就坚决执行了。见到我之后，他就像是看外星人一样地把我好一番审视，大概是要看一看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放在工厂里可靠不可靠。看了好半天，也许他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譬如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吧，于是就开始和我说话了：“你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什么只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呢？你应该到另外的地方去呀！”当时我没有去想这另外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直到第二年，1957年，我又被定为是右派分子时，我才知道了我到底应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才合适。

说到1957年的被定为是右派，那也是一种绝对服从上级决定的表现。其实我什么会议也没参加过，更没有向党提过什么意见之类，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和我毫不相干，但到最后，我还是被划到右派里面去了。当工厂的那位人事科长后来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也是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我也没有问给我定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便也就承认下来了。那时我只是想既然我前面有问题，如今到了最后再说我有问题，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定下来就定下来吧，不全是领导的决定吗？不相信领导，岂不更要错上加错了吗？这次，我就真到了我应该去的地方了。

什么地方？劳改农场。

因为我的问题定案得最早，所以把我送到农场来的时候，农场里还没有像我这样的“学员”。这里，没有进过农场的人就不知道了，农场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政府”，如今听起来好笑，但那时候听着极自然；另一种人就是“学员”，大家以同学相称，绝对不许相互叫同志。学员对“政府”也不许叫同志，也不许叫领导，开会时农场领导讲话时，学员们要是说“政府”讲话，而且对于“政府”的话，那是只能服从，而不许违抗的。

我是在1958年的春天被送到农场来的，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车子停在农场外面，进农场的一段路全是泥泞，只走了几步，两只鞋子就陷在泥里了，要用好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不到一里地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钟头，到了看见农场房屋的时候，我早就累得一步也走不动了。

在农场场长的办公室门外，我从鞋底上踩掉了两团儿大泥巴，一下子一双腿轻松下来了，就像是能飞了一样。不懂规矩，我竟然向里面问了一声：

“可以进来吗？”等了好久，里面没有人应声，我又敲了敲门，好像是里面有人说话，只是没有人答理我，我又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还是没有人应声。

大约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我的全身都已经被雨淋透了，再想问一声，我已经没有勇气了；我想这一定是我没有叫对“芝麻开门”之类的暗语，所以里面的人才不答理我，就这样等着吧，也许迟早里面会出来人的。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了足有 50 分钟的时间吧，里面终于有人出来了。立即，我忙走上前去，才要向这位出来的人问一句话，不料那人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恶凶凶地对我说道：“喊报告政府。”哦，我明白了，身分变了，我已经是一个面对政府的人了。

果然这句暗语叫开了门，我在门外“报告政府”的喊声才落，里面就有人应声喊了一句：“进来！”于是战战兢兢的我就走进了办公室，头也不敢抬，只乖乖地等着听发落。

“叫什么名字？”一位矮个子的人向我问着。

我报上去了自己的名字。

“什么问题？”最初我还以为是问我有什么要求，但立即意识到不会如此轻松，这一定是在问我因为什么问题才被送到这里来的：马上冷静下来，我站得规范一些，做出一副知罪的神态，向这位“政府”说道：“右派。”“还有呢？”显然这位“政府”对于我只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向他报到，还大不以为然，好像我还应该再多一点什么才对。幸亏我还有点小聪明，当即就又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胡风分子。”“这就说全了。”这位“政府”看来对我的情况极是熟悉，直到我把身份说全了，他才和我说话。这时，这位“政府”就向我交代着说道：“今后没有事情不许到这里来，叫你来的时候，先要立在门外报告全自己的身份，然后再说‘报告政府’。

记住了吗？”“记住了。”我立即答应着说。

听“政府”作过种种的交代之后，我以为报到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于是我就等着分配住处，还等编队编组呀什么的。可是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这位“政府”突然沉下脸来，他向我看了一眼，然后又咳了一声，似是显示他的威风。待到我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经立在我面前，要向我发训斥了。

“你的问题极端严重，本来应该判刑坐牢，现在政府对你实行宽大，让你到这里来好好改造，从今之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地方，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彻底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听明白了吗？去吧，你的住处是二栋三号，找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班长，他会给你安排地方的。”就这样，我就算是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了。

关于在农场里的种种遭遇，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作《十劫须臾录》的长文，曾经发表在几家报刊上，时代出版社还把这篇文章收在了一册书名叫作《回首人生》的专集中；胡风先生的女公子晓风编辑出版过一册《我与胡风》的书，在读书界很有一些反响，这本书里就收录了我这篇文章的部分章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书找来读一读，从中也许会得到一点什么启示，由此也就不难得出这类事件何以就应该“少写”的原因了。

本来呢，在农场里的日子也就算过得平平静静，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谁也就不再希望出去了，也不盼着会出现什么奇迹。生活的内容只有两条，

一是低头认罪，二是脱胎换骨，全都是没头儿的事，天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是认够了罪，天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脱过了胎又换过了骨。当然没有希望的日子也是好过的，就是一个活呗，活着就是一切，其中既包括低头认罪，也包括脱胎换骨，用句当代的词汇说，那就是“全活”。

在农场里过了大约三年的时光吧，眼看着就到了 1962 年，这一年上边有了什么指示，要农场对收留的人员进行一下清理，清理来清理去，就清理到我的头上了。

一天，还是那位身子矮矮的“政府”，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是这次他不那么凶了。他先是冲着我看了看，然后脸上又露出一丝笑容，最后他才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呀，也真是太老实了，人家把你送到这里来，你就来了，好歹你也要问一声凭什么要送我到这个地方来吧？”一听这话，我猜出事情可能出现变化了，但我没敢细问，深怕有企图翻案之嫌，只是老老实实地坐着，等这位“政府”往下面说。

果然不等我提出问题，这位“政府”就开始对我说明真相了：“你呀，一不是逮捕，二不是劳教。三不是判刑，直到现在，花名册上在你的名字前面也没有红圈儿。明白吗，凡是判了刑的人员，一辈子无论到了哪里，户口本上，还有工作单位的花名册上，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划上一个红圈圈儿。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要管，现在是说你的问题，你是怎样被送到这里来的呢？我们收下你的时候，说下的条件是‘代管’，明白吗，你本来不应该由专政部门来收管，可是单位把你送来了，我们也不能再把你推出去，于是就把你代管进来了。”恍然大悟，在农场里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不应该被送到这里来的。说起来这就怪我了，当初人家送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问一个“为什么”呢？早知道这是“代管”，我何必一定要让这里代管呢？这里面代管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呀，我干么不找个日子好过一点的地方求人家把我代管起来呢？譬如 SOS 村呀什么的，不是也可以代管一两个人的吗？只是不幸，我被专政部门代管了整整三年，我的日子不好过，人家还嫌麻烦，你说说这真是何必呢？谢天谢地，三年的时间过去，人家也总算把事情的真实告诉我了，倘若人家至今不说，那我是‘辈子也不会知道我的代管身分的。好了，知道我是代管就好说了，那以后，我就不那么卖命地干活了，因为既然你对我是代管，那么我对你也是“代干”，全是多此一举的事，大家就马马虎虎地在一起凑合吧。

就是在我一点也不因得知代管真相而忘乎所以的时候，这位场长却对我说了起来：“过去的事，也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今天只要我们改过来也就是了。你呢，我们把你送回去，谁把你送来的，我们就把你再给谁送回去。”一听说农场要把我送回去，当即我就慌了手脚，马上我就对这位场长说道：“你若是认为我在这里的表现不好呢，今后我努力干活就是了，你可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我就在里面呆着吧。”“怎么你不愿意回去？”这位场长大吃一惊地向我问着，“那些劳改分子们，一个看不严，他们就要逃跑，怎么你居然会不想出去？真是不可思议了。”“在这儿好，无论是什么代管主管的吧，在这里，大家都一样，比起来我还比那些劳教分子好些，他们见了“政府”只许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和“政府”说话还能东张西望。可是到了外边，我就是反面教员了，上千人看着我一个，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呀。”当即我就对这位场长解释着说。

“你还是要相信群众么。”场长拉着长声地对我说着，“送你来的时候，

你什么话也不问地就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好表现；可是如今要送你回去，你也要什么话也不问地就老老实实回去，这更是一种好表现。”“不行，你今天把我送回去了，明天他们还会再把我送回来的。”死皮赖脸地，我就是不肯走，想出了种种理由，我是赖在这里了。

“上面已经下达指示了，从今后，专政部门再也不收代管人员了。”场长极为严肃地对我说着，“今天我们把你送回去，日后如果谁若是还想把你送进来，我们就连他一起留下；反正一个也是代管，两个也是一起代管，多代管几个也无所谓，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呀？”没有商量，我还是被代管部门送回来了，果然政府说的话管用，从此之后，也没有人再要给我找个代管部门了，这个代管的笑话就算是结束了。

猪场记情思想改造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灵魂深处建立劳动人民的感情；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犯错误的人来说，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思想感情没有发生彻底的变化，于是才在大风大浪之中迷失方向，也才在阶级立场的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

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根本的变化呢？说得空灵一些，是要脱胎换骨，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把屁股坐到工农兵的板凳上来。可是工农兵的板凳到底到哪儿呢？看不见，摸不着，谁都说自己是工农兵的代表，可是谁又知道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这思想改造才是一个最痛苦的过程，也才是一个最复杂的过程。

不过呢，世间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人出了题目，就一定有人能作出回答。这就和平时所说的那样，有人划道，就一定有人会走，无论你划的是多么弯弯绕的道儿，也一定有人能走得上来，而且还能走出花儿来，这就叫能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们一样，全都想当模范，从冲锋陷阵到捕灭老鼠，举国上下，全都要有个好表现。

到了农场，这些人是要在思想改造上争上游，而且这些争上游的人们还都是改造对象，人人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就拿我说吧，第一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第二我对不起领导的期待和教育，第三呢，我对不起我自己的青春年华，还有第四、第五；反正我对不起大家的地方是太多了，无论我如何改造，那也不是二年两载能够改造好的。但是，正因为我的改造任务比别人重，我才更要比别人多做出一些努力，自暴自弃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死马且当活马治吧，万一能改造好呢？世界上不是什么出其不意的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吗？就这样，我也和大家一起，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开始在思想改造上使牛劲了。

最初，我以为加强思想改造，也就是拼命干活罢了；后来一看，大凡因被政府信任而荣任班长的先进人士，其于干活上倒未必多么出力，有时候还真有些吊儿浪当的呢。可是政府就是认为人家于思想改造上的进步，如我这样傻卖力气的学员，就是不如。

为了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开始用心计了。

本来呢，我们常说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可是世间无论什么事太老实了也不行，满农场的人谁不老实？大家全老实，于是老实就不值钱了。

不过呢，让我太不老实，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大不过也就是耍一点小聪明罢了。于是，从此我就时时观察那些于改造上有进步的人，时时效仿着他们的一行一动，“傻子过年看邻居”，人家做什么咱就跟着做什么的道理，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果然，世间无论什么事都最怕“认真”二字，经过我的一番认真，我还真就看出一些门道来了。

在农场里，劳动组织是按班设置的，每几十个人定为是一个班，领导学员们劳动和学习的人，由政府任命，上上下下一律称这种人为班长。当班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这说明这个人 and 政府靠得近，思想改造有“表现”，很可能有机会得到宽大呀什么的，所以大家都愿意向班长学习，班长做什么，大家就一起跟着做什么，那就有希望进步了。

用心地观察班长的表现，我忽然发现，有许多晚上班长在屋里就是坐不定，也不知是为什么，时不时地，班长就要出去一会儿，也不到什么地方去，就是立在门外，不多时就进屋来了；再看他的表情，有时高兴，也有时忧心忡忡，还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着急。那么，这位班长到底到门外做什么去了呢？于是在我们班长走到门外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面一起走出来，这时我才发现班长只是把手伸出来，远远地伸一会儿，然后就或是高兴，或是着急地回屋来了。学着他的样子，我也把手伸出去寻找一下感觉；哦，明白了，我们的班长是在观察是不是在下雨。农场么，天时是最重要的事，该下雨的时候下雨，我们班长就高兴，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改造上有长进的人们就着急。有道理，这就叫是感情上和工农兵靠到一起了，这就叫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看的就是你是和什么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有了这样的发现，那咱也就知道该如何办了。于是，一天黄昏收工时，看了看天空，正好天上有一片云彩，回到住处，不对任何人说，只一个人暗自用心；等到天黑之后，还没等班长出去观察，我就早早地跑到门外伸手去了，伸了一会儿手，没有任何感觉。于是我摇了摇头，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才心事沉重地走进屋来。我们的班长当然猜出我是为了什么事而犯愁，暗暗地记在心间。过了几天，开会时，班长就表扬了我：“你们看看人家林希，最近就有进步，知道地里早了，晚上就出来观察气象，而你们这些人呢？就知道睡懒觉。你们这是努力改造自己的表现吗？说得学员们一个个低头无语，说得我却好不得意。

只是，光得到班长的表扬，我还不肯就此罢休，我还想得到政府的表扬；因为，晚上观察气象的事，班长肯定不会向政府报告的，要得到政府的表扬，那就必须做出点出类拔萃的事来。可是什么事才算是出类拔萃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来。

当然我也知道，这类事，那是只可即而不可求的。

天公有灵，知我心诚，就在一天的夜里，哗哗地就下起了大雨。人们被大雨声吵醒，一个个全都为旱情的缓解而欢欣鼓舞，果然是全体学员一起关心农业生产的大好局面。再往大炕上一看，我们的班长没在，想一想，这几天正是他的假期，好了，表现的时机来到了。当即，抱起我唯一的一条被子，我就从屋里跑了出来。跑到院里，我想，在这样的大雨之中，什么地方最需要人们的关心？养猪场，猪圈里的小猪娃们现在一定正在冷得发抖呢，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送到猪场里给小猪娃们盖在上面，明天一定要受到政府的表扬。好了，就是这个主意，抱着被子我就往猪场里跑，也是雨下得太大，我连头也抬不起来，又担心小猪娃们因为没有得到我的爱护而正在挨冻，我也就跑得更加快了。谁料，正在我向猪场跑去的时候，猛然间，就觉得背后有一只手用力地抓住了我：“什么人？”一声大声的喝斥，我只能停住脚步，老老实实地站在了雨中。

“下这么大的雨，不老老实实在地屋里呆着，你跑出来想做什么呀？”一听这严厉的声音，我就知道坏事了，算我倒霉，被查夜的警士们碰上了。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大风夜，有人到饭堂去偷窝头，被查夜的捉住，一口咬定说是下工时发现饭堂的窗子坏了，夜里睡不着觉，才跑来修理。“不可能，来修理窗子，为什么口袋里揣着窝头？”一句话戳穿了阴谋，再从口袋里掏出窝头来，铁证如山，就乖乖地跟着警士们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你想想，农场里还会有好地方吗？赶紧说明原由，万一被对方先说出我是出来搞破坏，那就有口难辩了：“我是给猪场送被子的。”立即，我忙着向对方解释。

“谁让你来了？”人家的警惕性当然很高，不会轻易相信我一个人的话，把一只手电正正地照着我的脸，极其严厉地向我问着。

“是我自己自愿来的，我怕小猪娃们挨冻？……”我还想往下说，但是对方一挥手，打断了我的话：“赶紧回去，不知道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吗？下雨天，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才是好表现，谁让你出来乱跑的？若不是看你留着分头，我一定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的。”这里面诸位看官就不明白了，在这个农场里，劳教的，要剃光头，内部处理的，才有资格留分头呢。

谢天谢地，我总算没有惹出大祸，乖乖地抱着我的湿被子，老老实实地，我只有往回走了。

唉，我只是想着这样小猪娃们呀，得不到我的温暖，它们该是多可怜呀！

相亲记憾生为男子，于得意之时，被人选为婿君，实在是一件极开心的事；倘选婿的一方再有点来头，譬如什么书香门第，或者是什么权贵者辈，那就更令人为之自豪了。

而我的被人赶来相女婿，则实在是一桩大笑话，至今想起来，还每每要自己暗笑，说来还真有点黑色幽默。

那一年，我正是 21 岁，被送进农场已经是第三年了，忽然说是有了一个文件，说是诸如我们这一类人，可以离开农场，但是不许回城，只要有一个公社肯收留你，农场就给你办手续；从此，你就算是那个公社的人了，虽说还不能算是社员，但却可以以一个农业劳动力的身份参加劳动，并且享受和社员同等的待遇。你说，这对于诸如我这类的人说来，岂不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了吗？然而，人家公社为什么要收留你呢？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富余，而且又是在城市郊区，无论哪个公社也是不肯收留人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娶进门来的媳妇和迎进村来的倒插门女婿。

而农场也早就对这些人感到头痛了，当初送进来的时候，说好是三年，谁料矛盾激化，城市再也不让这些人的回去了；总在农场里放着，人家农场也照顾不过来。

倒不是在生活中谁有什么要求，是人家农场没有人看着这么多的“分子”，还要组织学习，连农场的人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呢，你又让他如何给你脱胎换骨？快找个地方把这些人弄走吧，人家乐不得图个安静。

也不知是怎么一个途径，这消息就传到了附近的村子里，就说是有一批文化人，都是好年岁，还干过几年庄稼活，男的可以选来做女婿，女的可以迎进门来做媳妇，而且无论是男是女，一律不要彩礼；唉呀，就等于是白捡了一个便宜人儿呀！

于是，没多少时间，就只见许多陌生人跑到农场来了。头一个被相的

是一个40来岁的“分子”，来人是一对老夫妻，当然是两位老贫下；进得门来就和我们这位老“分子”拉嗑。哪里人士？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离婚的妻子还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是一切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最后才向我们这位“分子”问道：“女方带一个孩子，你同意不？”当即，我们这位“分子”就糊涂了，幸好我们这类人的智商都还不低，不假思索，我们这位“分子”就对这二位老贫下说道：“我是老病号，肺都快烂没了。”这一下还真管用，二话没说，那两位老贫下就走了。这可能是他们知道肺病是一种传染病，那是绝不能往家里招的。

而到了有人来相我的时候，那可就出了笑话了。我倒是没注意老贫下是什么时候暗中就先相下了我，有关的情况，据说他们全都掌握到手了，我是单身一人，母亲早逝，父亲另娶，没有任何家庭牵连，真是再好不过的条件了；而且据他们估计，只要是他们愿意，我是一定求之不得的，离开农场了么，自由了，这些人不是信不自由勿宁死的吗？世上还有比自由更贵贵的东西吗？没问题，这就看咱们姑娘愿意不愿意了。

很可能，人家姑娘也同意了，我也不知道那位可爱的姑娘姓什名谁，更无缘一瞻芳容，反正人家是先没有意见了。至于我这边呢？那就只差说一声，事情就算办成了。

大概也是村里的姑娘们过于高兴了，有一天晚上，正好是我们下工之后，我们几个小青年，一起到农场后面的小河旁边，蹲在河边上洗身子；洗着洗着就觉着有点不对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在岸边上围过来了一群姑娘，一面看着我们洗身子，一面还指指点点。后来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互相在猜哪个是自己选下的人儿？当时，我们是蒙在鼓里的，只以为是碰巧河边上来了几个姑娘，看我们洗身子怪好玩，自然就谁也不在意。

谁料，那几个姑娘也是过于自信了，她们居然向我们凑了过来，一定要把我们看个仔细。这一下我们有点警觉了，倒不是我们要来个什么男女不亲，只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怕再给自己惹事了：下工之后和村里的姑娘在一条河里洗身子，扣你个居心不良，跳到黄河里也是洗不清的。

情况不好，赶紧逃跑。我们几个小“分子”们当即就匆匆站起身来，想往农场跑，只是为时太晚，我们已经被这十几位姑娘包围了。这十几位姑娘倒也胆大，她们中间的一位冲着我就问：“你是姓林的那个吧？”我当然不会回答，因为已经有了那位老“分子”的事端在先。我知道这是被人家相上了，不能激怒好心人的感情，还是自己早早跑开的好。

谁料，就在我要跑开的时候，又有一位更小的女孩向我靠了过来，冷不防，这个小女孩子就在我身上掐了一下：“哟！真白！”她还喊了一声，随后，她们就一起大声地笑了。

后来呢？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说是又下来了一个文件，说绝不能把这些人放到农村去做农民，要把他们永远留在农场里；这些人是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放到农村里，真到了闹的时候，你就抓不到他了。于是，从此之后，相亲的人，一律不让进农场了，我呢，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做倒插门女婿的机遇。直到今天，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为之扼腕，真是太可惜了呀！

嗟夫！

（选自《散文与人》第六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影的锣鼓

钟惦棐前几个月，当音乐方面正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戏剧方面正在讨论《琵琶记》和《如兄如弟》的时候，有人便发问：为什么电影这样沉寂？难道电影已经没有问题了？但 11 月间，电影的锣鼓就响了。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使他们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这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 9%，《上地》是 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 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 1953 年到今年 6 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 70% 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 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

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

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

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工农兵电影”，至今还是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而其含义又是十分暧昧。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

但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其所以是教条主义的，便在于它把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示僵化了，并且作了错误的解释；其所以是宗派主义的，便在于它企图以此去分别中国过去的电影，把那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那些影片，统称为“消极片”！

这种只要现在不要过去的作法，无异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演员孙景联喊出：“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上官云珠认为：“这些年来，在我们厂里有些演员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认为有些来资旧社会的演员，今天还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舒适说：“1955 年未拍《南岛风云》之前，上官也是被积压的一员，在偶然的机会上主演了《南岛风云》。片成后她扮演护士符若华很成功。于是上官开始忙起来了。……像上官这样有能力的演员，过去独当一面的演员，大大小小的有才能的演员，我们剧团里多的是，潜力非常雄厚，不过是没有被发掘罢了。”而导演孙瑜，则提出了“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而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对“电影圈”内如此，对“电影圈”外也如此，老舍的《救救电影》，便说明了这些年来关起门来搞电影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上海《文汇报》在 11 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10 个，工农，15 个，以及如此等等。

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今有人觉得电影界的学习空气不浓厚，但这种一年一度的传道方法，如何能使大家懂得持久的、日积月累的学习的必要呢？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电影事业管理局，顾名思义，是代理国家管理全国电影事业的行政机构。但这些年来，这里除了讨论剧本等等之外，一个剧本该发多少稿费，一个电影导演在拍完影片之后该给多少酬金，纸带录音机可否改做磁性录音机，也通通要呈请批准。

但往往又是影片要开拍了，剧本没有批准，影片都拍完上映过了，酬金发不下来，纸带录音机只需稍加改动，便可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为了要等待电影局统一全国的技术规格，这样的改变便成为不可能。

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会有关于“狗”，关于“黑框眼镜”。关于“敲门”和关于“道谢”的干涉？为什么会有“人物统一规格”？为什么“审稿制度繁复”？（以上均见《文汇报》的讨论）这在于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的很不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这并不是说列宁的说法是不对的，也不是说不需要关心、不能有任何干涉。而是说，电影既是最重要的，既然它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违背了这种规律，即不尊重列宁在另一地方所说的：“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 1951 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

关于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甚至有人表示怀疑，有人则十分肯定。此二者，我们以为是值得继续讨论的。但退一步说，中国电影便是没有传统，那么，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从“明星”到“联华”，到“电通”，到“昆仑”、“长城”，是否也还有些比较好的经验呢？在制片，在组织创作，在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发行等方面，是否也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某些具有宗派主义情绪的人，才是急于要把这些一脚

踢开！而且希望踢得愈远愈好，不然就似乎要妨碍什么！

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但它首先要妨碍的，岂不正是这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作法么？孙景璐在上海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还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样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导演中心”自然还有组织影片创作，团结电影艺术家们在一起工作并逐渐形成创作核心形成流派的意义。但它绝不是说，电影文学的基础对导演不具有约束的意义。影片的风格就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由电影文学剧本所提供，而由导演所完成的。

目前，我国电影生产体制正在进行改组工作，其方向，就是为了使得它更加适合于电影制作的规律。但其中，电影演员的培养和使用，是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

它牵涉到，电影制片厂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演员？如果应该有，对他们怎样使用和培养？如果不应该有，对他们怎样安排？在当前的锣鼓声中，以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锣鼓为最响。这是因为他们在电影艺术干部中人数最多，问题积累的也多。但目前有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电影制片厂是否应有上百的职业电影演员？没有，制片厂将会感到成天向文化部打报告之苦，向剧院借演员之苦；而能否借到，尚是问题。但为了省掉这些麻烦，便使人数众多的电影演员们终年甚至数年“失业”，终年甚至数年过着惶惶不安的生活。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学习，白白地浪费掉自己的青春！即便是说，演员们终年都在摄制组，演技是否就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也还是个问题。很早便有人说过：电影绝不培养演员。因为演员在镜头前面的活动时间总是很短的。能够真正培养演员、锻炼演员的场合还是在舞台上。

我们不以为问题的结论便是如此，但这却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提请文化主管部门来认真考虑的。

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文化主管部门亦准备对此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但组织措施不能同时解决许多创作理论上的问题，也不能够说当制片生产体制一经改革之后，所有电影工作者的电影文化水平便能够立刻大大提高。因之我们很希望这讨论还能继续深入下去，真正为我国电影事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交心成“右派”

钱辛波 1956 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与来自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虔诚的。

1957 报纸上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从来是跟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是我又深信，党是不会错的，决不致于无端置人于罪。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安修，想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可是浦安修说不出什么，并表示她已久不见她二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哪些“右派分子”是怎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

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1957 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完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康生接着讲话。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 3 天，继续“反右”。

在 3 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临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当时作一些抗争，据理力争，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小字报或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思想汇报”。整材料倒也好办，就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但是，他们作的这种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比

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是办得呆板，读者并不爱看。整材料者就认定我是“攻击党报”。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过建国以后许多事要按照等级办事，比如开会、看文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被上纲为“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定为“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材料中则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

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没想到杨校长回答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回想 1956 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采烈，感到党组织在关怀和培养我，1958 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此后 20 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是 55 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的负责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敌人的行列？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怎么可以将我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视为“向党进攻”呢？回顾五十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联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之心向党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不仅是个人遭受灾难，蒙冤 20 年，国家民族所受的损失则莫大矣！但愿从此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事发生了。

反右记

唐瑜“左”网恢恢反右派那时候，我是一个老“左”。

那年 6 月 1 日，我在成都，到一间小学校参加庆祝儿童节，顺便在邮局买了一份《人民日报》。这一天有一篇罗隆基写的短文，歌颂百家争鸣，说领袖是大乐队的指挥，他是队里的洋琴鬼。

时日不长，只一两个月，我回到北京，第二天上班时，就听说有人大嚷大叫，扬言这回要好好摸一摸打伞老和尚的头了。

真真岂有此理！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比喻为“无法（发）无天”，但即使

是老和尚，也岂能随便让你来摸。

我顺手拿过办公室内早已备好的大字报纸、笔，写了大字报。第二天，我又写了一张回击人事部门的大字报。那年代，人事部门几乎是清一色极“左”阵营，偏偏我们这个部门出了叛逆。

以后我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一时“左名”大振。人民大学一个叫林什么的姑娘又到我们的下属单位点火，我也想攻之，孟超说是再等一等。

运动迅猛发展，热火朝天，各单位纷纷报捷，不仅已完成了百分比的数目，有的更大大超额完成任务。可是我却看到形势古怪，“左”热渐渐冷下来了。

各部门每天都有一个反右碰头会，交换情况，汇报请示。

党委徐书记每天亲临参加，闭目聆听。

李书记汇报：本单位座谈“反右”战果，某人始终不发一言。“划！”徐书记轻声说了一个字。

“可是，他并没有右派言行。”“划！”这一次声音最少提高了三倍。

马书记汇报本单位反右办公室一个积极分子的思想，说他感谢党的挽救，否则这一次非跌入右派泥坑不可，因为他开始时颇为那些右派言论所迷惑。马书记认为这次反右非常及时，它一定挽救了大批像积极分子这样的人。

“划！”这次徐书记声音温和多了。

“徐书记，这样会使党失去威信的。”“划，错了我负责。”全国形势大好，各个单位和部里的右派，都挖出来了，到处都在举行超额胜利完成任务的祝捷座谈会。

但是，右派的细菌据说仍在各个角落里腐蚀我们的党。有一些头面人物还未完全解决。譬如某部的头头的反党材料收集得还不够全面，仍在向未被划的人征集亲自听到的，转听来的，觉得可疑的。对已被划了的，要他们立功赎罪揭发检举。

部长太太和我是同事，我们每天中午都在东四一家小馆子吃饭，我叫她告诉部长要小心为好。她说：“根据经验，这已成定局，现在只是手续问题，他已经作了准备，但孩子的问题比较麻烦。”我说：“如有麻烦，可先安顿在我处。”果然，不到一个星期，报上就公开了。

各路右派大军早已纷纷流放到北大荒、甘、宁，有的甚至西出阳关。部长太太带着孩子随夫出发，我抱两岁的小女儿去送车，却被她带到哈尔滨去了。

次日中午，我又在东四碰到聂绀弩，他说：“你请我喝二两，给我饯行，我也要到大荒，在这里，什么也别扭，不如去那边，大家还有共同语言。”但这不羁的诗人，把香烟屁股一丢呼呼大睡。不烧死已是大幸。“这是敌人的破坏，是阶级斗争。”当然就银铛入狱。

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心中。怎么那样静悄悄，连马路上也有异样。

是无公可办？做不做工作，似乎无所谓？你要做什么，人呢，能工作的人呢？运动过去了，难道可以不抓工作？看到右派像垃圾一样，我要几个垃圾，总容易些吧。

我打个报告给党组齐燕铭、钱俊瑞，请拨给几个右派。两三天后，有人偷偷告诉我：“你和马等一批人，十天内将下放遵化，安家落户。”马是党支部书记，曾与徐书记争辩，又曾说过地球如果失去地心吸力，海水倒光了，房子、人颠倒了，怎办。

蛊惑人心！其他一些人，也是平时很不听话，总之，这一批人，应该算是漏网右派。

“左”网恢恢，宽大而不漏！

我到医药商店买一些药品，遇到我的部下，一位 19 岁的姑娘。她正在买一包数量不少的避孕套。她平时是很大胆的，此刻却有点尴尬，笑笑说：“13 岁参加革命，今年 19 岁，却成了反革命。我和丈夫都是少年反革命，如果生下一个小反革命，我们将是不可宽恕的罪人。”对这对小才子、才女，我能说什么呢？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农村似乎是“欢迎”我们的，因为再过几天，翻天覆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大红旗就迎风飘扬了！

剃刀边缘有一种称呼，也很奇怪。

西藏军区文化部长带我去看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在为我们介绍的时候，叫他“03 号”。出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说是为了保密，我说这样称呼不就告诉人家他的职务吗。他说，这是战争年代定下的规矩。

为了这第几号，有人曾对夏衍虎视眈眈。

解放后，许多老革命不知天高地厚，开口闭口怎样怎样，话说多了，文章写多了，就不免有差误。夏衍在《人民日报》写二三百字的小方块，有一篇谈到号码，说每个人都给一个号码。写信时只写：第 1 号省、2 号市、3 号区、4 号街、5 号门、6 号楼、7 号办公室、8 号同志，或者 x 号大学，x x 号工厂等等（大意如此），有时也口头作谈笑资料，听者哈哈大笑，完了。到了反右运动，人们的记忆力特别强，特别敏感，这不讽刺党吗，这不是恶毒攻击党吗？那时，有人首先想保护自己，摆脱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危险；有人想立功，看别人倒下去，自己飞起来。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

但这次运动看来主要是清除党外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对党内高级人士较松（陈沂的被划右派是 x x 为消除长期以来不听话的分子）。那些有多年的政治经验的大人物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纷纷马失前蹄，真是世事难以预料。

（选自《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

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

黎白 1957 开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是首当其冲，展开最早的一个军内单位。从 1957 年初鸣放开始，接着展开反右派斗争，进而开展整风第四阶段至最后的组织处理，全部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直至决定创作室撤销。我当时是创作室的创作员，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训的、沉痛的历史。我想，将它写出，也是有益的。

昙花一现的总政创作室总政创作室建立于 1956 年，它是以文化部原有的临时创作组人员、从各大军区调来部分文学、美术方面的创作人员及部分参加莲花池“肃反”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组成的。有文学、美术创作人员及两位秘书。创作室主任是虞棘（兼电影处长，创作室党支部书记）副

主任魏巍、文学创作员蔣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佳、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秘书柳琪祥、夏信荣，美术创作员艾炎（组长）、关夫生、高虹、彭彬、刘×、何孔德、黄胄、张祖武。其中，胡可是党支部宣传委员、黎白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创作室组成后，由于创作需要，由创作室借调代管的各军区创作人员有徐孔、林予、樊斌、郭良信、孙景瑞。

在鸣放、反右时期，创作员郭光因病未能参加运动。丁毅调总政文工团，西虹调《解放军报》，实际上都没有在创作室参加反右运动。张桂是反右初期从解放军文艺社调来后参加运动的。所以，创作室在编人员只有 27 人参加了运动，非在编人员 6 人中有 5 人参加运动。实际参加创作室反右的总计 32 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8 人，受中右、党内处分或遣回单位继续批判的计有 7 人。也就是说，受处分的人数为 15 人，占整个创作室人员的近一半。

可以说，创作室从 1956 年成立至 1958 年结束，主要是经历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是绝无美妙可言的昙花一现。

“四人文章”和“灯下漫笔”1956 精神的鼓舞，及在这之前的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讲话所鼓舞，或者更早一些的 1 月 4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许多重要精神，很自然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的著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许多报刊上相当大量地出现了一批“百家争鸣”的言论和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 1942 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也就引起了一部分主管文艺的及相关的人士看不下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灯下漫笔》，总政文化部四个处长级的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联名在 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后来通称的“四人文章”。应当说，这两篇发表在党刊、党报上的文章也是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但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艺界相当一部分人受到震动，认为这是反击或反击的先兆，不是“放”而是“收”的先兆。因为多少年来，人们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一些人被整怕了，产生这些疑虑和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任何人也想不到的是：1957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在这前后，中央批评了《人民日报》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在毛泽东参加的颐年堂会议上，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挨了批评，指责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

4 挨了中央严厉批评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写着：“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又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并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又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它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也使陈沂和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这几位部队文化文艺工作领导人震惊得无所适从。陈沂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批评为阻碍鸣放的、当时党内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紧跟中央的步伐，亲自到军内几座院校鼓励鸣放。他在发言中曾说：我从1927年入党，一直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的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陈沂讲话的大意）。更没想到的是陈沂这个讲话中的“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十六个字，成为他不久被划为右派的“猖狂向党进攻”的主要罪状。其他四位处长在鸣放及反右中也大都是一付等待挨批的模样，有的人也确实在挨批。

这是鸣放前及后来反右中，总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化单位形成混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恰当地说，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很难讲是由总政文化部领导的。

没有形成热潮的鸣放4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文艺院校领导、知名人士的座谈会，鸣放掀起了高潮。

总政创作室也召开了为数不多的鸣放座谈会。据我亲身经历，创作室单独召开的座谈会并不多，我在鸣放初期到烟台去创作未曾奉调返京参加；还有一些创作员或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也未奉命返京参加鸣放。我是5月份返京后参加了一次创作室部分人员的座谈会及一次由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组织召开的，有部分创作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意见，也有过不同看法的发言，但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都是比较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我记得在座谈会上，公刘提出“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也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我却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公刘的意见。公刘没有反驳我，与会的其他同志也没有反驳公刘和我。会后，我受到了支部书记虞棘的批评，说我身为支部组织委员却阻碍鸣放。他讲了陈沂及“四人文章：受批评的情况，而我在这之前不在北京，是不清楚的。但，我对这个批评也不很心服，我向虞棘说：我发言是讲明当时肃反的事实并没有错呀。虞棘只说：“鸣放嘛，让人家讲就是了。陈部长是受了毛主席的当面批评呢。凡是对鸣放不利的话都不该说。”我当时有些糊里糊涂，我认为虞棘似乎也并不很清楚。

在解放军文艺社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大多与社会上的鸣放联起来了。

徐光耀刚从他的生活基地回京，他发言是肯定双百方针的，形容为“海阔凭鱼跃。”我发言中也提到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说：我

认为费孝通同志的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借鉴,虽然我们部队并不如此复杂……会上,杜烽等同志还提到了全国戏剧家协会的鸣放和美术家协会的鸣放。后来,大部分发言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有的发言也就成为以后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罪状。回顾我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的所有发言,我认为即使在当时也是以拥护整风、帮助整风为目的的。

尽管报刊上已发表有激烈的言论,这两个座谈会上发言却是“低调”的。

与此同时,创作室部分同志介入了文艺界鸣放热潮之中。美术组艾炎等同志参加了美协的鸣放;杜烽力求联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到剧协参加鸣放。

白桦单独去云南到昆明军区文艺单位和省文联支持并鼓励鸣放。创作室的作家、画家中的少数同志投入了鸣放热潮之中。鸣放的核心内容仍是在贯彻双百方针,力图纠正或改变一些单位确实存在的带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以及力求改变某些过左的粗暴领导作风。应该说,所有动机都是拥护中共中央决议的,即使发言内容和态度也并不是过激的。而创作室的相当多的创作员,基本上没有投入鸣放中间去,有的忙于创作,有的也许出于谨慎。个别创作人员甚至是完全没有参加鸣放座谈,更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鸣放活动。与当时鸣放高潮的许多单位相比,创作室的鸣放实际上是相当冷清的。这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了右派分子进攻,并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时,反右派的运动已经决定下来了。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下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就突然而迅速、猛烈地展开了。所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是鸣放开始的话,到毛泽东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有17天的鸣放时间,到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即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派运动为止,鸣放的时间也只有40天。总政创作室实际上算不了全力投入鸣放,也是不足为奇的。

“战果”可观的反右派斗争1957反右派运动来势汹涌的巨浪冲激得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一片混乱,形成了失足失措的局面。文化部长陈沂已是作为重点在总政范围内接受批判的主要人物,陈其通担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忐忑不安地领导着文工团的反右运动。

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反右运动,每次开会,他作为主持人总是先表示自己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别人时也很少作为领导人发言,更很少参加创作室支部会议对运动开展的研究。鲁勤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创作室主任虞棘则被一些人认为是陈沂的山东帮重要谋士,尽管虞棘是创作室反右的主要主持人,看来也只是依当时的气候,查阅鸣放发言,尽可能打出个右派分子来。所以,创作室开始反右时,是乱了阵角的领导人在进行领导,支部也很少有过对室内人员排队研究或事先预定打出多少右派分子。我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类似以上内容的支委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几乎形成了谁有鸣放言论,甚至没有鸣放言论也要相互揭发的局面。最早“揪出来”的樊斌、吴占一等并不是创作室的编制内的成员。樊斌是昆明军区的成员,他从小在

部队担任卫生员，他的新作《雪山英雄》在当时有很好的反应，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我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他的。以后留在创作室代管进行创作，我曾兼过创作室秘书，又是党支部组织委员，才与他有一些往来，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朴实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我记得樊斌参加过不多的几次会，其中也包括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会议。他在创作室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参加过揭发和批判，但我知道只是由于他在鸣放会上讲过几句激烈的话，又被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颇为简单地就划为右派。吴占一被划为右派更加简单，他原是总政文化部的秘书，曾随总政副主任甘泗淇去参加苏联归还旅顺港的活动。听到过甘副主任讲了几句对驻旅顺、大连的苏联红军不满的话，回到北京向几个同志顺便讲过。就以反苏的罪名划为右派。他们两人定为右派，依我的记忆，创作室支部大会和支委会都没有研究确定上报或正式表决过。如何就被划为右派的，我至今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很快就离开创作室。

创作室反右时期进行揭发批判是分两个组进行的。文学组是在虞棘、魏巍主持下进行，而美术组是在另处进行的。

文学组的反右运动，我是全过程都参加了。

在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同时，公刘被批判了几次，定他为右派的“罪状”并不复杂，一是他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他确在鸣放会上发言对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提出过批评。这个会我参加了，但绝对不是攻击全国的“肃反”运动。二是他发表过的几首古体诗，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无法理喻的。三是对他过去历史的某些已经作过组织结论的问题旧事重提，很简单地定为右派。再一位是沈默君，对他的揭发批判会议开了三四次。沈默君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找不到他有什么攻击言论。依他平时的作风及品质，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他应划为右派分子。只有我一个人不兴趣地在会上发言表示这是反右派运动，他没有右派言论就不应该划为右派。依其作风划为坏分子也不能划为右派。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另一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是白桦。他是被召回京在创作室参加反右的。

他正在积极揭发批判别人，昆明军区党委来电给总政治部揭发他在昆明军区的“罪行”，并要求划他为右派，经过总政批准了。所以，白桦划定为右派并不是创作室揭发出来的。

反右派运动初期，作协党组从6月6日陆续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至8月6日结束。

“反党集团”的报道。与作协党组扩大会同时，被认为与丁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在被揭发和批判。在创作室的创作员中，徐光耀和我都是原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文学系的学员，陈企霞是系主任。徐光耀在建国后又曾在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所以，我们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内的骨干”而被揭发和批判。

徐光耀的“罪状”主要是替丁玲翻案，经济上支持陈企霞。这个罪名是毫无道理的。

关于替丁玲翻案，是指1956年作协党组曾写过一封公函，要求总政创作室党组织让徐光耀写一份丁玲在主持文学研究所时期被揭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和证明。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即将作协党组的信面交徐光耀，请他写一份材料。他当时表示没有必要写。我认为是作协党组的要求，又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来函，还是写的为宜。他查阅了他的日记后，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

写了一份材料。这怎么能认为是徐光耀恶毒攻击作协党组，蓄意为丁玲“翻案”呢？而在经济上支援陈企霞，也和右派罪行丝毫不沾边。陈企霞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很久，1956年后或1957年初被解除隔离后，有同学来找到陈企霞，说陈企霞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这种帮助还不能被陈企霞知道，否则，陈不会接受。徐光耀相信了这位同学的话，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他又刚刚有些稿费，就支援给陈企霞几百元。这两条罪状就将徐光耀划为右派分子了。徐光耀1938年13岁时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工作，为人朴实，自律很严，鸣放时，他正在农村深入生活，被调回京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以他的为人，品德和言行，划为右派，即使是创作室的几个少数处于整人位置的人也感到意外。

我与徐光耀属于“同案犯”。唯有一件事似应讲一下，即会上对我曾经“系统地恶毒攻击赫鲁晓夫”这一罪状，在被批判时，给我内心的震动超过了这个“罪状”的本身。创作室反右运动中后期，某作家批判我时说：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也有意见，但是我们拥护苏联共产党，拥护赫鲁晓夫同志，你根本不同，你对苏共，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党都有刻骨仇恨，你反党思想深入骨髓……尽管我和这位作家在调到创作室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发表的一些作品，对他也有敬意。而他这个批判却使我按捺不住，当场和他抗争起来。以前，他对我毫无了解，依当时对干部的要求条件而论，我不是剥削家庭出身，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一贯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说我对党刻骨仇恨、深入骨髓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运动中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若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在鸣放中并没有反党言论，若是由于个人恩怨，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对赫鲁晓夫有意见是对苏共的拥护，我对赫鲁晓夫有意见就变成对苏共对党有刻骨仇恨？这种“理直气壮”的诡辩无非是他居于批判别人的位置，被批判的人只能低头认罪吧？当时我实在无法忍下去，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至今以为写出这个细节并非插曲，并非个人恩怨。它反映出一些人在大风浪中的政治品德，骨梗在喉，不能不讲。

对我的定性有过反复。最初，创作室主持运动的几位同志并未都要把我划为右派，而是定为中右分子，给予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但原总政文化部某副部长此前不久调到作协担任书记，他向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黎白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重要骨干分子，必须划为右派分子。而担任总政纪委书记的联络部长张桢样同志坚持不改变原来决定的处分，所以，我仍按原处分处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

老实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凡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如果还能幸存下来，也是经历了20年的非人生活啊！

我几经反复，最后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至今我极为感谢我并不认识的张桢样同志。

到了1958年初，创作室反右运动告一段落时，在创作室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等八名。徐孔被调回原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中右分子及受到处分的或处理的有寒风、黎白、林子、韩希梁、刘×、张祖武等六人。两类相加共19人，是创作室人员及代管人员的一半。

另外19人中，丁毅、西虹、郭光或调出或因病未参加创作室的反右运

动。胡可、蔺柳杞、史超等又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虞棘属于被批判的对象，柳琪辉、夏信荣是秘书，只参加运动或是记录。郭良信、孙景瑞返回原单位。总政创作室的成员中，在反右派运动里没有挨整的就不多了。

反右派后期“整风第四阶段”的风波 1957 张小字报，内容不限。有的同志“久经考验”，只写了一些“请不要在厕所乱扔手纸”，“请不要随地吐痰”之类的小字报。有的同志“不知深浅”，还是写了一些有关对领导同志的意见等内容。寒风等二同志在他们写的 50 张小字报中有一篇“打油诗”，其中有“老××没主见，跟着××屁股后头转”的词句。寒风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因为不够积极受过批评，却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右派罪行的言论，这首打油诗却使他在动难逃，终于被以算老账的方法，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于 1958 年下放到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创作室主任虞棘早已未经改选就被剥夺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在整风中成为被连续揭发批判的重点。后因突然病变住进了医院，对他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到了 1958 年 5 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及受了各种处分的创作员已先后离开了创作室，右派分子被正式开除军籍、党籍，分别送往劳改地点及管教单位，其他受不同处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农场或遣回原单位。几位主持运动的及没有受到处分的同志有的返回原单位，有的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个别人分配到军分区。至此，创作室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不久，创作室被总政撤销。

反右后所想到的反右派运动毫无疑问地是一场“左”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 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就完全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

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又是如何估计、判断并作出结论的呢？他在 1957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编入毛选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文中写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这个结论是讲在 1957 年，也就是说建国后的第八年。毛泽东所指的是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依附于那五张皮上，几乎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爱国爱党之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通通否定了。所以，毛泽东所讲的通过鸣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就不难理解了。很多人积极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满腔赤诚地投入鸣放，转眼之间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有的人和风细雨，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有的人甚至一句话没说，也被划成右派，就是不足为怪了。

即使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也统统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彻底改变立场。基于如此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判断，即使没有反右派运动，他们在国家中的位置也是明明白白的。

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位置被排列在“地富反坏右……”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比历代封建王朝时代认为的“下九流”还要低下，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这种“左”的错误，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对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经过几十年，大家都有了切身的感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平反了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得到改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清除它的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散文三篇

饮可早春 1957“小乔初嫁了。”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

踌躇满志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月休学疗养。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

我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的体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男的一律穿干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蓁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椅，每到晚上，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

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陪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桃源石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品，畅销国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服，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忽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诗作。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的时候了。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那时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了呢？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座谈会都能畅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太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未央、邵燕祥、梁上泉、流沙河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

争中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赖汉屏照了一张像。

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翟秋白的样子。这就不仅是洋洋自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

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来：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啊！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期望三年，热恋三年，等待三年，过去那三年，经过多少泥泞雨雪；天真一对，纯洁一对，热情一对，以后这一对，还有许多离合悲欢。

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个县里当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

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

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汉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就叫《百草园》吧！”他们拍手叫好，并要我写个发刊词，我也便写了。大意说，他们现在还只能算是一些小草，但小草长大了是会开放出鲜艳的花朵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闯下了大祸，后来竟把《百草园》定为“反党小集团”。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而我们却用百草来和百花对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园就是毒草蔓生的园地，所以《百草园》的成员全是反党的，而我和赖汉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园》的“黑后台”，于是我们便当然要划为右派了。当时中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不好给那些学生戴帽，而在他们毕业分配之后，又在各自的单位把右派的帽子给戴上了。这是一种什么手段，我至今还觉得悲哀。

这在当时，我是糊里糊涂的，一点也没有料到。那时我确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当时对大学的领导说：桃师的师生还在，时间过得不久，我认为一切可以对证，我能把一切说清楚，讲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与他们对证。学校领导也认为我在校表现很好，要定我为右派缺乏依据，现在的揭发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确不确实也应该弄个水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联系之后，由学校党委写了个委

托桃源县委处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着桃源来人接我。

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车，就发现来接我的人，简直就是把我当作犯人解押的，在车上上厕所都被监视。一到桃源，他们便把我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了。他们宣布：不许外出，不许和外人接触谈话，连家属也不能来往，甚至也不通知她们，不让家人知晓。开头一些日子，只要我写反省材料，也不与我谈话，也不开会，我觉得似乎一下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了。我有什么反省的？我写不出材料来，便写诗，写一些怀念我的爱人的小诗。这些小诗因为都有真情实感，都很珍贵。后来似乎开过一两次批判会，他们安排了一些积极分子，一上来就要我低头认罪，我一开口他们就喊口号，根本不容我申辩。我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他们就动拳脚，说我顽抗，不老实。记得有一个姓陈的什么老师，恶狠狠地冲上前来，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眼镜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遏，干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他们没办法叫我认罪，只得再把我关进小房，不再开会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材料其实也早就写好，只等我承认了，还有什么和我对证要我分辩的余地呢？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个小平房里，被他们关了几个月，直到这年12月，他们才向我宣布：学校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划为右派，由桃源县委送劳动教养。接着就把我们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劳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押到桃源，有一辆专车，把我们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些人说起，那时划右派分子，和后来评先进一样，各单位都是有指标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谬！而所以划到我头上来，主要是我得罪了当时桃师的校长。他觉得当时桃师学生对我的崇敬超过了他，是我“占领了桃师的思想阵地”，使他的威信下降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反省室记趣 1958 子便是我的反省室。

当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的调干学生。我是想回桃源来把我的所谓右派言行澄清的。谁知一来就被禁闭，失去了自由。会上也不容分辩，只有认罪的份儿，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这么铁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时，私下里还有另一个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迈的母亲，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儿子。我十分想念他们。

我离开他们一年了。分别的时候，儿子路沙还只出生三个月，还不会叫爸爸，只在轮船响起汽笛、将要开走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哭叫。但那声哭叫，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要远离他而去，还是被汽笛吓得“哇”地一声呢？现在他应会叫爸爸妈妈了，我多么希望能抱着他，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啊！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孤寡的老人。她体弱多病，常年咳嗽气喘。我这个被她视为命根的独生儿子，却有许多使她伤心的事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就是不孝吧。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母亲那时大约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吧。父亲没了，留给她的仅有几亩祖遗的薄田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

可是第二年，九岁的弟弟又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又瞒着她偷偷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走了。她得知消息后从家里赶到临澧，部队已开往常德，她又从临澧赶到常德，部队又

到了桃源，她又赶到桃源。

部队却因参加衡宝战役，奔赴雪峰山前线了。她想见儿子一面也没有见到。回到破漏的老屋里，把一只老母鸡一直养到我从朝鲜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结婚之后，把她从临澧鳌山接到桃源，和我们一起居住。岳母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便建议两家合成一家。仅仅过了一年，我又回长春复学。现在我被禁闭在这里，连见面也不许。

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伤透了。现在我多么想见到她，跪在她的面前向她哭诉、向她悔罪啊！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

而我的爱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会如何的伤心落泪呢？她是一个独生女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上校。她的幼年，曾跟着父亲在重庆、南京就读小学、初中。到了1948年，她父亲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可救药了，自愿请长假回乡，靠两架木机子与岳母纺织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国民党军官，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得了肺结核病，终于病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岳母胆小，连尸骨也不敢去收，遗体不知被人埋在什么地方了。元南幼稚，坚决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真诚拥护革命，连父亲的遗物也不肯去认领。母女俩也是相依为命，在桃源师范认识了我，认为我才华出众，思想进步，经过三年热恋，便嫁了我，以为生活从此幸福，谁知婚后只过了一年，我又划成了右派，她又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悲可叹的命运啊！当地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又是如何的震惊，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让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对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释，我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决不会去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

我是多么爱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啊！为了共和国的成立，又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都流过汗流过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马功劳的。我们三叔伯兄弟一同参军，一个弟弟就牺牲在朝鲜前线，尸骨抛在清川江畔，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啊，我是如此地思念元南啊！我认为这时候，只有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信任我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是相连的。这个时候，我最怕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倒，失去精神的支柱，我必须安慰她，鼓励她，给她以生活的勇气，而且我也需要她的支持，她的信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永远给人以力量的。

这一切便是我私心想回桃源的原因，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被关在这间反省室里，她们也许还不知道呢！

这间房子据说原先也是一位教师住的，那老师划为右派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于是他的住房临时做了我的反省室。

我反省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只有枯坐。

不，我不能枯坐，我有思想，我有思念，我有宣泄不尽的情爱。于是我写诗，偷着写诗，用一些纸烟盒子偷着写一些精短的小诗。好在屋子里只关了我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而且我写小说，写朝鲜前线的事情。记得其中一篇题名《下一站》，写一个抗美援朝的汽车司机，一个英雄，一个很风趣很善良的英雄司机。还写了他与一个朝鲜老大娘和一个朝鲜小姑娘的血肉深情。另一篇题名《香烟》，写志愿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在患难中的生死情谊。

但我写得更多的还是诗，是写给我的爱人元南的一些小诗。例如：越是没有信息，便越是爱得深沉。

你从前写的些平常的信，如今字字都成了珍品！

这是十分真实的情感，思念她的时候，我就把她写的一些信翻来覆去地看。又如：纯静了的悲痛没有泪，我想。

我不知自己是麻木还是健忘。

再见时我怕只会对你傻笑，我得道了，再也不会悲伤。

真的是得道了，大彻大悟了吗？不是。这是一种巨痛引起的麻木，是灵魂受到严重挫伤后引起的迟钝。

人们在痛极之时，往往会对一种幸福生活来一个否定，好像原本没有那些幸福会好些，痛苦会轻松些。没有得也就不会有失。我写道：真不该认识你，不该走上女生部的楼梯，不该题辞，不该通信，不该做你的嫁衣，不该走那条山林的路回家，赤着双脚，不该有这些爱情的痕迹，成天折磨我和你！

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往事为依据的，1953年我去看我的二叔章道生，他那时在桃源师范教数学，他和二婶就住在女生大楼一个教室的对面。我走上楼梯，迎面遇见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嘻嘻笑着下楼，见来了个志愿军，便领我到二叔的房里，一个个热情地向我问这问那，要我讲朝鲜的战斗故事，其中就有元南。她性格开朗活泼，显得最为热情。谈了一会之后，她便拿出她的日记本给我看，要我针对她的思想帮助她进步。我便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了两页很有感情的题辞，记得我的开头一句话便是：阅读您的日记直至深夜。

这自然是打动人的话，她看了之后哭了。甚至请病假没吃饭没上课，于是我约她谈话，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初恋。婚后我带她回临澧鳌山看母亲，走在山林小道上，路上泥泞、便赤脚提着鞋走，虽是路滑，但我们是愉快的，浪漫的，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痛苦。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为沉痛：蜜月中我俩嬉笑不休，说些傻话，说什么爱情是小偷，偷去了路，偷去了家，现在真的没有路也没有家了，只是孩子又在学话……这最后一句我不知是怎么跳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小诗，就不一一抄录了。总而言之，在那间反省室里，我并没有写出什么反省材料，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使我写下了不少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诗。我并不觉得全是空虚与寂寞，甚至也不全是悲苦。

可是，我仍然好像一下子被人抛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我特别需要见到我的亲人，不管给我定什么罪，我必须会见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我想，就是死囚也是允许直系亲属探监的啊！为什么把我禁闭在这小房子里，就不许我和亲人见面了呢？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就住在桃源师范学校后面——桃源城关镇边街居委会一个叫观音巷的巷子里，相距不过半里之遥，现在却仍像是在千里之外，真的是咫尺天涯了。而且，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归来，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与亲人见面，不许回家，这怎能让人忍受呢？过了些时候，对我的监视似乎放松了些。我便趁机提出回家看母亲。他们同意我回去一趟，但不允许在家过夜。

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元南因受我的牵连，已经从县城调到乡下一所小学去了，并且受着暗中监视：不允许她和我见面，不允许她回城，还要她向学校领导交心，汇报她的思想，要她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否则也要遭到“群众批判”。她于是只有星期六才从乡下回城里来，来了也只能在家枯坐，不敢去看我的。她们的领导有一个最“爱护”她的说法：即他们是把她往革

命的道路上拉，是往左拉；而我却是把她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拉，是往右拉。他们是挽救她；而我却是坑害她。

她因此必须擦亮眼睛，坚定立场，她必须恨我，揭发批判我，而决不能有半点同情，丝毫怜恤。甚至连哭泣，连无声的流泪都是错误的，是软弱的表现，是立场不坚定的证据。还有人对她讲，要想革命，就必须和我彻底决裂！如此类推，所有右派的妻子就只有离婚，否则就是苦海无涯。啊，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我看比右派本人的压力还要大。

顺便提一件事，不仅妻子，就连远在青海的一个表妹，因为谈论到我时表示了一点点同情，后被人揭发，也遭到了批判，罪名就是同情右派表哥，这真叫人不寒而栗！

元南不能见我，但她肯定是想见我的，我于是通过我的母亲和她约会。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元南将随学校上城集体看电影（也许是戏，记不清了）。我于是在那晚也请假去看，我进去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坐处。我发现她也无心看戏，而是不断回头寻找。我和她递了一个眼色之后，就溜了出来，在约定的老地方等她。等了许久她才来。她告诉我，她的坐位两边都坐着监视她的女老师，她是假装上厕所才跑出来的。并且说，现在连回家也不行了。因为她们发现她逃脱监视之后，肯定会派人到她家里去寻找或守候。于是我们便不回家，却到桃源师范后面的田野里去了。

那是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点，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我们还只是互相倾慕，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记得我那时和她约会到这个地点谈话时，我曾有意试探她说：“你愿意去遥远的东北吗？”那时我已从部队转业到旅大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她是知道的。我这样问，自然是转了个弯问她肯不肯随我去远方。她当然也明白，便低下了头，默默不语，却把路旁的一株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下来。看那神态，也是默认了。也许还羞答答地点了点头，记不清了。如果那时我大胆一些，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个深情的吻，她也不会拒绝的。但我也是初恋，从没吻过女孩子，竟傻乎乎地保持着一点距离，没有吻她。但那次约会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所以我把那一片田野当作我们爱情的圣地了。

现在我们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也并非抱头痛哭，而是仍然感到幸福。我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逗留到很晚的时候。夜深了，露水湿了衣裙，湿了她的发辫，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执手相看，似乎也没有恐惧和忧伤。我们仍然充满了幻想，认为我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这也不是为了自欺欺人，却是当时的天真幼稚，现在看来几乎是可笑的愚蠢了。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深夜。深秋的夜是清凉的，我们薄薄的衣衫已经耐不住寒露，渐渐冷起来了。我们是夫妻，却又不能回家，也不能在野外过夜，更不放心让她独自回到她乡下的学校去。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难舍难分，只得大胆决定，偷偷回到我的反省小房里去，把一向关押罪人的小房变成我们幽会的密室。

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

我们不敢开灯，不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

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了。到今年12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

三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渐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痛，再一次滴血呢？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嘴巴。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就是“瘐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

而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

我们是含冤负屈在自己的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予子孙带来灾难，甚至会悲剧本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为死去的“同犯”写的挽诗，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

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长 21 岁。生于 1910 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这样：六月吹南风，风吹荷花边。

荷花老来结莲蓬。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 1962 年 4 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

1961 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肖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两黯然，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棚里，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 1962 年至 1978 年间的诗作。1978 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我和老谭了。

记得 1962 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赠他：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

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

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

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80 个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 80 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

把玩，想来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澧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西装革履洋派头，失足悬崖万事休。

何幸夜来雷阵雨。好随巨浪入清流！

第二首诗写的是杨立中，桃源人。这人小时候与文思是同学，写得一手好字，在改进机械厂也算个书法家，他和文思感情很深。这年十月初五，他知道是文思的生日，只因都在狱中，没有办法祝贺，便拿出半盒卷烟相送，作为寿礼，那时候半盒卷烟也是很珍贵的。所以文思也深为感动。第二年杨立中得了肺病，咳血不止，死在德山狱中。死后也没有亲人来收遗骨，便由几个犯人抬出去，葬在乱葬岗上了。

文思作诗曰：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三首诗是写给一个叫胡天健的桃源人的。这个人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来岁，高高瘦瘦，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且喜音乐，二胡拉得很好。常听他独自演奏《梅花三弄》、《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等名曲，听说他还只结婚半年，就被送到德山来劳动教养。误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把一个年轻姑娘的青春和幸福也毁了。到德山只一年，就因劳累过度，日渐消瘦，终于骨瘦如柴，病死狱中。原先细皮白肉，很英俊的。死后却形容枯槁，真的只剩几根骨头了。他新婚的妻子看到，该如何悲痛啊！文思的挽诗曰：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

撩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四首诗写给一个叫郭述豫的人。这人如何死的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桃源人。

他死之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来德山。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似比别人幸运些。因为在那个年代，惧于政治压力，一般家属是不敢去收尸的。还听人说，这个女人并非他的原配妻子，而是续娶的二房或竟是小老婆。文思称之为“如夫人”。“如夫人”古时通常是指妾的。总之，这个女人竟来收尸，是很感人的，文思为作诗曰：深闺春暖任婆娑，偏趁浊流奈苦何，难得多情后死者，招魂泪洒德山阿！

可见，不论什么年代，人间自有真情在！

那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不能接受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觉得对于党中央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是至诚拥护的，怎么会反对呢？记得当时有一个桃源来的右派，名字叫黄德祚。他就对此一直愤愤不已，不肯从罪。后来派他去理公港运石灰，他在路上猝然得病，不能行动了。当时运石灰都是用的一种独轮手推车，乡民呼为鸡公车。同行的犯人就用车把他送回工棚，他在车上已经昏迷了，略一清醒时还喃喃地说：“我的心里

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

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中了。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阿 Q，文思的挽诗说：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 Q！

还有一个在德山死去的人，是我的同乡，叫杨承宪，常德县人。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应是真心保家卫国的战友。我很奇怪，这样的人也反党吗？怎么也弄到这里改造来了？他到改进机械厂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在开始基建平整地基时，他挑土推车都很卖力，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但是没有好久他就累倒，病得一塌糊涂。却还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时才如何如何艰苦，真是至死不悔，十分叫人悲痛，后来文思有诗记其事云：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这该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了，不知为何竟也入了右派之列？不说后来为我们落实政策时承认都是错划。就在当时，像杨承宪这样的右派，我们也认为他是属于错划的。我们错划受了二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平反改正。他没有受这么长的磨难，却不明不白死去了，改正也没有用了。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尽然，我虽是知识分子，却与资产阶级沾不上边。还有的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我们就戏称他们是‘混进右派队伍里来的’。例如有一个姓龚的桃源人，傻乎乎的，连买卖两个字也分辨不清，说的话也愚蠢可笑。有一次闲谈，他就胡说“我看苏联是个男的”。大家都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天天听到讲什么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众人哄然大笑。

有人说憨厚平庸的人往往有福气，不料他后来竟也死在德山去理公港运石灰的途中，在一个工棚里无声地辞世了。文思为他写诗道：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

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还有一个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和人一谈话就痛哭流涕，说自己罪恶深重，当积极改造。后来在狱中死了，恰好临终摘帽通知书也来了，来了也没有用了。文思写诗云：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

果然急泪能湔恶，恰好属纆获赦书。

这是历史的误会。自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这些人却又后悔不已，认为根本不该读书，不该成为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冠误我”，还不如春种秋收，务农为生的好。我在德山遇到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这么想这么说的。这人名叫李诚斋，长沙人，也是桃源划的右派。我和他接触不多，但一谈就知道他读了不少的书，知识渊博。后来他被派去澧县运石灰，体力不支，死于张公渡口，临终反复拜托同行的“同犯”，如果谁将来能够出狱，一定要转告他的妻子，儿子都要在家种田，不要让他们上学读书了。同伴都为之心酸落泪。文思后来为他写挽诗曰：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我在德山的三年，正是“过苦日子”的困难时期，饥鸿遍野。德山改进机械厂就有一百多人患水肿病，饿死累死的人也不少。可是后来听说，能到德山改造的，可以算是万福，别的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有一批去钱粮湖开垦的人，不少死于血吸虫病和水肿病，说是瘟疫，自然也可以说是瘟疫了。

还有一个叫刘宽的右派，没有到德山来。留在桃源改造，死于狱中，尸首抛在郊外二里岗上，竟被野狗拖去。

他曾是文思的学生，改造时还称文思为老师。文思听到死讯很伤感，为他的惨死也写了一道挽诗：白眼睥睨究可憎，却云傲骨有师承。

哀哉狗腹作棺板，世上竟无瘞旅人。

这诗开头两句大约说刘宽生性傲慢，讲究骨气，是文思影响所致吧！可惜的是人死了，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竟葬身于狗腹了。

自然也有多情的，有个叫万松筠的右派，常德县人，是个历史教员。1960年死在德山，埋在厂外的乱葬岗上。过了三天，他的夫人才得到消息，一身白布孝服奔来，哭倒墓侧。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么深情的妻子，为他戴孝，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为此也写了这样一首诗：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侈谈纸上兵，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涔涔。

最可恶的是犯人打犯人，有些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觉悟高，往往充当打手。管教干部不好动手的，他们就自告奋勇，动手打人。记得还在桃源时，有个叫赵大漠的人，因为饥饿难挨，就到食堂偷吃了一钵稀饭，当即被查出，把他拉到暂作监狱的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竟被一伙犯人一顿棍棒打死。犯人打犯人，打死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文思作诗纪其事曰：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

争料新朝存杖典：大雄殿上肉横飞。

还有一个叫邓华国的犯人，就为了一枝钢笔丢了一条命。他是洗衣组的，在为犯人们洗衣时发现别人衣袋里有一枝钢笔，他便见财起意，据为己有了。后来又害怕，偷偷把钢笔丢入池塘。终于被组里的犯人揭发，便开会斗争他，要他交出钢笔。

他交不出，说丢进池塘里了，便又令他下水到池塘里去捞，这时已是秋凉时节，下水捞钢笔冻得要死，钢笔仍没有捞到，决定第二天继续批斗，他知道这一关难过，便在晚上用一根棕绳吊死在床头上了。这是国庆之次日，只差几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

这事文思没有写诗，我的日记中却记下了。还加了个左右都能用的题目：《死有轻于鸿毛》。

那几年死去的人，能记下姓名和文思写过诗的还很多，不知名姓的就更多，不一一写出了。就这里记下的人和事，如果细写，可以写出一部血泪斑斑令人不忍卒读的小说来！

（选自《饮可诗文选》，海南文艺出版社）

作贼记

刘发清 1958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几经波折，1959年春才到L县报到。L县地处黄土高原，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之一。县城东西长、南北狭，极像一只大火柴盒，面积不过0.5平方公里。四面灰色土垒城墙雉堞全部坍塌，已失去当年巍峨风采。城内居民约四千。有一条十字街。街道两旁房铺古老而低矮，唯一高层建筑乃是新盖的桦木棚板的两层县府大

楼。

当时全国“大跃进”已开始退潮，但在偏僻的L县依然热气腾腾。城内中心鼓楼附近的白色墙壁上，顶头横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字标语。左下方画了一朵雨伞般大的棉花（L县不产棉花）几枝颗粒如桔子般的麦穗和一头比大公牛还壮的肥猪。右下方公布本县各地大放“卫星”光荣榜：××公社×大队小麦亩产8100斤××公社×大队玉米亩产12600斤××公社×大队洋芋亩产100000斤据说最后一条新闻上了省报，不知怎的传到外国，使一些洋专家大吃一惊，自愧弗如。因为据他们计算，十万斤马铃薯的体积堆在一亩地里，即如铺“席梦思”一样，密密层层，足足可铺一尺多厚，创造了了不起的高产奇迹，应当编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手册。因此他们写信到我国有关部门，要求来L县实地参观学习哩！

我最后被分到L县中学。校领导最先分配我下乡找铁矿，后来在校办砖瓦厂学做砖瓦。1960年初春，派我看守校办农场。还特地在路边临时给我盖了一间四堵土墙的低矮小屋。面积不到3平方米，用两根木椽和柳枝搭架，用烂泥巴和着剁成一寸多长的麦秸糊屋顶。没有益瓦。屋内“盘”了一个小土炕。朝南开了一个没有窗根的小窗户。房门朝西，面对农场。地里已点了甜菜籽、萝卜籽，但没有发芽。农场一片荒芜。

这年春天阴冷而漫长。时而寒风呼啸，唱着一支凄厉的歌；时而雨雪霏霏，流着冰冷的泪。我的心好像弥漫天空的云雾阴郁，而沉重。根据规定，我的口粮由每月27斤减到20斤。一天两顿。每顿我领到手巴掌大的一块玉米面“花糕”，或一只小瓷碗般的“黄团长”——黄玉米面做的馍馍；另加一碗被叫作“玻璃汤”的玉米面汤。没有油，没有菜。县城内外没有任何食品出售，路上行人稀少。我有意减少各种活动，尽量避免能量消耗，大部分时间躺在土炕上，不读书、不看报，眼巴巴地盼望开饭时间到来。睡觉也做吃馍馍的美梦，醒来时还咽着口水。学生们同样挨饿。一位语文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一个高中生极其认真地写道：我的最大志愿就是当一名炊事员，因为可以吃饱……我的脚和小腿还是慢慢肿起来了。此时，即发生了一件使我极为痛苦和不安的事：一个暮霭苍茫的黄昏，我怅惘地站在房门口。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纺织娘在草丛中令人心寒地开始悲鸣。突然，路边一个幽灵似的影子向我悄然飘来。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农民，穿着破绽百出的老羊皮统子，拄着一根木棍，满脸污垢，颧骨高耸，左眼闭着，右眼微睁，混浊的眼珠凝视着我，张着嘴，却没声音，抖抖索索地向我伸出一只干瘪的手。

“老乡，”我的嗓音变了样，“我确实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请你原谅。”他木然立着，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我却着急了：“快走吧！天快黑了，不然你就摸不着啦！”过了一会，他喉咙里响起一种奇怪的响声。头微微摇了一下，举起木棍，步履蹒跚地挣扎着往前走，慢慢消失在正在浓重起来的夜色中。我以为，他一定可以走到那不远的村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农民就倒毙在离我住的小屋不到二百米的路上，口中塞了一把生草，手中捏着一把生草……当时当地农村死了不少人。幸亏政府解散了公共食堂，从外地调来了豆渣、番薯干，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我也由于一个永不能忘记的上海同学及时寄来了她节约下来的几十斤粮票，才渡过了难关——水肿病好了。但仍饥肠辘辘，日子难熬，口腹之欲令人难以忍受。我每日都到新绿的田野里寻找苜蓿、苦菜、红背儿等野菜。

然而吃了这些野菜，肚里仿佛被猫爪抓着似的难受。一天，晴空如洗，我走到一大片碧绿的玉米地，蓦地发现密匝匝的玉米苗已经高过了我的头，修长的叶子在灿烂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抹了一层绿油。不少株植顶端散开了淡紫的雄花，土黄色花粉撒落在周围叶片上。有的株植叶隙中间，结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玉米棒子。

棒子尖上抽出一绺紫红色雌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芳香，突然间，像被一股不可拒的魔力所驱使，我不能自禁地走到它们跟前，伸手摸在玉米棒子绿色柔软苞皮上，可以感触到一颗颗玉米籽粒，我环顾四周，阒无一人，便一头钻入玉米丛中。我被包裹在绿色世界里，视线被密密麻麻的“青纱帐”完全挡住。我的心仿佛快要蹦了出来。但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所有玉米地都是有人看守的。我敛息凝神谛听：周围悄无声息，只有阵阵微风吹过时，叶片轻轻摇拂的沙沙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伸手抓住一个玉米棒子。但这个玉米虽然很嫩，却长得既韧又牢。我使了很大劲，也不能把它摘下来。于是我发狠往下一掰，“咔嚓”一声，玉米滚落地上，而响声却把自己吓了一跳。“笨蛋！”我暗暗咒骂自己。我不敢拾玉米，急忙转身四面了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四周寂静如常，听不到任何可疑声音。于是，我放心解开中山服棉上衣。拾起玉米别在腰间皮带上。接着，我掰了第二个。我打算再摘一个就回去。正当我的右手抓住另一个玉米棒尖时，忽然响起霹雷一声：“站住！偷玉米的站住！”这突如其来的吆喝声，仿佛使我遭到致命一击，顿时脑袋嗡地一震，眼前乌黑，几乎晕倒下去。两个神出鬼没般看守玉米的人已威风凛凛站在我面前：一个是四十多岁的胖子，高个儿，大光头，手中提了一根棍棒；另一个矮黑瘦子，三十多岁，手提着红缨枪。

“你是谁？”胖子举起棍棒厉声喝问。

“我……”我胸口像塞满棉花。

“你……是不是学校看农场的老师？”瘦子声音又尖又细。

“……是，”我喉咙哽咽着。

“你即是老师，就不应该……”胖子放下棍子。

“是，是，我知错，我认错……”我惊魂甫定，嗫嚅着说。

瘦子把红缨枪插在地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斜着眼睛问：“听说你是北京派来的大学生，是吗？”“是的，是的，我是去年分到L中学的。但我是……右派。”我觉得问题严重，无可回避。

“哈哈，”胖子忽然爆发了笑声，接着表情严肃地说，“咱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咱只管看守玉米。你……以后可不要再偷了！”“是！是！我是第一次……我保证以后不……”我真诚地忏悔说，从棉衣下掏出两个玉米棒子交还他们。

瘦子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态度温和起来：“看你模样，听你说话口音，你是南方人吧？”“是，我老家在广东。”“哎呀呀！”胖子大嗓门说，“听说广东是个好地方。几千里路远呐！你无亲无故，咋来咱们这穷山沟里活受罪！”“不，不……我要好好改造，”我低下头喃喃说。

“你在那边守菜园，咱们在这边看玉米。相隔不远，咱们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哟！”瘦子对胖子使了一个眼色，“摘几个玉米送给老师吧？老师吃不饱，生活很困难哩。”胖子两只大手一拍：“摘去！摘去！”瘦子动手摘玉米。

“谢谢你们，谢谢……”我眼泪双流，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向他们

深深鞠了一躬。但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好意。

当晚，吹灭了小煤油灯后，我钻进冰冷的被窝里，心里两个声音在争吵：一个怒声斥骂自己堕落，怨恨自己缺乏自制能力，嘲笑从前伪君子式的自命“清高”……另一个却用“三天饿成一个贼娃子”的当地俗语和“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为自己辩解……继而，又回想起令自己最伤心的1957年：假如没有那场运动，假如我不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假如我不上大学或不在那所著名大学上学，假如……也许自己就不会啜饮人生的苦酒。

突然，我又想到：倘若守玉米的人说了出去，可能给我再戴上一顶“坏分子”帽子，加上“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我的脑袋膨胀起来，心里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我无限伤心、悔恨，痛苦地往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

正当我胡思乱想、辗转难熬的时刻，突然，黑夜深处隐隐约约传来脚步声，并且似乎向我小屋方向走来。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有人走到我土屋跟前了。忽然，“扑通！扑通”几响，不知什么东西掉进屋里。俄顷，脚步声重新响起，离开土屋，由近而远，不久就消失在神秘的夜里，一切又归于寂静。

我松了一口气，从枕头边摸到火柴，点燃了小煤油灯，顺着微弱的灯光，啊！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发现炕脚下横竖相错地躺着六个烤过的玉米棒子！

我惊喜交集，拾起还有点温热的玉米，剥开烧焦的苞皮，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有尝过此食物的人，也许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用柴火直接烤熟的新鲜玉米，何等香气诱人、松软爽口，真是鲜、嫩、香、甜、滑俱全。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饱、最美的一顿夜餐。

三十年一晃而逝。不知胖子和瘦子今天是否还健在？倘使他们还活着，我这半生漂泊、命运坎坷现已回到家乡的远方人，衷心遥祝他们健康长寿，生活愉快。他们善良的形象，令我永远难忘，他们那颗淳朴、宽容、厚道、富有同情之心，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田。

1990

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刘发清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

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的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称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渐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以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 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哈哈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静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

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快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 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铤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虽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2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九”，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g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

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 30 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 800 斤、3000 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我对这 30 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 27 可是同年 10 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 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靂，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朦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此世难忘弭难粮，高倩厚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家中眠做骨，惊水长啣怨浦江？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 年 5 月 1 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 4 月 29 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 5 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 1981 年第 3 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和母亲的影响，17 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者，在工作中成绩出色。1954 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 年林

昭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 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同学、友好和亲属在北京举行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作家林斤澜，作家、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80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千秋岂短，浦江尚淌颡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35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 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域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我：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束头发。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一抔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

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钱理群——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帐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

这正是反思的时机。——或许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以后”这样的命题：此刻想做的，正是“庆典以后”的反思。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识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

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这倒也罢了，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注：原文如此）“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

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意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 20 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 1957 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7 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 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同样是集合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旗帜下，对“习以为常”的既定观念、习惯，进行大胆地置疑与挑战；同样是呼唤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个性的解放，呼唤社会的民主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背后的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期待，等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所在，它所提供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范式。而几乎是溢出字面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更使得这些 20 世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革运动的参与者，看起来像是精神兄弟；因此，当年“广场”的勇士们自称为“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这是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夸大的。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按：1957 年 5 月 19 日，北大部分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

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 ”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化（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 ”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也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或许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

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 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与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定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 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 80 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 1957 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 1957 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

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

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的。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美：《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

的“形而上学思维方”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上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

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在对1957年“广场”上的年轻的探索者所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作了以上不免是粗疏的历史叙述以后，我还想关照历史运动的参预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到兴趣的。——我以为缺少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整的。

《言论汇集》中收入了在遭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以后，这些“右派”学生，特别是他们中骨干的反应：他们公开贴出的“反批判”的大字报与私下的相互通信，当时是作为“猖狂反扑”的罪证而留下的，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的逆转对个人心灵的打击，以及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的资料。

种种反应都是因人而异的。前文提到的张景中贴出了宣布“急流勇退”的大字报，他说：“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脏得多。

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一文的作者钱如平（笔名谈论）则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留下了最后的“告别词”是：“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我特别注意的是，最早提出肃反问题与胡风问题的刘奇第，在写了检讨书以后，给谭天荣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在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但他仍然谈到了“一些影响我的情感的事实”：“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

他说，正是这些“外界力量”“影响我正视现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他还对谭天荣的某些“信念”提出质疑：“你说群众同情支持你，现在还不乏其人，这恐怕与事

实不符吧”，在“如今我国的情况”下，“工人农民都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的现行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的小变革？”但谭天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接连写了好几张大字报，一再表明：“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救救心灵》）他说：“（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一切，我绝不强求，对于属于我的一切，我决不放过”（《叫我怎么说好呢？——致 5402186》）。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第三株毒草》），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生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1998

是时候了

沈泽宜张元勋（一）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二）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广场发刊词

佚名伟大的整风运动以其不可估量的壮阔的波澜，激动了全中国全世界，在此就学。

“五·一九”以来已经过了这个伟大运动的第一个浪头：第二个、第三个……难以预计的高潮必然会相继而来！

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

大放大鸣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全面正确的运用、阐明与发挥！

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

一切都进了一步，都重新沐浴，清除掉一切垃圾，栽种下茂密的花木！

一切都只有一个结论：好得很！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

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1957年5月）

第一株毒草

谭天荣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

——赫拉克利特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1895 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详细论证情况请见哲学教研室印“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简直是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批判书。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作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宁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圆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损。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议：（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或者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你凝了一下眸你微微一笑你目瞪口呆你紧锁双眉你咬牙切齿你点一点头。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哪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

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 1957

第二株毒草

谭天荣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一）昨天二位职业的教育家向我们提出官僚主义的定义问题（关系斯大林），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实在是再也没有比提这样的问题更无聊了。只有绝对地禁止自由思维的人，才会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现在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过去几天，我到天津去了一趟，一方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游泳在友好、信任和关怀的海洋里；另一方面，有几件小事现在还像蝎子一样地刺着我的心灵：去天津的列车上我看到乘务员们不断地忙着，收拾着每一片碎纸和果皮之类的东西。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难道列车上真需要很多人这样地工作吗？难道乘客自己不会把碎纸

果皮丢在垃圾箱里吗？难道这些青年的生活不需要更充实一些吗？要知道这些无谓的琐事在消耗着人们的青春呵！

南开大学的一张标题“巨大的悲剧”的大字报告告诉我这样一件事：程京教授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过学，在英国得到二种博士学位，是一位对相对论有过贡献的物理学家。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参加建设。50年遇到思想改造运动，但在南大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改造呢？他遭受了各种人身攻击，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街。这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的心灵受到了残酷的伤害，现在在南大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人：像“夜半歌声”中的宋旦萍，每天拖着患关节炎的双腿，从事各种琐事，他自己洗衣服连肥皂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哲学博士，这就是当年的物理学教授——程京。

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作讨论，或者叫作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

很多同学写信给我，其中有封信这样写道：你是青年团员，按情按理你今天谈的问题似乎是感觉不到的你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爬得很高，走得很远，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到各种歧视，打击和侮辱，因此，你的行为便格外可爱。

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们就说他们是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

很多同学一在班上担任某种职位，或者有所成就，青年团干部就忙乱起来，把所有“好”的和“正确”的辞句加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形下有多少同学以职位和成绩为资本入党入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领导人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上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你来告诉我吗？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什么？请别人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我不愿意别人提到我。

亲爱的教育家，这就是官僚主义，懂吗？别在那白日见鬼吧！把八大文件说成八个大文件，不管叫什么主义吧，这位大首长毕竟是太不中用了，

而却说这不符合你们关于官僚主义定义。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把先烈们的鲜血和枯骨，把党中央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把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把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当作自己的家私。你是不是为这些而为他难为情？什么时候人们才学会害羞呢？去他妈的吧，甘心做偏见的奴隶的人，要他们接近真理，原来不比要蛤蟆飞上天更容易。然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不能要求一些别的什么，让生活本身来教调他们吧！可是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回答，这一切与斯大林错误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与南斯拉夫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他们永远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

我们要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要老老实实的学习，我们要向一切人学习，学习人类美好的一切，我们要学习辩证法，坚决反对给逻辑施加暴力，我们欢迎实事求是的反对意见，用开斗争会时用的那种独裁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一窍不通，实在太乏味了。学习具体分析和抽象思维吧，你们中也有真正的人。

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

有一个聪明的人这样说过“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弱的现实——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暴力的代替”。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组成的百万大军：（1）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

（3）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

现在要分清楚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们自会分道扬镳。过早的作各种猜测怀疑是最坏事不过的。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各有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

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他早晚会实现的。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生活也会老实不客气的把我们留在后面自己前进，在这里是没有交情可讲的。

善良的人们过来吧！近五万的共青团员过来吧！真正的共产党员们过

来吧！我们需要个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让那些折衷主义者去指手划脚吧！

让那些空谈家和胆小鬼临阵脱逃吧！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我们没有权利为一些琐事作无谓的争吵，我们没有权利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为了那些被歪曲的灵魂，为了那些被残害的心灵，为了那些像树叶一样被践踏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让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让我们携手前进吧！

第三株毒草

谭天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这几天一些无谓的琐事，转移了反对三害、争取民主的严肃斗争，事情既是这样了，我也表示一下我的看法。

一、关于我和小陈的纠纷，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调查的，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五个人，陈玉良，刘奇弟，陈奉孝，程刚和我，五个人都表示了的态度。还调查什么呢？学生会责难我不参加他们的秘密会议。这也不能说是我不好，当天我们借广播器受到各种阻拦，我们知道我们的活动不合学校当局的口味，任何放肆和任性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因此一直小心谨慎，哪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呢？小陈在电话中答应让我们上广播室找他，我们到广播室时，他却锁着门放音乐，我们怎样敲门他也不理，眼看开会时间就要到了，这才爬窗户进去，当时小陈大声呼唤，说我是反革命，是强盗是破坏分子，说我们要抢电台。我对他说，先别说这个吧！我们想借一个扩音器，他说不借，你谭天荣是反革命，别人可以借偏不借给你，别人怕你，我不怕，我不和你讲马列主义，我说如果和我过不去，你也不要让同学们开不成会啊：还是先把扩音器借给我吧！他可不依，一直吵吵嚷嚷还打电话给校卫队，要求立刻派人来抓我们抢电台的强盗，来抓反革命，校卫队来了之后，他立刻提到爬窗户的事情，并且力图证明第一个爬窗户是我而不是刘奇弟，至于借扩音器的事他还是坚持，我爱借就借，不借就不借，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过他，这时我们才不能不去找江校长，至于打人的事，我只有在听了小陈控诉之后才知道，因此我丝毫也不能帮助学生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至于我们当天对学生会，团委会，党委会和江校长的粗暴态度，好不好请你们自己来叙述一下。顺便提一句，我的记忆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它对我永远像猎狗对猎人一样忠实。对于各种抗议，警告和人身攻击，我都沉默地忍受，我有自知之明，根据不成文的规定，既然已经宣布我是“右派分子”那么我就该受到各种凌辱（或者叫做严厉的批评）这是我的本份，我只希望不要再为这件事情麻烦我。对于程刚，我既不责难，也不要求，我只是建议你：在任何场合下都要爱惜自己的心灵。到现在为止我对于“忠于职务”的小陈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我有理由怀疑，小陈不借扩音器给我们，仅仅是由于任性，可以不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呢？偏偏是我们借扩音器的时候，是谁给小陈以掌握

扩音器的全权。

对前天物四（原第六班）的一些同学对证刘奇弟事件真相的大会，我有一点意见，现在是一场严肃的整风——民主运动，由于习惯的力量在阶级敌人被基本消灭以后，我们就把阶级仇恨转加在“落后分子”身上，用对敌斗争方式，伤害了很多自己人，似乎过去喜欢思考的人大都成了落后分子，其中很多就被斗争过，其理由常常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很多同学养成了不思考的习惯，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和自己，而那些受委屈的同学却容易把所有这些同学都当作有意伤害自己的坏人，这样就激起了偏激的对抗情绪，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使我们放过了真正之三害分子。不要忘记，正是他们在我们中间散布着仇恨和猜疑，正是他们在制造着愤怒和绝望，正是他们在破坏我们团结和友谊。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更多地谅解和信任吧。

过去我们有过误解，有过一切非同志的态度，有过互相残害，这是生活本身的悲剧，谁也隐没不了，我们主张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重新探讨一下过去的成绩和缺点，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这需要大家努力，按情理说过去的积极分子应该做更多的努力。你们过去太自信了，你们的优越感是隔离落后分子的长城，现在该改变一下这种作风，要不，生活也许会向你们索取更高的代价，那时谁也帮助不了你们。

前天的对证会实在太无聊了，刘奇弟的问题，他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是不是应该坐牢，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是不是有过违反法制的行为，可是主持会议的人却仅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黄正中作了两个小时的报告详细地叙述了你们如何照顾刘奇弟，而刘奇弟又如何的胡闹，想想吧！正当刘奇弟讲出一些社会问题时，你们却从生活小节方面攻击他，这是多么别致的照顾啊！他被看管在二十四斋时，一个青年团员曾经是他的监视人，我知道这种照顾有多么的虚伪有多么冷酷，有多么残忍，你们说他被捆过三次，这是算什么意思呢？在二十四斋一天就要捆好几次，难道人们可以说话吗？也许一切都很正常，只不过我不懂而已，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吧！真的你们也太高贵了，刘奇弟爱好音乐，他作曲他指挥合唱队，这也是你们的照顾，照这么说他活着也是你们的恩赐了，为了什么对人这样不平等呢？其实没有你们我们会玩得更好，也许让我们试试吧！只要人们不过分阻拦我们就能立刻证明我们这些落后分子同样懂得生活，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不仅会战斗而且会娱乐。

刘奇弟小时因为不懂事，一时疏忽使他敬爱的先生被捕了。后来他知道这位先生是个地下的共产党而且被枪杀了，他的心里很难过，希望告诉一个他所信任的人，当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一个他能信任的人，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一个女同学。希望她交待时她却不仅拒绝交待，而且把刘奇弟信任她才告诉她的材料向全班公开，还有比这更难过的事吗？他期待最低限度的信任，期待哪怕一分钟的温存，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友情，可是周围同学都“十分恐惧”，人们到了这个时候神经十分紧张，力图摆脱当时的处境，既然从好的方面摆脱是完全无望的，那么他不得不做一些坏事情来刺激自己就不难理解。所以按理说他反常的言行用不着医生来判断，当然我也不要求你们理解我只想建议你们平易近人一些不要过分盛气凌人，如果你们友好地对待我们，我们将还以十倍的友情。

二、关于我们去天津的事情我很满意，交了不少朋友，也结了不少冤

家，不管人们怎样削弱我们的影响，我们还是到那里都掀起了新的大字报高潮，支持我们的信件至今还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们是应各校学生会邀请发表演说的，说的都是一些政治见解和学术问题，说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未免没事找事，江校长说什么国有国法，校有校规之类的话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我们没有犯法犯规，在这里我用共青团员的话告诉你不用转弯抹角，采取实际措施吧；对于我威胁是绝对不中用的，就像对于现代物理学我们可怜的哲学家们显得绝对不中用一样。

我今年才 22 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 22 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 22 岁还不曾有疲劳。

四、最后该允许我对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说几句话。为了满足校内校外部分同学的要求，我们现在想出一些油印小册子。问题在于现在极端缺乏经费和人手，过去印出的那些是我们献出我们可能献出的一切，坦白地说是经过不顾死活的努力才印出的，现在得重新组织力量了，我们用预定的方式来收集经费，我们欢迎捐款和义务劳动。现在暂时由我来负责。愿意预定捐款或参加工作的同学可以在每天上午 10~11 点，晚上 9~10 点来二十五斋 342 号来找我，这是我们大家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在困难的日子里帮助过我们“患难之交恩情长”。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乞求帮助，“生要站着才生”“死要站着才死”让那些嘲笑者见鬼去吧！

我们都要走自己的路！

第四株毒草

谭天荣“五·一九”运动结束了。

从北大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那一天（江隆基语）开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结束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将又是欺凌与忍耐压服与屈从叫嚷与沉默的相互渗透。总之，仿佛同“五·一九”以前的阶段的复杂。为此，“胜利者”江隆基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得到了不少的掌声。与此相应，另外还有些人不同意，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次运动作一些片断的判决。

（一）“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看来是那么强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面前表现了多么可怕的贫乏与卑劣呵——习惯势力的代表们在他们真理与正义的呼声面前，难道比老鼠在猫前更勇敢吗？他们在理性与法制的呼声中，难道比鱼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吗？他们在民主与自由呼声之下，难道比冰雪在太阳照耀之下更坚强吗？可是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

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

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

在他们面前既不是喷射死亡的机枪，也不是各式各样的法官，这是一种别有风趣的考验，他们面临着的是对逻辑施以暴力的批判，拙劣的捏造下流的人身攻击，还有那些正直的轻信者的反对和来自外面的敌人别有用心心的捧场。

对于这些面临决战的战士，这是一次必经的考验，生活就是这样地挑选着它所需要的人。

有些人在这运动中受尽了迫害，可是却为自己赢得了平静与骄傲，却避免了损失。

有些人饱尝虚荣心被蹂躏的痛楚，孤独的折磨，为自己的名声和出路而坐立不安，可以留下的，只是被生活遗弃后，那特殊的作用。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四）如果承认“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那么，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就不得不承担，负起对这“五·一九”运动的起因作历史分析的责任了，他们可以一般地分析，近年来人们大脑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特殊地研究某个右派分子神经系统的奇异特征，在他们得出结论以前，我想从一个相反的立场出发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五·一九”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教条主义是列宁逝世以后，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苏联整个民族的特征，它贯穿于各个阶段，渗透入一切领域，教条主义产生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相对闭塞的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局面（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文化革命、卫国战争）而不是全面资本运动、工人运动的全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世界性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如列宁所研究的问题的对象，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一否定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的转化，修正主义是教条主义自身的树立物，它们寓于同一对象，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过比斯大林更多的“修正”。

教条主义的一般表现可以用哥穆尔卡同志的话来阐明。

“执行六年计划的实践是在某些挑选出来的部门，集中了最高限度的投资，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能牺牲某些部门，而对另外一些部门过分偏爱，因为失去正确的比例，会使整个经济受到损害……“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信任他们掌握管理国家的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尽了义务之后，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的信任，意味着失去权利的道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却去失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一种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

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在波兰，也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只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常常被监禁许多年，虽然是无辜的，许多人遭受残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在个人崇拜的土壤上，产生了违反甚至取消人民政权的最深刻意义的现象……“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是和它的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监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这就是我们要反对的。

当社会主义突破一国范围进入世界体系时，需要重新全面地分析问题，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就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按照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惯例，这种历史转变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和波匈事件，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表现得特别温和，因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要求共产党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辩证法，克服教条主义。

（三）一切过程都有两重性，货币之转化为资本其反面表现就是劳动力之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其反面的表现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在物体的相互作用中主动的作功永远伴随着被动的受反冲，物质的渗透永远伴随着运动的渗透。

整风——民主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反面表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整个过程贯穿着两种力量，保守与革命的相互斗争。

自然界到处都是互相对立的两极，它们处于统一体中，其相互作用以及到达极端时相互转化决定着自然界的生命，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从产生到消灭无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可以消除“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觉。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是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还是苏联共产党。1948年以前建设社会主义波兰的是“统一工人党”，把哥穆尔卡同志下监狱的也是统一工人党，用秘密投票一致通过哥穆尔卡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还是统一工人党。

我们热爱的党是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党，而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政党根据自身的要求发展的，这种革新和变化就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相互转化，而这两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们反对这种倾向：领导者把工作中的一切差错和弊病，加以各种粉饰和弥补，完了就归之于党和制度，说这是党的意志，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如是对任何一种现象提出与某个领导者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我按照我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工作和战斗，我的一切行动自己负责，我不会受任何人利用，至于和我执有同样观点的人或有相似意见的人，无论是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关系，我都没有兴致去研究，如果台湾和美国兴高采烈，那是他们的事，他们从来就是这样愚蠢的。

（五）冬天如果来到，春天还会远吗？

再谈人性与阶级性

谭天荣常常涉及学术问题时，我的论敌就用文雅的谩骂，来炫耀他们的一窍不通。这些可怜的卫道者，说了半天，简直什么也没有说，你这篇文章倒有点意思。这么说，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你似乎认为我否认人的阶级性，这是一种误解，你看过我写给 5302041 同学的公开信没有，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你呀！应该再虚心一点，学术讨论可不比开斗争会。

好吧，言归正传，恩格斯说：“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通的命题，他说善与恶的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可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这种善与恶的相互作用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善与恶的对立存在于阶级关系中。这不正是毛主席说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吗？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新生的、上升的、日益壮大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刚好相反，是腐朽的、下降、日益没落的力量。这样，无产阶级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而其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才是客观真理。这完全是可以论证的，而忠诚于革命伟大的实践家并且略识辩证法的刘少奇同志在这问题上恰犯了错误，他认为“善”与“恶”没有客观标准，“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这显然是相对主义的胡说八道。

现在，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反殖民主义和反教条主义两种运动实际上是支配着一切。善与恶的对立也体现在这两种运动中，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周大觉关于领导者阶级正在形成的论点，是可以考虑的，他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

(1) 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 对生产关系来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3) 劳动组织处于支配地位，它是控制的人最积极手段。(4) 领导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用不着害怕异己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宗教呵，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禁止别人说话，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领导者阶级的问题，我想引哥穆尔卡的几段话，也许对澄清问题的实质有所帮助。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们信任他们的掌握管理国家和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们尽了义务的条件下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立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基础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崇拜都包括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虽然个人崇拜制度是在苏联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把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弊病的罪咎都归在苏联共产党或苏联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和它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牢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在波兰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些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术语完全或者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领导者的“行话”。如果按照这些术语的本来含义去理解，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

好吧！理论就谈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个问题，你说我看不懂荀子，我并不否认，我的古文学得很差，我只是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应该叫做十诬蔑书或者叫做十歪曲书）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懂了一点，我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精通辩证法，正像郭沫若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一样，将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至于“聊斋”我也有些地方不懂，不过也很欣赏，比方说有这么一段话：“视之美，近之，微笑，招招手，不来，亦不去。”这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中国式的简洁和美丽的句子把我引向了一个神秘的精神领域，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它。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谭天荣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黑格尔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歌德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恩格斯我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致好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出发，我们的具体分析基本上也是正确，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在这里，我想提出我的意见。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回答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难道这算是什么回答吗？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判断仅仅提出而没有解决问题，仅

仅描写了而没有说明现象，我们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彻底一点想一想，就会伸出无穷无尽的谬误，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正如商品价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明一样，也正如匈牙利事件不能用匈牙利的国内政治生活来说明一样，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只能从决定着人们意识中两种世界观——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我的初步结论是这样的。

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运动与工人运动向理论界提出问题时，需要了解全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进行透视，因为要求全面分析也就要求人们掌握全面分析问题的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而这种思想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科学，需要人们去寻找去发现，当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已经为唯物辩证法的发现，准备了条件，完成这一切任务的是马克思，之所以由马克思来发现，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那么德国工人狄慈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伟大人物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历代集辩证法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恩格斯只能有一个，百代而一怪，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去分别发动工人运动时，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只见个别的树木，不见整个森林”因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了优势，因此产生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考茨基就成了不可救药的牺牲者，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好，“考茨基反对他人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说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斗的工具，所以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采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正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士兵，像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一样，但是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本身的第一次否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修正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时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并开始夺取政权时，又一次向理论提出了新问题，要求再一次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重新配备阶级力量。总之，要求重新全面的分析问题。这就是说，要求人们重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谁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呢，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是俄国人，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是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为俄国当好孕妊的革命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斯大林语），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辩证法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战胜了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懂，这就是说，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批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几乎包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命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

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形也是没有的（甚至在恩格斯早期作品“自然辩证法”中一切概念判断都已经被新的自然科学发现所证实，更不用说反杜林论，一切关于恩格斯提出的原理已经过时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这可以用列宁不得不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人们的才干是取决于社会的要求的。

到了我们的时代，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在列宁同志“未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已经开始和第二国际时的和平环境相反，这时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斯大林是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然，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有超人的才干，这种性格，对于“认识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和对于相应的时间，是正当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加里宁比斯大林在理论水平上要高出百倍，但是他也没有——因为不可能而没有——改变斯大林的路线，所以在我看来，把错误归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

当社会主义超过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一个世界体系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恩格斯曾说，无论在某个多么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的程度要看研究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如何的合用甚至必要，可是迟早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思维方法，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这就是匈牙利的悲剧，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在这里产生多少误会啊，我说我们应该更少地责难苏联，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分析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生活是残忍无情的，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无限美好的，让我们来重新建立美好的新生活吧。

救救心灵

谭天荣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最近加于我的一切，我都不想置辩，因为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按照规律来发展，为了人们的心灵，我写这张大字报，这是合理的。由于各样的原因，有人把我的动机往最坏处想，这也是合理的，一切都会改变。明天，人们将以信任代替猜疑，以友情代替仇恨，以平等代替欺凌，以真诚代替欺骗，这还是合理的。

自从恩格斯教给我这种指导思想后，我就永远战胜了意气、消沉，我微笑地工作，我微笑地战斗，必要时我会含着微笑倒下去。在我还有权利写大字报时，为了人们的心灵，我愿意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观点：一、关于青年工作：首先让我们回忆回忆往事吧，解放前，我们唱，山那边好地方，解放

后，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时我们的心里感到解放快乐，自从开始经济建设以后，青年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活动的内容渐渐落后于生活的需要，强迫命令多于说服教育，行政措施多于青年活动。许多干部僵化了，脑袋对付不了复杂的生活现实，就采取禁止一切思维活动的措施，除了扣帽子以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本领了，现在立场这一术语已经成为理穷词尽，用来搪塞的万能方笈，所谓“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等都成了人们不去分析他们不懂得的新鲜事物却又为说明他们而胡乱搬用的空洞词句。于是有多少不能说明的现在，便有多少种不同的主义，而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一切运动，一切破坏和创造，一切新生和毁灭都被仅仅翻译成含义模糊的各种术语了。这样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痛苦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最可怕的偏见是，许多人以为听到了一句不习惯的话就发一顿神经病就算是站稳了立场，以为只认为谁出身于不光彩的阶级就永远是落后分子或反动分子才是阶级分析，其实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一点常识就不会这样想了。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够掌握无产阶级千百万人的心灵，是因为马克思凭借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便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向共产主义，而且主要的，是他唯一依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的领会以往科学上所贡献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来审查过，任何事物也没有忽略过去；凡人类思想所树立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并且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检验过，于是就作出了那些为资产阶级狭隘性限制或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可见无产阶级立场不能是自封的，要真正能站稳立场，必须懂得一点道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全面利益和长远利益。我还是坚持没有确定的性格，没有对生活现实前后一致的见解，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所谓“站稳立场”不过是一句赤裸裸的废话。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没有辩证思维的能力，没有无私纯洁的心灵，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自欺欺人。谁是真正的战士、谁是可怜的应声虫、谁是无耻的叛徒，让生活本身来裁判吧，我无条件地相信，中国青年——是那样的人，在前方他们是黄继光，那样勇敢，在后方，他们像刘胡兰那样的勤劳。现在在整风——民主运动中虽然他们是空手赤拳在搏斗，他们也绝对不会害怕，因为他们有一颗钢铁的心。

二、关于几个理论问题，我说过我拥护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什么的，我只是在随便聊天时提出过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从来没有说过要反对。有人对我说的一切都要探讨十分反感，可是正是这些人，在马列主义基础第一次课堂讨论时颇有体会的发言，马克思主义不怕反驳。比较一下他们的言行，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现在很多历史分析，在我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些外行，关于再论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我在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中已经批判过。三害分子对这篇文章像生了病的耗子一样害怕，事实上，现在的历史科学贫乏到惊人的程度，人们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搪塞一切历史问题。就说匈牙利事件

吧，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是帝国主义进攻呢？还是党犯错误是事件的主要原因，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争议是毫无意义的，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党的错误，在任何国度，任何场合，任何事件都是理由，正因如此，这些因素（字迹不清）在任何国度，任何场合，任何事件都不成其为理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为什么偏偏在匈牙利，偏偏在 1956 年发生了流血事件呢，我们并没有从这种争论中增加一丝一毫的知识，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这种争议没有揭示出矛盾的特殊性。想想看，如果你进城去了一次，有人为了是到城里去有条公路，还是公路上有汽车来往是你进城的主要原因争论不休，你会怎么想呢？要知道这种争议之所以乏味，正是因为无论是公路还是汽车的存在，都没有把你进城这件事的“矛盾的特殊性”揭示出来。

我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稳定的，缓慢的，而不是切切实实的过渡”，我说过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是敬爱的，但是他对辩证法最多也不过是个半通，我说过康生、邓小平报告中充满了保守的自满的情绪，我说过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乱与空虚，我说过党中央在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现得过分愚蠢，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水平的确不高，除了进行理论分析以外，谁又能用别的方法来说服我，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这是我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历史上有过恩格斯，曾经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依萨可夫斯基的诗句可以表现我对恩格斯的感情，“任凭我陷进了泥沼，任凭我冻僵在冰上，只要你吩咐我一声，任何的艰险我便又能经过”，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自从我在书中认识了恩格斯，我便永远地战胜了意气消沉，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便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

三、关于我的所谓“反社会主义言论”我曾写过各种稿件给各式各样的报刊和名人，大都石沉大海，当我请教名教授们时，他们的态度大都是“我不知道你写些什么，因此，我不想看你的，又因为我不想看你的，所以也就不知道你写些什么，由此可见，你的确是毫无意义的，完全错误和荒谬绝伦的。”这使我很苦恼，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把我的智慧献给处在困难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给全面危机中的科学界，献给多灾多难的人类，献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沉默，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我有意说了很多偏激的话，关于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地和石幼珊交代过，现在有些人都用这些来非难我，而且还按照他们的意志作了不少的修正，经过巧妙的摘引、安插和修饰，经过更巧妙的说明和引伸，似乎对我说过话都特别感兴趣。更有趣的是，我过去那样信任过的人，今天却在断章取意揭露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一直以为石幼珊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说谎狂。真的，为了帮助同学们和我划清界限，为什么不公开我写的亲笔信呢？如果和我过不去，蛮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对付我。来吧，我欢迎那些玩艺，污蔑凌辱，禁闭，捆打和谋害，这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觉得要（疑为“不要”——抄者）欺骗同学们，为了我们轻信，生活给了我们无情的嘲弄。

呵！善良的轻信者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前天的批判会，我觉得十分乏味，我再一次告诉这些人，对于我，这种批判方式是绝对不中用的，或者进行真正的辩论，或者在肉体上把我毁灭，别的方式是没有的，懂吗？你们满可以不用开斗争会时特有的方式来表现你

们的一窍不通，蛮可以不必借反对右派分子的手法来炫耀自己的绝对无知，也蛮可以用不着在强词夺理中显露自己无限愚蠢，还是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吧，还是学学卡尔文吧，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生活会证明，我们的事业是谁也绞杀不了的，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一定胜利，整风民主运动一定成功，“五·一九”和“五四”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未来的年轻人。为了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恐惧，自己人的反对，比面对枪杀要叫人难过，我也能沉默地忍受。

四、关于我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因为看到一些不愉快的现象，我曾想退学，离开北大，但自从“五·一九”以来，我深深地爱上了北大。现在，北大的一切都在向我招手，都在对我微笑，树叶展开眉眼，窗口凝着眸子，大路在×着我，友好地向我问好，清晨出门，每一块石头对我说“早安”，今天你将怎样开始战斗呢？晚上 25 斋的门神招呼我“晚上好，今天你工作得不够好，去你的吧，明天再来”，在小山上的草坪里，在未名湖边，一切都多么好啊，可是我更爱的是活动着的人流亲切的交谈和沉默的支持，我爱北大，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志，在这里，我读过恩格斯的著作，在这里我学会了生活。

我多么想留在北大啊！作一个学生还是职员作一个教师还是工友，这对我完全是无关重要的，重要是我要在这里战斗。

亲爱的朋友们，我拥抱你们每一个，不怀疑毛主席也永远支持我们，不怀疑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三害分子，不要怀疑马克思主义，她会从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清洗掉教条主义，不要怀疑整风——民主运动，因为一切过程都按否定之否定来发展，“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青年学生，自己能铺铁轨，自己能驾驶机车，难道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吗？一切都很好，完全不用害怕。

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真正的共青团员们！善良的同学们！请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无礼，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我不想向你们解释什么，你们的心是中国式的，用你们的心来理解我吧！

“卫道者”们我一步也不责难你们，我只是建议：在受到考验的时候，要爱惜自己的心灵，良心的责难是过分残忍的折磨，救救心灵吧！不要在那冒充北大同学的信上签名，因为那是最无耻的谎言。遇到了新鲜的东西，仅仅嗅一嗅是不够的，还要深思熟虑，无论如何，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脑子比鼻子更实用，思考吧！我未来的朋友。

三害分子们：知道了你们遇到的是什么对手吗？重新支配一下力量吧！疯狂地挣扎吧！让我们慢慢地教训你们。

一个“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

1956

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

谭天荣你的回信给我带来了淡淡的怅惘。自从“五·一九”运动以来，这是第二次可有趣的“生活之插曲”。在你的回信里，对于我们这些毫无悔

改之意的少数“顽固右派分子”表示了极端的轻蔑，在现在这样做是容易的，可是你愿意再进一步想一想吗？过去我们写大字报、开辩论会、印小册子还到过天津演说，那时我们可说是一帆风顺，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受到一些人身侮辱，特务跟踪，开斗争会还有那别有风趣的孤立，现实的皆是合理的，这些原来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清这一切。

有谁愿意为我们的人想一想吗？我们不是厌世者，相反的，一般地说，我们是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有人生乐趣的人，我们不是玩世者，相反的，对一切我们都严肃地加以探讨，曾经痛苦地思考过为了在生命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为了选择终生的道路，还有一点，人们似乎忘了我们也是自尊自重的青年，血气方刚，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把我们抓去质问任何问题，可以用任何骂人的词句用在我们的任何一个人身上。能够设想忍受这一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吗？自然有人会问：我们，为了什么？前些日子，朱彬在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他们为了什么？”说我们是为了恢复解放前的剥削生活，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拙劣地为我们编造了一套历史，比方说我应该在解放前入团，并且不早不晚，应该在入团那一年学会赌博，还有出身小地主什么的，我没有兴趣去驳斥这些古怪的历史的捏造者，这多么乏味，真的，解放前的生活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至少是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

有人说我们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是夸大狂，是野心家，难道这些说法能安慰你那社会主义的良心吗？如果否认我们有表现自己的欲望，这是没有分寸的，我们是够狂妄的，可是能够设想光是这一点支配着我们吗？仅仅由自尊心作为生活动力的人即使能够在顺利的条件下工作得十分出色，也不会经得起像我们这样的考验的（总算是一种考验吧），在我们人当中，有些罗曼罗兰式的个人主义者，也有高尔基式的集体主义者（仅仅是比方，我们不想和这些人比较），而小市民式的个人主义是我们极端蔑视的，高尔基曾说：“如果一个小市民牙痛而他又没有勇气来拔掉这颗牙时，整个宇宙对于他就是一座监狱。”想想吧！我们要是个人主义是小市民的话，那么，什么是我们要争取的个人呢？团籍吗？学籍吗？我们只会失去而不会得到，名声、威信、权势、金钱、地位吗？这一切都见鬼去吧，如果一个人不想自欺欺人，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些与我们是不相干的，没有一个势力眼光的小家伙会用我们这种方式往上爬，至少，这是不着边际的冒险行为，至于说到“野心家”这个术语用在我们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是不近情理的，关于这一点，我想你也不会不知道，我不想多说，我还没忘记，在我前面站着的是什么样的对。

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对也好，不对也好，我们的要求主要是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为了我们向往的人类社会，只有朝这个方面考虑才可以找到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对于那只想随便找一个理由来骗一骗自己的人，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那是他们的事，去他们的吧！在这里，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我想还是谈一谈大家所熟悉的问题吧。前些日子“中国青年”讨论“徐进问题”。

人们说徐进的思想斗争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那种“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一著名理论指导下，创造性的应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明，无异于用商品的效能来说明它的价值。用人的生理结构来说明他

的品质，或者，再通俗一点，用物体本身的物理属性（例如硬度、色彩等）来说明它会从高处往下掉一样。这种思想方法，我无条件的仇恨。正是这种思想方法，使人们对于民生各式各样思想的生活环境不理睬，而对由这种环境下养成的不合人们口味的思想，却施于暴力，似乎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有人对于在艰苦岗位工作的人们，提出无穷无尽不合人情的要求，而对某些旧人员却无穷无尽的让步。有人在批评有缺点的好同志时，像猛虎一样勇敢，而遇到了真正的坏人坏事却像生了病的耗子一样害怕。有人对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而对比方说：农业化高潮前低级干部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却大谈而特谈。似乎他们比那些农村干部一定会高明似的，最令人难过的事，谁如果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谁就会受到各式各样廉价的谴责。

在《学习》杂志上也讨论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公路勘测人员说：“要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以，可是说到已经结合起来，我思想搞不通。

我们成天开天辟地，把公路引向荒无人迹的地方。当人们坐着汽车旅行时，我们却走向他方了。当然这种工作是本份的，可是我们的待遇比谁都差，有钱买不到东西，我们的年龄一年一年的增长，可是婚姻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诸如此类，不能不认为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可是那些坐办公室，游公园的大首长、大学者们，大概要喝了过多的烧酒，于是写了文章证明：这算是什么呢，不会是你个人主义作祟吧了，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思想：“我们——大首长们、大学者们应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你们——天生的贱种，应该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你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就结合了。”这样人们不愿意真正地暴露思想，反正没有人和他说真心话。于是社会上盛行着一种虚假、伪善与欺骗的作风，这种风尚，这种传说，这种习惯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是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要是我们也相信“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主义的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命题，那么我们一天也活不了。上面那些思想方法我是切齿痛恨的，可是难道我们可以痛恨那些为这种思想方法掌握的群众吗？你记得吗？在天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基本群众，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基础。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仅仅是因为缺乏思考的习惯，全部问题就在于让他们思想活跃起来，不要过多地责难他们，与此相应我非常不同意你对天津师院数四同学关于他们学生会不民主的演说。在我看来，这正是使我们脱离基本群众的作法。还有我为了我们在师院时那种高高在上被人们视如贵宾的处境十分忧虑，我们当时过分自负了。这种错误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惩罚，你记得那天下午的场面吗？那是我们活该。我记起了肖洛霍夫笔下的达维多夫，他对鞭打他的群众说：“一切都为了你们，你们却这样打我”。但他也知道那是拉古尔洛夫的不好，难道我们可以设想他对群众进行报复吗？他是这样说的：“有人想要我求饶，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布尔什维克屈服。我不会报复你们的，布尔什维克不会这样对待自己人。但是要使你们觉悟”。这就是我所向往的英雄，为什么当时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痛恨“卫道者”们呢？这就是原因。

我们反对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种习惯的机械势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困难；这也是我们的光荣。

再举一个例子吧！我想引一段咱们都熟悉的一段话：“每天我在墙上划

一横，每五天就凑成一个‘正’字。每天我都盼望出狱，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过铁窗可以看见白云在飞，我真难说出那时候的心情，那时的滋味，我只是忧郁地望着那一小片蓝天和飞翔着的白云，我想起了‘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决定自杀，决定深夜撕下被单上吊。后来我想到一个姓聂的朋友，我就改变了主张，他是个老干部、共产党员、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过，后来调到江南分局任南桥派出所长。我和他接触了几年，知道他是一个热情公正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干部以审查他的名义，在1954年把他关在狱里，他不服气，整天吵着要自由。这批家伙就给他戴上了镣铐，他受了刺激以后，精神错乱，终于上吊自杀。等到发觉后被送到医院里，几个局长、副局长吓得轮流到医院里去探望，还告知医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钱都可以。结果人还是死了，这批人就在党内下一个含糊的通报，说他畏罪自杀，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顺便为我们的朋友控诉，要求重新审查案子，追究责任）我之不再自杀就是这个原因。

否则，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名义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不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虽被这批家伙玷污了，终有一天，会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名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这批家伙们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但终有一天要受到正义的裁判。就是这样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着那狱卒的吃喝，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你能不为这样的申诉感动吗？难道无产阶级的立场排斥正义和真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吗？（这是那些理穷词尽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歪曲和污辱）这些就是我们要反对的现象。

咱们在一起谈过了多少知心话，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党的错误我们感到痛心；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

现在我们是在困难中，受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反对。但是为了摧毁那种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威信，为了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为了曾昭伦、钱伟长的自尊心，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理性和人权，我们愿意殊死地搏斗。江隆基这家伙试图用什么“岗位”之类的废话来吓我们，老实告诉他，就是付出生命，我们也是愉快的，我不会忘记保尔的话，为了爱人活着这是卑鄙，为了家庭活着这是自私，而为了个人这简直是无耻，我们可不是那种人。

至于你对我的某些无理，现在我不再计较了，我对你的不满是你凌辱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五·一九”运动，我们纯洁无私的心灵。这方面按照生活的意志，我不能原谅你。

（1957）6月23日

五四断想

谭天荣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出生，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

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革命的，革命的永远是青年。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少），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倒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会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成立。

革命可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过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着一个，不慌不忙，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

但目前我们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是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谭天荣最近几天来，《人民日报》大为反对据说是“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卢郁文接到匿名信。

一、在我看来不是这样。一般地说共产党人不仅有权利反驳，而且有用斗争会的方式进行压服的特权，说真的共产党剥夺别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倒是应该反对的。

二、……过去普选时大首长再三指责我们没有民主的习惯，没有百分之百地参加选举，“真是给你们民主，你们还不要”，可是在今天，在广大青年学生争取真正民主时，大首长们却惊惶失措了……。

三、……现在我们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像胡风提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却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主……。

总之，在我看来，卢郁文没有实事求是，而是在无的放矢，他的意见也并不“平易近人”是纯粹的废话，毫无意义的空谈，在这场严肃整风——民主运动中。

实在更没有比这种言谈更叫人恶心了……。

卢郁文的品质是不是“典型的无耻之徒”，是不是“为虎作伥”，我不敢发表意见，不过就常情而论，关于他制造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与沟方面出了不少力量的说法似乎可以信赖的。要不《人民日报》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考虑到这种人的本性，他们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要不是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话，真的《人民日报》太盛气凌人了。为什么“为虎作伥”的虎，一定是指共产党呢？我看说他们是“三害”分子更合情理些。把真正的反对“三害”的言论，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另一方面又登一些廉价的批评，不痛不痒地胡乱给“个别领导人”提一些意见，这就是《人民日报》拙劣的诡计，再则《人民日报》把给卢郁文写信的没有留下姓名这一举动加以责难，是多么可笑的自欺欺人，写信人的顾虑可以用葛佩琦的遭遇来作充分说明，他们只不过不愿意在枪林弹雨中暴露自己而已，林希翎也接到各种匿名信，她该登在什么报纸上呢？该通过哪个电台广播呢？这真有一点像俗语中说的“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几天《人民日报》组织的读者来信和其他方式，对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围剿未免太不中用了，这些言论很多地方我也不同意，比方说在我看来，他们满可以不用卢郁文之流提什么警告，可是《人民日报》更显得软弱无力了，在这场围剿中，正人君子除了对这些荒谬论点，表示极愤慨以外，除了神经质地问“居心何在。和“有何意图”以外，并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正像北大学生会主持的辩论会念纸条，在墙上公布从天津来的讨伐信件一样（支持我的信要写成大字报可以贴满北大每一块墙，不过这样做多么乏味）。《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那些有着内在权利的人，用不着炫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力量的人会为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兴问罪之师吗？真太像为了转移人们对学生运动的注意而有意制造的纠纷，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

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最后一场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

在 1957 年 6 月 26 日报告会上的发言

张景中一、关于退出学习的原因“我退出学习的原因基本上和杨路同，但今早几个尊敬的老师劝导我，要我参加学习，我部分接受，参加一些讨论会，但气氛又不是那么坏的大会——如不是批判会（我所认为不应批判的问题）。另一方面我需要休息。”二、三害根源“新宗派主义（指现在的宗派主义）是由于对工作不了解情况，希望一部分人接近他，以改进工作，了解情况。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宗派主义：1 因而更不信任，如此循环……2 如选举制度，层层隔膜，为此而采取一系列的工作方法，而加深了这种隔膜，这个情况是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的。

“新官僚主义：大部分出发点是好的，愿意把工作做好，但由于不了解情况，做了错事习以为常，很主观地认为是不了解情凡犯了错误，但为了面子、个人利益而进行掩盖，越掩盖，错误就越大。

“旧三害（指解放前的三害）对新三害起助长作用，而过去的权威，损

人的利己主义，在人们思想上的遗留有时产生了和旧的相同的错误。

“新三害是在新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因而看法不同，这是永远有的……要有效地防止三害，应在制度上改变。在苏联相中国的制度由于本身的缺点，对产生三害大有些关系的。

“人们的思想是各有片面性的，领导片面，群众推翻，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之必要，但目前做得不好。”“直接生产者和管理生产者之分离（所谓分离是指管理者不是从生产者中来）从历史上看，不是好现象。奴隶社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有些人只单纯地从事管理。

因而产生了阶级，而目前不会产生阶级是因为人们的自觉……我不曾说明目前要产生这个转化，而只是说直接生产者和管理生产者分离不是好事情，这只是我的感觉。”“一部分人进行这样的工作，一部分人进行那样的工作，这是纵的分工、而管理生产和直接生产的分工是横的分工，管理生产者应从生产者中产生，领导科学的必须从搞科学的工作中产生。”“从领导上派下来的分离性较强，我不反对分工，但反对分离。”“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工厂中应该由工人选举厂长。”“工人代表大会的方向是好的，应促成最后领导者绝大部分由工人中产生，领导者参加劳动是好的，但没有劳动者参加领导好，现在是有好多领导者从群众中来的，但没有制度保证。”“在选举上，选民对代表不了解，如团的选举是对团组织投信任票，这种现象虽不是独裁，但是不好的，应该让候选人到选民中说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候选人名单应多一些，有选择，目前提几个选几个，你随便改掉一个人也会选上的。”“这种选举制度是不好的，显然不是民主，但说不民主，要被别人说是诬蔑，因此说是有缺点，要改”。

“人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不够，不了解，不能决定这个政策的好坏，而目前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斯大林的错误不了解使人们不能公正的判断，如果人民了解后，都得出和领导不同的结论，这就可说明领导的不对。”“《人民日报》若经常介绍北大情况，及时指出缺点、错误、就可避免目前的谣言和反革命的挑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来保证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如不说目前人权没有保障，而只是说与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如何保障其人权。”以上这些观点，我再声明一下，这些原则是在党的领导前提下，希望在党的领导下讨论的，“目前北大是否有右派，我不敢肯定，反正我不是右派，肯定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三、天津之行（略）四、我的看法与问题解答“一开始我们希望党委会领导，而党委会没有领导，这就可能有错误，关于思想解放的看法洪久楣曾向市委问过，市委没有反对。”“目前的做法是摧残了部分民主势力。”“我们有同学开始认为党是虚伪的，运动开始后就不是如此，但目前又贴上‘莫谈国事’。”《广场》找不到地方付印，因所有誉印社接到通知不让印，《广场》之基本路线是拥护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对刘奇弟不下结论，我和杨路说刘奇弟有复仇主义，谭敢于提意见的精神是好的，他也是帮助党整风的。”杨路以前不关心政治，而现在帮助党整风的。”“沈泽谊说：我面临了两条路：坚持真理就要离开党，放弃真理就可靠近党，而在阶级斗争中往往要放弃真理，以后十年不谈政治”。

“目前政治尽管目的伟大而手段不能不采取肮脏，《人民日报》为了人民利益但手段是肮脏的，我欣然接受组织处分，校规国法，我不改变我的态度，

假如以后更正……我就可以（放）弃这个肮脏的看法”。

此后听众提了一系列的问题，张作了一些回答：“去天津各人目的不同，我没有如杨路所说“去冲击一下”的想法，本来我们大家不让杨路去，杨路说一定守规矩，不乱说，以后就一起去了。”“我不参加学习愿负违反制度之一切后果。”有人问起信的问题（指张景中写给 5506136 的）张景中说“信公开没道理。就信的内容讲可以公开。我的信就是要组织力量而且要积极地组织力量帮助党整风。”“组织性和良心是有矛盾的，立场和真理有矛盾，为了真理可放弃立场不会做敌人。”“一切政治其手段可以是肮脏的，但我不反对伟大的目的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特别是阶级存在时。”有人问张景中：你说制度是根本的，为什么学校订出制度搞反右派学习，而你不参加。张回答说“我处在矛盾中”。

急流勇退

张景中 12 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肮脏得多。

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

345 举行一次三害根源的报告会。

和一些已约好的同学稍稍交换一下意见。

假期里到天津一次仅仅是为了不失约。

6

压制不了的呼声

严仲强自从中共提出“鸣”“放”政策及整风运动以来，不少人初步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盲从的习惯势力受到了打击，人民初步地提高了积极性。由于一部份人不仅喜欢研究理论而且喜欢用自己认为是最正确的理论去改进世界。所以“鸣”“放”政策不能与党的整风混为一谈，不能以某些言论不能帮助党整风为借口，而限制“鸣”“放”的范围。

有人认为“鸣”“放”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我国过去几年来建设上取得成就，马列主义的广泛宣传，政权的巩固，这是没有说服能力的。不可否认这些原因是“鸣”“放”的必要条件，但它远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得不出人民可以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可以真正的管理国家政权的结论；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波兹南事件及匈牙利的十月起义，以及斯大林为什么能够破坏民主集中制及集体领导。“鸣”“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苏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皆比中国先进，但就不提“鸣”“放”政策。所以“鸣”“放”政策可以提出，但也可能被执政党在一些借口下取消或有名无实。在中共所提出的反三害斗争中没有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这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教条主义反面为修正主义，而提出修正主义，就使人联想到制度及路线问题，这样就不能符合共产党的最高利益。

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有人喜欢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措施为修正主义，但同时他们又很谦虚地说：自己对南斯拉夫真实情况了解得很少。

人民不会长期容忍缺乏民主的生活的，但人民对民主内外体验及要求则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关，人民对新社会爱的基础仍是对旧社会的恨。所以即使新社会缺乏民主，但只要旧社会更不民主，人民仍是非常愿意接受新社会的，并尽全力去保卫它。由于我国人民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所以苏联人民可以在痛苦中容忍了斯大林一系列的罪行，而匈牙利人民就不能容忍拉科西——格罗集团的统治，而毅然组织起义，中共吸收了波匈事件的教训，了解到“鸣”“放”是可以缓和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总是喜欢知道国内各种力量对比的，这种对比的真实情况是不能从某些干部及文人们无耻的献媚及阿谀的颂扬中寻求正确答案的。但鸣放可以提供这种答案，通过鸣放中共可以估计到各种力量对比，学习对待各种不同人的手段，从而达到更巩固的专政。在“鸣”“放”中会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这是中共早就料到的，但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竟如此迅速地出现了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民主运动的力量，右派的力量。由于右派完全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应当反对他们。

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他们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他们要问：三害是否和社会的某些制度有关，是否和党的领导有关。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人道，他们无情地揭露过去的工作缺点，因而降低了中共的威信。由于他们对美好的明天强烈的爱，对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强烈的恨，他们对待某些问题上常有偏激情绪，别有用心的就是从这个弱点上对他们加以全盘的否定。这两种力量的出现，皆不符合中共的最高利益，（庸俗利己主义型及美化利己主义的利益）。中共对他们因而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并且将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凑成一个所谓“右”派，从而对右派展开进攻。

为了使问题明确起见，探讨一下民主运动潮流和右派进攻产生的原因，还是有必要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只要有机可乘时自然会向社会主义进攻。随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消灭，这种力量会逐渐削弱下去。但搞一次大规模反右派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右派，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的性质根本不同，不能因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混在一起，而否定民主运动的意义，这种民主运动在本校表现为“五·一九”运动，它的产生由于领导者对三害根源解释及对过去运动中优缺点的估计不能令人信服，因而群众自发的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他们要争取民主、自由、人道，而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在过去是受到限制和轻视的。

为了正确地估计这次民主运动，在讨论问题时，大家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一切言行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应当以这个根本前提为参考。这个前提应当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谈建设社会主义及要求党的领导才有意义。在这个前提下人民要求一个最完善的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是完全正义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保守势力却喜欢称这种要求为反社会主义，所以就应当对反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作一些分析。有人将社会主义基本特点归结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及党的领导。这几个概念皆非常广泛，但正因为它广泛也就缺少了具体内容，具体的社会主义并不像

理论上所宣传的抽象社会主义那样优越。例如三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反对社会主义中落后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不离开社会主义。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公有制的形式是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这种要求不应污蔑之为修正主义，事实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从理论上讲抽象的社会主义也曾有一个抽象的共产党领导，抽象的共产党应无条件的拥护，但具体的共产党可以成为官僚主义的化身，例如拉科西——格罗集团，反对这种集团并不能算反对社会主义，中共不喜欢这些论点，因为它是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共产党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任何具体党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常常不能一致，因而发生党、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在中国三害普遍存在，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不及时纠正错误，党和人民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对抗，从而被人民推翻。

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作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他们绝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

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

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三害老爷们发抖了。因为他们又一次领教到人民的力量，真理的种籽是不会消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在一定阶段可以后退，但它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尽管有人污蔑你们为右派分子，尽力将你们形容成小丑，从而想将你们完全否定，但有理智的人会看清楚这些阴谋。你们应当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继续在你们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历史会对你们作出公正评价的。

现在共产党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还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但立场、正义等和真理不同，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而立场、正义则是一个信仰问题，客观规律并不能告诉人应当选择某种立场，只有生活本身才能告诉人这一点，从立场来批评一个人的言论是最软弱不过的。

中共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因为他反对了真正的右派，但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对右派斗争流行一时的手法是批判会，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是肃反时斗争会的变相而已。这种会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因为这种会的性质，不是学术性的探讨，而是政治性的宣传、鼓动，它在说理争鸣的画皮下，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这种会在形式上可以不择手段，有些人不借用最虚伪的做作来获得听众由于一时冲动所赐予的掌声。

我估计这篇文章会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一定有人警告我，若不悔改则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应当声明我是不会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因为在我和右派势力之间，还隔着共产党的中间势力，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鄙视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

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19575302041 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略谈“五·一九”

王存心对于斯大林个人专断的严重错误和匈牙利的武装暴动，我们国家的领导当局所作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说服力不够，虽经大力宣传但仍有许多人不肯接受。

“三害”的实质和根源是同性质的问题。照样轻描淡写敷衍通过，当然人心不服。

为了防止“五·一九”这样的事件，我们国家领导当局作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慎重地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然后通过报纸等宣传反复解释；另外，还有特别布置的政治学习。但是，“五·一九”运动这样的事件仍然发生了，出乎领导当局的意料。有人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不容否认，中国过去太糟了，对比之下，人民对新中国是无比热爱的，只有在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暴力的革命才会发生。领导当局有决心进行一次和风细雨的彻底的改革，不会有多大的困难，虽有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并不可怕。我们国家的领导当局为了顾全自己高度的威信，十分固执地坚持不太高明的见解，对“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不但不予以支持，不积极的领导，相反的，不择手段的加以压制，并利用广大群众对新中国无比热爱的情绪大张旗鼓地掀起反“右派”斗争。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由于反革命的破坏，由于少数人近于疯狂的偏激，由于知识不足的广大群众不明运动的真象，经不起重大的阻力，“五·一九”运动未得到健康的发展，目前“五·一九”运动被反右派“斗争”代替。尽管如此，“五·一九”运动还是有成绩的。它给了“三害”分子一个有力的打击，在许多人僵化了的脑袋中起了振荡，还有，更重要的是，领导当局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阴改一点，阳改一点，实际上在改，不是吗？以我见到的来说，学生会的权力似乎是加强了，那些非行政机构也不再发号施令了，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延长十天也极为慎重，由校务委员会决定。总之，规矩多了。

与上文无关的附录 正如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也不在于它如何绝对的好，而在于它能及时地按照人民的意志改变。

人眼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历史的车轮永远前进，中国人民已跨了很大的一步，但不能就此停止不前。

有人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对政治生活中一些看不惯的事有点生气。

为此，特从弥勒佛（大肚罗汉）抄有关对联一副，牢记在心，可免烦

恼。

上联：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下联：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利己主义”原理

王存心“利己主义”由来已久，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限于认识水平，恕我不能详细叙述。在霍布斯那里，可以找到“利己主义”，实际上，“利己主义”是建立社会契约论基础。由于霍布斯对高尚的利己行为强调得不够，他的“利己主义”不易被某些品德高尚的人接受。与霍布斯相反，车尔尼雪夫斯基着重强调了高尚利己行为，提倡“美化的利己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化的利己主义”容易为那些品德高的人接受，但内容较为贫乏。甚至有人认为他主张的不是“利己主义”，只是不恰当地利用了“利己主义”这名词。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利己主义”都美中不足，完美的“利己主义”必须是二者结合，这种结合是极自然的。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作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

一件事对一个人有利还是不利，或有没有利害关系，取决于这件事和这个人以及评判者用以评判利害的标准。评判利害关系可以是各式各样的焚例来说：如以健康为标准，则能增进一个人健康的事，对这个人是有利的。因评判者用的评判利害的标准不同，同一件事对同一个人可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为了明确“利己”一词的涵义，究竟应选择怎样的标准？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标准是否存在？谁要是武断地提出一种绝对的标准，这种标准虽对他自己是适用的，但不一定为大家所承认。当他按这种标准硬说一件事对某人有利，而那人却不同意这件事时，不能认为这件事对那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事必需是自己承认的。因此，一件事对一个人的利害关系，评判者最好是这个人自己，用以评判的标准也由自己选择，致于如何选择，选什么，个人有所不同，并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不相同。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到满意时，认为这件事是对他是有利的；反之，一个人认为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在当时这件事是使他满意的。这句话浅显极了，谁都明白。不过，请不要轻视这句浅显的话，它给出了“利己”一词的涵义，是“利己主义”立论的基础。“涵义”作为一种感受，是不需要解释的。任何概念的定义，最终都是归结于直接感受到或间接感受到的东西。一个人对一件事认为满意，归根到底这件事必能使他在直接的感受中感到满意。

随着每个选择的用以评判的标准不同，几个人的利己愿望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为名，有的为利，有的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有的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有的喜欢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有的喜欢默默无闻的谈漂泊生活，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损人利己，有的把帮助别人当做最大的乐事。如此杂多的人的利己愿望，分别研究起来是费事的。有些有利愿望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在正常状态下差不多是全人类所公有的，如吃得饱，穿得暖。也有社会

上某些集团的人共同的利己愿望，如阶级利益。此外，奇特的，怪癖的利己愿望也有不少，有的是十分荒谬的。所有这些，不管差别怎样大，在前述意义下都是利己愿望，千差万别的利己愿意，在利己这一点上相同。

人的利己愿望及在利己愿望指挥下的利己行为，可以从利己的角度进行分类。

虽然人的愿望和行为是利己的，但其效果可能对别人有利，可能对别人有害，也可能与别人没有利害关系。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不要以为利人的利己这样的用语有矛盾，它的意义是十分确切的。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同时可以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利与否，取决于自己；对别人有利与否，取决于别人。

我们坚持的利己原则是：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都是利己；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遭到反对，只不过表明人人都利己。人都利己实在是明显的。只要经过思索，作一番选择，人总是做最能使人满意的事。许多人不认识这一点，是由于不了解利己一词真正的涵义，错误地把利人的利己当作损己的利己，把利人和利己对立起来。人在作利人的事时，常常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但这是出乎不得已，是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他才这样做。

关于利己行为，有一点要特别着重提出，就是，除了深思熟虑的利己行为，还有一些利己行为是不假思索就作出的。表面上没有计较个人利益，而行为的效果却有利于别人，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失。例如，人在紧急关头的自我牺牲，将士们在战场上的许多英勇的英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利己原则呢？不是的。一个人在作出这样的行为以前，对于这样的问题，即在那样紧急关头采取怎样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早就有了考虑。既然主意早已打定，行动时也就表现得毫无迟疑。

为了着重强调高尚的利己行为，我想谈谈符合利己原则的“舍生取义”。人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去作他认为更有价值的事？这和利己原则是不是违背？如果把生命作为人的最大利益（指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可贵），显然，“舍生取义”违背了利己原则，但前面一再提出：“利己”一词的涵义不能这样简单的了解。

“舍生取义”的行为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简单得很。

各章早已提出的：生我所欲也，义也我所欲也；二者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请注意“欲”字，正是这个欲字给出了问题的说明。对于贪生怕死的人不明“舍生取义”，也可以作出解释，因为他不欲。按照利己原理，人都是利己的，利己本身的所以不褒贬，不过，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遭到反对，这是不容易的事实。因为人人都利己，行什么样的利己在好呢？从利己的问题考虑利人的利己最有利，可以受到欢迎，少受到反对，既利自己又利别人。做一个利人的利己者从不容易，许多利人的事常常使人感到不利己。作一个利人的利己者需要一番努力，作起利人的事业，才会感到很满意，实际对自己有利，才能心安理得地“自我牺牲”。

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的划分是抽象的，很难有人是三者之一，大多数人是三者之混合体，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利己愿望支配的利己行为，其中有些人是损人的，有些是不损人的，有些是利人的。

尽管人的利己愿望是千差万别的，但同样的都有利己愿望，都要求过

幸福、自由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并非绝对的不可调和，相反的，人们联合起来会更有力量。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于是，有利己愿望的人结合在一起，过互助的社会生活，人成了社会的动物。与动物本能的联合（如蜜蜂的“社会生活”）不同，人的联合是大家都有利己愿望，都要求生活幸福的结果，是利己以“契约”的方式构成的联合，借助于此种联合调和彼此利己冲突，并争取共同的利益。

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的社会生活是很不完善的。所以严密的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很大进步。有的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为特权阶级服务，并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这样的现象是不理想的。不要忘了人们都是利己的，社会上的人都是利己者，只要有了得利的机会，一部分人就会爬上统治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

不要把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国家和少数人掌握的国家混为一谈，实际存在的国家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同时又被少数人采取。历史上一个个的国家被推翻，随之一个个的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不断在改变着，总之趋势是越来越好。以利己愿望作基础，人能联合起来过互助的社会生活，尽可能地使彼此利害冲突调和，事实证明这样的联合好处很多，对大多数人有利。当人们都这样联合逐渐习惯之后，人们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并且，个别的人离开了社会就几乎无法生活。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合作。虽然如此，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很频繁，所谓纠纷差不多到处都是。因为人与人的合作是以人的利己愿望作为基础，不是什么铁一般的自然法则。为了调解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社会上不能不设特定的有权机构来处理由于利害冲突引起的人事纠纷，如法庭、监狱之类。

在没有健全的民主法制以前，人与人由于利害冲突引起的纠纷的裁判，往往依照少数统治者的意志，或以所谓上帝的意志为根据。少数统治者的意志，有时符合大多人的意愿，也有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时候，当然最能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是健全的民主的法律。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人与人的利害冲突起一种调节作用。与法律相配合的，还有作为社会舆论的道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持的用以评判人的行为标准。以此标准可依据，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人们表示赞成或反对，说它是善或说它是恶的。

善与恶是人对人的行为所作的判断，不是人的行为本身所具有。因为在不同的人看来，同一的人的行为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无所谓善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们用来评判人们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不断在变化，与变化着的越来越完善的社会生活相适应。

社会上人们用来评判人的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己愿望的体现。要想清楚地了解道德标准及善与恶的问题，必须回到一再提出过的利己原则，由利己原则作一般说明。利己原则除了肯定人都是利己的，还说：利人的利己受到欢迎，损人的利己受到反对，因为人人都利己。焚例来说，偷东西是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东西被偷掉，于是大家都反对偷东西，社会舆论就认为偷东西是不道德的。与此相适应，法律上把偷东西规定作犯罪行为。

顺便说一句，法律与道德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合法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有些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能保证人民生活得幸福，怎样才能有好的国家和

好的法律呢？必须人民当家作主，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国家和制定的法律。争取民主，也就是争取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的意愿可以充分表达出来并加以贯彻。国家的组织形式及法律程序等不合人民的心意时，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更换或加以修正，可以不用暴力而实行一些彻底而有意义的改革。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当人民中大多数的利益受到严重危害时，他们就会起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当时的国家政权，同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也向他们进行反击，于是流血的残暴的斗争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与人民民主对置的是统治者的集中权力。为了有效的行使国家政权，使在全国范围内有利于国家民主的事务进行有一致的步调，为了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并有坚强的领导，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不过，这种权力的集中必须作为民主的结果，才是民主的集中。集中与民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否则民主将被限制而成为“集中的民主”。民主的集中是民主的，“集中的民主”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由于民主的集中与“集中的民主”不大自然容易分辨，民主的集中常常被“集中的民主”代替，使民主不能充分发扬。

民主建立的国家民主制定法律，能使人民享受各种民主权利，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些民主权利是不可少的。在法律上作为人权看待的自由就是这样，人必须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行动，生活才能幸福。自由，不受约束。人可以作各种决定，按照这种决定采取行动。不在他人他物的胁迫下，即没有约束，纯粹是自觉自愿地作出决定，并实行它，这就是自由。不管是一喜一怒，乃至把手举起，似乎是自由的，其实并不自由。推本求源都和别的事物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因此，通常谈到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表现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在法律上作为人权看的自由，就一般意义说也就是表现的，不过，它和最广义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有所区别，有他独特的意义。法律规定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有限制的。允许人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行动，但以不侵犯他人利益为原则。这样的自由是维护人们共同体中每一成员幸福生活所必须的。因而是大家的要求，为大家的愿望接受。

前面的叙述中，对个人的利己愿望和利己愿望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说得已经不少了。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在前面的叙述中没有涉及，这就是社会上人的各种集团，既不是社会上一个个的人，也不是社会上人的全体。在同一集团里的人，由于有共同的生活状况，使他们的利己愿望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而对许多问题有较一致的看法。他的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行动着，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所属的集团，但他们的利己愿望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而他们的个别行动往往对他所属的整个集团都有好处的。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时候，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他们为联合起来向侵害他们利益的人或别的集团进行斗争，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会为此表现出高尚的利己行为，以他所属集团的利益作为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种高尚的利己行为并不违反利己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卓越的文学家了解得较深刻），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到的。

所谓阶级就是社会上有共同生活状况的人的集团的一种。比如工人阶级，就是没有生产资料并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的集团。阶级之间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同的。由于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出现了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阶级这事实不容否认，不过也不要忽视各阶级的成员都是有利己愿望的个人（利己者）正如整个社会人的全体是

有利己愿望的个人（利己者）组成的一样。至于阶级是怎样产生的，这不是三言两语解释得清楚的问题。通常认为阶级是伴随私有制一起出现的，由于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有了可能，加上分工和交换给财产的私人占有以便利的机会，于是出现了私有制，随之也就出现了阶级。还有战争中得来的俘虏，令其做劳工可以从剩余产品得到利益，也是促成阶级产生的重要因素。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我只着重提出一点，那就是：阶级的形成仍然是以人们利己愿望为基础的，人如果没有利己愿望仅仅有剩余产品，强占剩余产品的事仍不会发生，阶级仍不会形成。不要以为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前原始人是不利己的，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结成原始群和部落等，并且会因为争夺事物等发生利害冲突。

谈谈阶级也应该谈一谈剥削问题。大家知道工人替资本家干活，并不能从工资得到全部报酬，一部分无偿的劳动被资本家占去了，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即所谓剥削。这种不平等交易确实是进行了，但工人不是心甘情愿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之前，工人不得和资本家进行这种不平等交易，并且没法争取这种不平等交易，否则就有挨饿受冻失业的危险。工人要求打倒资本家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自己切身利益。工人除了争取彻底的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也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工资多少是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的，一方面要使资本家获得很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要工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资本家依靠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利用工人失业压低工资，工人也运用罢工等手段争取提高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保证资本家获得够多利润的条件下，工人工资的提高是可能的，不一定绝对日益的贫困化。

“利己主义”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方面是：这样那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利己愿望如何被决定；另一方面是：运用利己原则来探讨各种人生和社会的问题。

在“利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利己原则是中心，起枢纽作用。利己原则是浅显的，正因为它是浅显的，所以它是可靠的。在探讨人生和社会的问题时，如能注意这样一个浅显而又可靠的原则，对于问题的说明是会有帮助的。当然利己原则并不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原则，不具备别方面的知识，仅仅有一个利己原则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

为了进一步指出利己原则的功用，下面以商品的价值为例，略加解释。

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被占有的物品。交换之所以必要，因为分工；占有之所以可能，因为私有。商品有使用价值；即商品对人是有用的，能满足人的需要。商品有交换价值，指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能和另一数量的别种商品交换。确定了交换时商品之间的比例，商品的交换价值就相对地确定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直接决定于交换双方，交换时商品之间的比例，必须是交换双方都同意的，否则交换就得不到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因定的，由于市场上商品的多寡，及交换双方不同的需要，商品的交换价值会因市场上供求情况的不同而不同。通常，在一定的供求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如果不是这样，包含劳动量多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按比例地高于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时，生产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是更有利的，包含劳动量少的商品就会增多，因而破坏原来的供求情况。结果认为商品有一种既非使用价值，又不与交换价值等同的属性，叫做价值，而把它理解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并且把交换价值换个

名称，叫做价格，则可发现，有时价格与价值成正比，有时不是，有时价格等于价值，有时价格低于价值，但不远离。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所说的价值规律，它可以用利己原则来说明。

上面给予商品价值的说明，对于简单商品生产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很发达的时期。大家知道，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利润率，例如商品是按照所包含的劳动量多寡出售，确实是这样。

资本有机构成生产的不同部门利润率不同，由于自由竞争，利润率平均化，随之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所谓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它和价值规律在表面上是有些抵触的。如何用利己原则来了解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呢？为此，必须指出，和简单商品生产不同，在资本主义很发达时期，资本所有者是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凭着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工人的劳动中取得利润。既然可以自由竞争，哪一个资本家都不愿把资本投到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部门，相反地，哪个资本家都想把资本投到利润最高的生产部门去。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实质是：同样多的资本获得同样利润，从利己原则看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同一利己原则，运用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简单商品生产，得到的是价值规律，运用到资本家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很发达时期，得到的是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两者表面上有些不同，其实质是同一的利己原则在不同条件下的运用。关于地租、地价、商业资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垄断价格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物质利益原则诸问题，也可用利己原则作类似的考虑，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述了。最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可以由利己原则得出，需要着重地提一提。就是：不断改进的社会制度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

好的社会制度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家都满意，因而大家愿意保卫它；对于不好的社会制度，人们不满意的，人们要求推翻它，改变它。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一个个地被建立起来，然后被推翻被代替。在人民能充分享受到民主权利的社会里，社会制度有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能较容易的及时地用民主方式使之改进，不致于发生暴力革命。正如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一样，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在于它如何绝对的好，而在于它能及时地按照人民的意愿改变。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当不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危害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民不能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制度有所改进，这时就发生了暴力革命。不受多数人欢迎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须能满足当时社会上大多数的利己愿望，才能稳定。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生产力之类在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在利己愿望并不断要求这种利己愿望得到满足的社会的人。社会发展暂时的有坏的社会制度代替好社会制度的情形，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好。

谈到社会生产力，大家都知道，社会生产是永不停地发展着的。但是不要以为社会生产力是自己在发展，不是的，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是人。人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使生产有计划地进行，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谁都希望在生产时能少费力气多获得产品，谁都希望体力和脑力负担很沉重的劳动生产能变得轻松愉快，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只要办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愿意使生产力尽可能的提高。由于

重重限制，生产力发展速度是有限的。不好的社会制度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但不能改变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总的趋势。当然提高社会生产力是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也就违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容许。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好的社会制度被推翻，同时也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1957

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

蒋兴仁——要求民主选举学生会目前选举方式是党团提名介绍个人优缺点，投票选代表，再用同样方式选举领导机构，没有竞选活动不说明被选人怎样工作，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好像选模范一样（其实并不模范），因此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理由如下：（一）提名：提几个选几个，虽说可以选其它的人，但没有竞选，不知另选何人，几个人想另选某人，也等于废票。

（二）提名时是介绍候选人人品，如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等，不介绍他将怎样工作，百分之百的通过，表面上是人民作主，实际上把主权让给他去独裁，选举实际上成为人民出卖主权的手续。

（三）这种选举产生的领导，其工作合乎人民需要也是自然的偶合，产生“三害”确是必然的结果。

（四）选模范（？）式的选举可能选出有德（？）无才和不愿工作的人，把工作搞糟。

（五）这样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工作不易得到选民的了解，提意见也不知多数少数，采不采纳，怎样采纳，由领导个人决定，根本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名义上的主人，选举者根本无法干预工作的进行，实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怎样选举才民主选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体现，要作到这点就必须实行有以下两个特点的选举方法：（一）选举前有竞选——由候选人向选民介绍他被选后的工作原则和实现此原则之初步计划——总称施政方针（至于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等可介绍也可不介绍）说明其好处缺点。由另外人批评其错误，经过充分宣传讨论和修正后，再开始选举。

如只有一个候选人，没有与他竞选的人，也这么进行工作，也要充分讨论，这样选举才是选原则，选计划，不是选模范人品，才是选民意志的执行者，才是选民自己当家作主，不是另外找一个主人。

（二）选举后被选人必须向选民报告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困难，缺点和对当前重大问题处理方法，举行辩论会及讨论会，在原计划未执行和有新问题解决方法不令人满意时要投信任票，罢免改选。

（1）选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选民是选自己的意志，不是选某人的人品。

（2）保证工作，代表人民意志不是代表个人意志，不产生独裁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3) 保证选得其人。不称职不愿工作的人，不敢竞选也提不出代表人民的施政方针，也不会选上。

(4) 选举的机构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的执行者，施政方针已得人民同意，更易深入人心，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

(5) 直接受到群众监督便易防止三害。

民主方式执行原则(1)从基层作起，从百家争鸣已经开展的地方作起。

(2) 供给任何人竞选的一切物质手段(如宣传费，以前工作情况，存在问题等各方面的资料)(3) 消除一切顾虑，鼓动人们提出各种意见，竞选纲领，互相批评。

(4) 用法律保证没有拉拢，收买，威胁人，其它任何破坏宣传和选民选举的行为。

(5) 党的领导体现在提出正确的施政方针，派出优秀的竞选人，不体现在其它制度上，这样的领导才是人民选出的，不是强加的，才能够联系群众，不产生三害。

实行步骤:(1) 首先在北大试验民主选举学生会，然后推广到各高等学校学生会，各地群众团体，合作社，工厂等基层单位，以致全国政权。

(2) 在北大实行的步骤：——马上确定学生会任务，宣布具体选举法，在本学期开始，候选人提名，提出初步竞选纲领，收集同学对学生会的希望和意见，进行初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放假前正式确定候选人名单，各提出完整的竞选纲领(工作原则和初步计划)利用各种形式正式展开宣传活动，下学期初步进行选举，建立民主学生会。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陈爱文这次运动中，有人好谈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有人忌谈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交锋之下，前者宣布自己应不反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只是要改进某些“具体的制度”后者也声明并不反对某些“具体制度”的改变，双方突然失去了争执的凭借——然则又何其汹汹滔滔乎！

斥绝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它要有书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风气、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间的有生命的东西。因此，一种制度的形成必然经过如下的历程，争取——宪法——再争取(争取立法的实现)。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着这样的历程：1919年革命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是第一步；解放后一系列的法制，特别是1954年社会主义根本大法的订立是第二步，紧跟着第二步而来的第三步，正近在眉尖，1954问题，所以有1955年肃反中许多地方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可是有的人却由于说了几句不同于习惯教条的话正被指为“反动言论”；有的地方公然检查信件，必然把正当的友谊聚会诬指为“小集团”甚至“反党集团”；有的地方甚至非法拘禁，变相审讯，如北大24斋就一度被代用作牢房，这些明知是非法的，但是在当时却到处诉说。这说明了，仅有书面的条文，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说这社会已经有了

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有群众的争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今天的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迥异于过去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但是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有了中央的鸣放政策，还必须加上群众的争取，才能够冲破保守力量的阻挠和束缚，才能保证贯彻中央的意图，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备，恐作风问题是错误的，（原文如此编者注）但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也是错误的；三害得以泛滥，是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讲坛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侈谈改革社会制度者可以休矣，假如你们要改变的也不过是人事档案制度，留学生制度等，请注意这些并不是社会制度。假如，这并不是社会制度，假如你们要争取的也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请注意，这正是我们要建立而没有建立好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反对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把一些离开传统习惯的见解都指斥为“离开社会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否定这个原则的，就不能妄指为“离开社会主义”。

我们同意陆定一的话，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而我们所理解的立场，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凝固的狭隘的不顾事实的成见，只有没落阶级的立场才是偏见成见，先进阶级立场永远是代表历史前进发展的要求的。

收起那些“耸听”的“危言”！摆脱那些“规戒”和“禁忌”！拿出主人的态度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肃反运动论纲

江文北京大学 1955 年暑假的肃反运动斗争错了那么多人，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区别“肃反工作”和 1955 年夏开始的以胡风集团为典型，以广泛开展斗争为形式的“肃反运动”这两个概念。毋庸置疑，肃反工作对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需要的，本文专谈后者。主要论点如下：一、当时局势，1953 国内阶级关系并不是“日益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2]”。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力量日薄，工人阶级的领导日益加强，阶级矛盾不可能日益尖锐化。有人认为，直至 1956 年底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那时起，阶级关系才趋向缓和这是割断历史的看法。在此之前，已是彻底改造的准备阶段，矛盾当然不会尖锐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是有历史传统的。

[1]见周总理在二届政协二次全国委员会上的政治报告。

[2]见本文第二点张仲纯的报告。

二、肃反的指导理论，张仲纯同志的肃反动员报告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从理论上苏共党的历史上来讲是如此，目前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江文）因此就有必要开展肃反运动，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提高警惕反对麻痹”一文的基本思想亦是如此[3]这种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绝对尖锐化的理论早已破产，不须再驳。

[3]见 55 年 6.30《人民日报》社论文三、肃反方针“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以及后来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和“不杀少捕”的政策，是正确的，使错杀和大量错捕可以避免，没有造成斯大林式的悲剧。

四、肃反的敌情估计：开始阶段提出“百分之几”[4]“百分之五”[5]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北大大约斗了二百多人。

[4]55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

[5]史梦兰肃反报告“大约有 5%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不过我们在班上不要掌握这个比例。”以百分之五推算（如财政部电力部[6]）虽然简便，但为有头脑的人所不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情况极为复杂”[7]根据主观意测的数字开展斗争实属可笑。有人认为，上级也无硬性规定为百分之五，我想这个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在当时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造成肃反扩大化。

[6]今年 5 月 19 日 15 日《人民日报》。

[7]毛主席七届三中全会报告。

五、检查肃反运动的主要标准。我们和史梦兰同志不同，他总结成绩说“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次的斗争（具体数字党委会有案可查）”。我们认为应以客观效果来检查，不能以斗争次数来定成绩，事实上，这数字在估计错误时引用它反倒适宜。我们以为斗错了多少人，就是错误，斗对了多少人就是成绩。（全面估价不拟在此详述）总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到底有几个对的，因数字保密，我不得而知，这样还能说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吗？还能背“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公式吗[8]？固然我们亦不应忘记肃反后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追查校对材料为主要方式，运动基本是健康的，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 Q 革命的宗派主义[9]。

[8]史梦兰肃反总结。

[9]毛主席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到《阿 Q 正传》的报告。

论人事档案制度

江文——请教严仁赓校长助理并致国务院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基于两方面的作用：一、系统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历史情况、工作经历，优缺点及

受过奖惩等，作为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二、审查干部的政治情况，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内部。

前者是内部问题，属于民主范畴；后者是敌我问题，属于专政范畴。前者对干部本人可以公开，后者必须严格保密。过去我们大量吸收干部，对他们的情况还摸不清楚，敌人也乘机混入是现在国内敌我矛盾基本结束，经过肃反、审干，干部政治历史情况基本弄清，人事档案制度第二方面的作用也基本结束了，因此档案材料对干部本人就可以而且应该公开。

至于发现个别干部有反革命嫌疑的，应该由公安部门建立档案进行侦察，这样做的好处：可以迅速证实材料的真伪，及时破案；怀疑未证实以前，不会影响干部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如果把这些材料放在人事档案里边，由于人事部门没有侦察破案的力量，对于坏人，不能及时查出，对于好人，则使他长期蒙受莫须有的嫌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产生下列主要消极后果：一、造成人事干部及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最近《人民日报》已经揭发了许多事实。我校也有这种情况，有诗为证：“……情郎名叫档案袋，姑娘倾心好几载，姑娘啊，只怪你思想与他（档案袋——本文作者）有界线，怎怪他不与你结姻缘”（见 16 斋东墙底下，李丰楷，赵振忠，李林活，蒋镇，王磊，张钟所作广场漫步）诗意虽然隐晦，正好道出了某些人的心理，以为“思想有界线”的普通人是没有权利看自己档案袋的，而只有那些“思想没有界线”的人，才有权利看别人的档案袋。

二、不与本人校对，造成某些诬告及误会的漏洞，如中文系新闻 54 级有一位“积极分子”（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恕不指名）秘密检举了一个同学，说他曾向自己打听江苏省公安厅派往敌区工作人员的名单。幸有一个偶然的机，让被检举者发觉，才查明是诬告的。试想，如果不被发觉，将对他造成怎么样可怕的影响。

三、由于某些领导者对干部的片面的评语，及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影响了对干部的正确了解和使用。

四、形成干部对领导的隔膜和怀疑。“到底他们对我的看法如何？”“是否在我的档案袋中放进什么材料？”这次运动中不是还有人担心自己写的大字报会被装进档案吗？校长助理严仁赓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答复说：“此系国务院规定必须保密，以后的鉴定材料，会经本人同意”连研究研究，向上级反映的余地也没有。难道国务院规定就不可以重新考虑吗？今后固然要防止错误，可是，过去材料中的错误，就让它过去吗？我们要求以理服人，不要以“令”服人，在新的时期下沿用旧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正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变这种过时了的制度，正是整风的目的。

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

胡稼胎胡稼胎说：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

他说：“最近几年来，我深居简出，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开会从不发言，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但在解放前我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武汉大学时，我担任教授代表，在教授会上向贪污公款的工学院院长开炮，仗义直言。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风是非常英明的。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应退出学校。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载在宪法上，党委会学校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弊多利少，党员向党报告教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教员怎么积极起来呢。不借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造者。

（原载北大校刊 125 期）

发言综述

胡稼胎他对农民看法的“根据”甲、在七 7 月 1 日的会上，他说：农民，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报上看来的，我的堂兄弟来信向我要钱，我儿子的同事出差到洛阳，看到农民很苦，又听到经济系陈振汉先生的发言，我讲的是根据少数听来的话。农民有 5 亿多人，我讲的是一小部分，诸位讲的也是一小部分。我讲这话，以后不久报纸上就发表广西的事件。

（齐香先生接着说：我们不要求你们解释，希望你端正立场。）乙、他说“我自然是个地主”，但是，“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在 7 月 2 日的大会上，他说：关于农民问题，我在 14 岁以前一直在乡下，我也放过牛，从前乡下农民苦，我知道的比你们多，所谓镰刀一上壁，家里没有吃。我自然是个地主，有四五十亩田，雇工种田的。我依靠田上了学，我进了香港大学，除了家里寄钱以外，有官费，有县里的津贴，我的兄弟也依靠田地进了大学。我因为看到农民苦，所以田租比人家收得少。我是看到农民苦，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也是因为我有农民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我从听到农民生活苦的个别事实推论到农民苦，是逻辑错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有农民情感。

他对党委会可以退出学校的根据在 7 月 1 日会上，他说：我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当然像章伯钧，储安平那样大骂主人失去了客人的身份。党的成绩我也讲过，最大的成绩是改变了中国百年来受屈辱的地位，我不相信罗隆基，章伯钧等夺到政权后会搞得好。因为人总有错误，世界局势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首先做到内部团结，北京大学靠近中央，又有党员副校长，可以够了。党要依靠群众，党委可以退出学校，是因为它有三害，如果能改掉，当然多些人做事也好。学术方面的领导有党员很好，没有也可以，只要有人掌舵即可，因此，只需两个党员副校长，这样也就可以在政治思想上领导了。我觉得我说的话和周总理的话意思差不多。

“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合乎逻辑”在7月1日会上，他说：许多话我在小组中已谈过，有的话传得不正确，说80%农民没得吃，我没有愚蠢到如此。

大家诚恳的动机，我很感激，我从儒家观点接受马列主义。儒家是讲仁的。所以接受社会主义，我觉得剥削是不合理的。年纪大的人有许多思想不能改掉，而且这些思想与马列主义并不抵触，我接受马列主义是移花接木式的。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加入过任何党团，因为我没有政治才能。如果有政治才能的人当然参加政治团体。我认为党整风是好的，应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我对党是善意的，因为本着儒家博爱的精神，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都是很合逻辑。

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他认为是逻辑问题在七月二日会上，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我认为是个逻辑问题，我把自己经历过的少数事件，推论到党员是便衣警察，这种推论方法是不对的。我班上的同学向领导汇报我的情况，我认为学校是党委领导的，所以就想到报告的是党员，就得出，党员是便衣警察的结论。

他的“动机”“效果”和“产生效果”的“原因”我的动机是本着儒家精神，但许多说法与儒家精神违背，这个意见我接受。关于“三害”问题，我说过共产党有成就，也发生了“三害”，但如果让储安平等人上台执政也不可能免去三害。人看问题是有许多毛病的，我说话主观方面是没有仇视党、敌视党的，但效果却如此，原因是因为我只说了党的缺点，没有说党的成绩。

突出地提出了党的“三害”。

他认为他的错误在于“用字上欠斟酌”在7月2日会上，他说：有许多人提到立场问题，这可能是个问题，我是从儒家立场出发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有仁爱精神与儒家相同。我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对党提意见的，但因用字上欠斟酌，结果与原意相反。我的话在听到的人看起来好像与右派野心家的言论互通声气。

最后，蔡鸿宾同志说，听了胡先生的辩解，我准备的发言显然是“落后”了，胡先生口口声声相信党，爱社会主义，但从胡先生的言论看却完全与资产阶级右派息息相通，这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又是什么呢？董桂枝同志说：我不同意会这样开下去。我建议扩大这个会，邀请同学和系外的教师参加。希望他（胡）好好想一下，在会上表示态度。此外杨周翰、杜秉正、杜美、曾藩本、裘景浩、陈占元、赵璉和罗经国同志等接着发了言。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有些同志要求胡先生深思和猛省，否则就要斗争到底，最后主席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研究召开扩大会议问题，对胡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刘奇弟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

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1957年5月）

论当前整风——民主运动

刘奇弟（一）运动的性质（1）整风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是自上而下，要求思想改造。

自从党中央决定整风、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以来，全国各地火热地展开了这一运动，出现了一片令人兴奋的新气象。党外的民主人士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大胆地热情地向党诉说出长期被压抑而又不敢说出来的知心话，并且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至今党中央是非常重视和很诚恳地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和意见的。

党中央决定整风，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预见到这运动的必然性和它的必要性；说明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是发展着的，进步着的，而不是腐朽着的；这说明我们人民还需要而且应当由共产党来领导，虽然运动还刚开始，但我们有理由来深信这一点。

（2）民主运动由群众自发，是自下而上的，要求改革（不是推翻）制度。

一旦整风成为群众性的运动时，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是群众自发性的民主运动必然兴起，这是客观事物开展的必然规律，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民主运动正常地是

随领导的预示而导发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而不是敌我之间的。否则，民主运动将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在“造反”。

说到这里，我们还不能肯定：党预先完全估计到今天的运动情况的，运动中的许多现象表明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从此得出党落后的结论。我们深信党在对待和解决这民主运动的问题中是会体现出它的英明和伟大的。

(二) 运动中存在着的问题 (1) 偏激情绪：话闷在心里闷得太久，一旦倾泻出来，言词、语调上的激昂是可理解的。受过“三害”伤害的人更不用说了。这现象是不太好的，所以大家都在改正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是运动中的重大问题，而问题却在于，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偏激情绪”当作运动的障碍来围剿，而把“三害”却丢在一旁不骂，我们希望参加围剿的人仔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围剿是不是就等于保卫社会主义？(2) 习惯势力：为数不少的人都是这样，在习惯势力控制之下。他们的心地都是好的，对党非常信任，但是他们不习惯于思考，一旦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们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要是有人（保守者）对这新问题加以歪曲和恶意地引伸出其它结论时，他们就更加激昂和愤慨了，“指责”就像骤雨一般地落到提问者的头上。

对于这种被习惯势力控制住的人，我们深为同情，并且要与他们携起手来，在运动中一道前进，互相启发和教育，发扬辩论、独立思考的风气。

(3) 保守势力：这种保守分子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好心，更谈不上信任 and 爱护党。给他们取个浑号——“三害”的卫道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们思想贫乏，理论空虚，他们的演讲和文章，只是教条和口号的堆砌。他们腐朽、没落、软弱无力，是永远阻止不了运动的前进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缠绕，往往浪费了我们许多的唇舌和精力，他们搬弄许多好听的口号，有时还能欺骗住一部分群众。以后，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吝啬一些，在群众面前揭穿他们后就够了，不要再跟他们多罗嗦。他们的脑子已经僵死，只剩下躯壳了。我们要摆脱他们，大踏步地前进。

(三) 党将采取的政策和步骤我不是党员，不能肯定党将会采取什么政策和步骤，现在我只能理论上作几种可能的推测，并略加分析。

(1) 仍然决心彻底整风，欢迎和支持民主运动。

这将是党最英明的一着，是适合于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它将使运动最顺利地前进，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

(2) 整风缩手缩脚，忽视民主要求。

这是愚蠢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许多现象表明就是这么一回事。要真是这样，其结果便是“整风不过一阵风，批评建议又落空”。这样，矛盾没有解决，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3) 物极必反，大开杀手：这是人们想也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但我们不能不想到其可能性。（哪怕是 1 / 10000 由于它的严重性，我们不得不重视。）显然要是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即会转变为敌我矛盾，党将自己否定自己，人民会不惜再度流血来争取民主和自由，争取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四) 运动的几个阶段 (1) 继续揭露矛盾：运动开始以来，重点是揭露矛盾。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现在已经进入探讨和争辩的阶段。运动深入

了，思想细致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和停止揭露矛盾。有些人由于顾虑，还没有说出内心话；有许多问题，由于习惯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来，在探讨辩论的同时，我们还应不断地广泛地揭露矛盾。

(2) 深入研究，在理论上解决问题：这一阶段已开始了。拿我校来说，已经树立了独立思考，深入研究和说理争辩的风气，这是可喜的，但不是人人都如此，有些人还假借种种原因（功课啦、身体啦、考试啦、与业务无关啦）不愿动脑筋而袖手旁观，甚至不闻不问，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是应该密切注意社会运动和国家大事的，是应该对各种问题深加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的，要求民主，就得有民来主。

(3) 要求政府整风有头有尾，监督政府进行制度的改革和改进：这是整风——民主运动的最后、最有实际意义、关键性的决定整个运动的成败的阶段，要是没有这一阶段，或这一阶段的工作搞得不好，整个运动必将残缺不全，前功尽弃，一无成就，或虎头蛇尾，达不到什么效果，不了了之。

可是一些人却往往忽视了这一阶段，忘记了我们这一决定性的工作，他们之所以会如此，不外由于这几种想法：(1) 整风是党的事情，我们不过是帮助党整风，提些意见，批评一下，也就算了。

(2) 民主是党的恩赐，给多少算多少，不必强求。

(3) 党是英明伟大的，会知道怎样做，一定会做好，用不着我们去多操心，更用不着监督。

显然，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因为：(1) 整风的确是由党领导，针对党本身的事情，我们是帮助党来整风，这却不等于整风不是我们群众的事情，把群众当作客人，只能看党的面色行事。就像病人请医生治病，医生帮病人治疗，不等于治病不是医生的责任。医生是客人，医生只能将就病人的口味来下方。何况党害了病，受苦的不仅党本身，受难的是全国人民（是医生）。

(2) 民主运动是党的恩赐吗？决不是。诚然党领导着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民才拥护党、爱戴党，要是党不全（心）为民主而斗争，它就没有这一切。要是他停止为民主而斗争，它就会失去这一切。为民主运动而斗争是作为党领导的必要条件，是党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说民主是党的恩赐与说生命是上帝的恩赐是同样的愚蠢。

所以民主不能是给多少算多少，而必须充分而完整。

(3) 党的确是英明而伟大，的确会知道要怎样做，我们也深信会把事情做得好，但是这一系列的“确是”“的确”“深信”是基础，保障这一系列的是什么呢？是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是群众对党的爱护，是群众对党的监督，没有这一切，这一系列的“确是”“的确”“深信”是不好存在的。

同学们，同志们：整风——民主运动是与我们血肉相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是运动的主人，我们绝不能看谁的脸色，绝不能将就谁的口味。我们懂得怎样对待敌人（反对公有制者），我们懂得怎样对待朋友，我们懂得怎样爱护我们的党。

让我们更加团结起来，将运动推向另一高潮（第二阶段的高潮）。最后的，全面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社会主义公有制万岁！

社会主义民主万岁！

说明：12 本文未引任何材料，这些材料周围太多了，举目皆是，请同学们自己去挑（若高兴的话。）3

三害根源

张锡镔（一）制度问题制度可以笼统地讲，不必加注解，说什么具体制度，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一些人一说到制度问题特别小心，硬要加上具体的制度，制度的环节。这样一来可小心翼翼地说小制度，很小很小的制度。

（A）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制度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完善地步。必须破除人们对具体制度的迷信。

（B）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这也不是个别环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些相似。官僚主义一定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一定是官僚主义。两个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人的思想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仅是产生三害的一方面；而目前官僚主义普遍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历史上程度也不同，这又为什么？这是由于制度不同。

要扩张它还是收缩它，是制度与官僚主义接近还是远离，民主还是独裁。

如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程度不同，既变成社会现象，就要从制度中去找。不然，为什么会变成普遍流行？因为有些制度便于成长。

在我国 1954 年宪法出来后，人们乐于歌颂却忘了切实保障。如肃反时人身侵犯，以后又压制人们发言；又如 24 斋的牢房，公民人权无保障，法制不健全。又如损害名誉，动不动就是立场问题，一些人利用统治地位损害人权，败坏社会风气。

官僚主义者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不是不知道。领导也不在乎，一手垄断，在人权无保障下作威作福，表面上（还是喊）为人民服务。

又如选举制度，选举几个提名几个。对选拔干部，不要光是来个工作积极，是个什么模范的介绍，还要考虑他们的思想方法。有人对在大饭厅投票，大喊幸福，这难道是心坎中发出的微笑？实际上我们并未干预政治生活，连被选举人也不认识，一提意见就加上“反……”“反……”层层选举没有直接选举好。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选举方式好。连班上也如此。这就更不必要。一些干部总商量把谁调回来，调回来干吗？强加于同学头上。

集中制度上的问题说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往往片面强调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集中多，阶级斗争缓和以后，人们思想意识落后。如工人委员会比厂长制就好。注意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政治上落后进步在宪法面前应平等。但并不如此，如考大学许多人因政治条件不好而不取。又如政治课必修问题。明明宪法规定有信仰自由，而又规定教徒必修猴子变成人；这平等吗？（C）不民主的统治方法，人民从何处监督。光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形式主义的签字，权限不下放，实际上讨论机关都无权。

（二）可耻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思想懒汉，满足于作应声虫——恶劣的社会力量，对领导盲目服从，对指示盲目推行，对下压制。

若没有这股社会力量，官僚主义不可能到处横行。人们习惯于体会领

导意图，以为左倾比右倾好，以为这是自己具有的身份，天生如此，还自认为立场稳。不体会反面就会夸大矛盾，强加于人民头脑中，以为人性次要，阶级性重要。一些人在以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良心何在？要摧毁这股力量，必须有积极力量对应声虫回击，尤其是抬轿子的人。

（三）思想上的问题这与宣传机关有关，要消灭家规的矛盾。我们作的应是教导人们接近客观真理，但同学得到的是教条化的东西。

“愚民政策”——凡是使人民是非模糊的宣传都是愚民政策。如保密制度，连永利碱厂碱的产量也保密（化工老师讲的），这除了增加人们的愚昧又有什么？经济上绝对数字的保密，相对数字的迷惑人，如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中谈各国生活增长倍数，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优越的结论。增长情况总与基数有关吧，同一水平比才行，这就是愚民，使人信服得五体投地，造成印象不真实（而政治经济学就好些）这就是扩大矛盾。此外航空学院连牌子都不挂，其结果也不过是愚民。有的地方连蒋光慈、黑格尔的书都不许看。又如科学院、原子能、国防化学方面的保密。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宣传上的片面性，也许我说这个又会来个立场问题。过去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天堂，都说成是“最……”“最……”这等于告诉人们不要再前进了。还要什么实现真理？连政治先生也说过：“过去对社会主义宣传得太好，几乎完整的没有缺点。”要全面认识，好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切无可取之处。

科学宣传的片面性，自然科学方面对摩尔根一棒子打死，对自然科学要谈阶级性，扣上一句唯心，加上一棒打死；把罗蒙诺索夫说成十大家，石像放在大图书馆，似乎一切文明都成了俄国的。偏要如此灌输，使人们不能认识客观真理。对斯大林盲目崇拜，对经典著作不能批改，当作神明，从这意义上比作圣经也不算错，教条主义统治比作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上可与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统治相比。

从前宣传苏联一切是天堂，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农业落后，官僚主义者在银幕上出现足见普遍，但也说明了英明。又如匈牙利问题，从前宣传得一切好极了。匈牙利事件爆发以后原来乱七八糟，这难道我们不知道？只是有意识地愚民。

又如南斯拉夫问题，过去一切骂够了，现在只称之为社会主义，难道会不知道？我们党水平那么高，难道是不是社会主义也不会辨别？到现在资料还是知道得很少。

愚民政策问题，不动脑筋的人得到欣赏，有意见的人就一直压制，我只管效果不管动机，有些问题党不是不知道，除了增加愚昧还有什么？凡是混淆是非都是愚民政策，不管动机好坏，但导致效果怎样呢？人民盲目崇拜领导，便非常欣赏，认为立场稳，于是积极分子提拔成了官僚主义。用信仰代替知识，首先是信仰，把知识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就是不要人思考，一棒子打死，效果就是爬上去，说好听点是领导，说得不好是统治，在思想上把矛盾拿开。

上述三方面汇成了一股洪流。

卫道者“逻辑”大纲

张锡镔近来，不少时髦之士纷纷出头，一些人对卫道者一味进行标榜，场尔者为在“卫道者”三字前，冠以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是更美的字样，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却说明了“卫道者”离开了那些用以吓人的字眼而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对教条主义者的嘴脸，我想还记忆犹新吧，它之所以厉害，不就是装出一副马列主义的面孔吗？不就是拿着镀有马列主义的皮鞭在那里挥舞吗？所以我要提醒你“朋友，这已是老面孔了，群众不再是那样容易被吓到的了”！

另外一些人，企图把“卫道者”和群众混淆起来，其不过是想欺骗群众，以达到迷惑一部分群众去与“卫道者”为伍的目的，故必须把“卫道者”的面貌，用下面大纲方式描绘一下，以期稍微明晰一些：逻辑大纲12345678910 凡具以上属性者“卫道之士也”。

人性的呼唤

张锡镔人在形成过程中，人性亦随之形成。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性也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内容。但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人开始具有了另外一种属性——阶级性，加上人们的种种阶级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阶级矛盾的掩盖下，被冲淡了，被忽视了！（如各种酷刑的出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本应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由于过分地强调了阶级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绝灭人性的东西无阻地发生了。（在各次运动中），对阶级异己加以私刑。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体摧残。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者对人身进行了无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健全，所以这些恶劣现象在社会上未被有效制止，所以社会风气开始败坏。

儿子可以对父亲任意谩骂，甚至将其捆绑、鞭打……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于是扣大帽子之事风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计的想将人证明为反革命，所以把一切生活琐事以及开玩笑的话，都搬来作为口实，而进行荒谬的推理。将其推向反革命的边缘。（当然，若有一点可能，早就被叫成反革命了！）朋友，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愿望，难道你的同学就没有生活下去的起码要求吗！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来！！

“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

龙英华先讲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对《人民日报》社论的评论。我认为重复大家知道的东西，就是教条主义。

过去反社会主义言论藏在心里，现在说出来了，很好。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扩大，说出来我们知道了，有利于思想改造，有利于给我们上课。我看反社会主义言论有这些：我所要的是理想的社会，要不要社会主义无所谓；“党天下”，共产党可要可不要，民主党派和党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宣言，不承认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有人主张由下而上地搞，像波兰、匈牙利的方式，这样国家生产会受到损失（暴动、罢工、罢课）。

整风是扩大民主，可以和教条主义斗争，斗争后可以出现新事物。

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指：“这是为什么”等），用辩证法看，好的是主要一方面，缺点是次要一方面，全部否定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另外有教条主义（全部肯定）和修正主义（全部否定）的态度。社论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论是正确的，因为需要提高警惕性，但从辩证法看，也有不好一面，对恐吓信的分析不深刻，对怎样区别反社会主义言论分析不够，给了教条主义者以把柄，如临大敌，不分好坏，打击积极分子。

“自由主义宣言”出现是一件好事，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北大大大发扬。大家知道了它存在。不要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的一边去，要客气一些，说理吧！我们占了半个地球，心胸要宽大一些。批判右派，右派可以转化，转化了就不叫右派了。

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比马、恩时已大大变了。但有继承性，列宁、斯大林学说是发展。现在来论述下列问题：一、世界向何处去：这是关键问题。有些我也只是“猜想”，恩格斯曾说：只要科学在发展中，总是需要“假设”的。我认为世界是人类大家庭。人类的共同敌人是自然界。自然界与人类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人类不分阶级在自然面前是一致的，在氢弹面前人类有一致的利益，一丢下不管哪个阶级都被炸死。所以大家感到战争打不得！（当然我们还要预备氢弹）战争有转化为和平的可能。人类对抗性的矛盾有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这样战争转化为和平、变为人类进步。

美国有（一）亿多人，有六千多万工人，他们生活得很不错。英、法、西德工人阶级也类似。你去发动武装起义试试看！过去美共教条主义碰了钉子，脱离群众，教条主义破了产。英共也破了产。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胜利了。法共也像胜利。国际工人阶级共约两亿（苏联 5000 万、美国 6000 万，中国算个 2000 万吧，算四口之家，工人阶级家庭人口共八亿。全世界人口大概 26 亿，除此八亿还剩 18 亿。农民算它个 16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最低目的上要有共同点，所以总应该团结改造社会党人，只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战争。然而过去教条主义者把工人阶级让给社会党修正主义了。教条主义使社会党都与帝国主义合作了。

用理论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全世界来一个百家争鸣。欢迎社会党人来作报告（但仍要准备氢弹）。欢迎杜勒斯等等他们来我国争鸣，但我们也要派人去宣传，和他们交换，看谁是真理。在人道的基础上，在氢弹和死亡威胁的面前，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无论过去和未来都是能在个别国家里提出来，作为全世界口号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口号会脱离群众，不管加多少解释。资产阶级比我们高明得多，搞了专政，但不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斯大林的口号。中国毛主席加以否定之否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共产党情报局用争取人民民主的口号，来代替专政更前进了一步，可吸引更多的人，可团结资产阶级，比人民民主专政更高

明的口号也可以提，再否定之否定，如共产党情报局提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你到印度搞无产阶级专政试试看，谁跟你走？只要保证党的领导，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是的确不当的。“一论”“再论”题目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但提出的五条经验中就没有提这口号。

在我们国内由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专谁的政呢？——专政对付帝国主义，国内主要是人民民主。这一名词关系很大，弄得不好混乱自己。英国提不妙，意大利讲议会过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很好。我们要使民族主义向我们看齐，民族主义国家，欧美政府中的某些人士都拥护社会主义，可是我们的口号把别人吓跑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过时了。

我们要夺取全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过时了的制度（对敌斗争时的（口号），不适合于今日）教条主义像喜马拉雅山，压在社会主义国家头上，出了波、匈、苏事件，人民不得不暴动，老是老一套解释，实际上是反对百花齐放，妨碍言论自由。表面赞成发扬民主，实际上阻挠。这样我们人民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在工厂、学校中没有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时有利的制度，现在变成了官僚制度。肃反前的工厂一长制，左得厉害。肃反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以党代政。

管理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左倾管理制度的改变，才能发挥潜力，1 可以竞选，上边批准，这样选出来的人，不能是高兴就走群众路线，而是非走群众路线不可了。

同在我们的领导集团，情况是中间大，两头小。上头是英明的好领导；中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官僚主义，不好不坏，不适合今天需要；底下是“三害”分子，或违法乱纪分子，让他们下台！

2，特别是在评级之后，干部基本配备全了，下级没有机会提拔，因此矛盾很大。仁人志士新生力量不能吸收到领导集团中去。现在大概有 20 不好就罢免，否则他们脱离群众后，官僚主义仍可能出现。

我们可以先整风，再选，希望中间类的缺点能够克服。教条主义不愿谈这个问题。

入党也要结合选举。现在入党的加深了危险。因为这些新党员容易被上头和底下两类人所俘虏，虽然是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斗争性差——在整风中可看出来——被不好不坏的干部，坏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教条分子喜欢教条分子，官僚主义喜欢吹牛拍马者。毛主席说共产党不改造要变成国民党。我看共青团不改造要变成三青团。47 年我在学校和三青团斗争过，很知道他们那一套，有些共青团像三青团员，现在多少共青团员就是用三青团的手段来对付整风积极分子。有些党员不动：以为这是站稳了立场，这是消极分子，他们反而要打击积极分子。消极的留在党内，斗争积极的反而喊要开除出党，岂有此理！（声色俱厉）

二、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苏联最近分全国为 105 个经济区，这是大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人说苏联是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错了，但反映了官僚主义厉害。

我们的气量要大一点。可以和资产阶级妥协。把资产阶级帽子摘掉了，有何关系？我们如果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开展，可胜过 10 亿大军，10 亿个氢弹。我们搞好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马列主义基础讲社会主义只讲经济基础（工业化），文化革命（原子能化）还应有政治基础（民主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

在社会主义中，说有新阶级，即是修正主义。但是有阶层，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不同，意识也不同，因此分作阶层，各阶层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斗争是次要的。但可以转化。这是阶层斗争，如匈牙利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转化了，官僚主义是压、打，矛盾就转化了。

三、北大（往）何处去？北大在全国各地的人均有。应当在理论上好好讨论这些问题。要求民主办校，民主选举：学校三害主要表现在教学制度上。

应当让学生多读、多想、多写、少听少背。现在我们教学只是拼命往学生脑子里装！装！装！在上课时讲 100 个问题：50 个——众所周知，40 个——一看就懂，还有 10 个信息量。教员是政治宣传员而非科学家。我看毛主席叫把功课砍掉一半的意见是很好的。对文科都合适。

我主张搞理论斗争，理论弄通了，再从上而下的搞。我曾和谭天荣在一个晚上商量过，他主张走出书斋，让全国学生动起来，工人动起来，农民也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搞。我是不同意的，我主张搞理论斗争。

我认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是生产知识的劳动者，他们学习动脑筋就是生产知识。应当由学生来选举学校领导……。我一个人想得还不够，大家动脑筋想想吧！

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群学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把少数人的力量以过高的甚至于离奇的估计。表现在思想上的个人崇拜，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

（一）个人崇拜在历史上产生的原因，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之际，由于某些人有杰出的劳动生产的才能，因而被大家尊重这很自然，因人总是想生活得到改善。随着剥削关系的形成，少数领袖们为了满足自己无害的欲望，就在原有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加上一种威力，因此就有“威信”之说了。人们有爱自由的天性，有爱平等的本能，奴隶受不了压迫，反抗的怒火燃烧在整个奴隶社会。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必然是十分凶残镇压反抗者，此外还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那就是领袖们有惊人的本领，仿佛有移山倒海，扭转乾坤之势，如何英明，简直未卜 L 就什么都知道，奉若天神。此外，更有利用、歪曲宗教主义，麻醉人民。

打开中国历史，真是举不胜举的此类事实，直到蒋介石，他也懂这一套，不过他以复古之名，扼杀新的思想，实行愚民的政策等。个人崇拜的法

律保证，也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巩固个人地位的卑鄙目的。今天的教条主义者，能和上例诸位“媲美”，他们不许有人对政策的怀疑，不许有人对现实问题的切实的讨论，同样以政权的力量保证他们在思想斗争中取得专横的独裁的“胜利”。表面上说的一套是“科学，发展，真理”；实际上做的是：“顽固，唯心，愚民政策”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下面就深入其产生的根基。

(二)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之初就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不崇拜者要说话，许多说道理者的遭遇不会很好。就党内来说，几次重换中央机构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严重的互相争权倾轧的惨景，美其名曰：“党内斗争”，瞿秋白之死有一半是自己人杀的，把自己同志的错误看成不可饶恕，这也说的过去，然而把自己人也看成敌人似的，这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品质。

这是为了争得个人超人“威力和信任”的一种初级形式的表现，因为在1930年前前后后几年里整个革命队伍人很少，不能有很大的威力。

与此相伴随的是乱杀自己人的罪行，远在“井岗山”时候，就有这情形，(有记录者：毛泽东：“农村调查”中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的下落不明的被杀，毛主席也在后面加了(?!))，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被枉杀的自己人。

(三)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旷野。因为像选举中，特别是县级以上的选举中，干部几乎不摸，这样领导者自身来讲易功臣自居，趾高气扬，群众看来，党……(原文如此编者注)

(四)更重要的是深刻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以往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个人崇拜的产生是自然又必然的，而今天说法很多，而且称为“卫道者”们害怕提出“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产生，他们认为这样说实际上就否定了公有制的优越性，就反对社会主义……不得了！但是，我都不以为然，因为事实是事实，正视与否定还是客观存在，我的看法是：是由制度产生的，这是因为上层建筑的产生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习惯势力是不怕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利用政权，习惯就可能改变，它以至在一短暂的时期内起一点阻碍作用(如婚姻问题)，同时，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无比优越，我们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来谈此问题的。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扶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如(一)中所述。

(五)“个人崇拜”者的理论基础：首先他们强调了一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予歌颂、赞美，进而把它的作用夸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个党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绝群众的意见，而当把党的地位异常特殊之后，再就进一步推崇个别高级领导人员，以至发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话，全部理论基础是：历史主要由个别政党所创，而政党由领导者所创，一切及时指示奉若神明，否认了群众的主要作风。

(六)为什么马列主义理论中早已肯定了群众是历史真正创造者而实践中，实际上政、经、社会地位如此分呢？这就是经济上的特殊逐渐形成阶级，利用政权，不许人民说，压制批评。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制度”来保证

群众以可对领导者进行监督，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有十分严重的缺点，它只能在书本上，讲台上反对个人崇拜，丝毫没有物质的力量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个人崇拜是制度产生的，这并不是说必须推翻这个制度，而是说必须彻底改变完备这个制度。

（七）消灭“个人崇拜”的办法。

必须调整经济悬殊、社会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吸收劳动人民参加政权，建议领导定期换人，各省政府主席等也应轮流担任，劳动人民中杰出的先进人物（劳模先进生产者）应做领导工作，领导者必须实质地参加体力劳动，而不是形式的去几次，在这些条件下群众看到领导并不是“神仙”。也许有人说此时无法工作了，回答：相反真正的领导，应以自己劳动等各方面才能、忠诚取得群众信任。（后面还有几行，下雨看不清了——抄者按）

我看民主

叶于泮最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引起同学们广泛注意，这不是偶然的。我的这篇东西，简要地说明个人的初步看法，愿与同学们共同深入探讨。

一切社会都有民主顾名思义，民主就是群众自己支配，影响自己的共同事物。只要有社会，就有民主，因为分工协作的生产劳动，本身带有互济的性质，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各个形态的社会都有民主，作用的范围不同而已，民主生活由来已久，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合作的扩展深化，民主生活必然地随之相应发展。因为：第一，个体愈是依赖于集体，对社会共同事务就愈关切，民主要求就愈迫切。

第二，个体在经济共同体中的地位愈重要，民主要求就愈快得到实现。纵观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如此。

民主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带有阶级的烙印，统治阶级允许基本阶级的成员，享有较多的民主，以便集中其阶级力量，镇压被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则力图缩小其民主权利，以分散力量，削弱反抗。

不能认为民主只涉及阶级斗争。原始公社的集体议事，公选领袖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现，也不能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消灭民主。

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几百年来“民主”一直是先进的社会理想，资产阶级唤醒了民主精神，随着转化为它的敌人，无产阶级宣布自己为新的民主旗手，但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却作得很保守。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也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均等机会，但是这种巨大的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开。

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手段，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还存在，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目前民主居于服从地位，但又必须充分利用民主这一有力武器，才能团结全民实现反帝建国任务。

但是也是目的。既然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建立更高类型的民主，就必须承认它也是目的。

民主化问题上的保守倾向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是存在这个偏向的。（目前

已着手纠正)表现在人民群众不能确有把握地监督国家工作,法制不够严肃。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没有彻底实行等方面,这种情况大大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我们的国际威望。

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们现有的政治理论,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个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日益显露,并尖锐地反映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为了消除“三害”,发挥全民的积极性,单党整风是万万不够的,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和建设。

为此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实际压力、限制,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

欢迎和同学们讨论,请来找我或留下地址姓名。

回答

叶于注应该声明,我没有义务回答作者问题的,这些问题本身表明不尊重人权的粗暴态度。也许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拐弯抹角地用发表日记的形式来提出质问。

作者问我:你的忧虑解除了没有?为什么迄今未表示态度?为什么个人的“忧虑”要印发传播?从这些咄咄逼人的问话里,我闻到了逼供的气味。

然而这究竟是主观臆测,又焉知作者不是一片好心呢?所以我决定回答他的问题:(1)看了《胡耀邦同志接见了我们》一文颇有收获,例如我知道了“有人要毛主席下台”的话不是他说的,那只是潘家威同学的不是了,但是这篇报导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了我的忧虑。胡谈的只涉及到我所谈到的许多“迹象”中的部分,他也没有否认,他把当前整风鸣放和陈独秀王明事件并称为中共历史上的三次大风浪。

他对这些话的解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请查阅“答辩”一文)。我和许多同学一样还是希望党中央派人来校报告我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以及中央的决策。作为党外群众,我是无权过问党内秘密的,但是假若“秘密”牵涉到国家社会的命运问题,那么我以公民的资格要求参与。

(2)我印发“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理由有三:其一,把我的想法公之于众和大家共同商讨。其二,假使我的想法有部分真实,那么就能起到引起大家注意的作用。群众警惕了就可以防止把“鸣”“放”化大为小,甚至半途而废的可能作法。其三,假使我的想法是全错的,并发生不良影响,那么上级领导也会出面说明情况,这对于解除顾虑、深入鸣放是有好处的。

这些意思,全在“答辩”一文中说得清楚,作者不是太冒失就是太健忘。

“广场”何罪

叶于注这几天来“广场”受到各种各样的恶毒攻击，包括人身调查，挑拨性的中伤，甚至把“广场”编委说成欺骗钱财，用心叵测的阴险分子。无疑的，这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广场编委是极大的精神压力，迫使我们去正视自己的工作缺点。但是我个人也有想不通的地方。我要问“广场”有何罪过，而劳如此“声讨”。

因为主编说过：“广场”是北大同学的刊物吗？因为我们选稿时，表现了自己的倾向性吗？因为我们是同人刊物而不是团委会、学生会创办的吗？因为我们的看法不为某些人所欢迎吗？因为“广场”编委不都是可靠的人吗？到底是因为什么？种种责骂到底何由而来？又来自何方？“广场”一开始就慎重宣布它的立场、性质、目的、编委名单、第一期要目，并请同学们监督批评，我想作为一个新办刊物，所能向读者表达的最大诚意也莫过于此了。现在它的第一期还在痛苦的难产中，还在种种的重压下挣扎着，而竟有人意犹未尽，还要加上狠毒的目光，还要加上震耳的咒骂，恨不能婴儿死在母腹之中，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想的。正直的人们，能够思考的人们，我再次向你们提问。

“广场”何罪？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王国乡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我们盛赞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它（他）能“顺其时”。要不然匈牙利的火焰也会在这里燃起，反革命乘机混水摸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将受多大损失！

有头脑的人，也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某个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如果人民的义务只是“服从领导”体会领导意图，那么“三个主义”在运动中被整掉，还会再起。

也许一位“无头脑的人”来一个条件反射，大呼曰，“怎么！你说社会主义不民主，就是要资产阶级民主”。你否认集中……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反社会主义本身……”。

天哪！别激动，你的思维失掉了联系，要知道，“要民主”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等于“要资产阶级民主”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否认集中”不等于“反社会主义”。我说我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因为它没有使人民免于贫困的自由，我要集中，也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据。但是我要说：如果只集中，没民主（我国只是民主不够）就会变成秦始皇或法西斯；专政是对敌人，如果对人民，人民就会打

倒你。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最优越的，因为它铲除了剥削——（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保卫它）。但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领导方法和精神生活，都远不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反过来破坏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

林希翎林希翎 5 月 23 日在北大第一次发言（根据记录整理）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

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

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察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明知错了，不承认，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从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给他工作。

在革命胜利到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制造的，这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这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朗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有十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群众哗然）。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来后，苏联还质问我，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察呢？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群众轰她，少数人欢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

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有部分群众鼓掌）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来。

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都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群众轰她）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群众中有人喊：不要煽动。）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吧，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实际生活中的 1%，因为这些教授都是老头，很世故，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是放了，但我还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群众轰她）同学们，我们说话要警惕，不要让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在她发言过程中，群众递条子，要求制止她发言，并且有条子骂她是“臭娘们。”）她讲完以后，有三四十个人围住她，要她继续讲。有个学生还找她签名。另外一个女同学说：我们要警惕煽动性的话！旁边一个学生打了这个女同学两下。（后来这个打人的人溜走了，没有找着）接着有人发言反驳她的意见，提出质问，她又作了三分钟发言。发言未完就被群众轰下台去，有二三十人推着她到大会旁边另一个场上让她继续讲，她讲到她过去的部队里，知道部队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从马寒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还说：过去在我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非常神圣，我也很盲从，后来才有些转变。

我的思考

林希翎社会制度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实际上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问题。

任何社会现象要从社会制度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基本原理。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本身找答案，社会制度的概念定义是经典作家所能做的事，所以我是不能下定义的。但可提出看法：社会制度应分两部分，即基础和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基础现在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摇的，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比私有制前进一步，所以有人提出定息 20 年应该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私有制的继续，取消定息的时机完全成熟，应该成为公有制。

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缘故。目前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表现出教条主义非常厉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谈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特别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

人事制度：不合理现象、宗派主义反映在此明显，并不是以德才衡量一个人，而是看资格，看是否是党员、切员，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不仅要看

现象本身，而且要看这些现象的怂恿者和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有些人把不好的东西归于旧社会，但是就是在新社会里，青年提高也很少，青年希望求知，想听报告、看材料，但有等级限制，为什么青年中存在虚荣、名利，和现存制度有关。有些党员是为了享受特权，而跑到党内，不入党就没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团，说你入党入团，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决，我听了很生气，要这样我一辈子也不入团。

等级制度：干部发桌子、纸篓都分等级，等级制度已深入到各个方面……产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这些小的制度（等级、人事、保密扩大化）组织了总的制度，具体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适应的，是私有利的产物。

我国教条主义的统治在这些方面只是宣传光明的一面，现在有些人还说夸大黑暗面，有人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样使单纯的青年到了社会，看到这些问题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苦着脸而消沉下去了，教条主义害人一点也不奇怪。

基础改变但思想意识仍是以前的，三害和过去的封建性、买办性、法西斯性有关，如宗派主义和封建性、法西斯性有联系，教条主义与买办性有关，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谊不可破，但把苏联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讲话就像个打字机，苏联医学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组织疗法害人不浅，无痛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这都是由于处在迷信的状态。

我不赞成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隶思想也出现了，要在巩固基础的前提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现在也认识到这点，如现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但这不是唯一方法，这不是根本解决，群众不一定是需要他们来干活，而是需要他们来办好事，当然整风是良好的开端。

关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讲，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大家讨论。我说这是客观规律，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时，这个规律便起作用。

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仍起作用的，当阶级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可以被用来利用，存在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要有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条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矛盾是看问题不一样，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爆发成对抗性，要看到现实生活中这个规律在起作用，领导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不加主观能动性克服的话问题就会发展。不同的地位产生看法不同，本来是被统治者，但一旦爬上统治（工人爬到厂长），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一切也就变了。

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片面地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

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的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

关于“对现实不满”谈一谈对现实不满的问题：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的。将来会有更好的社会。如果我生活在五百年以后的“X”社会，我也会不满，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对现实不满是应该支持的，而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成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后看不向前看。教员讲课也是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

有人说不满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歌颂是需要的，真正的歌颂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颂，吹牛的歌颂，这样会败坏人心，真是害人不浅。要把现在有什么问题老实的告诉人民。

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统治者是有局限性的客观规律也存在，因为有公有制为基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没有根本对抗，所以领导有可能认识这个规律，党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见党认识了利用了这规律，克服这局限性，从党过去、现在和将来准备实行的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问题如何办？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法制问题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

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棘手。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

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检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检查。很让人气愤，法院审判的结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贯”的现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

公式来定罪的，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层领导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继承过去统治作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错误呢？多少人被害呀？改革措施用什么措施来改革？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形式。团、妇联、人代会、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实际上公民得到多少权利？选举是安排好的，劳民伤财的布置工作和会场。

根本的改革要发挥群众智慧，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中央应该在整风基础上抓紧整党、整团。整党问题不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因为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是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由许多等级制造成的。还有一批中等的人不坏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思想，过去的党员强调“老实”，给爱人写封信也要汇报，成天谈思想，我看这些人可真没有思想。对于不起作用者，应该动员他们退党、退团。

入党、入团不仅要党团批准，应该有 70% 以上群众表示同意，而对不起作用者，群众还可以罢免他。党团不应有任何特权，他的特权应是人民给的信任，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要在物质上给以特权。这样使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入党多好？否则，他可以不入党。

在干部问题上，现在报上登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很同意。把企业交给职工，这是很好的。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感到是主人。

干部的提拔一定要群众同意。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资格吃饭。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可以辞职，可以罢免。我看这好，我们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过去下放往往好像是犯了错误，升上去就高高在上，这样继续上升，还能都当毛主席吗？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倒可以竞争一下，在我们国家里，当然这不需要。但这说明能多提意见是好的。部长们调换一下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是很好的。

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谈谈同学提出等级的存在，似阶级分野，然他为免和自称“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者”晓舌，不提“阶级”二字。小区区非神非圣，就十几年来对革命运动所见所闻及亲身领悟发表如下浅见，希大家补充事实，并加理论深究俾使达到改善现况之目的。

一、远在 1945 年我闻浙东游击队纪律严明，帮助农民抱不平……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目睹善良正义的兄弟壮烈牺牲，深深同情，此外我也知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道理，在年幼的心灵里撒下要翻身，要平等民主自由的种子，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

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视……。

二、谈到“阶级”的发展，就要回顾一个什么是“阶级”？根据马列主义，我们知道它是社会上的各种集团，它们间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在生产中的地位（指支配或被支配）、产品的分配、社会上的地位等所决定的，从土地改革彻底胜利之后，接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后，旧的阶级关系粉碎了，因此从现有理论上看来，我国已基本消灭了阶级，“卫道者”们没有想想，1957年的今天理论已大大落后于实践，而你们都却以此为满足，高而躁的干叫“社会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这和佛教徒求菩萨活一千年的唯心愿望有何区别？我们要问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在发展？如果旧的过时了，也就是说死亡了，那么怎么会万岁呢？如果喊马列主义精神万岁，还是对的，因为它主张科学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死保住陈腐的观点去作阻碍社会进一步完善的人。

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自然这与旧的不同，它有独特的特点，粗略想来有以下几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在的占有已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少，集体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这点现在一时不易看清楚，如果看一看分配关系就更鲜明。

分配，中央一级干部（或称万岁、九千岁、八千岁……）（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许农民比还恰当，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为40~60几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即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他极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回生产之中，我们可从讲课中知道，中国许多中等资产阶级他的总资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因此，纵然形式上不是剥削关系，但实质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许人们要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高级又复杂……”此话下面再谈。

我们要问，如此悬殊难道是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换吗？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感兴趣，自己规定的。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等价（指劳动量相同）交换，不可能相差800倍，因为试想象：你周围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创造如此多财富？毛主席等他们劳动竟如此珍贵？若告知天下农民赞成者我看寥寥。

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而易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至少换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

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变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过美名曰“通讯员”，实则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仗势欺人屡见不鲜，（可看报）此外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务监视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最凶残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他们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实为依据，纵然枉杀者也有，但试看北大有200余人斗错，被捕者两人，也是早已有交待过反革命罪行的。可见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威胁，一触犯上层贵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几个月还以淡淡的道歉。可见这种也可以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媲美”，“卫道者”们会

说我没有“立场”，但我试问：人民不要听娓娓动听平等自由无剥削……美好无比的社会……然而连生命也无保障，人的尊严随时可被侮辱，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愿拼死，不愿再存，简直是牛马的生活!!!

历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总是为了争取群众，与人民一起骗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脚踢开群众，借故屠杀功臣，（朱元璋所作大家知道的）争夺地位名利。在我国现在，也是伸手找报纸或打听一个儒林内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削尖头皮钻入政党，荣华富贵有权，盛气凌人。

也许这个比方过分，但比譬只能相似不等于相等，请看官辨清，这时还在初中一年级，一位国民党军官大叫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国父遗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像煞有介事，事实如何大家都知道，不赘述，今之自命“卫道者”之贵族说“辩证法、唯物论、民主、自由、平等、美好的社会……”事实像顾牧丁副教授只不过过去有些和旧政客来往和胡风也有往来，但马列主义中说：事物是发展的，既然如此，过去有“问题”（?!）又怎能推出今天有问题（!?!）这叫发展吗？再说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江书记说：对顾有“根据”，有检举“材料”没有调查就宣布他为胡风分子，岂不是含血喷人？就思想方法而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甚至还不如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唯物呢！（可参看毛泽东选集谈到我党应调查研究问题——毛主席所说过）因此使人不禁要问：现在的“真实理论”是什么？因为马列主义只是掌权者的招牌而已，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理论指导着。正像辛亥革命流产时一样，现在这样的现实“万岁”下去，我认为革命流产了，假如不急剧地扭转现在歪风的话三、你们会说现在工农生活不是提高了吗？对，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社会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总是上升的趋势，这点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一般收入总比资本主义社会好……。我国工农收入几年来实际上增加不多，仅过吃饱不饿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说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饱等等，来替现在社会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辩护的话，我要问：你也知道我们的眼向奴隶社会的方向看去还是向更合理的社会望去？资本主义不合理，我反对，但我认为现在也不足美，要改变。真正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真正的人民领袖应该是和人民共甘苦，尊重人民的伟大人格；他们是历史的主人，挂羊头卖狗肉者必须下台。

四、新的阶级矛盾和旧的不同，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和平的方法解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暴力——到无可救药时。任何企图以歌功颂德，个人作用，一部分人的作用捧到天上来迷混群众视残的人，在铁的客观现实面前粉碎，丑相毕露无遗。毛主席是伟大的，他知人民疾苦，功劳是大的，但我们更要记住，和他一起搞革命的数以万计的工农知识分子无声无息地流尽了血，党是伟大的，作一个党员是光荣的，但是没有人民也将一事无成，一切功劳应归功于人民（当然也包括党员和领袖），把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划归一个党所有是反历史现实的、唯心的。

五、要彻底改变现在作风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反对口是心非，反对对群众的欺骗，宣传，反对唯心主义的传播，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制止屠杀，监禁无辜的人民！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好

的发挥坏的坚决产除，如果有一个集团坚决违反社会的发展违反人民愿望的话，我想人民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万岁！！一切违反历史发展者的怙恶不悛者应下台！

正义万岁！真理万岁：民主万岁：人身自由万岁！

六、如果有人要驳请针对论点，希勿牛头不对马嘴乱放炮更勿歪曲原词之义，勿断章取义。

——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注）声明我不写姓名，取作“谈论”继“谈谈”同学之后，有感而作，现在卫道者拿着藤条——教条乱打人，我也得知一切新思想刚出现时，总会有反对者出来，而且也很可能遭到迫害，因为几年来事实教育我即使经过一定考验的人也常常口说一套，做另一套。江书记说过，有争鸣自由，我现在深感可疑，其态度也不很诚恳，对顾牧丁之道歉冷淡淡的说一声，甚至可以说还嘲笑他历史上有过问题。好吧，写到这里请提意见。

再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昨××杨君传达和黄良元同志谈话内容（史三中共党员，有一定教条主义习气，诚朴，会思考一些问题的好同志）。交换看法一致。

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之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产品（或相当产品的货币）因此，若分配不好，也就有剥削现象，这时虽然生产资料公有。

目前正是发展悬殊（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制止它发展的因素增长，有自觉地自上至下的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性。

双方一致认为，习惯势力固然是一重要因素，旧社会遗留下来升官的愿望，轻视其他职业的恶习，但这是次要的，它只能在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起一引起阻碍作用，像婚姻问题，有了法律保障，再加利用政权力量，宣传与舆论，习惯势力完全可以扭转，重要的在于规定一定的法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黄良元认为自己受教条主义影响，起初看我文章时很反感，主要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为基础就万事大吉，无需再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新的阶级分野，没有考虑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没有注意到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里制度指具体办法）。

黄良元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核心将放在分配上，如何完善管理制度，不好的管理制度会导向变相的阶级分野，今后他将和同学们长期研究此问题，并提交给有关部门考虑。

与经济上差别相应的社会地位等，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社会，应树立起劳动光荣，各个行业地位平等，这要求分配上，政治上，（即参加一定领导工作等）权利平等，这是物质的保证，否则空谈。

我们对如何改进现在政府领导及党、团地位有初步磋商：1 后天下之乐而乐”建议党员，团员把一部分钱交给组织，作为社会费用，这样实际收入比同级的其他同志少一些。现在恰巧相反，因此没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反而助长了物质享受的无限要求。

2 领导人员应该常换，三四年改选一次，改选出原来的群众中的典型、模范人物’，这样保证不脱离群众，又有个别有经验的人指导业务，就能把行政工作搞好。

我们的不同意见只在于用什么词来表达及对当前程度的估计，黄良元认为只提一下人民内部矛盾，措词认为不重要，知道那么一些意思即可，我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此语太抽象，应该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因此，为了正视现实，重视这一问题，指出新“阶级”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不能轻描淡写地含糊的说一句“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它，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解决，其他都是次要的。

我昨天受凉，不能亲自去，黄良元同志请杨君代为问好，深表感谢。他们的谈话是昨天晚上 7.45~8.45 进行的，在友好、讨论问题的气氛中进行，因时间有限，只谈主要问题，只好握手告别，大家认为有时间还有畅谈几次的必要，很有好处。

声明：许多同志对我提出许多意见，因时间有限，不一一答复了。由于许多误解，以为提出讨论改进公有制中的问题就是否定公有制等等。其他又如措词不妥当、词不达意等等都不多谈了。许多具体材料也可以商榷，但不很重要，因为找一找报纸就有的，主要的是一些基本的看法。本人学理科的，没有专门研究历史、哲学等，文章也写不通，这些请原谅，不原谅就批评，也受得了的。其他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管理制度的问题，本想专题再讨论，因考试面临，一个多星期没念书了，想补一下，不再写文章了。如有同志感兴趣，请示尊址，或洽商约定地点面谈半小时或一小时即解决。本人无法来时，请杨君或刘君前来。

1957

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

沈迪克在古印度，人们被分为高低贵贱的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利，在古罗马.....在封建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在纳粹，有优秀的雅利安人种.....在新的时代人们进步了思想聪明了，等级也就更细致了。有出身世家的特种材料等级的非.....有出身.....的应声虫，吹捧等级，有第一可靠等级，第二.....第三.....可惜我没作过人事干部，不能把这种新的“人种新麻衣相法论”中的微妙之处.....向你阐明。

有人要说，你在这里人为地制造分裂，但是亲爱的教条主义先生，客观的存在是不能因为你的否认而消失的！看看人所共知的事实吧！

留学生问题，大家这点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生产实习的问题，什么机密地方而去什么等的人，在我校也有，请参考航空学院的争论，那里更尖锐。

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问题，某些工作，某些人是不能去的，例证之一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研究，虽然在世界各国早已公开，甚至我们也帮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建设，但它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是保密的是要由些“人事专家”根据人种论细细的划清了你的等级后，钦定的，如果你本来就是贱民阶级，你就今生休想。

在各种运动中，如果你不是高贵等级，那你就准备挨打，挨斗吧！纵使你没有任何罪（请参考墙上那些申冤书）可以证实。

请参考各报上的发言，和前几天报上的新闻记者的四个等级的区别。

好！够了！大家自己想想看，自己日常生活周围吧！只要你头脑还不是空虚到一无所有，你会找到更多的例证的，至于那些想否定这些人，他有不可告人的隐私，正如资产阶级不敢承认资产阶级社会有阶级一样，那是由于他的……而决定的。

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在思想上人的类型的这种划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逐渐的由于有了物质经济基础，于是“向上的心”就鼓励着产生了一批钻营吹捧，拍马屁的，看脸色的积极分子，打击别人，在小班上作威作福的人（三好学生）虽不见得是白痴，但也只有凡事乖乖听话，正如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千娇百媚的姑娘才行的。

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古语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上升到了一个高的等级，就有着许多的特权和物质利益在引诱呀！

譬如留学吧！不就更进了一步吗？这种心情不值得“怜悯”和“同情”吗？听听那种似乎正经的所谓“争取政治生命”的饭碗的呼声吧！当然要是真有愿为共产主义建设贡献一生愿望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在这种呼声后面，人们可以嗅到更多的是米饭和肉汤的香味！我是学××和××的！我好像是第×个等级的分子，即使毕业了，那有什么来保障我的胃的要求和这个要求的进一步的提高呢？还是就加入到谋求等级转变者的行列中去吧！

千万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将会为此在九泉下哭泣。

有些人平常大叫发扬五四精神，可是当青年们真正拿起火炬的时候，就张惶失措了，叫什么和风细雨呀！赶快拿出反党反革命帽子来扣了呀！以及批评“是时候了，”的那首马雅可夫斯基式诗的作者们之流，读者们！用上面我所揭露出的“人种论”去分析一下，就会揭露出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等级”根源来了，本来嘛，这是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

本来我想用“……人的阶级”这个标题，可是鉴于大批书呆子人民大学放出来的散毒的蜜蜂，正是专门来钻这种缝的，为了不作无味的争论，我改了一个名词，反正事实总是事实，至于那批毒蜂的教条主义，大家在政治课上已领略够了，譬如大家就知道“马列主义”的一位教师王××，就是以有名的公式：“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造的原子弹会长翅膀，而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以原子弹长不出翅膀”。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而著名的，好，就到此结束吧，不过我要公开宣布，本文我不署名，是不是不負責任呢！不，这里面还有一个微妙之处，古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家还知道我校有个人事室吧！那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小小的属于你自己的口袋，专门记录尊座的行为的，而且是你自己不被允许知道的，对于国家安全必需的档案制度，我并不反对，但是过去已有过屡见不鲜的例子，由于尊名上加上黑点，于是你就从第几可靠等级降到了第 M》N 可靠等级，将来我在前面谈过的那些东西，就会跟着你屁股转，够你一生慢慢享用了。

所以这点请大家原谅，求生之心，何人不有呢？至于“无阶级社会中的等级（或阶级）”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联系或者会存在多久的问题，可以让书呆子们去争论，反正“有”不会因为说没有而变成没有，“没有”不会因为说“有”而变成就有的，反正“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有名不具，请恕不周谈谈

论牧羊者的逻辑

沈迪克“五四”晚会，我也到东操场去漫步了一番。只见，营火雄雄！一支美丽的红色火炬悬挂在主席台的正中，但令我惊异的是，看热闹的人比真正参加会的人要多，壁上观看唱“团结就是力量”的人比唱的人要多，而更多的还是那些早已割据地盘，心不在“五四”而在“教育的诗篇”的晚会积极份子。

难到（道）在具有光荣传统的北大，青年的热情就是这样“高？”吗？我心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心的读者可想一想，为什么现在的情绪是这种“高法”，而当时是那种“高法”？）但是敬爱的领导者和他们的歌颂者们，是欣赏这种驯服的群众的，他们之中的一个会在掌声中爬上台去大讲一通什么五四的传统呀！继承呀！火炬呀！之类。

是的！他们也歌颂“五四”，上面绘出的就是他们万分满意的一幅“五四的牧歌”，多么驯服的羊群呀！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大都作过“不关心政治”的检讨或挨过这种批评吧！大家想想看，怎么搞的？难到（道）这许多大字报的作者，这许多牺牲了学习和休息时间，甚至端了饭碗来看大字报的读者，是不关心政治，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是只会钻教科书的书虫吗？稀奇的事无独有偶。除了我们这些“不关心……的人”突然变成了“关心”的人之外，那一批大大小小，成天督促大家批评检讨的牧羊人却也同时突变了、沉默了、大多数都变成了消极分子，变成了“不关心……的人了”。倒底是谁为了真理而关心，又是谁为了别的什么而关心，真理只有一个，大家回答吧！

有人说：“青年是年青的，年青的就是幼稚的，幼稚的就是应当受教育的，作为被教育者就应当无知的。”于是好了。

既然是无知的，就应当是规规矩矩的，每个星期你就应该死背六小时的政治笔记。

既然是无知的！就应当是理解力和记忆力也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为了关心你，我们每年把政治课的教材换汤不换药的灌输给你，以锻炼你的记忆力。

既然是无知的！那就不应该有思考力，也不会（应）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

所以羊儿们呀！我爱护你们，遵照养羊的惯例，我已为你们每个小班都挑好了一批顶乖、顶听话的三好优秀羊。跟着他们走吧！要是跟不上，那你就一定是迷了路了，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应该能认识路的。

羔羊迷了路，我该多伤心呀！

由于篇幅，我就不把这个我们学校青年工作方针的“牧羊者的逻辑——既然是无知，就应当……所以就……”再多说下去。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既然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思想方法，那自己也就会去分析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了。譬如，大家都有过开一种只有主席和小牧羊者发言，会场绝大多数沉默，无聊，磨时间的“灾”会的经验吧！大家不要怨主席，他也是人，也不愿意经常处在这个令人精神愉快的窘迫位置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深刻体会大牧羊者对你们的关心，体贴入微的亲热了！

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呀！羊儿们说了话呀！牧羊人大吃惊呀！

牧羊者吃惊了！是的，当第三次“五四”的火炬燃烧得更明亮的时候，你还会更吃惊的！好心的牧羊人呀！我同情怜悯你的倒霉遭遇！

大家说我没有名字，我就取一个，就叫“谈谈”好吗？

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

钱如平先生们，同学们，同志们：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

您们的欢迎太多了，我并不很欣赏，因为这只不过表示了我原有的良心，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有偏激的情绪，有恒怅那些剥削阶级气味未尽的参加队伍的人们，挂羊头卖狗肉地危害人民，因为我接触过了老革命干（可能遗漏一“部”字——抄者注）和游击根据地出来的同志，那么亲切，难（可能是“艰”——抄者注）苦朴素，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知道他们是直率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决不讳言自己有病，我深深地感动，心里就想（可能是“向”——抄者注）他们学习，做好自己的榜样。入大城市后，不少现象看不顺眼，在这里仿佛“浪费”是一种“阔绰”的表现，少数党员粗暴地对人，和自私地抢“吃苦”的专业，我很反感。我想，人为什么要装出虚伪的面孔？我声明，对经四同学主要关于分配原则的论点表示赞同，新阶级（指对抗性的）不存在。此外，他们其他的具体细节上，我认为他们有教条主义，如关于工资问题×（不表——抄者注）要什么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制度等等，是教条式的搬用唯物史观，当然要考虑，但实质上有原则区别，一为劳动，一为剥削，如斤和尺不能比也！基于现在主要反对右倾分子，他们企图推翻我们政权，这样就没有我们讨论的前提，故其他问题也不能讨论下去了。以后再说。

对经二同学表示遗憾，他们文章往往文不对题，泛论很多，具体分析很少，其实我们知道你们所说的具体的为什么得不出阶级存在的结论，并不是喊口号和威胁恫吓所能解决的。

如果我认为自己分析是正确的话，——如果没有他人说服我才不怕威胁呢，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倘使真的有新阶级存在，那么就不难找到新的阶级力量，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语），也可以这

样说新生力量是不可被战胜，纵然旧势力如猛虎，你们大××（不清——抄者注）亲眼看到腐朽的国民党，表面上很强大，但内部土塌瓦解就要如山倒的，因此，经二妄想以恫吓代替说理，想的太可笑了！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不能杀服我！

在打退右派分子进攻以后，我将继续写文章，批判那些教条主义，并继续要对那些打肿脸充胖子，不敢坦白地承认自己错误的“三害”分子，要进行辛辣的讽刺，对具体问题也将提出具体办法和步骤，希领导考虑，我自己家之事，也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他们处理。

我不得不感谢一些好心的朋友同志，同时对口是心非表里两套做法的朋友、同志供予一个友好讽刺。

有人说我悲观，“什么自己的子弹打死”，这不然，我指的是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

——谈论——

论阶级的发展

钱如平近日，自《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后，说我神经质的人们，不摸摸自己屁股，是否神经失常，正像肃反时凑5%反革命一样连忙到北大乱找，如同见猛兽闯入燕园，大声疾呼“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神经高度衰弱的人们，一听“阶级”就魂不附体，并说：这是在扩大矛盾，转化矛盾，啊！看官：岂有矛盾能因我之如此认为扩大，如果真如此，那我高呼帝国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质矛盾，那么英美法资本和工人矛盾便日益扩大（严格的单调上升）则资本主义立刻就灭亡，用不着工人斗争了，用不着世界和平运动支持了：我认为：客观事物，并不因各人认识不同而变质，不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列主义”者，我以前文中明确指出，叫口是心非，讲的马列主义，做的是比佛教徒还迷信、唯心，此等人祸国殃民，要求下台——一个公民——社会的主人完全有权提出，有权干预国事，有人指责：“你在遭反驳后，无事可做，进行神经质的谩骂、……企图溜之大吉，”真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凡言之成理者，取其精华，凡狂暴无理攻击，教条主义乱扣帽子者加以驳斥和辛辣的讽刺，揭露其丑形若“州官”“判官”“无常”“百官”又若苍蝇——臭而令人讨厌，使染霍乱，这叫谩骂？不仅不懂文学的A.B.C，而且听了干瘪的叫喊，“以理服人”后，也不考虑自己身上的回声？我是新社会主义的主人，宪法明文规定，谁敢侵略人权？为什么要溜走？臆造者未免太荒谬！奉劝先生上卫生所看一看病，现因考试迫近眉睫，无暇详论，故不打算现在作一一回答，暂时谢绝参加“辩论会”。

鉴于景升伟同志基本态度真诚，姑且不论其以“教育”者的口吻，既然要求回答，说清楚，好吧，我撂下功课，给一简明扼要的回答。如果还有

分歧或不清，请写出真实姓名，房号，以便登门参见，指教，本人尽实际时间可能作一回答。一次不行，可互相保留己见，言论应自由，帽子请勿乱扣，你们批评我结论太早，我接受，不可希勿将此原则，只用于对人。你们也没有什么十分充足的论据，以“显然”代替材料，并把“后果”作为原因，逻辑上矛盾，如此争辩，我只好适可而止地应付，这里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用笔名“谈论”的原因，一则有前车之鉴，有不说理的与自称卫道者成天纠缠发现他见者，二则表明我只作“谈论”不可能专题研究很透，有正确部分希领导考虑，有认识不全面而误者，希解释，“论”者指讨论，集智求知，而不打算作论文。政治不是我的职业，我不允许超出笔名之外对我污蔑和诽谤，歪曲……言归正传，写下主要论点，由列宁关于阶级定义出发，试看现实：

- 1 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因并不握在群众手中，一个工人并无权干予生产。

- 2 高者有不合劳动应得报酬者，（不然为什么要工资改革）多得部分可称剥削。

- 3（详见报纸，从生活小事到政治权利，我们只可叫万岁，不可叫“九千岁”，只能称——“级”——能叫一“品”从表面条文，口头说到实践，有差距离 $d>0$ ）。

- 4 杀功臣，只要举一例，就大字报来说，为什么崔书记态度冷淡，这是相信群众，有辨别是非能力吗？确信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肃反时，为什么片言只语讲错了话，就杀鸡用牛刀式的用四人彻夜监视一个公民？（可去[问]28，417 这是信任乎？他听说钢院有一人跳楼自杀，告诉良友——党员同志，然在肃反时竟以“考试期”把此消息告诉党员，“妨碍他”学习，“居心何在”不是老虎？这是对人民充分信任？你们会谈，领导缺点就无关紧要，反正你们个别缺点四个字是和全国各地都有，北大就斗错了 200 人、清华 200 人，（见清华同学在驳命与病写的）全国反革命有 5%（史梦兰语），由此推出北大也不相上下，如此皆反对人民之信任乎？我坚决反对敌人，必须彻底肃清反革命，然我不赞成借肃反之际，硬把自己人往敌人一边推，甚至于进行个人意气报复，以及借口调查材料不多，“斗出材料”来的做法。这实际上也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收集材料，什么是功臣？人民！

是的，党很伟大，能正视并改造现实，见到有“阶级”出现的危险就设法改善，管理机构的官僚化领导像“阶级”，这点在上次“再论”中有重要更正“即可能”代替“正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初，也以管理者出现，后来就逐渐不过问生产了！新“阶级”概念引入，当然与旧的不同，因而也不必害怕，算新的阶级矛盾的解决可以用和平的群众监督的方法解决。目的在于便于认识现实，在当前算内部矛盾也可，然而太抽象，我企图从经济上，政治上阐明矛盾来之何方？至于“内部”二字指出了多少具体内容，你们不喜欢用“阶级”那么就用“内部矛盾”二方面人也可。

正像你们“喜欢用”领导的缺点和全国皆有，北大就 200 人斗错同义一样。

“平等”、“民主”、“自由”颂

钱如平封建王朝造风，继承历史传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应该颂；杀势腾腾来势汹，血腥气味浓，小百姓拙作，上奏商榷；因才疏学浅，有措词不正确，已声明注释，然今日“州官”装眼瞎耳聋，“卫道者”斗错百姓，口致歉意就行，吾之解释声明，为何杯水车薪？你们屠刀霍霍向我逼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之枷飞近；我尝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文明，不敢再点灯争鸣，“谈论”要逃命，罢，罢，罢……祝你们万古长青！

子孙若苍蝇！

原来特权思想“兴隆”，悔不当初自己太朦胧，总可向“百官”争鸣，更不该舌战、笔仗去交锋！

斯大林之幽灵仿佛长存，“土刑”不足，外国货运来，判官、无常，请快宣布犯“叛国罪”我打算从容走向“断头台”！

罢，罢，罢……祝你们到处横行，儿孙绝技更加精！

再为历史辩护（摘要）

S-C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都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对付他的反对派——这是由历史本身所证明了的。

如果证据确凿，胡风是反革命，那无话可说；如果证据不够，法律学上不能构成胡风的罪过，那同样无话可说。我的理由如下：一、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控制了部分出版事业（如臧克家的诗集，要牛汉批准出版），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办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然而崇拜法律的人，看不到这个社会规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级斗争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统治阶级有它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他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镇压反对派，以期保自己的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残酷，所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一个规律，他们在九泉之下应该欣然瞑目，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要伟大，因此这个朝代的冤死鬼人数最少，而又是因为了大多数人而死的，让人们看看迭更司（Charles Dickens）的双城记和雨果（Victor Marie Hugo）的九三年，再看看中国史书和西洋史就会摸到革命前程序的特性，浑然醒悟，而不至怒发冲冠到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来达到红色的目的，他排斥人道主义和人权……等使人糊涂到耸人听闻的说法，请问诸位，听到哪位党员说过人道和人权这种话吗？没有，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 C. 托尔斯泰主义中“爱”和“善”的意志，而只相信马列主义的。

四、近年文艺界的改革，似乎是采取了某些胡风的主张（如表演制片小组，刊物独立……都却与胡风意见暗合），但是这是文艺界的自发要求，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是故意说成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请提出你的论点。

限于篇幅，不能畅所欲言，请同志开辟论坛，进行辩论（我已看过胡风的材料和某些参考资料）。

组织手段过时了（摘要）

马云风工人阶级对全民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政策领导应该坚持到阶级消灭为止；而用组织手段进行领导，现在过时了，应该立即停止。

我所说的组织手段指下面四个内容：第一，本质上以党代政的各种手段。如工厂、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以及许多党的地方组织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等等。用这些方法进行领导的结果，就是党说了算。

虽然党没有禁止别人提意见，但是只要党没有改变主意，不管对的错的一切仍按原样进行。如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虽然存在着基本上代表着教职工的校务会议，但它只是个咨询机构，院长有最后决定权，而院长个人又要服从党委会，这样人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党委会犯错误，于是受害的不仅是党内而且是全院。党委的级别愈高，权限愈广，这种危害就愈大。

第二，公民的选举权不平等。如 50 万人以上的工业城市的人民，10 万人选举一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其它城市和农村则 80 万人选一名代表。其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虽无明文规定，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可能通过，虽然大会上是多数同意，而实际上是少数人同意的决议，也就是说在国内人民之间有发生少数人强制多数人办某种事情的可能。

第三，任命行政单位的领导者时，常常是一定要有几名党员而不是以才德作根本条件。这样在才德不够的党员领导机构中，就可能办出错事来。比如安插德有余才不足的党员领导者很多，决定有关科学技术问题时他们不仅很难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采纳别人的方案时不敢轻易接收一个而常常是各个方案的折中方案，这样工作盲目性很大，这样造成的损失，小的几十元而大约能几百几千元的也有。不是党员而才德兼备的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可能性就少多了。

第四，政府、学校、工厂等的人事部门有变成党的常设机构的倾向，人事档案神秘化，这样作就难怪群众不敢说话了，对离自己远的上级敢提意见，对顶头上司则不敢提，学校中毕业班同学说话比低年级顾虑多。因此今天人都有两个影子，一个是太阳照的，再有一个就是人事材料，它不仅跟着你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命运，不准看本人的人事材料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各种组织手段，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就是：不管对的错的，只要是党的决定就能够加载到人民的身上。所以党和人民之间就有发生一种强制性的可能。在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初期，对人民的强制因素或有强制的可能性存在是必要的，而在敌我矛盾转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的今天，工人阶级解决内部矛盾时唯一的办法是说服教育，不应该有任何强制因素。如果说民主集中制本身就具有强制的成份，那也应该发生在国家和人民之间（上下级、多少数、遵守法律等），而不应该发生在工人阶级或政党和人民之间，因为我们睁开眼睛看事实的人都会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先进的，同时也是会犯错误的。联共党犯过错误，中国

党过去也犯过错误，谁又能保证我们党从今以后连犯错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呢？危险的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犯错误时，自己并不认为是错误。因而组织手段可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保证好事贯彻到底，同时也保证了坏事贯彻到底。我看这是组织手段的两面性。有人说犯错误主要是主观主义，因而今后主要是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必须同时指出，过去许多错误的东西，尽管有许多人反对（如前面说过的保定地委一例），甚至普遍的不同意，为什么还能贯彻下去了呢？这不能不归罪于组织手段。它保证好事的顺利完成是主要的，但保证坏事完成的黑暗的一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一种代用品，它既能让好事贯彻到底，又避免组织手段黑暗的一面。我下面的意见就是由此出发提出的，是否正确，望请诸君指正。

第一，党委负责制改成有党代表参加的多数表决制。在任何一种权力机构中（如学校的领导机构）必须有党的代表。他和其他成员有平等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当选的人员中如果没有党员，则党有权派一名或数名代表参加这机构。但是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这样党的宣传、解释教育工作都可以进行，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对全民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的保证。同时它排除了组织手段的黑暗一面，再也不会把错误的或是群众不愿接受的东西施加在人民身上了。

有人会说：“既然党犯错误，你能保证采用这种制度的权力机构就不会犯错误吧？”我只是提醒这些人注意一点，这种机构代表全民（或局部地区的全体），因为全民包括了这个党，而一个党包括不了全民，所以全民总比一个政党犯错误的可能性少。

第二，改善选举制度。除少数民族以外选举权一律平等，用竞选的办法产生代表，政府和人民代表、代表和人民之间建立定期的公开的质询制度。

第三，任命某单位领导者时不要以是否安插上个党员或安插上个群众为原则，唯一的则是：德才兼备。（领导者并不是权力机构，所以和第一条不矛盾。）第四，行政部门的人事机构不要特殊化、党化、神秘化、应该和其他行政机构完全一样。人事档案和公安档案不应该混在一起。公民有权随时看本人的人事档案。

让青年去独立思考

沈以光一、关于个性和独立思考问题整个社会是复杂的。生长在社会中人的特性也是各异的，不能强求一致。如果干涉过多，就会影响个性自由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政府对人们管得较松、干涉较少，因而这些国家的人民获得了个性解放，要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充分发挥了才能，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但是中国数千年来，在封建统治下，个性得不到发挥，使经济落后。解放后，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得到了解放，但由于缺乏民主传统，思想统治还很严，若有人不问政治，要按自己的喜好去发展个性，是不可能的。中学里，总是强调集体主义，一切强调集体活动，框子太小，限制了个性的

发展。应尽量减少对个人的限制。因此建议：(一) 只要大框框，不要小框框，让青年在大框框中本着自由发展、自然淘汰的办法，去发展各自的个性，使其潜力得到广泛的发挥。

(二) 让青年去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幻想，甚至对党的政策、方针也可以怀疑。使青年的“原始思想”得到充分发展。

这就使中国每个人的个性得到了解放，各人的特长得到了发挥；那么，中国的前途，将不可限量，统治全世界不成问题。

自从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周总理作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后，以上情况有了好转。但是最近又强调学习政治，回到老路上去了。

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苏关系不平等，中国实际上处在殖民地地位。苏联专家渗透到我国各个部门，对我国的机密了如指掌（幸亏中苏友好，否则不堪设想）。总之，苏联把我国抓得太紧了。

反对学习苏联一面倒。一切都学习苏联，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中国好像殖民地。

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在中国建立“东方的南斯拉夫”。集中西之大成，搞个综合式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埋头苦干 12 年，各方面初具规模后，就可以松一口气，与苏联建立双方平等的新关系了。

《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

佚名《人民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特别是整风初期）登了大量的好报导，好文章，但这个报纸的基本思想方法，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方向。

首先我表明我同意百家争鸣中应该有反批评，应该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反击，例如，葛佩琦，但是我遗憾的是为什么一谈到制度问题便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一谈到党的领导的问题便是反对党，一谈到新社会中的错误便是希望回到旧社会中去，这种逻辑是已经过时的思想硬化的思想方法，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便是这种思想指导的恶果。（不要拿新旧社会对比来辩论，我们对于肯定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是不见得比你差的。）“党天下论”对不对？我认为“党天下论”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作者一再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为什么编者竟看编戏呢？（从前有人看戏不看戏文怎样，专看演员漂不漂亮）党天下论指出了生活真实的一面，的确就是因为不放心群众在每一个地方放上一个党员做头儿，（不是名义上的而是实际的）才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难道党政不分、有职无权，对群众不信任不是一致的呼声吗？我认为根据“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位的人看问题就会不一致，姑且称之为地位局限性吧，英明的领导就是要摆脱这种局限性，是有全面辩证的观点。试问我们的全体党员都这样高明么？试问最近揭发的矛盾是党员看出的呢，还是群众看出的呢？因此，我认为“党天下”，是三害产生的原因之一。

固然“党天下”而使人误解为共产党为自己汀天下，但是为什么不看

内容呢？为什么不先从理论分析就一棍子打死呢？为了这一点，便给人以反社会主义反党之名么？这与《人民日报》及 5.12 号的大字标题：“不要怕围剿，不要怕打击”形成极大的讽刺。

为什么“政治设计院”就是和党争领导？管理国家是科学，给国家制定政策就需要调查研究，分析比较，试问不给人家充分的资料，不给足够的时间，一上来就表决（当然不是说完全未讨论，不过这样够否）这是科学的态度吗？这样人家怎能表示负责任的意见，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吸收大家的意见就不好？这样就反对了党的领导？试问民主党派参加设计就能篡夺了党的领导，生活会回答的。

（以前那种形式的通过，我看还是干脆不要的好。）（为了避免无谓争执，我承认不完全是形式，但请问不能更好些吗？）为什么不能成立“平反”机构？有人说这样就是不信任党，这真是思想硬化的典型，试问党能保证不犯错误么？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是人，不是神，这就少不了犯错误。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不问政治了。这些人迷住了斯大林，可斯大林少不了犯错误。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害怕人民的监督，生活会告诉人们，这样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帮助党更好地改正错误，从而巩固党？民为帮之本。

章伯钧为什么说话两样，我看这说明了他还有顾虑，说明我们是压服而不是说服洞使他们错了也应该说服，为什么围剿呢？这是对待善意的批评么？（当然对章不了解，是否他有别的问题，本人暂不作最后结论。）写到这里不禁感到，许多党员缺乏党性：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缺乏唯物主义觉悟——实事求是。

请《人民日报》想想，说话作事不要只顾眼前，要给自己留后步。历史是无情的，的确有许多人就是要百年之后才能定案的，斯大林便是借鉴。

希望不要搞出以前肃反的错误，不要给自己再造出些“平反”。

最后向中共和苏共中央进一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有还是没有？没有就公开郑重否认。有，假如不涉及现行的军事、经济……秘密，我看还是公开了好，任何对客观面貌的隐（瞒）和保留都不是唯物主义的。常常有人为了眼前的顾虑，不敢老老实实的正视现实，结果总是自己吃了亏，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经历，希望把眼光放远点，相信人民的觉悟吧，（当然不是说一定要现在就公开，如果有的话请考虑适当时间。）末了希望这篇涉及《人民日报》的短文能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上刊出。

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王书瑶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

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能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历史时期，决定历史进程的人民群众，都是根据其自身的认识水平来取舍一切的，来取舍领导的。任何时期的领导人物，领导路线，都具有时代的特点，都标志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领袖人物决不是一些所谓什么天才，他们一经出现，就会立刻为不论什么样的群众所接受。在中国历次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中国人民过去深受压迫而文化低、愚昧加之无产阶级年轻幼小，所以在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时，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有大量“左”右的机会主义出现，正因如此，在大革命时中央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接受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在十年内战期间又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能接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直到经过两次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才在 1935 年遵义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才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大进一步，以致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因此我们看到，决定一切的不是领导者的思想情况，而是人民的认识水平。因此，一切领导者如果不愿革命遭受失败和损失，就要尽量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必须使他们具有深刻、明快的洞察力，具有一切政治上的远见。但是由于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没有这样作，反而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器，使政权握在少数人手里，致使斯大林的骄傲自满，错误理论造成对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的损害。

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任何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不论以何种隐蔽的形式对人民作用的降低，都会妨碍这点。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了一个可靠的党，它 100% 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决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上明明是写着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一切领导者的作用也就仅在于他应该进行正确领导，不然又怎能称做领导者呢？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就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要在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些什么？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该毫不留情的抛弃掉，正如今天对过去曾与刘志丹共同领导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高岗一样。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群众既然可能因为体验到自己有正确的领导而变成群盲，于是党的领导水平就决定一切。就形成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于是更加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就变得更重要，于是就更要加强……如此循环下去就造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造成了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群众既已变成了群氓，就又反过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

误倾向的发展，——在这种群众基础上，它也不能不发展——同时，任何党本身的错误又必然要来影响群众。如此，又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两个循环到了一定程度时，党内严重错误就成为不可救药了。

于是斯大林的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而且在他生前还不能纠正。很难设想，如果斯大林活到今天，世界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从赫鲁晓夫报告透视一点吧：即使斯大林迟死几个月，也就会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应该看到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感谢上帝，斯大林早死了，苏联得以保存，更惨重的事件在苏联得以幸免。而在波兰、匈牙利就成了必然，人民在平时不能影响政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统治又是狂妄愚蠢，到了一定阶段就会不借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全国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一个小集团手中的时候，如果小集团尚能服务于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可能认识他，一旦小集团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的抛弃它，正如拉科西——格罗集团被匈牙利人民抛弃一样。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权，一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什么自封的改造者与领导者。匈牙利人民、波兰人民与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鲜血及巨大的代价。这些事件应该敲醒一切睡梦的人，而把它完全归之于反革命的暴乱该是何等的愚蠢！

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 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 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 70%的中央委员啊！1100 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我想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必要的。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为了矛盾（敌人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就必须取得内部绝对统一，因此，我这里决不是全盘否认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

但是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是希望大家来共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超出了本题的范围。作者的希望是大家都来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参与国家生活，拿出中国青年固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神情。

几句衷肠，运动开展已经两星期了，凡大力参加者无不感学习压力之重大，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来讲尤感其甚，欲放不得、欲鸣不得，不能不令人深思学校当局对吾辈鸣放之大力支持也！虽然如此，亦不避艰难，敢抒胸中之见，以呈与识者。

时间紧迫，精神紧张，文章不当之处故必极多，尚有不敬之处，拜恳鉴谅一二。

王书瑶谨识（注：该文原题目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

岑超南上次两篇文章招来许多意见，主要是“太刺激了，影响效果”我接受，现在我摒弃一切刺目的字句来详细论述我的观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除三害要从更根本出发：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所有文章的中心精神只不过是论证一个早已公认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如果错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那应该从错误者本身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来寻找原因，但如果错误已经形成社会风气，那么只能从社会目前状况才能分析其根源，所以我认为除三害，首先要挖根。只有“铲草除根”，才免“春风吹又生”。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任何错误措施都要在一定的群众中间贯彻，一定要暴露在群众面前。所以如果民主生活正常，人民有实际上可以行使的民主权利，就会对三害群起而攻之，三害自然无法成风，事实上为什么大学中三害较社会上为轻？因为学生爱“闹”、敢说！

为什么今年毕业分配有根本的改革？因为我们不答应了！所以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

另一方面，“三害”的形成总要有社会力量来贯彻，这力量便是党团员的盲从成风，党团员是社会的骨干，没有党团员的盲从，任何错误都行不通，例如没有党团员“绝对服从分配”的盲从口号，以往错误的毕业分配方式是不可能维持贯彻，所以盲从风气使党团员对三害的斗争，被解除武装，所以这亦是三害的根源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从西语系同学案件、张顺有事件等都说明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法制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我国解放前处于封建独裁统治，丝毫没有人民权利，形成人民对做“官”者都畏之如虎，默认其有莫大权势。在解放后，由于长期尖锐阶级斗争，要求高度集中，人民民主受到很大限制，政府人员集中了很大的权力，因此当人民遭受违法行为时，竟习以为常，不敢回击，如肃反中对人都有随意软禁、监视的权力，这显然是违法的，而我们竟熟视无睹，如我本身的接触，在入学以前我工作时曾经协助税务局向工商户催税，当时便有一个税务员把一个欠税的小商贩押到税务所，审讯监禁这人，这是××违法的行为，而当时我竟以为平常，甚至还做了帮凶，审讯时还记录口供，因此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尊重人民的人身不可侵犯。

二、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人民监督的可能性，权威化的人事制度使个人前途被操纵在领导者手里，转×的鉴定会使人遗恨终身，所以在这情况下是谈不上人民的民主监督。

二、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事实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任何的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来压制，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党团员是三害的间接支持者，盲从与“三害”不可分割：党团员是国家的中坚，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者，祖国的伟大成就与你们名字分不开，反之“三害”成灾亦与你们分不开，请别激动，只听歌颂，不听批评，又是三害的梦想。盲从亦有其社会根源，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团员对反面意见抱有反感的情绪。除了“光荣、正确、伟大”便没有其他的教条主义教育，××“有肯定一切”的成见。在尖锐阶级斗争中，党要求党团员的绝对支持领导，来衡量党团员的立场和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党团员对立场、党性有错误的理解，把任何××的不同意见都认为是“立场不稳”“党性不纯”这便完全陷于盲从，完全××绝了思维，更甚至把××了，视为积极，打击××英雄。

盲从与三害是不可分割的，××的××领导方法，使领导人习惯于以行政命令代替群众教育工作，客观上便要求有一批盲从的骨干来贯彻工作，由于领导掌握大权，于是对盲从者表扬信赖×××××××这便鼓励了盲从风气的发展，盲从发展又转而使领导者陷于“三害”，又更鼓励盲从，于是可为因果蔚然成灾矣！

整风应该是全民的大教育。

执政党的地位使整风是全国的与全民的事，在整风中除党员整风外，更重要的是启发人民的当家作主精神，敢于斗争，勇于监督的精神，×××××××整风，我坚决相信，人民起来了‘一切幽灵都会被扫光！××我××人民无敌！人民万岁！

（划×者系看不清的字）

特殊阶层，安息吧！

岑超南一、在党团员上层分子中有两类人：第一类：领导所做全是对的，经典著作的话全是对的（以前联共党史的话也全是对的），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这种人实际是从未思想过，还自以为对党有利。可怜！

第二类：纯粹个人主义者，无非利用职权达到个人卑鄙目的。可耻！

二、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墙与沟的作用。

（1）向领导主观歪曲报告同学情况：（2）维护领导“威信”压制民主。

（3）当领导作出不合理措施时加以帮忙。

（4）后一类人更进行了私人报复。

三、怎样产生的：——领导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

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之产生！

四；应该怎么办——领导清除“三害”。

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

声明

陈奉孝《自由论坛》这样一个小型刊物是由我发起的，现在出了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我知道这有可能把全校的矛头引向我的，因此，我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一、你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的目的是什么？答：我发起创立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想把全校同学关于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的意见集中起来，因为我深深懂得一个人的力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好建议，喊破了喉咙也起不了好多作用，往往会遭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逐渐被压下去。但是如果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下股强大的力量，官僚主义者就不能不重视我们，群众也会敢于支持我们，因此我想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保住这个讲坛，使大家有讲话的地方。

二、你们为什么要出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答：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许多同学所以对党不满而不敢讲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肃反运动的不良影响和副作用，许多被错斗的人到现在还不敢讲话，党的具体负责者还没有向他们道歉，我们希望勇敢的人××讲话。

三、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还是要搞集团，这样做是在故意××矛盾？答：是的，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但并不限于此，还要争取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这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掉了官僚主义这股恶风，就会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要整风整得彻底，整得好，就必须提出扩大民主范围的要求。

我们是要搞集团活动，但是我们要搞的是民主集团，不是反党集团，我们要攻击我校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太浓厚了，如果这种官僚主义的习气继续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他们是代表党的，攻击坏党员与攻击党并不等价。

四、你们这个刊物命运如何？答：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把它保持下去，不仅在整风期间，以后也想保持下去，如果可能，我们还希望把它改成油印和铅印，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文艺修养也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困难是很大的。

大家不敢讲的话却可以到这里来讲，如果有人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十一字看不清）一定给你保密，我们的刊物绝不受官僚主义者的左右。

如果有人关心我们的刊物，可以直接到 28 斋 426 号来找我交谈，如果学校领导人怀疑我们要搞××，提出质问，也请直接找我交谈，不必捕风捉影，追究别人，如有问题我愿负全部责任。

许多人在怀疑我们，也有许多人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怀疑我们的人让他们怀疑去吧！我们并不害怕，对我们抱有热望的人，有话来讲吧！我们绝不辜负你们！

如此伎俩

陈奉孝自从我校反右派开始以来，保守派为了挽回他们已经破产了的名誉，为了挽回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竟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

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第一，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第二，保守派拼命制造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头上，好像只有他们才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似的，利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威胁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争取群众。

第三，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破坏别人名誉，把人家说成是小丑，坏蛋，流氓和打手，以便造成群众对这些人的怀疑和仇恨，从而孤立他们。

第四，虽然保守派利用了上面的手段，但他们也还很清楚，还有许多人支持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大多数的同学对保守派还有怀疑态度，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他们现在正在对某些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逼问，搞得他们思想混乱，用威胁的手段逼他们承认所谓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找出这次运动中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

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同学们不信请等着看吧！这样手段保守派迟早会施出来。最后，我们必须申明：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因为我认为“三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要根除它必须依靠群众力量，所谓小集团在根除“三害”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保守派们，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我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跟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顾什么情面，把你们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讲出来好啦！

我绝不会怪谁。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保守派们！你们不是掌握着权利机关吗？那么，你们现在就用吧！不必再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了。

保守派们！虽然看来你们胜利了，但是你们晓得吗？“五·一九”的火种已经播下了，它迟早会变成燎原大火把你们烧尽

最后的宣言

杨路 6 同志们，同学们，鉴于目前局势特作个人声明如下：一、党内

进步势力已和保守势力结成联盟（至少是默契），以打击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分子在北大我不敢肯定没有，正像某些人不能证明它一定有一样。

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民主力量。

二、我是不能同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措施的，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硬抗议。

三、党和民主激进派已由它们各自的片面性而陷于某种对立状态，虽然这主要应由党来负责，但我们如果再僵持下去，对党，对现时还缺乏主见的群众和对我们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局面只是对三害分子和真正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利。

四、民主力量应当退却，这不是向三害分子和保守势力退却，而是与党内进步势力妥协。这种妥协现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人民日报》那篇报导荒谬可笑，要盼望更正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广场应当停办百花学社应当解散，否则不管你们是否进行了反社会主义活动，只要有一点明显的民主要求，除非变成“浪淘沙”那样低级的东西，强权和所谓“舆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向“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战士致敬！希望大家注意到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民主权利除掉它的阶级性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

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在全民平等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时，其他许多进一步的民主要求是谈不到的。

六、在这次运动中，我的路线基本正确，没有离开社会主义，但也有错误，现在还不准备检讨，今后行动方针是：谢绝一切辩论会、讨论会和个别谈话；不写大字报小字报；拒绝参加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学习和批判。

朋友们，希望你们考虑我的意见，避开流弹，我没有力量帮助你们了。我厌倦了，我要继续去念那本“Introduction of Methmathes”七、当别人指责我参与了某些我一直闻所未闻的政治活动（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并以一封不负责任的捕风捉影的来信（曾以大字报贴出，无名氏写的）作为佐证时，提出抗议，不但是我的权利，而且是对压制民主者的必要的冲击，是为民主力量撑腰，对这个抗议竟然使得一些同志过分激动，并且因而要求开除我的团籍、这件事，我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并且啼笑皆非。

八、对于那些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别有用心的趋炎附势者，希望他们得以称心如意青云直上，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学会害臊，能学会尊重自己。首先是作一个正直的人，坚持着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再见了：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则其中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要是没有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也许我至今还

在那人海中浮沉。

6 对于我个人确有过的全部言行，我愿负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但对某些人对我的造谣中伤歪曲引伸，张冠李戴以及血口喷人一概不感兴趣。

“卫道者”们看

徐克学一、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有产生三害的根源不少被批为离开社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对三害根源的讨论。认为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我认为这些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卫道者”们不要慌，不要一听到：“我们的制度不健全……”就条件反射似的举起双手反对，大喊“你的动机何在，你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老天啊！谁还敢鸣，敢放，敢对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谁又愿意做反革命和可疑者。卫道者们，你的脑子哪里去了，但愿不是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使你的脑子生锈了，而在此提供这种论点的证据，动动你的脑子吧！我愿意在此提出一些论点的理由让你们的脑子开动、开动。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被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里，现在，将来还会有这对立的两方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领导者还要组织被领导者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由于领导的地位使得领导者不可能完全了解被领导者群众的要求和呼吁，这样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其产生的条件了，领导者要领导被领导者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民主生活不可能完善，要集中，甚至民主被集中挤得可怜。

这样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墙有沟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难怪有人不敢大鸣、大放，对领导者有意见，想批评前顾后虑，三害得以安然存在，被领导者的处境不可能像领导者看得全面，看得长远？尤其在阶级斗争还没有消灭时，我们的制度，必须规定被领导群众要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指示……。领导者在群众中久而久之有威望了，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某些时候群众只能凭着对领导者信任接受指示和领导。万一领导者错了将如何，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的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斯大林的一个公式，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愈尖锐，为什么曾被奉为经典呢？大家可以想想。我说出了我的意见。条件的限制我不能列举如上的例子。结合我们的制度仔细分析，证实我的看法，但是有头脑者，可以想到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

二、我们的社会制度必须处理双重任务——人民内部矛盾和敌对阶级的矛盾。

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制度，要担起双重任务，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要进行对敌国、蒋介石的斗争，阶级斗争的任务给我们的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缺陷也就成为三害的根源。不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彻底根除三害。问题很清楚，若离开时间、条件、环境，谁都应该承认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还能够组织力量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还能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是根本解决，但比起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要完美，因此我反抗三害根源的讨论时，提出立即根本改革我们社会制度，提醒这些人不要忘记蒋介石、美帝体系的存在。那么不能根本改变怎么办？整风是办法之一，

随着阶级敌人的缩小适当扩大民主，改进某些制度也是办法之一，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因此党曾经整过风，今天在整风，以后还应该整风，时时整三害。

三、莫忘记我们自己身上有不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卫道者”们不要害怕对根本问题的讨论，我看到不少大胆想有意鸣放的人、遭到非治病救人的攻击，我本无写大字报之意，但提出这个问题，刺激一下病人的神经，可谓针疗法。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可能错了，我欢迎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批评，但若有人立刻条件反射式的未经第二信号系统而发出一连串的呼喊，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对我们社会制度进行诽谤、污蔑……，你想挑起人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吗？……那么我要向你大吼一声，朋友、你病了！对于你的病我给你介绍一位神医，请到 16 斋北墙有洪元娟大夫处方，向卫道者同志呼吁的大字报一张，请到该处就诊吧！这是本人写这张大字报的主要意图。再见，祝你健康。

无题

张志武《人民日报》连续的社论使人无所是从，如果你坐在凳上则可看出趣事。看来党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怕右派分子给宣扬出事，赶紧拿出“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大帽子来，把这些敢说话能说话的人一下子扣死。这些知识分子真是短见，叫你鸣，你也得有个分寸呀！哪能什么都说呢？满以为说的越厉害越是响应党的号召，越是起带头作用。结果作了典型。共产党这一招把右派分子打得可够呛，那些借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再也不敢了。原来有顾虑的人这回也看到了现身说法。这个场面看来不好收拾，今后人们都会更加小心了。说话要考虑，首先都要作自我的言行检查。不出一个月，这前前后后都给人们看到了。人们对问题更有了清楚的认识。什么事情都有范围，都有局限性。顾虑不成其为顾虑了，它将变成分寸的出发点，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行。自由、民主都有阶级性。我们有对党对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自由，有和风细雨批评的自由，我们有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力，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权利，没有想什么说什么的自由，没有不经领导批准的民主。

共产党的领导不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怀疑，我们现存政权也不可怀疑，即使你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因为你可打着学术的旗号反党反人民。

三害判决书

张志武被告：宗派主义，年 36 岁，1921 年 7 月 1 日生教条主义，年 38 岁，1919 年 5 月 4 日生官僚主义，年 8 岁，1949 年 10 月 1 日生查被告宗派主义自诞生以来，搞不团结，破坏党与非党团结，迫害群众，造成对党不满。

查被告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死的圣经，不问客观情况，硬按

清规戒律行事，不顾中国情况，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扼杀新生力量。

查被告官僚主义，平日高高在上，不问下情，主观臆断，脱离人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来自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反恶意猜测提意见的动机，加以打击报复。

以上被告由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公诉来院，经本院审讯被告对以上罪行供认不讳。

为了整风，彻底根除三害，理应判处被告死刑，但念宗派主义对加强党性，维护党的利益，保持党的纯洁有功。教条主义虽然生搬教条，但对减轻脑力劳动，防止操劳过度，遵守马列主义（准）则有功。官僚主义对维持（护）领导威信，防止忙于日常琐事有功，减（轻）干部体力劳动过度有功，故免于判刑宣布无罪释放，今后再有骚乱滋事之徒控告那三个主义，本院定判其诬告罪，斩首公众，以儆效尤。

北京大学整风法院

一封公开信

张志武江书记：本来想同你面谈，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以偿，我来到北大还不到一年，对情况还不熟悉，对过去北大存在什么问题还不了解，加之自己又是个党员，所以对“五一九”以来的整风运动就不敢乱云云。

现在高潮已经过去了，更确切点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辩论会消失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只剩了稀疏几张，与当初比较起来，使人有日落西山之感。当初；正像您说的是“琳琅满目”，现在我说是一片凋零，如果说运动在发展中，我们不断（管）好坏是可以的，今天第一步已经过去了，本着盖棺论定的保守主张，现在来同您谈谈这个运动及党委对这个运动的领导。

从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运动，有人叫它民主运动，有人叫它整风运动，反正就是运动吧！我想现在您不反对这句评语，从它的起因，暴露出的问题，群众运动的情况来看，运动是健康的，群众的要求是正当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极少数的，而且是为群众所指斥的，至于有些人言语尖刻，情绪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它的主要缺点是，运动没能直接在党委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您曾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宣布，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但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并对崔副书记的态度表示遗憾，现在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了，回味一下党委是怎样完全支持的呢？我想不出来，是不是崔副书记的不禁止就是完全支持呢？或者他被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给否定了吧！是你在党内的话起了作用吧：记得您在党支部干部会上（党委、总支、支部），叫我们领导党员和群众用大字报或论坛反驳那些污蔑、谩骂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解除某些误会，向那些人讲清情况，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您对党员可否用大字报来揭露三害却只字未提，而且我们法律系党总支委员肖永清同志和张国华同志还告诉党员，党员有意见不要用大字报形式提出，当然这不是不叫党员（鸣）吗？这种作法在客观上就使党员小手小脚起来，妨碍群众大鸣大放，从全校来看，在这次运动中党员和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比较沉默，没能起到积极带头作用，有些人质问党员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党是没有私利的党，这一点8年多的党内生活使我坚信无疑。

在这封公开信里，我提了一些党内的事，照理说党内的事情是不应该讲的，无论什么时候党内外还是不同的，党的纪律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不过要看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党委在这个运动中是被动的，放弃了领导。所以如此，我认为您和党委委员除了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缺乏经验外，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这个自发的运动超出了党委领导是闹事，事前心中无数，估计不足，事情起来了，张慌失措，不能预察运动的进程，只怕出乱子，一味的希望平息，看不到它是崭新的冲破传统习惯的大变革大运动。

如果党委很好地领会了中央、毛主席的鸣放方针，事前有足够的估计，运动起来之后能积极领导，号召党员带头采取一切形式大鸣大放，会使很多想讲话的人能无顾虑的讲出来，会使党团员和全体同学紧紧团结在党委领导下，会使离开社会主义言论及其不应产生的错误言论更加减少，会对三害攻击得更有力，但是您和您为首的党委没有这样做，你知道这个损失有多大啊！您知道这挫伤了多少积极热情的心啊！希望党委好好总结这次运动，希望在考试完了后，或者下学期初，党委重新掀起这个运动，积极领导这个运动，我愿在党委领导下和群众一起，把风整好。

在这封公开信里我提了一些党内的事，是否妥当，请指示。我们的党是没有私利的党，八年的党内生活使我坚信不疑，指出党委的缺点并不意味着否认全党。

此致敬礼 张志武 1957

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

佚名一、现实社会主义并非是世外桃源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连续，它与历史上的社会并没有绝对的变化，要是说，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地狱，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也还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可是有些人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陶醉迷信，好像现在已经到了世外桃源，正如因为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跨进了一大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说着资本主义永恒的梦语。

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大大优越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因此为生产力的高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又突出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就是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它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那么现有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了，但是客观的存在恰恰否定了这种乐天主义的论调，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的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对于现在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当权集团这一点和“三害”的基础已有很多有关文章（此）文不加叙述。

这里向乐天主义者敲起警钟！

“三害”害在哪里！

他们不是鸡毛蒜皮。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在苏联经济上造成严重的损失，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农业，在波兰情况更为突出。

解放后中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教条的搬运苏联经验与盲目的发展亦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并非与此无关。

（乐天主义者，赶快跳出井底吧！）三、解决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的试探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斗争与统一就是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变革。

某些人感到这句话实在太刺耳（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他们是一提到根本变革，就像历史上一个集团起来打倒另一个集团，一个政党起来打倒另一个政党，打得当权者一扫而光，其实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恐惧是大可不必，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条件变了。现在全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觉悟，他们决不愿意返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牛马生活，但是他们坚决要求把社会主义推向更高一步，另一方面现在当权集团，虽然是享有特权的阶层，但是他们的特权毕竟与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大有差别，更何况他们也是刚刚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他们为了打倒旧中国，曾经抛头颅洒鲜血，他们到底是接受到马列主义的真理，在过去艰苦革命过程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紧紧地依靠着群众。

解放后虽然由于他们地位不同，与群众疏远了。但毕竟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我们党的主要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如果党不认真（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斗争发展，不认真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不认真探求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党不对不合理的地方做坚决彻底的改革，如果党不实实在在地依靠劳动群众的智慧与监督，那么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我们不埋怨党，因为认识一般是要在对立面矛盾突出以后，同时我们也坚决要求我们的党勇敢地采取彻底的改革。

为了消除和减少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求党中央尽可能消除党政领导者的特权，（为工作所必须者不在其内）我们认为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作有百利而无一害，作为人民称职的领导者，应该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具有慷慨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其意义还不在于其本身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些开支，更重要的是消除和减少了领导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实际差别，使得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好地反映客观，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目前我国提出的领导人参加体力劳动实际是还太肤浅了，流于形式，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领导者应该基于用他的才能等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群众的敬佩与信任，而不是通过强权和要强权机构存在，就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应该特别重视改进选举制度，同时为了保证以后的错误得到及时的改进，必须树立起有效的群众监督，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

关于更具体细致的道路，还有待全民的讨论，还有待党中央的重视，亲爱的母亲——我们的党，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

声明：12 所以希望不要以战略和策略的观点来对待我们，战略和策略

是随着国内、国际的形势而改变，仅仅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不随这种改变而转移。

论现实社会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虚伪性

佚名现实生活中人们是被自然地划分为各种等级了，不管你愿听不愿听，习惯不习惯，反正是事实存在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权集团与人民之间的差别。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无数铁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请参看“谈谈”同学与“谈论”同学的文章），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

正是这种特权的存在，使得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挂上了虚伪的色彩，有人说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是我国现实社会中最合理的分配原则，是的，要是真的按劳取酬我也承认，问题就在这里，正是人们都认为现在已经按劳取酬了，是合理的分配原则了，才使当权集团享受无上的特权，而在人们之中都变成了天经地义的合理的事情，不，有头脑的人们是会点破其虚伪性的，在生产力这样低的我国，大官们即使在经济上的享受也已大过于其劳！（请参看“谈论”同学文章）。

你想过这种特权，这种虚伪的分配原则的后果怎样吗？它不仅使当权集团和劳动人民隔开了，矛盾加深了，成为现实社会内部的主要对立面。更重要的，同志们，它们就成为了人们“好利之心”之社会基础。有人说现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了，因此丧失了“好利之心”之存在的全部根据。我不免要说这些人有些教条主义，因为他们光搬了前人的话，而忘了等级、特权虚伪的分配原则存在的事实。但要它们存在，那么就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人们对于这些东西的追求和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对利润的追求是有相似的推动力的，只要你不闭眼不看事实，那么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口流向城市，无数卑鄙的人们拼命的不择手段地提高自己的等级；无数的热血青年（徐进、黄坚……）在这些事实的影响下动摇了他们坚定的信心，过于责怪他们是不公正的，最令人气愤的是和徐进一样自私的××也骂起他们来了，不公正呵，人们，社会存在是要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的。

声明：我没有回答语句上硬找出的问题的义务。

本文许多论点是借用“谈谈”同学的，特表感谢。

我等口才欠佳，只作书面辩论。

政治风云

佚名天有不测风云，一星期前的报纸还在大鸣大放，但自 8 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政治气候为之一变陡天来各报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围剿，真是气势汹汹。追究其导火线，乃卢郁文接到了一封恐吓信。于是《人民日报》断言“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信号。”于是工人阶级奋起反击，读者纷纷来信声讨反动言论，《人民日报》以明显的态度给予北京大学的大量捍卫社会主义的勇士们以明确的行动方向，纷纷挺身而出痛击“反社会主义言论”，在清华 29 人事件后，沉默已久的党委会也在同日发出冠冕堂皇的对当前整风运动的意见，于是高潮再度来临，与第一次高潮不同者，目前中心似乎不是整风，而是反对反社会主义言论。

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任何运动出现偏差在所难免。应该注意的是运动的主流，不值得对次要的偏差过分地注意，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意外，卢郁文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就转移了运动的目标。比之以前，如在肃反中《人民日报》曾为一个无辜的自杀者、发疯者发表过一篇社论！曾有一回？？奋起痛击藐视法制，蹂躏人权的行径吗？人命比之于恐吓案如何？推测这次整风运动中这种喧宾夺主现象的原因，可见是自发的民主运动，带有知识分子无政府狂热不合共产党的口味，正如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一样，三大主义的最后根源是少数党员的作风和方法问题。凡超过此定理者，一概归之于反社会主义言论，探讨更深刻的原因，不免触及社会制度问题，“也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合乎这种逻辑口味的整风，不妨称之为“掸灰式”整风。这种整风才是共产党真心诚意领导的，当然，即便轻“掸”，倒底还有“灰”下来，内部矛盾也可解决了，其实今天看来矛盾存在并不影响社会的长期存在。对抗性阶级矛盾存在的封建社会也可以维持数千年之久。如果苏联存在内部矛盾，苏共绝不在意，苏维埃政权不是稳若盘石吗？接壤西方的小国发生的事情，东方大国似无发生之可能，此乃国情不同，如此看，即使没有整风也无伤大体。

尽管《人民日报》强调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一切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可是必须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种种现象的指导之下，报上的大鸣大放销声匿迹了，看来这种做法似乎离整风这题太远，到底不大像话，于是今天《人民日报》又出来安抚一番，指出“绝不能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并再三反复强调善意的批评有时也会不正确的，批评者的立场不坚定，认识不全面，甚至附和右派言论，后又指出“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意批评，所以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进行全面分析”。

捍卫社会主义的勇士们，大概又可在这篇社论中得出新的行动指南。

给《人民日报》的批评

陆坤元最近有人对储安平“党天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批评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批评，我不同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批评呢？根源在于《人民日报》对储安平的发言作了断章取义的摘录，用小标题出的结果。这样对整风是否起好作用，我怀疑。特与同学探讨，并请《人民日报》公平答复。

根据6月2日《人民日报》刊储安平的发言是这样的：（我是根据小标题原文抄录全段含意的）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在全国范围，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作法，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党这样作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一家天下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读者请注意储安平讲“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并不能用“蒋天下”来比喻和理解，而是带有括号的“党天下”即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他指党组织只相信党员，不相信非党的知识分子，至于把这种现象扩大为清一色，那是不对的，但批评基本是对的，更谈不到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样的批评好像叫人不“鸣放”似的，建议党报表示态度，否则有碍“鸣放”。

现将《人民日报》摘录的标题抄下，请注意所摘重点和原意是否有出入，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分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从而形成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清一色局面，我以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最后建议大家两线作战，要对反社会主义言论批评，而更重要的是对“三害”作斗争，今天的形势虽有逆流，但有的是否逆流？我们不欢迎逆流，但更欢迎与非逆流作斗争，假想一个敌人反击一下有什么意思呢？

又似一株“毒草”

陆坤元最近校园中对“三害”揭发探讨少，对反社会主义言论批评多，这是否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我认为反社会主义言论，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是可反批评的，否则会引起一部分人思想混乱，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而我们的“鸣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鸣放”中之探讨“三害”根源，是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等等，一些根本性和理论性问题上，我认为这样去思考问题，就不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我们不能把“鸣放”仅仅压缩在具体人具体事的范围之中，而必须问一个为什么？并且大家来探讨怎样更好地来克服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一步，以使今后不或少犯错误，不再看见或少看见一些人民为“三害”所害，这样讨论问题，并不是和整风无关的。周大觉，谈论，谈谈几位先生认为“领导者的阶级”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某种意义上的“阶级”存在，或还有“等级”存在，这样提出问题引人深思，经四哲四有些同学对这些观点提出反驳，我基本上同意后者的观点，但是我要问一下，前面几位先生要这样地提出问题，

而不提其他问题，我认为他们看到了目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如有的党员有“特权”，同样工作能力，级别比别人高，待遇比人厚（住房比人多，有福利金等……），有的高级干部把家属也送进不应享有的医疗机构中，办公用具也分级别。

科长以上的伙食科员不能吃，而有的党员自以为比群众高一等，把不同思想水平的人，原来只是为了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原文如此编者注）而结果以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群众，损害了一部分人自尊心等等。这说明什么呢？这是党取得了领导地位（在国家生活中）后，有些党员沾染了旧习气，不想在群众之中，而想在群众之上，不想与群众共甘苦，只想个人得利，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思想离开了共产主义，政治上在蜕化了，现象虽较普遍，但是党的性质并没有变，大部分党员还是好的，中央对“鸣放”政策的贯彻，实质上表现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思想，党对错误和缺点绝不容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于是开展整风运动，内外夹攻，使不合理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合法的市场，从这次运动的开展中，也可看到党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统治者”，对人民来说党是领导者，这是原则问题，须划清楚。

现在还是把问题扯回来，谈论“阶级”，谈谈“等级”，以及周大党的“领导者的阶级”正在形成中的很重要的根据之一，是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大家无法否认的，管理权是属于人民所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说的国家行政人员执行的，不过这个政权机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种管理如经四同学所指出的，不能和私有制的支配权相混淆，没有变卖生产资料的权利，而前面几位先生谈到支配权的表现似乎指分配得不均，认为有的人分配多，有的人分配少，领导者物质待遇高。一般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这是事实，问题是这种分配是构成“阶级”和“等级”的物质基础吗？是“阶级”和“等级”这些词含义的新发展吗？若要这样用词则已经变换了原来概念的内涵，好像把人这个概念称呼为动物一样，你说人不是动物吗？不！人是动物，但动物是人吗？又不！动物这词不能反映人的本质的特点，人的本质是有理性的，会制造动物的动物，这就是说，不能从分配多少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须以所有制不同来划分阶级，在今天基本上有两种公有制，就是工农两大阶级。而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若要根据列宁阶级定义死抠，那么到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时代也有“阶级”，因为在阶级定义中有这么一条“……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我们知道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会完全一样的，若说那时候还有阶级。依据这种论点，那么阶级的本质是什么？在对抗性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阶级的本质和剥削相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本质与所有制的不同相联系，这并没有违背定义，关键在于所有制的问题，有人说现在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党中央领导集团所私有，这点大家也明白，党中央领导人民当家，并未把国民财富纳入私人腰包，这样谈问题是对党中央的信任问题，当然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对党中央的信任是什么的这点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是他们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不平等，这个法权还是继续统治者，因为产品是按工作分配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共产主义者是否应该与历史上形成的党外民主人士或专家享

有同等的，由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即享有同样的物质待遇，是否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当劳动人民生活还提高不多的年代“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精神生活严格要求自己，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员的工资按马克思的说法不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其他人员凡不直接参加劳动生产的共产主义者按此适当递减，以与群众在生活中同甘苦，这样做对党本身的巩固和发展也是有利的。

关于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或存在的，或严重的类似公式，我基本上同意，因为一般说来这是事实，抹杀成绩是不对的，但每一件是否可以用此公式来套呢？若此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要求党委会重新分析一下，北大的肃反问题，不能以扩大范围了事，究竟在肃反问题上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错误是基本的？我实在想学习一下，总结工作的方法，以便我走上工作岗位应用!!!

有人看到北大肃反工作错误严重，又看到其他单位同样发生“偏差”，由此推论到党中央的方针是否正确？是否受了斯大林的阶级日益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的影响而搞错了，若此党中央应作检讨，我认为党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搞肃反运动时对敌我双方估计的情况不足，对敌情估计过高了，扩大了打击面，很多人斗错了，这种错误的程度应作何种估计呢？是否还是成绩是首要的呢？还是错误是首要的？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公开的交代，并检查原因何在？！另外肃反运动的方式，我认为可以发动群众搞，但不应开斗争会，因肃反是细致复杂的工作，不同于土改和镇反，因为地主恶霸、社会上的流氓等等是浮在社会上面的，群众一目了然，经过发动群众像大扫除一样，把这些垃圾大部分清洗出去，而反革命分子是隐蔽的，开斗争会实在不能解决大问题，反而把自己人斗了，也伤了人民之间的感情。中央在执行政策上这点是有害的。

由肃反而谈到法制问题，由于三害在肃反上作祟破坏了宪法，侵犯了人权，故要防止三害之为害扩大，必须健全法制，而要使宪法切实施行，须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并拟定一定的制度，保障人民法制，这尤其在下层组织更重要。

总之，三害根源在认识上混淆了敌我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思想上是执政党地位，使有些党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政治蜕化所造成，而在物质待遇上由于收入多，不知道群众生活疾苦是什么所造成的。要改变以上群众情况反映，除了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物质上与人民同甘共苦外，还得扩大民主生活，某些党员思想上不以“统治者”自居，而以人民群众中的领导者或称之为以身作则，为社会主义先进战士作用来帮助群众，共走社会主义，长期“鸣放”很好，群众能替党员经常洗脸照镜子。事实上，群众今天没有党的领导也万事不成，问题在于二者怎样结合，否则党也会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那样的发生危机，建议扩大民主制，同时在党内建立对党员进行定期的群众监督制（除了长期鸣放外）。

对本校运动的一些看法：领导保守时，当初龙英华等“鸣放”对整风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即使个别人动机是“恶”的，恶在历史上也起作用，这点不能否认，林希翎大胆提出问题，刺激某些人想问题，对独立思考的良好作用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她却是揭发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或某些阴暗面，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有好处的，不过他们扩大了缺点，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党失去信心，对局势悲观，或认为会发生匈牙利事

件，他们要举起“剑”像唐·吉诃德那样的与风车作战，甚至要与反革命势力结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由于对实际生活的了解不够，思想方法片面，个人狂妄不愿与反革命结合（如谭天荣）不管你是否承认立场问题，今天客观上你是否真正地为了人民利益是很显然的，现在的客观效果已有部分失去了推动历史（指北大整风健康发展）前进的作用，希望你和你持有同样观点的同学们，应冷静地想一想，别钻进牛角尖钻不出来，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大家欢迎，只是用黑格尔的三段论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套一切现实生活不仅是目前而且将来也会使你碰壁，若你提出像马克思那样否定资本主义而你论证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必然灭亡，我就跟你走，告诉你我也在想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内部矛盾而被否定呢？我认为，目前只有“再论”一文所述在量变阶段说法是正确的，只有通过现实生活大量研究，才能指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是什么？指向何方？目前的结论还是走向共产主义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夜深了，再见！

一个愿在运动中改造自己并影响别人的小伙子——陆坤元

告全校“右派同学”书

黄友剑 1957 我们为什么声嘶力竭地呼喊，为什么我们终日劳碌奔波，什么力量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勇士，是什么理由使我们一直坚持斗争。亲爱的同学们，难道我们是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是为了才子与佳人？难道我们是要使历史的车轮倒头前进？或者是反党反人民？我相信这些话是对我们最愚蠢的歪曲，是时代的疯狂性代替了人们的理智，人们是多么习惯于紧张的阶级斗争，人们对当前的现实——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如此的不习惯，以致我们这些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优秀青年遭受到可悲的攻击。

当然我们自己也犯一些可以原谅的错误，我们的过激的行动，我们过分不相信党的情绪，我们在客观上作了社会上右派分子的政治资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五·一九”人民民主运动开始时所未想到的。这也可以说是此次民主运动中的副作用。

也可以看出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并不是十全十美，它有它阴暗的一面，非在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应该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的。应当承认，事实证明，我们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过于主观的政策解释（虽然责任不能完全由我们这些青年人承担）因而在不必要发起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而发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虽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如此善良，而我们所遇到的责难，却如此的不幸，但是最可爱的小伙子们与姑娘们，我们千万不要为我们所干的不愉快的事而过分地悲伤，列宁不是说过吗？上帝是准许青年人犯错误的。亲爱的同志们，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告诉我们，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并不是保守势力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不是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们承认“五·一九”人民民主运动是不必要的。它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客观上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勇敢地承认错误吧？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也告诉我们在以前所预料的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变革中，

的确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在顽固地阻挠我们前进，他们客观上不愿意无产者们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共产主义，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历史环境而有所改变，他们墨守成规，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人民的命运不负责任，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不管他们以前有过多大的丰功伟绩，因为过去的丰功伟绩，并不能抵消他们现在对人民的犯罪，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放弃那些不必要的民主运动吧！让我们团结在各国共产党的进步势力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克服我们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奔向共产主义！

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

燕遁符光荣的北大学生，确实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

“向民主墙发起人历史系一群青年致敬！向先锋沈泽宜、张元勋……致敬！”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直接跳进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有好有坏，好在免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灾难，坏在人们在精神上的要求非常之低，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相称。

譬如说，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则）感恩不已，无亦不关紧要……。

故在我们国家里，如果不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特别容易产生“三害”。

事实恰恰如此，我们这里的确是民主太少了，（同学们可以举出成百上千的实例说明这一点），故“三害”在全国各地普遍流行起来决非偶然，也绝非解决了个别干部的思想作风的问题就能解决得了。

这使广大人民的智慧用不出来，大大妨碍了社会发展。故从根本上铲除“三害”太必要了，故大量好心人苦口婆心地要求：“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这对巩固人民江山当然是有利无害，但某些神经过敏者认为：要民主 = 认为现在没有民主 = 心怀叵测，冤者枉也”。

这次整风，领导上特意教导我们要针对“三害”，“理论”少谈，大概是领导上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怎么办？老话，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宣传，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绝无他意。）具体的怎么办？1 在现阶段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矛盾尚未充分成熟，除部分大学生外，很少有人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

2 要求英明的领导者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

如果领导者不够英明，怎么办呢？我们的火光可能会暗下去。但是，朋友们，不要紧，矛盾存在着，终会有一日成熟、爆发。等到广大人民觉醒过来的时候，火将更猛烈地燃起，烧遍全中国。

普洛米修斯们，坚持前进！

领导的艺术

朱庆坻大家仔细阅读去阅读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一书，8.90~108 那里揭露产生思想上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可悲的是，非常可悲的是，像《真理报》记者一样找到了过去同样的字眼，不是来对待我们的思想敌人，而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抓住他们个别的字句，就说他们是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者。

回想一下，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了哪些思想上的悲剧：天真的大学生在政治考试时被要求去背条文，背苏联各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内容。

年纪不大的同学在肃反中在严厉的面孔下被错“斗”。

团的干部任意地在背地里对非团员论长论短。

不同情或支持马列主义的国际上的科学家就不得赞扬。

宣称人民代表大会是从下而上的全民的选举，而其实是彻头彻尾从上而下的选举。

列宁所说的，“政治是最吸引人的矛盾”这句话在我校这次民主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然而它在我们的“政治课制度”是无法体现的。

就在这次运动时期，清华大学党委竟动员党员去破坏 29 人的演说。

以上一系列的思想性悲剧是否要铲除呢？是不是由于某些干部官僚主义才产生的呢？这点我有如下看法。

“我们不仅要使国内人民生活得幸福，而更重要的是能战胜任何外来侵略，战胜资本主义确保人民永久幸福。”这样一个问题是高级干部所必须深思的。是啊！

在中国是当家难！人多经济落后，还有暗藏反革命，美帝还在扩军备战，还在搞什么导弹基地，“领导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顿如对于群众的某些不满或怨言尽量拖延下来，只是去处理某些非法行为，只是反对某些干部“三害”行为，不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能够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有利于战胜外来的侵略，那么，这样做是自明的，是眼前利益服从更远的利益。我们回想一下，德日法西斯的士兵的斗志和士气都很强，在被俘之前剖腹而死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头脑固化，不追求真理，不独立思考，而且有着宗教式的信仰。诚然，对于领导者来说，被领导者若都具有简单而带宗教式的头脑，那就太好了，任何外来的侵略都无情地被粉碎。在我国思想领导上，竭力希望广大人民具有典型共产党员的思想：没有个人打算唯党是从，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以党的理想作为个人的理想，不追求文艺和艺术修养，看见不顺党意的言行就激烈地反抗，假如这样的党员不断地成长，那么全国人民将团结在党的周围，像一个人一样，这种人可以称为头脑简单带有宗教式信仰的人，也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光荣最觉悟的人顿如我们认为这种方针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此而努力，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加强学校教学中的政治课，让马列主义作为鼓励人民忘我工作，取消个人打算的力量。使人们经常保持很多的纪律性与组织性，让人们经常沉醉于开会、批评、检讨、

宣誓、保证决心、……等等简单生活方式上，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不应该从各方面供给青年们以精神食粮，更不必去培养青年对生活的各方面爱好和艺术修养，作为“团”应该是加强对青年进行思想改造，加强青年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尽量取消个人打算，最后是争取入党。除了这些基本方向外，在细小处注意培养，例如；我校某党员对某非党团员教导说：“谈恋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若按此，同性恋爱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就是这样的精神的过度表象。

要求人民具有简单头脑并带有宗教式信仰的思想教育方针，最集中的表现在我国艺术事业上。生硬地认为人们来看电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受教育和改造思想，我国出产的“反特”影片所唯一希望收到的效果是：“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人们！你们不要乱说啊！”“人们！你们要仇恨反革命啊！”有时也把反革命丑化得可笑，刚一出现在银幕时，谁都知道他就是坏人，是特务。所谓对“艺术性”的了解在这种精神下，有了新的式样，凡能很好很巧妙地配合“政治性”收到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目的就叫“艺术性”强。这样看来在解放了的国家所出产的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赶不上资本主义世界翻译过来的影片，并不以为怪，解放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另外，对旧的艺术作品不管他多么吸引人，只要他有不健康的思想因素，就要被“禁演”（现在有所改进），其实，在新的影片中，在艰难的环境下，通讯员和女护士的一段谈话表明，他们之所以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保持高度意志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理想“即希望和毛主席见面，和毛主席握手”。在这种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艺术加以发扬，不能收到思想改造效果的艺术加工以轻视的精神下，加上官僚主义，才可能在解放了的的中国发生了伟大的人民民间声乐家瞎子阿炳遭到饿死的悲惨的事件。在这里我应当压制个人的激动，还是冷静地来讨论一下。

有人说：“革命的先烈为了下一代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活稍微简单化一些，公式化一些，少讲点民主，又有什么不可呢？”固然，假如这样做是有益的，那么这种说法也是莫明的，为此来分析一下，显然使生活简单化，开会化，极力培养典型共产党员的这种方针，在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阶层上已收到较大的负效果，可惜，解放后我还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只是听别人说：所以这里还是不讲，希望那些了解农村情况的来谈。知识逐渐增加的青年，要求各方面精神食粮，越来越厌倦那种整日开会、批评检讨的生活方式，要求充分发扬民主，要求个性的发展，这在我校“五一九”运动充分表现出来。

再退一步来谈，假如站在五十年后的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思想领导方针是对的，是保证了后一代的幸福，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施行情况吧！一方面在人民群众中做得还好，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不少人，已习惯于开会，教育、改造、竞赛的生活方式上，要他们在大放大鸣充分发扬民主倒是费力的事，就在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在这次运动的高潮时，很多同时听了江书记说西语系的控诉会开的不好，不对，它是向党控诉的报告时就热烈鼓掌，还有这样的同学，在别人的大字报上贴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还有这样的同学在别人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铲除“三害”时他们宣称自己是卫道者，要出来维护社会主义的道，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甚至在公开集会上宣称要通过这次运动申请入党。他们，就是这种方针施行良好所收到的果实，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党的干部本身，这种方针施行得情况很不好，

对他们不严格要求取消个人打算，对个人的照顾无微不至，从物质生活条件去激发他们的向上心和歌功颂德的本能，甚至用组织的威信和“团”的力量去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在更高级干部中经场焚行盛大酒会盛大宴会，在伏老来京时，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能提高国际声望吗？中苏友谊靠它巩固吗？这样做就人为地制造一批国家食客，更有害的是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有恶劣影响。党员干部不以己为人民的勤务员，不好好铲除个人主义思想，就要产生很坏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应当指出。我国人民武装主要源泉是农民兄弟，党对农民的领导是应该有高度艺术的，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由于我感性知识的不足，我还不能公开地全面地来反对这样的思想教育方针和这样的“领导模型”，也很有可能，假如我做了高级干部、知道很多底细，得到更多感性知识，那么也可能会同意这种方针，希望人民的生活在目前尽量简单化，开会化、宗教化、甚至能够心胸广阔地忍受来自下面的指责质问，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得起我的子孙。

但是基于我现在的感性知识和理解水平，作为一个公民，我向党的领导提出新的“领导模型”，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一个人从内心里十分热爱自己的家，那么一旦有人无理破坏他的家时，他会冒着一切危险保卫自己的家”。这样要使得人民愉快热情地生活着充分发挥民主，真正当家作主，让人们知道国家困难的底细，充分发挥个性，先进的入党的干部不再是拿着“教育你们”，“改造你们”的牌子来对着群众，人民见了干部好像亲兄弟一样，让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人们尽情地歌唱，每个人都仿佛认为，在这美好的生活里不能缺少自己一样。

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

姚仁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沉痛的旧诗句引起了两年前辛酸的回忆。在肃反运动时我虽然被斗了，究竟我错在哪里呢？当时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斗争我时，我的同志竟歪曲事实力图“证明”我思想是反党的，也有个别同志竟捏造中伤我的私生活和人格。组织上抛弃了我，群众被一般歪风所蒙蔽。这种社会性的误解和孤立，给一颗年青的心灵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沉重的。我想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也会为这种无辜遭遇洒几滴同情的泪水。生活中有甚么痛苦能比心灵受伤更可怕呢？！何况自己的良心是拥护党的事业的，刚好就被同志们误解自己是反党的，就连一个人生活的内心支柱也被拆去。亲爱的同志们啊！

你们难道知道由于“三害”的偏见，你们伤害了手足之情呀。难道有谁真的忍心把党儿女，把正直的公民说成敌人，把他（她）们推向虎口去。想想吧！我们应该为以往的委屈抱头痛哭的。我们沉痛地哭以往的误会！我们兴奋地笑今日的谅解：我们从此就会相爱更深，相依为命。

党毕竟是公正的。根据中央规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我主动地协助了党组织查清了我的历史：铁的事实证明了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任何反动政治问题。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检举材料”。党帮助我认识了从前的一些立场不明的言论（主要是1951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由于认识不清受别人影响。说过一些不满当时统战政策的话），并证明我没有反党思想。党的同志也指出我从前由于自高自大在一些同志中激起的反感，以及和班上一些干部同志之间相互的成见等等缺点。最后，虽然我没有被冤枉成反革命分子。但是当时肃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是认识不够的，没有勇气诚恳的对我道歉和在公开的场合恢复我的名誉（包括法院早于去年就因为根据事实性质的不符而撤销了原来对我的处分的判决。我历史上没有受过任何的法律处分及行政处分）。这使我一方面感到党的伟大（因为毕竟没有冤枉好人），而另一方面又怀疑党是否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大公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也曾请求过党委会应该及早细致地加强肃反善后工作，然而党委会没有足够的重视我的意见，显得有些拖拉和魄力不够（如教育肃反工作干部诚恳的贯彻中央的政策）。以至于使很多在肃反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长期在群众中抬不起头来，而且有时还受到一些无理的歧视（如我自己在接受分配工作时就遭受过北大人事室党员同志的歧视和盛气凌人的侮辱。后来由于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去检查了人事处的工作，及我的导师张龙翔教授（党员）和生物系党总支书记陈守良同志能够坚持正义支持我反对歧视待遇才得到基本解决的）。

这些工作中的缺点我再一次向党委会提出批评，希望在整风运动中能够作深入检查。

尤其大家对我校人事处同志们的意见是特别多的，我代表一些受过他们气的同志请求党委会特别检查他们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愿意参加一次人事处的整风座谈会，我要去提意见。希望人事处纠正以往的错误，特别是由于肃反后对很多同志的歧视。

以我良心的正义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除“三害”的整风运动，我深切地拥护，而且下决心用自己的觉悟和认识，公正而热情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这次运动的深刻社会意义不仅在于给有“三害”错误的同志提提意见而已，我认为这是党中央非常有远见的的一个革命措施，通过这次从共产党带头反躬自省的思想改造运动，将为我国树立一种全新的社会正气（或即称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人与人的关系。难道我们能不高兴么！以往的错误和社会歪风将从此了结，真正的同志关怀的友爱和社会正气将从此兴起。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从前英勇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经济和政治上人与人的对立关系，今天英明的党又自上而下地领导人民改造社会思想中的人间关系。人民的精神面貌将为之一新。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幸福乐事将无穷无尽！

当然，问题并不如想像时那样单纯。有很多问题不仅是工作中“三害”的结果，同时也涉及深刻的社会歪风和习惯势力。至今不少同志还没有很明确地觉悟到这次整风对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尤其没有很准确地了解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三害”的危害性。这需要长期、艰巨、耐心、善意的以理服人，以正义感动人才能真正的帮助同志们清洗“三害”，才能真正达到治病救人，才能真正的挽救人民不再被歪风歪气侵袭！

我认为：1955年进行的肃反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的典型的“三害”例子。当然，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绝对需要的，人民也是拥护的，我们当然应该肯定运动的成绩，因为的确查出不少对人民犯有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我国政治局面之更加稳定，党对人民的更加信任，难道不是由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了么！理智和良心不允许我们抹煞事实。

然而，在运动中用极为粗暴的办法错斗了许多好同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么！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应该以政治家的远见和正义的同情去理解由于我们的错误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给受委屈的同志们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和政治侮辱这些难于估计的损失是每一个正直人士不应该忽视的！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痛心的：这是人民自相侮辱的惨痛悲剧呀！

我以受过伤的心灵向不自觉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呼吁！我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良心向全体同志们招请！请相信我们，一个真正懂得了心灵受伤时的痛苦的人，绝不会用自己的手再去伤害别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党的真诚拥护使我们不会由于个人的委屈忘记了对人民利益的责任！我也向一切有委屈的同志们祈请：让我们首先以革命者的开阔胸襟，去了解以往的错误。相信吧：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当时也是不自觉的，当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害，当他们的良心同情了受损害的兄弟姐妹们的内心衷情，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的，看吧！在生物系党总支召开的一次对我们这些被斗错的同志公开道歉和恢复名誉的一次大会上，我们没有厉声厉色的质问，也没有敷衍道歉的虚伪，我们（犯错误的同志和受委屈的同志）以哽咽的悲调倾述出自己的真情。误解消除了！我们又真正的回到了正义的怀抱！很多教授先生们哭了！很多年青人哭了！党总支书记陈守良同志也哭了！多么沉痛而又畅快的泪水啊，你清洗了以往的一切愤怒，你带来了最真诚的心的一致。

我们哭出了往日的悲痛，我们哭出了今日的温暖。真正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们又重新团结到了党所领导的正义事业的周围。

今后，我们将更加热情的，公正无私实事求是的跟党走一起整风。我以生命和良心发誓：将一生为正义的事业奋斗！

但是，整风是一次深刻细致的思想改造，因而特别需要耐心和理性。

我欢迎激动的正义冲击！因为正是这惊心动魄的战歌震荡了人们在习惯势力中的蛰睡。

但我更拥护心平气和的讨论！因为只有用最深刻的正义才能服人的心。才能真正揭出“三害”及一些其他社会歪风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救人而且避免一些消极的“后遗症”。

我认为：肃反中的错误，集中表现了“三害”的恶果。而且反映了不少社会歪风（如是非心和正义感被舆论所压抑，违背良心说话而不感到惭愧等等），这些东西不但使我们工作造成严重的错误，而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

诸如：肃反运动中某些同志（当然不是每个人全有）主观主义的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断章取义；宗派主义的倾轧排挤！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实用主义的逻辑论证！以及违背事实和良心的乱“揭发”，不以是非为标准（真正的党性应该是与人民的利害是非统一的）的盲从冒进等社会歪风。难道这些不都需要彻底铲除么！

显然这些都是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违背的。是先进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和每一个真正马列主义的卫道者都应该下决心客观地、冷

静地、理智地、深刻地、科学地、大胆地、公正地揭露出这些问题出现的真实根源。然后用最果断的魄力和对子孙后代人民的责任坚决地消灭它。

我建议：党委会支持召开由在肃反中被斗错的同志、肃反工作组干部同志、党委会领导同志（最好能请中宣部派人参加）群众代表联合发起一种长期的（因为决不是一次会谈得完的），心平气和的，说理的关于肃反中错误的研究会。这个会可以深入的研究一些有关当时的理论根据，干部水平、政策执行情况、工作方法、以及错误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带来的深刻而惨痛的损失。这将对党真正地从根本上铲除“三害”，扭转社会歪风起最积极的作用。

我希望党委会支持我的建议！希望同志们支持我的建议！让我们通过这些活动锻炼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忠心，让我们从最生动的政治生活中去锻炼成为国家的主人。

最后，我希望一切受过“三害”之苦的朋友们能用理智克制一些愤激之情。冷静热情地帮助党整风，因为我们的体会比别人更深沉！我们的正义呼声也更能打动人心。

今后将陆续发表我的意见，愿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次严重的历史考验。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善良人类都在期待：“党是否能真诚透彻的整风，是否能真正大公无私地对待人民，……”。

我们以爱党的心祝愿：党顺利地通过这一历史考验（当然会需要很艰苦的努力），我相信全国人民也会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帮助和鼓舞我们的领导者通过这一考验。

我无法概括将来会如何美好，我只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

（原载北大校刊 123 期）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

黄继忠最近在报纸上和我们学校的座谈会上揭露了不少人民内部的矛盾，我认为其中最基本、最尖锐的矛盾是党群关系，因此想在这方面发表点粗浅的意见。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现在好党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经过一些演变的。在解放初期，党和党员在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而今天呢，党的威信当然还是很高，但是由于下面要谈到的种种原因，党群关系恶化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竖立起了一堵堵的高墙，群众见了党员有一种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跟党员不说真心话。傅鹰先生说，和朋友在家里谈知心话，看见党员进来就把话题扯开，谈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日前我去看一位以前在我们西语系的老先生，他说党群搞得很不好，在这方面简直是怨声载道。我认为这话并不过分。下面我要谈谈党群关系恶化的原因。

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首先，这几年来，党员（当然不是全体，但也不是个别，可以说是一般的，恕不仔细区分）对于群众渐渐由最真诚的人而变成虚假的人。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对任何问题不发

表个人的意见，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问题。实际上有没有思想问题呢？当然有，今天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一部分是非常高的，但大多数是解放后入党的，其中有的在思想上比群众只是先走一步，略胜一筹，有的恐怕还不如群众。

不肯暴露，只是表现他们的虚假而已，群众觉得党员跟他们不是一样的人，群众有的问题，他们没有，因此对他们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党员同志压抑着自己的人性，不让它跟群众见面，他们和群众只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点也没有，更谈不上友情。有的人入了党便跟以前无所不谈的朋友疏远起来，见了面僵得无话可谈；有的党员原先和群众格格不入，群众关系恶劣，但因为某种原因取消了党籍，反而变得很可亲，也和大家交起朋友来了。这种情形我们系里就有，真是令人不解。这是一阴森可怕的风气，它扼杀共产党员的人性，好像党员有了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这种情况在年轻人身上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寒心。我系的党员大都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同志，年龄都很小，他们做学生的时候，活泼可爱，生气勃勃。一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当上了支部书记或委员，立刻就一副老气横秋的党员面孔，青春的热情与活力都给埋葬起来了，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在他们身上一点也嗅不到。这种气氛在同学党员中也有，好些活泼而真挚的年轻学生，入党之后变得少年老成，对同学和先生不随便说一句话，不随便笑一声。我校党委会中不少年纪很轻的的男女同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群小和尚和小尼姑，一个个沉默寡言，老成持重，仿佛都已看破红尘，和五情六欲都已绝了缘似的。把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弄得这样暮气沉沉，这能说不是扼杀人性吗？其次，今天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毛主席明明说，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国家，国家大事几个共产党员包办不下来的。而事实上，今天共产党员大权独揽、包办国家大事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最高政府机构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军队，比比皆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无权，报纸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机关主管人是党外人士，副的是党员；有的正是党员，副的是非党员。但无论正、副，权总是在党员手中。拿我们学校来说，就给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副校长，而不是马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该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轻的党员系秘书。昨天我系系主任冯至先生的发言中提到他以前在西语系是应声虫，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大家都心中有数。连作为群众组织的工会中也是这样，我在北大工会当过几届委员知道的比较清楚。工会有好几位主席，但他们都是不大问事的，实际上决策的是党委会派来的秘书长。

有些党员对本门业务一窍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风气，对党的威信大有损害。那就是今天有些党员借着共产党这块招牌吃饭。他们对于本门业务一窍不通，不学无术，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当之无愧。有的人居然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根本不靠业务吃饭，老子是靠革命吃饭。今天党内似有一种按革命资历封官的风气，比如说，一个 1938 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分配工作时就要看看他同时的党员是个什么长，如果一般都是司长，那他也得封个司长；一个 1945 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就必分配他个科长，诸如此类。这种风气对学生党员也有影响，有的学生党员业务不行，但毫不感到恐慌着急，仿佛毕业后做领导干部满有把握似的。共产党员享有的特权还不止于此，比如说出国留学就是他们的特权，非党员是没有份的。当然，共产党员如果板起面孔来算帐，说老子这么多年，享受这点权利还不

应该吗？如果今天的问题单是论功行赏，那你尽管享受特权，大家没有话说。不过，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呢？你还不想维护党在人民大众当中崇高的威信呢？这种特权思想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形成另一个脱离人民大众的统治阶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毛主席今天提出整风的号召，真是最英明不过的措施。说到这里，我想向我校的党委会提一个问题：去年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之后，我校一阵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我听到的一些名字是严仁康、侯仁之、冯至、陈定民、季羨林、曹靖华等。一分析，这些同志不是教务长，就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领导干部。这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是专门吸收领导干部入党似的。（对这些同志个人是否合党员标准，我不了解情况，无发言权。）这到底是一种偶合呢，还是有一种什么思想在作祟呢？提出来供党委会参考。

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总之，这几年来党员居功自大，排斥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这几年来，党的改造、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完全正确，但通过党员干部执行的结果，却产生了很不好的副效果。共产党员的表现，叫知识分子有一种做仆从的感觉，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而是受雇于党员似的；党员似乎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主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仿佛他们非要共产党员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这种态度使知识分子心里很不痛快。历史系有位先生对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同志（党员）说：“我们之间，你是主人，我是奴仆。”这句话是值得全党的同志细细寻思的。要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和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密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任何人也不喜欢这种关系给第三者间隔开来；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效劳，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每人神圣的天职和权利，也是大家热切的愿望。因此，大家不愿意受做客的待遇，大家热烈要求以主人公的身份主动、直接地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大家要求真正的主人地位。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到如今，我还不不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么？难道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些，但是我确实不了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

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此外，我想谈谈年轻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我们系里的老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总说能领导，毫无问题。我个人则认为大有问题。这些年来年轻人（主要是党团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轻党员领导的直接后果。首先，这种领导关系不自然。拿我们系来说，这几年来党员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毕业前受先生们的教诲，对老师很尊敬，一毕业就大模大样对系主任及全系教师摆出一付领导面孔，这怎能自然呢？他们无论在业务、经验、常识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们，即使在政治觉悟方面，高得也极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结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都感到别扭，工作不易做好。第二，年轻人居高位易助长青年得志，目中无人的官僚作风。第三，年轻得志，还会助长不知艰苦、不肯老老实实去钻研门

业务的歪风。凡此种说明年轻党员居领导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害处。为了爱护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如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业务单位上老老实实地去刻苦钻研，做点实际工作。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29日）

发言摘要

黄继忠昨天冯先生谈温德的事，我很反感，你说对温德生活上关心，肃反中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我反对。

温德是真正的人，是闻一多介绍来的，是美国进步人士，在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美国学校里规定不许把好成绩给犹太人，温德就反对。到中国后，一直很进步。解放前，他比冯先生，比我都进步，帮助很多人到解放区去，与吴晗是好友，温德亲自把吴送走。

解放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对温德疏远，告诉群众不与他来往，不让东欧学生与他来往，来北大后，给他破房子，不让他开课，把他孤立起来。

肃反时有一人提出温德发过牢骚，我们每人也轮流说我们听到过的牢骚，也不敢和他往来，我也这样，现在感到这是十分可耻的，温德说“要容忍”。

有一教授曾在强烈灯光下受审，说温德是特务，已坦白了。以此来逼供其他教授，这是什么做法。

我们这样对待他，是把朋友当成敌人，我很反感，恐怕这是党的秘密，温德如果是特务，我愿和他一起被枪毙，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真理。

学校高级知识分子的会上都是迂回曲折地提意见。党员应与群众站在一起，党员所以落在群众后面是因党员有很多特权，整风应打掉党员的特权，否则国家就没有希望。江副校长说大家提我们一定改，做得到否是另一回事。党员应先放下身价与群众一起。党员缺乏人性，拿假面目对群众。我从未听说过冯先生说过有独立性格的话。冯先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爱戴，他解放后的诗没人爱看，因已失去其独立人格，希望冯先生不要做应声虫，要有独立人格，要有血有肉。

要慎重全面考虑，多磋商（按指出去宣传）。今天主要目标是什么，英三走在前面，不要让别处党委走在后面，我们对党中央有信心，应有妥善办法，考虑出校目的，后果，组织起来先在校中扩大影响，取得党委会合作，同学组织代表团找党中央，使党中央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使运动更彻底。

党委落后于群众，我们搞运动也要有组织有纪律，党要不同意，我们就说服他，再不同意就做，还应派代表到中央让他们看到运动的发展、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目的。

黄继忠在5月24日下午西三班会上的发言摘要马副校长请去掉党员的身份，作为搞教育的人、长辈和你谈谈，这几天我受的教育很大，我有疑问。党要把青年培养成怎样的人材，要把我们培养成骗子，你骗我，我骗你，互相妒嫉，把特权交给一些人去压另一些人（拍桌子），这是最痛心的，这是不能想象的。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怎样的人，很多同学没有个性，党员都有假面具，不能都怪党员，这是党的一个风气，这谁负责，共产党负责。党给

了他们特权，骑在人头上，出校门后形成一批特权阶级，将来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社会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人和人之间没有真心，我不要这样的社会，我冷静地建议，作为一个普通的上一辈的人，马校长希望他多听取群众意见，请教育部长、毛主席来听听青年的意见，不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死气沉沉的人，否则我们国家没有希望，每个人应有的人性，真诚相见，希望马校长传达我这个意见。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来加强思想工作没有用。

黄继忠在5月26日江隆基同志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从大字报出现以来，党是落后于群众，没有领导群众，这是危险的，先是瞿副书记，后是江副校长作讲演。控诉会同学争取到学生会和团委会的支持，但党委不重视这一领导，在会后江副校长又说：这一方式不很好，这是很难使人心服的。对违法乱纪的人控诉，没有什么不好。

今天有29人去清华，昨晚江副校长同意这样做，今天早晨我找谢道洲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我认为党不能禁止，但也不等于不能领导，但党委放弃领导，对这后果党委要负责。今天这样行动的效果还不知道，但希望明天党委别再来一个反对。

对北大肃反的估计究竟是成绩为主还是缺点为主，希望重做估价。全校有200人被斗错，西语系有两个斗错，其中一个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思想反动，并不是现行犯，同学中英三斗了6个，除了一个是一个集团的成员之外，其他都斗错了。东语系斗错的也很多。今天就要搞清楚，错就要承认，不然不仅被斗的人不能平心，群众也会有意见。

今天要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有彼此猜忌，党群之间有矛盾，青年中的正义感埋藏起来了，青年中的生气消失了，青年中一些美好的理想淡薄了。今天我们教师在谈教学上的问题，但培养目标却更重要，要让青年中的一切美德开展起来。

参加了西三会议后，我才真正地看到青年中的纯洁和可爱，我受到了教育，我希望高教部、毛主席来北大看看抹杀了青年人的人性和基本美德是不好的。毛主席是否了解这一情况，我表示怀疑。

乌“昼”啼

徐钟年乌凤和鸣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

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鳞前鹿后，蛇颈鱼

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毛毛雨下个不停和风细雨……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灵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自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小论带坑臭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

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则份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往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8日，略有删节)

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

刘地生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危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

消灭三大主义的根本办法，在于消灭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那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

首先，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产

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反映)

因此要消灭三大主义，必须首先消灭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仅供听命和驱使的现象。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使6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这才能逐渐根绝三大主义。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1200万党员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某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6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地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此在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原载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

怀监狱

聂绀弩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那是我看书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西第三监狱，不过中

学程度，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有耐心就好懂。”

“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

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 70 岁了，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 30 来岁的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

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爽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

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

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舌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药店买，也都不大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

狱的医疗的方便——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在临汾监狱很有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来干什么事，在里面还是干那事，理发的还是理发的，木工还是做木匠，厨子还是做大师傅，大夫还当医生，称为“医犯”（似乎只有医生如此，没有“木犯”、“厨犯”等称号）。临汾监狱医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几个是北京转去的，也有干部大夫，不轻易给犯人看病，做些什么，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确也有些好处，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夫更能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也较少有在干部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条件，是医院离监号更近。北京监号是楼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亏。

临汾则是平房，监号分若干队，每队一个院子，其中分若干号。医院就是其中的一队即其中的一个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队各号的或远或近的左邻右舍。每天有一定时间出诊，急诊随时可看，且可叫医犯到号里来看，或同犯用急盾抬到医院去。

我在老残队，老残队也有不老不残的人参加。否则连饭都没人给打了。老残队有些人也参加点劳动，我参加的是“拣菜”，即在厨房洗菜、削土豆、萝卜之类，但也有相当重的，如刨西葫芦、冬瓜。一个老西葫芦或冬瓜，重几十斤，搬不动，皮有半寸后，刨的工具又极钝，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钉一条洋铁片，刨不动。一碰到这种场合，旁边往往有年轻小伙子替我搬，搬来了还刨几下放在旁边，刨过几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个人蹲在身边看。一回头，就是那说我读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他也是北京转去的，现在做“医犯”。他问：“你刨得动么？”我说：“对付着刨。”他说：“你有病，应该去看病。”我说：“我没有病。”他说：“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说：“找你么？”他说：“找谁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个年纪大的，我想他也许经验丰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问：“是你么？”诊病后，大声说：“你回号休息，不要劳动。”说完，就把我的名字记入休息三天栏内，并说下星期再来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别个医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这样，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劳动，一直过了很久。原来医犯有准许病号休息三天的权（还要干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没有不批准的。）但这是一段附带的话，本意只是想说明在监狱里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经常怀念医院，主要就为这。还有，监狱里一般比农村讲卫生。比如临汾，每星期都理发。理发师多，不怕理不过来。用水方便，有富裕时间。比如稷山时，凡初进来的犯人几乎都是被子几年未洗，一阵气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虱子，进来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帮助之下洗澡洗衣服，焕然一新。

三、监狱伙食不太坏“一个人顶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难免常在监狱出出进进。”

来过一次，难保不来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爷”之类）。来就来吧，没有好招待，请吃窝窝头。开店的不怕大肚汉，随便吃！”这是北京半步桥一个看守说的。看守，名称似乎不好听。犯人都叫他们“队长”或“指导员”之类。但临汾的队长或指导员是正式职务。也有的叫做干事。临汾监

狱没有像北京那样的“看守”，监号，队，都是用犯人管，队门也是犯人看，通称之为“值星员”，一个号里一个值星员，负责学习、打饭及一切有关事务。临汾的犯人也好管，衣帽都是特制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没有钱，每月发两元“零花”，是一种只在监狱小卖部可用的“狱币”，自家有钱也要换成这种钱才可用。

可只给人很少的一点点，多的存在银行里，一句话，不容易逃走，谁都管得住。

说“来了请吃窝窝头”，好像监狱吃得很坏，其实不然，甚至可说大谬不然。

北京半步桥，一星期改善两次，有时好像达到隔天一次。吃饭前，如果听见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没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总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几块。（至于回民，至少给两个盐鸡蛋，有时四个。）都是好肉（临汾比较差，常吃肉，都是头蹄内脏，似罐头厂剩下的，烹调也差。但临汾也常吃鱼（带鱼），（北京则一回也未吃过））。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面馒头就是大米饭，不改善也不坏，最多的场合是西红柿甩蛋汤，犯人见了，似有不屑一顾之态。有一阵子关了一些学生。不知哪个号里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嗲声嗲气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馒头烤一下吧！”爽性插一段：黑龙江虎林监狱，逢年过节之前，总会有一两个老头之类关进来。他们是附近居民，对于出进监狱之事非常内行，过节之前总有办法（多数是打老婆）犯点事被抓进监狱去。看守见了他们就笑：“又来过节了！”因为过节定有肉吃。过了节，因为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于梭山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我本不想谈坏的方面，不谈。当我在半步桥吃得满嘴是油时，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国农村，都吃到这种伙食，那将是什么情况。

四、结语把监狱说得这么好，似乎比外面还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进监狱，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励犯法么？鲁迅说过：北京模范监狱，许多条件，有的条件比外面还强，只有一个条件不好：不自由！一开始我说过，撇开一切方面，专讲我所经历的，我所怀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我来说，最适宜于学习的，是稷山看守所，但伙食很差。对文化落后的人，学习最好的是临汾监狱。医疗条件最方便的，主要是临汾监狱，其次是北京。伙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临汾。各个监狱，都有这么一两点好处，写在一起，说不定有人认为一切监狱，都具备这一切好处，这不怪我，这不是我的意思。

再说一点。本与监狱无关，而是从监狱看出的。不是说农村里穷么？不是说中国人民能吃苦么？何以见得呢？从监狱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无期或死缓。判得对否，是法院的事，与监狱无关。且说一判刑，衣食服用就都归公家供应，而且每月发两块钱零花。我再次到临汾时，知道有人把零花积着不用，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了。刚听，把我吓了一跳，怎会这样多？可不，1月2元，110知情况如何）竟需要他每月两元的补助，而他自己二十几年，一分钱也未花！还有把公家发的毛巾、肥皂、牙刷、袜子，积起来趁家里有人来接见时，偷偷交家里人带回去。但往往带不回去。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

缅怀聂绀弩

冯亦代自从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协现代文学馆为聂绀弩诞辰 90 周年召开座谈会的请柬，对绀弩的思念始终萦绕我的心头，久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强烈。特别在座谈会上听了丁聪、吴祖光二位谈及老聂的往事，心情更是不能平静。

他们二位自称是五七届“北大（荒）同学”，而且以热烈的口吻回忆同老聂在一起的日子，但在这些思往言辞的背面，我却感到那些日子的苦涩和凄惨。在祖国的大地上正照着一片明亮阳光，而在这一冰天雪地的荒原里，只是一堆生死关心的门坎。多少有为的人在这里落入死神的魔掌，幸而逃生的人也都是梦残魂断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坚强的，特别是那些堕入噩梦的人，他们舐干了身上的斑斑血渍，重又站起身来，迎接祖国母亲的召唤。老聂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吴祖光说老聂是传奇人物。他是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媲美鲁迅，他的旧体诗开创了以时代精神贯入诗意的前路，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独辟蹊径，树一帜之言。总之，他不是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期徒刑在山西的班房里，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了 4 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已成为“反动言论”而不知所终，如果留至今日，则他必为后学者，开启了读《资本论》的门径。

我和老聂相识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但是我知道他却远在抗战初期。我读了他在《野草》杂志上写的文章，深为他的犀利与深邃的笔锋所倾倒。他大我 10 岁，我虽然叫他老聂，衷心则以师事之。

1962（周颖大姊）也来前纱络胡同我的寓所小坐。第一次他到我家，看见我居室的湫隘，不禁摇头叹息，称我是公子落难。

他是很用功的人，于各家对《红楼梦》的观点，十分注意。有次他借到一本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出版的《红楼梦考》，便让我逐句翻译给他听，一共花了 4 天，他边听边记下了书中的要点，而且特别注意吴对高鹗续四十回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有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为什么还要记下别人的观点，他说正因为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才研究别人的观点来对证自己的观点。那时他买了不少古人的碑帖，每天练字，其时我也以写字代气功治疗我的高血压症，他深为称许，但看了我的毛笔字，又大摇其头，说我练字不得法，不能入门。这正是他的直率处，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他劝我学写旧体诗，我说戴望舒说我没有诗才，所以我只顾欣赏而不愿自作。他宽厚地笑了，说我弱不经风，受不了打击。

他是个饿怕了的人，但他的饭量并不大，只喜欢和少数几个友人在饭店里，小饮几杯，吃几盘好菜，于是纵谈上下古今，自得其乐。我和他最后一次一块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了，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他是否有预兆，我从未问过他。1972 年底，我从沙洋干校劳改回来，就从友

人处听到老聂被判入狱的信息，以后常在李健生大姊处遇到周婆。他们二人一见面就谈如何搭救老聂和健生小女早日出狱回京的途径。我眼生生看见她们的头发由黑变灰，又由灰变白，但我无能为力，只能空言使她们一时宽心。

老聂以国民党师团级俘虏而被释放，得到重生，因为他原来判的是无期徒刑。

有人觉得滑稽，其实这是周颖大姊各处奔走呼号的结果。想到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坐四人帮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监狱，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为国民党战俘得到特赦，也就并不滑稽了。有一次他给我看写狱中生活的诗，诗的反讽使我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我的眼泪不是笑出来的，而是为胸头的痛苦抑压出来了。他说在监狱里比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

奇人而有奇事，他当然能甘于他所得的不公平待遇。

我 50 岁时，他曾经在我庆寿的册页里题过一首诗，写完了笑着说“涂鸦！涂鸦！”这首诗并没有在他诗集里出现，也许写得匆匆他自己不满意。可惜这本册页已被“文革”革掉了，我痴想或许有一天会在故书堆里突然出现，这是我不释于怀的企念。周颖大姊生前曾要我为老聂写文章纪念，但牵延至今，始终认为是一笔人情债。

以老聂的身体和他的乐观天性，他原是可以活到 90 岁的，如今只留得友人们对他的思念了，能不痛哉！

1993

回忆母亲丁玲——1957 年前后

蒋祖林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 1953 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

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

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

我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

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场吠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琳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30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关系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工作上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伤了好一会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

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 打红台》，

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伸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地作痛。

再就是我想藉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1200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十六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嘛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副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根，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十六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作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西边的耳房用作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叙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4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

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款款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钟，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 1955 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 6 月 6 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 1955 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 7 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1953 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 年 4 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七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 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震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 1955 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 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璜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

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

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慕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只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

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2·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攒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青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二个主编的问题。

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

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合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为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珪（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

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珪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的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邵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以不影响全局，而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

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

要好一些。”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欢乐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子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子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7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向我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毛主席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江青。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毛主席与罗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

毛主席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

毛主席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毛主席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毛主席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毛主席，罗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只一次地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 况？”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理解，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 1947 年，在阜平抬头湾，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 年，她在泳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 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写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 1956 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 年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尔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法，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

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 1955 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

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斯》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间，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在长廊上坐一会，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 1955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

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笼头冲得水淋淋的。”1953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拗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麟儿！你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我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

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楼饭庄为灵源饯行。下午4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她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萃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般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11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赓，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

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作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子，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

妈妈说：“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去年年初在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来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份。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20 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翻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

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 20 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 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 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思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

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

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的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 23 位革命先烈，1931 年 2 月 7 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松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 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 23 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 24 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 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 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扰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 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的文章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20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珪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珪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3.5）一文中写道：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向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四、“反右派斗争”中的6日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

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

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地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雷。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的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妈妈沉默了一小会，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

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璉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的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联在一起。”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大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待，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

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待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

党太甚’，‘欺人太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天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可能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待“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和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

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呆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待。”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还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噩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认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愿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

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入王府大街 64 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廊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

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拼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 1941 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 1955 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 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 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是 1945 年的事。那年 11 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式平房，房间里铺着“塌塌米”。

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塌塌米”上。

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离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 20 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

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 8 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达餐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 20 多分钟不在场。

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 1955 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

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定 8 月 21 日离京。8 月 6 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 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 8 月 11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议。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点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 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把椅子上，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待的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又一次加重，晚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颤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向卧室，躺到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

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企图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的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地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认，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

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它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我已入党10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我说：“好吧！”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8天。

9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胡海珠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待’，‘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须要有实际行动的。”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6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五、离别10 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

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我点点头说：“我知道。”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的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妈妈想站起，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

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6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十六号小院。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7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

我心目中的丁玲

王蒙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于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1985年6月签名赠送给我她的六卷本精装《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最近才为写这篇文章而捧起阅读的。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是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一位论者说，那些1957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70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1979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了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了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六卷 233、365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痛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

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周扬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周扬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评她的对立面‘左’，揭露周扬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周扬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周扬的‘右’来，这样一来，×扬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王蒙原文中“周扬”均以××代替——扫校者识）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

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见《文集》六卷447页）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作法呢？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名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大面上则宁愿看作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

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 20 余年后，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过去她让领导添堵也是由于这个，她从苏联开会回来就散布，在苏联爱伦堡几次请她讲话，并说：“你是大作家，你应该讲话。”但她不是代表团长。代表团团长是与她不睦的周扬。她引用爱伦堡的话说：那个周扬团长“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等等。请想想，这样的话传出去，她能不招领导讨厌吗？（她说的并非完全不是事实，但中国国情与苏联不同，我们这里认的是谁是什么什么长，而不是谁是大作家。愈是大作家大什么家愈要把你摆平，这也是一种自由平等博憎，也许是乐感文化。）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么？恨乌及屋，她无法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潮流抱亲和的态度。当然，她也想立一些人，如写《灵与肉》的张贤亮，她为之不止一次地谈话和著文，但她已无法成事，她的支持中青年的动作的影响已经无法与周扬相比。还不如少支持一点打起另一面旗帜。她的可爱其实也在这里。在这上头，她恰恰表示的是她是普通一兵，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咱们比的不是年龄，不是资历，不是级别而是实打实的写作。她喜欢的位置在赛场上，而不是主席台上。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得主发奖或进行勉励作总结发言尔到年轻人火的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划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这样的伟大作家前辈并不止她一个，而且，说老实话，如果不及时反省调整，王某人也会变成或已开始变成这样的角色。

其次是由于她的特殊政治经验特别是文坛内斗的经验。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

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周扬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周扬，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依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那位老作家的高参论其实没有丁玲高。她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文集》六卷 230 页）这来自她的血泪经验，也来自她的政治信念价值系统，当然有她的道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之道？在鸿鹄们看来，根本用不着那些书呆子燕雀雏儿讨论这种问题。

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

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有她的复出后的一系列维护党的权威歌颂党的领导以及领导人的言论为证。“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才是她的最大的情意结。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周扬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革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于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于她的理解认识勾勒。打的是沈从文，盯着的是一直从政治上贬低她的周扬。你说她惹不起锅惹笨篙也行，灭不了锅就先灭笨篙，灭了笨篙就离灭锅更靠近了一步。这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的常识性法则，理所当然。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周扬，对周扬，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周×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的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革命许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要求的东西也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接受了革命，就等于换了另一个人——如毛泽东赠丁玲词所言：昨日文小姐（请注意，是小姐，这个称谓并不革命），今日武将军。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他或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忍辱负重，万死不辞。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质论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文集》六卷21页）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辞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她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呜乎，痛哉！

而与此同时，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这种心态表现的最充分的就话是话剧《杜鹃山》。此话剧是教育雷刚们的，表达的却是柯湘们的自信。）一朝革命更视那些不大革命的人为糊涂，为落后，为盲瞽，为混账，为历史大波上浮沉的泡沫，最好也不过是一看二帮我说你服的对象。至于反对革命的人，那就只能是敌人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同时一旦革命也就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为高于一切的宝贵。为了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和名誉，人们不能害怕斗争，不能作好好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可以或必须“缴纳”一切的一切。当下的小字辈可以不理解这些，却无法否认这种信念这种追求的真实性与历史必然性。

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它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决绝。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反击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沈从文

对于她的歪曲——至少是对于她的未革命时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革命的正义性，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念与沈的旧谊。北京一解放，沈去看望丁，丁对他并不热情，联系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以不革命的庸人的观点去评说这件事。当时一个是老革命，是胜利者接管者掌权者，一个是老不革命，最好也不过是刚刚得到解放、刚刚开了革命之窍、肯定对革命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说不定还有若干需要审查的历史疑点，丁怎么可能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待沈呢？以革命家的身份衡量丁玲，丁玲未必是那么不近人情，而是更高的阶级情政治情原则情。丁玲为革命确实付出了不少东西，那么再把老友沈从文搁置一下，让分管沈的部门去处理，有何不可？沈和丁的恩怨沧桑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责备沈老，同样也无法以一般人情事故的观点去责备丁玲。如果没有一点狂热和自豪，又哪儿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或者优点。当然，如果丁玲还活着，那么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以后，在尘埃落定以后，也许我们愿意与她老人家共同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她老人家不那么严厉，如果她当初也能尊重与自己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不同的知识分子，如果她能够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平常心，多一点对劳苦众生的善意，有何不好，岂不更好？换句话说，一个革命者在取胜以后，在普天之下莫非革命之土以后，盛气凌人地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究竟是有利于执政巩固革命成果还是相反呢？这也值得确实革过命的杰出人士们三思。

年轻得多的人无法理解丁玲的那种政治激情，有时把投身革命与什么仕途进退搅在一起，这会让革过命的人气得发疯。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一个人既然参加了崇高伟大的革命就超凡脱俗，从不考虑“仕途”（当然是别的词儿，如叫做进步或者信任或者关怀、考验）大概又太天真烂漫了。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1931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中，她的莎菲女士写道：“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得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到一点牡丹花……”（《文集》三卷312页）这是她的一个夫子自道。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真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一个确实政治化了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小品——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家绝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人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她的过分自信也表现在她晚年办文学杂志的事情里。在新侨饭店举行的创刊招待会上。她是如何喜气洋洋通体舒泰呀。她是以发表革命老作家的作品的理由来创办新刊物的，但是她主办的《中国》，实际上以发表遇罗锦、刘晓波、北岛的作品而引人注目。历史可真会戏弄人。她的创办刊物并未收

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而是举步维艰。她的那些跟随者也并不总是买她的账，她不得不亲自出马，提着礼物去协调与自己的编委们的关系。她费了太多的精力去办刊，可以说是操碎了心。这影响了她晚年的写作，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她说过：“我现在是满腹经纶，要写，但是时间不多了。”她又说：“过去了的事情是空，是无。”她说得好惨。

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她预言过中国作协将会发生“垂帘听政与反垂帘听政”的矛盾。她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而没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以至她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她的晚辈，她的同行，本来这些人可以成为她的忘年朋友。我本人几次去看望过丁玲，但是无法交心，不无防范戒备应对进退，着实可叹。

她本来可以写很多很多杰出的作品。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

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丁《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12岁的王蒙似乎从此才懂得了对女性的膜拜和怜悯。向往、亲近和恐惧，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责任。这也就是爱情的萌发吧。少年的王蒙从丁玲那里发现了女性并从而发现了自己。从梦珂到莎菲到贞贞到陆萍（《在医院中》）到黑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小说这个玩艺儿是太怕人了，戴厚英的《脑裂》不也是一样的可怕吗？也许丁玲的命运在1927年发表《梦珂》的时候已经注定了？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作者写道：“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丁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本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然而她的环境和她自己的性情却不可能使她处处如愿，使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有了距离。

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为什么一个人的自我估量与某些旁人的看法相距如此之遥？这是说明做人之难吗？这说明相通之不易吗？这真是最大的遗憾了噢！“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苦么？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许多人都奇怪地望着我……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写下的这些话（《文集》三卷232、233页），莫非后来都应验了吗？然而，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

她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需知现时连周作人也得到了宽容的目光：一个人因追求革命而幼稚而做出过一些蠢事，总不能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何况如今丁玲和她的友敌们大多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她的起点就是高。她笔下的女性的

内心世界常常深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 and 欷歔。同时她老了以后又敏锐地却又不无矫情地反感于别人称她为女作家。她认为有的女作家是靠女性标签来卖钱。但是她同时确实是一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谁能否认这个事实？怎么能认为所有的读者都是用一种轻薄的态度而不是郑重的态度来对待她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文学特质？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文学对她的回报还远远不够。而她的经验很值得我和同辈作家借鉴和警惕反思。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

不该发生的事——丁玲问题经过

李之琏——“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引自 1986 年 3 月 19 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关于丁玲》）。

1984 她生平的介绍和一些同志写的文章中，对她的生平作了公允的评价。孙犁同志在文章中用以上这几句话作了概括。

我因过去工作关系，有同志希望我写点什么，使人们更了解这段历史并表悼念。

我同丁玲在全国解放之前只有一面之识。那是我 1940 年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之余，想写些文艺作品反映战地的军民生活。最早写了一首诗，题名《打扫战场》，投到《解放日报》，不久被刊登。后来文艺版主编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开座谈会，对这一诗稿表示欣赏并有所鼓励。这当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以前，我对她 30 年代在爱人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仍能坚持斗争，主编“左联”刊物《北斗》，也留有好感。后来虽然也听到对她被捕后的一些传闻和议论，但由于她 1936 年从南京投奔陕北和抗战初期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参加抗战，遗留在头脑中的由传闻而来的疑虑也就消失了。在延安整风期间对她历史审查的情况，也只是传闻，都不是直接接触，实际情况并不了解。1954 年底，我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后，由于管干部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参与过对丁玲等问题的审查。因此，我只能就我所接触的事实，提供一些情况供研究，这也许有助于文艺界弄清是非，加强团结。

二 1955 党组确定要“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为此开展了对丁玲等的批判。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认为是陈企霞所写，牵连到陈与丁玲的关系。

约七十人参加，共举行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最后向中央写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会议。听说一些情况，虽感到很不正常，但也难以表示意见。

直到1955年9月30日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时，才了解到批判的全部内容。报告指出，他们“反党”活动有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我看后，觉得这个报告罗列的反党词句很多，但确切事实很少。报告中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等等。

但因我没有参加批判会，也不太了解文艺战线上一些领导人物彼此间的复杂错综的微妙关系以及这次批判的动机和背景。所以我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反对这个报告的论据。我在讨论发言时，只表示，对报告列举的丁、陈反党的事实根据应进一步核实，以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我的意见没有引起主持部务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会后作协党组的这一报告正式呈报中央。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还指出要审查丁玲被捕这段历史。对她反党的错误要看她对错误认识的态度再作处理。

三 1956 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都是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从各方调查的材料证明，丁玲是在自己的丈夫胡也频被反动当局逮捕牺牲后，根据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于1932年同冯达同居。冯当时是共产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于1933年5月被捕，招认了自己的住址，因而丁玲也被捕。他们被捕后，冯达表现不坚定。

国民党政府为争取丁玲为其服务，特意安排她和冯达继续同居，想通过冯达影响丁玲。丁玲对冯达的态度虽很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摆脱同他的接触，如果不同冯达保持某种关系也难于应付国民党对她的折磨。……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微妙关系。在百般折磨的情况下，她没有丧失革命气节，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直采取拒绝的态度，对所用的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尽一切可能设法同党取得了联系，最后在党的帮助下由冯雪峰同志派人从南京把她接到上海，经西安到党中央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组织上曾作过审查，档案中存有1940年陈云、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

当时张际春、我和张海等同志曾一同听取过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

我们听着她的陈述，思索着当时国民党对革命者的迫害和所实行的“自首政策”，对她这一段经历都感到可以相信并同情。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30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本来审查丁玲历史的专案小组应该一起听取丁玲本人的申述。但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特别指示，他认为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

加同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我们每次同丁玲谈话时，都不通知周扬参加。但每次谈话的情况都向他一一通报。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

这次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第一稿，是我主持起草的。我在文字上作了最后修改。对丁玲被捕后的表现方面，有这样几句话：丁玲同志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党的怀抱。这个结论草稿经过张际春同志同意后，提交小组讨论。这段文字是对丁玲被捕后政治态度的总的评价，因此小组成员对此都十分认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段文字上。有的认为，这种写法太过分，丁玲被捕后继续同冯达同居并生了孩子就是叛变，怎能说她同敌人斗争？等等。持这一见解的同志还对起草人有所指责。审查结论前后修改了七稿。以后的修改是由张海执笔的，讨论时字斟句酌，争执不休，哪怕是对一个字的取舍。最后一稿达成妥协，改为：丁玲被捕后有变节性行为。

关于起草丁玲历史审查的结论，张际春同志当时很慎重，不管怎么修改，只要周扬不同意，就不作决定。最后一致了，他才签发报送中央审批。但丁玲自己看到结论后，对排除了自首的说法表示同意，对“变节性行为”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并写了书面意见，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

四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束后，对她“反党”的错误要进行组织处理。这也是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工作。中宣部又成立了专门小组，仍以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仍是小组成员，又吸收中宣部和作协其他有关同志参加。小组在讨论如何进行工作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丁玲等的错误，讨论一下如何处分就可以结束了。我和张海、崔毅等同志则认为，对“报告”所列的错误事实需要逐条进行查对核实，以免将来再有反复。张际春同志同意要逐条核实，那样处理才更稳妥。小组最后决定，对1955年陈反党的事实逐条进行查对，根据落实情况再研究如何处理。于是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具体组织工作由我和张海同志主持。

1956年要进行组织处理后，便向机关党委写了全面的书面申诉。对在批判过程中出现的她认为不正常的活动，以及揭发的“反党”事实如何同实际情况不符，她一一作了申辩，并提出了证人。申诉中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人也有所批评。按照组织原则和正常情况，这一申诉可以拿到专门小组讨论并据此安排工作，以示组织上对党员负责，对申诉人意见的尊重。但当时我考虑到，在小组开始工作时，小组成员意见已有很大分歧，如将这一包括批评当事人的申诉信，拿到当事人中去讨论，会引起不满、冲动，甚至反感，不利于弄清事实。小组既然决定逐条查对事实，有了作协党组的报告，又有了丁玲自己的申辩材料，再有其他有关人员的书面证词，一定会将一切误解澄清向际春同志报告并取得他同意后，丁玲的申诉，没有提交小组讨论。

这是采取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的作法，让当事人回避一下，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陈企霞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我和有关同志听了他

的申诉。谈话后他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各有关同志。

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和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关于《文艺报》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

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了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因为在宣布前已经请示了领导。

关于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指周扬同胡乔木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具体事实，只是一一些人认为是这样。为此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他没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这种事实来。

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系，确实周、丁之间，在工作上 and 思想作风上有些不一致。对周扬的一些意见和作法，丁玲有些不同看法，有时在同志间有所表示。如果不顾场合议论别人的是非无助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个人有些意见，绝不能说是“反党”，这也很明显。

从调查的结果看来，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有的不成为错误，有的不是事实。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和被调查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传达，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是调查小组所能解决的，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但经过这番调查，许多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现在了解了；原来有盲目性的，现在清醒了。同时许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后，未及时处理；她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何时能够解脱和以什么方式解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时看不到前景。于是在作协机关有许多作家、工作人员就逐渐由怀疑到认识，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这不是哪个个人的偏见，而是情况的反复促使人们清醒并形成了新的认识。

五 1957 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每个机关、单位人们对建国几年来的各种工作，根据整风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对哪个人、哪件事，作的结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实际，同党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们的思想中进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风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希望领导带头作表率。自然大家都会想到，在本机关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协会，就不能不把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提到整风的首要议程。这也不是由哪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人们经过学习整风的指示，联系这几年作家协会的工作，对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从延安整风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她能深入农村，同广大农民一起参加土改，同农民交朋友，写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她还被派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如果她是反党的，这些成就又应怎样解释？在全国

解放后的几年中，丁玲身兼文艺方面的几个重要职务，如果她是反党的，那么对她的这种使用又该怎样理解？同时人们还想到，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应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主要根据；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作评价则应以他执行的方针、路线作为主要依据。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范户”的倡导者，这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说她“反党”，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同1955年的批判相对照，就使人们的怀疑和不解更增加了。……1957年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消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在开会期间，张际春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参加过一次会，听了听大家对丁玲问题的处理意见。会上的发言都是倾向丁玲的，认为1955年对她的批判和结论很不得当，要求领导会议的同志认真检查，得出教训。我们当时没有表态。

本来，从会议开始，作协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有纠正过去错误的趋势。由于有些同志的发言，言辞尖锐，丁玲本人又提出了“为什么？”这就使会议主持者对所提出的问题难以解答了。本来，丁玲对自己问题的处理有意见，在党内提出申诉和要求找出形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上有明文规定的。不应以此作为批判和纪律处分的根据。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

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

六先是由周扬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中宣部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的审查丁玲的历史结论，他不同意。主要领导人指示我同中央组织部联系，将原结论报告从中央退回来。随后，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上，由主要领导人提出，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要重新进行修改。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

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

主要领导人宣布后，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根据已有的惯例，既是领导人正式在会上宣布了，自然就成为部务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后，张际春同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问周扬：原来结论是你同意后才签发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你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你不同意就不会向中央报告了，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能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他俩一面争吵，大家一面散去。实际上，这种讨论是没有别人发言的讨论，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否定原来结论的结论。本来，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既没有提出改变的根据，也不能同本人见面，更无法向党员群众宣布。

但由于结论的修改，就把丁玲历史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问题变成敌我问题。

这样就可以使一切对丁玲有同情的人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接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7月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6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发展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活动；在会外则从多方搜罗材料，拼凑罪行，作为“反击”的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的另一成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领导人不满的言论。

这些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对那位领导人的议论。这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为了维持1955年的那个错误结论，为了阻止人们对作协党组领导的批评，为了压制人们对丁、陈案件的不平，还必须揭发新的材料，造成更大的声势。作协党组决定，扩大会议规模，由原来参加会议的限于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各部门的负责人及一些知名作家共几十人，现在要扩大到作协以外各文艺部门、文艺团体以及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和非党知名作家，共几百人。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指定要我在会上表态，表明中宣部机关党委完全支持对丁玲等的这种作法。

七我作为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对部领导的这种要求，不能采取抵制态度，只能密切配合，保持一致。如果我不表态或者表态不支持这种作法，那就会被指责破坏“反右”斗争。因此，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我作为一个党员，对于这种作法从思想上是不以为然的，如果向我个别征求意见，我会说明我的不同看法。但当时并没有给人这样的机会，这个矛盾已无法解决，为此我很不安。

7 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有些人高声叫喊，有些人在窃窃议论，有些人沉默不语。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

我在发言中，一般号召机关党委所属党员凡知情者要积极揭发……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会场的气氛很严肃。但在我的内心里则认为这种讲法，只是对丁玲等施加压力，无助于解决是非。这在我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灵上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宣部有同志竟认为我的讲话很“得体”。我对这种说法则感到不安和惭愧。我的讲话应该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调查丁玲等“反党”事实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定了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的结论。我这次讲话表示了党的“一致”，就表明对作协党组作法的支持。由于我的这种错误的迁就态度，就使主持批丁的人更无所顾忌了。从此以后，作协党组继续对丁玲等的批判和最后处理就不再征求机关党委的意见，而是由党组直接向中宣部主要领导人请示。直到1957年9月16日肯定丁玲等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外，还宣布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还说，她“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篇讲话还点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和戏剧家，把他们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文艺工作者。

这次的结论比1955年的结论，政治上更加重了，在所谓反党集团的人数上更增多了。1955年定的“反党小集团”只有丁玲、陈企霞两人。这次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成员扩大了几倍，包括冯雪峰、艾青等在国内外有影响、对中国革命文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这以后，又对丁玲等的作品继续组织了“再批判”，打倒了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一批有好评的作品。

八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

1958我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他说：“只有几个人参加，谈一两次就行了。”并说这是因为有的同志对此事有意见。对这种安排，我原已想到，不过没有料到竟这样急不可待。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为了便于了解，不妨回顾一下这几年发生的事：1955年在机关肃反运动中，作协党组要求对陈企霞、李又然实行“隔离审查”，说他们有托派嫌疑。中宣部机关党委认为根据不足，没有同意。当时党组负责人直接找到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才能获得批准（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张际春兼任，我是副组长，机关党委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在作协党组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后，党组向中央的报告说“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中宣部机关党委没有立即配合作出开除他们党籍的决定。陈企霞、李又然经过隔离审查，撤销嫌疑，释放出来后，立即向党委提出申诉，反驳了批判他们的“根据”。机关党委将这些申诉材料印发给有关同志，暴露了党组一些不正常的作法。在审查丁玲历史和“反党”错误时，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又有上述那些不一致；从1956年到1957年，机关党委参加的对丁玲问题调查的结果，实际上对1955年作协党组对丁玲等的批判是一个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给人一种印象，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形成了对立面。如果机关党委不是全错的，就表现不出作协党组的一贯正确。而且要使在批丁斗争中已经取得的“胜利”得到巩固，又必须清理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切怀疑。如：在整风开始前，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调查和否定了这个小集团的存在到底是

怎么回事？整风开始，周扬等在党组扩大会上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又是怎么回事？到底算不算数？……都必须向群众有所说明，作合理的交代。否则，打倒丁玲的新胜利虽然“战果辉煌”，但它是建立在沙滩上，是不巩固的。如果不把中宣部机关党委参与对丁玲问题的调查所得到的事实和相应的结论推翻，那便给某些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这样看来，在公开场合“谈谈”机关党委在丁玲问题上的错误，便十分必要了。

由常务副部长周扬直接主持这样的会（原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已调国务院二办工作），也可看出领导上的决心和重视。会议开始让我先作检查。我不能按照主持人的意愿检查错误。因此，我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他们都不认为在参与处理丁玲等问题过程中，机关党委有什么真正的错误。这样，满足不了主持人的要求，他原说“谈一两次就行了”的说法就不算数了，就改变了方针，要“彻底揭露，追究到底。”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

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4个多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由于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和丁玲“合谋翻案”。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人为“反党集团”，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两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的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调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部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管得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他调回来揭发问题，因他无可揭发，就叫他检查，给他戴了多顶“大帽子”，并被认定我们四人是一伙，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最后结果是我和黎辛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

在“十年浩劫”中，所有不幸者们又重受折磨，丁玲被送进秦城监狱，直到1975抖露了一番……九但是，历史总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不能违背。正像阴云和太阳相比，不管阴云密布，还是暴雨成灾，总是一时的现象；最后总是太阳把一切阴云驱散。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拨乱反正，许多混乱思想被澄清，许多被颠倒了的是非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1978后，经中央批准彻底平反，我们四个受害者的一切处分都撤销，政治上恢复了名誉。

除张海同志已逝世外，生活上都恢复了待遇，工作上作了重新调整。

1980 丁玲案被定为“右派”的结论，经中央批准，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随后各地为此受株连者也或前或后逐个得到平反或改正）。

丁玲 1933 年被捕后囚禁在南京的政治表现，于 1984 年 8 月由中央组织部报中央批准，再次被肯定并通报全党。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指出：1955 年、1957 年定丁玲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把丁玲打成“叛徒”属不实之词，应予平反。并指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其实，早在 1940 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对丁玲被捕问题就作了审查，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就已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从 1940 年第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到 1984 年最后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相隔 44 年，其中约三十年丁玲是戴着“反党”、“右派”或“叛徒”的帽子度过的。这三十年，她在桑乾河畔，在北大荒，在汾水之滨，她结识了不少新中国的农民，并同他们结为朋友。她体验了群众生活，丰富了自己创作的源泉……从 1940 年到 1984 年，更确切地说，从 1933 年到 1984 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年月中，丁玲同志的革命活动经历了肯定、否定，又肯定、再否定，再次肯定、第三次否定；最后才又得到党的总肯定。这是多么生动、又多么令人难于理解、值得深思的故事啊！

丁玲同志是个作家，但又是共产党员。她虽然长期处在被打击、被折磨、被贬斥的逆境中，但从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是由于她始终坚持以共产党员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终身志愿，而不是以单纯的作家，以个人名声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直到晚年，她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维护党的利益，在文艺战线上坚持党的方针，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与恩怨。她的作品获得人民的好评，也受到海内外国际人士的赞誉。

对丁玲同志一生的曲折遭遇，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到底应该怎样去认识？哪些是社会的必然？哪些是人为的制造？在各个有关方面，包括有关组织和个人，从几十年的反复过程中，又应该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有的人，对丁玲的历史，既不承认组织上已有的结论，也不相信现实的调查，却一味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怀疑来给人定罪并急于公之于众，这是为什么呢？我在这里说不清楚。只有让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事情已经过去。追究责任易于引起新的混乱，不利于团结，是不可取的。但为着避免重走错路，从思想上清理清理不正之源，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则很有益处。

最后，我引用贺敬之同志一段话：“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所能见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的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实是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不论是在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和民族敌人作斗争所经历的严峻考验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和党内长期的不幸遭遇中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反复考验更说明了这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86 年 7 月 3 日，贺敬之《致丁玲作品讨论会的信》）这一论断，我认为比较客观和切合实际。我引用在这里，

本文也就此结束。

1986（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李之珪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节录）

戴煌李之珪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

在这之前，李之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李之珪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5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7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珪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珪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作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其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违反党章吗？……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珪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

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随后，作协党总支才写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中宣部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与机关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认为，在“肃反”高潮中，对于政治上还没搞清楚的党员就这样开除党籍，肯定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虽然部务会议已通过了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方听取意见为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提议，决定机关党委与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审议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决定。

审议的结果认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开除陈、李的党籍是不妥的；如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党籍，而“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丁玲却尚未处理，这也不合适。另外，“反党小集团”除丁玲、陈企霞外，还有一个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只因为对丁玲、陈企霞“反戈一击”，就立刻变成了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而得以豁免，这就充分证明“反党”与否，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显得很严肃。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事实根据不充分，应拿回去研究重写。

1955 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的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党籍”已随着整个报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实。随后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这个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可是，待到 1956 年 5 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 月 22 日，他们二人就恢复了自由。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这与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这样，对陈、李二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1956 年 6 月 28 日，中宣部不得不举行部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关于他们的问题，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结果得到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首肯后，中宣部机关党委就组织郭小川、阮章兢、严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对陈企霞的问题一一作了检查；然后由张际春主持，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李之琏等人参加，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再由作协党组起草成《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

这个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工作还比较积极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由此而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对于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结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损害了党的团结。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反党小集团”论。

这样的结论经陆定一审阅同意，陈企霞却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关于丁玲，中宣部组成了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和作协党总支的一位同志为组员的专门小组，审查丁玲当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于 1940 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就作出过审查结论，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都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

因此对于这一次的重新审查，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别作了这样的指示：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 1933 年 5 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 1936 年 9 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 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作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 1956 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

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于是有些在 1955 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 1955 年 9 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于虚乌有。

比如：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原说丁玲 1953 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1956 年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过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作的漏洞。1957 年 1 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 年 5 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 1955 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 年先说：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开下去。正好，6 月 8 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如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珪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

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珪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明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珪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珪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周扬顿即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180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50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21年的流放，尝遍人间的苦辛……党“八大”代表李之珪，边参加“八大”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难路。1958年李之珪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临离开北京时，周扬对李之珪说：“要

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个月，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来，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骸吠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错误’，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谈就谈吧，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李之琏觉得无所谓。

接着，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张子意是1957年初，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听张子意这一说，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谈谈问题”，似乎是早已安排好的一个步骤。

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形势有点紧张”的时候，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

在这个会上，周扬说，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说得很轻松。但李之琏不相信他这种说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1958年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一人外，李之英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唯有×××，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的“检查”刚说完，周扬就站起来叫好。他认为×××这样的检查“干脆”、“痛快”，“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要李之琏等人都学习×××。

从此，周扬就把×××当作揭批李之琏等人的积极分子。×××从党委会议记录中，找出谁个在丁、陈问题上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都分别当作李之琏等人的“错误”证据。尽管李之琏他们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只因谁也不肯像×××那样说“周扬是完全正确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还被说成相互包庇，毫不揭发，形成了“负隅顽抗的小集团”。

于是在陆定一的支持下，批判会逐步扩大，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几百人。“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就与“八大”二次会议穿插着开——“八大”二次开会，李之琏等几个代表就去参加“八大”二次会；“八大”休会，周扬就又主持开会批判李之琏等人；“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中宣部的这种批判会则继续开。大小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开了所有宣传文教部门上千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宣布处理结果的大会。

在批判揭发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说，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他曾问过李之琏：在全国文艺界，还有谁参

加中央委员会比周扬更合适？李之珪遂和他谈了对周扬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这种揭发，立即引起周扬的全神关注，也引起与会群众的兴趣，一个劲地要李之珪交代对周扬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这时就向周扬检举李之珪在河南会议上，就丁玲等人问题的处理，提过对周扬的意见，说李之珪在“八大”为丁玲翻案。

这等于给追究李之珪与周扬之间关系的浪潮加刮了台风，随之李之珪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质问——“你对周扬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你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批评的那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扬？”……周扬也起来指责李之珪：“你这是把我们看成了‘娄阿鼠’啊！”在这连珠炮似的质问声中，李之珪心想：索性把我对周扬的看法和盘托出，作为我的“思想检查”，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他说：“我要求给我一些时间作准备。”群众的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来。

但是，在专门让李之珪“检查”对周扬看法的大会上，李之珪刚刚开了一个头，只见周扬与形式上的会议主持人张子意悄声嘀咕了一阵，他就被赶下台来，不让他讲下去，转而追问丁玲给他写过几次“反党”信件和材料。

李之珪记得丁玲写的信和材料都印发给所有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了，不记得多少次。周扬随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对，发现有一封信并没有被印发，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为名，搜查了李之珪的办公室，从文件柜中搜出了丁玲写给机关党委而没有被印发的有关周扬的那封信。

周扬如获至宝，说这是丁玲写给李之珪的“反党密信”，是李之珪与丁玲“合谋翻案的罪证”，是“私藏变天账”。

李之珪申辩说，在印发过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后，周扬曾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他为什么“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所以对丁玲后来写的这封信才没有印发；但他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任何一个党员交给组织上的材料，又不能弃之如废纸，谈不上什么“私藏变天账”。

周扬越听越火冒三丈。他怀疑李之珪之所以了解他的许多情况，《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可能是这些情况的来源之一。因为他知道，公木与李之珪在延安时，曾共同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过。在这之前，李之珪在1932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时，公木作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与李之珪共同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1932年冬，鲁迅在师范大学操场上演讲和1933年4月他们二人又都是参加者。后来都到了延安，他俩又在一起学习，准备党的“七大”召开后一同奔赴敌后的……周扬遂决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的公木急电催调回来进行批判，追查他与李之珪的“交往”和向李之珪反映过哪些“问题”房其实，公木在作协党组讨论丁、陈问题的座谈会上，也讲过一些周扬不中听的正确意见，周扬就对他也怀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当公木从国外归来虽然什么也没交代，也被划为“李之珪、黎辛反党集团”的同伙。

关于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处理，周扬给李之珪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张际春对这种故意违背事实的随意乱说，非常反感。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专门小组给丁玲作的历史结论，是集体讨论，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谓的‘错误’，也不能由李之珪个人负责！”个别群众对

张际春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说明，当作是为李之珪“开脱”。周扬看到了会议《简报》有关这个情节的描述极为赞赏，说“这个意见是提得好的。”张际春就此再不参加批判李之珪等人的大小会议。

但是，周扬觉得，只在丁玲等人问题上拼凑李之珪们的“反党”材料还远远不够。他又打电话，又登门拜访，想方设法去找过去同李之珪共同工作过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珪的“反党”线索：“肃反”运动后期，李之珪曾作为文教部门的代表代替张际春，参加过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为此，周扬就去拜访罗瑞卿；大军渡江后直到1954年初大区撤销，李之珪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后担任过组织部秘书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和党校副校长，为此周扬又去找了当时也在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的钱瑛和统战部长的张枫一。结果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到被访者的拒绝。可当他回转身来，却在大会上大放空炮，以壮声威。他对李之珪说：“你不要以为过去你熟悉的人都对你有好印象，现在他们对你的看法也改变了！”对李之珪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珪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珪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珪、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珪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珪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珪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珪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气，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40年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寇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酷刑可以摧残生命，不能泯灭人的魂灵；念党光荣伟大，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

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不再往来……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

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

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1957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念、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念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

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 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 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 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 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 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分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1942 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 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 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 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

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

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经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起了“肃反”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陈说话的李之琏们，突然又听说温济泽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非常生气。

他立即给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梅益遂把温济泽找去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呢？”温济泽早忘了这档子事。但梅益是个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扬的电话就下功夫调查过了，见温济泽一时想不起来，就把别的编委的笔记拿给温济泽看。温济泽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向梅益道明了原委。梅益说：“你自己去向周扬说吧！”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济泽也是听众之一。待周扬报告完，温济泽连忙上前不无检讨地汇报了当时的实情。但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中宣部和梅益要温济泽作没完没了的检查。

1958 泽向“右派”一边推了一把。

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 11 个月之后，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1958 十分震惊，连忙给廖承志打了电话，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了，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没法改了……胡乔木当部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

他们都很了解，1929 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以“年龄不足 16 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3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公安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又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 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温济泽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18岁。

在监狱中，他被狱中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5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 了延安，虽然只有24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 总编辑，温济泽又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戌材，又转到阜平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多才多智、谦逊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李、温二位各自走了漫长的坎坷路河北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是长城外的一个穷县。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本想把李之琏留在地委文教部门干点事儿，以示对这位不幸落难的老同志的照顾；但李之琏执意要到艰苦的农村去，重温战争岁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13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 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

队干部向社员家庭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克：“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1960年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元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伞忽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齐，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个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

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

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地发展到 3000 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的冤，却难而又难。1962 年 1 月中央召开 7000 封信，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7000 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 1957、1958 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 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 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作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 1934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 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李之琏说：“问题已经过去了 15 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

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条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

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

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我写好了。”“那你就放下吧。”“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琏当作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待的是一男一妇。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示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

李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40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吗？”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我替你转去，试试看。”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最近局势又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尽冬丛生的人生终将走到何年何月……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也是对党忠贞不二，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作为一个

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作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

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摘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站门一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地，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1972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陈述书

陈企霞 1955 年 2 月 22 日，才由阮章竞同志和崔毅同志以及中直党委另一个同志一起，宣布停止所谓停职反省，恢复了我的自由。3 月（疑为五月——恭怀注）24 日，在中宣部党委会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党委书记李之珽同志叫我作一总的陈述，以资研究。我在三个小时中将初步意见陈述完毕，李之珽同志提出要我将它写成书面的。这就是根据当天发言重新写了一遍的书面陈述。

我准备以下列三个部分来叙述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完全以事实为根据，我相信我完全能以足够的冷静的态度。这一陈述的整个精神是对事不对人的（自然，事情是人做的，谈事也不能不牵涉到做事的人）。崔毅同志那天说，即使你的牢骚也要倾听，这精神我很感动。我深深检查自己，我认为我确实没有个人牢骚，个人的牢骚是完全不值得发的。这里要加以声明的是，我所根据的事实，我能保证全是真实的。当然这是我在自己的角度上所接触的事实，是否是完全，或是某些事实我看重些，某些看不够重或竟至忽视，这也不能说没有可能，何况我被和文艺界隔离，说多已有三年之久，至少也有九个多月，有些事情可能我完全不知道。但事实总是最雄辩的，可以互相印证，并且可以继续根据事实讨论看清，以求把整个事件弄清楚，这完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很明白的。

一第一部分我所陈述的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我根据亲身遭受的事实，已经长期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了一幅这样的图画。这里面，很多地方不能用一般的合理合法的原则去解释它。我在自己的解释中有时自己也是不相信，但却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新解释，这怎么办呢，我请求党的组织帮助我。譬如说，我在和阮章竞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关于我的事件，我认为大概是有那么几个人发了神经病，或是有人一定要故意为难我，才造成这矛盾百出，百思不解的一连串事件。我也在一次给郑重（我的老婆）的信说到，我说：人们用这样的方法审查我的历史，这真是很有意思，世界上只有天才和疯子，才能从我的历史上做出“犯法”的结论来的。我自己也知道这样解释是不对的，人们并没有发疯，大概也不至于有人故意长期要和我为难，但是除此以外，我总无法解释一连串的事实，这是我最苦恼的事。只要有了正确的解释，我相信一切所谓思想问题，情绪问题，态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件应当从 1954 年文艺报发表批评于黑丁关于李准小说的文章开始说起。众所周知，文艺批评在当时很受一些责备，作家们也不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原文不清——恭怀注）思想混乱，文艺领导机关缺乏战斗性和原则性。笼统地责备文艺批评粗暴，或是文艺批评软弱，都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两种倾向同时严重地存在）。对新作品简单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而且不大愿意展开讨论，这可以代表前者。读者要求有更多更好的批评（这完全是对的），引起编辑部的责任感，这也是对的。但从这里有时因考虑不够而发表了一些不够全面的有缺点的批评，这自然也是很难完全避免。问题是在学术问题范围内应当允许讨论，而这种精神整个文艺界都很差，我认为这才是“粗暴”的主要原因。至于软弱，那只要指出对胡风，对红楼梦（在文艺范围内说）思想上的斗争的迟疑和犹豫就足够了。这种摇摆状态，是文艺批

评最大的特点，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报编辑部本身，冯雪峰同志对文艺批评是很消极的，我也同样是觉得没有办法，不过我因为主持日场愤体编辑业务，问题就要碰到，因此有时也想在自己认为问题比较明显的情况下，组织一些批评文章。这是这事实的前提条件。

于黑丁的文章发表的时候，编辑部侯民泽同志（他分工阅读中南的刊物）谈了文章和李准的小说，在会上汇报，认为于的文章对这小说来说是“拔苗助长”的方式（编辑部认为：对新作品十分过火的捧场，这是粗暴批评的另一面，这倾向也是应当批评的）。我在会上提议他作些准备，起草一个写作提纲对于的文章可以提出意见。侯将提纲交我以后，我发现提法上有些过火之处（他因为要指摘于的文章捧得过火的地方，就把小说本身的缺点强调）。我不时发现他有些火，就要他把小说也找来看。我看了小说后，就提出请他注意，这小说是应当肯定的，请他修改文章，并经大家看过修改后署名李琮发表了。这文章引起很利害反响，首先，河南文艺界对这小说本来有争论，一部分不重视小说的人认为文艺报支持了他们，纷纷写信来拥护李琮的文章。另一方面，于黑丁同志写了一封信给冯雪峰，提出抗议。雪峰同志事先并没有把于的信给我看，也没有在编辑会议上提出。在一次开会回来的车上，他把回于的信给我看，信上表示编辑部不对，并提到我（和——恭怀加）他（有——恭怀加）同样意见。我在车上即向他提出异议，我认为于的文章是有毛病的，可以批评，也可以讨论，不应该先向于说我们全错了。我不同意对文艺批评用这种庸俗的“息事宁人”的方法，我提议把信中我的名字划掉，两人这就发生了争吵，我认为这样不分是非，各打五十板的方法，对工作并无好处，并损害了文艺报工作。

这件事在作家协会引起一些反响。也在中南地区发生了反响。当时编辑部收到的全是拥护李琮文章的信，当我们编辑通讯员内部通报的时候，我在会上提议可以把这些意见编进去。当这些材料编好送给我看时，当时正是冯和我关于此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过去通讯员内部通报一直是由我负责审稿的，这次我嘱咐编通报的同志将这一部分材料同时送冯审查，并写了一封信给冯，说明请他审阅的意思。冯看了并未表示反对，就退回来了。我们也就发了稿。当通报出来之后，我们开始收到另一部分读者反对李琮文章的意见（主要是河南日报的），这时我们也开始选择反对的意见编入编辑部内部通报（另一种内部材料，主要是供文艺界领导同志参考的）里。

正是这一时候，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的几篇小说，在文艺界引起了普遍的意见。

作家协会党组准备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进行关于党的四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周扬同志在这一次党组会上，首先对文艺报李琮文章及人民文学路翎的小说都提出了意见。

他首先说发表路翎的文章并不是文艺方向问题，但对文艺报的问题，却提得很尖锐，这引起我的不平。同时，他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引起我当时不得不插言提醒他。譬如他说，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说这是纪律性问题。

我当时提出，过去并无此种规定。他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这次也就算了。又说：当《人民日报》转载了李准的小说并加按语，发表后文艺报却说这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反对党报（由于他既不根据事实，却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我立即插言，说，周扬同志请你

注意，我们并不知道党报要转载这一小说，同时文艺报的文章是半个月以前发稿的，这恐怕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

这引起他大为愤怒，他立即拍了桌子，并不许我发言），又说，我们在通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是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把反对的意见压了，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云云（事实已如上述，完全不是这样），他还说，我们请冯审查这部分材料也是无纪律无组织倾向云云。

党组会决定组织文章来反对李琮，当（即——恭怀注）推定由康濯起草，两三天后，康濯文章写出来，并经过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修改，送到编辑部发稿。我仔细阅读康的文章，发现经修改的地方很多，我认为这篇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当时即向冯建议，再修改时开会讨论这篇文章，为节省时间起见，可由我先用红笔改一遍，如有意见，再改回来。晚上，康濯在会前向我说，原来他写得比较温和，后来就改得更尖锐了云云。晚上的修改会议由于各人坚持己见，实际上成了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家都很不耐烦，我也只好不再坚持，重新又改回来很多，这就是发表了的那篇文章，并由冯雪峰写了按语，承认文艺报对这一篇作品看法不对云云。事实上是这样：康的文章中几乎认为于的文章没有毛病，但后来中南长江文艺转载这一文章时，却不得不首先承认于的文章分寸很不对。这就和康的文章有了原则上的矛盾。

从这一情形看来，到现在我还以为：1．于文章是完全可以批评，应当批评的，决不可以归结为无纪律性。2．李琮的文章有缺点（即对小说肯定不够），可以另外用文章来进行讨论，而不需要用完全否定的过分严重的方法来“纠正”。3．编辑部对这小说估计不够高，应当用仔细的对小说的再评价来进行教育，而不应当用“整思想”的方式，这反而不能解决问题。事实确是如此，文艺报发表了康的文章和按语，编辑部人员都是反感的，都觉得有冤无处申，即如亲手起草按语的冯雪峰，在对待新生力量这一问题，显然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从相隔三四个月以后他在处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所加按语的错误来看，就可以更明白了，李琮事件就这样结束。在接着所开的学习四中全会文件的党组会上，很多人就针对着我，并围绕“反领导”这一中心对我提出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党组会这样开法是不民主的。后来也就不开了。周扬同志说要找我谈谈。我们也谈过一次话，他要我检讨，我也认为我应当检讨，于是在一次周、冯、丁、林、我五人的小会上（在丁玲家），我作了一次检讨，主要是检查自己和领导同志的关系。我承认我有时为了强调讲道理，自己态度不够注意。并举出幼年时代读过的一个战国故事为例，我并说：从我的认识，自然认为这故事和我们所处情况大不相同，但我自己认为领导同志对下面同志应当谦虚些，多倾听些，这还是要注意的。在这一会上，决定我于6月1日休假，下去深入生活，6月份我未离京，主要是想做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并计划把几篇答应别的杂志的文章写起来（后来只给中国青年写了一篇介绍《保卫延安》的）。有一次在丁玲同志家里，她催我赶快下去，我说明上述原因后，并附带地说，我也很老实告诉你，我的经济也很困难，这几篇文章写了后，多少也可以安一安家。第二天，她派人送来了200元钱（我和丁玲除工作外，平常并无这种私人生活上的这一类交往，当时我觉得盛意难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即写信道谢，说惭愧无地云云）。我本来打算七月离京，谁知7月1日我脊骨神经炎大为发作，躺在床上20多天，才能起床走动，一直到9

月初，才和戈扬、艾青一起去浙江海岸阵地去。刚到上海第二天，就收到周扬同志的电报，命我立即回京。

这当时，就是发生了红楼梦问题的时候。

关于李、蓝文章的发表，我正在休假期，在我未离京前已在会议上听过一些传达。我回京后，当天就参加了会议，好几个同志要我在文联大会上做检讨。当时文艺报内部的工作检查并未结束，很多问题尚未弄清，编辑部同人，开始对我的意见是不多的，有的也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红楼梦问题，我并没有直接的责任问题，编辑部的检查工作尚未有结论，在这样的时候，我曾表示无法检讨，实在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认识自己有多少错误，有哪种性质上的错误。和这同时，一起开着四种会议，在中宣部由周扬同志主持的检查文艺报的会议，作协支部讨论我处分的会议，文联召开的从讨论红楼梦问题，批评文艺报问题，批评胡风问题，编辑部内部检查工作的会议。这些都交叉着开的。我在文联的两次（会议上——恭怀加）做了敷衍了事的检讨，在中宣部会上和支部大会上做了比较深入的检讨，在编辑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些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一月。这一时期，我的思想上是极端矛盾的。

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在作协支部大会上，作家杨朔并无充分根据，首先提出应当把我撤职的建议，作协主席并未充分讨论，更没有让受处分的本人出席，就做出了撤职的决定。在最后的支部大会上，我则勉强地接受了处分（也是经过反复的）。我首先在中宣部的会上提出请求让我说清事实，我说，在这些会所谓揭露的一些事实，可分三类，第一类，根本不是事实，第二类，别人的事实强放在我头上，第三，多少有些事实根据，但看法问题，尚可讨论。我话未完即被斥为向党进攻，反党。我一方面，认识到必须坚持事实真相，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气氛和某些做法，使我根本丧失了当时为自己辩护的勇气和可能。同时，我又受了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劝告的影响，例如，丁玲说，文艺报既然在红楼梦问题上确实犯了大错误，又被胡风攻击得一塌糊涂，譬如赌徒，大的本钱蚀光了，你难道还想捞回一些小的吗？例如冯雪峰对我说：你文艺报工作不干了，未必没有好处，你可以去创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例如艾青说，周扬同志已向刘少奇同志反映，说你是抗上，还有什么办法呢，咽了这口气吧。支书康濯则说，如果你当支书，也只好这样干吧。这以前，周扬同志在中宣部会上说，要斗争胡风。当时，文艺界好些同志传说陈企霞要被开除党籍。

这些情况使我丧失理智（这其实是自己软弱），但是使我产生应付式的检查和勉强接受处分的重要一点，却是我听了周扬同志在中宣部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指的胡风之类，“安内”主要自然是指我了。我已知道我们必定要对胡风展开斗争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自己意见，相持不下，就会影响这一战斗。我从这样的“打算”下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处分。我当时还存了一个希望，我认为中宣部总支或中直党委在批准这处分时可能还有机会让我说一说，但终于没有。我在那样空气下自己也不敢提出，当时的空气对我说来是紧张的，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切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

——恭怀加)审查,这委员(会——恭怀加)也在大会上产生(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

这种情况,使我在精神上有了很大负担,一直到梅山后(我3月20日左右离京)才在群众生活中排除了一些,情绪也就健康了些。但是,当我在梅山读到《人民日报》公布第一批胡风材料时所加按语提出不应作假的检讨,我实在出了一身冷汗。

我觉得我的勉强接受处分与应付式的检讨,何尝不是一种虚假。这想法,当我接到周扬、刘白羽两同志调我回京的电报后到达北京的第一天,就向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同志陈述了的。

1955 我按照来电的要求抵达北京,1日晚即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第一次会主要是文艺报几个同志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信是我写的。会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同志留下我来同我谈话,我申辩了一下,并提出一些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不能把很多不明不白的东西,强加在(我——恭怀加)头上。我举例说,过去认为我在编辑部一次谈话中所曾举出的“相濡以沫”的话是一种反党的罪状,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恰恰在讨论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短文中也引用过这句“成语”,为什么允许别人引用,不允许我引用呢。我希望弄清各种事实。周扬同志回答我说: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这句(话——恭怀加)引起我很大反感,我认为这就根本不允许我说清事实,当时我心里想,这大概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方法,但是,我不敢把这话说出口,怕又激怒了他。他又说,当你被当作思想典型的时候,为什么那样不愿意呢,做了典型还可以给别人作教训呢(大意)。我当然也不同意这样意见,但我已不想再辩护了。丁玲同志说要讨论陈企霞的工作与思想问题,如果不先解决她自己同周扬同志的领导关系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她这话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她后来说:她在这么多年来几次和我一起工作,好像背了一个大包袱,也该卸一下了。这话也引起(我——恭怀加)反感。我是为党工作,并不是为丁玲个人工作。如果说,共同工作的同志身上的缺点成为包袱的话,那么谁背谁的包袱,背多背少还值得大研究呢。最后,周扬同志又说,你看,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检举你,该不是布置的吧。我当即回答他说:如果是正确的思想斗争的话,不但可以布置,而且也是应当布置的。问题是斗争得对不对,不在于是否经过领导的布置。

这以后,又继续开了二次党组扩大会议,空气愈来愈紧张,所有所谓“揭露”的问题,已使我不能辩白,我在向组织上写了一次书面报告后,就不让参加这样的会了。在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的会上,同一个在去年中宣部会上提出要检查文艺报方向路线却没有丝毫结果的张光年(即光未然)同志提出要停止我的党籍,审查我的历史,党内公布我的问题。他并(原文不清——恭怀注)说去年讨论红楼梦时他曾向周扬同志提议要在党内公布我的材料,周扬没有照办,所以陈不承认错误云云。8月19日晚上,我被宣布逮捕(有逮捕证),搜查了住所,但始终并未宣布是犯的什么罪。我当场说了这样三句话:这样的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范围搞乱了。康濯、张僖两位同志(他们是带来捕人的)你们以后检查要深刻些。我是服从政府法令,才勉强就捕。

这以后,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还使我莫名其妙的被迫丧失自由的生活,到1956年5月22日为止,共计9个月零3天。

这就是我所遭遇的整个事件的一幅图画。我编了 5 年文艺报，从李琮文章的讨论开始，实际上是处于“失业状态”三年，其中 9 个多月失掉了自由。这为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找不出解答。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深深思索所有的事件和问题，我对于我在这样的运动中采取了应付式的检讨，这才是我最大的最严重的错误，我甚至应当把自己这一行动看成是一次思想上政治上一次严重的摇摆，不管为的是什么，不管当时受多少自由主义的劝告，这责任我自己是应当负的，并且一定要作为个人工作经历中一次最深刻的教训。

其次，我在深刻的思考中发现，从思想问题与工作问题开始，一直到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贯串着在对我的斗争中，其内容和方法都充满了浓厚的逼供信色彩，这首先表现：先对一个人有一个固定的看法，然后发动群众进行所谓“揭露”，对于“揭露”出来的事实，完全不加分析，有些是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实是别人的，甚至这事实的当事人本人也在场，也不加说明和区别。相反的，对于有些关键性的事情，并不积极调查研究，或形式上调查了而实际上却按上述先入的固定看法来选择这些所谓“事实”，以充实自己原先固定看法，对于会上某些既不了解情况，却又逞一时之快的无根无据的意见与建议，会上既不讨论研究，看重相反之见，会后也完全缺乏科学的冷静的考虑，这就会轻率地作出一些不对头的结论来了。对于一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党员，完全放弃了历史的、全面的认识与考察。在这些会上，根本不能产生不同的意见，不要说允许本人声辩了。

我在被捕一次书面（意见——恭怀加）上，曾说逼供信分子惯于“金里淘沙”，然后“聚沙成塔”，就当作一座伟大的建筑物，他根本不考虑后果如何，也不想一想，这建筑能存在多久。

以上主要是我遭遇的经过情况，自然，由于我失去了自由，还有很多事实和很多所谓“事实”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是，仅仅按照我知道的事实，已足够构成一幅使人深刻考虑的图画了。下面，我将在第二部分，把一些过去构成所谓反党问题，以及构成处分的一系列所谓事实，作一个分别的陈述。

我相信，让事实来回答各种各样的看法，这就是最后必然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的。

二我在第一部分的陈述中已按事件的次序叙明了全部经过。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最初的斗争开始，一直到宣布逮捕，究竟有些什么具体问题，在每次会议或谈话中屡次被责备、议论，并且有些被作为处分及犯罪的具体的内容呢？这也就是我屡次提出要求让我说明事实而恰恰不但被不允许，反而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大帽子，甚至得到：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加以逐条的说明。我在中宣部会上曾提出事实的三种情况。但并没有给以陈述的机会，我在给公安部某局长的信上也声明，如果真有什么材料，我敢说在一百件材料有九十件材料是假的，留下一些多少有些根据的话，也是被歪曲了。这话确实有些过分，如果有些问题在思想与工作的范围来说，我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话，那么，从纪律处分，犯罪这些范围来说情形正是如此。人们对我的责备首先把事实的非事实的汇报弄到，然后又把事实实际范围弄乱，这就使问题看起来复杂，而处理更使人莫名其妙。

有一次康濯与我五弟陈适五谈话，说我有六十条罪状，可惜他不敢公布。我倒愿意知道这六十条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破烂的垃圾堆，很可以在讨论与辩驳的阳光中晒它一晒，看还能留下些什么。我下面逐条的事实，大概很

多是在那六十条里面的，我虽然不知道那六十条究竟是什么，那么先让我把我已知道（大部分是在斗争会和讨论处分中提出来的）的每一条先陈述一下吧：首先，应当说一说所谓“反领导”的问题。

刘白羽同志以及还有些同志曾在会上诬蔑我是一贯反领导的，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信口胡说。从1940年我到延安开始，16年来我先后曾和许多我们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工作过，有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有时直接作他们的助手：如胡乔木、博古、杨松、陆定一、丁玲、艾思奇、艾青、沙可夫、成仿吾、张如心、萧三、周扬、钱俊瑞、李伯钊、冯雪峰等等。自然，在工作过程中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在互相了解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但这是在实际工作（原文不清——恭怀注）是不可免的，（原文不清——恭怀注）的意见，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而且甚至应当是受鼓励的。如果有时同个别同志由于（原文不清——恭怀注）不同态度不够好，或者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意见而争论了一下，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正常的事情，从哪里可以得出一些反领导的结论来呢。

这次（原文不清——恭怀注）处分以来所提到的，具体是指和周扬同志的关系。我对周扬同志的理论、工作与作风，在其中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在专门会议上也提出过（我从进北京城以前，除了在张家（原文不清——恭怀注）时期不到一月外，并没有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在上次口头陈述时，曾提及在到北京以前同他的关系和对他的意见，（此处从略）。但我从来没有“反”他的意思，更没有“一贯反”的事实，事实却是相反，我只要举第一次文代大会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基本情况就可以了（是的，最后却发生了一次争吵，下面应当说到）。

最常被人们提到的是两次和周扬同志所谓“吵架”的事件。人们说我拍桌子，其实两次的桌子都是他拍的。第一次就发生在文代大会结束后，整个第一次文代大会从三月到八、九月结束，我在周扬和沙可夫同志领导下，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周扬同志对我也没有提过什么意见。我除了工作中的问题以外，对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意见。在文代大会结束的一次党组会议上（当时我是党组书记），周扬同志严厉责备我不帮马少波找房子，认为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并说我对马彦祥发脾气，我稍稍声辩了一下，他拍桌子骂我：“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觉得受侮辱当即回答：“你这算什么领导。”这就闹僵了。周扬同志向在座三四十个文艺界负责同志说：“你们大家说说，这太不像话。”当时并无任何人发言，后来周扬同志只好说：“沙可夫同志，开了会同企霞谈谈吧。”事后，沙可夫同志同我谈了一次不关痛痒的话，也就算了。

必须弄清楚这次争吵的具体内容，才能使人明白真相。第一次文代大会快结束，周扬同志筹备设立文化部，在这时期文联和文化部的工作搅在一起，我也曾帮助周扬同志做一些有关于文化部的事情。但慢慢地就分开来了（这情况是自然的）。文代会山东代表马少波，一家好几口，还有别的人，周扬同志决定留他们在文化部工作（这我是知道的）。有一天，事先并未接到通知，马少波同志派人拿着周扬同志的条子要我立刻给他们找房子。我当时认为马少波等已决定在文化部工作，不应由文联借给住所，文联房子虽有一些，但当时都住满了人，马少波他们人多，一时也无法腾出空房来，而周扬同志事先并未交代清楚，我没有准备。因此我告诉来人，暂时不能解决。事后我告诉周扬、沙可夫同志，这就是全部经过，我认为这事情我并没有错

误，这虽是上级同志交办的事，但究竟不能（原文不清——恭怀注）地就（原文不清——恭怀注）作命令，而且即使是上级一时不了解情况而下的命令，下级实在一时根本没法做到，除非特殊情况，也是允许再作商量的。周扬同志有什么必要坚持这是命令而且在会上大发脾气，骂我不像共产党员呢。本来，在进城不久，工作紧张的情况，这种事情也是普遍可能发生的，如果不采取上下互相按实际情况来研究并体谅困难，那么，试问叫下面同志如何工作呢。

马彦祥事件更叫人莫名其妙，当时马是文代会演出方面的负责人。有一次，为了要求梅兰芳演出一次出钱的问题，马与我在电话中商量演出报酬，我当时并不了解梅的演出是不能少钱的，曾向马提议减少演出费用（这费用当时觉得很大），马发脾气把电话挂了，却到周扬同志处说我发脾气把电话挂了。马彦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很多人是知道的。周扬同志听信了他的话，不查查具体情况，却拿来作为材料在会上这样数落责备我，而且更不允许我说明事实，那又叫人怎么办呢。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小事，甚至是一些无原则纠纷，有时更是实际工作中很难避免的事，却长期被作为反领导的内容，难道有这样的必要吗？第二次争吵，桌子也是周扬同志拍的，那就是讨论李琮的时候，我已在第一部分叙述过了，不必重复。这些事情，周扬同志在会议上，以及别的同志也常常提到，但是，我想，即使我有什么错误，周扬同志的胸怀能和他的工作岗位相称，这些事一经说明白，我相信他自己也会哑然失笑的。又何必严重得提到反领导的高度，使人承受不起呢。

另一个事例也是周扬自己以及别的同志在会上常提到的，就是说，周扬同志找我谈话，我抗而不去，这也不是事实。那就是在第一部分提到过李琮问题以后那一次，会上说过他要找我谈一次话，我天天等着，过了很久，有一次他的女秘书来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今天晚上去谈话。那天晚上，我们已决定开党小组会，我在电话中向秘书同志说，是否可以改一改期，因为要开党的会议，她去问了一下后说可以。

后来不知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谈了的。那次谈话，情况是良好的，我想周扬同志也该记得。

所谓反领导的另一个事件的内容是一篇我所写的文章《关于文艺批评》的审阅问题。这问题也是周扬同志自己在会上提到的。这篇文章本来是批评上海文汇报罗石（现已知是胡风分子）和北京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王淑明所写两篇文章的，这两篇谩骂了当时的文艺批评，完全是错误的。编辑部决定我写这篇文章，写好以后，大家的意见是这问题较大，应当请乔木同志审阅一下（当时乔木同志经常对文艺报有所指示），我把来稿寄给乔木同志后，就想到也应当请周扬同志审查，所以接着也送了一份请周扬同志审查。乔木同志很快把文章寄回来了，改了很多。不久，周扬同志的审阅稿也退回来了，也改了一些。当时因为付印很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他们两人改的并无矛盾之处，就综合两人所改的，完全没有损害他们所修改的，付印了。刊物出版后，乔木和周扬同志都并未提出别的意见。但事隔一二年后，周扬两同志却提出这也是反领导内容之一，这问题一直使我不懂。附带说一下，在批评文艺报的文联大会上，刘白羽曾经发言，大大批评我写的这篇《关于文艺批评》文章。

他实在很替胡风分子罗石诬蔑批评翻了一次案。至于王淑明的文章，他在文章发表的同时已作公开检讨，如果根据刘的意见，他也应该翻案。

整个所谓“反领导”的内容就是如此。下面，我再以事实为基础，陈述一些常被提到并作为处分与定罪内容的事件：关于所谓反党问题，因无具体内容，只是一顶空帽子，所以我无从说起。

关于所谓反中央问题，指的新人物问题的讨论。

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关于整个新人物问题的讨论，说来话长，此处从略。说我在这问题上反中央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二次文代会期间，传达过中央对文艺工作六条意见，其中有一条提到写英雄人物是否能写缺点问题，传达只提到，某些实际人物身上的缺点，在重要描写的情形下可以忽视，并举水浒传描写鲁智深并不涉及他的恋爱家庭生活为例。我从来不曾主张过人物必须写缺点，或绝不许写缺点，我以为这样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人物有大小，作者批判和反映人物，本人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有高低，而且优点缺点，如果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条件，是无法思考的。

还有人物优点、缺点，是否描写也被决定于作品题材和主题的要求。能写或不能写，万应灵方是没有的。我认为我这主张并没有和中央所传达的矛盾。而且这是纯粹学术和文艺学理论的问题，即使有分歧，也允许讨论，怎能归结成为反中央的罪状。

何况我起草的一篇文章，本来是提供讨论，也并未发表呢。

在中宣部会上，被提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是所谓“自封主编”的事件。林默涵同志大声疾呼地说：就这一条已经够了，同饶漱石一样。事实是如何呢？文艺报初办的時候，编者并未署名，决定丁、陈、萧三人编文艺报，并有一个编委会，我并未参与。编了不久，有一次丁玲同志说，她已同周扬同志商量过，决定编者署名，由丁玲主编，我和萧殷副主编，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问题，随便说了一句，署名不署名没有关系，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同志迟疑了一下，她说那么慢一点发表吧，再商量一下，大概又隔了一二期，丁玲同志才说她、周扬同志的意见，可以署三人主编。这件事经过就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问，如果我是自封，为什么封了二三年并没有人在会上或是在一定场合下提出，作为领导的丁玲、周扬根本没有和我谈过，隔了三五年才提出作了罪状呢。我还可以问，后来冯雪峰主编了，我只是编委之一，却负责日常编辑工作，但我并没有提过任何意见。如果我是一个醉心名位不择手段的人，能这样吗？在我入党的二十多年中，如果查出我曾经为个人名誉地位及待遇进行过任何不正当的活动，那就可以说这条罪状还有可能。否则问题这样的提法是毫无根据的。事情可奇怪的还在这里，我自封后来在处分决定中曾屡次改字，由自封改为自居，又改为自称。何地自居，何处自称？这难道不都可以说是捕风捉影吗？另外一些称为罪状的，是从我平时谈话中东摘一句，西取一段，不顾事实，却歪曲为加上一顶大帽子所造成的。有的更为滑稽，不是望文主义，就是在你所用的比喻的跛脚（列宁引用过法国谚语说，譬喻总是跛脚的）部分大做文章。下面可举一些常被提起的著名的例子。

所谓“幸福”问题。作协整党后，进行评级会议，在编辑部会议上。编辑周文博谈到说，在企霞同志领导下我们是幸福的。我当时即批评了他，我说：在党的领导下，到处都是幸福的，如果你有进步，那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后来，当时和全编辑部都闹得不好的王知还，取了周说的一句话，根本不提我对他的批评，到处告状。这以后，很多人都向王知还学，于是这一条就这样作为“独立王国”的主要内容了。后来周还特别向党支部写过汇报

说明真相，但没有用，这仍是我的处分决定里的重要的一条。同志们，什么原则允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的？（附带说一句，如果文艺报编辑部真是独立王国，那么首先“揭发”的正是王知还。如果陈企霞真是像处分决定中所写的，那么我也应该向党建议，应当大大奖励王知还。如果她真正首先是这样一个大案子的发难者，那么，我以为奖她为一个劳动英雄，先进工作者也不算过分，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正是王知还，她歇斯底里地诬蔑了全体文艺报编辑和工作人员！虽然，即使她，也还不敢加上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等等大帽子哩！）所谓“相濡以沫”的问题。这是我在编辑部一次谈话中曾援引到过的一句话。

事实是怎样呢？当时文艺报工作困难，编辑部内情绪不好，主要是因为文艺批评展不开，不能回答读者的要求。在大家的苦闷情绪下，有时个别年青同志常为小事争吵，有一次大家对唐因提出苛求的意见，我谈了一次话，我大意是说，我们工作有困难，这是事实，但是困难不应使我们产生无原则的纠纷，相反，我们应当在小问题上互相原谅，互相帮助，这帮助也包括互相正常的批评在内，但不应该闹无原则的纠纷。我们有党的领导，当然不是涸辙枯鱼，但是我们自己力量很小，在困难尚未解决之前，应当互相帮助，学习“相濡以沫”的精神……。人们也可以说引用这句成语不够妥当，也可以说这样说不够全面。文艺报当时的困难原因很多，但文艺报的党组织，或是某一个具体负责同志领导得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人们为什么可以从这句话里得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是“独立王国”的表现呢？就是周扬同志，他不是也不能不承认自己对文艺报曾经放弃领导吗？所谓“创痕与苍蝇”问题。这句话之常被提出，并竟被说成是我诬蔑党，诬蔑同志的证据，这也是很可深思的。这事情发生在这样情况下面：有一次萧殷同志去北大做报告，回来对文艺报同志说，在北大大学生中有人说过，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是死对头，是互相揭底的。文艺报同志都很骇异，对这种流言蜚语感觉很不安。我在一次会上说：党叫我们做文艺批评的工作，难免得罪人，并且更不能杜绝一些嘁嘁喳喳的私议。我说，文艺批评作为思想斗争来看，这是一种战斗，既然是战斗，战士就可能受伤。鲁迅先生说，战士受伤了，难免会有几个苍蝇，在他的伤口上嗡嗡。

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认为这样看法并没有大错，硬说是诬蔑党，真不知从何说起。最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问题，有一次康濯对我说，原来处分上有这一条，后来觉得你也许是对胡风分子之类嘁嘁喳喳之流说的，所以去掉了。他告诉我这事，一方面表示处分决定是慎重的，但是他却忘记了，在多次处分讨论会上，人们把这句话作为我侮辱党的根据，正是说得何等响亮。而且据说最近他和陈适五谈话时却又把这句话当作罪状了。事情即使故意而且滑稽，也不应该到这样程度。

上面二件事情，曾经是被当作大罪状而多次引用的，我也说明过多次了，但都没有用处，因此，不得不再在这里说一说。

关于文艺报编辑部成为独立王国的问题，人们屡次说什么不民主，无批评，无原则等等，我认为都是缺乏根据的。我不想再举那些实际上是没有的，或细小的但被当作实有的、巨大的那些事件了。总而言之，所谓独立王国，实在只是一顶高帽子。

三我的被逮捕，据宣布恢复自由时的说法，根据两点：1．说有人说我说过有一支手枪和六颗子弹，要打死别人再打死自己。2．历史上有和所谓

托派（主要是翁涛）分子有关系。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实在是十分轻率的举动，而且更没有理由拖延这么久。说一说前一个根据吧，我曾有一支左轮枪和六颗子弹，这（是——恭怀加）北京军管时期组织上发的，有正式枪照。上述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我想来想去，只记得在第二（次——恭怀加）文代（会——恭怀加）以前，雪峰同志因为起草大会报告被否决而意志消沉，有一次他来我家，发牢骚似地说：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一定自杀了。我开玩笑说：要自杀，我这里还有一支枪六颗子弹呢！说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相信雪峰同志绝不会把这样的事当认真的。至于说打死别人，那就从脑子里都没有想过。老实说，我根本不会打枪，而那支枪也好久不擦，恐怕早已锈坏了。我恢复自由，同老婆郑重谈起此事，她说，她是记得一次你醉了，曾胡说乱道，艾青曾跑来劝你，好像你说过自杀之类的话，至于说打死别人，那是连影子也没有的。除此之外，更不知从何说起。用这样的根据捕人，实在是太轻率了。

至于翁涛问题，作为逮捕的根据，同样是轻率的。翁涛曾一度同我一起在苏联大使馆工作过，由于他不能完成任务，我们照事实报告了上级，才由大使馆出面割断同他的关系的。知道这事情的人都在。而且这问题，在延安审干时都审查过的。

翁涛是陈适五幼年时代的朋友，陈适五也和他在大使馆系统工作过，既然翁涛问题这么重要，居然是逮捕的根据之一，那么为什么陈适五同志在年底前归国，却不向他去调查最直接的材料呢？既这样重要，又这样轻率，这真叫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上了作协某些人荒谬的估计的当。作协的某些同志，完全用逼供信方式在对付我的问题。从思想问题到法律问题，其痕迹斑斑可寻。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我是逮捕，因为有正式的逮捕状，而且恐唬我说，公安部有我的材料云云。这以后，除了失去自由七八天后有康、张、阮章竞三同志来作过恐吓式的谈话以外，没有宣布过什么罪状，更没有正式审，一直到四个月之外，根本无人过问，这真使人奇怪。在这四个月中不许看书看报，我给老婆写信都被扣留。被逮捕时，根本没有明确告诉我的家属，搜查住所，我的孩子曾质问康濯，你为什么拿爸爸的东西，他还撒谎说替你爸爸整理整理，这真叫做又要瞎做又是胆小。

三四个月以后，我的老婆曾去找作协一些负责人，很难找，都是推三推四的，根本不明确答复问题。只有一次张僖同志曾对郑重说：被捕前是为了匿名信问题，逮捕后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而现在却又变成上述两件更莫名其妙的事，这也是使人不解的。

我的岳母是一个旧家庭妇女老太太，70多岁了，当时住在我家，我老婆因为发生了这事，想将她送回上海去，她要求来见我一次面，竟被拒绝。老太太对女儿说，如果老四得罪了什么人，她可以摆酒叩头，不要把好人当作坏人，这当然是她的旧看法。她既不被允许见我一次，哭着就回上海了，回上海后生了一次大病，几乎死去，我认为即使我真犯罪，作协的同志都不该对老年人如此没有人道。如果他们太不放心，尽可以监视我们见面。

不让看书看报，除了逼人发疯还有什么理由？被隔离在作协角落小间里，两人看守，生活上是不堪设想的。而事实上看守却如同儿戏。康等口口声声说照顾，实际上却在尽量虐待。第一次康说，公安部有你材料，应送监狱，因为老干部，可以照顾，住在机关。我说，你这话不对，如果犯罪，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必照顾，如不能肯定犯罪，根本不应使人丧失自由。他无话可答。

12 阮章竞同志和一个公安部的局长同志找我谈话，他让我说话，这是他最好的一点，但从他对我的看法看来，完全受了作家协会某些人逼供信的影响，我曾请求他让去公安机关或监狱，他说这不必。这次谈话我才第一次听说，我这是停职反省。谈话后我曾写给他长信一封，要求他考虑应即恢复自由，他至今并未答复。我屡次问阮章竞同志，他一会儿说局长病了，我说病了也得有人接替工作。一会儿阮又说局长不知到哪儿去了。这封信里我还提出很多问题和意见，至今未见答复，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以后，允许搬到对面小房间单独住，允许看报了。生活稍好了一些，张信同志还说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我要求把家里的收音机送来，使能稍稍有文化娱乐，就答应了，但拿来后却又给扣住了。说是我态度不好，不给了。作协某些人，实际上是在同我开玩笑。我说该给就给，不该给就不给，不要用拿糖骗小孩的方法，说叫叔叔给你糖吃，不叫不给。这对小孩已经是一种最恶劣的方法了，居然还学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有人屡屡说我态度不好，一直到今年二月间康濯和陈适五谈话，还说主要是态度问题。试问，世界上有以态度论罪的法律吗？其实我态度根本没有不好，我要求讲理，对于不讲理的一切行动，我必加抨击，有时声音大些，问题尖锐些，这是有的。在这种情形下，还要责备别人态度，岂不等于砍了别人脑袋，还怪别（人——恭怀加）脖（子长得——恭怀加）细吗？凡是正式讲道理，我都是平心静气谈的。第一（次——恭怀加）谈社会关系，翁涛问题是我自己提出的，而且谈得很平静很详细，这就足够说明情况是怎样的了。

陈适五前年回国的时候，合作总社根据作协总支的通知告诉了郑重，说适五回国了，她可以去看他，但不能谈政治。第一次合作总社的党是照样通知的。接着，有一个惠局长专门派一个人去同郑重说，刚才的通知是不对的，你们是一家人，又都是老党员，碰面不谈政治，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谈。这事后来郑重告诉我，我说，你们惠局长是通达人情法理的好干部，而作家协会某些人的这种规定，是既荒唐而又可笑的。但这种荒唐的规定，作协某些人居然还要重复一次，自己也不以为怪。

旧历新年后，答应我的家属来看我，小孩老婆先来，以后他们天天在我处吃饭。

过年时，郑重把我五弟带来了，引起了好大波浪，就又被禁止来看了。我据理力争，几天后又允许了。却又告诉郑重，叫她和我不许谈政治！

这以后老婆孩子放学下班都来我处，事实上监禁完全没有意义，两看守更成具文，但这情况竟还拖延三四个月之久。这以后由阮章竞同志和我联系，他声明他是负责处理我的问题的。但每次约定什么，必定失约，谈话一拖再拖。我要求立即恢复自由，阮都采取躲避推脱方法。我问他我究竟犯什么罪，他无言可答。有一次阮、康、张三人来谈一次话，由阮正式通知我，说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丁玲和我（的——恭怀加）问题（他们在我面前，未提反党集团这名词），但此事并无下文，到现在我仍莫名其妙。

后期两三个月来，阮的谈话比较客观了，我们也就谈得多些，但谈话机会是很少的，阮总是失约，我提的问题他避不作答，只说向上转达了。当时我也不知这上面指的是什么机构，后来知道是中宣部党委，但不理解怎么先一下子由作协转到公安部。后来又从公安部转到中宣部党委，到现在我

还莫名其妙。这样一直到 5 月 22 批准我解除隔离的，时间是 5 月 11 日，但正式通知我却是 5 月 22 日，这 11 天耽搁又是为何原因。这许多使人莫名其妙的、百思不解的情形，我要求弄明白。

我的几点声明：当我口头陈述完了的时候，党委书记认为：问题是复杂的，有关于思想的、学术的，也有关于组织的问题。是的，事实是如此，但这却实在并没有关于法律的，而却通过了公安部，让人无缘无故失去了近 280 天的自由，这也使我莫名其妙。

我的书报文件笔记本，一部分给搜查去了，一部分又经过一次我不在场的搬家，结果弄得很乱，要找材料也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我应当声明，这陈述书个别枝节可能不够准确，但并无防于基本的、绝大部分的事实真实性。请允许我保留以后查对、校正修改的机会。

我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的生活中，已被搞得很坏，我目前已没有一小时以上的睡眠，一个晚上醒一二十次。因此在写这书面陈述的时候，也颇受健康上的影响，如果写得太烦碎，太冗长，请阅者多多原谅。

我这一次陈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能说是初步的。我请求允许我继续有机会来逐步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也请求党委会彻底调查所有事实，从根本上弄清这一事件。

1 因此现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续撤销我的逮捕状，并说明误捕的理由和原因。这意见曾（对——恭怀加）在 5 月 22 日向我宣布恢复自由的崔毅同志提过，现在，再提一下。

2 谁做的决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个月零三天的长时期，问题是怎么在被处理的全部情形。因为有很多事情，我到现在还不得其解。

3 考虑根本撤销我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问题。

45 以及党的重大问题的传达，以及补读一定文件。

67 有无偏向，如何产生？谁应负责？8 请党组重新考虑：提请作协主席团根本撤回去年对我的撤文艺报编辑职务的行政处分。请主席团给予机会让我在一定范围内为第二次理事会中对我的诬蔑和毁谤进行合法的辩护。

关于父亲的《陈述书》

陈恭怀 1988 里面有一篇 1956 年他写给中宣部党委和中宣部的《陈述书》的底稿。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从中可以知道很多 1955 年他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事情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即便如我，虽然当时就在他的身边，并同他一起经历了以后多年的坎坷，对这一冤案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对其全部真相及来龙去脉，仍是如坠迷雾。“丁陈”案件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带给他超过过去经历的任何痛苦，包括童年时代四处流浪谋生，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而且还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以致于性格。

所以即使他在 1980 年前后重获改正后，这一事件带给他身体上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仍使他难以摆脱，以致于后来他从不提起，也不愿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它。父亲的最大痛苦在于，他所经受的那些本不该经受的曲解、羞

辱、压力和迫害，都是来自自己的同志、领导，和他们的抗争，远比同明火执杖的敌人斗争要复杂困难得多，他只有把这种痛苦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我们若想从他嘴里了解事件的经过，也就完全没有了可能。因此，《陈述书》的发现就成为我们了解“丁陈”案件的情况的唯一可信的材料。

循着这条线索，后来我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又陆续读到一些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文章与书籍，特别是一些偶然也必然得到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如1957年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二期）等等，才逐渐知道了一些原委。

所谓“丁陈”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的“肃反”运动中，丁，即丁玲。

陈，即我的父亲陈企霞。从1949年《文艺报》创刊后，两人曾一起担任该刊的主要负责人份说，他们都不是当时文艺界领导人、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所喜爱的人。

解放初期的文艺界，尽管有当年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指引，但是，一方面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文艺报》创刊到1955年在上海的矛盾也不时重新流露。《文艺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阵地，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文艺报》的工作就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丁陈”问题的发难，是从追查一封匿名信，追查丁玲与胡风有关“反革命关系”及康濯同志“揭发”丁、陈反党问题开始的，这封匿名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有关领导不是花力气去研究信中反映的问题真实与否，如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追查写信人是谁。我父亲与胡风没有关系。康濯的揭发信，当时只有三几位领导人看过，至今没有公开，无法得到其具体内容。如此，一时间，在作协及所属机关，特别是《文艺报》编辑部就大会小会不断，开始了全面“围剿”。

林默涵同志（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来到《文艺报》编辑部，“征求”大家对陈企霞同志的意见。大家开始不摸底，纷纷反映陈企霞如何领导有方，如何勤奋肯干。林顿时拉下脸来，勃然大怒：“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他评功摆好的！”人们不知所措，只好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从这里打不开缺口，他们又打算从历史上找父亲的问题。作协某领导人带着何路同志（作协人事室主任）等人到上海与南京，想从南京军区某部部长丁公量处抓到上海市公安局关押的“托派分子”翁涛与陈企霞之间的反革命关系的证据。丁公量没能提供出什么可以作为罪状的材料（延安审查干部时，陈企霞曾交待个人与翁涛认识，但个人不是托派，请组织审查），作协某领导人大大为不满，就向上海公安局打报告说，丁公量私自向陈企霞透露机密……这以后，作协前后召开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加紧揭发所谓“丁陈”问题的罪证与批斗“丁陈”的反党罪行，同时又通过莫须有的罪状将陈企霞逮捕。当时，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组员有周扬等人。周扬因中宣部“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为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副组长为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璉）认为逮捕陈企霞理由不足，不同意逮捕陈企霞，乃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组长刘白羽）名义，径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将陈企霞逮捕审查，至使陈不能参加后半截批斗“丁陈”

的会议。作协肃反小组向中央肃反领导小组报告的陈企霞的反革命罪行是什么呢？是1957年6月14日秦兆阳给邵荃麟的信中所说的“何路曾到南京调查陈企霞的材料，回来后，刘白羽同志把一些本来不是确切可靠的材料当成可靠的材料加以运用。”（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二期《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何路说的是什么材料呢？原来是说丁公量利用职权，个人提审翁涛，不让翁涛交待陈企霞与丁公量是托派。天哪：南京军区写的证明材料，明确提出根本没有此事。人们不禁要问，这材料究竟是怎么出笼的？就这样，1955年8月19日，父亲被逮捕。从8月19日到次年5月22日，父亲被非法关押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大院西北角的一间平房里。这期间，作协党组一方面对父亲实行逼供信，逼他就范，另一方面向中央呈交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代中央起草了批语一同呈报。中央书记处于1955年12月15日将此文件批转全国县团级以上党委。

《报告》列举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罪状有四点：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帽子很大，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

父亲被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的康濯与张僖同志持逮捕证逮捕审查，到宣布自由，前后共280天左右。后来，康濯与张僖执行中央肃反小组指示取消逮捕时，又说不是逮捕，而是“隔离审查”。1956年5月11日，中央十人小组宣布解除隔离，从通知下达，到5月22日通知到父亲本人，中间又被作协某些人无故拖延11天，父亲也就毫无理由地多被扣留了11天。看来，这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法制意识与组织观念。

5时中宣部党委邀请刘白羽与作协支部书记阮章竞等人出席。中宣部党委书记李之珪同志提出要父亲把以上的陈述写成书面的材料，于是就有了这份《陈述书》。事后党委会请示张际春同志，并根据组织程序，将《陈述书》与丁玲的《申诉书》一起作为绝密件打印发给中宣部长、副部长与党委书记、副书记，以供讨论研究。

还在父亲被关押的时候，作协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将父亲开除党籍。报告送至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处，小平同志指示，事情尚未结论，先不要忙于处理。随后中央十人小组指示解除父亲的“逮捕”，党籍问题也就搁置下来。

1956年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了“丁陈”的申诉，决定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成员主要有杨雨民（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党组副书记）等人，重新审查所谓的“丁陈”一案。经过慎重的调查，最后得出了此案不能成立的结论。周扬等人迫于确凿的事实，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结论。

1957年，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传达，并且承认没有查对清楚事实向中央报告不对。本来事情到此应该算是完满解决了，但是，在传达过程中，与会的同志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使周扬等人无法回答，周扬匆匆宣布暂时休会。

休会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运动开始。作协某些领导看到机会到了，迅速将无法解决的“丁陈”一案转向“为‘肃反’翻案”的新罪名，把丁、陈与对迫害“丁陈”不满意与不同意的几十个人统

统打成了“右派”或同情“右派”给予处分。这还不算，到1958年秋反右补课时，甚至连同中宣部里不同意他们意见，而按实事求是原则办事的李之珪、黎辛、张海、崔毅等人，即党委书记与三个副书记都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并分别划为“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与“反党分子”。而他们的所谓罪名，是包庇“丁陈”，为“丁陈”翻案等等。

具体说起来有：黎辛鼓动陈企霞写《陈述书》，李之珪到处散发《陈述书》，影响极坏等等等等……今天，人们再来读这份《陈述书》，不仅可以了解到解放初期文艺界内部的许多矛盾和真实情况，而且也可以深切领会到：在一个没有民主，个人说了算和缺乏法制意识的环境中，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多么的不正常，它会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不幸！而从《陈述书》呈递后事件发展的后果看，负有领导责任的个别人以自己的意志和意气处理事情又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在他们的眼里，李之珪等人听取陈企霞的申诉是“鼓动翻案”，而刘白羽等人复查“丁陈”案件却是正当工作？这完全是颠倒事非！1978年末，党中央政治局批发的对李之珪、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盖了红色图章，清清楚楚地说明“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李之珪等人当时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肃反、审干方针、政策”的，这一案件的定性材料都与事实不符。党是正确、光荣、伟大的，党是实事求是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手头父亲的这份陈述书，是他刚被解除隔离后，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和情绪最不好的时候写的手稿原件。他受了委屈，却没能听取全部揭发，也无法看到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他反党的文件，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正面为作协某些人背着他对他的栽赃式的“报告”作出辩解和申诉，他的陈述意见也就与报刊上对他的批判不太吻合。父亲的《陈述书》底稿字迹小而潦草，很多地方难以辨认，因为是历史原件，我无权改动和臆测，有些实在认不出的字，就只好空在那里了。

1996

坎坷人生路

黎白——陈企霞逝世十周年祭陈企霞同志逝世已经整整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希望这篇纪念短文，使读者能从中对企霞同志的精神、品德有所了解。

— 1945 城工部长刘仁也住在解放饭店。

一天上午，刘仁找我谈话。他用乡音很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考虑一下今后的工作吧，是留在城工部还是回北平呢？还是留在张家口继续读书呢？”我全家都在解放区，我不打算留在城工部再回北平了。就问：“在哪个学校读书？”刘仁说：“你挑！行政干校，白求恩医大，抗大，华北联大都可以。”我向刘仁提出可不可以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刘仁一口答应了我，并且说：城工部原来的一位同志叫夏力民，现在是文艺学院音乐系的学生，让她带我先到文艺学院看看，自己去选择入哪一个系，定下来后，城工部负责向学校推荐。

过了几天，夏力民领我来到东山坡。一片红房子座落在山坡上，当年

是日本侵略军的营房，如今已是联大文艺学院的院址。

夏力民介绍情况说，文艺学院刚刚组建，只有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四个系，学生很少，还有一个联大文工团也住在这里。

她领我走进一间日式屋子，只见一位穿着灰棉衣的中年人，瘦瘦的，戴着眼镜，正背着手来回走着。看见我们进屋也没有停步，冷漠的眼光从眼镜片透出来盯了我一下，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容，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心想，这个同志好严厉，千万别是文学系主任。

“陈企霞同志，文学系主任，认识一下。”夏力民笑着介绍说。

我感到失望了。文学系主任怎么这么冷冰冰的？我鞠了一个躬，没有吭气。

夏力民走了，屋里剩下陈企霞和我了。我怔怔地站在门口。

“坐！”陈企霞一指椅子。

我坐下。

“你多大了？”陈企霞背着手，站在我面前。

“15岁！”我心里又一阵紧张。心想，年龄是稍微小了点儿，高中又没毕业，八成儿没希望了。

“读几年书了？”陈企霞神情依然冷漠。

“高中二年级。”我低声回答。

“唔！”陈企霞点点头，看了我一眼，眼角似乎多了几条皱纹，算是笑意吧！

他又踱起步，“看过什么文学作品？喜欢谁？”“看过鲁迅、茅盾、老舍的作品，也看过武侠小说。”“看没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不喜欢看言情小说。看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也看过《水济》、《西游记》。”没有想到，陈企霞停下脚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吓了一跳，怔怔地看着他。

他突然止住笑。说：“写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与文学》，明天送来！”我答应着，站了起来。

第二天，我按时把《我与文学》交给陈企霞。他坐在那里仔细地看了一遍，朝我点点头，眼角上似乎又多了几条皱纹，说：“好吧，明天把行李带来吧！住在一组，组长叫李炳川，明天到我这里来。我领你去！”我就是这样进了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

二文学系的政治空气很浓，民主空气也很浓。这两种空气并存，本属平凡，却又极为可贵。

1946的大辩论。同学赵克前是东北籍，来系学习时间不久，他在时局座谈会上发言讲到苏联红军于1945年秋出兵我国东北进攻日本侵略军时，曾经奸淫掠抢，酗酒打人，因此，苏联红军也并不都是好人。东北人民对“小鼻子”（指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对“大鼻子”（指苏联红军）也没有好感。这个发言引起了来自延安及其它解放区的同学们的极大愤怒，立予驳斥。其它来自平津的同学大部分赞同这种驳斥，认为是反苏反共的言论。赵克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又举了许多苏军暴行的事例。少数东北籍的同学表示赵克前的看法正确，事实也准确。另一些东北籍的同学虽未敢公开赞同赵克前的意见，但私下里却表示赞同，认为延安等地来的老同志那种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就无名火高千丈和严厉驳斥的态度是以势压人。又感到由于大部分同学那种忿慨和强烈反驳的态度，赵克前同学的处境大为不妙，很有可能被院系领导

作为反动分子而处理。

我当时并不知道苏联红军在东北如何。但我倾向于延安来的同学那种驳斥。认为我们这里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好，苏联也是共产党，怎么能坏呢？八路军好，苏联红军怎么能坏呢？可想到赵克前会被抓起来，也有些同情，认为他是东北人，有他的亲身感受，大概不敢在这里公开造谣吧？经过两三天激烈的大辩论，在人心不定的时刻，系主任陈企霞在做结论时却说：“赵克前同学的想法，是可以讲出来的，言者无罪。个别苏联红军犯法也是存在的。”

但是，对联共党，对斯大林同志还是要有正确认识。许多同学的忿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民主讨论，不能忽视事实，也不能给赵克前加什么罪名。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帮助，使他能全面认识问题是必要的，如果对这种发言定什么罪就不应当了。”赵克前当场掉了泪。

经过这次大辩论，人心大定，同学们敢于无所顾忌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了。

这次大辩论，使同学们对系主任陈企霞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三 1945 我们文学系和整个联大一样，除了本身的学习之外，用了很大精力投入了边区的建设和政治生活中间。我们全校热烈地投入了边区临时议会的选举热潮，有一些师生投入了市内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斗争，文工团则上演了《白毛女》等剧，唤起解放区民众的觉悟，同时也给予民众很高的艺术享受。

不久，张家口失守，联大撤退到冀中束鹿县的农村。陈企霞要求每个同学在村里最少要交三个农民朋友，要向他们学习，要观察他们的生活、性格、作风，了解和采集民间传说、民谣，每周要写一篇人物特写交给老师。还决定由同学主编两个刊物，一个是《文学新兵》，由同学将自己的创作交给由同学担任的编辑，择优选登，手抄后以墙报形式挂在村子里显著的地方，每月一期。稿件还要评议，陈企霞、肖殷在讲课中对这些稿子的评论是极其严格的，有时会毫不留情的把同学某一篇文章指责得体无完肤，却又不能不使同学们认为指责是有理而中肯的。对优秀的稿件，他们则交地方的一些报刊发表。另一个刊物是《街头诗》，每月出刊两次，同样是手抄后挂在村中墙上，并且请村中的干部、小学教师、学生投稿。这种生活、创作、讲课、办刊物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很有有效的，许多同学受益终生。像同学徐光耀、李兴华、徐孔、陈森、白石、闻功、鲁煤、李克、鲁芝、刘朝兰、唐因、刘剑青、丁浦等等都是两个刊物的积极投稿者，后来，他们大多成了作家、记者，都能坚持以文艺为武器战斗了几十年。

1947 参加了土改的复查斗争；一批到冀中一些县深入农村开展艺术活动，一方面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地方戏曲等等，一方面帮助县、村剧切、民校培养文艺骨干，教跳秧歌舞、作曲、表演及一般创作方法。这三项活动先后都进行了近三个月，使很多同学开始养成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习惯，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文学系的同学，先后入学的的时间不同，依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干部的需要，毕业的时间也不同，是陆陆续续不断分配到其它单位的。每当有一批同学被分配离系，大家都曾十分珍重地互相勉励胜利后再相会！

1949 会。系主任陈企霞和何洛、厂民、肖殷、蔡其矫、熊焰等老师，在华北党政军文机关部队工作的原文学系同学几十位纷纷从前方、后方来到

北京欢聚一堂。

聚会的气氛热烈感人，聚会的形式却是很简单的，拼起来的桌上只摆着花生、瓜子，糖果和茶水，师生们久别重逢，喜悦、激动中却也有着一些遗憾。座谈中，不少同学发言讲到毕业后做着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有的同学甚至提出来请陈企霞设法能把他调到文学工作岗位上来。

陈企霞本来一直是难得笑逐颜开的，但是听了这类发言之后，他恢复了往日同学们十分熟悉的严肃神色，他脸上没有了笑容，手插在口袋里，站起身来回踱着快步。

漫谈之后，大家欢迎陈企霞讲话。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却是如此严厉。

他说：“文学系教育学生的标准，第一是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第二才是文学。文学系所教的文学只是起步，真正能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长期投入火热的斗争中间去，积累生活，提高水平，不然是谈不上搞文学的，我们没有空头文学家。

所以，不是应该想调动工作，而是努力地、无条件地做好本职工作，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我希望同学们首先把组织上交给你们的工作做好，利用一切条件密切注意生活，多学习、多实践、多读书，可以在工作之余写一些作品。现在就想当文学家，我可以这样讲，多数人远远不具备条件。要像列宁讲的那样，先甘心当一个螺丝钉！”以陈企霞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威望，他的讲话尽管严厉，却使许多同学心悦诚服。

谁料到八年之后，即1957年“反右”开始，第一个轰动全国的就是“揪出”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而文学系师生这次胜利后的聚会也被定为陈企霞纠集反党宗派小集团的一个吓人的罪状。仅我自己，这个“罪状”就跟随了我20年。

五 1957 部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与文学系同学徐光耀都在创作室受到揭发和批判，主要“罪行”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骨干。不久，徐光耀被划成右派，我也受了处分。但在本单位受批判的同时，还允许我们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及冯雪峰、艾青等。在几十天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我听不出了陈冯艾反党罪行和反党活动在那里，有人把联大文学系和中央文学研究所都形容为丁玲、陈企霞搞反党宗派的地方，我做为文学系的学生有着亲身经历，当然不信。

可是另一方面，使我又不能不相信当时在会上揭发批判丁、陈的一些事情。因为揭发者是我素来敬仰和比较熟悉的文艺界老同志，有的还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揭发的，导致我对丁、陈，特别是对陈企霞的看法也有改变。真正觉悟到“丁陈反党集团”是被制造出来的，以及一切都是“打”、“揪”出来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启发”，走资派无所不在，“横扫一切”，使我悟到今日之非，也悟到昨日之非。

六反右之后，我受了处分，总政创作室也已解散，我被下放到昆明军区，十三军三十八师宣传科工作，以后奉命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1962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在劫难逃，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近20年，没有和陈企霞同志联系过。

1979 饭店去看望了他。

他显得又老又瘦，但外形没有变，精神似乎也很好。那严厉的目光不见了，握着我的手，吃力地说：“对不起你们，因为我，让你们受了株连。”

我呐呐地说：“没有丁陈事件，我也还是要挨整的，我当时还有两条大罪，一条是恶毒攻击赫鲁晓夫；一条是赞同费孝通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在发言中把费孝通称呼为同志。”他说：“称同志并不错嘛！”他的眼里又闪出严厉的光。我想，20年的“改造”到底是抹不掉他的锋芒啊！

这次会晤，我们都没有互问20年来的经历，或是都在回避，或是尽在不言中了。

不久，陈企霞同志调回北京，一家人住在团结湖小区。这期间，他约我到他家大约有四五次。

企霞是老了，他已经不再来回踱步，也很少有突发性的大笑了。有一次，他要我去，他说：“我请你来，是想认真和你谈谈。”他郑重地向我提出，希望我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写出两部长篇：一个是写我们湘潭黎家，一个是写联大文学系。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就提出，我所掌握的资料和我的写作水平，很难完成这两部长篇。我特别提出，在文学系教学中，一强调为工农兵服务，而这两个题材都是写知识分子的，这是否偏离了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呢？他似乎恢复了系主任的严肃，说：“那是不全面的教育。歌颂工农兵是必须的，正确的。忽视了写知识分子是不对的。大家都认识得晚了很多年哪。你的大伯黎锦熙，二伯黎锦晖“五四”以前就是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勇士，你四伯黎锦纾是大革命时期在德国入党的，和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党小组。你的老辈中很多人是我们文化艺术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为主要人物写出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啊。”使我深为触动的是尽管他经受了20年的冤屈，而他的观念，对革命的热情，对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执着却毫无改变，老而弥坚，内心充满激情。我觉得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过去是师生之谊，只有崇敬，却说不上了解，现在仿佛对企霞了解得深了一些。

后来，一位同学因为要证明在文学系学习是参加革命，找到我，要我给他所在单位写一份证明，我答应了，但认为如果能当年系主任陈企霞写一份证明会更有力量，我们俩人就去拜访企霞。

陈企霞明显的消瘦和衰老了，走起来也显得步履维艰了。我将这个同学的来意讲明以后，没有想到，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脸色极为难看，暴躁地大骂：“这个组织部门都是白痴吗？晋察冀华北联大是从抗日战争就建立的大学，还不是参加革命？混帐已极，革命的基本常识，基本政策都搞不清楚，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半晌之后，他叹了口气说：“好，我写个证明吧。我这个几十年前的文学系主任写的证明管不管用，可就难说喽！”他立刻写了证明，而且郑重地盖了印章，说：“我再写封信给作协党组，请他们证明一下我的可靠性，也请他们写公函并盖章。不然，那个混帐组织部门还认为我陈企霞是个大右派呢！哈哈……”他又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大笑！

我明显感到企霞同志的脾气大变，喜怒无常了。他的变，我以为主要不是年龄老了，而是压抑着不愿人知的苦闷。我们这些学生是无法启齿，也无法帮助的啊！

所以，同学们看望企霞的次数大为减少了。直到突然接到同学的通知说企霞已经住入协和医院，并且报了病危，要我们赶去看望。

我和同学徐孔赶到病室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

一位久经考验也久历坎坷的共产党员，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与世长辞

了!

